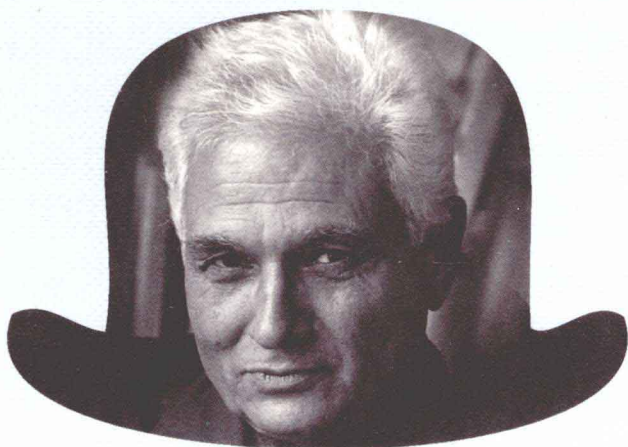


明  
系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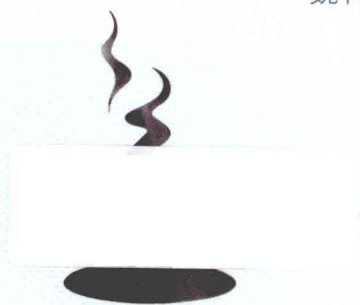
大师传记馆  
学术即人生



#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Benoît Peeters) | 著

— 魏柯玲 | 译



*Derrid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4445号

本书讲述了德里达的故事：

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后来成为全世界被翻译作品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直到生命最后仍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青睐的人。

他与最重要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非同寻常的友情，从路易·阿尔都塞到莫里斯·布朗肖，从让·热内到埃莱娜·西克苏，还有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和让-吕克·南希。

他同许多思想家一系列激烈而意味无穷的论战，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约翰·塞尔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

那个与他融为一体的概念——解构——及其奇特的命运，它远远超出了哲学界，对文学研究、建筑、法律、神学、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都影响深远。

为撰写这部引人入胜、充满惊奇的传记，作者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并参考了雅克·德里达终其一生积累的庞大的个人档案及大量通信。资料丰富全面。这部作品深刻地更新了我们对这位20世纪下半期重要哲学家的看法。

上架建议：名人传记

ISBN 978-7-300-18193-6

Avec le soutien du



9 787300 181936 >

定价：88.00元



大师传记馆  
学术即人生

#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Benoît Peeters) | 著  
魏柯玲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著; 魏柯玲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300-18193-6

I. ①德… II. ①皮… ②魏… III. ①德里达 (1930—2004) —传记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280 号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著

魏柯玲 译

Delida Zh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6.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55 000

定 价 8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雅克·德里达的第一部传记被译为中文，这对我来说既是喜悦也是荣耀。

《书写与差异》和《马克思的幽灵》的作者德里达只在2001年来过中国一次，但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语言和文明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早在1953年德里达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时，他与学习汉语的吕西安·比昂科（Lucien Bianco，中文名毕仰高）就同住一间宿舍。德里达后来以一篇题为《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的优美文章向毕仰高致敬，他在其中写到，多亏了毕仰高，他才“学会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sup>①</sup>。整整半个世纪里，关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及其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毕仰高始终是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尤其因了这位深刻了解中国且具有独立精神的汉学家，哲学家才避免了那一代许多法国知识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幻想。

毕仰高与中国很早就有真实的接触。1954年夏天，由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有幸获得邀请，与包括菲利科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在内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回到法国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迦里玛出版社，1967年）的未来作者就中国问题滔滔不绝，而德里达就是他独享的对话者。那时的毕仰高与德里达分享同一辆汽车——一辆老掉牙的1932年的C4雪铁龙，还共同订阅《世界报》。他们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属于坚定的左派，但坚决反对斯大林。他们与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内的几名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建了“保卫自由知识分子委员会”，将非共产党员的左翼学生聚集在一起。

随后，德里达和毕仰高两人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本传记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政治和个人意义上对德里

---

<sup>①</sup> [法] 雅克·德里达：《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L'ami d'un ami de la Chine”），载《中国革命的起源：致吕西安·比昂科》（*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n hommage à Lucien Bianco*），巴黎，L'Harmattan，2002，p. VIII - IX。

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哲学上，文字的问题——一直被西方形而上学压抑的文字——在德里达的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撰写即将令他成名的《论文字学》的过程中，他常常就汉语问题请教毕仰高，很遗憾自己没能认真研读这门语言。

德里达从1964年起执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对那里最具政治意识的学生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要比苏联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在德里达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的《原样》(Tel Quel)杂志编委会，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却保持着夸张可笑的狂热态度。而德里达对之保有警醒的距离，尽管他不断受到持续的压力。在向毕仰高致敬的文章里，他谈到1968年5月之后的这些年代，那时“最令人不安，有时最危险又最滑稽的教条主义的颀颀主宰着某种巴黎文化的舞台”。

中国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的赌注，对于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都是如此。1971年，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在著名的瑟耶出版社出版了《论中国》一书，热情洋溢地讲述了在中国三个星期的旅行。此书将掀起激烈的论战。当德里达就此询问毕仰高时，毕仰高并未隐瞒对这本充满谬误与自得的宣传意味浓重的作品持有的恼怒。1972年1月，“马西奥奇事件”将导致德里达与《原样》和索莱尔斯痛苦决裂。

在1972年3月18日致年轻的比利时哲学家埃里克·克莱芒(Eric Clémens)的信中，德里达对这次冲突作出了详尽解释。他一开始就向对方说明他显然对中国没有任何敌意：“在历史—理论层面上，在我们共同的领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参照中国的人。在最现实的政治层面上，我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之处。”但在德里达的眼里，对这一切还需进行注定艰难的严密的分析。在此之前，他坚持对巴黎知识界以“文化大革命”之名所指称的一切保持“最冷静的批判性的警觉”。未来将很快证明他是对的。而同一个德里达，长期以来被怀疑不关心政治的德里达，有意不合时宜地于1993年发表了杰作《马克思的幽灵》，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次试图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中国之旅从1980年代末起就开始筹划，但直到2001年才成行。当时德里达已有7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大多数译自英文版，造成不少模糊和误解。<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希望找到好的对话者，能够在更加严格的基础上推进作品的翻译出版。出发之前，德里达自然还是向老友毕仰高征求建议：中国公众最希望听到什么样的主题？是否可以谈论他最关心的死刑问题？

德里达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于2001年9月4日发表于北京大学，题目是《宽恕、

---

<sup>①</sup> 当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德里达著作约有《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立场》、《他者的单语主义》等几种。——译注

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在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和香港的旅途中，他还进行了另外两场讲演和几场研讨会，并多次接受访谈。德里达特别对中国学生说，马克思主义并未死亡。哲学家并不就此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重新找回其力量和恰当性，如果它能够摆脱有时以之为借口的极权主义偏差的话。<sup>①</sup>

这次旅行本身极为成功。德里达并不掩饰他对中国的强大与现代化，以及随处可见的大规模建筑和工地所感到的惊叹之情。他也十分感动于所受到的礼遇：他到处获得隆重接待，每一步都有人照相。而他最兴奋的是他的许多作品将直接从法文进行翻译。

就在上海，几乎到了旅行的尾声，“9·11”事件发生了。几周之后，他对吉奥瓦纳·博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讲述：“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咖啡馆喝咖啡，老板对我们说一架飞机‘坠毁’在双子塔上。我冲进酒店，从一开始的电视画面就很容易预料到这一切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成为一个‘重大事件’。”<sup>②</sup>德里达随即在中国香港发表的讲演中对事件进行了初次分析。

对德里达与中国的关系作过这样简短的回顾之后，我想以一个难解而诱人的重要问题作结。雅克·德里达如此深植于法语中的思想如何能够穿越国界呢？这一思想在如此不同的中国传统当中是如何被阅读和看待的？诸如延异<sup>③</sup>（différance）、解构（déconstruction）或萦绕学（hantologie）这样的概念所揭示出的语言中的思想经验，还有对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让·热内（Jean Genet）这些与法语源泉密不可分的作家的精细解读，这一切如何能够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翻译中存续下来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该由中国读者得出，而答案本身即开启了巨大的研究与思考的空间。无论怎样，我希望这部传记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入德里达带来的这份20世纪下半期的重要书写，也让他们发现这个人——脆弱，非凡，令人难忘。

伯努瓦·皮特斯

2013年4月17日于法国巴黎

<sup>①</sup> 关于德里达在中国的情况，参见杜小真、张宁编译：《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张宁著译：《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译注

<sup>②</sup> 雅克·德里达，尤尔根·哈贝马斯：《9·11的“概念”》（*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Galilée，2004，p. 164。

<sup>③</sup> 加下划线文字为原书斜体文字。全书同。——译注

哲学家有生活吗？为其作传是可能的吗？这是1996年10月在纽约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雅克·德里达这样开始他的即兴发言：

正如你们所知，传统哲学是排斥传记的，它认为传记是哲学之外的东西。诸位还记得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吧：“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是怎样的？”嘿，答案就在一句话里：“他出生，思想，死亡。”其余的一切纯属轶事。<sup>①</sup>

不过这并非德里达本人的立场。早在1976年他就是一次关于尼采的讲演中说道：

我们不再认为一名“哲学家”的传记只是经验性事件的汇集，只在一种体系之外留下一个签名和一个标记，而只有这体系才供人们进行真正哲学的解读，才被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存在。<sup>②</sup>

那时的德里达呼吁重新探讨“广义的传记，以及狭义的、哲学家的传记”，以再次思考“文集与身体”<sup>③</sup>之间的界限。他对此始终关注。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他仍然坚持说完全不介意谈论“‘传记’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令他非常感兴趣：

我是少数几个对此不断提起关注的人之一：我们非常需要（而且需要很好 10

---

① “Thinking Lives: The Philosophy of Biography and the Biography of Philosophers”, New York, 1996. 关于德里达这次发言的一些片段见 Kirby Dick 和 Amy Ziering Kofman 的影片 *Derrida*（影碟由 Blaq out 出版社于 2007 年发行）。其他片段可在互联网上查到。

② Jacques Derrida, *Otobiographies. L'enseignement de Nietzsche et la politique du nom propre*, Galilée, 1984, p. 39.

③ 法文的“文集”或“汇编”为 corpus，与“身体”一词 (corps) 同源。——译注



地)重新展示哲学家的生活及其以真实身份介入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黑格尔,弗洛伊德还是尼采,萨特还是布朗肖,等等。<sup>①</sup>

在自己的作品中,德里达在写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或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人时亦不惮使用其生平资料。譬如在《丧钟》(*Glas*)里,他大量引用黑格尔的通信,且谈到其家庭关系和财务困境,并不认为这些材料无关紧要或与其哲学工作无关。

在科比·迪克(Kirby Dick)和艾米·齐尔林·考夫曼(Amy Ziering Kofman)拍摄的影片《德里达》的最后几组镜头里,他走得更远。在影片中,当被问到希望在关于康德、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记录片中看到什么时,他挑衅地回答:

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的性生活。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因为这是他们从不谈论的事。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从来不说东西。为什么哲学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如同无性人?为什么他们将私生活从作品中抹去?为什么他们从不提及私事?我并不是说应该拍一部关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色情片。我是想听他们讲述爱情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更具说明意义的是自传——他人的自传,首先是卢梭和尼采的,但也包括他本人的自传。德里达将自传视为彻底的哲学对象,其原理及细节都值得探究。对他而言,自传甚至是最完美的写作体裁,它最早予以他写作的欲望,并始终令他萦怀。他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写一部生活与思想的庞大日记,一篇从不间断、千变万化因而是绝对的文本:

11 在根本上,回忆录并非人们通常所指的形式,而是一种普遍形式,代表着令我着迷的一切,是疯狂的欲望,想以其独特的语言保留一切、汇聚一切。对我来说,哲学,或至少学术性的哲学,一直服务于回忆的这一自传性蓝图。<sup>②</sup>

这并非回忆录的回忆散落在德里达的许多作品中。一部零落的自传的轮廓隐现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Autrui est secret parce qu'il est autre", entretien avec Antoine Spir, repris in *Papier Machine*, Galilée, 2001, p. 378.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entretien avec Maurizio Ferraris, Laterza, 1997. 我引用的是保存在当代出版资料馆(IMEC)的从未译成法文的手稿。

于《割礼忏悔录》、《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isme de l'autre*)、《面纱》(*Voiles*)、《盲者的记忆》(*Mémoires d'aveugle*)、《侧道》(*La contre-allée*)，以及其他许多文本中，包括晚期的很多访谈，还有那两部以他为主题的影片，其中充满了具体的有时十分私密的细节，他将之称为“死亡的异质的自传书写作品”(opus autobiathanatohétérographique)。我大量运用了这些极为丰富的材料，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均与其他资料来源相印证。

※ ※ ※

本书无意介绍德里达的哲学，更不企图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其广阔性与丰富性都将对论者提出持久的挑战。我想尝试的既是个人史，也是思想史。因而我会着重描述德里达的阅读经历和他所接受的影响，他主要作品的源起及其在读者那里引发的震荡，他从事的斗争，还有他设立的机构。但这并不因此而成为一部精神传记。这种说法令我不快，因为它在很多方面似乎排除了许多东西：童年、家庭、爱情、物质生活。对德里达本人——他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的谈话中作出过解释——“‘精神传记’这一说法”也是极可质疑的，而在精神分析学诞生一个世纪之后，“有意识的精神生活”这一说法则更成问题。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在他看来极为脆弱模糊： 12

在某个公众人物——当人们根据某些含糊的标准而称之为公众人物时——的生命轨迹的一个特定时刻，其所有的私人档案，如果这一说法本身不算自相矛盾的话，只要不被立即烧毁，都注定要变成公共档案（即便被烧毁，它也会变成公共档案，除非它没有在身后留下一抹炽热的仍在述说的灰烬，供诠释者或公众分析出某些可供存档的症状）。<sup>①</sup>

本传记因而不自设任何禁忌。描写雅克·德里达的一生，亦即叙述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的故事，他后来成为全世界作品被翻译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也是叙述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人的故事，他直到最后始终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的青睐；亦即再现种种不同的世界，从独立前的阿尔及利亚到高等师范学校的小宇宙，从结构主义的纷繁变幻到1968年后的风云动荡；也是追述他与最重要的作家和哲学家们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友情，从路易·阿尔都塞到莫里斯·布朗肖，从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1995年2月1日研讨课记录，当代出版资料馆档案。

让·热内到埃莱娜·西克苏 (Hélène Cixous), 还有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和让-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 还是记述他同思想家们常常激烈而意味无穷的一系列论战, 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约翰·塞尔 (John R. Searle) 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以及一些远远超越学术界的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牵涉到海德格尔和保罗·德·曼; 更是再现许多勇敢的政治活动, 包括支持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无身份者或同性婚姻; 也是叙述一个概念——解构 (la déconstruction) ——的命运及其异乎寻常的影响, 它远远超出了哲学界, 对文学研究、建筑、法律、神学、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都影响深远。

13 为实现这一写作计划, 我当然尽可能全面地阅读或重读了他的著作。其卷帙浩繁人所共知: 80 部已出版的著作, 不计其数未曾集结成书的文章和访谈。我也尽可能参阅了许多二手文献。但我主要倚重德里达本人留下的数量可观的资料, 并会见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

对于德里达这位《纸机器》(*Papier Machine*) 的作者, 档案令他着迷, 也是他不断思考的主题, 但同时也是非常具体的现实。正如他在最后的几次公开谈话中所说的: “我从未丢掉或毁弃任何东西, 哪怕是布尔迪厄或巴里巴尔 (Balibar) 放在我门口的小纸条……我保存着一切最重要的和似乎最无足轻重的东西。”<sup>①</sup> 德里达希望这些资料均可供人参考, 他甚至说:

最美妙的幻想, 就是所有这些纸张、书籍、文章或软盘早已超越我的生命而存在。它们早已是见证。我不断地想到这些, 想着谁会在我死后前来, 看看譬如这本我在 1953 年读过的书并发出疑问: “他为什么在这儿做个记号, 又在那儿画个箭头?” 这每一张纸片、每一处踪迹的余存的质构萦绕着我。<sup>②</sup>

这些我仔细研究过的个人资料主要收藏于两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朗森图书馆 (Langson Library) 的特别收藏处, 当代出版资料馆 (IMEC) 在位于法国戛纳附近的阿登修道院里的德里达遗赠。我渐渐熟悉了德里达那让所有了解他的

---

<sup>①</sup> “Dialogue entre Jacques Derrida,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et Jean-Luc Nancy”, *Rue Descartes* n° 52, PUF, 2006, p. 96.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nt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 17, décembre 2001.

人都觉得费解的字体，并有幸第一个看到了他终其一生积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学校作业，个人手记，书稿，未发表的教案和研讨会发言稿，访谈与圆桌会谈记录，报刊文章，当然还有信件。

德里达仔细保留着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来信——他在临终前几个月还在惋惜唯一一封被毁掉的信件<sup>①</sup>——但他极少打草稿或留备份。我必须进行大量搜寻工作才能找到或查阅到最重要的通信，比如他和路易·阿尔都塞、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布朗肖、福柯、列维纳斯、加布里埃尔·布努尔（Gabriel Bounoure）、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保罗·德·曼、罗日·拉波尔特（Roger Laporte）、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萨拉·考夫曼（Sarah Kofman）的通信。更珍贵的还有他在成长期间寄给青年时代友人的一些信件，如米歇尔·莫诺里（Michel Monory）和毕仰高。还有许多已无处寻觅或丢失，比如他给亲友的大量信件。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我在德里达逝世后不久即开始撰写这部传记，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话来说，那时我们才刚刚看到“德里达的回归”。本书开始于2007年，出版于2010年，他该是80岁了。哲学家的大多数亲友这时都还健在，只依赖书面材料将是荒谬的。

玛格丽特·德里达（Marguerite Derrida）对我极为信任，她不但允许我接触所有资料，还接受我的大量访谈。同各个年代当事人的谈话也非常重要，这些会谈常常花很长时间，时有重复。我有幸访问了他的兄长、妹妹和他钟爱的表妹，以及他青年时代的许多同学和友人，得以了解被他称为“32年之久的青春期”。我采访了上百位人士：友人、同事、出版商、学生，甚至几个诋毁他的人。当然，我没能联系到所有可能的亲历人，还有一些人不愿见我。一部传记也是在种种障碍、抗拒或抵制中完成的。

面对自己投身的这一艰巨任务，我不止一次感到眩晕。完成这一计划大概需要某种天真或至少是憨厚的秉性。德里达著作最出色的诠释者之一杰弗雷·贝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不是严肃地回避了撰写一部真正传记的可能性吗？

当然，人们期待有一天德里达成为传记的主题，而且什么都不能妨碍它以传统的体裁写成……但这种建立在迎合与补偿心理上的写作迟早会同德里达的

<sup>①</sup> “我曾经毁掉过一封信。带着可怕的狂热：我想撕毁它——不行；想烧掉它——不行……我毁了一本不该毁掉的信件，为此悔恨终生。”（*Rue Descartes* n° 52, PUF, 2006, p. 96.）有迹象表明此事发生在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

工作相冲突，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动摇前者的假设。我们很可以断定，最后受到解构主义冲击的学术或近学术的写作体裁之一便是传记。……能否想象一种非等级化的、多重层分的亦即碎片的传记呢？它将摆脱主宰传统传记体裁的同一性和目的性。<sup>①</sup>

我并不否认这一看法深具意义，但归根到底，我想要撰写的并非德里达式的传记，而是德里达的传记。在这件事上，就像在许多别的方面，我认为模仿并非我们能够致以他的最好礼敬。

我认为重要的是另外一种忠诚。从1974年第一次阅读《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开始，雅克·德里达就一直隐秘地伴随着我。十年之后我开始结识他，那时他正在就我和玛丽-弗朗索瓦丝·普里萨（Marie-Françoise Plissart）合作的摄影集《注视的权利》（*Droit de regards*）撰写一篇不吝赞誉的评论。我们有过一些  
16 信件和书籍的往来。我从不曾中断对他的阅读，到现在，有三年之久，他占据了我最好的时光，直至潜入我的梦中，仿佛一种不在场的合作。<sup>②</sup>

写作一部传记便是经历一场亲密无间又时而令人胆怯的冒险。无论以后怎样，雅克·德里达都将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一名已故的好友。他不会不拷问这奇特的单向的友谊。我确信无疑：传记只能书写死者。所有的传记因而都缺少那名至高无上的读者：死者。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传记作家的伦理学，那也许就在于此：他是否敢手持此书站在他的传主面前？

---

① “A life in philosophy”，in Geoffrey Bennington, *Other Analyses: Reading Philosophy*, 电子版可见 <http://bennington.zsoft.co.uk>。

② 如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本书的酝酿过程和作者所面对的问题，可参阅《与德里达在一起的三年——一个传记作家的手记》（*Trois ans avec Derrida. Les carnets d'un biographe*）。该书与《德里达传》同时由 Flammarion 出版。

# 目 录

## I 杰基 (Jackie): 1930—1962

- |       |                        |    |
|-------|------------------------|----|
| 第 1 章 | 非洲国王(1930—1942)        | 3  |
| 第 2 章 | 在阿尔及尔在阳光下(1942—1949)   | 13 |
| 第 3 章 | 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1949—1952)   | 28 |
|       | 第 4 章 高 师(1952—1956)   | 48 |
|       | 第 5 章 美国一年(1956—1957)  | 67 |
| 第 6 章 | 克雷阿的士兵(1957—1959)      | 77 |
|       | 第 7 章 勒芒的忧郁(1959—1960) | 91 |
|       | 第 8 章 走向独立(1960—1962)  | 95 |

## II 德里达 (Derrida): 1963—1983

- |        |                        |     |
|--------|------------------------|-----|
| 第 9 章  | 从胡塞尔到阿尔托(1963—1964)    | 107 |
| 第 10 章 | 在阿尔都塞的荫庇下(1963—1966)   | 123 |
|        | 第 11 章 文字本身(1965—1966) | 133 |
|        | 第 12 章 丰硕的一年(1967)     | 148 |
|        | 第 13 章 轻微的后退(1968)     | 163 |
| 第 14 章 | 不适的位置(1969—1971)       | 184 |
|        | 第 15 章 决裂(1972—1973)   | 205 |

第 16 章	《丧钟》(1973—1975)	229
第 17 章	捍卫哲学(1973—1976)	239
第 18 章	另一种人生(1976—1977)	258
第 19 章	从“新哲学家”到哲学大会(1977—1979)	268
第 20 章	发送与考验(1979—1981)	277
第 21 章	布拉格之夜(1981—1982)	298
第 22 章	新的牌局(1982—1983)	307

### III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84—2004

第 23 章	解构的领地(1984—1986)	319
第 24 章	从海德格尔事件到德·曼事件(1987—1988)	341
第 25 章	生动的记忆(1988—1990)	363
第 26 章	六十岁哲学家的肖像	376
第 27 章	在体制的边界(1991—1992)	397
第 28 章	解构在美洲	407
第 29 章	马克思的幽灵(1993—1995)	417
第 30 章	德里达国际(1996—1999)	432
第 31 章	对话的时代(2000—2002)	448
第 32 章	向生向死(2003—2004)	470
	资料来源	492
	书目	495
	致谢	501
	人名索引	503
	译后记: 阅读德里达	536



I

杰基

**Jackie**

1930—1962



# 第 1 章 非洲国王<sup>①</sup>

## (1930—1942)

很长时间里，德里达的读者对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一无所知。他们仅仅知道他的出生年代——1930年，还有他的出生地——埃尔-比亚（El-Biar），即阿尔及尔的一个郊区。一些自传性的指涉文字确实出现在《丧钟》，特别是《明信片》里，但它们完全藏身于文本游戏，保持着彻底的不确定性，令人无从判断。 19

直到1983年，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刊登的与卡特琳娜·大卫（Catherine David）进行的访谈中，雅克·德里达才第一次同意提供一些事实上的细节。他含讥带刺，隐含愠怒，词锋简练，就好像急于摆脱这些让他无奈的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对您来说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呵，您希望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出生于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亚一个已归化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但是……”这有必要吗？我做不到，我需要帮助……

您的父亲尊姓大名？

好吧。他有五个名字，所有的家族名字和其他一些名字都隐藏在《明信片》里，他们本人有时都认不出来，这些名字常常不用大写，比如“埃梅”或者“勒内”……

您离开阿尔及利亚时多大年龄？

显然……我19岁来到法国。我从未远离埃尔-比亚。40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

① 原文内古斯（Le Négus），指埃塞俄比亚君主的称号。——译注

20 带着最初回荡在深处的沉闷声响。<sup>①</sup>

1986年，在法国文化电台的一期节目《雅克·德里达的快乐》里，他在同迪迪埃·卡昂（Didier Cahen）的对话中再次表示反对回忆生平，但也承认文字使人有可能触及这些问题。

我希望有一种可能的叙述。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我幻想有一天——不是讲述这份遗产，这些过去的经历，这个故事，而是从中至少形成一种叙述，在其他可能的叙述当中。但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工作，需要冒险，而我直到现在还无能为力。要发明，发明一种语言，发明追忆的方式……<sup>②</sup>

渐渐地，对童年的暗示明显起来。1987年，在《尤利西斯留声机》（*Ulysse gramophone*）中，他提到自己出生第七日时取的秘密名字埃里（Élie）；三年之后，在《盲者的记忆》中，他提到因家人认可哥哥勒内的绘画才能而感到的“受伤的嫉妒”。

1991年，瑟耶（Seuil）出版社在“当代人”丛书出版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书，这标志着一个转折：在书中，德里达本人撰写的《割礼忏悔录》从头至尾都是自传性的，而且在最后所附的“履历”里，德里达服从了他所称的“（自传）体规则”，尽管该书合著者杰弗雷·贝宁顿小心地形容说，这热情并非贯穿始终。<sup>③</sup>但在这里，童年和青年时期远非主要部分，至少从个人生活记录的角度来说如此。

从那时起，德里达自传性的文字越来越多。他在1998年承认：“在最近20年……以既虚构又非虚构的方式，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文字越来越多了：回忆录，忏悔录，对忏悔之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思考。”<sup>④</sup>这些片段放在一起便形成了相当清晰的叙述，尽管有重复和缺失。它们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无可估量的重要来源，也是可

① “Derrida l'insoumis”, entretien avec Catherine David, *Le Nouvel Observateur*, 9 septembre 1983. Repris dans 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Galilée, 1992, p. 128-129.

② “Il n'y a pas le narcissisme”, entretien avec Didier Cahen, 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216.

③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Seuil, coll. “Les Contemporains”, 1991, p. 297.

④ “À voix nue”, entretien radiophonique avec Catherine Paoletti, repris dans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 Éditions de l'Aube, 1999, p. 10.

供我们以感性的方式仿佛从内部追述其童年的唯一来源。但这些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事（还需要提醒读者吗？）首先应作为文本来阅读。我们应该以对待圣·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谨慎态度接近它们。无论怎样，德里达承认，它们是事后对过去的重构，脆弱而不确定：“我试图在有记载的事实和主观参照之外，回忆我在彼时能够想到和感受到的，但这些尝试常常失败。”<sup>①</sup>

能够补充并印证这些大量自传性材料的真实痕迹可惜并不多。一大部分家庭资料似乎在1962年丢失，当时德里达的家人匆匆离开了埃尔-比亚。我没有发现阿尔及利亚时期的任何一封信。尽管多方努力，我仍未能接触到任何他上过的学校的档案。但我有幸搜集到四名亲历人对他的介绍：勒内和雅尼娜·德里达（Janine Derrida）——雅克的兄长和妹妹，他的表妹米什琳·莱维（Micheline Lévy），还有他当时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菲尔南·阿沙洛克（Fernand Acharrok）。

※ ※ ※

在他出生的1930年，阿尔及利亚大张旗鼓庆祝法国征服一百周年。当时的法国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访阿期间着力对一个世纪以来“殖民及文明的令人景仰的成就”表示祝贺。这一时刻被许多人认为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巅峰。第二年，在文森纳森林举行的殖民博览会吸引了3300万名参观者，而同时超现实主义者们举办的反殖民博览会只取得了可怜的成功。

拥有30万居民、大教堂、博物馆和林荫大道的“白色阿尔及尔”就好像法国在非洲的橱窗。一切都试图让人联想到法国本土城市，从其街道名称开始：乔治-克莱蒙梭大街、加利埃尼大道、米什莱街、让-麦墨兹广场，等等。“穆斯林”或“原住民”——泛指阿拉伯人——略少于“欧洲人”。杰基将在此成长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在政治权利和生活条件上都深为不平等的社会。各个种群毗邻而居但很少混杂，尤其是极少通婚。

和其他许多犹太家庭一样，德里达一家在法国统治前很久就从西班牙来到了阿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起，犹太人被占领者认为是潜在的助手和盟友，这使他们与此前一直混居的穆斯林拉开了距离。另一事件将加剧他们的分裂：1870年10月24日，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总理签署了向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3.5万名犹太人集体授予法国国籍的法令。这并未阻止多年来反犹太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蔓延。第二年，因《犹太的法国》（*La France juive*）而不幸著称的埃德华·德吕蒙

<sup>①</sup> *Sur parole...*, *op. cit.*, p. 11.

(Édouard Drumont) 当选为阿尔及尔议员。<sup>①</sup>

《克雷米厄法令》的后果之一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融入法国生活。他们当然还保留着宗教传统，但仅限于纯私人的领域。犹太名字或者法国化，或者像德里达家族那样，被放在隐秘的第二位。他们不再说“犹太会堂”（synagogue）而只说“教堂”（temple），也不再说巴尔·米茨瓦（bar-mitsvah<sup>②</sup>），而说领圣体（la communion）。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德里达对历史问题颇为关注，他对这一变化十分敏感。

23 我见证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主义的非同寻常的变化：我的曾祖辈在语言、风俗等方面还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克雷米厄法令》（1870）之后，在 19 世纪末，下一代人资产阶级化了：虽说这一代由于犹太人受迫害的缘故 [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正如火如荼] 几乎总是在阿尔及尔区政府的后院里秘密地举行婚礼，但我的外祖母已经像巴黎中产阶级那样养育女儿们了（学习巴黎 16 区的礼仪，上钢琴课，等等）。之后是我的父辈：他们中少有知识人，主要是或大或小的生意人，其中有些已经利用殖民形势成为法国本土一些名牌的独家代理。<sup>③</sup>

德里达的父亲，阿伊姆·阿隆·普罗斯佩·查理（Haïm Aaron Prosper Charles），又称埃梅，1896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阿尔及尔。他 12 岁时进入塔舍酒厂做学徒，在那里工作了一生，就像他自己的父亲阿伯拉罕·德里达（Abraham Derrida），也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父亲，后者也曾经在阿尔及尔港口的一家酒厂工作。葡萄种植业在两次大战之间是阿尔及利亚的首要收入来源，其产量居全世界第四位。

1923 年 10 月 31 日，埃梅与乔吉特·苏塔娜·埃斯泰·萨法尔（Georgette Sultana Esther Safar）成婚。后者出生于 1901 年 7 月 23 日，是莫伊斯·萨法尔（Moïse Safar, 1870—1961）和福图内·泰米姆（Fortunée Temime, 1880—1961）的女儿。埃梅与乔吉特的第一个孩子勒内·阿伯拉罕（René Abraham）出生于 1925 年。第二个孩子保罗·莫伊斯（Paul Moïse）1929 年 9 月 4 日三个月大时夭折。时隔不到一年，后来被称为雅克·德里达的孩子出生了。他后来在《割礼忏悔录》中写道，这

① Benjamin Stora, *Les Trois Exils. Juifs d'Algérie*, Stock, 2006, p. 48. 我也参考了同一作者所著的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loniale, 1830—1954*,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04, p. 32.

② 希伯来语，指犹太男子成年仪式。——译注

③ Jacques Derrida,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entretien avec Jean Birnbaum*, Galilée, 2005, p. 36—37.

让他成为“珍贵而如此脆弱的闯入者，多余的人，在他人的位置被爱着的埃里”<sup>①</sup>。

杰基于1930年7月15日黎明出生在位于阿尔及尔高处的埃尔-比亚的一处度假屋。他的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中断牌局，那是她一生酷爱的游戏。孩子的主要名字大概来自电影《寻子遇仙记》（卓别林影片 *The Kid*）中扮演主角的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行割礼时他还得到了第二个名字——埃里，但与其兄妹不同，这个名字不曾登记在身份档案上。

直到1934年，德里达一家除夏天外都住在城里。他们居住在圣·奥古斯丁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完美巧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忏悔录》的作者将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对这所父母居住过九年的房屋，他只有些十分模糊的印象：“幽暗的衣帽间，房子下面有一家食品店。”<sup>②</sup>

24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前不久，德里达一家定居埃尔-比亚——阿拉伯文意为“井”，位于较富裕的郊区，孩子们得以自由呼吸。他们贷款多年买下一处简朴的房屋，位于欧莱尔-德-帕拉迪纳街13号。这所房屋在“阿拉伯聚居区和天主教墓地的边缘，安息之路（chemin du Repos）的尽头”，带一个花园。德里达后来将之称为果园，其意象为天堂，也指赎罪（Grand Pardon）及卡巴拉（Kabbale，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解释）传统中的圣地。

妹妹雅尼娜的出生伴随着一件家族中颇为著名的趣事，我们所知德里达最早说的一句话。当时祖父母让他进到房间，给他看了一个箱子，里面大概装着当时分娩用的必需品，并告诉他妹妹就是从那儿来的。杰基走近摇篮看了看婴儿，宣称：“我想让她回到她的箱子里去。”

五六岁时，杰基是个十分斯文的孩子。在家族庆典时他戴顶小草帽唱莫里斯·舍瓦利耶（Maurice Chevalier）的歌；他皮肤黝黑，常被称为“非洲国王”。在整个童年期间，杰基和母亲的关系尤为亲密。由乳母喂养到三岁的乔吉特对自己的孩子们并不十分温柔，也不擅长情感外露。但这并不妨碍杰基对她的热爱，就如同《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马塞尔。德里达形容自己像个“大人喜欢用一点小事逗哭的小孩”，“直到青春期之前，每晚都喊‘妈妈我怕’，直到大人让他睡在父母旁边的长椅上”<sup>③</sup>。开始上学时，他把脸贴在学校院子的栏杆上哭泣。

① Jacques Derrida,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52-53.

② *Ibid.*, p. 124.

③ *Ibid.*, p. 114-115.



25

我清楚地记得同家人和母亲分离的痛苦，记得在幼儿园里的眼泪与哭喊，还看到老师对我说话的景象。她说：“你妈妈会来接你。”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她在做饭。”我于是想象在幼儿园里……有个地方妈妈在做饭。我还记得进园时的泪水哭泣，离开时的欢笑。……我甚至为了不上学装病，让大人给我量体温。<sup>①</sup>

这位后来写下《鼓膜》(*Tympan*)和《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的未来作家被反复发作的中耳炎困扰，在家中引起很大的不安。他被带着到处看医生。那时的治疗方法很激烈，要用装着热水的橡皮球冲洗耳膜。有一次甚至提到切除乳突骨，这手术非常痛苦，但在当时很常见。

这时期发生了另一起严重得多的事件：比他大一岁的表兄让-皮埃尔在自己的住宅前被汽车轧死。由于误传，正在学校的杰基最先听说是哥哥勒内死了，这使他深受打击。这最初的丧亡对德里达影响很大。后来他对表妹米什琳·莱维说，他过了很久才明白自己为什么给两个儿子起名皮埃尔和让。

※ ※ ※

在小学，杰基是个好学生，除了笔迹太乱，被认为无法卒读，而且一直如此。“课间休息时，知道我是班里第一名的小学校长对我说：‘回去重写吧，没人看得懂你的字，到中学你能这么写，但现在可不行’。”<sup>②</sup>

26 在这所学校，大概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许多学校，种族问题已十分明显：学生们当中多有冲突。仍然羞怯的杰基将学校视为地狱，感到自己是如此暴露在危险之中。每天他都害怕打架变成斗殴。“到处在爆发种族的和种族主义的暴力，反阿拉伯人、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西班牙人……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sup>③</sup>

在小学，小“土著人”还很多，到了中学大部分就消失了。德里达后来在《他者的单语主义》里写道，阿拉伯语被视为外语，可以学习但不加鼓励。阿尔及利亚的现实则完全遭到否认：给学生们讲授的法国史是一门“荒诞不经的课程，是寓言，

---

①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1-12.

②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in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 17, décembre 2001.

③ Jacques Derrida, “L'école a été un enfer pour moi”, entretien avec Bernard DeFrance paru dans les *Cahiers pédagogiques*, n° 270 et 272, janvier et mars 1989. 该文未经德里达审阅。

也是圣经，是几乎无法抹去的僵化教条”。老师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和地理只字不提，却要求孩子们能够“闭上眼睛画出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和纪龙德河口”，并背会“所有法国省会的名字”<sup>①</sup>。

学生们同法国本土的关系十分混乱。一些幸运者会去度假，通常在以温泉著称的城市如埃韦安、维特尔或孔特尔瑟维尔。对所有其他孩子而言，包括德里达家的孩子，法国亲近而遥远，处于深渊般无法逾越的大海的另一头，仿佛梦中的国度。它是“高雅谈话与写作的楷模”。至于阿尔及利亚，他们感到一种“模糊而肯定的了解”，觉得它绝不仅仅是法国的一个省份。“对于我们，从童年起，阿尔及利亚也是一个国家。”<sup>②</sup>

※ ※ ※

犹太教隐秘地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在大的宗教节日，孩子们被带到阿尔及尔的犹太教堂。杰基对犹太音乐和歌曲尤为敏感，并终生保持着对它们的喜爱。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在埃尔-比亚星期五晚上的点灯仪式。“我重新看到那一刻，在采取了所有的保护措施后，母亲点燃小长明灯，那小小的火苗浮动在注满了油的杯子表面，那时便不能动火，不能划火柴，特别是不能抽烟，也不能碰开关。”他也记得普珥日（Pourim）欢快的景象，“那些插在柑橘中的蜡烛、杏仁饼，那些浸在糖浆里然后像衣服一样晾在绳子上的满是小洞、覆满霜糖的白色松饼”<sup>③</sup>。

在家里，外公莫伊斯·萨法尔虽非拉比，却是宗教意识的化身：“令人肃然起敬的端方态度使他高于司祭。”<sup>④</sup> 他以朴素的态度奉行犹太教礼仪，坐在扶手椅中，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祈祷书中。正是他，临终之前在杰基的成年礼上送给杰基一条纯白的披巾，后者将在《面纱》一书中长久地追叙这条祈祷用的披巾，说自己“触摸”或“每天抚摸”<sup>⑤</sup> 它。

外祖母福图内·萨法尔在丈夫去世后又活了很久。她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所有重要决定无不经过和她的商讨。她在欧莱尔-德-帕拉迪纳街的德里达家中住过很久。星期日，特别是夏天，房子里挤满了人。这是五个萨法尔女儿的和解时刻。杰

① Jacques 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Galilée, 1996, p. 76.

② *Ibid.*, p. 73-74.

③ Jacques Derrida, “Les lumières de l'exil”, préface à l'album de Frédéric Brenner, *Diaspora: terres natales de l'exil*, 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 2003.

④ Jacques Derrida, *Mémoires d'aveugle. L'autoportrait et autres ruines*, RMN, 1990, p. 43.

⑤ Hélène Cixous et Jacques Derrida, *Voiles*, Galilée, 1998.

基的母亲乔吉特排行第三，她以大笑和爱俏著称，对扑克牌的热爱更让她名声远扬。大多数时间她和外祖母一起掌管账务，这样更容易平衡收支。杰基后来讲述，他在识字前很久就学会了发牌，其灵巧不亚于赌场上收付钱的人。他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姨妈们中间，享受她们彼此间的疯话，然后学给表兄妹们听。

28 乔吉特喜爱待客，也会适时烹饪美味的古斯古斯，但她并不在意日常生活的约束。平时，隔壁的食品店会送来食物。星期天早晨，她的丈夫负责去市场，有时带着雅尼娜或杰基。埃梅·德里达是个沉默寡言无甚权威的男人，不大反抗母系权力。“这儿成了帕奇酒店啦。”他有时候会神秘地抛出这么一句，当女人们在他看来过分梳妆打扮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去看赛马，那是在某些星期日的下午，全家去铺满细沙的海边，通常是圣-欧仁的普德里耶沙滩。<sup>①</sup>

战争已经打响，但对阿尔及利亚领土尚未造成显著影响。这时悲剧向德里达一家袭来。杰基的弟弟，刚满两岁的诺尔贝得了结核性脑膜炎。埃梅四处奔走试图挽回，问询了无数医生，但孩子还是在1940年3月26日死去。当时9岁的杰基，面临这件永远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感到的是“无尽的惊愕”：“在亲人去世后继续或重新生活。”“我记得1940年的一天，我的小弟诺尔贝死去一星期后，我看到父亲在花园里点燃一支烟：‘他怎么可以这样？一星期前他还在哭泣！’我的创伤一直不曾平复。”<sup>②</sup>

※ ※ ※

29 多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要比在法国本土任何地区都猖獗。极右派发动了取消《克雷米厄法令》的运动，《小奥兰报》(*Petit Oranais*)上的大标题则天天重复：“要把硫黄、沥青，可能的话还有地狱之火投向犹太教堂和学校，毁掉犹太人的房屋，夺取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像赶疯狗一样赶到乡下。”<sup>③</sup>法国军队被摧毁不久，贝当元帅所希望的“国民革命”在阿尔及利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虽然根本没有德国的占领，当地执政者却干劲十足：为应和反犹运动，反犹措施的实行要比在法国本土更加迅速和彻底。

1940年10月3日法令禁止犹太人从事公共部门的职业。对自由职业者要求2%的人数限制；第二年，这一规定得到更严格的执行。10月7日，内政部长佩鲁顿(Peyrouton)撤销了《克雷米厄法令》。对于这些已成为法国人70年之久的犹太人而

① 同雅尼娜·麦斯凯尔-德里达、勒内·德里达和米什琳·莱维的访谈。

②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Louis Vuitton, 1999, p. 29.

③ Cité par Benjamin Stora, *Les Trois Exils...*, op. cit., p. 78.

言，维希政府的措施是“可怕的震撼，无法预料的灾难”。“这是‘内在’的流亡，法国公民权的放逐，打乱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日常生活的闹剧。”<sup>①</sup>

虽然只有10岁，杰基也承受着这些可怕措施的后果。

我在小学是个好学生，经常是班里第一名，这让我很容易注意到德国占领和贝当元帅上台所带来的变化。在阿尔及利亚的学校并没有德国人，但人们开始让我们给贝当元帅寄信，歌唱“我们来了，元帅！”等等。每天早晨上课前升旗的总是第一名，轮到我的时候却换成另一个孩子。……我不记得当时受伤害的感觉是激烈的、不解的，还是懵懂的。<sup>②</sup>

从那以后，孩子们对犹太人的侮辱得到了默许，如果不是鼓励的话。

“犹太”这个词我想并不是最先在家里听到的……我想是在埃尔-比亚的学校里听到的，那时这个词已经充满了拉丁文的“injure”，“injuria”，英文的“injury”的含义，即侮辱、伤害和不公……在对一切毫不理解时，这个词向我袭来，像检举揭发，也像先于所有法律权利的非合法化。<sup>③</sup>

局势迅速恶化。1941年9月30日，扎维耶·瓦拉（Xavier Vallat）访阿的第二天，一条法令规定小学和中学犹太孩子的人数限制为14%，这在法国本土亦无例可循。1941年11月，哥哥勒内的名字出现在被驱逐出校的学生名单上：他将失学两年，并像其他一些同学一样以为自己会永远辍学。年仅7岁的妹妹雅尼娜也被逐出校。

杰基则进入了埃尔-比亚附近曾是一所修道院的本·阿克努（Ben Aknoun）中学六年级。他在那里遇见了成为他少年时代挚友的菲尔南·阿沙洛克和让·塔乌松（Jean Taousson）。但这一年对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真正发现了文学。他成长在一个藏书不多的家庭，且已穷尽了家里有限的图书。这一年他的法文老师是勒费弗里（Lefèvre）先生。这是个棕色头发的年轻人，刚从法国来。他同学生讲话时热情洋

① Benjamin Stora, *Les Trois Exils...*, *op. cit.*, p. 78.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la situation de l'Algéri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on se reportera également à l'ouvrage collectif *Alger, 1940—1962*, Autrement, coll. “Mémoires” n° 56, 1999, p. 34—35.

②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2.

③ Jacques Derrida, “Abraham, l'autre”, in *Judéités: questions pour Jacques Derrida*, Galilée, 2003, p. 20.

溢，常令他们发笑。但有一天，他提到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人间食粮》，并热情赞颂爱情。杰基立刻找到这本书开始狂热地阅读，他连续几年反复阅读此书。

我大概把这本书背诵下来了。可能像所有的少年人，我喜欢它的炽热，它向宗教与家庭宣战时的抒情性。……它对我而言是感性的、反道德的宣言或者说《圣经》……特别是它的阿尔及利亚气息……我还记得其中对萨赫勒、伯利达和试验花园果实的颂歌。<sup>①</sup>

数月之后，他将领教法国另外一副极其令人不悦的面孔。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352.

## 第 2 章 在阿尔及尔在阳光下 (1942—1949)

1942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杰基的青少年时代骤然降临。那是开学的日子，本·阿克努中学的总学监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回家去吧，孩子，你的父母会得到通知的。”<sup>①</sup> 在阿尔及利亚的学校里，犹太人的比例刚刚从 14% 下降到 7%：当地政权的意志又一次超出了维希政府。<sup>②</sup>

德里达多次重申，这次被驱逐出校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地震”。

我毫无准备，无从理解。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感受，但徒劳无功。需要说明的是，在家里也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我相信这对许多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当地并没有德国人，这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权的提议，比在法国本土还要严厉：阿尔及利亚所有的犹太教师都被逐出学校。对于犹太社区，这一切是个谜，也许无法接受，但只能像对待自然灾害一样承受，没有任何解释。<sup>③</sup>

德里达拒绝夸大此事的严重性，因为这对备受迫害的欧洲犹太人是“失礼”的，但他后来承认，这一经历令他极为受伤，并深刻影响了他的内心最深处及人生的发展。像他这样不愿将任何东西从记忆中抹去的人，怎能忘记呢？就在 1942 年的这个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Flammarion, 1980, p. 97.

<sup>②</sup> 关于更多反犹措施的细节，参见“Curriculum vitae”，proposé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99 - 300.

<sup>③</sup>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3.

清晨，“一个黝黑的十分阿拉伯化的犹太孩子”<sup>①</sup>被逐出了本·阿克努中学。

在这无从理解、无人解释的无名的“行政”政策之外，那伤害还在别处，从未愈合：孩子们、同学们、街上的小孩们平日的羞辱，还有时而针对我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威胁或拳头……<sup>②</sup>

就在反犹政策加剧的随后几个星期里，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大的转折。1942年11月7日到8日夜，美国军队登陆北非。在阿尔及尔，维希政权的部队毫无顾忌地向盟军开火，并与由22岁的医学院学生约瑟·阿布斯克（José Aboulker）指挥的抵抗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德里达后来向埃莱娜·西克苏详细描述了这一天的情景。

从黎明就开始听到炮声。法国方面有正式的抵抗组织，还有法国宪兵和军队，装作与来自西迪费鲁希的英军和美军作战。下午，我们就在房前看到战斗中的士兵……戴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头盔。这不是法国头盔。人们说是德国人。其实他们是美国人。我们从没见过美国头盔。当晚，美军大批到来，跟平时一样散发香烟、口香糖、巧克力……这第一次的登陆仿佛是一种顿挫（*césure*），生命的中断，新的抵达点和出发点。<sup>③</sup>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法国本土，号称“自由”的南部在1942年11月被德意志国防军占领，成为“行动区”。而直到那时尚未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阿尔及尔城则遭到上百次轰炸，造成无数受害者。从埃尔-比亚的山地看去，景象十分恐怖：大海及城市被海军的炮火照亮，防空探照灯和高射炮击不断扫过天空。几个月间，警报声和向避难所的逃生几乎是家常便饭。杰基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恐惧是如何攫住了他，当时全家同往常一样在邻居家避难：“我刚好12岁，我的膝盖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sup>④</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57.

② 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Fayard-Galilée, 2001, p. 179.

③ Propos de Jacques Derrida cités par Hélène Cixous, “Celle qui ne se ferme pas”, in *Derrida à Alger*, *un regard sur le monde*, Actes Sud-Barzakh, 2008, p. 48 - 49.

④ Jacques Derrida, “Comment ne pas trembler”, *Annali*, 2006/II, Bruno Mondadori, p. 91.



从本·阿克努被逐出不久，杰基在玛伊莫尼德（Maimonide）中学注册，这所学校又称埃米尔-莫帕（Émile-Maupas），源于其所在的位于伊斯兰区边缘的街名。这所临时学校是前一年春天由被逐出公共教育领域的犹太教师们成立的。从本·阿克努被逐对杰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但他同样厌恶这所他视为“群体性认同”的学校，尽可能地逃学。日常的混乱与困窘使得父母似乎对他的旷课从不知情。对少有的在埃米尔-莫帕度过的日子，德里达保留着“阴郁和不幸”的回忆，他在同伊丽沙白·鲁迪奈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的谈话中说：

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体会到——如果不是说染上了——这种痛苦、不适，这种生存之痛，它使我终生无法适应“群体生活”，无法享受任何归属感。……一方面，反犹主义令我深受伤害，这伤口从未痊愈。但同时，矛盾的是，我无法忍受被“纳入”这所犹太学校，这个同质的空间，它像是某种反作用力、某种模糊的镜像，以强制（迫于外界威胁）和被迫的方式，再造并认同了其自身所承受的可怕暴力。这种反作用式的自我防卫显然是自然正当的，甚至是无可指责的。但我不能不从中感受到一种冲动（pulsion），一种群体的压迫（*compulsion*），它实际上与放逐（*expulsion*）相对应。<sup>①</sup>

快到13岁了，他该准备考试以迎接巴尔·米茨瓦，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长久以来已习惯按天主教说法将之称为“领圣体”。但他所学到的微乎其微。他在伊斯里街的一名拉比那里毫不情愿地装作学习一些粗浅的希伯来文。幼年时代深深吸引过他的礼仪此时令他痛恨。他从中只看到空虚的商业气的形式。

34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抗拒宗教，不是因为无神论或某种否定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发现，在自己家里，人们奉行宗教的方式建立在误解之上。对宗教仪式毫无意义的奉行令我震惊——我发现那只是盲目的重复，毫无思想。有一件事在当时特别让我无法接受，现在仍然如此，就是人们分配“荣誉”的方法。手里捧着托拉书（Torah），从犹太教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在众人面前朗诵其中一段，这荣誉由出价最高者获得，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憎。<sup>②</sup>

① 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183.

② “The three ages of Jacques Derrida”, entretien avec Kristine McKenna, *LA Weekly*, 8-14 novembre 2002.

杰基不去长老会的学校，而是整天和在一间小钟表店工作的表哥吉·泰米姆（Guy Temime）厮混，那钟表店紧邻穆斯林居住区，正对着阿尔及尔最大的妓院之一斯芬克斯。两个男孩一半出于好奇，一半觉得有趣，整天观看那些在妓院门前排队的士兵们。

他们喜爱的另一项活动是看电影，只要能够买得起票。对于杰基，看电影就是真正的出行，是挣脱家庭束缚的重要方式，也是性的启蒙。他一生都记得电影《汤姆·索亚》（*Tom Sawyer*），特别是汤姆同一个小女孩一起被关在洞穴里的场景。“那是性的冲动：我发现一个12岁的男孩可以抚摸一个小女孩。感官和情欲的成长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影。……我十分强烈地保留着那来自性冲动的战栗。”<sup>①</sup>

35 1943年，政治和军事形势快速发展。盟军想从阿尔及利亚开始收复失地。曾经是维希政府殖民地心脏的阿尔及尔很快成为自由法国的新首都。本雅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写道，犹太人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欢迎美国士兵，并“热切地在餐厅墙上的地图上追随着盟军的前进”<sup>②</sup>。对杰基来说，这是同来自远方的外国人“第一次充满惊奇的相遇”。“美国佬”带来了充足的食物，并让孩子们发现了许多未知的东西。他后来说：“在我去美国之前，美国已经侵入了我的‘家’。”<sup>③</sup> 德里达一家结识了一名美国大兵，接待了他好几次，并在他回国之后继续和他通信。

但对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局势恢复得很慢。在吉罗（Giraud）将军和戴高乐（de Gaulle）将军共治期间，种族歧视的法规在6个多月里仍然有效。如德里达后来对埃莱娜·西克苏所述：“吉罗打算继续并延长维希的法令，并让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保留着‘土著犹太人’的身份。他不想让他们重新成为公民。直到戴高乐以手段和才能清除了吉罗之后，维希法令才被废除。”<sup>④</sup> 反犹政策于1943年3月14日废除，但一直等到该年10月底，戴高乐主持的国民解放委员会才重新使《克雷米厄法令》生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在公民权被剥夺整整两年之后终于重新获得公民身份。

36 1943年4月，杰基得以再次进入本·阿克努中学五年级。他共失学不到一个学年。但这次归学混乱且无甚热情：“我又一次进入了法国学校，这不是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次回归很不愉快：驱逐与回归都令我十分痛苦和不安。”<sup>⑤</sup> 学校的建筑已被英

---

① “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 entretien repris in Antoine de Baecque, *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 Petite bibliothèque des Cahiers du cinéma, 2008, p. 54 - 55.

② Benjamin Stora, *Les Trois Exils...*, op. cit., p. 95.

③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33.

④ Propos de Jacques Derrida cités par Hélène Cixous, “Celle qui ne se ferme pas”, art. cité p. 49.

⑤ *Ibid.*, p. 49.

国人改造成军队医院和意大利战俘营。学生们在简陋的木屋里上课，几乎所有的男性教师都被征兵，人们只好求助于退休教师和女教师。

对于杰基，有些东西随着他被逐出校而破碎了。在此之前他曾是好学生，但周遭的混乱已使他养成了自由生活的习惯。在随后的四年里，他喜爱打架与足球远甚于学业。他尽可能地逃学，加入伙伴们激烈的时而暴力的起哄。这频受干扰的学业给他留下了许多重大的空白。

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体育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也许因为在这个非犹太人的环境里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认同，得到群体和伙伴们的接受。

我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就从这时开始，上学就意味着带着包在毛巾里的足球鞋出门。我对这双鞋顶礼膜拜，给它打蜡，比对作业本还要爱护。我们把时间花在足球、跑步、美国人教的棒球，以及同意大利犯人的比赛上：学业是十分次要的。

回到中学后，杰基又找到了赴法之前最亲密的朋友——绰号“娃娃”的菲尔南·阿沙洛克，还有也住在金山区的绰号“丹丹”的让·塔乌松，后者是阿尔及尔大学赛跑队的希望之一。<sup>①</sup>他们三人常常在中学附近的本·鲁拉体育场玩到天黑。德里达本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年他梦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有一点确定无疑，足球当时是阿尔及利亚所有社群的皇家运动，几乎相当于宗教。

37

菲尔南·阿沙洛克回忆道：“和加缪一样，杰基努力在足球上出类拔萃。”这在他的亲友中已有先例：哥哥勒内也是个出色而热情的足球运动员，他是红星队的门卫，好几次参加比赛。“杰基喜欢模仿这支球队的守门员……就像在别的方面，他希望听到高手的意见。有一次比赛我们的球队输了，他从阿尔及尔郊区的圣-欧仁体育场一直走回家，就是为了听一个著名球员的评论。那路程可够远的！第二天他就无自得地向我们解释失败的原因。”<sup>②</sup>

德里达不止一次地用“无赖”（voyou）来形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很喜欢这个词，还用它作为自己晚期一部著作的标题。菲尔南·阿沙洛克说用这个词来形容

---

<sup>①</sup> 让·塔乌松从20岁起就成为《阿尔及尔回声》（*L'écho d'Alger*）的记者，后来与秘密军队组织（OAS）靠拢，之后成为《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记者；并与夏尔·帕斯卡（Charles Pasqua）关系密切。德里达在年代1980年代或1990年代与让·塔乌松共度一个晚上。虽然对老朋友政治立场的演变感到难过，他还是像对待菲尔南·阿沙洛克一样仍然希望见到他。

<sup>②</sup> 同菲尔南·阿沙洛克的访谈。我十分感谢他的儿子让-菲利普帮我收集这次谈话的内容。

他们当时的行为显然太过分了。“我们这个小团伙不是什么天使。我们有时候会干点蠢事，但我们可不是无赖，不是。”德里达后来对妻子玛格丽特倒是讲过酩酊大醉之后开车兜风，还有用收集的炸药炸毁学校楼房的计划。很难弄清楚他们干过什么坏事，但似乎绝大多数都处在想象阶段。杰基和伙伴们看来更增加缪回忆中的“克拉克”，是些“善良的少年，却费尽力气想表现自己是坏小子”，并企图勾引“玛莲娜”。<sup>①</sup>

38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年里德里达一家人的关系很紧张，特别是杰基和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勒内之间。杰基感到哥哥在体育和智力上都比自己优越。他无法忍受勒内想要对自己施加权威，特别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上意见相左：勒内愿意表明自己的右派立场，而杰基不放过任何机会声明自己是左派。

从这个时候起，德里达的主要武器就是沉默。他能够整整一顿饭一言不发。他在晚年的文章中承认自己超乎寻常的不回应态度：“我的父母知道，我从童年起就能够以固执的沉默来表示反抗，任何折磨都不会使我让步，只要有谁让我觉得配不上我的答复。沉默是我最崇高、最和平也是最绝对的斗争方式，或表示轻蔑的宣言。”<sup>②</sup>

同阅读《割礼忏悔录》获得的印象大概相反，他同母亲的关系在少年时代十分紧张。他感到她过得很舒服，而父亲却是工作的牺牲品，既被家人也被雇主剥削。

我对父亲怀着无限同情。他几乎没上过学，12岁就开始在塔舍公司工作，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那里的一名小雇员。当了一阵学徒之后，父亲成了推销员：永远开车在路上。<sup>③</sup>

杰基觉得这职业既辛苦又丢人。在“可怜的父亲”身上，他看到“为现代性赎罪的牺牲品”，从父亲在坎坷长途无休止的跋涉中则感到“难忍的艰辛”。每周四天，埃梅·德里达清晨四点就开着他的雪铁龙离开家。他很晚才回来，“筋疲力尽，弯腰驼背，手里拿着那块沉重的手巾，里面装满了订单和钱”。他从这长途奔波中带回的  
39 食品让家人能少感到些匮乏。每早出发前，他把前一天收到的钱款放到餐桌上。如果账目不对，那简直就是灾难。他不断地叹息，抱怨着让他疲惫不堪的日程，但还

---

<sup>①</sup> Albert Camus, “Le Minotaure”, in *Essais*. Cité par Pierre Mannoni,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L'Harmattan, 1993, p. 163.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Le Survivant, le sursis, le sursaut”,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 882, 1<sup>er</sup>-31 août 2004.

<sup>③</sup> Jacques Derrida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177.

是很感谢老板们没有在反犹政策时将他解雇，而他们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感恩的表示让杰基极为痛苦。

有老板，有雇员，有富人，有穷人，即使在家里，我也看得出父亲是某种阴郁仪式——黑暗、残酷、致命的仪式——的牺牲品。“牺牲”这个词反复出现：“他为我们牺牲。”在整个少年时期我同他一起受罪，指责全家人不认可他为我们做的一切。这就是“受侮辱的父亲”的体验：承担所有义务，屈服于责任，弯腰驼背。他的姿态、他的轮廓、他身体的线条和动作都好像弯曲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弯腰驼背”这个词，因为我无法将之与这命运分开：父亲工作的地方在阿尔及尔港口，一个恰好叫“弯拱”的地方。<sup>①</sup>

学会开车之后，杰基就常常陪伴埃梅在路途上。这是同这个男人单独对话的机会，杰基肯定父亲对自己更容易倾诉心声，因为他把自己当作“见证了其他人的不解与冷漠的人”。但这些旅途也让他开始发现阿尔及利亚内陆令人目眩的景色，特别是卡比利。

任何其他地名都不能同这些泊泊尔名字相比：提兹·乌祖、提茨特、吉杰里、圭耶敦港——这是行程路线——还有亚库兰森林……我热爱开车行进在这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但我更愿意帮助父亲，我想表现出同他“在政治上一致”，还有对这“土地的被诅咒者”的同情。<sup>②</sup>

不过德里达一家也有另外一面。杰基和妹妹雅尼娜喜欢同一大群快乐的表姐妹们成群结队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前往普德里耶海滩，在那里度过一整天。他最钟爱的表妹米什琳·莱维深情地回忆起那些使他们忘记战争的时光：“我们有约会的密码：电话铃响两声就是出发的信号。我们结成一小伙上路，带着鸡蛋和点心作为野餐。杰基胃口很好，他最喜欢杏仁雪茄。他游泳也很棒，常常游到大海深处。有一次我们凑钱买了一只黄色的橡皮船，高兴极了……少年时的杰基不大喜欢跳舞，他更愿意在海边待到很晚。我们在夜幕降临时一起长时间散步。他对大多数人很少倾诉，但同我要健谈一些。不管怎样我能够猜到他的很多秘密，我也告诉他我所有

40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177 - 178.

<sup>②</sup>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Perrida, op. cit.*, p. 37 - 39.

的秘密。他曾爱慕我最好的朋友吕西安娜，一个漂亮姑娘。她是他的初恋，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关系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纯洁。”<sup>①</sup>

晚上，在回埃尔-比亚的路上，这一伙人常常停下来看电影。多年之后，杰基长时间回忆起阿尔及尔的电影院：沃克斯、卡梅奥、子午夜、奥林匹亚，还有北非最大的至尊影院……不管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来自何方，杰基都贪婪地吞下。

41 对我这个阿尔及尔孩子，电影代表着奇异的旅行。我们同电影一起四处旅游。不用说美国电影，绝对的异国风情，又与我们如此接近，法国电影则有奇特的声音，移动着可辨认的身形，其中的风景和法国内陆给我这样一个从未越过地中海的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书籍不曾给我同样的东西，是电影直接把我带到了未曾认识的法国。看电影就是一场有导游的旅行。<sup>②</sup>

他仍然偏爱阅读。从六年级听到勒费弗里先生对纪德的热情赞美开始，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日俱增。这是他独自培养的热情，相对学业越来越自由和独立。在家里，父母把阳台隔为两半，好让杰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他连续数小时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他在床的上方安了一个小书架，放着他崇拜的书籍。他把少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书上。

我在一个藏书很少的家庭长大，读过些糟糕的小说，比如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等的小说，那就是全部了。我最早的书是在阿尔及尔用父亲给我的一周的零花钱买的。绝对的顶礼膜拜。在我的床顶上方有《恶之花》，还有我热爱的纪德，我有他的10本、15本、20本书。<sup>③</sup>

在《人间食粮》之后，他痴迷于《背德者》、《窄门》、《沼泽地》和《日记》。他后来说：“纪德对我而言不是小说家而是道德家，教我如何生活。”<sup>④</sup>杰基很可能知道，就在他如此狂热地发现纪德作品的时候，纪德就生活在阿尔及尔。纪德于1943

---

① 同米什琳·莱维的访谈。

② “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in Antoine de Baecque, *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 op. cit., p. 56.

③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nt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7, décembre 2001.

④ Franz-Olivier Giesbert, “Ce que disait Derrida”,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7/philosophie-ce-que-disait-derrida/1038/0/31857>.

年5月27日抵达，一个月之后，就在埃尔-比亚，在戴高乐将军居住的别墅进过晚餐。随后的几个月他住在米什莱街友人雅克·埃尔贡（Jacques Heurgon）家里，有时同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下棋。杰基很有可能遇见过这位他如此热爱的作家。

他很快也开始迷恋其他一些作家。在学校里发现的卢梭很早就成为他钟爱的作家之一，他一遍遍地阅读《忏悔录》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从十三四岁起，仿佛听从了纪德的建议，他沉浸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和尼采的其他著作当中，这使他的童年更加远离犹太主义。他像热爱卢梭一样热爱尼采，尽管这两人如此不同：“我记得很清楚心里的挣扎，我想使他们和解，我敬仰这两个人，我知道尼采对卢梭毫不留情的批判，问自己怎能既爱尼采又爱卢梭。”<sup>①</sup>

42

杰基阅读量很大，但对古典小说不大感兴趣。他对大仲马、巴尔扎克、司汤达或左拉这些作家的了解很表面。但瓦雷里（Valéry）作为诗人和随笔作家让他着迷。尽管引用得不多，但他也喜欢加缪：就像《人间食粮》和《背德者》，他在刚刚出版的《婚礼》和《局外人》中发现了法国文学，这“同我们生存的世界没有可感的连续性的世界的经验”<sup>②</sup>与他生活的具体世界发生了奇迹般的相遇。

在他青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烙印的作品中，我们不能忘记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尽管那时他的书还很少见。

如果要回忆阿尔托的名字第一次在我心中留下印象的话，那大概是在布朗肖的文字中，里面提到《同雅克·利维尔的通信》。我于是读了阿尔托的这些信件，并带着认同感投入他的文字，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同情。他说他无话可说，没有什么能使他说话，而在他身上却存在着写作的激情与冲动，也许还有戏剧的冲动。

为什么在年轻时产生了对阿尔托的认同感呢？我从少年时开始（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持续到32岁）就狂热地想要写作，同时伴有一种空虚感：我知道我必须写作，我想写作，我有要写下来的东西，但归根到底，我所写的没有什么不是从一开始就同别人早已写下的相类似。我记得在十五六岁时，我感到自己是千变万化的（protéiforme）——这个词是我从纪德的书中看到的，我非常喜欢。我能够用任何形式、任何口气来写作，而我知道这口气从不曾真正是我的：我用人们期待的方式答复，或者在别人递来的镜中看见自己。我对自己说：我什

43

①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8.

② Jacques 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p. cit., p. 76.

么都能写，因而什么都不能写。<sup>①</sup>

像许多青少年一样，他写日记，在小小的作业本上写满了生活中的秘密和读书感想。他也喜欢直接写在粉红色纸桌布上，然后把喜欢的段落剪下来。小说对他的吸引力虽然小一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5岁时想象诸如日记被偷和敲诈等小说中的情节。

这时期他对文学事件很感兴趣。他虔诚地阅读文学期刊和增刊，有时高声朗读。要知道阿尔及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成为法国文化的第二首都。出版过加缪早期作品的埃德蒙·夏洛(Edmond Charlot)在1942年年末开发了“战时法国”丛书，其中重印了维尔高(Vercors)的《寂静的大海》，出版了纪德的《想象采访录》、凯塞尔(Kessel)的《影子军队》，以及于勒·鲁瓦(Jules Roy)、马克斯-波尔·弗舍(Max-Pol Fouchet)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卡比利诗人让·安鲁士(Jean Amrouche)主持的刊物《拱》(*L'Arche*)意欲与二战中向德国妥协的《新法兰西杂志》(*NRF*)竞争。1947年，埃玛纽埃尔·罗布莱斯(Emmanuel Roblès)创办了锻造(Forge)出版社，出版了默罕默德·迪布(Mohammed Dib)和卡代布·亚辛那(Kateb Yacine)等作家的作品。<sup>②</sup>

德里达那时写过诗，他后来说讨厌这些诗并试图使之消失，除了在《丧钟》中引用过一句：“池塘的陷阱我沉溺的死亡之乳汁。”<sup>③</sup>他还向一些杂志投稿。1947年3月，《航行，地中海期刊》(*Périple, revue de la Méditerranée*)的负责人克洛德·贝纳迪(Claude Bernady)肯定地说读他的诗感到“一种真正的愉快”：“您拥有很好的素质，应该加以培养”<sup>④</sup>，并承诺在下一期发表他的一首诗，但杂志在此事实之前就停刊了。这些年里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似乎在一些小杂志上发表过，但我没能找到。

※ ※ ※

杰基拥有超出年龄的出类拔萃的阅读水平，但他并不是个好学生。从五年级被驱逐出校起，他漫不经心地继续着中学的学业，某些基础方面仍然薄弱。他的数学、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Les voix d’Artaud”, entretien avec Évelyne Grossman,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 434, septembre 2004.

<sup>②</sup> Pour plus de détails, on se reportera notamment à l’article de Jacques Cantier, “1939—1945, une métropole en guerre”, in *Alger 1940—1962, op. cit.*

<sup>③</sup> Jacques Derrida, *Glas*, Galilée, 1974, p. 219.

<sup>④</sup> 克洛德·贝纳迪致德里达的信，1947年3月21日。



拉丁文和外语很差，但他并不以为意。但当他在1947年6月第一次中学毕业会考失败时，他深感苦恼。他在整个夏天勤奋学习，习惯早起，并在9月份成功通过考试。“我们突然间认不出他来了。”哥哥勒内回忆道。

他随后离开了本·阿克努中学，进入埃米尔-菲利科斯-戈蒂埃（Émile-Félix-Gautier）中学，这是阿尔及尔市中心一所有名的学校。他的哲学老师让·绍斯基（Jean Choski）尤为著名，他有“令人难忘的声音，尾音拖得很长，元音也发得很重很长”，还有一把从不离身的大黑伞。他在第一堂课就宣称：“如果问你们为什么来到埃米尔-菲利科斯-戈蒂埃中学，你们就回答为了向绍斯基学习哲学！”据他从前面的一个学生说，这是个“不可预测的、迷人的、充满幻想的、有点爱哗众取宠的人物，有时甚至令人憎恨，但他是个教育家，充满创见，智力超群，拥有清晰、优雅而明确的思想。有时如电光石火般耀眼：如此的热情奔放（尤其在讲到康德时）！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sup>①</sup> 我们无从知道这名教师在德里达身上留下什么具体影响，只知道他在课程中讲到了柏格森和萨特，这两人的作品对他影响最深。

就在这中学的最后一年，很久以来一直肾痛的杰基的母亲接受了一场大手术。结石太大了，需要摘掉一个肾。在1976年12月的个人笔记里，德里达简略而意味深长地谈到这件事在他和母亲之间的重要性，它标志着长时间紧张关系的结束。 45

母亲的手术。

我同她的“和解”从这时开始。十分具体地描述。经常的探视。手术期间的恐惧。她面对我的关心表现出的感动的惊讶，我也一样。战争结束。我们的关系变为“研究”，等等。<sup>②</sup>

通过会考时，杰基对下一步只有模糊的想法。从十四五岁起他便相信自己将从事写作，最好是文学写作。但他从不相信能够用这种方式养活自己，因此很久以来成为文学教师就是“唯一可能的职业，如果不是渴望的职业的话”<sup>③</sup>。随着对哲学的发现，这计划发生了变化。

我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真正开始阅读哲学的。这时我知道，因为没有学习

① Jean-Louis Jacquemin, *Je suis un "Émile Félix Gautier"*, <http://esmma.free.fr/mde4/jacquemin.htm>.

② 雅克·德里达，1976年的个人笔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馆藏档案。

③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301.

希腊文，我不能参加文学教师资格考试，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哲学教师呢？那时的榜样，比如萨特，都是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于是，渐渐地，我想我不必放弃文学写作，但从职业角度来说，哲学会是更好的考虑。<sup>①</sup>

在1989年的一次题为《称作文学的奇特建制》的极有趣的访谈中，德里达更清晰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摇摆态度。

46 我那时大概在哲学和文学之间踌躇，两者都不愿放弃，或许是暗地里在寻找这样的领域——能够对两者之界限的历史进行思考或转换：就在文字当中，而不只是历史的或理论的思考。直到今天，我感兴趣的严格说来既非文学亦非哲学，我发现这么想很有趣，即我少年时的梦想促使我走向一种非此亦非彼的写作。<sup>②</sup>

这些混杂的想法将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找到实现的途径。会考成绩下来后几天，杰基偶然听到阿尔及尔电台播出的一个提供专业指导的节目。里面有一位文学教师赞扬为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而设置的预备班（hypokhâgne），它提供开放多样的教育，不会太快地进入专业选择；他特别说到加缪在1932—1933年间曾是这班的学生。从未听说过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的德里达第二天就找到了这名教师，并注册加入了布若（Bugeaud）中学的高师预备班，这个班级赫赫有名，集中了来自全阿尔及利亚的学生。他将在那里遇到让-克洛德·帕里安特（Jean-Claude Pariente）和让·多麦克（Jean Domerc），他和这两人很快惺惺相惜并最终同时奔赴巴黎。

帕里安特回忆道：“在布若中学的高师预备班，来自奥兰的学生相当多，还有一些君士坦丁的名额。但这个班的独特性之一在于男女生混合，而当时男生和女生属于不同的学校。总的来说，学生们为了准备接受高等教育，会在阿尔及尔的文学院系继续学业。我们并不是很多人都瞄准了高师。女生的出现改变了班里的气氛：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在以前的班级里更加彬彬有礼。但一般不会有什麼结果。德里达

---

①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9.

② Jacques Derrida, “Cette étrange institution qu'on appelle la littérature”, entretien avec Derek Attridge, in *Derrida d'ici, Derrida de là*, Galilée, 2009, p. 253 - 254.

同女孩子们相处愉快，但我并不记得他在这个班里有过女朋友。”<sup>①</sup>

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虽然是个出色的学生，那年却是他在预备班的第二年。因为虽然布若中学有完整的理科预科体系，但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却还没有高师的文科预科班（khâgne）。就在这一年年末，帕里安特将在阿尔及尔参加高师入学考试。这一计划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班的教学质量相当出色。德里达曾在广播里听到的文学教师保罗·马修（Paul Mathieu）是个老派的人文主义者。他曾是高师的学生，对于于姆（Ulm）街的高师始终崇敬有加，鼓励他最好的学生努力加入。但他的教学建立在朗松（Lanson）式的文学史上，显得太古典而无法吸引德里达。他也教授拉丁文，这门课杰基成绩平平。历史教师吕西安·贝希尔（Lucien Bessières）深受战争影响，从战场带回一些漂亮的装饰品；他授课十分清晰，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进度太慢。

47

哲学教师扬·扎奈基（Jan Czarnecki）是个进步的新教徒，后来勇敢地参加了《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sup>②</sup>的签名。他是勒塞纳（Le Senne）和纳贝尔（Nabert）的学生，属于法国观念主义和唯灵论传统，但他对认识论问题和其他哲学流派表现得十分开放。他的教学非常理性，有些枯燥，但方向正渐渐明确的德里达听得津津有味。德里达在后来同多米尼克·亚尼克（Dominique Janicaud）的谈话中说：“我在高师预备班里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他以简洁明确的方式讲授哲学史，涵盖了从前柏拉图直到现代的内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特别收藏处保存的资料中能找到很多他这一年上课的痕迹。

就是从扬·扎奈基的口中，德里达第一次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名字。他刚有可能就找了那时唯一的法文版《什么是形而上学？》（*Qu'est-ce que la métaphysique ?*），这是亨利·科尔班（Henry Corbin）的译文选集。“烦，否定之前的虚无经验，这些问题远比我在很久以后才关注的冰冷的胡塞尔（Husserl）哲学更加符合我个人的感性。当时我对此十分敏感，那是战后人们普遍感到的情绪。”<sup>③</sup>因为扎奈基，德里达也开始阅读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是他最着迷的哲学家之一，他将一生对其保持忠诚。

48

不过这一年对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正处在荣誉巅峰的萨特。杰基在中学毕业班就开始读萨特，但在高师预备班里才真正投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为准备一篇很

① 同让-克洛德·帕里安特的访谈。他是我能找到的高师预备班里德里达唯一的同学。我很感谢他有关这一年的回忆。

② 1960年法国有121名知识分子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支持反战士兵，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译注

③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in 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entretiens*, Hatte-Littératures, coll. “Pluriel”, 2005, p. 89-90.

长的论文《萨特，心理学——现象学》，他去阿尔及尔图书馆阅读《存在与虚无》，同时也对萨特早期的作品感兴趣，如《想象力》、《想象》，还有《情感概论》。在这篇文章里，德里达强调了胡塞尔对萨特的影响，尽管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现象学家只有间接的了解。

与《存在与虚无》同时，他“在一种沉醉的眩晕中”读着《恶心》。“坐在拉菲利耶广场的长椅上，有时抬眼注视那些树根、开花的灌木或茂盛的植物，仿佛为了验证那存在的多余，而且怀着强烈的‘文学’认同感。”<sup>①</sup>多年之后他仍然激赏这部“建立在一种哲学‘情感’基础上的文学作品”。对萨特的热情一直延续到《禁闭》，他还去看了一场该剧的演出，以及《现代》杂志和《境遇集》的前两卷。

尽管德里达后来常常认为萨特的影响是“恶劣”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在当时，这位《什么是文学？》的作者对他而言，就像对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

49

我承认在我成长的年代曾受益于萨特，包括他的传承，他的巨大影响，他巨大的存在。我从未试图撇清这些。……我在中学毕业班和高师预备班时，不只是萨特的思想，还有他的形象，这个将哲学与文学的欲望相结合的人，都是我的榜样和参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笨拙。<sup>②</sup>

也是因为萨特，他发现了好几位对他非常重要的作家。他毫不讳言：“我第一次见到布朗肖、蓬热（Ponge）、巴塔耶（Bataille）的名字……就是在《境遇集》中。……我先读到萨特关于这些作家的文章，然后才去读他们的作品。”而当他全心投入“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后，《存在与虚无》就显得“在哲学上较为薄弱”了。德里达认为萨特的作品除《恶心》外亦非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对他个人和他同时代人的经历而言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萨特对政治的介入也对应着德里达政治觉醒的开始。时间顺序当然不能弄错：虽说1945年5月的赛提夫大屠杀在日后看来像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导火索，当时杰基的立场却并不是反殖民的，而是传统的改良派，就像当时的法国共产党。

我在阿尔及尔高师预备班时开始将自己归为阿尔及尔的“左派”。1947—1949年这段时期有芒杜兹（Mandouze）。……我属于立场坚定的团体，在政治

① Jacques Derrida, “‘Il courait mort’: salut, salut”, in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176.

②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82.

上更加清醒。我们虽然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也反对法国的强硬政策。我们抗争的目标是通过改变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而实现去殖民化。<sup>①</sup>

从许多方面看，高师预备班似乎是愉快的一年。杰基同一群兴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一起，不曾屈服于任何考试的压力。但他的成绩总的来说不错，哲学是70人中的第二名。他的朋友、班里最出色的学生让-克洛德·帕里安特参加了高师的考试，但被淘汰了。这让德里达确定自己不再进行尝试。他对自己说，要想有更多进入高师的机会就要置身法国。和帕里安特与多麦克一样，他进入了路易大帝高中 (Louis-le-Grand)，那是巴黎最著名的高中，曾经接纳过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阿兰-傅尼埃 (Alain-Fournier)、保罗·克洛代尔 (Paul Claudel)、萨特和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尽管上这所高中对杰基的父母意味着经济上的巨大牺牲，他们还是决定支持这名从毕业班以来学业变得极为优秀的学生。杰基自然不可能租房，只能在路易大帝高中寄宿。他一刻也不曾想到这将意味着什么。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L'une des pires oppressions: l'interdiction d'une langue", entretien avec Aïssa Khelladi, in *Algérie littérature action* n°9, mars 1997.

# 第3章 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 (1949—1952)

51 1949年9月末，令人期待又恐惧的奔赴巴黎的时刻来到了。这是杰基第一次真正的旅行：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乘船，第一次坐火车。

乘“阿尔及尔”号轮船横渡地中海如同进了地狱，严重晕船，20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呕吐。在马赛什么也没看到便立即向巴黎出发。经过漫长一日的火车旅程抵达了法国首都，这许多书籍和电影令他为之梦想的抵达却是可怕的失望，“瞬间的黯淡”<sup>①</sup>。多雨肮脏的巴黎，一切都显得阴郁灰暗。“从白色之城阿尔及尔，我到达了阴暗的城市巴黎，因为马尔罗（Malraux）尚未经过，尚未将之美化。”<sup>②</sup> 但最阴暗的还是圣雅克街123号路易大帝高中，他于10月1日第一次迈进它的大门。

德里达是第424号寄宿生，他同所有寄宿生一样注定要从早到晚穿着蓝色的罩衣。纪律严明，作息时间苛刻。巨大的宿舍里没有丝毫隐私，床与床之间甚至没有帘子。卫生条件极差：只有冷水洗漱，哪怕正值隆冬。食堂的饭菜糟糕而单调，因为依然处在战后的匮乏中。杰基觉得自己像个囚徒。在开学前孤独的几天里，童年时代上学的恐惧感重新降临，“在这阴森的寄宿学校，整整一个星期的悲痛和孩提的泪水”<sup>③</sup>。

开学后不久菲尔南·阿沙洛克的来信一定给他留下了奇特的印象。阿沙洛克希

---

① 这是埃莱娜·西克苏的话，她在几年后经历了同样“小小的流放”。参见 *Si près*, Galilée, 2007, p. 45。

② Franz-Olivier Giesbert, “Ce que disait Derrida”,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7/philosophie-ce-que-disait-derrida/1038/0/31857>.

③ Jacques 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p. cit.*, p. 75.

望老朋友已经参观了巴黎，他还认为杰基能待在这儿“运气不错”。问他看到了“著名的圣日耳曼德佩雷街区”和“让-保罗·萨特长驻的皇家圣日耳曼饭店”了吗？他去看了圣日耳曼俱乐部和老鸽舍剧院吗？不错，巴黎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存在主义者出没的地方离圣雅克街很近，但寄宿生们的出行有严格的规定。阿沙洛克还说，在阿尔及尔，占据人们头脑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拳击手马塞尔·塞当（Marcel Cerdan）的死“让全城陷入惊愕，包括不热衷体育的人”<sup>①</sup>。

剩下的是让杰基十分期待的课程。这难道不是法国最具声望的高中吗？其高师升学率不是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吗？但即使在这方面，路易大帝高中也令他失望。这里更受青睐的是认真而不是出色，大多数课程的教学方法仍然是相当经院式的。

如果德里达在路易大帝高中的竞争对手，即旁边的亨利四世高中上学的话，他的哲学老师就会是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这位老师是将海德格尔介绍到法国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收信人。但在路易大帝高中，他同所有高师预科班的同学一样，一周要听六个小时埃蒂安纳·博尔纳（Étienne Borne）的课，此人远不具前者的魅力。他曾是阿兰（Alain）的学生，埃玛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崇拜者，人民共和运动（MRP）的骨干。他是天主教徒，频频在《十字架》（*La Croix*）和《精神》（*Esprit*）上发表文章，以至被人称为“主教的学舌者”。他的外貌和举动有些滑稽：他很瘦，总在试图保持平衡，同时不断摆弄手表。讲话似乎使他极为痛苦，让人觉得“每说完一句话他就会死掉”。他“痉挛地”舞动着手臂，“为了强调一些词而重重地吐出前几个辅音”<sup>②</sup>。不过这一切都不妨碍博尔纳是个好教师，他教学生们掌握论文的艺术，并学会就任何主题进行20分钟的演讲。

53

从德里达一开始交作业起，博尔纳就赞赏他的哲学素质：“有分析的天分，对问题敏感，讲究遣词造句”。满分是20分，德里达的得分是12.5分到14分，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十分令人满意。但博尔纳对他的点评常常很严厉。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参照越来越多，这让博尔纳颇为恼火：“您使用的存在主义语言有待澄清”，他在几份作业的边上批注道，并无情地划去了所有在他看来无关主题的东西。

学年开始时，杰基经常与同样来自阿尔及尔的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讨论问题。帕里安特回忆道：“对哲学的共同趣味使我们接近，同时也在我们中间激起某种完全是智性的竞争。我对认识论问题的兴趣让他惊讶，而他所引用的存在主义哲学（克

① 菲尔南·阿沙洛克致德里达的信，1949年11月4日。

② XXX [Pierre Nora], “Khâgne 1950”, *Le Débat* n° 3, juillet-août 1980。这里还借鉴了让·贝勒曼-诺埃尔和米歇尔·莫诺里的描述。

尔凯郭尔)或现象学(他已谈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还记得一次讨论,主题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一定十分宏大,他刚刚开始学术上的训练,但他的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理解对科学的思考何以能够阐明哲学问题。”当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影响我们的真正友谊。我在他身上察觉到真正的思想深度,但其所表达的形式让我感到陌生。”<sup>①</sup>

54 在当时的路易大帝高中,寄宿生与走读生界限分明,在人数众多的高师预科班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团体。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对圣雅克街另一端的索邦大学(Sorbonne)的轻蔑,后者与由这些专科学校组成的法国高等教育的圣殿相距甚远。

德里达几乎没有机会结识走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家吃午饭,下午下课后便立即离开。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米歇尔·德基(Michel Deguy)、多米尼克·菲尔南德(Dominique Fernandez)都属于这些出身优越、衣食无忧的巴黎人。而寄宿生,比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让·贝勒曼-诺埃尔(Jean Bellemin-Noël)、皮埃尔·布尔迪厄,则常常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外省人。他们永远穿在身上的灰色罩衣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在许多方面他们就是高师预科班里的无产者。

除了这严格的社会分野,来自阿尔及利亚这件事倒显得微不足道。这遥远的来源地甚至好像带有一种异国他乡的威仪,特别是1949年秋从阿尔及尔来的三名学生——帕里安特、多麦克和德里达——要比大多数来自小地方的外省人显得自信。帕里安特回忆道,他们不只一次在同学们面前编造些阿尔及尔的俏皮话:“黝黑结实的杰基很会讲阿尔及尔下层民众特别是港口渔民的方言。他父亲的办公室就在通向港口的坡道上,他一定常去那里。”身为犹太人也并无大碍:战争刚刚结束,在路易大帝高中这样的地方,犹太人的身份既非困扰也无甚荣耀。有些学生有时也会发表反犹言论,但只是泛泛而谈,并不针对他们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

55 所有当时的人们都承认,寄宿生的生活条件并不舒适。“1949年,法国的生活水平尚低,我们的寄宿学校还是老式的:我们住在巨大的宿舍里,床头有个小衣柜,门口有几个盥洗池。晚上九点半熄灯。饭菜极糟,菜式单一,我们几次绝食抗议。这种集体生活让德里达比我们中的大多数更受罪,况且他的健康问题使得这里的饮食更对他无益。”<sup>②</sup>对寄宿生的纪律要求像对待小孩子一般严苛。舍监监视着所有微小的举动,哪怕只是去圣雅克街和苏弗洛街拐角的面包店买半根面包充饥。德里达和同学们不止一次因为小小的迟到或未经批准的出行而受罚。他们对那些通常与自己同龄的滥用微权的学监们充满了怨恨。

① 同让-克洛德·帕里安特的访谈。

② 同上。



强制的群居和艰难的生活条件迅速加强了寄宿生之间的关系。在点心时间，小饭馆的味道飘荡在学习室：从外省收到食品包裹的人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几周之后，杰基开始与几个同学结下友情，其中有来自黎巴嫩的罗贝尔·阿比拉舍德（Robert Abirached）。罗贝尔回忆道：“德里达和我都来自地中海边，同其他人的气质略有不同。我们更爱讲话，这让我们更接近。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叔父在巴黎，而且有趣的巧合是，这两个叔父几乎是邻居。他们都住在离蒙玛特尔两步远的菲利科斯-齐姆街。我们经常一起星期天去他们家里饱餐一顿，哪怕要忍受无聊的谈话。回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无数可笑的故事讲给对方听。”<sup>①</sup> 在杰基称为齐姆的叔父家里，杰基有时会见1947年就来到巴黎的哥哥勒内：他正在为完成药剂学业实习。勒内第一次在路易大帝高中门口再次见到身穿灰色长衫的杰基时忍不住吃了一惊：那个叛逆的少年、文学期刊的热心读者此时有着囚犯的样子和气色。

56

这一年德里达的另一位密友是来自埃克斯-雷-班的让·贝勒曼-诺埃尔。他讲道：“我大概很让杰基安心，因为同他相反，我脾气和缓。我睡得很好，什么都能消化。我们常常让夜里值班的人在清晨五点叫醒我们，好在上课之前足足地学习两个钟头。我们把毛巾挂在床栏上，巡夜的人就会拍拍脚把我们叫醒。我有时候把杰基的毛巾替他挂起来好逼着他起床学习。他从没学过希腊文，但知道以后会有用，我于是每周为他启蒙两到三次。作为回报，他为我解答哲学问题。我中学在一个宗教学校，从没听说过黑格尔和叔本华，更不必说尼采和胡塞尔了。大多数时候杰基能够非常清晰地回答我的问题，但他有时会突兀地停留在一点上。他有非常原始野性的一面，会突然间回归内心。”<sup>②</sup>

两个年轻人的亲密关系并不限于学业。在课后和学习之前，他们有时召集大家打扑克，两人对此都极擅长。“我们发现了一种玩法，能从几个有钱的走读生身上赚点钱，比如安德烈·杜伯夫（André Tubeuf）、多米尼克·菲尔南德、米歇尔·德基。我们让他们互相竞价，这样我们出去时就能多点零钱了。”

出去的机会很少。寄宿生每星期四有三个小时的自由。他们通常借机去学院街和尚皮翁街拐角的尚皮翁电影院看场电影，那儿的电影票很便宜。德里达很久以后说：“电影伴随着我困窘黯淡的学生生活。因此电影对我就像毒品、兴奋剂、逃亡地。”<sup>③</sup> 像在阿尔及尔，这都是些娱乐至上的美国片，看过就忘，远非经典。

57

① 同罗贝尔·阿比拉舍德的访谈。

② 同让·贝勒曼-诺埃尔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 in Antoine de Baecque, *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 op. cit., p. 57.

得到许可的时候，贝勒曼-诺埃尔和德里达会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出去，并小心赶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回来。他们在河边漫步，试着找些便宜书：就在那儿他们发现了自己最早拥有的弗洛伊德的书。他们还流连于两处钟爱的咖啡馆——马修和卡普拉德，位于圣米歇尔大街和苏弗洛街拐角，就在卢森堡公园对面。贝勒曼-诺埃尔回忆道：“我们谈文学和哲学，也谈体育或姑娘。我们接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两个都已懂得性事，这在当时的学生中还很少，在预科班就更罕见。那些男生入校时都是童男，我们可不是。我是因为在一座水城长大，有这样的机会，他是因为阿尔及尔的妓院。杰基把这经历当成优势。在圣米歇尔大街能碰到许多年轻姑娘：打字员、售货员，有些比女学生更容易接近。杰基那时候就已颇具诱惑力了。……与此同时，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感和宗教感，一种对绝对的渴望，这从他私下里写的东西看得出来，他有时会让我读这些文字。我还记得一首诗，瓦雷里式的开头，克洛代尔式的结尾。只有前两三小节是规则的，随后便越来越不合节律。早在那时他就已无法服从任何规范了。”

58 当时德里达同贝勒曼-诺埃尔的交情足以使后者请他到家里过复活节：埃克斯-雷-班因而成为德里达发现的第一座巴黎之外的法国城市。在这预科班的第一年里，另一件事让两个年轻人更为接近：小有名气的路易大帝高中剧团决定排演席勒（Schiller）的剧目《唐·卡洛斯》。由于排练在较为舒服暖和的音乐教室进行，贝勒曼-诺埃尔和德里达便自告奋勇扮演士兵。在他们的心目中，排练主要是为了延长晚上的时间。

就在排演期间，德里达第一次见到了热拉尔·格拉奈尔（Gérard Granel），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德里达还会常常与之相遇。格拉奈尔学业出色，人称“哲学王子”，他前一年已升入高师，回来就是为了在剧中担任主角。他的傲慢与骑士风度让德里达既着迷又恼火，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次结识的情景：

这甚至不能称为“初次相识”，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看到我。……这种不平衡使我留在阴影中……预示了我们日后的友情中一些命定的东西。……在《唐·卡洛斯》里我只是个小配角，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无名“西班牙大个子”，留着黑胡须，身穿镶着绒边的黑色短上衣。在我这无名小卒看来，他本身就是荣耀，光芒万丈，哪怕正跪在灯光下。<sup>①</sup>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Gérard Granel”, in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Galilée, 2003, p. 314 - 315.

到年底时，杰基同贝勒曼-诺埃尔稍稍疏远，同皮埃尔·富歇（Pierre Foucher），特别是迈克尔·莫诺里接近起来，后者在以后十年里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莫诺里在路易大帝高中已寄宿两年；他曾在高师预科班一年，后因为结核感染放弃了第二年的学业。他羞怯善感，爱吹管风琴，喜爱戏剧，反复阅读《大个子莫勒》，还是个“去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学生。一天晚上，杰基和他在吉尔贝书店后面的一家希腊饭馆里结下友情。从此他们之间常有长时间激动的交谈，还有在圣米歇尔大街和河边沉默的漫步。杰基将刚刚出版的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重负与神恩》送给迈克尔，迈克尔回报一本带有彩色复制画作的小书《凡·高》。杰基常使迈克尔惊讶：他觉得杰基一出生就已博览群书，甚至包括柏拉图全集。<sup>①</sup> 59

的确，德里达的哲学笔记令人生妒。在第一学期他的哲学成绩得了全班最高分，平均成绩14分，埃蒂安娜·博尔纳的评语也赞誉有加：“有学养，有天赋，善思考，成效优秀。”第二学期他是第二名，大概排在帕里安特之后，但平均分达到14.5分，评语皆为奖掖之语：“一流的哲学素养。”但不幸的是，哲学远非唯一重要的课程。当时高师的入学考试不分专业，而竞争之激烈又使人不能忽视任何一科。德里达的历史、地理及法语的成绩尚好——具有“有待发挥的可贵潜能”，而英文“尚未达到要求”，德文“还需努力”。<sup>②</sup> 至于拉丁文，德里达在翻译上较差，法文翻译成拉丁文只得了2.5分。要想通过考试必须同拉丁文成绩优秀的几名同学共同练习。

尽管成绩不均衡，这一年的杰基还是确信自己吉星高照，迟早能通过考试。有一天同贝勒曼-诺埃尔散步经过于姆街的高师时，他向朋友保证，两人有一天都会进去，这预言日后果然成真。另一次，在万神庙广场，他在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曾在《娜嘉》一书中赞美的伟人大饭店前停留片刻后说：“我怎么也得在那儿住一晚上。” 60

在准备考试以迎接这些好事来临时，他大把吞吃一种名叫马克西顿的苯丙胺药，这种药当时可以随便买到，萨特也曾大量服用，但它更加扰乱了本来就不安稳的睡眠。杰基发着烧出现在阿贝-德-雷贝街的大教室里，对着试卷半睡半醒。他的笔试成绩太差，令人无法接受。不管怎样，他几乎没有希望：预科班第一年落选被认为是正常的。很少有人能立刻考上。对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尝试就像训练。另一个参加考试的理由是可以旁听通过笔试的同学的面试，比如帕里安特。哲学的面试官是弗拉迪米尔·扬科勒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和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是德里达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这位《知觉现象学》的作者。

① 同迈克尔·莫诺里的访谈。

② 路易大帝高中档案，简报1949—1950。



夏天在埃尔-比亚度假时，德里达同迈克尔·莫诺里大量通信。寄宿的日子令二人同感抑郁，而回到家乡亦无法让他们满足。杰基很难再找回儿时玩伴的默契，此后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变了质的阿尔及利亚人”。

对我也一样，暑假漫长单调，了无生气。我真是迫不及待想回去，哪怕不是为了学习和忙碌的生活，只是为了远离家庭，回到巴黎的冬天，回到你和其他人的身边。这儿的气候让我倦怠，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疏远而充满误解，或者是本能的和动物性的。更有甚者，这一切甚至常常不再使我失望，真是令人消沉到极点。<sup>①</sup>

61 只要可能，杰基总会陪着父亲出车，特别是去他尤为喜爱的卡比利。“这是一周最累但最有意思的日子。”其他时间里他则感到“前所未有的萎靡不振。……我随性作乐：打桥牌，打扑克，开车，坐火车，同我模糊地知道是庸俗的人们为伍”。家里过于丰盛的饭食很快使他在巴黎减下去的体重又增加回来。这新的形象令他不悦，他在寄给迈克尔的照片的背面写道：“瞧，我变成了庞然大物。我同‘自己’再无共同点，我为此而悲哀。”

两个年轻人在夏天的通信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讨论各自阅读的书籍。莫诺里推荐的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的《日记》无法吸引德里达。

请你原谅我的狂妄，我想对你说“私人日记”这种体裁对我始终有着过于强烈的诱惑力，它使人轻而易举地流露弱点，而我个人对自己过于克制，对此难以容忍。

比如，我这几天在重读收于“七星”丛书（la Pléiade）的纪德的《日记》，我必须经由一个无穷无尽的决定论之网来解释纪德。也就是说，我必须将他一笔勾销，才不会觉得这是一部即便不算智性败坏，也是愚蠢而天真的作品；而纪德在几年前还令我敬仰不已。<sup>②</sup>

① 德里达致迈克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夏）。

② 德里达致迈克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夏）。

不过，德里达还是怀着狂喜之情重读了《窄门》，还发现了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认为他十分出色。

按照惯例，杰基进入预科班第二年。大多数同学还和他在一起，新换了老师。哲学课的变化很大：阿兰的弟子莫里斯·萨文（Maurice Savin）取代了民主派基督徒埃蒂安纳·博尔纳。萨文来自费奈龙高中，人们说他被调离是因为他对姑娘们的兴趣过于浓厚：有些女生仍然以各种理由来路易大帝高中门口找他。萨文深具文学禀赋，热爱戏剧，常常在《现代》、《法兰西水星》和《圆桌》上发表文章。他在课堂上有时会提到普鲁斯特（Proust）、拉威尔（Ravel）、巴什拉（Bachelard）和弗洛伊德，同时告诫学生们不要在考试中引用这些名字。

62

尽管莫里斯·萨文多少有些现代派的取向，但他似乎并不像博尔纳那样欣赏德里达的风格。杰基的第一篇论文只得了满分20分的11.5分，这在路易大帝高中算是成绩平平。其评语严厉而认真：“不可否认，执笔人有哲学家的素质。关于历史方面的表述有太多的哲学。被概括的哲学无甚意义，因此您的开头部分使我迟疑甚至不快。但进入分析部分后，虽然语言过于‘专业’和晦涩，但您的文章变得生动有趣，表现出许多潜质。”在一段的确流于雕琢的段落旁边，萨文批注道：“我承认很难理解。请为读者着想……”德里达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用两页半篇幅的“附注”结束了作业。那是一些很短的格言式的段落，同论文的走向全不相关。最后一句占了一行，同主题相去甚远：“爱：投身于无量，于疯癫。”萨文的评语点到为止：“有趣但无用。”<sup>①</sup>

在预科班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杰基的确时有陷入疯癫之感。寄宿生活的管理比前一年还要让他痛苦。寒冷、糟糕的卫生条件，恶劣的饭食，私密感的匮乏使他难以忍受。有些晚上，他因为陷入情绪低谷而无法学习，甚至无法与同学交谈。

只有与莫诺里日益强烈的友情能让他忍耐下去。他们在音乐教室一起学习的时候——米歇尔有权持有钥匙，他们写作小说和诗歌，小心翼翼地投稿。但随着时间流逝，杰基越来越被一种严重而不明确的“疾病”困扰。他处在神经衰弱的边缘，睡眠很差，无法进食，常感恶心。

63

1950年12月，德里达的情绪降到最低点。因为不明的原因，他在圣诞节期间没有回家，独自待在巴黎——很可能在叔父家，因为宿舍关门了。他陷入一场真正的情绪危机，远离朋友，焦虑不安。在一封给莫诺里的开头已不幸丢失的信中，他试

<sup>①</sup> 这篇论文和其他许多论文一样被德里达终生保存，现藏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特别收藏处。他保留了在一些文章末尾加一段长长的附言的习惯，比如他为《现代》杂志创刊50周年撰写的文章：“‘Il courait mort’, salut, salut”, repris in *Papier Machin*, Galilée, 2001.

图解释自己的烦恼。一段时间以来，他感觉自己行进在“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难以到达，更别说了解的地方”。米歇尔好几天没有回信，事情并未好转。杰基前所未有的地沉沦，也许想到自杀。现在，危机最深的时刻似乎已过去。

是啊，风暴已过去，因为最糟的情况就是风暴经过。我几乎决定这学期回阿尔及尔去，如果能同行政部门协调好的话。你的来信先是动摇随后又坚定了我的决心。我会在星期三见到你。我无法执笔，今后也将难以执笔。<sup>①</sup>

就在杰基回埃尔-比亚的家里休息之前，两个年轻人在巴黎短暂重逢。杰基整个第二学期都待在家里，冒着荒废整个学年甚至被开除的危险。开始的时候他无法写字，更别说学习。随后他开始了同米歇尔·莫诺里几乎天天不中断的通信，所有信件值得有一天全部发表：它们对德里达成长的重要性可同年轻的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相媲美。脆弱的杰基在阿尔及尔没有一个真正的对话者，他毫无保留地吐露心迹，之后再未如此。米歇尔虽然对困扰着朋友的神秘病苦感到不解，但还是表现出持续的善意：“由于我极度无知和缺乏洞察力，对你讲到的疾病我只有模糊的体会。”他劝杰基努力学习，并寄给他拉丁文翻译练习。那时的杰基还做不到这些，给最好的朋友写封信已是考验。

我在这儿的生活十分悲伤，难以为继，将来我会详细讲给你听。所有我能写下来的，所有我能说出来的都将无法表达这可怕的经验之万一。……我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自然而然的出路。啊！要是你能在这儿……

我所能做的只有流泪。……向着世界哭泣，随着上帝哭泣。……我几乎无能为力，米歇尔，为我祈祷吧！

我很不好，米歇尔，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接受这将我们分开的距离。所以，我也放弃试图穿越这距离的努力。<sup>②</sup>

渐渐地，剧烈的危机开始减弱，让位于“沉重而平静的忧伤”。杰基离开巴黎已三周。他开始读书学习，“等待赎罪的两个月过去”。为了避免再次沉沦，他想在复活节假日之后不惜一切代价成为走读生。此时他请求米歇尔“经常”给他写信。他希望后者帮他询问如何能够在社会保障餐厅就餐，那儿的饮食要比路易大帝高中的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12月底）。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1月）。

食堂更适合他。他也希望他寄来高师和索邦大学的拉丁文、法文和哲学史的考试内容。虽然他提出了很多要求，但两人的交流并非单向的：米歇尔在哲学上感到困难，杰基便寄给他“一些关于美学的笔记”帮他丰富论文的写作，还说明自己对这些笔记并不满意。这50页的笔记让朋友得到了当年的最高分，更增加了对他的钦佩。

65

尽管有寄宿生的种种限制，米歇尔·莫诺里还是尽力为杰基的归来作准备。他开始寻找朋友微薄的收入能够负担得起的出租房间。他找到一个熟人，是学校卫生检查员，允诺写一封许可信让杰基能在社会保障餐厅就餐。米歇尔还给他寄了些练习，尽管觉得他很难在阿尔及尔进行拉丁文翻译：“你需要这暗淡的墙壁、缺页的字典，这灰尘和陈旧烟草的呛鼻气味，还有煮饭锅的咕嘟声。”<sup>①</sup>

杰基的信仍然充满感伤，但渐渐变得不是那么阴暗了。

只有六个星期了，然后我们又能一起出门，一起散步，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也一起在长长的互诉心声的间隙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将能倾诉书信无法表达的东西。米歇尔，我们能享受到宁静而彼此信任的欢乐吗？没有你我几乎不相信自己可以，但有了你我可以吗？……永不会放弃你，也不许你那么想的挚友。<sup>②</sup>

让·贝勒曼-诺埃尔也在忙着。他寄去了考试内容，还有高师笔试的时间表。让·多麦克则在一位名叫贝拉尔的夫人的家族的朋友那里找到一间很便宜的保姆房间。这房间位于拉格朗日街17号，离路易大帝高中很近，房间没有暖气和自来水，但光线充足，还有独立的楼梯。杰基立即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仍感脆弱，但已不再掩饰想要离开埃尔-比亚的急切心情，因为回家并不比寄宿制更让他好受。

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开始我尚能忍受，想着我学业会有进步，健康也将大为改观；而且那时我刚刚离开你，你还在我眼前，我们的通信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觉得自己很远，十分遥远。……米歇尔，别忘了我，我只有你的友谊。<sup>③</sup>

66

① 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1年2月）。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2月）。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3月）。

不巧的是，就在杰基即将回到巴黎的时候，米歇尔正在夏特勒饶的家里度过整个复活节假期。在最后一封信里，杰基谈到自己最近在重读《恶心》。在他刚刚经历了折磨之后，这本书对他有了新的意义。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世界对我显得不同寻常，让我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如奇迹般显现。我不再知道什么是自然或什么是自然的，面对一切我都痛苦地感到惊讶。至于我用的词，我采取的态度，我的姿势，我的思想，它们奇特地越来越像《恶心》里的罗康坦。我现在一直自以为已理解、吸纳并超越了他的经历，事实上远非如此。……区别在于罗康坦没有朋友，也不想有。而我，米歇尔，我寄希望于你。<sup>①</sup>

杰基终于回到巴黎，从4月2日开始如释重负地过起走读生活。现在，下课后他可以自由安排学习和生活了。但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像个病人，睡得很早，只吃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的饭食。他努力学习，但仍不足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缺课如此之久，他第二年的成绩惨不忍睹——除了哲学，萨文认为他是个“扎实勤奋的学生”，尚“有希望”。法文课尽管“天赋很好”，成绩却“仅为中等”。其他科目的成绩均是平平，太多的作业没交。<sup>②</sup>

67 1951年5月28日，杰基在极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参加了笔试。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又大量吞食了苯丙胺和镇定药，他再次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考试的紧张感是最后一击。他写不出字，第一场考试交了白卷，只好放弃。几天之后，绝望的杰基向老朋友菲尔南·阿沙洛克倾诉了痛苦。他担心路易大帝高中在他如此混乱的一年之后不接受他进入第三年的预科班学习。而回到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是耻辱：他将不得不放弃对大学生涯的希望，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他做了最后的努力，找到法文教师蓬斯（Roger Pons）。蓬斯在很多方面属于老派，比路易大帝高中的许多其他教师更加传统。但他也许对杰基的处境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无论怎样，这次见面至少在心理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杰基在一年之后通过考试后给蓬斯的信中写道：

除了许多别的回忆，我感激的心情还让我记得1951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因一桩觉得无法弥补的事而沮丧万分。……我去请求得到您的建议，特别是鼓

<sup>①</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3月）。

<sup>②</sup> 路易大帝高中档案，简报1950—1951。



励。与您告别时，我放下心来，决定继续努力，尽管我以为永远无法摆脱那失败。能对您承认吗？如果不是那天早晨的拜访，我将不会继续在预料班学习，大概也不会其他地方继续学业了。<sup>①</sup>

在圣雅克街另一头的索邦大学，一些教师对德里达的个性显然不那么感兴趣。他得通过好几门学士学位课程：在哲学通史考试中，他关于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 的题目只得了丢人的 5 分，而满分为 20 分。亨利·古耶 (Henri Gouhier) 的评语极尽讽刺，想必直刺其心：“答案因晦涩而出色……高超的技巧练习，无法判断其智力水平，但同哲学史无甚关系。需攻读笛卡尔 (Descartes)。对马勒伯朗士无评判能力。等他愿意接受规则而非在应该了解的地方杜撰的时候再回来。失败对这位考生有好处。”“接受规则而不是杜撰”：这就是给未来哲学家的规划。如果说这傲慢的语气和因循守旧的态度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特征的话，它们所表现出的却是法国的大学在很长时间里对德里达的态度。其后的一切成功都无法令他忘却这样的句子。

68

※ ※ ※

7 月初，杰基再次返回阿尔及尔。他大多数时候乘船，但有时也用便宜些的旅行方式：“作为半公开的，或至少是‘非正常’的旅客，乘坐那种看上去很不可靠的运输机。”这样的飞行很不舒服，而且颇为吓人：“半坐在成箱蔬菜中的小板凳上。”<sup>②</sup>

一到家他就给亲爱的米歇尔写信，后者也在高师入学考试中失败，沮丧不已。杰基认为能通过考试说明具有某种智力与愚蠢的奇特而复杂的混合：“那是种最廉价的奇迹。”他知道朋友不顾父亲反对想要离开路易大帝高中，进入索邦大学。想到无法再与米歇尔朝夕相处，他既担忧又悲伤。

像前一年一样，杰基感到阿尔及尔的夏天令他精神麻木。

我读书很少；我试着写作，但每次都放弃。我心比天高，但力所难及。对于无才者，思考是永无创造力的啊！

疲倦随着炎热降临；沉重的疲倦，就像我在考试时所感到的。<sup>③</sup>

① 德里达致罗日·蓬斯的信件草稿，1952 年 9 月 10 日。

②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84.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 年 7 月 10 日。

69 他认为自己注定要长久忍受这无法治疗甚至无法理解的精神上的极度疲劳，故而有“这令人厌恶的无聊感，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担忧，没什么能动摇它，它蔑视一切。偶尔才有读书的兴趣或者毫无灵感的热情”。读书漫无目的，从《圣经》到萨特，还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克尔凯郭尔、提耶尔·莫尼埃（Thierry Maulnier）、埃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让·华尔（Jean Wahl）。“别被这么多的名字吓着：每本书都读不过七八页。我不会用别的方式读书了。”<sup>①</sup>但他将对其中的一些作家始终保持忠诚。他耐心地阅读柏拉图：“如果有足够的力量，我会为之充满热情。”他还怀着真正的幸福感重新发现了弗朗西斯·蓬热：“从没有人让我感到这么少的……惊讶。我为此激动。我会带给你《散文诗》。”<sup>②</sup>

阳光与大海渐渐重新发挥作用。杰基再次同少年时的伙伴塔乌松和阿沙洛克交游，但他感到一种愧疚。

这些天我任由自己被一帮伙伴弄得昏头昏脑，他们不顾我的意愿拉我出门到处逛，还开着我的车。大海、阳光、舞会、酒精、速度等带来了浑浑噩噩。重新体验年轻时的这些东西（别笑话我，我的年轻时代同路易大帝高中巴黎式的学生生活截然不同……），让我对之彻底厌恶，而且我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我有任何闪失。<sup>③</sup>

几周过去，双方通信渐少，德里达担心起来。如果米歇尔拿走友情和信任，杰基相信自己很快又会变成“一条卑微的小蚯蚓，自负、狭隘而萎靡”。他比以往更需要朋友的支持。

70 这儿有无数的考验刺激着我，夺去我的力量。即使在最为沮丧的时候，我也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状态。我睡不着觉，有时候夜里起来光着脚走遍每个房间，为的是听到家人熟睡的气息，祈求一点安宁或信心。为我们祈祷吧，米歇尔。<sup>④</sup>

---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年7月16日。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④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年10月2日。

莫诺里一直是奉行教规的天主教徒，这时正在一所修道院隐修。这正好让德里达有机会确认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不如说自己的焦虑。

像很多时候一样，我希望能模仿你，但我做不到。首先因为某种宗教“背景”让我无法这么做。其次，更主要的是我还太过软弱，如果不是太过焦虑的话，以至会将祈祷、沉默、必要的安宁、企盼和冥想变成精神上的懒惰。虽说这懒惰也许能够终结那可怕的折磨（结束与终点），但我尚未感到，大概也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有接受此种懒惰的权利——如果这预测不算太拙劣的话。<sup>①</sup>

1952年10月初，杰基终于回到巴黎。开始在路易大帝高中第三年的高师预科班学习之前，他必须面对那些学士课程考试，对此他几乎没做准备，非常害怕。通过考试让他松了口气，尽管成绩极为一般。随后他再次进入已经车熟路的路易大帝高中。学年一开始他就同班里最年轻的同学之一米歇尔·欧库图里耶（Michel Aucouturier）结下了友情。后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最初的相遇：“德里达——我们那时候称他德尔——属于预科班里自视甚高的一群。他让我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总是令人愉快，而且同我在一起时几乎带着保护者的姿态。他有时对我说，我的金发让他想起两岁时死去的小弟弟诺尔贝。”米歇尔·欧库图里耶对杰基的才华印象极深，以至有一天在给姐姐玛格丽特看班级合影时说：“找找看能不能认出来那位哲学天才！”欧库图里耶在第一年就一举通过考试，和杰基一起进入高师，他们的友情将在那里加深。<sup>②</sup>

而米歇尔·莫诺里只在开学的头两个月待在路易大帝高中。他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在万圣节那天离开了他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预科班。他在夏普塔勒高中找到一份“寄宿教师”的工作，同时在索邦大学完成古典文学学位，并撰写题为《阿洛伊修斯·贝特朗与散文诗的诞生》的论文。这并不妨碍两个朋友仍然保持亲密。他们约在拉格朗日街的小房间或者离圣拉扎尔火车站很近的夏普塔勒高中门口见面。米歇尔有时拉着杰基去阿特内或埃贝托剧院。虽然比前一年好许多，但杰基仍然抑郁。在他“秘密而混乱”的信中，他为自己的沉默、恍惚和偶尔的无礼道歉。米歇尔·莫诺里在他的目光下有时觉得自己被肢解，“变得一无是处，只是个无用可笑的小东西”。“你的友谊迫使我谦卑。”<sup>③</sup> 他给德里达写道。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② 同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访谈。

③ 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同米歇尔·莫诺里的访谈。

在这预科班第三年期间，杰基同皮埃尔·富歇接近起来。后者也成了走读生，在与杰基同一个街区的卡特法日街租了间房，距植物园很近。同富歇的友谊不像同莫诺里那么感情化，更多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富歇说：“在预科班的第三年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早晨一起骑车去学校。午饭和晚饭一起去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它同路易大帝高中的餐厅比起来好多了：食物更好、更健康，气氛更愉快。总的说来，我们并非十分快乐，这大概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问题。我们刚刚摆脱战争和匮乏，没有任何职业规划，对未来的设想远没有什么玫瑰色彩。不过自从摆脱了寄宿的约束后我们的生活明显少了许多痛苦。我们常去看电影。有时候打桥牌，他几乎同喜欢扑克一样喜欢桥牌……我还记得1952年5月1日那天，杰基带着一束铃兰花来找我。这在两个男孩子中间很少见，我很感动。”<sup>①</sup>

至关重要的仍然是准备考试。虽然走读生活带来一些诱惑——有人说他同一名已婚女子有染——杰基这一年还是很勤奋认真地学习，没有忽视任何一门功课。皮埃尔·富歇回忆道：“大多数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他我才开始真正学习。我帮他学习拉丁文，因为我比他强；他帮我学英文，他水平很好。我在中学最后一年的哲学老师很糟，因此我的哲学较差。有个星期天晚上，因为不知道怎样结束一篇论文，我请杰基帮忙，他对我口述了整个结尾。博尔纳发还作业时，给出的评语毫无歧义：文章平平，但最后两页相当出色！”

几年过去了，路易大帝高中的哲学教育越来越难以满足德里达。他开始勤勉地阅读海德格尔，但无论博尔纳还是萨文都同海德格尔无相近之处。总的来说，预科班的学生甚少能接触到重要的作品，他们学到的更多是如何使用论辩法以及如何掌握论文的修辞法。因此，德里达自修海德格尔的作品。但在1950年代初，海德格尔的作品还很少有法文版。只有《什么是形而上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以及《存在与时间》的几章已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知道这些译本很难令人满意。1938年，亨利·科尔班将“Dasein”（“此在”）的概念译为“人之现实”（réalité humaine），这个译法后来因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而流行开来，而德里达后来认为这是个“在许多方面都怪异而糟糕”的翻译。<sup>②</sup> 但当时德里达的德文十分有限，无法独立阅读原文。

73 距离1952年春天的高师入学笔试越来越近了，他不再像前两年那样焦虑。他这一年的成绩十分令人满意，无论教师还是同学都不怀疑他的成功。拉丁文仍然时好时坏，但第二学期有了“决定性的进步”。他在英文上被认为“非常认真”，尽管由

① 同皮埃尔·富歇的访谈。

② “Les fins de l’homme”, conférence de 1968, reprise dans *Marg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于健康原因他常常缺课。在法文方面，这位“很好的学生”只需要小心“烦琐化的倾向”和“过度咬文嚼字”。

他的哲学成绩一直很好，这时开始出类拔萃。发还论文时，不擅夸奖的博尔纳常常表扬德里达的文章。第一学期他只拿到第三名，但平均分达14.5分（“各方面都极出色，有非常好的哲学素养”）。第二学期他名列第一，获得了路易大帝高中罕见的16分（“稳定出色的成绩，确定无疑的哲学素养”）。考试前夕，博尔纳让杰基准备最后一篇论文，主题显然是特意为他设定的：“您有哲学精神吗？询问自己，您相信文学和哲学精神是无法调和的吗？”博尔纳没有给这篇文章打分，只写下了这样褒扬的评语：“全文经深思熟虑。您应该能够通过考试。”

这一切都不能消除德里达的焦虑，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在最后一刻崩溃。这一次将是悲剧性的：如果再次落败，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将永远向他关闭。苯丙胺的诱惑仍然强大，但他试着不再大量服用。在第一科考试的前夜，他无法入睡，叫醒了租给他房间的两位老妇人，他同她们这几个月来相处甚欢。他喝着浓茶同她们聊天，最终重新回去躺下。

笔试相当顺利地结束。随后的几个星期，德里达准备口试。他更加担心，害怕失去自控。就算是有天赋且用功，进入高师可也永远不是稳操胜券的。在班里，只有塞尔、拉米（Lamy）、贝勒曼-诺埃尔、卡里夫（Carrive）、欧库图里耶这几人同他一道升入高师。其他出色如米歇尔·德基和皮埃尔·诺拉者均被淘汰，并为此终生难以释怀。

74

德里达终于通过了考试，他向法文老师罗日·蓬斯详细讲述了其中的种种。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此我们发现德里达是个出色的叙述者，尽管他后来称自己没有讲故事的能力。

我的考试最平常不过。唯一值得记述的就是口试，我表现平平，以至落后了十名。实际上我笔试得了第六名，比第一名落后4.5分，尽管我的哲学成绩十分令人失望。

在德文和古代史的口试中我落后了很多，我的应答很差，估计刚过零分。法文口试我得了很高的12分，但一切都让我不快。比如评委，至少他们的外表让我失去了愉快作答的兴趣。卡斯特克斯（Castex）先生带着先知般的神气，说出的判断却平庸、简短且肤浅。我同另一位评委对答较多，他更加严格，但在他四周和他的思想中漂浮着那种浸淫着官方文件、公证书甚至是中学会考手册的琐细陈旧的气息。

在这次口试中，德里达遇到的题目是摘自《百科全书》的一页狄德罗的文字，“一段颇为无趣的文章，一切都浮于表面，清晰准确”。他对这段文章的分析已经是德里达式的了，就好像他研究方法的大线条已然确定下来。

75 我认为这段文字是个陷阱，多疑而谨慎的狄德罗将自己的意图藏在字里行间，而从形式上看一切都是模糊的、潜在的、间接的、拐弯抹角的、复杂化的、隐含的、轻悄的……我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去发现每句话、每个词的一系列含义。我创造出一个精于曲笔的狄德罗，一个文学的独行侠，经得起反复推敲……

但同评委的对话似乎很困难，其中之一谢赫（Schérer）先生对考生提出反对意见。

——这篇文章说到底很简单，您用自己的意思将之变得复杂和累赘了。比如这句话，只有这一点是明确的……

——在明确的意义上这篇文章并不存在，它在我看来毫无文学旨趣……

卡斯特克斯仰望天花板，忧伤地笑了；谢赫指着面前的纸说：

——没人不让您从一开始就把这话说出来。

归根到底，名次并不重要，关键是考上了。德里达自认尤其在意高师从此能够向他提供的物质保障——他将得到入门教师的薪水——还有家人的释然。把他送到巴黎对家庭来说是相当沉重的物质上的付出，三年来，这一直令他烦恼。

在这封长信里，德里达礼貌而优雅地对罗日·蓬斯的教育表达了谢意，尽管或者说多亏了他的某些简单粗暴。

我以不可饶恕的巨大狂妄相信，在预科班里，除了您本人和博尔纳先生，没有一位老师教给了我并非我早已了解或者能自己学会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其他人，当他们传授些什么的时候，教会的只是一门职业，一种技巧，一些客观有用的知识。我感到，在您身上，从您那里，我学到的当然是职业的一部分，但还有超出职业的东西：智力的诚实与谦虚，兴趣和严谨，不为虚假的深刻或似是而非的特征所欺骗，竭力以简单的方式抵达确定无疑的判断，将最大的善意与最大的清醒相结合。我从最早交给您的作业中学到了关于严谨的风格与智

识的艰难一课。我今天仍然会倾向于当时盲目相信的混乱而夸张的所谓抒情性，但幸好对之有所控制。您的一些评语是如此尖刻，但我为什么从未感到受辱和被冒犯呢？那是因为您在场。<sup>①</sup> 76

考上高师绝不意味着任何保障。口试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路易大帝高中同学、酷爱诗歌的克洛德·博纳弗瓦（Claude Bonnefoy）邀请德里达到位于图尔附近的普莱希斯的家族庄园里去。德里达大概并不知道自己置身于怎样一个右翼的圈子。克洛德的父亲勒内曾是皮埃尔·拉瓦尔政府的情报处长；他被判死刑，后于1946年减为终身罢免官职并没收财产。晚宴时，许多维希政府的旧人在座，其中一位女宾突然说：“噢，犹太人，我从远处就能感觉到他们，先生……”德里达大声反诘：“是吗？不错，我就是犹太人，夫人。”桌子周围立刻笼罩了一层肃穆的寒气。

几天之后，德里达给同学写了一封长信。他以坚定、沉稳的语气解释说，自己无权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尽管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肤浅的”。他的“犹太身份”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决定他，而且他对此从不声张，除了遇到明显的反犹表现时：这十分接近萨特在1946年发表的《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中表明立场。德里达借此机会将法国的情况同他亲身经历过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几年前我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任何反犹暗示都会让我怒火中烧。我会做出激烈的反应。……这一切有所平息。我在法国认识了一些不曾表现出丝毫反犹情绪的人。我了解到在这个问题上智慧与诚实是可能的，在犹太人中间不幸流传的说法——“非犹者即为反犹者”——并不真实。这个问题对我变得不是那么迫切，成了次要的了。还有些非犹太人朋友教我将反犹主义同整个决定论联系起来。……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似乎更难以逾越，更加具体和可怕。在法国，反犹主义是或者希望成为一种教条，一系列抽象思想的一部分。它像所有抽象的东西一样危险，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不那么明显。归根到底，反犹的法国人只在针对他们并不认识的犹太人时才是反犹的。<sup>②</sup> 77

德里达确信，“若一个反犹主义者足够智慧的话，他便不会相信自己的反犹主义”。他希望再有机会同他的朋友及父母讨论这一事件。在回信中，克洛德·博纳弗

① 德里达致罗日·蓬斯一封信的草稿，1952年9月10日。

② 德里达致克洛德·博纳弗瓦一封信的草稿，无日期（1952年8月）。

瓦似乎并未领悟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我们庄园里所有的人都为那些话感到悔恨……这种话大概经常像口头禅一般脱口而出。”他将局势翻转，强调父母的困难处境，说他们此后成为“被正式抛弃的人，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仿佛为了让德里达忘记那句讨厌的话，他提议杰基撰写文章或小说向《巴黎人》投稿，这是作家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正准备创办的一份报纸，后者是克洛德父母的朋友，也出身于同样为纳粹合作者的圈子。德里达不会参与，但这件事似乎丝毫没有改变他和克洛德·博纳弗瓦之间的关系。

※ ※ ※

在艰苦的考试和漫长疲劳的返回阿尔及尔的旅途之后，杰基听凭自己沿着“通向此刻日常生活的天然坡道”滑下去，尽管不无负罪感。

疲倦、炎热，家庭在此刻完全令我迟钝。我无法阅读或写作。我只对轻松的娱乐感兴趣，无聊的游戏、阳光和大海……我感到这个假期我将一事无成。我暗淡而干涸。我还能恢复吗？<sup>①</sup>

78 他十分希望米歇尔·莫诺里能来阿尔及尔度过夏天的一些时光，但这是不可能的，倒是皮埃尔·富歇和邻居皮埃尔·萨拉赞（Pierre Sarrazin）来待了几周。“我们在阿尔及尔见到的杰基同在路易大帝高中十分不同，”皮埃尔·富歇回忆道，“他身穿阿尔及尔犹太人的服装，但与我们相处融洽。他的家庭由祖母和母亲主导，是个团结的大家庭，十分热情好客。星期天我们在兹拉达和金沙滩举办大型野餐。我很欣赏这个大家庭的和谐默契与宽容。平时我们常常陪他父亲出车到卡比利。总是由杰基驾驶，他开得飞快，十分享受，就像那个圈子里的年轻人。他有种自信，几乎是优越感。”<sup>②</sup>

这个夏天，杰基同两个伙伴一起发现了好些他此前不了解的阿尔及利亚城市和地区。晚上他们去电影院、赌场或长时间打牌。但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厌倦了这两个皮埃尔不间断的兴奋吵闹：“我没有力气总是带他们出门，我需要安静。”<sup>③</sup>他渴望孤独，终于把他们送到一个叔父家待几天。每一次被抑郁攫住时，他总是转向米歇尔·莫诺里。

---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2年8月）。

② 同皮埃尔·富歇的访谈。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2年8月15日。



多希望你能知道此时我是多么沮丧、茫然、干涸。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寻找一些精神或灵魂的新鲜气息，找到某种东西，哪怕多少类似于兴味和热情，一点内心的情感，同他人或自己交流的意愿。没有，没有，没有……迟钝、麻木、神经衰弱、委靡不振，这是灵魂的衰竭。<sup>①</sup>

他不想读书，更不想学习。也许是阿尔及利亚的氛围使他如此。他不敢完全放松，但情愿像加缪在《婚礼》中出色地描述的那样沉沦于当下。“在某种意义上，但 79 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生活舒适得让人不愿读书，也或许就是不愿思想。”

但这个阿尔及利亚将很快成为回忆。

---

<sup>①</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2年8月26日。

# 第4章 高师

## (1952—1956)

80 1952年10月，德里达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相对于预科班时的种种限制，这意味着真正的解放。虽说杰基得离开拉格朗日街同其他三名学生合住，但他仍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终于，他进来了；终于，他到达了。

高等师范学校创立于国民公会时期的1794年，从1847年起定址于于姆街45号，距路易大帝高中只有几百米。它本身并不发放任何学位证书，但它的特点是文科与理科学生的比例相当，尽管两者泾渭分明。高师尤其人才济济。著名的高师毕业生数不胜数。轮到德里达进入时，亨利·柏格森、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查理·佩吉（Charles Péguy）、雷翁·布罗姆（Léon Blum）、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还有其他许多人已历经数代确立了它的光荣地位。

这个只有青年男子的小宇宙——但女子可以随意进入——“于姆街的隐修院”，自有其传奇和仪式，为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或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这样的作家所称道。学制四年，第三年通常用于准备教师学衔考试，第四年开始撰写论文。81 学生们的身份为见习公务员，他们从入学开始算起就要为国家至少服务十年。

从1900年代初起，高师内部就流传着一些习语。“土纳”（turne 或 thurne）指宿舍，“土纳志”（thurnage）指从二年级起向学生分配宿舍的复杂程序。入学考试第一名的学生被称为“卡西克”（cacique）。“原方”（archicube）指从前的学生，校友录因而被称为“原方志”（archicubier）。在正方形的庭院中有一个带喷泉的水池，其中的金鱼被称为“恩斯特”（Ernest），“恩斯特法”（ernestisation）指把一名学生扔进水池。“水族馆”（aquarium）指一楼大厅。“饭锅”（pot）指一天供应三餐的学校餐厅。

推而广之，这个词用来指代与饮食有关的一切。勤杂女工和所有广义的服务技术人员都是“西乌克斯”（sioux）。<sup>①</sup>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这种高师气质越来越令德里达不快，但他刚开始时心甘情愿、眉头都不皱地参加孩子气的胡闹，比如摘下写有校友名字的街牌，或者去荣佩梅耶茶餐厅发表不着调的言论打扰客人。杰基肯定参加每年冬天举行的必须打领结的学校舞会，还有六月初轻松愉快的花园舞会。在年度汇演中，他表演了一个地道的节目，拉下帽檐扮演阿尔及利亚土匪，引来哄堂大笑。<sup>②</sup>

他还用半严肃半滑稽的口气起草了一份有关饮食制度的建议书，随后请包括埃玛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Ladurie）在内的几名学生签名。在这两页用打字机打出的建议书中，他们指出学生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包括用火腿取代肉食，太多肉糜、香肠和豌豆泥，特别是除了汤以外所有食品均不足量。

冷菜取消了。为什么？我们不吝唤醒厨师的想象力，向他推荐这些最常见 82  
的水果——西红柿、橄榄，以及便宜的块茎植物——生擦胡萝卜……

给我们吃的垃圾食品中有今晚的卡芒贝干酪，它切成小块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其硬度堪比砖头。我们特呈上此品供您评判。……

身为病人且以此为憾的我们有必要澄清那种想法：认为我们养尊处优，苛求比普通食物更丰富、更好的饮食，其实我们仅仅满足于健康的食物。<sup>③</sup>

开始时，杰基继续在可能的时候去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就餐。但几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大有好转，不必再常常食用高师或别处的健康饮食了。现在他有了些钱，可以更容易光顾街区的饭馆，特别是高师学生喜欢的咖啡馆。他们常去马修和卡普拉德，更常去著名的高师吧——就在于姆街对面，佛扬提那和盖-吕萨克街的拐角，还在那里玩台球。他们也喜欢吉马家，在圣雅克杜欧帕前面的小广场上，离圣雅克街很近，十分安静，适合随意聊天。<sup>④</sup>

※ ※ ※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经过预科班严酷的管束之后，在高师的第一年相当于解脱。

① [http://fr.wikipedia.org/wiki/École\\_normale\\_supérieure\\_\(rue\\_d'Ulm\)](http://fr.wikipedia.org/wiki/École_normale_supérieure_(rue_d'Ulm)) .

② 阿兰·蓬斯的回忆。

③ “Le Pot”，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建议书的片段，收藏于玛格丽特·德里达档案。

④ 同让·贝勒曼-诺埃尔的谈话。

83 的确，夏天之前还要在索邦大学修几门课，但没有考试，也不必撰写论文。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候，可以享受生活和拉丁区。德里达比前些年在经济上要宽裕得多，终于可以随性买书和外出了。他频繁光顾电影院，常与罗贝尔·阿比拉舍德同去，并且好像关乎某项科学活动似的认真宣称：“我们要研究应用电影学。”

政治在高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萨特和加缪的冲突开始于前一年的春天，但继续引发争论。1952年5月，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的一篇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叛的灵魂》掀起了敌意。加缪不屑与作者打交道，直接在《致〈现代〉杂志主编》一文中回应萨特：

您的文章……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均保持沉默或加以嘲讽。……我开始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有点厌倦，即我自己，以及那些在自己的时代从未拒绝过抗争的老兵们，不断地受到审查者们关于效用的教训，他们的椅子永远摆在朝向历史的方向，我也不再强调这种态度所隐含的某种客观上的沆瀣一气。<sup>①</sup>

萨特在同一期杂志上用更粗暴的口气加以反驳：

但是您告诉我，加缪，出于什么样神秘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类存在的理由就无法讨论您的作品？……是因为您的著作仅仅证明了您在哲学上的无能吗？是因为它是用第二手资料匆忙堆砌而成的？……难道您如此害怕争议吗？……我们的友谊曾很艰难，但我会怀念它的。如果您在今天中断这友谊，那大概是它该中断了。许多东西曾让我们靠近，使我们分开的极少。但这极少仍然是太多了。友谊亦然，它会趋向专制。<sup>②</sup>

84 萨特以《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标志着他同苏联结盟，并且以法国共产党同路人的姿态出现，这导致几个月后他与莫里斯·梅洛-庞蒂更为痛苦的分手。他们两人1927年在于姆街相识，曾并肩战斗，并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在政治上，梅洛-庞蒂常常领先于萨特，甚至起过“领路人”的作用，但后来《肮脏的手》的作者指责梅洛-庞蒂为一种与世界脱节的哲学而抛下当时的政治挑战。萨特尤其不能原谅他在冷战最盛的时候批评苏联。在萨特看来，在“党”之外没有救赎的可能。“反共产党者是狗，我不会离开，我永远不会离开。”几年之后他仍然这么写。

① *Les Temps modernes* n° 82, août 1952.

② *Ibid.*

这两次冲突撕裂了当时的知识界，对德里达影响尤深，因为他每一次都觉得“可能像萨特本人一样……同时处在矛盾的两边”<sup>①</sup>。

在于姆街，共产党的问题无论如何无法避免：从全法解放以来党就控制着学校。许多事情近乎传说。早饭一结束，学校“支部”成员就集合在大厅阅读《人道报》（*L'Humanité*），并将最好的版面张贴起来。同时几个更靠近意大利共产党的反对者不加掩饰地沉浸于《团结报》（*L'Unit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那天，许多眼泪未干的共产党员强制学校实行一分钟默哀，同时试图将一份吊唁电报发往苏联。但这些战斗者们——当时最积极的是埃玛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皮埃尔·于甘（Pierre Juquin）、保罗·维纳（Paul Veyne）和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施加的压力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反复到宿舍召集会议，没完没了地兜售《人道报》，不断展示请愿书要求大家签名。

与友人毕仰高和皮埃尔·布尔迪厄一样，德里达试图站在一个艰难的立场，拒绝正面反对共产党，但更不愿被其吸纳。活动分子们很快将他归于不可能指望入党的一类，尽管他们是左派，还能在一些斗争中发挥作用。好的时候他们被视为“左右逢源的家伙”，远远不如“同路人”；坏的时候被看成“社会叛徒”。德里达后来在一篇向伟大的汉学家毕仰高致敬的文章中回忆当年：

85

在我们周围，在于姆街的日子里，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里，最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即将迎来末日。但它似乎前途远大。我们两人那时属于非共产党的左派或极左派团体，以一种多少算是意料之中的和常规的方式进行斗争。我们参加在互助会和其他地方举行的所有会议，为我已不记得是什么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糊信封（反对殖民压迫、酷刑、法国在突尼斯或马达加斯加的行动，等等）。<sup>②</sup>

令共产党员们大为光火的是，这个小群体不久创办了“维护自由知识分子行动委员会”的一个支部，集合了非共产党的左派和极左派，成功地汇聚了众多学生。他们阅读《世界报》、《观察家》或《快报》，然后连续几个小时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

① Jacques Derrida, “‘Il courait mort’, salut, salut”, in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200.

② Jacques Derrida, “L’ami d’un ami de la Chine”, in *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n hommage à Lucien Bianco*, L’Harmattan, 2002, p. VIII-IX.

杰基甚至差点成为《快报》周刊的长期作者，有1953年5月15日第一期出版前夕让-雅克·塞尔万-施勒贝（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致德里达的一封信为证。两人在几周前见面，酝酿德里达为周刊投稿之事。塞尔万-施勒贝这时说仍然在摸索周刊的形式，还不清楚向年轻的哲学家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他承诺，一旦有机会就向德里达示意。这样的合作没有丝毫不光彩之处。不久后，就在《快报》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神话》，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新小说的宣言。



86 在高师，这一届30多名学生中只有四名转向哲学：两名来自路易大帝高中，为米歇尔·塞尔和德里达；两名来自亨利四世高中，为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和阿兰·蓬斯。但他们远不能组成一个团体：塞尔和阿斯奈都不住在于姆街，也很少出现在那里。德里达于是常常同阿兰·蓬斯一起去索邦大学，无甚规律地听亨利·古耶、莫里斯·德·冈迪拉克（Maurice de Gandillac）、费尔迪南·阿勒吉耶（Ferdinand Alquié）和弗拉迪米尔·扬科勒维奇的课。但德里达同两名高师教授的相遇后来证明是决定性的。

从第一天起他就得到路易·阿尔都塞的接待，他负责哲学方向的学生。德里达认识他时他34岁，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完全不为人所知。大约十几年后他将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同德里达一样，阿尔都塞出生在阿尔及尔附近。他成长于天主教环境，1939年通过考试被高师录取。随后立刻被征兵，很快成为战俘，在一个德国俘虏营里度过了5年，到战争末期才回到高师。他直到1948年30岁时才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很快成为指导学生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导师，并做了30多年。1950年起，他成为文学院秘书长，这是个定义模糊的职位，似乎专为他而设。被许多人称为“勒杜斯”的他在一层的“水族馆”右边有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实际上，只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时阿尔都塞才过问学生。在高师的第一年，杰基只是偶尔才见到他。<sup>①</sup>

87 不过，在开学几周后，德里达开始听当时同样名不见经传的米歇尔·福柯从上一秋天开始讲授的实验心理学。这门课每周一晚在卡瓦耶斯小讲堂进行，德里达像其他听众一样为这位仅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教师的风采所震撼：“他雄辩滔滔，富于

---

<sup>①</sup> 这些信息中的一些来自 Yann Moulier-Boutang, *Louis Althusser, une biographie*, Grasset, 1992。可惜只出版了第一卷。

威信，出类拔萃，令人印象深刻。”福柯有时带几个学生去圣安娜医院，他的一位精神分析师朋友在那里从医。德里达永远难忘这直面疯癫的经历：“人们叫来一个病人，他被一名年轻的医师询问和检查。我们看着这一切，深感震惊。”<sup>①</sup> 医师随后离开，撰写完观察报告后回到诊疗室主任乔治·都莫宗（Georges Daumezon）面前进行陈述。福柯和德里达的关系很快向友谊发展；福柯虽被任命为里尔的助教，但他当时一直在高师居住，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

1953年2月的另一次相遇更加具有决定性。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父亲为祝贺他考试成功将自己的小汽车送给他，他于是带着三名同学——米歇尔·塞尔、埃里·卡里夫和杰基去上萨瓦的卡洛兹-达拉什度假地过了一周。这次出行值得一提的原因不是年轻人的滑雪，而是杰基同米歇尔的姐姐玛格丽特初次相识，他们后来在电影《德里达》中隐晦地谈到此事。这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只有20岁，和许多同代的大学生一样患有肺结核。她在达希高地的疗养院已经住院数月，病情不稳定，结果时好时坏。从第一次见面起，杰基就对玛格丽特感兴趣，但他没有机会单独见她。而在少女的眼里，他不过是那群男孩子中的一个。直到一年半后玛格丽特重新回到巴黎，他们的关系才变得更为私密。

※ ※ ※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德里达任由自己卷入一种惬意的旋涡。正如他给表妹米什琳所写：“这里的生活呼唤着安静、沉默、独处的漫长假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动荡、不安、散漫。每天晚上想起这一天如何度过时都不由得惶恐。”<sup>②</sup> 好像为了有所弥补，杰基1953年夏天在埃尔-比亚用了很多时间阅读一本将对 88 他至关重要的书，即埃德蒙·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此书以《观念 I》的题目更为人所知。该著作由保罗·利科翻译并评介。“正是这位胡塞尔的伟大读者，用比特甚至比梅洛-庞蒂还要严谨的方式，最先教会我阅读‘现象学’，并在某种意义上从这时起成为我的导师”<sup>③</sup>，德里达后来对利科致意时这样承认。

余下的时间，八九月份再次在慵懒和忧郁中度过。他给米歇尔·塞尔写道：“我欢迎这假期的末尾。我最终让步于彻底逃离家庭的懦弱的欲望。当一个人太爱他的

① 引自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Champs-Flammarion, 1991, p. 71. 德里达在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I* 中的倒数第二篇讲演中也提到此回忆 (Galilée, 2008, p. 415)。

② 德里达致米什琳·莱维的信，无日期（1953年春）。

③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Donner, nommer, appeler”, in *Paul Ricoeur, Cahier de L’Herne*, 2005, p. 19–25.

家庭时便会如此。”<sup>①</sup>除了阅读胡塞尔，他很少学习，几乎不曾准备他应该在索邦大学通过的民族学考试，他选了这门课作为学士学位的科学学科。

有一件事令杰基苦恼：从他进入高师后，他和米歇尔·莫诺里之间的距离有些疏远了。他同高师的任何学生都不曾有过同样密切的关系。他以怀念的心情给朋友写信：

为什么我们连给对方写信的力气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不曾忘记。并非我的友谊已逝或已失掉热情，而是因为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我需要告诉你——也告诉我自己——这两三年来直到最近发生的事，我一直在自我“陈述”，好理清头绪。

而且，我不想再写信，我不再会写信。这尤其令人苦恼，因为我确定——当然是在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哪怕仅仅是给自己写作，才能拯救自己。<sup>②</sup>

89 1953年开学时，在索邦大学的学士学位考试让他情绪恶劣。正如后来他在一间曾深感痛苦的讲堂里接受荣誉勋章时所说：“预科班和高师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有种高高在上和出类拔萃的天真情绪，这种情绪并不能让这些优越的人免于屈尊来到这里，在索邦大学注册参加各种考试，也不能让他们中间的我免于种种磨难和失败。”<sup>③</sup>10月底，因为没有“绘制和测量骨骼的时间”，他在民族学的实践考核中失败。这一年开始时他本想全心投入高师的学业，但现在又一次背负着他称为“可笑的包袱”<sup>④</sup>，幸好他的心理学通过了。

一个好消息是，他在学校的新楼里同朋友毕仰高合住一间舒服的房间。“这里有理想的学习条件，我想从来没有更好过。我们摆脱了所有物质困扰。如果只顾自己无忧无虑的话，我们可以很快在高师这人间天堂睡大觉。”<sup>⑤</sup>他给表妹写道。杰基和吕西安一起买了一辆老车——1930年的雪铁龙C4，他们昵称为“车车”。不错，这车几乎跑不了路，而且常常得把它从街的这边移到那边以防被连续罚单，但它仍然让他们有过几次愉快的出行。尤其这是高师学生拥有的第一辆车，足令同学们钦羨。德里达就胆大包天地开着这辆“车车”同阿兰·蓬斯每周

---

① 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塞尔的信，1953年9月11日。

② 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3年9月13日。

③ Jacques Derrida, *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 1992, texte inédit conservé dans les archives de l'IMEC.

④ 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3年11月13日。

⑤ 雅克·德里达致米什琳·莱维的信，1954年1月8日。



一次去人类博物馆上他尚未摆脱的民族学课。<sup>①</sup>在那里他主要学会了区分人类与类人猿的头骨和骨骼。

“认真勤奋”的伙伴毕仰高决定专攻现代中国史，并开始学习中文（“车车”这异想天开的写法在中文里便意为“汽车”）。就在邻桌学习的杰基怀着崇拜的心情追随着他的进步，日后在里昂车站附近一家中餐馆听到朋友流利的中文时也激动不已。德里达后来在《论文字学》中提到作为表意文字典范的汉字时还记得当时同毕仰高的讨论。

此刻，杰基主要考虑的是高等教育文凭的论文主题，这相当于今天的硕士论文。11月底，他确定论文题目为《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其导师为莫里斯·德·冈迪拉克，是萨特在高师的老同学，1946年起任索邦大学哲学教授。德里达后来常常这样解释：即使胡塞尔不是他在哲学上的初恋，但其哲学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严谨学科”也为他的研究工作留下了重要印记。在1950年代初期，这也并非孤立的兴趣：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大学里不大被接受，但对许多年轻的哲学家来说似乎是无法绕过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转向社会学之前也考虑过撰写关于胡塞尔的论文。

德里达想要用“一种更倾向科学的现象学”取代萨特和梅洛-庞蒂阐发的“法国式”现象学。在他看来，这几乎既是政治题目又具有哲学必要性。受到马克思主义者陈德滔（Tran-Duc-Thao）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影响，他也想将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方面相结合。辩证一词在他的论文中反复出现，但他会很快将之抛弃。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德里达深深为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所吸引，特别是关于时间、“否定的起源”或“他我”的部分。但这些手稿只能从保存在鲁汶的胡塞尔资料中查询。1954年1月，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写了一封推荐信，获知赫尔曼·冯·布莱达（Herman Van Breda）神父将提供帮助，使他们得以参阅这些珍贵文件。

德里达3月份赴鲁汶，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这是他第一次出境。胡塞尔留下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共4万多页，从1939年起就保存于哲学院顶楼，德里达在那里勤勉地工作。尽管对德语的了解有限，他仍然用心解读并抄写了许多段落，尽管他最后在论文中只用到很少的一部分。他遇到的比利时人似乎令他不快。幸好他同参与出版胡塞尔未发表作品的年轻德国哲学家鲁道夫·伯赫姆（Rudolf Boehm）惺惺相惜。他们每天在街道和公园散步，长时间地讨论哲学，当然是关于胡塞尔的，但也有关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只要有可能，杰基就将谈话引向自己越来越重视的海德格尔，而伯赫姆曾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的学生，

<sup>①</sup> 同毕仰高和阿尔·蓬斯的访谈。

也很了解海德格尔。<sup>①</sup>

就在这次逗留鲁汶期间，德里达发现了《几何学的起源》，这是胡塞尔晚期的一部著作，刚刚在德国出版，它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德里达将十分重要。<sup>②</sup> 不过，德里达还是很高兴回到巴黎的宿舍同朋友们相聚。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以相当紧凑的节奏写了将近 300 页的文章，就写在旧的行政用纸和应该是从父亲那里成堆拿来的抬头为默希尔和玛姆香槟的纸上。毕仰高还记得德里达有时给他念刚写下的段落，但他从未听说过胡塞尔，理解不了多少。

92 此处不适合介绍《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这部专业著作。但在这部仅仅是论文的作品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德里达表现出的坚定。他在穿越胡塞尔作品的过程中不惮对其提出质疑。如果不在乎年代顺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已开始对其进行“解构”了。他在“序言”末尾毫不犹豫地写道：

尽管胡塞尔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哲学革命，他却仍然禁锢于那宏大的古典传统：这一传统将人的有限性还原为一场历史事件，一种“人的本质”，将对时间性的理解建立在一种可能的或现实的永恒之上，而人曾经能够或可能参与这永恒。胡塞尔将存在与时间的先验的综合作为一切实起源与意义的基础，他为了挽救“现象学观念论”的严谨与纯洁，并未打开超验的还原，也未调整他的方法。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呼唤着超越，这种超越将仅仅是一种延伸，或者反过来，是一种激进的解释，亦即一种彻底的转化。<sup>③</sup>

尽管对论文的指导被称为是“关切和认真”的，但其唯一的正式读者莫里斯·帕托尼埃·德·冈迪拉克却仅满足于读过一遍。他后来说，这是因为他立刻意识到论文的质量；还特别因为他绝非胡塞尔专家。无论如何，德里达非常失望地看到自己的第一部长篇论文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他期待一种真正的哲学对话，就像他同鲁道夫·伯赫姆开始，但没能同任何友人继续下去的对话。“我的论文在其他情况下将会吸引别的读者”，杰基对米歇尔·莫诺里倾吐。阿尔都塞和福柯似乎都没有提出要阅读这篇论文。只有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在一年之后读了此文，并鼓励德里达着手将之发表。但杰基当时正全力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没有后话。

---

① 同鲁道夫·伯赫姆的访谈。

② 德里达将翻译的这部著作由 Walter Biemel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Husserliana* 第六卷（M. Nijhoff, La Haye, 1954）。

③ Jacques Derrida,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PUF, 1990, p. 41.

《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并非一篇简单的文凭论文。他作品中的许多重要因素已然存在，并且当此文于37年后最终编辑发表时，德里达不安地在其中“既辨认出又没有辨认出……一种讲话的方式，也许几乎没有改变，一种声音，或曰一种语调的古老而几乎是注定的立场”。令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法则，其稳定性让他“尤其感到吃惊，因为直到字面的措辞，这一法则从那时起就不间断地指导着”他所有的写作。从这时起，他关注的就是“起源的原初复杂性，简单的初始混杂性”<sup>①</sup>。让-吕克·南希读到此文后给德里达写道：“这本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里面找不到人们想要抓获现行的青年德里达。德里达的源头，不错，但不是年轻的德里达。他的全部已经在此，如同身披铠甲的雅典娜。但他所缺少的也显而易见，那恰恰是某种青春，游戏的青春。”<sup>②</sup>

※ ※ ※

尽管同毕仰高友情深厚，德里达仍然怀念与米歇尔·莫诺里的友谊。高师“冷漠的躁动”让他疲惫，他也厌倦“拉格朗日街漫长沉默的孤独，在那孤独中和走出那孤独时，人就是真正的自己”<sup>③</sup>。米歇尔在前一年夏天成功通过了中学教师资格证书(CAPES)的笔试，正在南锡的两所中学实习。这使他们不容易见面，在一起的时间又过于短促，无法不令人失望。杰基觉得自己变得闭塞、冷酷和自私。1954年4月，他又一次陷入忧郁，请求朋友在巴黎至少待一个完整的周末。

尽量在放假前来看我，那时我除了你没有朋友，没有人，什么也没有。这里的人面对的是个幽灵，就算在对我表示友情的时候。这样一个人很快也变成了自己的影子。……我等你，一直如此。

我的生活忧伤、压抑、焦虑。……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的忧伤在变化：它变得持续不断、干枯或尖酸。我想从前它会成长为另外一种欢乐或希望，比它自身更为真实。<sup>④</sup>

米歇尔也伤感地怀念起他们在巴黎共同生活的“那些丰富的时光”：在盖-吕萨 94

① “Avertissement” in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PUF, 1990, p. V-VII.

② 让-吕克·南希致德里达的信，1990年10月10日。

③ 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4年）。

④ 雅克·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4年4月）。

克街拐角处的简单午餐，“在索邦时夜晚在岸边漫步，在奥利开着老破车兜风，你在高师宿舍给我朗读《堂吉珂德》，笑得像个孩子”。米歇尔在信中反复向他亲爱的杰基表达“温柔的友情”，但他常常害怕看他远去：“对你来说，难道我不是完全失落在迷雾中，如失宠的友人，苍白的幽灵？……我不知道是否配得上你的友谊，也不知道我对你怀有的友情是否足够美好。”<sup>①</sup>

杰基这时同女子的关系仍然相当神秘。他在索邦大学遇到了热娜维耶尔·波莱姆 (Geneviève Bollème)，她就读文学专业，热爱福楼拜，已进入文学圈子。显然这名年轻女子令他动心，但她似乎为他们的暧昧关系感到不安。她有一次给他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谈谈我们相互的情形。我不大确定，但始终感觉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sup>②</sup>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友谊。



1954年10月起，准备教师资格考试让德里达和毕仰高有权拥有独立的宿舍。他们的房间相邻，他们继续共用一辆汽车，共同订阅《世界报》，特别是继续讨论政治。夏天的时候，毕仰高有幸随一个法中友谊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其中也有菲利科斯·加塔里 (Félix Guattari)]。回来之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的未来作者就这个主题滔滔不绝。德里达后来承认，他完全是从毕仰高那里学到了“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sup>③</sup>。

总的来说，毕仰高当时要比杰基更加积极地投身政治，更加激进。杰基有一天  
95 对他说：“如果命运给予我扮演列宁的可能性，我很可能不会去做。”<sup>④</sup> 这一年，时事的影响触手可及。1954年5月7日，随着莫边府战役的溃败，法国殖民帝国开始土崩瓦解。几周之后，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 France) 上台带来相当大的希望。但在1954年11月1日夜里，一系列刺杀震动了阿尔及利亚：直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组织民族解放阵线 (FLN) 呼吁“重新争取自由”。1954年11月5日，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的内政部长在国民公会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的反叛只有一种终结的形式——战争”。冲突持续8年，伤害了整整一代人，极其强烈地影响了德里达。

返校时在小范围内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让·伊波利特执掌高师。作为当时

---

① 米歇尔·莫诺里致雅克·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4年）。

② 热娜维耶尔·波莱姆致德里达的信，1955年10月4日。

③ Jacques Derrida, “L’ami d’un ami de la Chine”, in *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n hommage à Lucien Bianco, op. cit.*, p. II.

④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7年10月1日。

法国哲学的重要人物，他是后来对德里达真正意义重大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看出德里达的哲学禀赋的人之一。他和让-保罗·萨特及雷蒙·阿隆同年进入高师，是将黑格尔引入法国的人之一。他在1930年代听过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著名的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课，后来翻译并详细评论了这部重要著作。伊波利特在亨利四世高中长期担任过预科班教师，学生中有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米歇尔·福柯。他领导高师的雄心是在文学领域还哲学以光荣地位，但他的脾气使得他难以像他希望的那样令人接受。

1954—1955年间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无疑是阿尔都塞。杰基像担心高师入学考试那样担心教师资格考试，他只求努力学习，听从他人的建议。针对指导教师布置的第一篇论文，他系统地做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笔记。随后，在一篇笔调十分个人化的长文中，他第一次试图将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相结合。 96

当无意识不再是对哲学的检讨时，它不过是哲学的反省。而哲学，作为哲学且在其自有的时刻，游弋在一些透明体之间：智性的思想，“先验”的概念，意识的直接前提条件，纯粹的意义。然而，无意识不只是含混的和模糊的。它主要是一个混合体。<sup>①</sup>

阿尔都塞在论文第一页给出的分数毫无希望：给了他7分，而满分为20分。不错，这分数纯粹是指示性的。重要的是以一封四页长信的形式写下的评语，语气十分热情。

德里达，我们要一起看看这篇作业的细节。它毫无“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希望。我不怀疑你的知识水平，也不怀疑你进行概念思考的能力以及你思想的哲学价值。但要想在“考试”中得到认可，你必须在陈述与表达上进行彻底的“改变”。你目前的问题源于你将一年的时间花在了对胡塞尔的阅读与思索上，而我要重申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评委们“熟知的思想家”。

更根本的是，阿尔都塞认为德里达必须接受“所有论文写作的策略”：“在你的作业里，很清楚地看到你的讨论对象早已提前接受审判，这太明显了，文章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需要赋予这审判一种理想的司法形式：哲学修辞。”阿尔都塞还是以鼓励的口气作结：“这就是我的批评。我必须批评你。我还要说，我相信你今天能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的论文，1954年11月，由路易·阿尔都塞批改，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够听得进去，以便……明天不必再听。”

对于德里达的下一篇论文《用简单进行阐述》，其评语明显更为肯定。阿尔都塞对序言提出了批评，但认为“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的一路阐发非常出色。（而且随着文章展开，分析也越发从容与坚定）”。但他仍然建议避免使用长句：“就古典哲学写作时，不要在作业中夸大其辞。”

这时，德里达正挣扎于准备考试和对海德格尔日益增加的兴趣之间，这兴趣在他写作关于胡塞尔的论文时就很明显。让·波弗莱有时来高师讲课，但他从不提及海德格尔，尽管他是海氏在法国主要的对话者。因而德里达更多的是同热拉尔·格拉奈尔一起——他已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但定期回于姆街——钻研德文原文。格拉奈尔那时表现得对他颇有“保护性”，属于一小群“深奥做作的海德格尔派贵族”，这让德里达既着迷又恼火。格拉奈尔去世时，德里达回忆道：“几乎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让我感到窘迫，他尤其如此，常常令我胆怯到无法动弹。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sub>97</sub>在法国文化和普通哲学方面是个赤贫者。”

1955年春，临近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杰基承受着与考高师时同样的焦虑。考试对他而言仍然是今后不会再有的“令人恐惧的考验，是焦虑和疲惫的时刻”。“无论怎样，我们那时感到的就是断头台的威胁，这使得这些年对我如同地狱一般。这样的过去曾十分痛苦，我从没喜欢过高师。简单地说，我在那里始终很不舒服。”<sup>①</sup>

5月初，德里达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极糟，以至他在居雅街约见了一名他并不认识的医生，后者给他开了苯丙胺和催眠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杰基控制不住颤抖，在第三次笔试时交上去一份只开了个头的卷子，写了个潦草的提纲。他还是通过了<sub>98</sub> 笔试——但口试时第一个就落榜了。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在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写给德里达的信中表示，他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遗憾，特别是因为他的同事亨利·毕罗（Henri Birault）和他本人为德里达开了个真正的“信任账户”，给德里达第三次笔试交上去的“说实话很不像样”的草稿打了相当高的分数，好让他能参加口试。不幸的是，他的口试并不比笔试好。

我的同事们应该对您讲了他们对您如此严格的原因，您就笛卡尔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诠释，您的讲解很奇怪地集中于一名恰恰极少谈论死亡的哲学家上。您的才华毫无疑问，但同每年一样——这是教师资格考试的规则——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样的考生：其智力“水准”大大低于笔试或口试失败者，但很好地

①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30.

掌握了游戏规则，有意识、有耐心地获得了成功。请别忘记教师资格考试中的“讲课”并不是纯粹的技巧练习，而首先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学院式的训练，而这并不妨碍您在扼要说明您会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之后说点评委们想听的话。<sup>①</sup>

冈迪拉克在信中尽可能以鼓励的口吻作结，提醒他萨特也曾在第一次考试中失败。另一位评审团成员费尔迪南·阿勒吉耶则表现得更加生硬，他建议德里达“学院化一些”，更经常去索邦大学听课，并在哲学上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您的三篇论文不过是一篇，您患有‘单一意念偏差’”<sup>②</sup>，他可能这样对德里达说过。

※ ※ ※

在埃尔-比亚度过的暑假因这次失败而蒙上了阴影，但更因为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恶化。1955年1月，就在其政府倒台之前，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任命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后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被认为持 99  
开放和自由的观点。上任不久，他就承诺团结穆斯林并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但无疑已太晚。1955年8月20日，民族解放阵线在康斯坦丁地区组织了暴力游行。反叛者们挥舞着斧头和木棒，造成132人死亡，其中有欧洲人和温和的阿尔及利亚人。严酷的镇压造成1.2万人死亡。此后阿尔及利亚冲突扩大到真正的战争规模：许多此前反对独立的穆斯林转而支持独立，而雅克·苏斯戴尔加入了“极端派”阵营。

1955年10月，阿尔贝·加缪开始在《快报》发表一系列关于“被撕裂的阿尔及利亚”的文章，试图定义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立场”。加缪认为两个壕沟正在加深：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将欧洲人和穆斯林分裂的壕沟，将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相对立的壕沟。“就好像法国对殖民政策的公正讨伐扩大到了所有居住在那里的法国人身上。按照某些报刊的说法，真好像在阿尔及利亚拥挤着100万挥着马鞭吸着雪茄开着凯迪拉克的殖民者。”关于犹太人，加缪指出这一族群是怎样多年来被困于“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和阿拉伯人的不信任之间”<sup>③</sup>。1956年1月22日，加缪在阿尔及尔发出“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平民停火的呼吁”，同时他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他的态度并不被人理解：“从个人的角度，我只对此时此地能够避免无辜流血的行动感兴趣。……这一立场在今天不会让任何人满意，我事先就已知道两方对此会采取什

①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致雅克·德里达的信，1955年8月9日。

② 转引自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③ Albert Camus, *Chroniques algériennes, 1939—1958*, Gallimard, coll. “Folio-essais”, p. 139-142.

么态度。”<sup>①</sup>

那时的德里达同加缪的立场相当接近。但在阿尔及尔，一切与此有关的讨论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他的家庭中。而在巴黎，他几乎只能同毕仰高谈论此事，后者认同他反殖民主义的信仰，也同他一样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行动所震惊。<sup>②</sup>

100 1955—1956年是德里达应该在高师度过的最后一年，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好几次邀请他参加和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在这个沙龙里，德里达结识了让·华尔和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这样的知识界与哲学界名流，还有一些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如克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吉尔·德勒兹或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在此之前似乎难以企及的巴黎圈子。前一个夏天，在瑟里斯-拉萨勒（Cerisy-la-Salle）举行了为期十天的有海德格尔亲自出席的海德格尔研讨会，这次重要的聚会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在一次由瑟里斯的主人埃尔贡夫人举办的招待会上，有人发放了记录着研讨会重要时刻的录音。德里达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刻。

我那时是高师的学生，在16区的一个沙龙里第一次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声音。我尤其记得这样一段：我们都在沙龙里，都在聆听这声音。……我特别记得海德格尔讲演之后的时刻：[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和[吕西安·]戈尔德曼的提问。其中一位大概向海德格尔提出这样的反驳：“但是，您难道不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或者这种阅读或提问的方法是危险的吗？”这是方法论或认识论的问题。我耳中还能听到——片刻沉默之后——海德格尔的回答：“Ja！是很危险。”<sup>③</sup>

不过，对杰基来说，这一年的一件大事是与同学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姐姐玛格丽特多少有些动摇的关系。经过在疗养院度过的漫长时光，玛格丽特终于在1954年回到巴黎：她的病情报告仍然相当糟糕，医生考虑施行大手术，但她拒绝了。“从我感到自己确实面临危险的时候起，我决定把病治好。”她回忆道。回到巴黎之后，玛格丽特接受了多少算是顺势疗法的治疗，饮食中蛋白质非常丰富：她每天要吃下  
101 一整块卡芒贝干酪，200克肉，四个鸡蛋，还要喝大量红酒。这种独特的疗法使她的

<sup>①</sup> Albert Camus, *Chroniques algériennes, 1939—1958*, Gallimard, coll. “Folio-essais”, p. 12 - 13.

<sup>②</sup> 同毕仰高的访谈。

<sup>③</sup>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in 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op. cit.*, p. 94 - 95.



状况显著改善，让她可以重新进行俄语的学习。杰基好几次被欧库图里耶一家请去共进午餐或打桥牌，可以越来越接近玛格丽特。在他们最早的一次会面时，德里达送给她一本加缪的《婚礼》：他带着一种预感景仰这部作家青年时代的作品。但这本书尤其让玛格丽特得以窥见他成长于其中的阿尔及利亚。

玛格丽特 1932 年出生在一个十分不同的环境中，童年生活颇为动荡。她的父亲居斯塔夫·欧库图里耶曾是高师学生：他在通过历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学习过俄语。他在布拉格服务于哈瓦斯事务所，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妻子并有了玛格丽特和她的两名兄弟。欧库图里耶一家随后在贝尔格莱德生活，直到 1941 年德国入侵。失去了父亲的消息，母亲和三个孩子逃难到开罗，艰难度日，直到战争结束。一家人随后搬到莫斯科，居斯塔夫·欧库图里耶在那里成为法新社通讯员。玛格丽特和米歇尔就在那里开始学习俄语。到 1948 年，欧库图里耶一家终于回到巴黎，让孩子们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并接受高等教育。看得出来，玛格丽特接受的教育并不比杰基更可算得上是法国传统教育。虽然成长在天主教家庭，但后来玛格丽特说，经历过这样流离的童年，还有个捷克母亲，她有时觉得比德里达更像犹太人。

在 1956 年夏天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一封信中，杰基要求朋友保密，并隐晦地谈到他经历的“糟糕的日子”。玛格丽特已同另一名高师学生洛朗·维斯尼（Laurent Versini）订婚，她的父母喜欢这个稳重的男生，已请他来过他们在夏朗特的住宅。这暧昧的局面一开始并不令杰基烦恼——像他那一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自认反感婚姻与忠实——直到他因妒忌而要求玛格丽特在他和维斯尼之间做出选择。玛格丽特很可能就在等待这个时刻好做出决定。她于是去找了未婚夫的母亲。当她对维斯尼夫人做出解释时，后者请她尤其别在教师资格考试结束之前向儿子宣布此事，以免干扰他。<sup>①</sup>

102

※ ※ ※

对杰基也是一样，现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考试，如果他想最终得到解脱的话。在笔试前的几星期，哲学教师资格考生的传统是去寻求导师阿尔都塞的鼓励。不幸的是，阿尔都塞常犯的忧郁症发作，离开了高师。于是轮到杰基尽力安慰他，同时不愿“惊动他的休息”。

我确信这几周的隐居对你会有好处。看到你很疲劳，为教师资格考试及行

<sup>①</sup>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和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访谈。

政事务缠身，我很难过。再过几周，不是吗，你就会重振精神，回来用你的建议和你的在场支撑我们度过口试之前和之后的艰难时刻。

谈到自己的情况，德里达先是装作超然：

每年的资格考试前夕都是相似的。我的情况相当好。做了几个兆头不错的练习。关于笛卡尔的论文得到德·冈迪拉克很好的评语（14.5分，“今天并不宽宏大量”——原文如此）。在伊波利特那里就康德进行了陈述（“十分出色”，“至少能打17分”——原文如此）。我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表现得像个为好分数骄傲的小学生，而是因为这让我安心——尽管也许我是错的，也为了让我在考试之前获得更多的心理力量。

但他无法长久地隐瞒这一切已让他无法忍受：

103

唉，德·冈迪拉克或伊波利特的称赞已无法再令我骄傲，但我像饮用药液一般接受这些夸奖，我已成为资格考试的病人。上帝，这集中营般的混账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哲学——还有其他，因为还有其他越来越重要的东西——在忍受着这考试的禁锢，以至于我可能已经患上了你那种慢性疾病。你相信有一天我们能痊愈吗？<sup>①</sup>

对米歇尔·莫诺里，德里达则像往常一样更加直截了当，不隐瞒自己的不安。他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忍受着严重的咽峡炎，但主要还是为焦虑所侵蚀。他在诊疗室的病床上给朋友写下的话看起来带有预言的味道：“我一无所长，除了拆除并重造（在这方面我成功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这个世界。”就在笔试之前，杰基同罗贝尔·阿比拉舍德一起去“老压榨场”汲取力量，那是“翁弗勒附近的一座小城堡，一些不事声张的慈善家们将之供‘疲惫的知识分子’使用”。他本希望去探望刚刚开始在南痛苦不堪服役的米歇尔，但意识到这样做并不理智。“如果你看到我的状态，我肯定你不会生我的气。这次在诺曼底的逗留让我感觉好些了，但我筋疲力尽，觉得自己很难熬过考试。”<sup>②</sup>

考试的压力肯定让他难以忍受。他再次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这一次教师资格

<sup>①</sup>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6年4月25日。

<sup>②</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6年5月）。

笔试和口试没出大错，但他得到的分数只是差强人意，远远低于备考练习让他所希望的。毕仰高祝贺杰基考试成功，并劝他别在意“可笑的名次”。他知道朋友这两年付出的努力，说很高兴看到他“终于有了试着生活的权利”<sup>①</sup>。

德里达等到8月30日才给阿尔都塞写信。后者一直病着，只能远远地跟踪考试的情况，连自己爱徒的资格考试讲课都没能参加。<sup>②</sup>这并非有意的缺席并不妨碍德里达充满感情地给自己旧日的导师写信。

104

我悲哀地看着这一年的结束……因为我将与我最好的朋友们分离，他们的存在对我是如此重要，其中便有你，你知道。……我不愿感谢你——尽管我本该如此——为你的建议和指导给我带来的一切。我非常清楚我该为此感谢你，但人们用以感谢老师的一切尊敬而有距离感的言辞也许只会损害你一直以来对我表达的深情厚谊。我请求你为我保留这份情谊，为此我衷心感激。<sup>③</sup>

阿尔都塞的答复同样极尽友好。

你不知道十多天前我听到你成功的消息时是多么如释重负。无论如何，尽管我离开前获知许多有利的迹象，但我仍然禁不住暗地里为你担心，担心这荒唐考试中的陷阱与意外，担心评委的苛刻。我知道轮到你的时候这一切你都不能逃脱。赶快从你的生活和记忆中赶走这糟糕的回忆以及评委们的面孔吧！

允许我只简单地对你说，你的友情是我最近两年在高师最珍贵的财富之一。<sup>④</sup>

尽管有这些不只是空话的鼓励，德里达还是怀着多少有些苦涩的心情离开了高师。他第二次才通过资格考试，成绩毫不出色，这迫使他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文风，屈从于这门学科；它从未曾属于他，也永远不会适应他。正如他给米歇尔·莫诺里

①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8月11日。

② 不过，到达巴黎不久的埃莱娜·西克苏参加了这次“答辩”。“我偶然地，在1956年6月，悄悄进入了一个‘剧场’——索邦大学黎世留阶梯教室。我坐在门边易于逃离的一条旧木凳上。前面远远的，远远超前于我的，他的背影。他坐着，讲了很久。我不认识他。我看到他的后背。面对教师资格评委会，他要被审判。他讲的主题是‘关于死亡的思考’。最后，我出来了。这场景留了下来，包括最小的细节，永远留了下来。我没有看到他。”（“Le bouc lié”，in *Rue Descartes* n°48,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PUF, 2005, p. 17.）

③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6年8月30日。

④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9月4日。

105 所写，这成绩平平的成功“完全不像一种和解”，就好像他被接受是出于“些许无奈”<sup>①</sup>。他将保留着对法国大学体系真正痛苦和怨怼的回忆，在此他将终生“失宠”。

取得教师资格让他收到许多祝贺，其中德里达应该十分看重表妹米什琳·莱维的来信。向她亲爱的杰基表示祝贺之后，她以一种奇异的混合了天真和直觉的口吻对他吐露：“比起教师，我更希望你是作家。……我该多么喜欢读你的书（自然是小说），并试着从字里行间诠释你。”<sup>②</sup> 德里达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她的心愿。

---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6年8月22日。

② 米什琳·莱维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6年8月）。

## 第5章 美国一年 (1956—1957)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间每年都有学生交换计划。高师副校长让·普里让 (Jean Prigent) 青睐杰基，特别是因为杰基用和毕仰高一起买的老式汽车教会了他开车。他促成德里达获得了哈佛的特别听课生奖学金，理由是去查询胡塞尔未出版作品的微缩胶卷，而实际上这些资料很晚之后才到达。 106

同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杰基一开始对这次美国之行并无兴奋之情：离开巴黎和朋友们令他惶恐不安。而另一方面，这是最好的办法，能够让他再延缓一年服兵役，还能避开同样让他恐惧的中学教师的职位。最让杰基担心的是玛格丽特的情况。她若想陪他到美国必须有工作签证。况且，无论如何，德里达将获得的一年 2 200 美元的“奥古斯图·克里夫·塔沃奖学金”远远不够两个人生活。

此刻，杰基很难过，因为他在短暂的假期中得与玛格丽特分开。他到 8 月中才回到埃尔-比亚。毕仰高疑惑朋友在阿尔及利亚能找到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还能继续“长时间无所事事，等到这荒谬的战争结束”<sup>①</sup>。总的来说，杰基在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政治局势，还因为他马上要去美国的事让父母担心。正如他给米歇尔·莫诺里所写： 107

我整天都在为旅行做准备，撰写程序要求的信件、填表，等等。而且我很焦虑，不知道玛格丽特……能否和我同时出发。自从我们……相结合，这是我生命中最新鲜的事，我感到被这世界裹挟着，我用尽全力，直到流血，同世界上所有被胁迫的东西作战，其模式便是“家庭”。但我说这些时总是怀着最强烈

---

<sup>①</sup>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8月11日。

的欢喜中的忧伤和战栗……

我猜你还在迪南。我希望你永远别来阿尔及尔。年轻士兵们在阿尔及尔制造的景象让我很难过。无论他们是无奈还是英勇，是在街上冲姑娘吹口哨还是粗暴地对待阿拉伯人，他们总是带着那副陌生荒唐的神情。我可怜的米歇尔，你能干什么呢？<sup>①</sup>

在另一封写给路易·阿尔都塞的信中，德里达十分精确地描绘了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我还要在这个可怕僵死的国家待十天。没有任何事发生，丝毫没有能让人联想到政治运动或形势变化的事。只有每日的刺杀事件，只有人们习以为常的死亡，说起来就好像一场倒霉的雨。但永远是同样的政治蒙昧，同样的盲目。这次在阿尔及尔的逗留没让我学到任何东西，除了呼吸我不太了解的空气。从前在印度支那的大城市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狂热，加倍的躁动，加速的贸易狂欢，骗不了任何人的对未来的投机，虚假的欢乐；海滩、咖啡馆、大街上挤满了人。在坦克、装甲车和机关枪中间，美国汽车越来越多。整座城市好像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宣告着最祥和、最繁荣的未来。<sup>②</sup>

108 一个月之后，1956年9月30日，两颗定时炸弹在阿尔及尔市中心伊斯里广场的牛奶吧和米什莱大街咖啡馆拥挤的露台上爆炸，造成大量伤亡。这次双重案件将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新转折。这是贾米拉·布赫德（Djamila Bouhired）事件的起源：雅克·维尔热斯（Jacques Vergès）为这个姑娘进行了激烈辩护，她将被判处死刑，后在撕裂了公众舆论的审判之后被赦免。<sup>③</sup>

※ ※ ※

8月底，哈佛的一位负责人通知德里达给他的未婚妻在剑桥城找到一份只提供膳食的职位。玛格丽特便可以获得工作签证，陪杰基同去。但为支付旅行费用，她得向一位女朋友借钱。在欧库图里耶和德里达家中，两人同时出国的消息引起不小的震动。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6年8月22日。

②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6年8月30日。

③ Jacques Vergès, *Pour Djamila Bouhired*, Éditions de Minuit, 1958.

玛格丽特的弟弟迈克尔刚刚在苏联度过一年回来：他这时才知情，无法掩饰不安的心情：“她和洛朗·维斯尼解除婚约让我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有些许责任。此外，杰基给我的父母写过一封长信，令他们相当不快。他没有按常理向玛格丽特求婚，而是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夫妻关系的非常自由的理念。我父亲虽然出身高师，但有相当传统的一面。他并不看好女儿与这个年轻人同行。”<sup>①</sup>

在埃尔-比亚德里达的家中，情形还要更加微妙。玛格丽特天天写来的信引起了杰基父母的注意。但杰基等到最后一刻才说明他们的关系是严肃的，而且玛格丽特要同他一起去美国。与他们的世界完全陌生的“异教”女子类似订婚的消息在随后几周里引发了强烈的震荡。所有的人都加入进来，包括其兄长勒内，他并不掩饰对这即将到来的婚姻的反感。

109

舅舅乔治·萨法尔寄给杰基一封信，让他极为恼火。舅舅向他保证，不会“赞成或反对”外甥所做的事，但希望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和他谈谈，让他了解“他的良心、感情和经验使他不得不说的话”<sup>②</sup>。毫无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问题：萨法尔家族同德里达家族一样，认为族内通婚天经地义，有甚于规矩。人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结婚，甚至常常就在同一个街区，就像勒内和雅尼娜。但杰基从少年时代就同犹太社区拉开了距离，难以忍受被关在这圈子里。几天之后，他给舅舅写了封信，可惜此信似乎丢失了，但我们猜得出他在信中逐点反驳舅舅，无一遗漏，正如他在后来的哲学论战中所采取的属于自己的方式。乔治·萨法尔惊呆了。

我给你的信里都是日常用语，而你给我回了封辛辣的长信，仔细剖析我的用词（大概是职业病），口气牵强，有时很无礼。……

我本想晚些时候对你说的话不过如此：你们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我知道你已经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想警告你什么，只想建议你慎重，因为……在我看来孩子的教育将给你们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们没有提前考虑过未来的话。

最后我要补充，我亲爱的杰基，我不希望你像回复我上封信那样解剖我用过的每个字眼，也不想收到你回信中那种精微的分析——即便不带傲慢无礼的口气。

不过舅舅猜想自己的信是“跟在其他许多信之后到来的”，因此外甥看来“处在四面遭袭的角斗士的位置，他由于总是四下舞剑抵挡攻击，以至仍然继续劈裂空

110

① 同迈克尔·欧库图里耶的访谈。

② 乔治·萨法尔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10月30日。

气……哪怕周围已没有敌人”<sup>①</sup>。

只有杰基的表姐妹们似乎很满意这门婚事。罗塞特劝他“不必犹豫，就算家里有些牵扯”。米什琳说她也很高兴知道“有这么一位未来的表亲，从巴黎来的漂亮的金发女郎玛格丽特”。她希望同勒内的争吵不会持续，但不管怎样杰基应该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sup>②</sup>

※ ※ ※

9月15日，杰基和玛格丽特在勒阿弗尔登上了著名的“自由号”轮船。经过穿越大西洋的美妙旅行后，是“面对纽约的陶醉的喜悦”。他们两人都被“这座没有秘密，没有历史，袒呈在外的城市的神秘”<sup>③</sup>深深吸引。可惜他们钱太少，不能去游览发现别的城市。他们立刻赶往波士顿郊区的剑桥市。

玛格丽特讲道：“我寄居人家做女佣。罗德温（Rodwin）先生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他的太太是法国人，希望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法语环境中成长。我在他们家有一个房间，在阿灵顿街，位于马萨诸塞大道附近。那个街区很怡人，离学校很近，工作也不辛苦。杰基住在校园里的研究生中心，这是一座现代建筑，但很贵，而且严格禁止女子进入。我们有时能逃过监控，但日子还是不好过。同前些年在高师相比，杰基的钱很少。他的奖学金不够，每周三早晨给几个教授的孩子上课。这一年我们几乎没有结识任何人，除了玛格丽特·迪纳（Margaret Dinner），人称玛格，她是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哈佛那时只有男生，拉德克里夫便相当于女子哈佛。”<sup>④</sup>

111 只要可能，玛格丽特和杰基就在哈佛校园宏伟的怀德纳图书馆见面。照德里达看，这是“世界上最宏伟的书的墓园”，要比国家图书馆“大十倍”。尤其可喜的是，他获得了查阅内部藏书的特权。<sup>⑤</sup>他继续研究胡塞尔，同时系统阅读乔伊斯（Joyce）的著作。他一生都认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是将“人类的潜在记忆”汇集于一部作品的最伟大尝试。<sup>⑥</sup>这时德里达英文的书写能力已十分出色，但口语仍不自如。玛格丽特比他表达要好，尤其是她更愿意表达：从童年起，她就习惯说不同的语言。

① 乔治·萨法尔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11月17日。

② 米什琳·莱维致德里达的信，1956年10月20日。

③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7年2月11日。

④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⑤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7年2月11日。

⑥ Jacques Derrida, “The Villanova Roundtable”, in John D. Caputo,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



杰基也利用在哈佛的时间学习使用打字机。他到达不久就买了一台奥利维蒂 32 型打字机。他后来承认：“我打字很快，但很糟，出了很多错。”他习惯了国际键盘，多年间继续在美国买打字机。

“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散步、读书和——很少的——学习上。”<sup>①</sup>他对毕仰高说。在给米歇尔·莫诺里的信里，他则同往常一样表现得更精确，也更忧伤。

这里的生活没有事件，没有日期，没有真正的社交，或几乎没有。我们独自生活。外面的节奏属于最外省式的大学城。我们每个月“进城”一两次，也就是去离这里十分钟地铁的波士顿。除此之外我们就学习，或者试着学习。玛格丽特在翻译一本糟糕的苏联小说，我在机器上打出来。我读书，试着学习，试着依附于什么。但我所做的恰恰相反，我怀疑怎么能有自由的学习。<sup>②</sup>

圣诞节时他们回到纽约。他们深为这座城市所吸引，不顾寒冷，整日行走。杰基已经开始喜爱这座城市：“它有着如此奇异美丽的‘灵魂’，一切裸呈于外，‘现代’得令人不适，人在此感到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孤独。”<sup>③</sup>在马提尼克旅

112

馆房间，德里达试图“为自己”写作，他已经多年没有这样做，可惜他的笔记本似乎在几年之后丢失了。

他们还同玛格丽特·迪纳和她的一位女朋友——一名德国大学生——一起去了当时很受保护的科德角。另一次，他们租车一直开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哈特拉斯角，这是一片原始地，其美景令人陶醉。就是在这次进入美国深处的旅行中，他们直面了种族隔离的残酷。时值 1950 年代末，“仅供白人使用”的牌子还到处可见。很久以后，德里达给朋友佩吉·卡穆夫（Peggy Kamuf）讲述了一场当时有可能下场不妙的历险。他们停车让一名黑人搭车者上来。那人被一对白人搭载，十分惊讶，明显表现得十分神经质，杰基和玛格丽特均不解何意。搭车者可能想到，一旦遇到警察检查，一定会有麻烦：这种不同种族间的接触那时是完全禁止的。幸好一路平安无事。<sup>④</sup>

① 德里达致毕仰高的信，1956 年 11 月 18 日。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7 年 2 月 27 日。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7 年 2 月 27 日。

④ Peggy Kamuf, “The affect of America”, in *Derrida's Legacies :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New Nork, Routledge, 2008, p. 144.



德里达到达美国的时候，1956年的总统竞选似乎已尘埃落定；它在11月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压倒民主党对手的绝对胜利告终。别的国际新闻则很少引起他的兴趣，他很快开始想念高师的政治辩论。毕仰高替他订了《世界报》的每周选刊，但总是很晚才能到他手中。他的前室友还在信里评论当时动荡的时局：布达佩斯特暴动，赫鲁晓夫报告及其后续，纳塞尔（Nasser）的上升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113 毕仰高和德里达更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形势的恶化。在居·摩勒政府统治下，兵役刚刚延长到24个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法军人数从5.4万人上升到35万人，而上万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加入了游击队。新任总督罗贝尔·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采取了比雅克·苏斯戴尔还要强硬的政策。1957年1月7日，他将阿尔及尔“和平化”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伞兵第十师的马絮（Massu）将军。尽管对包括伊斯兰区在内的城市进行了防卫性的分区控制，但刺杀事件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市体育场和埃尔-比亚体育场的看台上。

毕仰高带来了校友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消息：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尔服兵役，在拉科斯特的内阁。他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册子。“幸好其语调、形式甚至内容都同总督府的其他出版物大相径庭，我为此松了口气”，毕仰高讲道。对他们也一样，服兵役的日子越来越近。杰基建议他们尽量在一起，好让这两年好过些。但没什么能保证这个主意能够实现。同时，杰基向一些校友询问进入海军的可能性，好几个人向他担保说那是“美差”。他得通过一项考试，写一篇同海洋有关的论文，这些对高师学生来说易如反掌，但英文程度要求优秀，这就有些棘手了。



2月，德里达收到米歇尔·莫诺里一封长信，他很高兴在其中又找回了“全部的”他，尽管分离过于漫长。他也给朋友写了封长信，倾诉对当年亲密时光的想念之情。这种回转悠长的句法已经让人窥到多年之后他在《割礼忏悔录》或《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中独有的风格，例如：

114 我常常被击垮，像是发起某种无名可恶的烧来，当我手脚被缚投入“回忆”中时。这可怕的东西比我们要强有力得多，玩弄着我们此刻微小的生命。只有在回忆时我才感到自己存在，也只有回忆时才感到自己在死去。而你，我像爱同胞兄弟一样爱你，因为你为同样的回忆和同样的死亡所滋养。我们难道不是

将一起死于我们共同爱过的一切，或一起在此刻死于只不过是明天的一切吗？

我不愿开始讲述我所记得的东西，因为那就好像我忘记了其余，而我什么都没有遗忘。但还是有些影像跃上心头，好像一个叠句引出更多的叠句：在“利斯马克”（饭馆）吃完饭的一个晚上，灯光和罩衣，音乐室肮脏的天花板，在圣米歇尔大街散步，手里拿着尚未翻开的《凡·高》，而今天，这本书穿越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穿越了欧罗巴地铁和在沙塔尔中学门前等你的我，我在下面的阴暗中，等你一起去看《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中学昏暗的楼梯，拉格朗日街昏暗的台阶，门上的小字，所有的失望，在协和广场附近利沃里街拱廊下的散步，我从阿尔及利亚回来那天，在十字路口的踟蹰，*and so on and so forth*<sup>①</sup>，还有英国诗人……所有这一切就好像一生中细微的符号，被生活催促着，所有的一切，全在眼前，好像大海里的网。……

回忆这一切时我很难过，首先因为我回忆起这些，其次因为想到我们竟如此天各一方，而我们曾多么害怕这分离。<sup>②</sup>

等他终于摆脱兵役的时候，杰基希望米歇尔和他能够在同一座城市教书，重结他们20岁时融洽的友情。此刻，他同情朋友的不幸。

你就要去阿尔及利亚了，就此实现——讽刺而悲剧地——我们从前共同的计划。我曾经害怕让你来我家里，因为我们会如此不适，但现在我向你提议，如果你在阿尔及尔或附近，或者路过此处，到我家去吧，就像回到你家里一样，住我的房间，在家里吃饭，让他们给你洗衣服。别犹豫，他们很好，不管我在家时曾感到多么难受。……我要给布尔迪厄写信，他被派驻阿尔及尔。他对我说过他很有权力，我会和他提到你。

115

同月，德里达再次同阿尔都塞联系，首先道歉，出于自己这么久没有消息。他感到无法说出许多旅途感想，因为他还只了解新英格兰地区。他没有钱，不可能像阿尔都塞建议的那样穿越美国大陆。但他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向旧日导师描述了哈佛的哲学教育。“总的来说，贫乏粗浅。同这宽阔奢华的门面——在后面闪耀着的既有激情与青春，又有无知和天真——相比，索邦大学就是一所虫蛀的老房子，其中精神如飓风般猎猎吹拂。”在他看来，只有一门现代逻辑学的课让他学到了“关于弗雷

① 原文为英文，意为“如此等等”。——译注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7年2月27日。

戈 (Frege) 以及年轻时的胡塞尔等的许多东西”。但在根本上, 杰基似乎主要对自己不满意:

我虽然决定独自努力, 但还是没有做什么事。我曾十分期待的这完全自由的一年就要结束了, 我不会很快还能拥有这样的时间……我已为此而焦虑。……这一年将为我留下非常强烈的无力感。此前我一直装作相信是外界 (原因) 令我无所作为, 我想说服自己一旦教师资格考试结束, 我就会文如泉涌。但实际上几乎比以前还糟。不错, 我一直竭力把自己看成理论基础危机、哲学濒危、文化枯竭的牺牲品。在所有这一切消亡的前沿, 你只能沉默, 哪怕只为了别缺少“现象”。玩笑之外, 除了国家和国家间哲学氛围的彻底改变, 没有任何东西能 (如此地) 带来这种危机感。……去看看哲学在美国的书籍或大学里变成了什么, 看看那些莫名其妙的翻译、怪异的主题、关注领域的转移、对教学与地方价值的重视。<sup>①</sup>

116

德里达自觉急于见到阿尔都塞, 就在后者终于在高师获得的公寓里。他想同他谈谈阿尔及利亚最近的事件——布达佩斯特的起义, 以及它们在巴黎的影响。他也想同他讨论一项“非个人的小型研究”计划, 他试图“在情况好的时候”用心完成: 翻译并介绍《几何学的起源》, 这是他早在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的倒数第二章就提到过的一篇 30 多页的文章, 他将之视为胡塞尔的杰作之一。但他不知道是否有权发表自己的翻译, 因为还没有得到鲁汶的答复。

这个计划可能成为他学业生涯下一步的博士论文起点。对一名高师学生而言, 这“几乎不算是个决定”, 而是遵循一种“可以大概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运动”<sup>②</sup>。在这篇论文里, 德里达想要将他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 科学问题、现象学问题, 尤其是文字问题。早在赴哈佛之前他就已经启动了这些思考。

我记得教师资格考试刚刚结束, 我就去找让·伊波利特说: “我想翻译《几何学的起源》并研究这部作品。”因为里面很简略地提到了文字, 提到学者必须从数学对象的直觉出发去构建可沟通的理念对象。胡塞尔说, 只有文字能够赋予这些理念对象最终的理念性, 只有文字才能在某种意义上使之进入历史: 其

①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 1957年2月11日。

② Jacques Derrida, “Ponctuations : le temps de la thèse”, in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Galilée, 1990, p. 440.

历史性来自文字。但胡塞尔的论述模糊而隐晦，因此我试图建构一个文字的概念，让我既能理解胡塞尔的用意，并在需要的时候向现象学和现象直觉主义提出问题，又能归结到一直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文学的印记。什么是印记？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印记会成为文学？<sup>①</sup> 117

尽管还没有正式提交论文主题，但德里达已询问伊波利特是否同意做其指导教师，高师校长表示同意。伊波利特给他写道：“好好利用您在那里的时间。至于哲学，我对您很有信心，我知道您不会忘记这一点。我认为您翻译《几何学的起源》的计划十分出色。”<sup>②</sup>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也没有忘记。他给自己旧日的学生提出了令他安心的方法上的建议。他肯定地对杰基说论文的内容会慢慢成形。“让它先于本质而存在。我强烈建议您在没有预设的计划时就开始写作。随着写作的进行，您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哪里，要去向哪里。”冈迪拉克希望杰基能够在“漫长的兵役插曲”之前开始写作。他随后在信中对阿尔及利亚形势的分析明确表明了他的左翼倾向。他哀叹共产党的犹豫不定，尽管有阿尔都塞和其他几人的努力。“党派机器压制了思考，统一行动的命令阻碍了同摩勒在阿尔及尔施行的政策进行任何真正的斗争。”<sup>③</sup>

※ ※ ※

米歇尔·莫诺里 1957 年 4 月 28 日从布拉扎的营房里寄来的信让杰基极为突兀地直面战争。杰基是米歇尔唯一能够讲述自己刚刚经历的可怕场景的人。

我们昨天在贝鲁阿基亚遭到伏击，4 人死亡，18 人重伤。一夜倾盆大雨之后，我今天凌晨看到了我的战友们铅灰色的尸体，僵硬且血迹斑斑；我看到了伤者。但在这令人难过痛苦的景象之上，我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那个 17 岁的阿拉伯年轻人的形象。他双手被反绑吊在门上，衣服被剥光，遭到最残暴的拷打和最精细的酷刑。<sup>④</sup> 118

震惊之下，德里达沉默了整整一天，不知如何向朋友回复。

①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21.

② 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56 年 12 月 4 日。

③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57 年 1 月 11 日。

④ 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1957 年 4 月 28 日。

我试着想象，但我恐惧而战栗。我猜想，很明显的，在你讲述的这样一个早晨，想要为哪一方辩解或谴责哪一方都不仅是粗暴的，只够略微平息一些怒气，而且是抽象的，“悬在空中”。试图去理解则更使人孤立。无论结果如何，上帝都无法为这一切给出意义……

我全心和你在—起，米歇尔。我想同你说话，说所有我想到的和现在面对这个令我难过的阿尔及利亚时的感受，但我耻于在这么远的地方说这些，耻于面对将所看到的一切告诉我的你。

先到这里吧，我的老友米歇尔。我非常想念你。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绝望和你分担的话，我已准备好和你分担，永远。这是唯一直立的信念，没有谎言和盲目。<sup>①</sup>

杰基知道从哈佛回去后他就得开始服兵役，他惧怕这“两年的巨大黑洞”，和玛格丽特一起颤抖着走向它。被送上前线的风险不小。但埃梅·德里达从几个月前就开始活动，每有可能就说明儿子的情况，试图使他被编入文职。埃梅认识阿尔及尔附近一个小城市克雷阿的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因为那里经常向他定购酒。他们正在为一群孩子找个老师，埃梅于是夸耀他作为高师学生的儿子的水平，保证说他能够胜任任何科目。当然，这样的两年会相当无趣，不过，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兵役来，这可是真正的美差。

杰基和玛格丽特去美国时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分离。  
119 不过传统的家族婚礼对他们来说不可忍受，特别是在他们赴美前发生的那一切之后。1957年6月9日，杰基和玛格丽特在剑桥城结婚，他们的朋友玛格是唯一的证婚人。晚上，在罗德温家里进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一对新人乘火车到了纽约，在那里登上“自由号”轮船。6月18日，他们回到了巴黎。

---

<sup>①</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7年5月17日。

## 第6章 克雷阿的士兵 (1957—1959)

他们在巴黎待了几天，杰基痛苦而吃惊地发现，他留在高师的一只装着他所有青少年时代的书籍的箱子失踪了。这让他难过了很长时间。他已经有了保留一切的习惯。 120

离开始服兵役还有两个月，这时尤其需要弥补双方家庭的裂痕：玛格丽特的父母和杰基的父母更加如此，先是为他们去美国而失措，又因为被排除在外的遥远的婚礼而难过。德里达回到埃尔-比亚几天之后对米歇尔·莫诺里解释道：“和往常一样，也许更加严重，因为我同玛格丽特在一起，还因为阿尔及利亚今天的样子，我感到十分难受。”所有的人围着他们，使他们没有渴望的私密。“玛格丽特一家也不让我感到很自在，但不管怎样，他们要谨慎得多，沉默得多。”<sup>①</sup>

但事情很快有所好转。没能举行一场盛大婚礼的失望渐渐消散之后，杰基的父母接纳了玛格丽特，她相当自然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埃梅·德里达尤其喜欢她，但仍然担心地问儿子他们将来的孩子是否会接受宗教教育。“他们会自己决定”，杰基回答，这只能让父亲得到部分的满足。<sup>②</sup>

离开埃尔-比亚后，夫妻俩回到法国，在昂古莱姆附近欧库图里耶家的产业拉萨茨度过了几周。尽管杰基渴望将玛格丽特介绍给米歇尔·莫诺里，他们还是又一次错过。杰基在8月24日回到阿尔及尔，九月初受编。他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水堡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学习立正和使用武器，随后去接受父亲经多方斡旋为他保留的教师职位。“你看，我十分幸运，我如果自己不感到惊奇的话就会让别人为我惊奇，这 121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7年7月15日。

② 同雅尼娜·麦斯凯尔·德里达及勒内·德里达的访谈。

也好不到哪儿去。”<sup>①</sup>对这样的“美差”他若还发牢骚的话就太不知好歹了，尤其是对米歇尔。

10月初，他同玛格丽特到克雷阿入职，这个小镇子位于阿尔及尔西南部38公里，在俯视米提加平原的山丘上。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作为穿便服的二等兵给阿尔及利亚老兵的孩子上课，他们中很多是孤儿。一些刚过三年级的孩子有时会消失在游击队基地中。在这个预备军校里，杰基和玛格丽特将过着相当单调的生活，尤其对杰基来说十分辛苦。他在四五年级有12个小时的法语课，他适应得很快，还有三年级两个小时的英文课。每周四在阿尔及尔他教一小群文书学徒两小时法语，这两个小时很无聊，但报酬足够支付他们在克雷阿的一所房子里租间屋子。再加上批改作业、行政工作，为总督政府翻译报刊文章，甚至主持学校足球部，可以理解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与自己脱节。

从物质上来说，学校运转良好，让他们拥有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别的方面则不那么令人愉快，正如他向米歇尔·莫诺里解释的：

122 学生们很可爱，活泼友好，我进教室时总是心情很好，从不感到无聊，但同军队或文职人员的接触则相当痛苦，有时难以忍受。两个小时的食堂进餐时间和班级委员会简直就是折磨。<sup>②</sup>

德里达夫妇的情况当然比许多其他人要好——就从米歇尔说起吧，他十分难熬的兵役期直到1957年12月才结束，但克雷阿的生活远非那么容易。玛格丽特还记得就在附近的战斗：“夜里是真正的战争。我们常常听到枪声。有时会发生可怕的事。一天晚上，处死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头目之后，他们用吉普车拴着脖子把他拖到了伊斯兰区，然后把尸体放在一座清真寺前。他们大概想给阿尔及利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挑衅当然只能激起仇恨。还有，每次杰基经过兵营附近，那里的狗就开始狂吠。‘它们当我是阿拉伯人’，他说。他大概是对的，因为他皮肤黝黑，就像他每次回到阿尔及利亚时。”

几周之后，杰基和玛格丽特买了一辆2CV型汽车，能够在可能时回到阿尔及尔。周五晚上他们几乎总是和德里达的父母一起吃饭。其他的晚上他们同皮埃尔·布尔迪厄共进晚餐，他们在这段时间同他十分密切。布尔迪厄被派驻总督府军事部，担任总编。1957年年底他解脱了所有兵役义务，成为阿尔及尔大学助教，开始在全境

<sup>①</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7年夏）。

<sup>②</sup>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7年11月）。



进行真正的田野考察。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些年成为布尔迪厄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他起初投身哲学，这时开始转向社会学。<sup>①</sup>

德里达每周来总督府一次，负责翻译与北非有关的重要英文文章。这让他了解了很多情况，甚至掌握了许多在法国被禁的消息。这段时间毕仰高在斯特拉斯堡，远离妻子和婴儿希尔维，焦虑而抑郁：他服役的职位是在一所士官学校教书，这使他不得不在一所老式军营里忍受军人对新兵的戏弄。毕仰高的情况同德里达夫妇相似：比起工作来，环境更令他们压抑。如果他们能够一起在克雷阿“分担我们的感受……而不总是逃开身边的人”，那该多好。

123

几个月来，在阿尔及利亚虐待俘虏的证言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1957年6月11日，25岁的数学家、阿尔及尔科学院助教、阿尔及利亚共产党（1955年解散）员莫里斯·奥丹（Maurice Audin）被伞兵队员抓获。据看守说，他在6月21日逃脱，但此后没人见过他。他很可能曾在埃尔-比亚阴森的“玫瑰别墅”经受折磨，这地方的负责人之一就是国民议会议员、年轻的中尉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数学家洛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和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拿凯（Pierre Vidal-Naquet）刚刚成立了奥丹委员会，试图发现他失踪的真相。调查一直持续到1962年，证明他被杀害。

毕仰高刚刚激动地读完《问题》一书，这是莫里斯·奥丹的战友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的作品，刚在子夜出版社出版，随即被禁。<sup>②</sup>毕仰高冒着风险尽可能地在周围的人中传播此书。书中对酷刑的揭露使他面对冲突的立场更加坚定。他希望在这几个月的分离之后杰基和他还处于同样的政治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怎么想这场战争和所有这些可怖的混账事。在我看来，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除了独立别无他途，只能希望尽快宣布独立（它解决不了什么），尽快中止屠杀。也许你根本不同意？跟我谈谈吧，如果这一切不是太让你作呕的话。<sup>③</sup>

124

德里达会谈论这件事，而且是长篇大论。因为事态发展突然变快：1958年5月

① 这是他第一部作品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PUF, coll. "Que sais-je?", 1958) 的出发点。欲了解更多，可参阅 Marie-Anne Lescouret, *Bourdieu*, Flammarion, coll. "Grandes biographies", 2008, ainsi qu'un texte posthume de Pierre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Raisons d'agir, 2004。

② Henri Alleg, *La Question*, Éditions de Minuit, 1958。同一家出版社几周之后出版了 Pierre Vidal-Naquet, *L'Affaire Audin*。

③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4月27日。

14日，他开始写一封密密麻麻的16页长信，一小时一小时地向毕仰高讲述他们在克雷阿正在经历的事。他们刚刚度过了可怕的日子，“内心狂怒，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被周遭最卑鄙、最恶劣的混账事逼到要做噩梦”，这种混账事“失算时可悲”，可能见效时则令人恐惧。他们确实感到恐惧，躲在房间里守着收音机。杰基给毕仰高和他的妻子写信说，现在平静与希望回来了，尽管还显得那么脆弱。他们对他们详细讲述一切，首先是为了“满足这些日子被压制得快要呕吐的交流与述说的需要”。

对他们来说，一切开始于5月12日，那天报纸刚刚宣布第二天要在阿尔及尔组织游行，纪念三名在突尼斯被起义者俘虏并枪杀的应征兵。

晚上，在食堂，我们周围的气氛尤为紧张恶劣。虽说通常我们只是以消极沉默的方式表示不赞成，我们还是自然而然成了靶子，对我们的仇视虚伪而沉默地表现出来。周围弥漫着一种告密、写匿名信指控的气氛。那天早上，我突兀地离开了那群人。他们正在激动兴奋地读着“极端”组织印刷的各种宣传单。前一天，我在教员室拆包了米歇尔（欧库图里耶）寄给玛格丽特的一本俄文书，这是无法饶恕的。你们没法了解……这种阴险懦弱的集体愚蠢是多么难以忍受，当你独自面对的时候，哪怕你拥有全部信念。

125 那天晚上，人们在餐桌边谈论皮埃尔·弗林姆兰（Pierre Pflimlin），他应该第二天在巴黎被任命为政府首脑。人们指责他想将兵役时间延长至27个月，还要放弃阿尔及利亚，“无论他说什么”，“他的讲话中有太多潜台词”，一名到那时为止杰基一直认为相对开放的上尉补充说。

玛格丽特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激起几个同桌人沉默而激烈的反应。……我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当人们正要开始讨论在阿尔及尔发生的事件时，我决定离开食堂，部分是因为我无法呼吸如此重浊愚蠢的空气，部分是为了表示我蔑视在阿尔及尔发生的事，只对巴黎的情况感兴趣。……此时收音机里正在讲有关“纪念三名被懦弱杀害……的光荣的法国士兵……”的游行。……我们出去了……在所有在场人愤怒的目光下。

到了院子里之后，杰基无法控制地想象这群战斗分子们正在说他什么：“他对被杀的法国士兵毫不在乎”，“而且他是共产党员”，“他妻子不是法国人”，“他是犹太人”，“他看《世界报》和《快报》”，“他妻子翻译俄文书”……他突然崩溃，泣不成

声：“这伙混账守着他们不变的坚硬的雷打不动的良心，宣判我是赞成屠杀和恐怖的‘叛徒’，这让我深感受辱。”

为了多得到一点消息，杰基和玛格丽特打开了阿尔及尔电台，通常他们认为这是个诚实的电台，但它刚刚被叛乱者占领。电台宣布萨朗（Salan）将军将发表讲话，但“在大约半小时的软绵绵的音乐之后，一个从没听过的急速、狂热、极其愚蠢的声音”宣布，由马絮主持的公共救赎委员会成立，它将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命运。

一切都混乱不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并不确定，人们几次三番增减人名。不再有萨朗什么事。我们自然惊恐不安。新闻的口气令人恐惧。让人想到最糟的事：“种族暴力”，追捕“失败主义者”，侵占突尼斯，等等。我们担心和害怕得要命，整夜猜测政变的可能性，想象各方面的后果——最糟的和最好的。我们只是抽象地想象好的结果，一边给自己勇气，一边幻想着法国左派联合起来，清洗阿尔及利亚，赶快谈判，幻想着民族解放阵线在学会抵抗的政府面前妥协，等等。 126

由暴动者推上台的马絮给巴黎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成立一个“唯一能使阿尔及利亚继续成为法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国民救赎政府”。议员们并不喜欢这种干涉，他们按原定计划任命了皮埃尔·弗林姆兰。这是同阿尔及尔的决裂。5月14日凌晨5点，马絮再次发出呼吁：“国民救赎委员会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成立一个唯一能使阿尔及利亚免于被抛弃的国民救赎政府。”

这些可悲的时刻过后第二天，杰基到学校上课，重新找到些安宁，就像他给毕仰高的这封信中所表明的：

天气很好，就像我一生中的每个清晨，我在阳光下不再理解夜晚的焦虑。人们很安详，左派正在联合起来，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党行政长官将坚决顶住，“极端者”的势力将受到打击，不再像2月6日以来那样恐吓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和部长们了。法西斯主义不会得道。……

我下午上课。到第二节课时我差点晕倒。我已经一整天吃不下任何东西。抱歉讲述这些可笑的细节。但我对民主的信念和担忧从没有如此充满心间，法西斯的危险也从没有显得这么迫近，这么具体，这么紧急。所有这一切，而我是如此孤独，没有朋友，不可能逃跑，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当兵。现在很清楚，这个国家从没有过民主，也没有过任何民主传统，对殖民者靠军队进行的独裁统治没有任何抵抗的源泉。…… 127

我感到束手无策，了无趣味，一个失落在一片丑恶汪洋中的二等兵，我想在巴黎——哪怕它被法西斯占领——做个平民，同朋友在一起，能够参加抵抗，无论我的角色多么微不足道……倒霉透顶！<sup>①</sup>

在此期间，事态发展越来越快。5月15日，掌握民权和军权的萨朗将军对聚集在阿尔及尔论坛的人群讲话并高呼：“法兰西万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戴高乐将军从1947年起离职，始终希望给予法国更加稳定的机制。他终于从隐居中走出，宣称“准备履行共和国的权力”。在几天的时间里，阿尔及尔成为惊人的巨大游行的舞台，“来自所有种族的人群聚集在三色旗下向宗主国表明他们保留法国身份的一致意愿”<sup>②</sup>。

※ ※ ※

杰基没有把信寄给毕仰高，担心其像嫌疑人或“危险人物”的信件一般被拆开，他确信自己是其中之一。几天之后，他在这封厚厚的信后加了一篇附言，交给哥哥，让他从法国寄出。在形势的压力下，杰基的语调前所未有的具有战斗性：“在这里，我们生活在绝对的前法西斯世界，处于彻底的无奈中，我们唯有希望人民阵线或最好的戴高乐能够扫除这朽败。法西斯主义不会得逞！”恰在5月28日，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率领的一场盛大的反法西斯游行在巴黎举行。“我多么希望昨晚在巴黎”，杰基写道。

就在这天，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René Coty）又向“最伟大的法国人”发出了庄重的呼唤。6月1日，戴高乐将军接受了国民议会329票对224票通过的任命。128 议会要求他在六个月期间行使全部权力，使命是制定新的宪法。6月4日，他在阿尔及尔发表演讲，人们常常将之简括为著名而模糊的“我理解你们”这样一句话，而实际上这场演讲远远不止于此。

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了你们想要做什么。我看到了你们在阿尔及利亚开辟的道路通向创新和博爱。我说的创新指各个方面。但你们很正当地希望创新从最初开始，亦即从制度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还说到博爱，因为你们让我看到了如此壮观的景象：人们，从这端到那端，无论其族群

<sup>①</sup> 德里达致毕仰高的信，1958年5月14—29日。

<sup>②</sup> Guy Pervillé, “Le Temps des complots”, in *Alger 1940—1962*, *op. cit.*, p. 158.

如何，都携起手来以同样的热忱团结在一起。那好！我以法兰西之名采取行动，我宣布从今天起，法国认为在阿尔及利亚全境只有一种人民：只有彻底的法国人民——彻头彻尾的法国人民，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必须开辟此前一直向许多人关闭的新的道路。这意味着必须给予无力维生的人以生活的手段。这意味着必须承认那些尊严受到质疑的人的尊严。这意味着必须确保为怀疑自己是否拥有祖国的人提供祖国。<sup>①</sup>

对戴高乐，德里达的态度显然是暧昧的。在法国的政治环境中，他觉得自己更偏向左派。但对他，就像对所有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戴高乐将军仍然是那个在1943年结束了反犹政策并恢复了《克雷米厄法令》的人。在当前形势下，他在给毕仰高的信里提到的“最好的戴高乐”无疑指希望他能遵循6月4日这次演讲的精神，使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不同族群共处于一个深刻变化的国家。事实上，随后的几个月推出的一些重要的改革，开始于政府总代表保罗·德鲁夫里耶（Paul Delouvrier）领导下的选举制改革。但同时，夏勒（Challe）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采取“压路机”战略，试图粉碎民族解放阵线。后者暂时被削弱，但很快又强大起来。战争，人们知道，还远未结束。

129

※ ※ ※

毕仰高和妻子深为德里达的长信和其中表现出的坚定信念所感动：“若要了解你，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听你重申‘法西斯主义不会得逞’（我还记得在学校一个什么共产党员时刻叫嚣这句口号时你恰当而冷酷的讥讽）。”<sup>②</sup> 毕仰高一家从7月10号起要在巴黎待几个星期，邀请玛格丽特和杰基来他们的公寓小住。但这一次轮到毕仰高担忧了：在一份不好的报告之后，他可能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行动小组”<sup>③</sup>，这将让他不得不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巴黎。德里达将竭力让他全家来克雷阿。

毕仰高9月1日来到阿尔及利亚，先到了自己任职的地点——距君士坦丁不远。他反感这场不得不参加的非正义战争，也讨厌被迫忍受上尉的亲法言论，他希望被任命在克雷阿，又不敢真的相信。他对杰基说，如果没有多余的教历史—地理的职位的话，他可以教法文甚至德文。实际上他甚至愿意“打扫教室，只要能待在克雷

①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论坛的演讲，1958年6月4日。

②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6月21日。

③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7月1日。

阿”<sup>①</sup>。9月15日，他获正式任命。他将于25号抛开军队制服和束缚到达克雷阿，给校友所教的同样的学生上课。

在一年的时间里，毕仰高与妻子及幼女希尔维和德里达夫妇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在食堂同桌吃饭，与那些军官拉开距离。但和那些人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张。另外一名与德里达一起在水堡受过培训的应征兵因为无法忍受那些“极端分子”的交谈，有一天端着盘子坐到了德里达与毕仰高两家的桌旁。“这样至少很清楚”，他用强硬的口气抛下这么一句。

130 在巴黎，形势发展迅速。1958年的全民公决要求法国人民认可第五共和国宪法：它以将近82%的赞成票通过。几周后进行了立法选举。德里达的选民注册地一直在巴黎，他委托路易·阿尔都塞替他投票，尽管两人的选择截然不同。他们两人以足够隐晦或暗喻的方式通信以避免审查。阿尔都塞只解释说，他将做“必要的事”：“我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选你说的人。如果他放弃了第二轮，我将遵循他的指示。我希望你还在教师队伍里，也希望秋天到来时气氛不再那么凝重。告诉我天气预报是什么样的。”<sup>②</sup>几周之后，他让他放心：“已按照你的心愿投票……这是你的选票。”但信末让人看出两人的政治倾向不同：“我仍然祝你圣诞愉快，并致以诚挚的友谊。”<sup>③</sup>

1958年12月21日，戴高乐将军成为为他量身定制的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 ※ ※

德里达和毕仰高两对夫妻的相契使以后的几个月好过许多。他们十分关注战争，连续几个小时听广播和读报纸。德里达和毕仰高每周一起买《法国观察家》。克雷阿的书店只订购两份，他们纳闷谁会买另外一份：这份周报被许多人认为是反法报刊，需十分谨慎。毕仰高和德里达两家常常读同样的书：刚刚由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翻译成法文的帕斯特纳克（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格诺（Queneau）的《扎齐在地铁》，还有从美国带来的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和福克纳（Faulkner）的小说。玛格丽特在翻译高尔基一部并不太激动人心的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杰  
131 基有时想继续撰写《几何学的起源》导论，但他每周在克雷阿有19个小时的课，在阿尔及尔给指挥部门秘书们上3个小时的课，还有几节私人课程，以及为总督府翻译英文报刊，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sup>④</sup>正如他对米歇尔·莫诺里的解释：

①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9月10日。

②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11月17日。

③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58年12月13日。

④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和毕仰高的访谈。

所有这一切，你可以想象，奇特地压缩了我孤独的机会，亦即我的呼吸。在某些“时刻”，我心中极其渴望，感到自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天翻地覆；而其他时候我接受这一切……带着很快忘却的微弱叹息，还有些许麻木的无声顺从的安详，就像忘记了已变得稀薄的空气而继续生活的人。<sup>①</sup>

虽然距离遥远，但学术界并不能被完全忘却。1959年2月，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建议自己从前的学生参加将在夏天举行的“瑟里斯会谈”，主题是“起源与结构”。德里达将直接延续他的文凭论文，就胡塞尔发言。但在冈迪拉克眼中，重要的是“在茂盛的诺曼底乡间”围绕着发言进行的“自由亲密的讨论”。那里会有“现象学家，辩证论者（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逻辑学家和认识论者，经济、艺术和语言史学家，民族学家，生物学家，等等”。讨论将由吕西安·戈尔德曼和冈迪拉克本人“以最灵活的方式”主持。<sup>②</sup>虽然对这第一次的公开演讲不无担心，但是德里达只能对这令他受宠若惊的提议给予肯定的答复。

也是在这一年——而不是像他在姗姗来迟的答辩中所说的1957年——他正式提交了论文主题，题目是《文学对象的观念性》。论文虽然以胡塞尔为依托，但它将把德里达引向一个极为个人的问题，其方向早从少年时代就让他最为关注。

我那时想要以多少有些激烈的方式将超验现象学的技术用于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即关于文学对象这种极为特别的观念对象……因为我必须有点简单粗浅地再次强调，我最持久的兴趣，我要说甚至在哲学兴趣之前，如果可能的话，是朝向文学，朝向人称文学的书写。 132

什么是文学？首先，什么是写作？写作是怎样前来干扰一切，直至“什么是……”甚至“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的？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对我很重要——印记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成了文学的，那时发生了什么？这回归到了什么，回归到了谁？在哲学和文学之间，科学和文学之间，政治和文学之间，神学和文学之间，精神分析和文学之间发生着什么，这就是在这抽象的题目中最为执着的问题。<sup>③</sup>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8年12月15日。

②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2月9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onctuations: le temps de la thèse", in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43.

让·伊波利特可能对这罕见的主题和尚不明确的框架感到茫然，他同意登记论文题目，同时让德里达放心，说进入撰写阶段后还能修改题目。伊波利特说，很高兴知道《几何学的起源》的翻译即将完成。他肯定说将在自己主持的丛书“厄庇米修斯”里出版这部作品，并请德里达给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写信，让他们着手同出版《胡塞尔全集》的荷兰出版社办理必要的手序。伊波利特说，在放假前不能仔细阅读译文，但他的第一印象很好。他建议德里达抓紧撰写评论，希望兵役不会占用德里达太多的时间。德里达很快将回到法国，开始真正的职业生涯。高师校长在信末说“告诉我你和中学的关系”，“相信我将来会想念你们”<sup>①</sup>。

133 虽然还要在克雷阿待几个月，但杰基确实在思索这漫长的兵役之后该做什么。他曾有可能去拉弗莱士高中教毕业班，这座城市在萨尔特，有些偏远。但不久他的前校友热拉尔·热奈特告诉他，也许在自己工作的勒芒就有一个教毕业班和高师预备班的职位，这个前景显得更光明些。那里的校长觉得哲学教师费希（Fieschi）过于怪异和随便，想让他离开。热奈特于是对校长大加称赞德里达。现在需要做的是，联系部里以便具体操作。<sup>②</sup> 获得同意后只需要知道是住在巴黎还是住在勒芒更好。问题概述如下：“旅程（每周两次往返）在体力上特别是在精神上会很辛苦，但在勒芒的生活并不有趣。”<sup>③</sup> 几个月之后，热奈特也放弃了在巴黎居住。

134 尽管通信语气友好，但这两名年轻人那时几乎不认识。他们同时在于姆街的时候，热奈特修文学专业，又是个共产党斗士，这让他们不易接近。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特后热奈特离开了共产党。<sup>④</sup> 他刚刚结婚，他的妻子莱蒙德急于认识人称“温和而复杂”的德里达。为了使德里达来勒芒的计划成行，还得让那位相当传统的校长放心。热奈特给了德里达机智的建议：“自然，作为哲学家，你在许多事情上必然被人质疑，特别是你怎么会相信哲学这种该死的东西。有机会的话，要让他听出来你只相信结果，也就是，显而易见的，只相信考试。……至于道德范畴，你

① 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5月13日。

② 热拉尔·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4月12日和16日。

③ 热拉尔·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5月11日。

④ 德里达在同迈克尔·斯普林科（Michael Sprinker）关于阿尔都塞的谈话中提到了这段往事：“1956年镇压匈牙利后，一些参加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开始退党。阿尔都塞没有退党，我想他永远不会这么做。热拉尔·热奈特到1956年一直是党员，他对我说他在匈牙利起义之后去见了阿尔都塞，向他倾吐他的担忧、焦虑和理由，大概也为了向他咨询意见。阿尔都塞大概对他说：‘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话，党就是错的。’党犯错看来是排除在外的，那么用矛盾法推定热奈特说的话应该更正。热奈特笑着对我说：‘我从这令人震惊的说法里得出了结论，立刻退了党。’”（这篇谈话的英文版发表在1989年出版的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一书中；我引用的是未发表的法文版，据德里达的誊抄，现存于IMEC。）



要在讨论会上重读于连·索莱尔（Julien Sorel），并记住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和警察的进步。”<sup>①</sup>

杰基和玛格丽特觉得这次任命是件好事。马上就能得到预备班的职位是很有面子的。热奈特夫妇应该是令人愉快的同伴，他们已经在尽力帮忙安顿。而且勒芒距巴黎只有两百公里，打算重修民族学的玛格丽特可以不必太辛苦地每周往返巴黎一两次。

但更加令人振奋的前景似乎突然间触手可及。7月16日，德里达29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分别收到路易·阿尔都塞和让·伊波利特的信。阿尔都塞十分高兴地转达了“一个包含巨大希望的消息”：经过几个月艰苦的谈判，伊波利特提名德里达担任将在索邦大学创立的普通哲学助教职位。教师大会最终通过提名。现在全看哲学研究主任埃提安娜·苏里奥（Étienne Souriau）和部长本人的意见了。伊波利特说自己很乐观，但还是建议在最终确定之前继续办理中学的手续，以做好两手准备。<sup>②</sup>但事情进展顺利，不到一周，苏里奥正式邀请他担任索邦大学“教师资格实际研究负责人”：“您愿意担任这一职位吗？回答是的话，就决定了。”<sup>③</sup>德里达急忙表示接受，就在出发去诺曼底的瑟里斯-拉萨勒之前。为期十天的“起源与结构”研讨会来得正是时候，他得以再次同因为不可抗力而几乎睽违整整三年的学术环境建立起联系。

研讨会于1959年8月3日举行，最终由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吕西安·戈尔德曼和让·皮亚杰（Jean Piaget）三人主持。当时有许多重要的知识界人物参加，包括恩斯特·布洛克（Ernst Bloch）和让-图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以及几个“年轻人”，如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和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这十天是一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次，给德里达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

135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开着一辆小2CV带着众人去享用佐以白葡萄酒的诺曼底美食，这里面著名的有让·皮亚杰、德桑蒂、布勒东（Breton），后两位随后成为挚友，还有我同样是初次相识的匈牙利心理学家尼古拉·阿布拉罕（Nicolas Abraham）和玛丽亚·托洛克（Maria Török），他们在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之间开拓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还没有读过恩斯特·布洛克的作品，但他的在场

① 热拉尔·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6月25日。

② 路易·阿尔都塞和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7月15日。

③ 埃提安娜·苏里奥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7月21日。

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边界的穿越”，这在欧洲十分引人注目，尤其再加上戈尔德曼，使得所有的讨论都不妨说贯穿着对马克思的参照。<sup>①</sup>

研讨会题目“起源与结构”呼应着让·伊波利特的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但在此处未带任何修饰语。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会谈都是跨学科的，尽管当时这个词还远未流行，论及从官僚主义到生物学，从数学到赫西俄德（Hésiode）笔下的种族神话，从语言学到宗教信仰等各种主题。“这样积极的和百科全书式的讨论方式在大学里是不可能产生的。”

对于德里达，这十天是一次真正的洗礼。尽管他算是最年轻的参加者之一，还未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从头至尾在许多讨论中发了言。就是他，在让·皮亚杰的发言之后以一种虎虎生气引出了讨论。

136

我还记得我像条迷恋发生现象学的小狗，如此年少轻狂，胆敢对了不起的皮亚杰的心理主义提出反驳，几年前我还曾为准备儿童心理学考试而认真地研习过他的学问。这是第一天晚上。此后，在整个十天里，皮亚杰带着一种既恼火又保护的讽刺的尊重对待我这个胆大妄为、天真无礼的年轻人。他称我为“现象学家”。<sup>②</sup>

7月31日星期五上午，德里达在城堡的图书馆里做了第一次演讲，宣读了20多页仔细写就的讲稿。他提出的问题来自论文，但他撰写了一篇有自己最新研究的文章。就在这一天，将成为德里达作品中重要概念的延异（*différance*）第一次出现。不错，他发言中使用的是常见词“差异”（*différence*），但哲学家显然赋予它以极其特别的意义。行文中间的确出现了用“a”的“*différance*”，尽管只是一带而过：“这一不可逆转的差异（*différence*）源于理论基础无尽的延异（*différance*）”<sup>③</sup>，他写道。

其他同样重要的第一次有：就是在瑟里斯的这些讨论和这次准备发表过的讲演

---

① Jacques Derrida, “Le modèle philosophique d’une ‘contre-institution’”, in *Un siècle de rencontres intellectuelles : Pontigny, Cerisy*, IMEC, 2005, p. 257.

② Jacques Derrida, *Un siècle de rencontres intellectuelles : Pontigny, Cerisy*, op. cit., p. 258.

③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Seuil, coll. “Tel Quel”, 1967, p. 239. 这一点在“Derridex”中提到过，这是德里达作品中词汇的索引，见网页 [www.idixa.net/Pixa/pagixa-0509031313.html](http://www.idixa.net/Pixa/pagixa-0509031313.html)。[“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创的新词，读音同“差异”（*différence*）完全一样，但以一个字母之差（e变为a）引入了延迟之意，亦结合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兼含现在分词即动词化的含义。——译注]

中，德里达将自己的名字“杰基”改为“雅克”（Jacques）。他有时为冈迪拉克当众称他“杰基”感到恼火。此后他的“真实”名字只保留给家庭和几个老朋友。

※ ※ ※

在拉萨勒和埃尔-比亚度过几天假期后，杰基和玛格丽特在9月初回到克雷阿度过兵役生活的最后几周。时间变得漫长，他们如此急于落户巴黎开始新的生活。德里达知道为索邦大学教课要做许多准备，希望同阿尔都塞进行讨论：“你若愿意的话，我回去后要求助于你的权威和经验，让你看看我的计划、文章、主题，等等。”<sup>①</sup> 137

在给米歇尔·莫诺里的信中，杰基描述的情形略有些不确定，但在索邦大学做助教看上去已经颇有保证。

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消息，但大概是肯定的；只要中学不反对我离开。我在夏初知道这件事……并接受了，欣喜若狂又万分恐惧，我的恐惧接近发狂，比喜悦更加持久地出现。你看我运气很好，但我属于不会欣赏它的人。我本该高兴地搓着手，却像困兽般东奔西跑，气喘吁吁地在一团糟里狂热地工作……这很愚蠢，我希望面对魔鬼能够振作精神。我模糊地试图说服自己，在这所老房子里做了这么多鬼脸，我要是还没变成个足够老的猴子，那可真有些奇怪了。……根据流言，我有这运气多亏了伊波利特，也有冈迪拉克的功劳。

德里达希望这样的话回到巴黎后就能常常见到米歇尔。对他来说，这又是激起回忆的机会。无论快乐与否，他都禁不住回忆。他已然热爱过去，过去的一切。”

我觉得再次听到，近在耳畔，我们共同在圣雅克街度过的冬天。它们对我越来越有着黄金时代的声响，那是一种奇异的黄金时代，阴郁、艰难，带着沉默而轰鸣的裂响。当我感到我就要回到巴黎，在那儿再见到你时，我觉得我在其间走过了一个不现实的圆圈。……

你是否可能为我们找到住处？……我还记得那个冬天，下着雨，我被放逐于此，远离家人。我给你写信，就在这张桌边，请你帮我找个住处。我要说你没能帮上什么忙，但你如此诚恳地为自己的无用而难过！不管怎样，试试

<sup>①</sup>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59年9月4日。

吧！……这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sup>①</sup>

138 随后的几周极为混乱。德里达发现自己无意中卷入一个双重游戏，情势突然反转过来不利于他。9月30号，他收到中等教育总长布鲁诺德（Brunold）先生一封非常生硬的信：德里达已申请并被任命为高师预备班教师，“鉴于此职位的重要性”，他不可能再接受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安排。服完兵役之后，德里达必须前往勒芒高中就职。

阿尔都塞和伊波利特一知情就竭力澄清这件“荒唐事”。尽管他们从上层着手干预，但还是很快意识到事情已变得错综复杂。10月6号，阿尔都塞说事情的变化让他“深为痛心”，“首先为你，其次为我，我曾希望你能待在高师附近”<sup>②</sup>。在热奈特那边，他几个月来一直竭力让校长耐心等待，现在却发现情势紧迫：“给我消息，哪怕是含糊的消息或者是坏消息，这没完没了的不确定开始让我感到沮丧。”但实际上事情已经决定了。德里达略带苦涩、遗憾地看到自己困在影响力游戏中。现在他只想尽快到勒芒任职。

在此期间，阿尔及利亚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将军发表了广播讲话，第一次提出通过“自决”解决问题，并提出在三种形式中进行选择：“彻底法兰西化”、“联盟”和“脱离”。不错，“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制定并确立未来协商的方式。但路线已经清晰，决定已经做出”<sup>③</sup>。对选民的调查显示即将宣布独立，支持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兰西的人们感到受到了欺骗。

在当地，战争仍在持续，德里达很高兴兵役终于结束。他没有一刻想到，在勒芒的这一年将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之一。

---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9年9月12日。

②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10月6日。

③ 夏尔·戴高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的讲演，1959年9月16日。

## 第7章 勒芒的忧郁 (1959—1960)

从春天起，热拉尔·热奈特一直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耐心。但勒芒高师预备班一些准备学哲学的学生有些不耐烦，去了另外一所高中。这漫长的拖延在热奈特看来只有一个好处：“校长说，他现在必须诱使你待在这儿，待得越久越好。你会看到他是个多么可爱的家伙。”<sup>①</sup> 139

终于解脱的德里达夫妇于11月中抵达勒芒。他们先是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后很快搬进了坐落在雷翁·波雷街的一座现代化的公寓楼，离热奈特家百十米。后者继续全力帮忙，告诉他们手工艺人和旧货商的地址。在《追加遗嘱》一书中，热奈特开心地回忆说，“雅克有时颇为固执。他需要给一个山毛榉书架涂一层麻油”，热奈特建议加些干燥剂。“他觉得多此一举，结果有好几个月他的书就像炸糕一般油汪汪的。”<sup>②</sup>

在物质上，勒芒的生活比在巴黎舒适。至于其他方面，热奈特并不讳言，在法国很难找到一个更加不开化的城市。“学术书店，本地作家，时髦的咖啡馆，小圈子，系列讲座，所有这一切像在北极一样闻所未闻。”<sup>③</sup> 今天已精心修复的老城区在1959年不过是个“打着瞌睡的大村子，漫不经心铺就的街道上杂草丛生”<sup>④</sup>。德里达任职的男高中是市里唯一的高中，就在教堂旁边，有些日子得穿过牲畜集市才能到达学校。 140

① 热拉尔·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11月12日。

② Gérard Genette, *Codicille*, Seuil, coll. "Fiction & Cie", 2009, p. 107.

③ 热拉尔·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59年9月14日。

④ Gérard Genette, *Bardadrac*, Seuil, coll. "Fiction & Cie", 2006, p. 67.

刚开始杰基似乎对自己的情况还算满意，我们可以看看他给表妹的信：

我们在勒芒这座大而安宁的外省城市至少要待一年。幸好它有不少好处：就在巴黎门口（2小时火车）；我的教学很有意思（高师预备班哲学），也给了我许多自由，而且我们很快找到一所十分合适的公寓。<sup>①</sup>

德里达负责两个班，每周大约15小时的课程。在文学毕业班里只有15名左右学生。高师预备班经特别允许是男女混合的，30人左右，大部分不是那么出色。这是些有点“土气”的学生，同他希望在索邦大学遇到的十分不同。但他仍然仔细备课，尽管他没有时间像后来那样把教案完整地写下来。他远离常规教学，想要传达他最关注的哲学问题。但也许他过于在意校长认真教书的要求，也可能他试图以有些严厉的权威来补偿自己的胆怯，他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主要是一名难于接近、过于严格的教师。我访问的三名亲历人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阿尔贝·多辛（Albert Daussin）那时是高师预备班的学生，他对德里达最初的印象是一个“英俊的褐发青年，侧影好像罗马勋章”，有时会在讲课结束时充满怀念地提到北非。此外，他并不特别与学生亲近，经常让人感觉他生活在一个理念与思索的世界，学生们永远不能进入。“我记得他给我们启蒙黑格尔的思想，他的语言如此深奥，我们很少有人能懂！从我们的笔记看得出来，我们没有能力理解德里达，显然他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能力。”

保罗·科廷（Paul Cottin）则吃惊于德里达的严肃和专注，他同热奈特的伏尔泰式的讽刺和前一年的哲学教师帕斯卡·费希的波西米亚般的魅力相去甚远。“德里达不表露自己。他似乎有意避开小故事和可笑的例子。他不寻求和蔼可亲，而是给我们上结构扎实的课。他的课要求很严，但其概念程度对于我们来说过高。他过于相信我们的智力。我们预备班的水平同路易大帝或亨利四世高中无法相比。我记得他给我们长时间讲述《纯粹理性批判》。他还倾向于把一切都引向康德。‘伟大哲学家的特征就是他出现在所有的十字路口’，他说。他在讲特别难的东西的时候会皱起眼睛，好像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进入他的叙述。”

乔·穆埃雷（Njoh Mouellé）——他继续学习哲学，后来成为喀麦隆的部长——的回忆则更加正面：“雅克·德里达相当有保留，不大与学生混在一起，但他参加我们全班组织的晚餐。热奈特和他是仅有的借此机会与我们在一起的老师，还有他们

---

<sup>①</sup> 德里达致米什琳·莱维的信，1960年1月7日。

的妻子。他不大讲话，更不爱开玩笑。德里达有一次对一名总是面带笑容的同学抛出一句话：‘听着，佩罗斯，您永远的快乐真让我绝望……’他的课扎实而且严肃。由于我从毕业班起哲学就还算不错，所以我个人怀着很大的兴趣上他的课。是他让我遨游在康德的世界。他通常给我很高的分数。”

142

※ ※ ※

几个月过去，德里达越来越不掩饰他的不快。热奈特很高兴能够同他组成“一个优秀的小团队”，并理解自己的校友只把这个位置看成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总想着没能进入索邦大学的失败，好像那是种迫害。其不适首先表现在一段疑病期。德里达每天都发现新的吓人的症状。他害怕是癌症或别的什么绝症，看了很多医生都无法平静下来。在第三个学期，精神抑郁变得明显。他后来说这是“巨大的抑郁”，因为之后再没有过如此严重的现象。

刚到勒芒的时候，他不想承认自己的失望有多大。突然间一切都爆发了。他经受了多年的痛苦才通过高师入学考试，随后是教师资格考试。他忍受了27个月的兵役，等待生活终于向他打开的一天。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来到这里，面对着听不懂课的学生，与只喜欢聊度假和体育的同事为伍。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疲惫不堪地备课，批改无趣的作业。几个月来他无法从事任何研究，他甚至没有力气与最亲近的朋友通信。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完成论文呢？不错，让·伊波利特向他保证，索邦大学到下一年开学时就会任命他，普通哲学助教的职位还在等着他：“我已经说过您会接受的。在我看来这次机会对您十分有利。”<sup>①</sup>但经过前一个秋天的失望之后，杰基不再相信虚假的希望，想象自己也许得在勒芒这座压抑的城市待上好几年。

这时来了最后一击：校长坚持要求作为新教师的德里达撰写并致颁奖辞。热奈特还记得这让德里达十分苦恼。“我还看到他躺在床上，对我解释说 he 无力完成这‘可笑的世俗说教’：‘不行，真的，我做不到，我对这些家伙无话可说。’但校长仍然坚持。为了让德里达上手，我提醒他说学校校舍曾经是一所奥拉托利学校，应该出过梅森（Mersenne）神父，他是哲学家和学者，是笛卡尔、帕斯卡尔（Pascal）与迦桑狄（Gassendi）的朋友。我建议他赞颂梅森，甚至提出找些材料帮他完成任务。”<sup>②</sup>

143

德里达还担心另一件事：著名的6月25日和26日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让整座

<sup>①</sup> 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60年3月11日。

<sup>②</sup> 同热拉尔·热奈特的访谈。这段故事也在他的著作 *Codicille* 中讲到过。很遗憾我没能找到德里达的讲话稿。

城市热闹非凡。勉强上完最后几次课后，他同玛格丽特去了乡下，快到7月14号才回来，为的是这一天在勒芒新剧院的舞台上发表这著名的颁奖辞。就在这时，他在索邦大学做助教的任命得到证实。玛格丽特和他处理了他们少有的几件家具，开始在巴黎地区找住处，随后开着他们的小2CV汽车出发去位于布拉格玛的格丽特家。尽管这第一次去“铁幕”那边的旅行让他很感兴趣，但杰基还是无法恢复精神。回来以后他极为沮丧，决定去咨询心理分析师。那时抗抑郁药刚刚发明：最早的药物于1958年进入市场。医师给他开了阿纳夫拉林，迅速产生了有益的效果，但也引起了许多副作用：一阵阵发热，颤抖，等等。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在夏末给他写信，说看到他的“严重的健康问题”很难过。冈迪拉克希望在索邦大学的新职位能帮助他很快恢复。

144            对您的任命顺理成章，因为去年只是因为中等教育部门的恶意才使我们的决定没能实现。伊波利特先生和我本人让您获得了您的权利，而且也没有别人提出申请。不过，您别过于指望这个职位能给您带来闲暇。准确地说，您的教学大概将与您的研究更加吻合。<sup>①</sup>

---

①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0年8月24日。



## 第8章 走向独立

(1960—1962)

德里达夫妇很快在奥利机场附近瓦尔德马恩的弗莱斯纳找到一所公寓。公寓有 145  
四间屋子，在一座崭新的带状大楼里，就在凡尔赛的大道边。玛格丽特重新开始学习民族学，她将在人类博物馆地下室里实习一年，随后开始同安德烈·勒鲁瓦-古尔让（André Leroi-Gourhan）做关于阿尔及尔犹太人礼拜仪式的论文，因为她在克雷阿的两年期间曾有机会观察到他们的丧葬习俗。<sup>①</sup>

杰基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差，他很担心上任的时刻。“我不曾知道这一年对你是如此痛苦，就好像刚到巴黎时那些阴暗的日子”<sup>②</sup>，米歇尔·莫诺里给他写道。幸好10月24日才开学，这让他有时间备课。德里达是唯一的普通哲学助教，要协助好几位教授。工作量相当大，他很快感到“被卷入教学和巴黎的荒谬旋涡里。从10月起一直是匆匆的奔忙，没有一刻回顾和生活”<sup>③</sup>。必须要做的事情已然很繁重，此外的一切看来都超出了他的精力范围，更不必说弗莱斯纳和巴黎之间的路途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尽管如此，同在勒芒的一年相比，变化还是积极得多。抑郁症状一旦开始缓解， 146  
德里达就能正确对待他的新职位。他在1992年说：“这四年里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在那里教书很快乐，自从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快乐。”<sup>④</sup>实际上这是他在法国从事过的唯一真正的大学职位。在《莱尔纳手册》向保罗·利科致敬的一辑中，他写下了自己最后的文章之一，追述了在索邦大学的这段时间。

---

①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独立之后这些犹太族群将彻底消失，勒鲁瓦-古尔让不久对他的学生说：“我可怜的孩子，您的领土正从您脚下溜走。”

② 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60年9月）。

③ 德里达致让·贝勒曼-诺埃尔的信，无日期（1960年12月）。

④ 《荣誉勋章获奖词》，1992年，未曾发表，IMEC档案。

在那个时代，助教的位置很奇特，今天的人难以想象。我是“普通逻辑哲学”的唯一助教，可以照我的意愿自由组织我的教学和研讨课，理论上我是某些教授的助手，但我对他们只有泛泛的依赖：苏珊娜·巴什拉（Suzanne Bachelard）、康吉莱姆（Canguilhem）、普瓦里耶（Poirier）、波林（Polin）、利科和华尔。考试之外我很少见到他们，后来的苏珊娜·巴什拉和我钦佩的忘年交康吉莱姆除外。<sup>①</sup>

普通哲学并没有固定的教学方案，德里达能够依照自己的心愿决定主题。他上的课有全部关于海德格尔的，如对《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和《什么是形而上学？》进行评述，也有其他主题，如“当前（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柏格森）”、“思想，就是说不”，还评论克洛代尔的说法“世间的恶就像提水的奴隶”。他的名气迅速提升，人们争先恐后听他的课。150多名听众勉强挤在卡瓦耶大厅里，没有出于谨慎提前半小时到的人只好站着。几个月之后，德里达不得不把学生分成两组，每一次课都多讲一遍。

147 当年索邦大学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但许多学生对德里达的教学记忆犹深。在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Françoise Dastur）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深刻的教师，但仍然相当传统。“他显得腼腆，甚至有些笨拙。他的教案内容极为厚重，有些确实精彩。我尤其记得‘方法与形而上学’，还有‘胡塞尔思想中的神学与目的论’。德里达和利科两人为我启蒙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有时会提到萨特，但从未谈到过梅洛-庞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也给他们带来很多东西，他也愿意每次课后与学生讨论一会儿。”<sup>②</sup>

在不久即与德里达结下友情的让·里斯塔（Jean Ristat）的记忆中，他多数时候很友好，很关心学生，但有时也会表现得毫不留情。“我记得口试时他大为光火，因为他询问的几个学生都没有读过《纯粹理性批判》。但对于真正热爱哲学的人来说，他十分容易接近。有时他带我们去‘巴尔扎’酒吧继续讨论。这种对学生的亲近与倾听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异乎寻常的。”<sup>③</sup>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局势快速演变。它越来越成为索邦大学和其他地方的中

---

①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 - Donner, nommer, appeler”, in *Paul Ricoeur*,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21.

② 同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的访谈。

③ 同让·里斯塔的访谈。

心话题。在德里达家里，就像在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家庭，反对戴高乐的情绪持续上涨。在1961年1月8日举行的自决问题全民公决中，投“同意”的占了上风，在宗主国占选票的75%，在阿尔及利亚占70%：穆斯林第一次可以投票。4月7日开始了埃韦安谈判，为独立打开了道路。一些人无法接受。4月21日至22日夜，四名将军——夏勒、儒奥（Jouhaud）、载勒（Zeller）和萨朗——试图挑动军人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促使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内部。他们在几个小时内控制了阿尔及尔。4月23日，在后来变得很有名的电视讲演中，戴高乐谴责“四名退休将军的企图”，下令采取一切措施挡住他们的去路。政变失败了，但秘密军队组织（OAS）继续以越来越血腥的方式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作战。

148

大约就在此时，杰基在路易大帝高中的校友皮埃尔·诺拉在朱利亚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书。收到此书不久，德里达回复了诺拉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19页单行距长信。我得到许可大量引用此信，因为它在我看来意义重大。他在其中陈述了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信念，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再没有过。他在这篇详尽的分析文章里也表现出对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关注，这在许多年之后才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德里达说，在这些令人绝望的和让他觉得不现实的日子里，他以持久而强烈的兴趣阅读了这部著作。他感谢诺拉写了这本书，其“罕见而艰难的价值在于对此问题……几乎始终保持着公正和恰当，无论内容还是结论”。但他为其语气而惋惜，认为“它总的来说比内容本身更加能揭示写作者的基本态度”。他感到这语气中有“一种有些严厉的侵犯性”，甚至有一抹“侮辱人的意愿”。“当你说‘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用论据来回答’时，我只能下结论说，你还没有遇到足够多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

德里达肯定地说，他很久以来就“在心里，在沉默中，审判着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但他仍然坚持维护公平，就在此风向扭转、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日益增加的时刻。好像为了弥补过久的沉默，他想向诺拉阐述自己在这个如此切身的问题上积累许久的思考。在他看来，他的前校友确实在书中掩盖了这一复杂形势的好几个因素。

149

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尽管他们有着长久而巨大的负罪感，我们不应忽略，也不应以分担的借口去淡化它）去承担130年来法国的全部阿尔及利亚政策，这难道不是太难了吗？如果，照你所说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曾经是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不幸的“制造者”，那么必须同时明确说明，所有的政府和军队（也就是他们以其名义行动的全体人民）一直都是这历史与不幸的主人。

德里达尤其感到愤怒的是，左派“既没能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又没能在别处进行去殖民化”。让他恼怒的另外一点是，像大多数法国的法国人那样，诺拉忽略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多样性和变化力，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同质不变的实体。诺拉尤其讽刺了那些“自由化”的法国人，而不言自明的，德里达便属于他们。但德里达认为对这一群人值得作出有别于尖刻审判的判断，而且他本人也挣扎于对法国的归属感和对去殖民主义原则的认同之间。自然，这常常导致人们谴责这些“自由主义者”立场模糊和无能为力。但无论怎样，

（就是这些人），无论共产党员是否曾在战前组织起政治生活和工会生活，其中阿莱格、奥丹或加缪这样的人曾经思考与行动。就是他们，在45年之后，让阿尔及尔选举出一届进步共产党的市政府（是的！），而且随后成功地与阿尔及利亚当选者、民族主义政党的公开活动分子进行了合作。还是他们，直到1957年，就在战争、镇压、谋杀已经开始让许多事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始终与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150 德里达还指责诺拉让人以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于法国的法国人，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少数殖民者享受着真正的经济优势。他借此机会在一个很长的注释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简略的批评。

这也许意味着“殖民主义体系”的概念在根本上始终不能从唯一的短暂或长久利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也许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阶段）的教条需要修正，特别是因为这种教条最终确立了——有时以隐匿的方式——殖民现象最平常、最为人所接受的定义。

正如向友人们所表示的那样，德里达维护热尔曼那·蒂里庸（Germaine Tillion）和阿尔贝·加缪那种复杂而微妙的立场，尽管这立场被某些人“出于他们两人都不支持的利益”加以利用。不能因为“极端者”使用过某个论点就将其抛开，也不能轻率地认定“客观上的同谋”。一旦不小心就会落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们总是以此种方式开始，革命者和其他人都是如此。“关于热尔曼那·蒂里庸，你说‘在戴高乐之前我们已足够成熟，可支持戴高乐主义’，或许吧。而我，我常常惋惜地看到，对于阿尔及利亚而言，这不曾更加真实，也不曾来得更早些……”

关于前一年去世的加缪，德里达进行了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加详尽的分析。

首先,我认为你对《局外人》的那几页论述的立意十分出色。我一直将这本书当成一本阿尔及利亚的书来读,萨特加诸其上的全部哲学批评在我看来确实减弱并掩盖了它的意义及其“历史”独特性,而且也许首先在加缪本人眼里亦是如此,他太快地被当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在不久以前,我还经常出于同样的原因像你那样评判加缪。我不再知道这是否诚实,也不知道他的一些警告是否在明天看来仍是清醒的和源于基本的要求。很多东西,首先是他全部的过去,让我们赞赏加缪身上纯粹而清晰的意愿。<sup>①</sup>

151

加缪一直为之奋斗的这样一个法国—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也是德里达所希望的。尽管知道这个梦想已不合时宜,但他仍然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爸爸的阿尔及利亚”的面貌。<sup>②</sup>

几周之后,诺拉感谢他写下了“如此密集深刻的文字,需要再写一本书”才能够回复他。他感到自己催化了德里达的个人思想,并幸运地摘到了其成熟的果实。诺拉希望他们再次见面,进行更加自由的讨论。他承认自己写下这本书有些鲁莽。“我以为讲述了我在那里逗留的时光,思索了我看到的事,但如果从正面就此主题进行全面论述的话,我就得做一篇论文,那令我望而却步。”<sup>③</sup>

两人在6月底一起度过了一个很长的晚上,进行了充满信任的讨论,并不试图得出结论。德里达说,他对这次交流很满意。尽管有些时候讨论似乎在打转转,但在他看来他们的分歧“是只是相互赞同的方式,或与自己产生分歧的方式。而如果不到达这个境地的话,怎能对阿尔及利亚——或其他事情——进行严肃的思考呢?”德里达以为诺拉愿意就几点进行公开解释,具体方式是他发表一篇对此书的介绍,诺拉作出答复。但德里达“出于千万条理由,绝不可能撰写评论文章”。对亲友的保护很可能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不反对把这封长信全部或部分匿名发表,只署上“一位阿尔及尔朋友”<sup>④</sup>。这一计划看来未能付诸实施。

152

① 德里达致皮埃尔·诺拉的信,1961年4月27日。

② 在一篇出色的文章“Liberalism and the Algerian War: The Case of Jacques Derrida”(*Critical Inquiry* n°36, hiver 2010)中,Edward Baring详细分析了德里达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将这封致皮埃尔·诺拉的信同1952年在高师预备班时的一篇历史作业“Causes, caractères et premières conséquences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de 1888 à 1914”联系起来。根据Baring的推断,德里达这位未来的《他者的单语主义》的作者的态度与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殖民者的。在文章更远处他似乎惋惜地提到德里达没有在1960年的《121宣言》上签名。但在我看来,这是忘记了德里达当时完全默默无闻,没有人会想到请他签名,而且如果签名的话,他将置仍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家人于很大的危险中。

③ 皮埃尔·诺拉致德里达的信,1961年6月22日。

④ 德里达致皮埃尔·诺拉的信,1961年6月30日。

几周之后，德里达从埃尔-比亚又给老校友寄了一封信。

我正在此度过奇特的假期：在些许工作和享受大海的幸福之间，在这个奇特的社会，整日回味着那些无解的问题。我发现我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这疯狂的愛同我长久以来宣称的对它的厌恶并不矛盾。<sup>①</sup>

这将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也许他已想到，只是未曾承认。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恐惧已真实可触。在埃尔-比亚，一个老人就在自己家门口被割喉。一位表姐的儿子查理在杰基和玛格丽特在弗莱斯纳的家里住了一年，因为家人担心他被害。在那里，他产生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后来说这次逗留拯救了他的一生。

※ ※ ※

就在此动荡的局势下，德里达终于在1961年7月完成了《几何学的起源》导论，草稿写在抬头是“文学与人文科学院，殖民的历史”的纸上。开学时他将打字稿带给了让·伊波利特，后者说急于看到文章付梓。10月，在一封极为简短的信中，伊波利特肯定地说“怀着很大的兴趣（并非客套）”读了这篇十分详尽的导论，并说它“准确地跟踪了胡塞尔思想的曲折历程”<sup>②</sup>。这如此简短的意见并不足以平息德里达在发表自己第一部作品时的焦虑。

153 11月24日，他给保罗·利科写了一封语气极为不同的长信，在这篇导论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他坚持请利科先过目：“您的判断对我至关重要。”德里达在导论中多处暗指利科的文章，他特别希望利科对其有效性进行评判。他说“尤其为引用在世的哲学家感到苦恼”，担心找不到“恰当的口吻”。他也遗憾地表示，在他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没有告诉利科他对其著作的“巨大而忠实的敬仰之情”，并希望向他解释“出于怎样偶然的原因”而没有请他指导自己的论文。<sup>③</sup>几周之后，德里达惊讶于没有收到一点回音，不得不将信重写了一遍并再次寄出，因为利科把信弄丢了。利科为这疏忽感到抱歉，说自己年轻助教信中流露的全部“倾诉与腼腆”令他深为感动。

① 德里达致皮埃尔·诺拉的信，1961年8月4日。

② 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61年10月23日。

③ 德里达致保罗·利科的信，1961年11月24日。

我猜想在两代人之间极难找到恰当的口吻。我想到美国，在同样的情形下，大学教员之间的关系要更容易相处一些。请允许我对您说我热切期望看到我们的分歧（我们相互的立场使之不可避免）融入沟通与友谊。让我们信任大胆的表达和时间的考验吧。<sup>①</sup>

在随后的两年里，德里达和利科接近起来，几次共进午餐或晚餐，有时在太太们的陪同下。但这时的德里达还十分腼腆，在社交场合颇不自如。利科则事务缠身，在《几何学的起源》出版之前似乎没有仔细读过这篇导论。德里达仍旧对自己的书稿怀有疑虑，为了有一个更加坦白直接的意见，他转向阿尔都塞。

仔细读过文章之后，他的前导师在1962年1月9日对他肯定地说，从没读过“如此审慎、如此深刻智慧的关于胡塞尔的文章。深刻的智慧，超越了对一般矛盾的陈述，去寻找最隐匿的意图与原因，以揭示其表达的秘密”。他确信德里达比其他“战斗失利时便放下武器”的诠释者走得更远：“你一直走到了尽头，虽说无论如何人们总能够选择不追随胡塞尔（读你的文章让人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看到成为胡塞尔主义者是可能的，也看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他还说很高兴从中认出了德里达目前思考的出发点：文字、“超验”病理学、语言。“要继续下去：你关于文字的段落已然意义重大，大有可为。”阿尔都塞认为文章整体是一流的。“我度假归来（雨、雪、雾），打开了你的文章：它对我是光明和巨大的快乐。”<sup>②</sup>他借机邀请德里达到他在高师的小屋做客，他尤其希望同他再次讨论胡塞尔和黑格尔及海德格尔的关系。

这邀请并非空言。从短期看它帮助德里达重拾了些许信心。他只梦想着“能够用鲜活的、共同的、自由对话中的工作取代这指向‘课程’或‘成果’的矫饰的、不人道的和产业化的紧张压力”。索邦大学令他筋疲力尽：他的课似乎很受赞赏，但他抱怨用自己最清明的时光去批改那些通常了无趣味的作业。“有些日子，疲劳让我从这一切中感到的只有喘息、磨蚀和无谓的牺牲。”<sup>③</sup>

※ ※ ※

眼下，阿尔及利亚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兀地呈现在他面前。从1962年年初起，秘密军队组织将行动扩大到了法国本土。巴黎发生了好几起塑性炸药爆炸，其

① 保罗·利科致德里达的信，1961年12月27日。

②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62年1月9日。

③ 德里达致路易·阿尔都塞的信，1962年1月15日。

155 中一个就瞄准了萨特的公寓；另一起针对马尔罗的谋杀令一个四岁小女孩毁容。左派最终联合起来，成立了“致力于协商和平以及反对秘密军队组织全国行动委员会”。2月8日，一次游行被禁止，后遭到警察总监莫里斯·巴蓬（Maurice Papon）的野蛮镇压；9人死在沙罗纳地铁站的栅栏边。5天之后，人们组成庞大的队伍向死者致敬。

《埃韦安协议》于1962年3月18日签署。停火应当在第二天实行。冲突造成40多万人死亡，包括所有种族阶层，其中大部分是阿尔及利亚人。从4月起，欧洲人开始大规模返回本土。但杰基仍然相信各族群有可能共存，建议家人留在埃尔-比亚。几周之后是全面溃散。大多数人措手不及，尤其是犹太家庭，他们同德里达和萨法尔家族一样，在阿尔及利亚定居已久，从未想到必须离开。人群拥挤在岸上，尽管船只接纳的人数已远远超限。无穷尽的汽车列队排在从阿尔及尔到白屋机场的路上。很多人宁愿毁坏行李、烧掉汽车，也不想将之抛弃。<sup>①</sup>

德里达的妹妹一家最先到达。玛格丽特回忆道：“快到9月底时，我们收到雅尼娜和她丈夫的电报，告知他们要来，此外没有别的内容。我们在奥利机场待了两天，不知道他们上了哪架飞机。到处一片混乱。最终雅尼娜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到达：玛蒂娜、马克和米歇尔。所有人都在我们在弗莱斯纳的家里临时住下来。最后在我们四间屋子的公寓里住了17个人。我们找了几张床，但孩子们睡在地上的垫子上。”

156 当时8岁的玛蒂娜对这段时间保留着一些精确的回忆：“要安排好一切相当复杂。杰基常常带着我和弟弟马克去巴黎。有时我们得在他的车里等很久，就在高师的院子里——还是在索邦大学？他对我们说，他得拿沙丁鱼罐头去喂‘鲸鱼索菲’。他叫我们耐心，因为‘索菲’不太好对付，只让他靠近……我多年之后才明白索菲就是哲学。”<sup>②</sup>

几周之后，轮到勒内及其家人离开阿尔及利亚。“起初是秘密军队组织想阻止我们离开，最后是民族解放阵线。无论在哪边都受到威胁，被视为‘温和’的人尤其遭到敌视。我们抛下我们的药店在6月15号出发。我们只带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像要去度假，但实际上我们只有离开的时间。那天就在去机场的路上还发生过一次抢劫。”<sup>③</sup>

7月1日终于全民公决，压倒多数的选民投票支持独立。还没有等到正式结果，狂喜的群众已挤满了阿尔及尔的街道，挥舞着带有星星和红色月牙的绿白两色旗帜。

① *Alger 1940—1962, op. cit.*, p. 250-257.

② 同玛蒂娜·麦斯凯尔的访谈。

③ 同勒内和埃芙琳·德里达的访谈。



还没有回到法国的移民加快了脚步，现在他们只剩下在“行李和棺材”之间选择了。两周之后，刚刚结束了索邦大学的考试，杰基回到埃尔-比亚帮助家人带走一些东西。勒内不愿再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他在那里的最后几周看到了太多可怕的事。雅尼娜的丈夫皮埃罗及其兄弟雅基·麦斯凯尔（Jacquie Meskel）也同德里达及父母一起出发，试图抢救出更多东西，但他们立即受到威胁，不得不迅速返回法国。杰基虽然也冒着风险，但仍然独自与父母在一起。随后的几天，他们尽量帮雅尼娜和勒内搬家。但行李都塞满了，只能带走很少的东西。他们将大门关在身后，希望几个月之后局势稳定下来再回来。邻居们立刻占领了这些房舍，刚开始的几个月还交给他们房租。随后，埃梅和乔吉特刚刚还完贷款的房子成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财产。在法国，勒内和皮埃罗经过漫长的程序才使他们的权利得到认可，并找到新的生意。逐渐地，像许多其他“归国者”一样，整个家族聚集在尼斯。<sup>①</sup>

157

※ ※ ※

虽然早已离开埃尔-比亚，德里达却永生难忘这裂痕。岁月流逝，他将日益频繁地追忆他无法释怀的“阿尔及利亚乡愁”（nostalgérie<sup>②</sup>）。同人们认为的相反，这个新词并非德里达的创造。它最初是马赛罗-法布里（Marcello-Fabri）于1920年代写的一首诗的标题。

阿尔及尔，我像怀念恋人一般梦到你  
 芳香的、灿烂的、奔放的你；  
 你因遥远而更加美丽，这里的  
 雨，雨如同魔术遮盖了  
 天空的灰暗，用你阳光的金黄……<sup>③</sup>

在家庭与个人的伤痛之外，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成为他政治思想形成的根源之一。在法国，德里达很长时间避免当众谈论这个仍然会引发论战的主题。但他1987年在日本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承认，就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为独立而战的同时，他在很长时间里也希望达成“一个能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继续在这个国家生活的解决办

① 同雅尼娜·麦斯凯尔-德里达、皮埃尔·麦斯凯尔、勒内和埃美琳·德里达的访谈。

② 这个词由“Algérie”（阿尔及利亚）和“nostalgie”（乡愁）两个字结合而来。——译注

③ Marcello-Fabri, “Nostalgie”, in *Alger 1860—1939, Autrement*, coll. “Mémoires” n° 55, 2001, p. 94.

法”，“一个不同于现有方式的独特的政治解决方案”<sup>①</sup>。

他将始终忠诚于这一很少有人认同的基本信念。2004年6月22日，他在自己参加的最后一次电视节目中称，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倾向于一种有别于两个主权国家的解决方案。他说：“即便是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我虽然赞成独立运动，但我更希望有另外一种和解方式，能让阿尔及利亚人少受些苦，也能使主权这一僵硬的无条件式受到挑战。”<sup>②</sup>

德里达晚年关于宽恕与和解、不可能性与好客性的阐述，在我看来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段阿尔及利亚伤痕的反映。1990年代，因了纳尔逊·曼德拉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物，南非的情形仿佛证明德里达为阿尔及利亚设想的模式并非绝对是空想。在谈论种族隔离及其未来或巴以冲突时，他不断地回顾阿尔及利亚，回顾在自己身上存在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这些，其余一切都不可理解。

“我的青春期一直持续到32岁”<sup>③</sup>，德里达在最后的几次访谈之一中这样说。完成第一本书，确定启用新的名字，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年的这些事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sup>④</sup>这一转折的后果将从随后的几个月开始显示出来。

---

① Derrida, “Les mots autobiographiques - pourquoi pas Sartre”, 1987年3月23日，在日本发表的访谈，IMEC档案。

② “Cultures et dépendances”, France 3, 22 juin 2004.

③ “Les voix d’Artaud”, entretien avec Évelyne Grossman,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434, septembre 2004.

④ 让-吕克·南希也认为1962年是一个重要转折。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德里达的独立》（“L’indépendance de l’Algérie, l’indépendance de Derrida”）一文中，他将“延异”概念的出现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比较，说这里形成的不是“在一个起源中的重建，而更多的是对尚未到来的‘起源’的创造”（*Derrida à Alger. Un regard sur le monde*, Actes Sud-Barzakh, 2008, p. 19-25）。

## II

德里达

**Derrida**

1963—1983



# 第9章 从胡塞尔到阿尔托

## (1963—1964)

《几何学的起源》出版时只署名“胡塞尔”，“雅克·德里达翻译并介绍”的字样仅出现在标题下面。这第一部出版物正式确定他不再使用杰基的名字。对于后来将签名问题作为完整的哲学主题进行探讨的德里达来说，这个决定要比表面上看起来重大得多。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161

我开始发表作品时便改了名字。简言之，这是进入正当的文学或哲学空间的时刻，我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着这个空间的“礼仪”。我发现“杰基”不是一个可能的作者名，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半假名，它的确同真名很接近，但变得十分法国化和基督教化，而且简单，我这么做必定抹去了比我用两句话能说出来的要多得多的东西。<sup>①</sup>

《几何学的起源》是一本在很多方面相当奇特的书。首先，在字数上，胡塞尔的文字只有43页，而德里达的导论却占了170页。但主要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巨大的模糊性。刚开始德里达显得很谦逊：“在本文里，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辨认并安置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阶段，包括其特定的预设和未完成性。”<sup>②</sup>看起来他好像只是努力接近胡塞尔的意图。事实上，越是深入阅读这篇迷宫似的带有长注的分析文章，就越看出德里达似乎“怀有些许过度的雄心，想向我们介绍完整的胡塞尔现象学”<sup>③</sup>，甚至对之提出质疑。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一些他将在以后作品中大力阐发的概念162

① 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354.

② Jacques Derrida, “Introduction”, in Husserl,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PUF, 1962, p. 5.

③ Rudolf Bernet, “La voie et le phénomène”, in Derrida, *la tradition de la philosophie*, Galilée, 2008, p. 67. 与标题暗示的不同，此文是对《几何学的起源》导论的详尽且具有启迪性的阅读。

以相当隐晦的方式出现了，如“原初的延迟”（retard originaire）、“延异”（différance）。

除了保罗·利科和陈德滔，德里达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当代哲学家。能够感觉到他越过正式诠释直接进入胡塞尔文本的意愿。他没有引用萨特，在提到梅洛-庞蒂时并不隐瞒自己试图作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诠释”<sup>①</sup>。在这篇导论里，他出人意料地将埃德蒙·胡塞尔和詹姆斯·乔伊斯联系起来。他用好几页的篇幅将“胡塞尔追求的单义性（univocité）与乔伊斯广泛的模糊性”进行对比。前者意欲“系统地将经验语言简化或贫乏化至透明”，后者则在文字中显示出“在每个语言因子的灵魂里埋藏、积累和混合着的意向的最强大力量”，这文字“同时在所有语言中穿行，累积其力量，显示其最秘密的和音”<sup>②</sup>。这奇异的对比同德里达其余的评论反差很大，似乎使作为现象学家的德里达同自己的另一面相冲突，后者萦绕于心的是文学和超越话语意愿的文字。

虽然这第一部作品的技术性很强，德里达却远未放弃更接近文学的计划。尝试过几次为期刊撰稿后，他计划同米歇尔·莫诺里写一本小书，后者兵役归来后在奥尔良教法语。莫诺里的文学学位论文是《夜晚的加斯帕和散文诗的诞生》。德里达向他提议一起写一部关于阿洛伊修斯·贝特朗的作品，在塞戈尔（Seghers）出版社的“今日诗人”丛书中发表。<sup>③</sup>这个想法本来有可能实现，如果出版人表现出一些热情，而不是告诉他们出版计划已经排满好几年，“不可能考虑……出版一部关于贝特朗的作品”<sup>④</sup>的话。但这多少有些奇特的想法难道不是首先为了找回那开始减弱的诚挚友谊吗？



大型媒体和一般公众并未留意《几何学的起源》的出版，但它得到了哲学界的

① 十分奇怪，德里达同莫里斯·梅洛-庞蒂几乎没有过个人接触。似乎只在1950年或1951年见过他一次，当时《知觉现象学》的作者在主持高师哲学口试。根据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的说法，德里达还同梅洛-庞蒂通过一次电话，大约在1956年或1957年他翻译《几何学的起源》时。德里达在于姆街度过的四年间从未去附近的法兰西学院听过梅洛-庞蒂的课，后者在那里从1952年开始执教，直到1961年5月去世。1959—1960年，德里达在勒芒期间，梅洛-庞蒂上课的内容是他所称的胡塞尔的“未思想处”（l'impensé），主要依据就是《几何学的起源》（*Notes de cours sur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de Husserl* 于1998年由PUF出版）。但德里达和梅洛-庞蒂的研究工作完全是独立进行的。尽管对萨特的一些抨击相当激烈，德里达仍感到同梅洛-庞蒂有更多亲近感，对他的阅读也更多。他在《盲者的记忆》（*Mémoires d'aveugle*, 1990）和《触感：让-吕克·南希》（*Le toucher*, Jean-Luc Nancy, 2000）中对梅洛-庞蒂有过长篇论述，但仍然带有相当的批判性。

② Jacques Derrida, "Introduction", in Husserl,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op. cit., p. 104-107.

③ 德里达和莫诺里致皮埃尔·塞戈尔的信，1962年11月2日。

④ 塞戈尔致德里达和莫诺里的信，1962年11月15日。

注意和赞赏。德里达真诚钦佩并称为“哲学超我”的认识论大家乔治·康吉莱姆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

已经很久了——有好几个月之久——我不曾搁置一切将一本书一口气读完，由此我衡量您作品的价值，因为我不间断地读完了您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论，怀着少有的精神上的满足感。……一开始，我在比较导论与原文的篇幅时忍不住笑了。但我没有再发笑，而是对这篇导论的长度很满意，因为最终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第一个对您充满信任的不是我，是伊波利特。我的信心来源于他，而我现在找到了理由。<sup>①</sup>

164

康吉莱姆向德里达表示祝贺，希望他的工作“和刚刚达到如此成功境地的作品一样成果丰硕”。他将从言语过渡到行动，成为将著名的让-卡瓦耶奖颁发给《几何学的起源·导论》的主要推手。

几周之后，在1961年出版《古典时期的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之后声誉日隆的米歇尔·福柯也向他“亲爱的朋友”表达了兴奋之情。

我等到安静地并且反复地阅读了你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论之后才向你表示感谢。现在已经很清楚。我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你我的敬佩之情。此外，我知道你对胡塞尔有着多么完美的理解。我读你的文章时感到你让哲学研究的可能性浮现出来，现象学一直在承诺这些可能性，但或许也一直在使之枯竭；而这些可能性就在你手中，就从你手中经过。也许对我们来说——直到很久以后——哲学的第一行为就是阅读，你的阅读恰恰证明了这样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它具有如此庄严的诚实。<sup>②</sup>

在索邦大学，这第一部作品也产生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利科发起了一个研讨课，致力于胡塞尔研究。他希望德里达在第一次课上就来介绍他关于《几何学的起源》的工作。“这一邀请表达了……我对刚刚研读完的您的作品的钦佩。”<sup>③</sup>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德里达经常参加研讨课上气氛友好而严谨的讨论。一部分在鲁汶制作的微型胶

① 康吉莱姆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月1日。

②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月27日，引自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109-110。

③ 利科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3月5日。

片保存在巴黎。在很久之后的一封信中，利科提到同德里达一起围绕着这些手稿进行的工作，说这些工作激起了他们对“这样一部具有精神诚实性的典范作品的景仰”<sup>①</sup>。

165 《几何学的起源》的出版也增加了德里达在索邦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说：“1960年代初，尽管梅洛-庞蒂突然离世，但现象学看起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德里达在他指导的范围内建议有此愿望的学生组成小组，每组钻研一个同胡塞尔现象学有关的确切主题。我于是参加了两个研究小组，每周在校外聚会一次，第一组研习《逻辑研究》，第二组由像我这样讲德语的学生组成，着手翻译《观念Ⅱ》。德里达每学期一次亲自参加每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这对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浸淫在胡塞尔的思想中，还能得到致力于向其考问的人的指导。”<sup>②</sup>

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仿佛为了追赶失去的时间，德里达的进展令人眼花缭乱。他建立起了重要的联系，许多地方请他撰写文章、参加研讨会。他撰写《几何学的起源》导论曾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此刻却将写下好几篇不同主题的重要文章。似乎这些约稿让他发现了自己，正如他在给福柯的信中所解释的，他正在寻找自己特有的文字。

大学的工作，在当今社会为其限定的形式——特别是大学的形式——下使我痛苦地远离……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使命（这使命同时也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掩盖它的东西同时也保护我，让我安心）：一种哲学的写作，在其中我可以“我”，可以讲述自己而不感到《形而上学日记》的羞耻和欣悦。<sup>③</sup>

166 让·华尔刚好请他在著名的哲学研究院自己选择主题作讲演。德里达决定讲述给他留下强烈印象的《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尽管从第一次阅读时他就没有向福柯掩饰“内心深处些许沉闷的抗议，无法成文抑或尚未成文的抗议”。这让他想撰写这样的文章：“应该算忠于此书，类似对理性的赞美。”<sup>④</sup> 一年以后，他十分谨慎地向福柯阐述了自己的写作构想。这篇文章将大为出名，并彻底动摇他和自己旧日老师的关系。他在圣诞节期间“带着不断更新的喜悦”重读了这本书，现在试图就其中关于

---

① 利科致德里达的信，2000年4月7日。

② 同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的访谈。

③ 德里达致米歇尔·福柯的信，1963年2月3日。Gabriel Marcel, *Journal métaphysique*, Gallimard, 1927.

④ 德里达致米歇尔·福柯的信，1962年2月2日。



笛卡尔的几页“炮制一篇讲演”：“我想我将试图阐明——大体上——你对笛卡尔的解读是正当而且富于启发性的，但在在我看来，在与你不同的文本深度上，我觉得我的解读也许和你并不完全一致。”<sup>①</sup>

该信的附言亦非随意而为。德里达向福柯每周一晚上的广播节目表示祝贺。前一周关于安托南·阿尔托的节目令他尤为印象深刻。“很久以来，我对阿尔托的看法同你的所说所想是一致的。我应该重新阅读他，或者更好、更仔细地阅读他……”

1963年3月4日星期一晚六点半，德里达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对面莱纳街44号的哲学研究院发表了他第一次在巴黎的演讲：《我思及疯癫史》（“Gogito et histoire de la folie”）。米歇尔·福柯在座。德里达在讲演开始时向《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表示敬意，说这是“在许多方面令人景仰的著作，具有强有力的气势与风格”。他说自己曾是福柯的学生，感到作为“充满敬仰与感激的弟子”，在这如果不是“争论”，至少是“同大师对话”的时刻，他处在一个微妙的地位。但很快，德里达表明了他的倾向。

我的出发点也许显得薄弱和矫饰。在这部673页的书中，米歇尔·福柯用了3页（第54~57页）——而且是作为第二章的序幕——来解读笛卡尔《沉思录》第一篇中的一段，在这段话里，癫狂、怪诞、疯痴、精神错乱，似乎，我说的似乎是，从哲学尊严的圈子被驱赶、排除、放逐在外，被剥夺了哲学的公民权以及接受哲学思考的权利，在法庭上，在本质上不可能疯狂的我思（Gogito）的终审法庭面前，被笛卡尔刚刚提起传唤即遭撤诉。<sup>②</sup>

167

尽管对这一段的阅读看上去很不全面，它对德里达来说却构成了巨大的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福柯全部工作的意义可能就集中在这含蓄而有些费解的几页当中”。德里达逐词解读《形而上学沉思录》的第一篇，并上溯到拉丁原文，由此出发耐心而系统地对福柯的诠释提出了质疑。一步一步地，全书的设定，直至疯癫的定义，都为他的分析所干扰或动摇。

福柯的第一反应相当积极。他看起来准备考虑德里达的批评，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能让人感觉到9年之后将发生激烈的论战。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福柯的信，1962年2月3日。

② Jacques Derrida, “Cogito et histoire de la folie”,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52.

那天，你可以想象，我没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感谢你：不全是，也不只是因为你讨论我时所说的过于宽容的话，而是为了你给予我的巨大而美好的关注。你演讲的正直性让我深为震动，以至当时我所能说出的话狼狈而笨拙，你的演讲毫无挂碍，直接深入我想要说的东西，甚至至更远。我在我的论文中可能过于鲁莽地处理了我思和疯癫的关系：我经过巴塔耶和尼采，经过无数转折才缓慢地回到这里。而你，光明正大地指出了一条笔直的道路：你很知道为什么我应向你深表谢意。

再见到你我将无限快乐……只要你愿意。请相信我深沉忠实的友谊。<sup>①</sup>

168 几个月后，当德里达的演讲即将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上发表时，福柯再次肯定地对德里达说——口气有了微妙的变化——“你的文章要发表了，我最终认为这很好（我在这里自私地这么说）。只有盲目者才会认为你的批评很严厉。”<sup>②</sup>在“怀着热情重读”了编辑好的文章后，他再次说“确信它直达问题深处，如此彻底，如此全面，让我完全处于疑难之中，又开启了我没有想到过的崭新思路”<sup>③</sup>。这友好的关系将持续几年。后面我们将看到它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恶化的。

《几何学的起源》的出版让德里达同路易大帝高中和高师的几个旧日同学恢复了联系。米歇尔·德基已出版了四部著作，包括在迦里玛出版的两部诗集，他建议德里达向著名的期刊《批评》(*Critique*)投稿。这部期刊由乔治·巴塔耶创办于1946年，在他1962年7月逝世后由其内兄让·皮埃勒(Jean Piel)执掌，后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中有罗兰·巴尔特、米歇尔·德基和米歇尔·福柯。

对于1960年代初一名年轻的知识人，《批评》是理想的出版物。德里达的一些老同学如阿比拉舍德、格拉奈尔和热奈特都已在上面发表文章，那一代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家亦然。与《现代》、《精神》或《原样》(*Tel Quel*)<sup>④</sup>不同，《批评》并非出自某一圈子或团体。正如巴塔耶所希望的，这本期刊涵盖各个领域。月复一月，它推出针对法国或国外发表的书籍或文章远不止是单纯评介的研究文论：“通过它们，《批评》试图对人类种种精神活动在文学创作、哲学研究、历史、科学、政治和经济

---

①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3月11日，引自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op. cit.*, p. 115-116。

②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0月25日。

③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2月11日。

④ 又译《太凯尔》或《泰凯尔》。——译注

知识等领域提供尽量全面的概貌。”<sup>①</sup>

德基——他将在这本期刊发表第一篇关于德里达的文章《再读胡塞尔》<sup>②</sup>——肯定地告诉德里达可以提交几乎“你所希望的无论多长”<sup>③</sup>的文章。他还不知道对德里达而言这个“几乎”是很恰当的。德里达先想到写一篇关于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的评论。但因为感到这个主题需要暑假安静的时光，他打算先写另外一篇文章，评论让·鲁塞（Jean Rousset）最近由约瑟·考蒂（José Corti）出版的《形式与意义——从高乃依到克洛代尔的文学结构》。米歇尔·福柯也很高兴看到他第一次为《批评》撰稿。

对于德里达，从这时起，写作就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全身心投入。积累笔记之后，他以高度庄严的仪式开始手写。

对于那些对我很重要的文章，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宗教感的文章，我连自来水笔都不用。我把一个长长的蘸水笔杆浸入墨中，用一种笔尖略弯的绘图蘸水笔写下大量草稿和初稿，最后用我在国外买的带国际键盘的小奥利维蒂打字机把它打出来。<sup>④</sup>

他在1963年4月底完成了这篇文章。让·皮埃勒几乎立刻作出回应，既热情又困惑。文章的高水准及其提出的如此现实的问题让他很高兴刊登在《批评》上。但其长度——40多页——令他吃惊，也许最好将之分成两部分。这个主意不太让德里达振奋，皮埃勒最终决定在六七月合刊上全文刊登《力量与意义》。

文章以一个条件式句子开始，拔兀、庄重而忧伤：“如果有一天结构主义退去，将其作品和符号留在我们文明的沙滩上，那么它对于思想史家将成为一个问题。”<sup>⑤</sup>结构主义要到三四年之后才在法国公众那里达到巅峰，而对年轻的德里达来说，它已不过是过去的东西，是一种余生。

《力量与意义》的语调不知来自何处——或许来自莫里斯·布朗肖。它高屋建 170

① 1946年6月《批评》第一期的编者按。Sylvie Patron, *Critique, 1946—1996, une encyclopédie de l'esprit moderne*, éditions de l'IMEC, 1999。

② *Critique* n°192, mai 1963。

③ 德基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月6日。

④ Jacques Derrida,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152-153。

⑤ Jacques Derrida, “Force et signification”, *Critique* n° 193-194; repris dans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9。我有意如德里达希望的那样在标题中使用小写字母，他想避免用大写字母使得文字、差异、声音或现象等词显得庄严。

瓠，旁征博引——莱布尼茨和阿尔托、黑格尔和马拉美（Mallarmé）——看似出自无名，但当时的人们必定感到了其文风与思想的重要性。文章对鲁塞的著作加以褒扬，但批判了其中一些基本的假设，对他冷酷地称为“最精微的结构形式主义的酩酊大醉”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抨击。“在鲁塞为我们带来的重新阅读中，从内部威胁光明的东西也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威胁整个结构主义的东西：就在发现意义的行为当中隐藏意义。”<sup>①</sup>用马尔罗的话来说，这是哲学概念野蛮地闯入文学批评。这篇长文在四年之后开启了《书写与差异》一书，它也许构成了不久后被称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奠基行动。

※ ※ ※

德里达在1963年看起来不知疲倦。以出色的胡塞尔专家的形象引人注目之后，他正在成为巴黎知识界一个重要角色，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长子皮埃尔于本年4月10日出生不久，他又投入为《批评》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当中，这篇文章较短，谈的是迦里玛新近出版的一部作品——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的《问题之书》。德里达当时还不认识雅贝斯，后者1912年出生于开罗一个讲法语的犹太家庭，因为犹太身份不得不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离开埃及。他1959年的第一部诗集《我建筑我的住所》受到了苏佩维埃尔（Supervielle）、巴什拉和加缪的赞扬。《问题之书》是一个由七部书组成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

171 《埃德蒙·雅贝斯和书的问题》全无传统评论之风。此文大量引用原诗，穿行其中并以一种移情的形式加以延续。这是德里达第一次谈到犹太教，可明显看出雅贝斯和他有着类似的关注。

雅贝斯承认很晚才发现对犹太性的某种归属感，对他来说，犹太人只是受苦的寓意：“你们都是犹太人，就连反犹者也是，因为你们是由殉难者指定的。”于是他必须向自己不再是想象中的同族兄弟和拉比们做出解释。所有人都将指责他的普世主义、本质主义、干枯的寓意，还有将事件在象征和想象里的中和。

对着我，我同族的兄弟们说：

“你不是犹太人。你不去犹太教堂……”<sup>②</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44.

② *Ibid.*, p. 112.

但至少同样吸引德里达的，是雅贝斯不断指出的文字与犹太教的关系：“身为犹太人的困境混同于写作的困境，因为犹太教和文字恰是同样的等待，同样的希望，同样的磨蚀。”<sup>①</sup>

德里达的这篇文章到1964年2月才发表。但雅贝斯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此事，并在1963年10月4日第一次给德里达写信。他一读过手稿就向德里达表达了激动之情：“太出色了，我必须立刻对您说。……您所开启的就是我冒险跋涉而事先并不知道会被带向何方的道路。读您的文章让我感到这道路被您如此清晰地勾画出来，似乎我一直就知道它的名字。”<sup>②</sup>几个月之后，他再次为这篇研究的明晰性而感谢德里达：“我因您而感到巨大的欢乐。今后，读过您文章的人将更加深刻地理解我。”<sup>③</sup>德里达由此开始了同雅贝斯及其妻子阿尔莱特的热烈友谊；他们就住在高师附近的木剑街，见面很容易。

同雅贝斯的密切来往还带来了另一份也许更加重要的友谊，该友谊将德里达和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相连，后者是当时一位重要人物，但今天多被遗忘。布努尔出生于1886年，当时已相当年迈，他只在萧沅主持的丛书“行走”中出版过唯一一本书《广场上的游戏方格》。但他在《新法兰西杂志》（NRF）和其他几种杂志的固定专栏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他让公众认识了马科斯·雅各布（Max Jacob）、皮埃尔·让·儒弗（Pierre Jean Jouve）、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皮埃尔·勒维蒂（Pierre Reverdy）和于勒·苏佩维埃尔，还有乔治·舍阿德（Georges Schehadé），并为雅贝斯的第一本书作序，后者说这本书是“在他的注视下”写成的。他是高师学生，最早的抵抗成员，在开罗和拉巴特的大学执教，也作为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缔造者出现，而这个问题那时已深深吸引德里达。<sup>④</sup>

172

在雅贝斯的提议下，德里达给布努尔寄去了自己所有已发表文章的单行册，并伴以长信。布努尔每一次都极为仔细地给予回复。他们尚未相遇，但从最初的通信开始，德里达就以全部的信任向布努尔倾诉心声。他说起自己并不称意的情况，亦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脆弱和犹疑。

您的信令我感动，让我不顾谨慎向您倾诉。我知道您听到了我的声音，知道您愿意以信任和慷慨的同情心听取我的声音，没有什么更让我受鼓舞了。请放心，

①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100.

② 雅贝斯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0月10日。

③ 雅贝斯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2月13日。

④ Danielle Baglione et Albert Dichy, *Georges Schehadé, poète des deux rives*, IMEC, 1999, p. 47.

我了解这份价值，我对您的敬仰从很久以前就已让我有所准备。您的鼓励与威望是我最巨大、最迫切的需要。因为无数的原因，尤其因为我置身于……哲学家的圈子，并且处在另一个圈子——巴黎文学界——的边缘，在其中我感到十分痛苦，十分孤独，不断受到恶意或误解的威胁，不断感到转身离去的欲望，却不知朝向何方。我热爱教学，但它令我深感疲惫，而且从根本上让我无法全神贯注（正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十分可敬的借口，并能得到人们所称的“成功”的机会）于我预感到对我来说关键的、我希望写作的东西，而这需要另一个人生。<sup>①</sup>

173 两人1964年春在巴黎会面。从那时起，年轻的哲学家与他眼中“这奇异道路的照亮者”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之间的友情变得尤为强烈。德里达为这转向自己的关注而感动和胆怯，他“很久以来就了解其慷慨、力量和要求”。

与您相处让我受到鼓励，感到安心，得到肯定。此外，当然，还有情感，这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暴露于同样的风险、同样的威胁、同样的质询，并受其影响时，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读过您的著作之后，遇见您并能够与您交谈，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sup>②</sup>

德里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章关乎列维纳斯。这是有关这位1906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哲学家的第一篇翔实的论文，当时列维纳斯59岁。他从1920年代起就是布朗肖的朋友，先是胡塞尔后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在整个二战期间都被关在德国。194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著作《从存在到存在者》。此后，他经常参加哲学学院的研讨会，同时主持世界以色列大会（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的师范学校。他的论文《整体与无限》于1961年在海牙尼霍夫（M. Nijhoff）出版社相当秘密地出版。通过保罗·利科，德里达立刻发现了这部作品，正如他在后来给利科的一封信中所说：

我还记得那天，我猜您已经忘记了（那是在1961年或1962年，我是您在索邦大学的普通哲学助教），我们一起在您的花园散步。您刚刚读完《整体与无限》，就在一次论文答辩之前，我想您是答辩委员会的评委。您对我谈到这本“巨著”，把它当成一件大事。那时我还未读此书，只了解列维纳斯关于胡塞尔、

---

①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4年1月25日。

②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4年4月27日。

海德格尔等的一些“传统的”——然而是多么出色的——研究。第二年夏天，我读了《整体与无限》，并开始撰写一篇长文，随后是另一篇，自此他的思想再未离开过我。<sup>①</sup>

德里达利用1963年夏天相对安静的时光撰写文章《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思想》。但在打字时，他很快意识到这篇文章“很长，太长了”<sup>②</sup>。米歇尔·德基看过之后立刻表示同意：“你写了一本书！加上你特有的注释方式，总共有100多页！”<sup>③</sup>德里达有两个选择，或者在德基可能的帮助下把文章缩减成规规矩矩的30多页，或者找一家出版社发表一部完整的作品。但第二个选择似乎难以付诸实现，因为当时列维纳斯尚籍籍无名。

12月初，德基以略加坚定的语气再次提到此事：“如果我建议……将你的文章删节，你觉得如何？如果经他人之手将之删减，你会深感痛苦吗？”<sup>④</sup>随后让·皮埃勒请德里达试着再看看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必须尽快在《批评》杂志上发表关于列维纳斯的论文”<sup>⑤</sup>。他也借此机会向德里达表示十分重视同他的合作，他1964年所有的写作计划都将受到特别的欢迎。

德里达同德基讨论了这篇“怪物般庞大的”文章，考虑了对其删减而不改变本质的可能性。但这样做的话他将做出太大的牺牲。1964年1月30日，他放弃了在《批评》上发表该文的想法，并希望皮埃勒不会对他过于苛求：“我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我多么高兴同《批评》合作，其主编给予我的接纳令我深感荣幸。”<sup>⑥</sup>最终是让·华尔同意将《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思想》这篇文章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上分两次刊登。

比《力量与意义》更甚，这篇文章完全不同于评介，开篇便是宏伟庄重的语调。而且在一开始的几页，他并没有提到列维纳斯，而是对哲学本身进行讨论。

说哲学自黑格尔或马克思、尼采或海德格尔以后，在昨天已经死亡——并且哲学应该永远朝着其死亡的方向流浪——或者说它始终在自知将死之中存活；

① 德里达致利科的信，1966年1月4日。  
 ② 德里达致德基的信，无日期（1963年夏）。  
 ③ 德基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63年9月）。  
 ④ 德基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2月6日。  
 ⑤ 皮埃勒致德里达的信，1963年12月25日。  
 ⑥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64年1月30日。

说它有一天死了，在历史中死了，或者说它始终在垂死中存活，并通过去除其反对非哲学的可能性而激烈地打开历史；说在超越这哲学之死亡或死亡性的地方，也许甚至多亏了其死亡或死亡性，思想才有了未来，甚至如今天人们所说，思想的全部才会从哲学出发而到来；更为奇特的，说未来本身因而还有未来，这都是些无从回答的问题。<sup>①</sup>

德里达随后着手对列维纳斯的作品进行他认定是“部分的”解读，特别是关于其阐述的“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两种历史话语”的相遇。论调看来很谦虚：“我们首先试图以评论的风格（尽管我们将困惑留在一些括号和注释中）对一种思想的主题与勇气表达忠诚。”德里达也强调了这一计划的困难：因为“特别是在《整体与无限》中，很难将文体的姿态与意图区分开来”，他担心“这种在概念架构中灵肉分离的乏味论述是一切评论的首要暴力”<sup>②</sup>。

※ ※ ※

从1964年最初的几个星期开始，德里达去旁听列维纳斯每周二晚在索邦大学的课，并常常在课后与他交谈。德里达想利用他的长文发表前的几个月时间让《整体与无限》的作者有所准备。因为这篇论文虽然在总体上是褒扬的，但也包含一些批评的方面。列维纳斯寄给德里达一篇新的文章《他者的印迹》的题词单行本，德里达也开始回寄自己以前的文章，同时腼腆而谨慎地给列维纳斯写信。

我犹豫了很久——从这些文章发表时起——是否寄给您这些“落叶”……首先因为它们不值得如此，其次因为我害怕这会很鲁莽地让您感到不得不同我交谈或给我写信。我总是痛苦不堪地思忖是否该寄出文章的单行册，思忖是这么做还是不这么做更加友好。

后来我们谈到了雅贝斯，后来我想，我在这几页文字里所试图说明的同您将很快在《形而上学杂志》上读到的文章中我冒险说的话在有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有所相通。……于是我斗胆寄给您这三篇应时的小文，它们的确是“应时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合时的情景……我总是感到，我在其中说出的或宣称的话同以往一样，同那天晚上当我们分手时说出黑格尔或魏伊（É. Weil）

① Jacques Derrida, “Violence et métaphysiqu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117-118.

②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124-125.



的名字时一样，与您的思想极接近又极遥远；这一切只有根据您所说的“形式的逻辑”来判断时才是矛盾的。<sup>①</sup>

1964年10月，德里达迫切地将已发表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列维纳斯，他还附上了第二部分的手稿，并请他原谅其状态：“您看到它就会理解我给杂志的秘书和打字员带来的烦恼。”<sup>②</sup>他怀着惧怕和信任等待列维纳斯面对“这鲁莽的文稿”的反应。《整体与无限》的作者给予了他坦率的答复：

首先我想——在第一次读完您的文章之后——感谢您将它们寄给我，感谢您的题词，还有您对我尽心的阅读、评论和如此严密的反驳。……我应该告诉您，我对您在这些极为慷慨的篇幅中表现出的精神力量感到巨大的钦佩，即便当它们是讥讽的和严厉的批评的时候。衷心感谢您所有的文字。<sup>③</sup>

《暴力与形而上学》也使德里达收获了来自列维纳斯1920年代以来的密友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封信。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德里达以前的文章，这次则特意表示这些研究工作为他带来了“多么大的帮助”，以及他将多么“高兴继续了解他的思想运动”<sup>④</sup>。一场将近40年的重要友谊就此开启。

177



1964年也开启了雅克·德里达同菲利普·索莱尔斯的交往。索莱尔斯虽然比德里达年轻10岁，但他从第一部小说《古怪的孤独》开始就享有了真正的声誉。1958年，就在索莱尔斯同让·埃德恩·阿利耶（Jean-Edern Hallier）创办《原样》杂志前不久，这部小说受到莫里亚克（Mauriac）和阿拉贡（Aragon）的赞赏。1961年，他因第二部小说《公园》而获美第奇奖，彻底选择了现代派。《几何学的起源》出版时，他正沉浸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中。他对德里达在导论中把胡塞尔与乔伊

① 德里达致列维纳斯的信，1964年6月15日。有趣的是，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在1964年1月或2月相识于索邦大学，但他们本来可能不久之后通过另外的途径建立起联系。1964年6月19日，世界犹太人大会法国部的雅克·拉扎鲁（Jacques Lazarus）曾给埃梅·德里达写信，说他有机会同“胡塞尔哲学专家”列维纳斯先生交谈：“我对他说您的儿子德里达老师写过关于胡塞尔的作品。列维纳斯先生将很高兴同他取得联系，您若惠赐他的地址我将感激不尽。”

② 德里达致列维纳斯的信，无日期（1964年10月）。

③ 列维纳斯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10月22日。

④ 莫里斯·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64年10月或11月）。

斯相提并论印象深刻，在1963年春第13期《原样》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德里达很感动，给他寄去了《力量与意义》和《我思及疯癫史》的单行本。

索莱尔斯于1964年2月10日寄来第一封信，语气极为热情。他肯定地说这两篇文章让他感到最高度的兴趣，尽管“哲学上的低能”使他只能靠直觉来了解同福柯的争论。“无论怎样，令人震惊的是能够再一次——而且绝非偶然——作出这样的判断，即思想和（真正的）‘文学’实现彻底的交流。这种相互的质询是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不是吗？”<sup>①</sup>

178 与此同时，刚刚被任命为索邦大学助教并在《原样》发表过文章的热奈特邀请德里达一家参加“有索莱尔斯，或许还有巴尔特等大人物的晚餐”，晚餐于1964年3月2日在位于塞纳-沃兹的萨维涅-絮-奥尔日的公寓举行。6月，索莱尔斯和德里达再次见面，这次是在德基家里。两人立刻相互产生了好感，作家毫不迟疑地请哲学家在《原样》发表文章，主题由他自己决定。德里达答应一旦从繁忙的考试阶段解脱出来就加以考虑。

德里达从4月到7月确实被学校的事务缠身。除了在索邦大学需准备并批改大量试卷，以及帮助高师学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下一章将会叙及）之外，这些年来他还有各种聊以糊口的差事。就像热奈特所讲：“在1963年及其后的几年，雅克和我，就像让·贝勒曼-诺埃尔和伊丽莎白·德·丰特奈（Élisabeth de Fontenay）一样，靠批改‘普通文化’科的卷子（论文和‘文章缩写’）以及在高等商业学校（HEC）入学考试主持同一科目的口试而赚些外快。校园里传说德里达喜欢出这样的题目：‘小汽车’，我不知为什么这令他十分恼火。”<sup>②</sup>

※ ※ ※

也是在1964年，德里达结识了埃莱娜·贝尔日（Hélène Berger），她很快以埃莱娜·西克苏的名字更为人所知，并成为德里达40年间最亲密的女性友人之一。她当时在波尔多学院担任英文助理，正在撰写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论文。1964年4月11日，她怀着快乐与兴趣读完了德里达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论和其他最早的文章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她感到不可避免地被引导着“从胡塞尔的角度”阅读乔伊斯。尽管是“心灵的哲学家”，她却并不从事哲学，只希望同德里达讨论她所关心的几个问题。<sup>③</sup>

这第一次“乔伊斯之约”定于5月30日星期六的巴尔扎咖啡馆，“公共酒吧是典

①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2月10日另有同索莱尔斯的访谈。

② 同热奈特的访谈。这段故事也在他的作品 *Codicille* 中提到，*op. cit.*，p. 57。

③ 西克苏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4月11日。

型的乔伊斯之地：在那里，所有的结得以解开，所有的谜得以解决”<sup>①</sup>。这一次，西克苏发现德里达对乔伊斯有着真正的激情，远远超出了他当时写下的几行字。他们还互相发现了许多其他共同点，从出身开始：埃莱娜·西克苏出生于奥尔，父母都是犹太人，她在阿尔及尔长大，经常光顾德里达青年时代常去的地方——试验花园、布若高中，还有其他许多地方。他们在谈到法国大学的经历及其僵化体制时也很有同感。她回忆道：“结识德里达的时候，我正在同体制作战。同他交谈时，我对自己说，在法国大学界应该还有与他同样气质的人，决心做出改变。但很快我不得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默契。因为他，我感到自己不必只生活在死者即我阅读的伟大作品的作者的陪伴当中。”<sup>②</sup>

179

※ ※ ※

1964年确然是新的友谊产生或加深的时候。夏天到来前不久，德里达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皮埃尔去不列塔尼看望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他本想一回来就给他写信，但“又一次被妖魔的大学攫住，它直到7月底才把精疲力竭的他丢弃在岸上”。尽管如此，德里达仍然为布努尔“深邃、灿烂、友好”的存在所深深吸引，也为他在自己逗留期间“每时每刻散发出的慷慨”关怀而感动。但德里达极为疲惫，感到在这几个月无休止的思考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组织起最简单的句子”。他的疲倦是“如此沉重，伴随着对此职业的某种苦涩的厌恶”，以至于有时感到不再知道如何开口。他忧伤地发现：“我自然的声音变成了最矫饰的教学或写作的声音。”<sup>③</sup>他希望每当布努尔经过巴黎都尽可能有机会见面。

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暑假固定的安排，雅克与妻子一直遵守，除了极少数几次。

180

他们8月份在位于拉萨茨的玛格丽特家度过，这是一座有些破败的老农场，带一所大花园，距昂古莱姆几公里远。有一所小房子给他们留着，但雅克没有真正的书房，只能将就工作。那里除了玛格丽特的父母，还有她的两个兄弟及其家人。杰基在高师的老校友米歇尔·欧库图里耶在日内瓦执教；他的论文是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同时继续翻译并评论果戈尔（Gogol）、托尔斯泰（Tolstoi），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他是研究帕氏的大专家。

自从德里达的父母以及不久后他的兄长和妹妹在尼斯安家之后，他们就在尼斯或其近郊度过9月。雅克很高兴重新回到地中海海滨并长时间游泳，但父母的狭小

① 西克苏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5月19日。

② 同西克苏的访谈。

③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4年8月3日。

公寓让他难于工作。总的来说，德里达并不是一个爱度假的人。8月和9月是他一年当中最富于成果的时候，他要备课，并撰写各处开始邀约的文章或讲演。为了享受一点安宁，他比平时起得更早。喝下一杯咖啡后，他从早晨6点开始写作，到9点左右停下来吃早饭，然后再继续工作至少到午餐时分，不顾周围的嘈杂喧闹。

181 1964年8月初，德里达仍然为前几个月的过度劳累而疲倦不堪。索莱尔斯再次说多么希望在下一期《原样》刊登他的文章。“对《原样》深怀好感”的德里达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题目可能是《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书写（或文字）》，但他担心这篇文章对杂志来说可能太长。<sup>①</sup>索莱尔斯喜欢这个主题，很愿意把文章分两期刊登，只要不超过60页的篇幅。他也询问德里达是否“关于阿尔托有什么话说”，可以为自己正在编纂的专辑投稿。

9月30日回到巴黎，德里达不得不宣告他关于文字的文章在到达尼斯时就搁浅了。他刚刚重新投入写作，但担心不能很快完成。索莱尔斯的来信还激起了他重读阿尔托的欲望，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没有再读过了，也许还想写点什么：“但同样的，我需要时间。工作很快就要缠住我了。”<sup>②</sup>两个月之后，尽管课程和其他工作事务繁忙，关于阿尔托的文章仍然进展很快，题目将是《被劫持的言语》。德里达希望在年底放假期间完成。<sup>③</sup>

---

①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4年8月16日。

②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4年9月30日。

③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4年12月1日。

# 第 10 章 在阿尔都塞的荫庇下

## (1963—1966)

1963 年确是德里达十分活跃的一年，他也走上了于姆街之路。《几何学的起源》刚一发表，阿尔都塞就邀请他给学生们就胡塞尔作几次“介绍”。德里达并非是唯一这样做的。高师并不真正教课，只是经常性地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比如让·波弗莱在几年间主持一个海德格尔讨论小组，这是个相当封闭的团体。米歇尔·塞尔、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其他几人这些年也时常前来授课。 182

但德里达的情况很快就表明他同这些偶然前来的讲演者不同。3 月 20 日，阿尔都塞告知他刚刚同伊波利特交谈，后者即将离开执掌高师的职位，要去法兰西学院担任教授。这位《〈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的作者热情地响应了让德里达作为教师资格考试导师重回高师的计划。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目前，伊波利特想同康吉莱姆讨论各种可能性，为德里达从索邦大学过渡到高师做准备。

1963 年 9 月初，阿尔都塞获知自己最亲密的友人雅克·马丁 (Jacques Martin) 自尽的消息。这令他连续几个月情绪低落的不幸事件大概使他与德里达更加接近。也许新校长、古希腊学家罗贝尔·弗拉瑟利埃 (Robert Flacelière) 很快发现阿尔都塞需要支持和帮助，总之从 1963—1964 年起，始终是索邦大学助教的德里达被任命为高师的教师，每年需授课 48 小时。 183

※ ※ ※

“谁能够撰写这所‘宅子’及其演变关系的历史而不向任何社会—学院派让步？为了对 20 世纪法国知识生活的许多‘逻辑’有所了解，这是几乎不可能但却必要的任务”<sup>①</sup>，德里达在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一次对话中称。事实上，在阿尔都塞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133.

召唤德里达的时候，高师正处在沸腾当中。一群年轻出色的哲学家在1960年加入了高师，其中有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艾蒂安娜·巴里巴尔、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他们大多数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而成为共产党员，共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可能的更新进行大辩论。他们将去找当时只发表了关于孟德斯鸠的一本小书和几篇文章的阿尔都塞，请他在其导师的职责之外对他们的理论研究提供帮助。

1961—1962年间，阿尔都塞研讨课的主题是年轻时代的马克思，第二年则是“结构主义思想的起源”。1963—1964年间，阿尔都塞研究的对象是弗洛伊德和拉康。他对拉康散落各处的文章很感兴趣，要求他最优秀的学生阅读，因为他吃惊地发现，拉康发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呼唤对应着他本人对马克思的研究。

184 阿尔都塞对拉康的关注至少在两个方面至关重要。这时，在法国共产党内部，精神分析学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将于第二年在一本党的期刊《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上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与拉康》就此打开了一道意义重大的缺口。在仍然漠视精神分析学的法国大学环境中，阿尔都塞的贡献也具有决定性，正如鲁迪奈斯库所阐明的：“第一次，拉康的文章从广泛超越临床范围的哲学视角得到阅读。”<sup>①</sup>

阿尔都塞还在弗拉瑟利埃的支持下促成了拉康来高师开研讨课。此时拉康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与几位友人同时被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开除，如他后来所说“被逐出教会”，并决定以新的方式教学。他开始远离此前一直所在的体制，选择“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为主题，面向人数增加了许多但不再那么专业化的听众。1964年1月15日，在杜萨纳厅，他的新研讨课的第一讲颇具庄重色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到场，还有精神分析学家亨利·埃（Henry Ey）。德里达看来没有参加这第一讲，很可能因为索邦大学事务缠身，也可能因为前些年他曾与德基同去圣安娜听过拉康的课。

鲁迪奈斯库写道：“从这一天起，杜萨纳厅将成为今后五年里新法国弗洛伊德学说的专有场所，比之前更加具有文化和哲学色彩，也更加光辉灿烂。”<sup>②</sup>在高师内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下一堂课上，刚刚19岁的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第一次发言。“您的这个小伙子相当不错”<sup>③</sup>，拉康立刻给阿尔都塞写

①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Fayard, 1994, p. 386-387; rééd.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 Jacques Lacan*, Le Livre de poche, coll. “La Pochothèque”, 2009.

② *Ibid.*, p. 371.

③ 雅克·拉康致阿尔都塞的信，1964年1月22日，见 Louis Althusser, *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Stock-IMEC, 1993, p. 299.

道。米勒试图进行综合阅读的努力给拉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月29日的课上对米勒作出了长篇答复。年迈的精神分析学家和这年轻人之间的对话从此未曾间断，并在拉康的表述中带来了重要的转折。

※ ※ ※

与阿尔都塞的大胆作为相反，德里达尽管年轻，却首先表现得像个更加传统的教师，是德布雷眼中的“代课导师”。但《几何学的起源》导论深深影响了巴里巴尔及其他同学。这一年，德里达给他们上了三门课，强度很大，内容有关阿尔都塞很少讲到的作者：第一门关于柏格森的《思想与运动》；第二门关于胡塞尔的《笛卡尔沉思录》——这是一部深奥的著作，他的评论令人难忘；最后一门的题目是《现象学和先验心理学》。 185

对于教师资格考试，从这时起德里达有着与阿尔都塞同样的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拉康的信徒还是结构主义者，在考试时都应该“模仿”：在一切哲学或政治问题之外，关键在于掌握论文或口述特有的修辞方式。德里达本人为通过考试深受其苦，很清楚应该怎么做才能成功。不过，即便在这个领域，事情也开始变化。1964年，教师资格考试评委会有所改变：主席不再是埃蒂安纳·苏里奥，而是康吉莱姆，伊波利特任副主席。这个新的评委会对当代哲学、认识论、现象学，甚至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都表现出开放得多的态度。在此新局面下，由阿尔都塞和德里达担任考试导师成为新的优势。<sup>①</sup>

德里达的教学质量尤受推崇，特别是因为就在笔试前夕，阿尔都塞再次崩溃。1964年4月，他感到喘不过气来，“精神滞塞”，“伴有十分不适的‘严重’抑郁症的所有症状”。他将离开学校几个星期，问德里达能否“在考试前躁动不安的气氛中照顾小伙子们……哪怕只是同他们聊聊天”<sup>②</sup>。阿尔都塞很遗憾几个月来过着不堪的日子，向德里达道歉说，除了见面打个招呼外，没有花时间同他交谈。

情形很快恶化。很明显，就在教师资格考生最需要他的时候，阿尔都塞完全出局。德里达尽管在索邦大学事务繁重，还有正在撰写的文章，还是毫无怨言地接过了重担。“我不再知道我在哪儿……刚刚结束催眠的疗程，”笔试后不久阿尔都塞给德里达写道，“小伙子们怎么样？你呢？唉，我万分不情愿，我毫无预告地加予你这沉重的任务。”阿尔都塞住在艾比奈-絮塞纳的疗养院，有几天可以接受探视：“我不 186

<sup>①</sup> 同德布雷和巴里巴尔的访谈。

<sup>②</sup>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4月3日。

敢对你说见到你我一定会十分快乐，但这里太遥远了。……谢谢，衷心感谢你所做的一切——首先谢谢你，你是你原来的样子。”<sup>①</sup> 德里达将经常取道艾比奈去诊所看望他。

6月10日，阿尔都塞抱怨自己不得不延长痛苦的住院时间。“严重的间歇发作中断了回到现实的路线。”他因而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口试前与学生见面。8月3日，他开始感到好转，希望向德里达表示感谢。高师学生的教师资格考试极为优异，他知道是德里达的在场促成了这一成功：“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不会让我说，但这都是真诚的。”<sup>②</sup>

此后的德里达了解到阿尔都塞心理状况之严重，而后者也不是不知道自己从前学生的脆弱，每有机会就开个玩笑。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正如渐渐走出危机的阿尔都塞所写：

我很了解，对于我的经历你远不止是见证而已。这不但让你承担了本可以推托的沉重工作，还应该让你体会到某种回忆的余味，并把你掷向其他的艰难时刻。你当然是见证人，但也许通过我所经历的，你也见证了些许与过去相仿的东西。为所有你做的和对我说的，也为你留给我的一切，我向你表示无限感激。<sup>③</sup>

187 这亲密的情感经年不变，在几乎每年阿尔都塞的抑郁症发作与住院期间亦然。“我祝福你的在场并成为我的友人，”阿尔都塞还这样写，“请为我保留你的友谊。它是我仅有的理由之一，让我相信生命（尽管充满变故）值得去经历。”<sup>④</sup>

这段时间，阿尔都塞同勒内·迪亚特金（René Diatkine）开始了新的精神分析疗程，同时也写下了使他很快获得巨大声誉的文章。“我们之间的哲学交流越来越少，如果不是已不存在的话”<sup>⑤</sup>，德里达后来对迈克尔·斯普林科这样说。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1964年9月1日，德里达开始深入分析阿尔都塞寄给他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此文在第二年成为《保卫马克思》一书的最后一章。德里达的评论既坦率又默契：

①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5月14日。

②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8月3日。

③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8月24日。

④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⑤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and Friendship”, in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1992. 我的引文出自保存在 IMEC 的法文原稿。



我认为你寄来的文章极为出色。我对你有力而严密地提出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感到亲近，我了解那就是你的观点，我想我还理解了“意识形态上的”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在某些时刻意味着什么，以及总的说来，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等等。把这些同卡尔·马克思本人联系起来则不那么使我信服。也许有些无知的因素导致了我的怀疑，导致我感到这种非人道主义可能受到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前提的支配。你从116页起的阐述为我表明了马克思同某种人道主义、同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某种关联的决裂。但这种激进化，在其最有力和最引人的地方，在我看来仍然常常是十分阿尔都塞式的。你会说对马克思的“重复”不应是“背诵”，深刻化和激进化就是忠实本身。不错。但从黑格尔或费尔巴哈出发难道不会抵达同样的结果吗？而且，虽然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复因决定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化”观念的论述——以及意识一无意识，尽管……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却令我不快，因为一些你知道的相当“反动的”哲学原因。恰好相反，在我看来，这一概念仍然局限于一种形而上学，以及某种你比任何人都了解的“打翻的唯心主义”。我有时甚至感觉到你本人也为它所困……我们应该再谈谈所有这一切，手里拿着你让我读的马克思的文章……<sup>①</sup>

188

在这1960年代初，助教的职位限定四年。德里达因此必须于1964年秋离开索邦大学。几个月前，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建议他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申请两年的全休假以顺利完成论文，他这么做了。据伊波利特的说法，德里达的申请很有优势，不应遇到什么阻力，况且伊波利特就是委员会成员。<sup>②</sup>但两年纯研究的前景并不吸引德里达，反倒更让他害怕。尽管他保留着在高师当学生时相当痛苦的回忆，他还是很向往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导师的职位。

透过痛苦，高师令人着迷的模式吸引着我，于是，当伊波利特和阿尔都塞建议我回去，而我能够就任他处时，我为回高师而辞去了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位置。无论怎样批评这所学校，它在那时都是典范，在那里教书是一种荣誉和奖励，我既无勇气也无意愿拒绝。<sup>③</sup>

① 德里达致阿尔都塞的信，1964年9月1日。

② 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3月11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and Friendship", *op. cit.*

离开索邦大学时，德里达给利科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已经产生的怀念”和“巨大的感激之情”。他将索邦大学的四年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并认为其好处具有决定意义：“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来说，特别是因为，对于拥有此良机的我们，职业和哲学是一体的。”虽然德里达仍感不安，但他确认在索邦的时光给予了他最为宝贵的动力。

189 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只是因为我在您的指导下并在您的身边工作。您热忱表现出的十分慷慨友好的信任是深沉而持久的鼓励。我请您今后将我视为您的助手，不是名义上的，而是永久的。<sup>①</sup>

另一边，冈迪拉克很高兴德里达在高师的提名很快得到证实，这使他不必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并能够即刻为阿尔都塞带去“伊波利特的离开使之更显必要的珍贵合作”<sup>②</sup>。但他很快提醒德里达撰写论文的重要性，希望他的新职位能留给他足够的余暇以“尽快完成”这些论文，因为教师资格考试导师的职务很容易令时光飞逝。<sup>③</sup>冈迪拉克的直觉完全被证实。德里达被众多写作计划压身，向伊波利特解释说，他在1964年夏几乎没有就论文做出什么成绩。但他开始写作一篇关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随笔”，或不如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间”的文字，这应该帮助他确定下来论文所需的一些概念和问题。他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形成一本小书，或将提交“厄庇米修斯”丛书出版。<sup>④</sup>

※ ※ ※

1964到1965年间，正式作为教师资格考试导师的第一年，德里达开了一门课，题为“海德格尔和存在与历史的问题”，这门课相当新颖，使他想到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不过，激起学生强烈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主题：这一年有阿尔都塞著名的研讨课“阅读《资本论》”，十几次课将成形为一本书。在这段时间，阿尔都塞及其身边的人——巴里巴尔、马舍雷、朗西埃、罗日·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一起构想出“症状性阅读”的概念，并阐发了“认识论的分裂”这一思想，将年轻时代仍然处于黑

① 德里达致利科的信，1964年9月28日。

② 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10月6日。

③ 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4年10月23日。

④ 德里达致伊波利特的信，1964年10月24日。

格尔主宰下的马克思与完全成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区别开来。德里达参加了几次课，但他感到孤立和不安，正如他很久之后接受斯普林科的访谈时就阿尔都塞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一段长话所表明的，这段话的法文原版尚未发表过。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大概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内部是必要的，后者尤其受到了同共产党的关系的影响——我不曾加入共产党，它当时正在缓慢地脱离斯大林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个问题——它并不粗糙或天真，远非如此——对于当时我认为必要的一些关键点极不敏感，尽管它是反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或至少是经过他们的。……我感到他们的历史观本该就此进行考问。……我觉得他们的言论让步于……一种“新式的”科学主义，对之我可以加以质询，但很自然，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我不愿人们将我的批评与来自左派和右派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的粗浅而有所图的批评混为一谈。<sup>①</sup>

德里达感到被迫沉默，更是因为阿尔都塞支持者们的言论带有一种“精神恐怖主义”，或至少是“理论恫吓”。“用一种姑且可以说成在表面上是现象学的、先验的、本体论的风格来构筑问题……这立刻就会被视为可疑的、落后的、唯心的，甚至是反动的。”历史、意识形态、生产、阶级斗争、“最后决策”（*dernière instance*）这一想法本身，所有这些在德里达看来仍然充满疑问的概念，都没有得到阿尔都塞及其信徒的足够的考问。

我在这逃避中看到了错误，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没有提出“根本的”问题或没有对根本性提出问题，没有对其自身的前提及其公理本身提出问题，这让我看到激进性的缺失，以及话语本身仍然太严重的教条性，这无法不产生短期或长期的政治后果。……他们的概念未曾加以足够的细化和区分，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sup>②</sup>

这些争论发生在一小群“精于解读”的人中间，就像在一场虚拟象棋赛中，每个人都在预测对手的攻击，试图“通过最微小的迹象猜出他人的战略”。

①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and Friendship”, *op. cit.*

② *Ibid.*

有许多的阵营、战略结盟、包围和隔离的纵横术。……当时的交往方式，如果有的话（用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是一种规避的交往：沉默、不引用……而我，我在那儿是个小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完全是我的同辈。但，我们并没有公开的敌意。尽管有这些不同与分歧，我仍然属于同一个大的“阵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有许多。

巴里巴尔发现了这篇后来同斯普林科的谈话，了解到德里达当年曾经怎样因为被冷落和被迫沉默而痛苦。他承认，1960年代中期在阿尔都塞周围形成了大概令人很难忍受的堡垒。“事实上，我们并不在意德里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作为哲学家和个体的他有着真正的尊重。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在他在弗莱斯纳的家中度过了一个晚上。我们感觉到阿尔都塞和他之间有一种默契，但并非从属关系。这是一个教学团队，而非意识形态团队。”<sup>①</sup>

在教学方面，德里达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阿尔都塞因为“阅读《资本论》”的研讨课和《保卫马克思》的成书而筋疲力尽，1965年夏天再次神经衰弱。到7月，他开始为教师资格考试，尤其是德布雷的成绩担心：这位出色的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高师——在政治上早已十分积极——在高师的学业却始终断断续续。德里达急切地向阿尔都塞传递消息：布弗雷斯（Bouveresse）第一，莫斯科尼（Mosconi）第四，德布雷第五。“我很满意他的口试，因此给他打电话鼓励他。……拉康的女儿同拉邦（Rabant）的妻子并列第一。就是这样。我在教师资格考试的氛围中一直呼吸困难，还要看看这场戏最终的结果。”<sup>②</sup>

在他很关注的考生当中有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孙子布里耶克。虽然他不是高师学生，但德里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远远地帮助他准备考试。他对布里耶克说：“面对试卷尤其要具备必要的哲学自由和空间，不要错过题目尖锐的特殊性，不要迅速投入熟悉和有把握的道路，这样才能组织好话语。”<sup>③</sup>但布里耶克在笔试的第二天便消失在不列塔尼，甚至没有询问一下成绩，而在想是否应该选择过水手兼渔民的生活。冈迪拉克知道德里达对这年轻人的关心，让他尽快来找他：“告诉这个孩子口试时可以随心所欲。按照他的笔试成绩，他无论怎样都会被录取。”几周之后，德里达很高兴能够给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写信，告诉他布里耶克的口试被评委们认为是“至今为止最具有哲学性的”。他关心他的成功，“如果他因为某个让他气馁的

① 同巴里巴尔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阿尔都塞的信，1965年8月2日。

③ 德里达致布里耶克·布努尔的信，1964年12月26日。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手势而失败的话，那将令人悲痛”<sup>①</sup>。

※ ※ ※

1965年10月，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集体著作《阅读〈资本论〉》在马斯佩罗（Maspero）出版社“理论”丛书的第一批出版，很快在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激起强烈反响。随后的几个月，阿尔都塞成为“任何同代人都未曾激起过热情、迷恋、模仿”<sup>②</sup>的对象。在许多人看来，他像是“世界革命的秘密教皇”<sup>③</sup>。1966年11月，让·拉克鲁瓦（Jean Lacroix）在《世界报》的报道中说，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试卷上引用最多的两个名字是阿尔都塞和福柯；一些年轻哲学家的名字也时有所见，如朗西埃、巴里巴尔或马舍雷。<sup>④</sup>

在高师，共产党学生联盟（UEC）正在解体。“意大利”趋势——同意大利共产党形象相符，十分开放——在高师几乎没有代表。矛盾主要产生在倾向共产党和苏联的正统派与“毛主义者”之间，后者由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主导，他将很快离开被视为“修正”的共产党学生联盟，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共产党员联盟（UJCml）。阿尔都塞并不隐瞒自己对毛泽东理论文章的兴趣，他采取了一种复杂的战略：他将自己的学生推向激进，自己却从未想过脱党。<sup>⑤</sup>

193

在几个月之内有好几本小型杂志在高师创办。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以一句德里达并不欣赏的列宁的话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在其中一期，符合林哈特口味的文学评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此后雅克-阿兰·米勒、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和弗朗索瓦·雷尼奥（François Régnauld）产生了异议并创办了《分析手册》。这本杂志由“认识论圈子”主持，其立场可以说是“阿尔都塞—拉康式的”<sup>⑥</sup>。德里达在上面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论文字学》中的一章——同时该杂志还重新编辑发表了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这也是德里达这一年研讨课的主题。

德里达的声望虽然还远远不及阿尔都塞，但已开始在高师产生影响，一些学生

① 德里达致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信，1965年8月25日。

② Propos de Jeanine Verdès-Leroux cité par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Champs-Flammarion, 1991, p. 194.

③ 同多米尼克·东布勒（Dominique Dhombres）的访谈。

④ Cité par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op. cit.*, p. 183.

⑤ Élisabeth Roudinesco 在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中对 1960 年代末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进行了出色的叙述，*op. cit.*, p. 390-391.

⑥ François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I*, Le Livre de poche, coll. “Biblio”, 1995, p. 333.

也开始同他接近。贝尔纳·波特拉（Bernard Pautrat）回忆道：“在高师迅速形成两极分化：阿尔都塞影响着一群教条的时而态度傲慢的人；德里达代表着另一极，他更加开放，许多人认为他是观念论者。听他课的足有 20 多人。他十分新颖的阅读哲学的方式令我着迷，我很快同他接近起来。从 1964 年起他就建议我在利科的指导下撰写关于尼采的论文。不知不觉中，我仿佛成为第一个德里达的信徒。”<sup>①</sup>

194 即使在最政治化的学生中间也有一些怀着很大的兴趣听他的课，例如德里达在以后的道路上将多次相遇的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最初我的志向是考古学，是德里达在读完我第一篇应他的要求写的论文之后决定了我的去向，他的批注第一句就是：‘您是哲学家。’我在五年间始终是他的学生，听他的课，不顾那些围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周围的同学的嘲讽，他们视他为无用晦涩的形而上学者。就个人来说，我从来不愿因政治而疏远德里达，我相信他对此十分敏感。阿尔都塞和康吉莱姆是我的两个主要参照，但我清楚地感到德里达身上有些十分重要的东西。每一次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就去找他，每一次他都表现出随时准备给予答复。我依赖他，作为教师和作为个体的他。在他表面的淡漠下燃烧着热情，我愿意前去温暖自己。”<sup>②</sup>

1966 年夏末，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教师资格哲学考试几周之后，波特拉给德里达写了一封他将一直铭记的信。他讲述了自己对德里达的全部感激之情，远远不止为了他在这一年准备考试期间带来的支持，更为了他的在场，他“令人深受鼓舞的关注”，还有他不懈地做出示范的“不可替代的深刻性”。

我想您在高师的工作并不讨喜，而且并未得到足够的回报。我们太多地表现出一种令人恼火的“哲学上的消极”。这就是为什么我允许自己对您说，您的工作无论如何并非徒劳无功。没有像您和阿尔都塞这样的导师，我会早已远离哲学，迷失自己。您很清楚，没有您，我们关于哲学的想法只会是孱弱和疏离的。<sup>③</sup>

---

① 同波特拉的访谈。

② 同勒古的访谈。

③ 波特拉致德里达的信，1966 年 9 月 5 日。

# 第 11 章 文字本身

## (1965—1966)

195

尽管德里达最早的作品质量很高，但他仍感脆弱。友人的鼓励对他来说必不可少，从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开始。正如他在 1965 年年初写给布努尔的信中所说：“您关于我对列维纳斯的评论所说的一切令我深受鼓舞，借给我许多的勇气。我确定我需要这一切。也许您说您感觉到的力量不过是这需要的力量，亦即一种巨大的虚弱，它以某种方式在求助。”德里达感到他所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逃避隐匿之地，在此一切都突然间模糊在一片黑暗的清晰中”。布努尔先他而行，让他能够进入这地域。

您在我之前，而且比我更好地现身于此经验的中心（让我们用那些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的名字来称呼它吧：尼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朗肖），您看到了我的到来。为您写作时，我才能更好地控制我摸索前行的话语。您看，我仍然在寻求宁静和被理解。此外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我知道您现在给我带来的安宁绝非安逸，在摸索中得到理解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另外一种安宁，或许是糟糕的安宁，是大学，是此时的高师，在这里我的教学以另外一种更平凡、更有效的方式让我安宁，但它与前一种安宁似乎是相关的。<sup>①</sup>

196

另一名年轻许多的对话者，作为朋友，也作为作家，正对他产生重要的意义：菲利普·索莱尔斯。他最新的小说《剧》令德里达深为感动。他写了一封腼腆且几乎是窘迫的长信，同时为“搬弄语句”而道歉。

---

<sup>①</sup> 德里达致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信，1965 年 1 月 11 日。

《剧》击中了我的期待，通过这一切，您先于我踏上了一条我似乎从记忆之外认出的道路，我的一切解读与您的书交相缠绕，而它本已在解读自己，亦即在自我书写的同时抹去自我……在抽身退却的同时进行书写，我不敢作这解读，或者说，我不敢从我身内持续不断的运动中抽出这解读，超出所有这一切之外，我景仰着（可以吗？）作家，景仰他就在写作的第一行，就在写作无上的危险处仍然保持着神奇的确定性……<sup>①</sup>

德里达的口气变得更加私密，他承认索莱尔斯的书是如何唤醒了他对文学的热爱，而面对文学他感到脆弱，又仿佛是胆怯：“如果我对您说您又写了一本好书，您会生气吗？不管怎样，我为之欢欣鼓舞，因为——我决不会当众说出此话——我仍然热爱，而且仍然相信美好的书。我仍然保留着年轻时一些对文学的虔诚。”附言表明他将索莱尔斯的书置于何等崇高的地位。“您读过布朗肖的《等待忘却》吗？不知为何，在此书出版两年之后他才刚刚寄给我。我就在《剧》之前读了它。透过无数的差异，两本书之间相互传达着一种亲密的东西。”

可以想象，这慷慨的解读令索莱尔斯十分感动。他为这“无保留的沟通”<sup>②</sup>和与之伴随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与德里达接近了许多。他们频繁丰富地通信，常常见面。可以感到德里达想有一种相融无间的友谊，就像曾经与迈克尔·莫诺里那样。

197 关于阿尔托的文章，3月份发表在第20期《原样》杂志上；同一期刊登了一篇索莱尔斯的文章，一篇宝洛·泰弗南（Paule Thévenin）的文章，还有11封未发表过的阿尔托致阿纳伊斯·宁（Anaïs Nin）的信件。德里达这第一篇关于阿尔托的文章题为《被劫持的言语》，对这位尚不被人了解的作家提出了全新的解读。1965年时，其著作全集在伽里玛出版社只出版了前五卷。

在这篇出色的文章里，德里达一开始便指出评论阿尔托具有特殊的困难性。太多的评论只是将之封闭在已有的类别里，一次次地否定“想要真正称之为安托南·阿尔托的肉身之谜”<sup>③</sup>。就连莫里斯·布朗肖写下的动人篇章都倾向于将他作为一个案例来对待，而不是真正考虑到他经验中的“野性”。

①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5年2月28日。

②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5年3月3日。

③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 soufflée”,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292.



如果说阿尔托绝对抗拒——而且，相信我们，以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诊断式的或评论式的解读，那是因为在他的历险（我们用这个词指代生活与作品分离之前的整体生命）中，有一种抗议本身与范式化本身相对抗。评论家和医生在这里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拒绝意义的存在，不愿有作品的艺术，不愿有踪迹的语言。

阿尔托想摧毁一种历史，二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它或多或少潜在地启发了上述的尝试：灵魂与肉体的二元性支撑着——当然是以秘密的方式——言语与存在、文本与身体的二元性。阿尔托想要禁止他远离身体的话语向他吹拂过来。<sup>①</sup>

这期《原样》刚一发行，德里达就接到宝洛·泰弗南的电话，她是该全集的主编，德里达从未见过她。她必须告诉他这篇文章多么令她激动。她在一封长信中重申在她眼中该文的重要性。

我感谢您，因为从最深处，几乎是第一次，我被赐予了些什么。除去布朗肖的文章，以及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里的一两句话，我15年来感觉一直在真空中工作，从未找到共鸣。自然我并不做什么鉴别。我仅仅相信安托南·阿尔托的作品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完全值得我为之付出的时间，而且远远不止，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对我说我没有错。在此意义上我感谢您，就像我感谢菲利普·索莱尔斯。但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对此事的想法。<sup>②</sup>

198

他们很快见面并结下友情。从那时起，泰弗南开始让德里达了解自己的研究，并定期给他阿尔托未发表的文章。在阿尔托离世当日，她在颇具争议的情形下取得了他的稿件，满怀激情与耐心地解读它们，为不断扩充的全集出版工作进行准备。<sup>③</sup>

宝洛和伊夫·泰弗南定期在他们在巴士底大街的公寓举办晚餐，玛格丽特和雅克·德里达便是在此结识了一小群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常去的人里面有弗朗西斯·蓬热、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路易-勒内·德佛莱（Lou-

①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261.

② 宝洛·泰弗南致德里达的信，1965年3月19日。

③ 所有关于宝洛·泰弗南、安托南·阿尔托的遗产及其全集的编纂等问题在今天仍然充满争议。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这个话题。欲了解更多，请参阅 Paule Thévenin, *Antonin Artaud, ce désespéré qui vous parle*, Seuil, coll. "Fiction & Cie", 1993。Florence de Méredieu 在其作品 *L'Affaire Artaud, journal ethnographique* (Fayard, 2009) 中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观点。

is-René des Forêts)、米歇尔·莱里斯 (Michel Leiris)、皮埃尔·布列兹 (Pierre Boulez) 和罗日·布兰 (Roger Blin)。但德里达将特别与让·热内结下密切关系。

热内在宝洛·泰弗南身边享有特殊的待遇：她给他饭吃，打他的文章，照料他的起居和稿件。对她来说，他有点像“第二个阿尔托，活着的阿尔托”<sup>①</sup>。泰弗南也在寻找新的评论以重新激起对他作品的关注，自从萨特在1952年作为其全集的第一卷发表了著名的《圣热内：演员与献祭者》(*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以来，评论就有些销声匿迹了。

199 从第一次见面起，德里达和热内之间就发生了些强烈的东西。泰弗南为照料晚餐留他们单独在一起片刻，为此还有些担心。但当她从厨房回来时，发现他们沉浸在热烈的讨论中，让她几乎觉得自己是个闯入者。热内通常讨厌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们。但同德里达的友谊是立即产生的，它将永远不会变质。他们相识的时候热内正处在一段痛苦的时期：曾是他七年伴侣的阿布达拉 (Abdallah) 在1964年自尽。热内放弃了写作，烧毁了许多手稿，不想再听人谈论文学，或至少不想听到他人谈论自己的文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十分接近。德里达告诉泰弗南：

请您有机会时用您的话把我永远不敢也永远不知该如何对让·热内说的话告诉他：对于我，这是一个真正的节日——朴素、平静、内在，但是真实——遇见他，同他说话，聆听他，见证他存在的方式。……在所有我幸运地在您家里遇见的人当中，我最热爱的是他。<sup>②</sup>

德里达有时也让热内害怕，不亚于热内让德里达害怕。哲学问题的最炙手之处也令作家关注，正如下面从一封长信摘取的片段所表明的。

上次我们见面，当您离开宝洛的公寓时，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说，特别是要向您请教。……我希望……您告诉我是否通过认真的思考就能在哲学上“选择”决定论或其反面。这样的选择是经由怎样的精神活动作出的？它是在信仰行为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吗？就像骰子掷出后再加以解释？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是因为事后理性化的慷慨秉性吗？或者，我是民族主义者吗？为什么，怎样？非理性（偶然性）难道不是处于每种哲学信念的开端吗？我知道，或者我

---

① 同阿尔贝·迪奇 (Albert Dichy) 的访谈。关于让·热内与泰弗南之间关系的详情，请参阅 Edmund White, *Jean Genet*, Gallimard, coll. "Biographie", 1993。

② 德里达致泰弗南的信，无日期。

想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一种选择进行辩解，但我不知道这选择是怎样做出的。在我看来，人们首先自然地倾向于一种选择，然后再寻找理由。……这个小问题您和您最年轻的学生一定早已解决，而我，我却无法解决。有一天您要和我谈谈这个问题。<sup>①</sup> 200

对于德里达，1965年夏初同许多时候一样颇为压抑。玛格丽特和皮埃尔在沙朗特，他独自待在弗莱斯纳，感到工作几乎停滞。“我觉得自己在看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珍珠，就像一个擅长捕捞牡蛎却又怕水的渔民”<sup>②</sup>，他给阿尔都塞写道。而这篇他费力地完成于8月底，随后寄给《批评》的“关于文字的小文”将很快被视为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雅克和玛格丽特给自己放了一次真正的假，他们整个9月都在威尼斯，更确切地说是在丽多度过。和他们在一起的有刚满两岁的皮埃尔，还有莱伊拉·塞巴尔(Leila Sebbar)——她是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帮助照看孩子，几年之后成为著名作家。这是德里达第一次到意大利旅行，它将成为他最钟爱的国家之一，也是他在工作之外常常会去的少数国家之一。

回来之后他发现了德基的信，说《字母之前的文字》这篇文章多么令他着迷。几天之后，皮埃勒证实要在《批评》杂志刊登这篇“极为厚重、丰富而新颖”<sup>③</sup>的论文，尽管其长度使之必须分两期刊登，即1965年12月号和1966年1月号。德里达后来好几次承认：这篇文章，即《论文字学》一书第一部分的雏形，是随后奠定他研究重心的“子宫”。

按照《批评》杂志的规矩，文章首先作为对三部作品的评介存在：大卫(M.-V. David)的《17和18世纪的文字与象形文字之争》，安德烈·勒鲁瓦-古尔让的《手势与话语》，以及研讨会论文集《文字和种群的心理》。但《字母之前的文字》所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些作品。德里达在提出“文字学”这一概念之前，预言般地提出了“书的终结”(la fin du livre)这个说法。 201

文章细致分析了整个结构主义的主要参照，即索绪尔的语言学推定。德里达肯定差异性语言价值的源泉这一中心主题，但认为索绪尔的思想仍然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的主宰，即长期以来贬低文字的“语音文字的形而上学”。但文章的用意并不限于语言学或人类学问题。德里达延续海德格尔的做法，致力于

① 让·热内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② 德里达致阿尔都塞的信，1965年8月2日。

③ 让·皮埃勒致德里达的信，1965年10月3日。

“撼动一种本体论，它在其最内在的过程中，将存在的意义决定为在场，语言的意义决定为话语的完全连续性”，而且极力“使接近、即刻、在场这些人们以为很了解的词语变得神秘难解”<sup>①</sup>。

一个人们常常用以指代德里达思想的重要概念也在文中出现，这就是解构（*la déconstruction*）。德里达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这位日本人无法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令人满意的对应词——中对这一词汇的选择给出了最为清晰的解释。

202 当我选择这个词，或者当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人们在当时与我有关的言论中看出它有如此核心的作用。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我当时想将海德格尔的用词“Destruktion”或“Abbau”翻译过来，并使之适用于我的论题。这两个词在此语境中针对对本体论或西方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的结构或传统建构所进行的行动。但在法语中“destruction”这个字太明显地含有消灭、否定的缩减等意义，更接近尼采式的“拆除”（*démolition*），而不是海德格尔的诠释或我所提出的解读类型。因此，我避开了这个词。我还记得去探寻“déconstruction”这个词（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十分自发地想到了它）是不是法语。我在《里特雷》（*Littré*）辞典里找到了它。其语法的、语言学的或修辞学的意义同某种“机械”的意义相关联。这一关联在我看来十分完美。<sup>②</sup>

在更加细微的层面上，可以说明的是，“解构”（*déconstruire*）作为动词，在德里达开始将之赋予新生命的时候并未被完全遗忘。1960年，它被用在吉尔贝·贝科（*Gilbert Bécaud*）一首成功的歌曲《不再》中，词作者为诗人和官员路易·阿玛德（*Louis Amade*）。

难以承受友人不再

①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Éditions de Minuit, coll. “Critiques”, 1967, p. 103.

② 下面是 *Littré* 给出的动词“déconstruire”的解释：

1. 将整体分解成部分。解构一台机器以便将之运往他处。
2. 语法用词。进行分解。将诗句分解，通过取消格律使之类似于散文。
3. 自我解构。失去其结构。“现代知识证明，在静止的东方国度，达到完善程度的语言单是因为人类精神固有的变化法则就会自我解构，自我改变。”（*Villemain, Préface du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Jacques Derrida, “Lettre à un ami japonais”,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Galilée, 1987, p. 388。在我看来有必要说明，“Destruktion”在德语中并不是日常用语；而用于哲学时，这个词并没有法语的“destruction”不可避免包含的消极含义。

曾每晚来到这桌旁的友人  
他不再来，死亡是悲惨的  
它刺穿心灵，将你解构。

《字母之前的文字》的第一部分刚在《批评》杂志发表就引起知识界的关注。米歇尔·福柯并不隐瞒他对这篇“具有解放精神的文章”的兴奋之情：“在当代思考的范畴内，这是我所读到的最激进的文章。”<sup>①</sup> 列维纳斯也肯定地说自己被这些“炽烈、醒目的篇章吸引着”：“尽管您忠实于海德格尔，但您强有力的出发点宣告了在他之后第一部新书的诞生。”<sup>②</sup>

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也重申他对“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文章”的赞赏。德里达用抒情的语句向他表示感谢：“这笼罩着我的奇迹般慷慨的关注对我而言是怎样的帮助啊。到现在，两年了，它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这对我是多么巨大的福气！我永远无法向您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到惋惜：地理上的距离使她们无法如愿常常见面。

203

我是那么需要您的建议，您细心的经验，您耀目的学养。我很久以来就了解这一点，但您自称为“老阿拉伯人”的上一封信证实了我的情感。我多么希望您对我讲述易本·马萨拉（Ibn Massara）、科尔班（Corbin）、马西尼翁（Masignon）。<sup>③</sup>

根据巨著《结构主义史》的作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的说法，1966年是结构主义这一全新范式的巅峰。这是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出版的年份——它出人意料地畅销，是罗兰·巴尔特与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围绕新批评理论激烈对抗的年份，也是拉康将散落各处的文章汇编成巨著《作品》出版的年份。德里达在这一年没有发表作品，也尚不为公众所知，但他的多篇文章和演讲证实他将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将是“20世纪的伟大精神”之一，正如弗朗索瓦·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大胆断言的那样。

也是在这一时期，德里达周围渐渐形成一个圈子，其中作家要多于哲学家和大学教师。德里达非常重视寄来的书，写下热情、厚重的长信寄给埃德蒙·雅贝斯或

①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5年12月21日。

② 列维纳斯致德里达的信，1966年1月30日。

③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6年1月21日。

米歇尔·德基这样的朋友，也给《原样》的撰稿人或与之接近的作者，如让-皮埃尔·费伊（Jean-Pierre Faye）、马塞兰·普利耐（Marcelin Pleynet）、让·理夏杜（Jean Ricardou）、克洛德·奥利耶（Claude Ollier）。

他将与罗日·拉波尔特结下长久的友谊，后者比他年长五岁，是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密友。他在“传记”这一标题下逐渐建构的庞大写作计划足以令德里达着迷。对于拉波尔特来说，这个计划的要紧处在于“颠覆长久以来在生活与写作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普通的生活先于可从中得到的叙事，但我打赌，某种生活既非先于也非外在于写作……你无法就尚未发生的故事，以及闻所未闻，只有写作才有可能抵及的生活进行叙述。”<sup>①</sup>

第一卷《守夜》于1963年由迦里玛出版，但直到1965年德里达才在米歇尔·福柯的建议下发现此书。他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热情，以至拉波尔特很快将第二卷《细默之声》的手稿寄给了他。德里达十分敏感地注意到拉波尔特对语言极限的探索，以及接近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的语气：“您大概知道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话，‘不能说出的就（不）应该沉默’<sup>②</sup>，我深信您正好与之相反。”拉波尔特的作品在德里达看来就像他自己研究的镜子，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恐惧。它在许多方面代表着他梦想抵达的目标，而他同时又感到有用哲学来保护自己的需要。

我如此确信您的举动意义重大，这是我眼中最为彻底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它令我着迷，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由于无能而痛苦地放弃这样的写作。……靠近这一界限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尽可能地远离这界限以免被威胁者（庆典或死亡）摧毁，同时尽可能地靠近这界限好不让自己昏睡。一面是对生命的威胁——对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那一点点安宁和警惕性的威胁，另一面是对话语（或文字）的威胁。……我常常感到，出于我也许有一天能克服的“恐惧”，我逃离了心灵的路线，而您则成功地践行着这条路线。……因此，我试图像您那样（只是多戴了一副面具），即在我的“生命”和我的“思想”之间有一条多余的弯路，外加的“另一个”，以及一种十分痛苦的（请相信我）间接话语。<sup>③</sup>

---

① Propos de Roger Laporte cités par Thierry Guichard dans “L'épreuve par neuf”, *Le Matricule des Angés* n° 32, septembre-novembre 2000.

②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65年8月10日。

③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66年2月19日。

通过一位与索莱尔斯基为接近的比利时精神分析师玛丽-克莱尔·布斯 (Marie-Claire Boons), 德里达还结识了亨利·博肖 (Henry Bauchau), 当时他还是位几乎刚刚起步的作家, 尽管已年过五十。博肖定居在瑞士, 与妻子一同主持一个专为美国女孩开设的豪华寄宿学校, 名为蒙特萨诺学院, 但他常来巴黎进行教学分析, 并且每有可能就参加拉康的研讨课。1966年, 他的第一部小说《撕裂》深深打动了德里达。

此文令人钦佩, 请允许我简单地对您这样说, 既不热情洋溢, 也不用陈词滥调, 其深刻、清晰、力量与审慎令人钦佩。就我所知, 这是第一部这样的文学作品, 其中精神分析源泉与诗歌实践以同样的把握度相混合, 相环绕, 甚至相交融, 既真实又独一无二。……除了诗的美和成功外, 它对文学还具有示范意义, 后者应该真正穿越“分析”, 而不仅仅停留于向精神分析借来崇拜物上。<sup>①</sup>

博肖的第一部小说给德里达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也是因为他第一次全身心地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 在此之前他只是以“非常零星的、不充分的、传统的”<sup>②</sup>方式读过。他解释说, 直到1960年代中期他一直未曾考虑精神分析在他的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他同玛格丽特的交谈必定促进了这两者的接近: 她通过翻译梅拉妮·克莱因 (Mélanie Klein) 的几部论文, 开始资助一次教学分析。<sup>③</sup>

应安德烈·格林 (André Green) 之邀, 德里达于1966年3月第一次就弗洛伊德发言。格林希望巴黎心理分析协会向结构主义与现代性开放, 并希望在他的研讨课上围绕德里达最近的文章进行讨论, 但德里达的讲演大大超出了这一范围。德里达以“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为题, 详细分析了两篇不大为人所知的文章, 即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概论》和1952年的《关于神奇拍纸簿的说明》。与拉康相反, 德里达试图阐明无意识更属于象形文字, 而非话语。他将弗洛伊德引为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要同盟, 强调了“事后性” (Nachträglichkeit) 和“延迟” (Verspätung) 等概念的重要性。

一般的在场并非原初的, 而是构建的, 并非构成经验的充实生动的绝对形

① 德里达致亨利·博肖的信, 1966年7月24日。

② Jacques Derrida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275.

③ 对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通过玛格丽特, 也有可能是通过1959年在瑟里斯认识的朋友尼古拉·阿伯拉罕, 德里达发现了梅拉妮·克莱因的作品。他在《论文字学》中用很长的篇幅论及《精神分析论》 (*Essais de psychanalyse*) 中的一篇, *op. cit.*, p. 132-134。

206 式，并没有活生生的在场的纯粹性，这就是弗洛伊德通过不等同于事物本身的概念性呼唤我们思考的主题，这一主题对于形而上学的历史来说妙不可言。这也许是唯一不会在形而上学或科学中穷尽的思想。<sup>①</sup>

那个晚上，德里达面对的只是圣-雅克街精神分析学院一间小讲堂里的20多名听众，但他对弗洛伊德文章的创新性解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发表在《原样》第25期上经过扩充的文章带来了大量积极的回应：“越来越明显，没有您我们怎么办？”<sup>②</sup> 罗兰·巴尔特这样给他写道。

※ ※ ※

尽管工作能力巨大，德里达仍常常在信中将自己形容为“教学和家庭之间的困兽，在教课、作业、购物以及种种义务之中无喘息之机”<sup>③</sup>。此前他相信自己即将梗塞发作，医生们也难以让他安心。他刚刚见过热娜维耶尔·波莱姆，她建议他多保重：“在我看来，您的社交生活是您声名鹊起的代价，但您必须防备前者，好保护后者。”<sup>④</sup> 德里达将很难听从这一建议。

207 让·伊波利特曾极为欣赏《字母之前的文字》一文，他希望在“厄庇米修斯”丛书中收入扩充后的版本。但让·皮埃勒和子夜出版社的老板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想要推出一个新的延续《批评》杂志的文论丛书。他们坚持让《论文字学》成为丛书的第一本，这一前景对德里达来说再荣耀不过了。从他在《批评》上发表的长篇文章到他刚刚在高师开的研讨课“自然、文化、文字或字母的暴力，从C. 列维-斯特劳斯到J.-J. 卢梭”，他拥有全部必需的材料。但很大一部分还仅仅停留于笔记的形式——大量卡片、纸条、各式纸张。

1966年夏初，德里达万分沮丧，心神恍惚。他感到亟须休假与隐退，同时又想利用这没有课的几个月完成文章。但在弗莱斯纳独自工作几周，又参加了一个关于死亡与悲剧的“难以呼吸的”研讨会之后，他即将崩溃：“我肯定经过了一段‘神经’衰竭的时期，‘绝望’于此并不陌生。我应该不顾自己的意愿离开巴黎，同玛格丽特、皮埃尔和我生病的妹夫托付给我们照看的两个孩子一起在这里休息。”<sup>⑤</sup>

①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314.

② 罗兰·巴尔特致德里达的信，1966年8月8日。

③ 德里达致罗日·拉波特的信，1965年12月29日。

④ 波莱姆致德里达的信，1966年6月16日。

⑤ 德里达致德基的信，1966年8月20日。



支撑着他的有索莱尔斯的友谊和与《原样》的密切交往，这本期刊使他得以在十分有利的默契条件下将他关注的哲学、人类学和文学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他很高兴索莱尔斯与他分享自己的研究工作，将《文本中的萨德》和《文学与整体》这两篇文章先给他看。德里达认为它们“极为精彩”，确信关于马拉美的文章让他“学到了很多”。他相信，有这两篇文章，还有普林耐关于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的“有力而中肯”的文章，“下一期《原样》将会产生反响，带来回应。它将成为返季的大事。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一致性不容置疑，具有爆炸力”<sup>①</sup>。

索莱尔斯的兴奋之情亦不逊色。在1966这一年，德里达对他来说是为“文本性”（textualité）问题赋予哲学框架的重要思想家。他迫切想要把这些在他看来是“无尽的思索”源泉的文章汇集起来，形成《原样》中的一本。他确信只有一本书能呈现这一全新思想的影响力。索莱尔斯常常感到德里达说的话没有人真正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就连他本人也难于“让他人明白”。他自己的作品也遭到这种抗拒，其时他刚刚开始一部新小说的艰难历险，这便是后来的《数目》。他希望德里达想象这样的文本，它“负载着我们在神话层面上所‘思想’的东西，是其荒诞的痕迹……我要说（不是发牢骚）这是一颗奇特的重磅炸弹，而这么说并不能教会您什么”<sup>②</sup>。

208

※ ※ ※

夏末，德里达始终处于“低气压地带”，无法走出使他陷入忧郁的巨大疲劳。他试图工作，却无甚进展，不耐烦地等待着重新振作起来。在高师重新开始上课时，他抱怨说“同这些年轻人没完没了的时常很紧张的‘对话’让他气馁”<sup>③</sup>。

9月16日，德里达向皮埃勒解释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写作计划逐渐扩充，但进展没有他所希望得那么快，特别是他必须将夏天的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关于胡塞尔的一部作品，即后来的《声音与现象》。他答应写的书至少要迟交两个月。《批评》的主编用理解、友善的口气给他回信，他尤其不愿催促他：“一部关键文本的写作”必须有成熟的孕育过程。但他也不能过于延搁：第一部分所引起的出乎寻常的关注使得德里达必须全神贯注完成这部十分令人期待的书。<sup>④</sup>

1966年10月30日，德里达向皮埃勒宣布开始了《论文字学》的打字稿。去美国的一次旅行让他有些疲倦并耽搁了些时日，但他希望能在11月底交稿。“无论如

①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无日期（1966年夏）。

②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6年8月27日。

③ 德里达致拉波爾特的信，1966年9月24日。

④ 皮埃勒致德里达的信，1966年9月28日。

何，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现在是最后的整理阶段。”<sup>①</sup> 但几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伊波利特和冈迪拉克鼓励他将《论文字学》作为第三阶段论文，随后可以成为补充论文。这个建议对他很有利，因为这样的话他进行主要论文答辩时就不必再做这项工作了。德里达想要顾及大学体制：他显得“很久以来对此过于忽略”<sup>②</sup>。现在最好还是做出让步，尽管这又带来一些编纂上的变化：根据当时严格的规定，书要在论文答辩几周之前付梓，但只有在答辩之后才能进入书店。皮埃勒仍然抱着十分理解的态度，接受了这新的限制及其所带来的延搁。

※ ※ ※

德里达把即将去美国的行程描述为这段磨难重重的时期的又一个干扰，而实际上这次旅行将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旅行的缘由是著名的巴尔的摩研讨会“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由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教授理查德·马克塞（Richard Macksey）和欧金尼奥·多纳托（Eugenio Donato）组织，他们想借此使人了解法国思想界的最新进展。这一年，结构主义在巴黎盛行，但在美国，无论在书店还是校园，它尚完全不为人所知。在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帮助下，马克塞和多纳托准备了一份大师云集的名单，包括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吕西安·戈尔德曼、让·伊波利特、罗兰·巴尔特、让-皮埃尔·韦尔南和雅克·拉康。

1966年10月18日至21日，所有与会者下榻于天台酒店。在那里，拉康和德里达第一次被介绍认识：“我们非得等到了这儿才见面，而且是在国外！”<sup>③</sup> 拉康友好地感叹道。伊丽沙白·鲁迪奈斯库详细描述了随后的情形：

第二天，在组织者举办的晚餐上，德里达提出了一些他关注的问题，如笛卡尔的主体（sujet）、实体、能指。拉康一边站着品尝一份甜白菜沙拉，一边回答说，他本人的主体同他的对话者用来反对主体理论的主体是一样的。这一说法本身并不错，但拉康急于补充说：“您不能忍受我先说出了您想说的话。”老调重弹，又是窃取他人想法这个主题，又是对概念所有权和占先权的幻想与自恋。够了。德里达没有上钩，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不是我的问题。”拉康失望

①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66年10月30日。

②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66年11月12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our l’amour de Lacan”, in *Résistances—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1996, p. 69.

了。晚些时候，他靠近德里达，把手友好地放在他肩上：“啊！德里达，我们得谈谈，我们得谈谈！”他们没有再谈……<sup>①</sup>

拉康在法国已成为明星，也想如同明星一般出现在巴尔的摩研讨会上。他大概想让自己这第一次在美洲的旅行像弗洛伊德1909年的赴美之旅一样成为传奇。他在会议的第二天发言，坚持排在另一名在场的精神分析学家居·罗索拉多（Guy Rosolato）之前，令后者的妻子极为不快。他用英文开始讲演，而他的英文远未到熟练掌握的程度，接着又变成了几乎听不懂的英法混杂。讲演题目本身就令人错愕：“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逐字翻译就是：《作为先于任何主体的他者的混合的结构》。译员很快宣布无能为力。听众不知所措。组织者为此“巨大的闹剧”<sup>②</sup>而惶惑不安。

德里达的发言在第三天下午，就在会议作结之前。这并没妨碍这篇讲演——《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La structure, le signe et le jeu d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成为会议最重要的发言。乔治·普莱的研究尽管与德里达截然相反，他却对所有未能与会的人称赞这“令人赞叹的讲演”，特别是对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后者将成为德里达在美国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sup>③</sup>刚进入约翰·霍普金斯的大学生大卫·卡洛尔（David Carroll）也惊叹于这位不知名的年轻哲学家的讲话：“我们正在发现结构主义，而他却对我们刚开始学习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我立刻感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事件。”<sup>④</sup>

211

的确，德里达的发言远远超出了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他的一些说法将在美国盛行“法兰西理论”（french theory）时成为准则。他再次提出必须同“在场的伦理”与“对源头的怀念”决裂，提倡将符号从一切中心论的宰制下解放出来。面对幻想着“辨识真理”的古老诠释学，他希望代之以一种“肯定游戏，超越人及人道主义”<sup>⑤</sup>的诠释方式。这并不意味着翻过哲学的一页，而是以真正全新的方式去阅读哲学。正在形成中的全部解构体系就浓缩在这几段强有力的文字之中。

①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1925—1985, op. cit.*, p. 417. une excellente évocation du colloque de Baltimore est également proposée dans le livre de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La Découverte/Poche*, 2005, p. 38-42.

② 巴贝特·热奈特1966年11月4日致玛格丽特和雅克·德里达的信里引用了乔治·普莱的这句话。

③ 同米勒的访谈。

④ 同卡洛尔的访谈。

⑤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op. cit.*, p. 428.

在德里达发言后的讨论中，伊波利特承认自己既茫然又满怀钦佩：“我不能确切看出您的方向。”德里达回答：“我曾自问我是否知道我的方向。所以我这样回答：我恰恰试图抵达这样的点，在那里我不再知道我的方向。”秉持人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尔德曼则将德里达的演讲视为质疑主体的最激进的翻版。这让他提出一个奇特且颇令人不快的比较。

我并不同意德里达的结论，但我发现他在法国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为此我向他致敬。他让我想起了我1934年来到法国的时候。那时在大学生中有一个强有力的王权运动；其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群体，他们也捍卫王权，但呼唤的是一位真正的墨洛温国王！<sup>①</sup>

德里达同拉康的交道还没打完。从巴尔的摩回来几周之后，他收到厚厚的一本212《作品》，扉页上写着：“致雅克·德里达，这敬意请他随意处置。”善于长篇大论的德里达几周之后回复了一封短信，这是他寄给拉康的唯一一封信。

我收到了您的《作品》，非常感谢。上面的致辞，您知道，不会不让我吃惊。“无从处置的文字”，我一开始这么想。但思索之后，应您的开放之邀，我在其中加入了我的思想，我产生了另外的想法：这一致辞是真的，我该照单全收。我知道您在“真的”这个字里面也会放入您的思想。

至于您的书，我肯定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有时间去读。我将用我所能有的全部注意力去读它。<sup>②</sup>

但在他尚未实现这一承诺之前，另一起个人事件将使他们本已糟糕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德里达后来在鲁迪奈斯库撰写《法国精神分析史》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这一事件很重要，请原谅我在此进行长篇摘录。

巴尔的摩会议一年之后，在巴黎又有一次晚餐：在让·皮埃勒家里。拉康热情地用他滑腻的手掌握着德里达的手，问他在研究什么。柏拉图、苏格拉底、药、文字、起源、逻各斯、神话：哲学家正在为《原样》撰写一篇文章。……

---

①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actes du colloque de Baltimore dirigés par Richard Macksey et Eugenio Donato,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 276-269.

② 德里达致雅克·拉康的信，1966年12月2日。

他（拉康）又一次声称多么奇怪，他已经讲过同样的主题。他的学生们可以作证。为避免争执，德里达对拉康讲了一件趣事。一天晚上，玛格丽特也在，准备入睡的儿子皮埃尔问父亲为什么看他。

“因为你很好看。”父亲说。

孩子立刻回答说，这奉承话让他想去死。德里达有些担心，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爱我。”孩子说。

“从什么时候？”

“从我说话的时候。”

玛格丽特抱起他来：

“别担心，我们爱你。”

皮埃尔大笑：

“不，这都不是真的，我是个在生活中作弊的人。”

拉康不动声色。过了一段时间，德里达惊愕地发现这个小故事出现在对话者的笔下，在1967年12月拉康在那不勒斯的法兰西学会发表的演讲中。拉康是这样说的：“‘我是个在生活中作弊的人’，一个四岁的孩子蜷在母亲的怀里，对他的父亲这样说，后者刚刚对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你看我？’回答说‘你很好看’。这个父亲并没从中辨认出（尽管其间孩子骗他说失去了对自我的兴趣）他自己在扮演死亡时递给他者的死结。致这位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无论他是否听得到。”<sup>①</sup>

对这段私人对话几乎是报复性的滥用深深伤害了德里达，他不再推进同拉康的私交，但他仍然仔细阅读了《作品》。

<sup>①</sup>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1925—1985, op. cit.*, p. 418-419. Cette conférence de Lacan a été republiée dans *Autres Écrits*, Seuil, 2001, p. 333 Derrida commente la séquence dans sa conférence “Pour l’ amour de Lacan”, prononcée en 1992 et reprise dans *Résistances—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1996, p. 69-70.

# 第 12 章 丰硕的一年

## (1967)

214 德里达 1967 年 1 月 12 日寄给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信表明，即便在最近的成功之后，这位老作家的评价对他仍然是多么重要。德里达信中语气时而抒情，时而私密，与对所有其他通信者都极为不同。

我永远无法向您表达足够的谢意。……在日渐扩大的沙漠中，没有什么能像您的理解那样珍贵。我常常害怕不能与之相称。为了让自己安心，我任由自己被信任和钦佩引导：我对自己作品的判断全凭您告诉我您对它们的兴趣决定。我需要相信您，特别是我行走在不断消失的土地上。

在此，有骚动，有喧哗，也有深深的沉默。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巨大的焦虑，以及同样巨大的贫瘠。面对正在坍塌的世界，四面八方尽是喧闹，尽是疯狂的喊叫和崩裂，但懂得聆听的人却感到一片深深的死寂。我在其中，尽管绝望，却仍然尝试着平静，尝试着并不是——并不太是——装聋作哑的平静，尝试着为这个时代提供手工艺人的劳作（教学，制作小文），为了不至于完全昏了头。玛格丽特和皮埃尔——他们俩都为您深厚忠实的友情而深深感动——用坚定的生命的力量帮助我做到这一点。<sup>①</sup>

215 从美国回来之后，德里达的确在勤奋工作，“但主要是对同样的论点进行检视和重新组织”。布努尔现在菲尼斯太尔南部安居下来。德里达很惋惜他们见面的机会太少，希望能尽快实现两人一起去摩洛哥旅行的计划——布努尔对摩洛哥很熟悉。正

---

<sup>①</sup> 德里达致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信，1967 年 1 月 12 日。别忘了皮埃尔那时只有四岁半……

如他后来又说过的，同布努尔的关系继续长久而重要地支持着他。没有这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美妙的接近”，他觉得没有什么还能持续下去，“甚至没有这与虚无和荒谬的游戏，没有这无望的严谨，它还能面对游戏和与死亡的关系”。德里达梦想着“长时间的、持久的、无尽的会面，间以共同的阅读和沉思，还有表明巨大默契的简短对话”<sup>①</sup>。

※ ※ ※

1967年年初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他与热拉尔·格拉奈尔恢复了联系。他们之间很快产生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这位在路易大帝高中时代令德里达印象深刻，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如隐形人一般的“哲学王子”听说了人们对德里达最新文章的高度赞赏，迫不及待想要读到它们。德里达赶紧寄给他一系列单行册，主要有《字母之前的文字》——《批评》分两期刊登的文章——和《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格拉奈尔毫不掩饰他的兴奋。

我收到这两篇鸿文后，当天（加上半个夜晚）就把它读完了，如同持续不断的启示与喜悦。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地说出来呢？……我感到一种至关重要的话语——对不起，是“文字”——通过你诞生了。<sup>②</sup>

格拉奈尔知道德里达很快将对这些文章进行修改和阐发，但他还是说自己很高兴看到了它们“粗粝的形式，一种思想从此诞生并穿透。那其中有断裂或跳跃，时

216

而还有预言式的明暗对比，比任何滴水不漏的文章都更富于启发性”。两人很快建立了丰富的通信联系。格拉奈尔已在图卢兹大学执教数年，正在完成关于胡塞尔的论文。他应该在5月初来巴黎，主要的愿望就是和德里达“长谈”，因为他们两人思想的联系令他如此震惊。<sup>③</sup>

※ ※ ※

让·皮埃勒越来越欣赏德里达，常常就《批评》收到的投稿询问他的意见。被问及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早期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篇文章时，德里达开诚布公地回答：

<sup>①</sup>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7年7月9日。

<sup>②</sup> 热拉尔·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月6日。

<sup>③</sup> 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4月11日。

我刚读完巴迪乌的文章。同您本人与巴尔特一样，我觉得他让人恼火的地方是作者的口吻和文章表现出的态度，还有他分配给每个人的“注释”，就好像是大审查或最后的审判。但在在我看来，他并不因此而不重要。……我相信人们无法怀疑这一点，我愿意认可他的重要性，特别是，我感到自己在“哲学上”远远跟不上他的行进或他的结论。<sup>①</sup>

很自然地，皮埃勒很快提议德里达进入杂志编委会，与德基、巴尔特和福柯在一起。杂志的决策并不正式：编委会议通常在皮埃勒家里进行，伴随着午餐或晚餐。《批评》不表现出倾向于任何“路线”，但至少在这些年间始终贴近时代，生机勃勃。1967年开始与杂志伴生的丛书将更增加其影响力，提高其地位。

虽然书稿的打字过程要比预想的漫长和艰难，德里达与皮埃勒仍然希望看到《论文字学》在夏天之前问世，与索莱尔斯准备在瑟耶出版社的《原样》丛书中出版的《书写与差异》同时。对于《论文字学》来说，日程问题相当复杂：作品应当在5月初之前出版，以便正式交到三名评委手中，但它在书店上架的日子则绝不能在预计6月举行的答辩之前。

德里达很快告知索莱尔斯，《论文字学》最终只能到9月份出版。他在想是否也应推迟《书写与差异》的出版，好让两部作品不要分开。他担心分开出版会造成零散的效果，也担心两书之间大量的相互参照得不到反映。他认为最好在同一天出版他正在等着校样的“小胡塞尔”：“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9月份同时出版对所有人都有好处。”<sup>②</sup>这并非索莱尔斯的意见：他更愿意按照约定，在春季出版《书写与差异》。

这本436页的大书始终是德里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汇集了1963年以后刊登在期刊上的大部分文章，只有少许改动；文章按照发表年代顺序编排，使其间的关联得以体现。全书开篇的文章是关于让·鲁塞的《力量与意义》，接下来是《我思及疯癫史》、《埃德蒙·雅贝斯和书的问题》、《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思想》、《“起源与结构”和现象学<sup>③</sup>》、《被劫持的言语》、《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残酷戏剧和再现的终结》（德里达第二篇有关阿尔托的文章）、《从有限经济到普遍经济：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关于乔治·巴塔耶的文章，刊登在《拱》上）、《人文科学

---

①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67年2月26日。巴迪乌的文章题为“Le (re) commencement du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最终将刊登于《批评》第240期，1967年5月。

②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7年3月21日。

③ 这篇文章是1959年在瑟里斯的讲演，因此是全书最早的一篇，但会议论文集直到1965年才在Mouton出版社出版。



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巴尔的摩研讨会上的发言）。全书以《省略》作结，这篇关于雅贝斯的文章未曾发表过，题献给加布里埃尔·布努尔。

对于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是第一部真正个人的书，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作者的位置。按照他一生遵循的做法，他将大量写有题词的样书寄给过去和现在的朋友。218  
路易大帝高中或于姆街的老同学们反应不一。让-克洛德·帕里安特十分热情：“我高兴地重新发现了我青年时代的杰基的哲学气质，当然更加成熟并且仿佛升华了，还有概念上的轻盈感，使你的作品从不让人无动于衷。”<sup>①</sup> 让·贝勒曼-诺埃尔则说自己先是看到德里达“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位‘大人物’，并且日渐超越了其中的许多人”<sup>②</sup> 而“深感幸福”，但他很快承认被“超越”，对大多数文章不感兴趣：“我比预计更早开始阅读你的书。我没有全读，而且即便是出于友谊我也不会全读。”<sup>③</sup> 从米歇尔·莫诺里开始，好几个过去的密友保持了沉默。

幸好还有其他并非可以忽略的朋友表现出巨大的兴奋。米歇尔·福柯读过《书写与差异》中几乎所有的文章，他再次一口气把它们全部读完，惊讶于“它们组成的这部具有令人赞叹的断续性的著作”。

在它们的并列中，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形成了一部令人惊奇的书，它从第一行字开始就处在不间断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读过它们，却没有觉察到除了这些文章本身，还有这篇正在浮现的文章中的文章。这是为了告诉你我怀着怎样迫切的心情等待着预告中的文章。<sup>④</sup>

几周之前，列维纳斯向他热烈致谢，同时并未隐瞒自己有所保留。他借此机会重读了关于自己的文章，“其中有如许的理解，再加上如许的不相容”<sup>⑤</sup>。1967年6月6日，在人们很快称之为“六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德里达给他写信。他从冲突开始就“守在收音机旁”，承认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以色列一边发生的事件纠缠”。这自然使他更加接近列维纳斯。

对列维纳斯刚寄来的文章——很可能是《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的增订版——加以评论后，德里达在这封也许以后不会再有的长信里描述了他关于哲学 219

① 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5月20日。

② 让·贝勒曼-诺埃尔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5月13日。

③ 让·贝勒曼-诺埃尔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6月12日。

④ 米歇尔·福柯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6月12日。

⑤ 列维纳斯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5月16日。

对话的思想：这是一种艰难而严苛的对话，只有通过文章才能真正进行的对话。它并非想要拉近无法接近的东西，更不是“讨论”，而是为既尊重又绝不妥协的面对面对话准备条件。

您知道，通过您和我的文章，通过它们相互的关注，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它们的“对话”是来源于怎样的差异和怎样的接近啊。这也是“博爱”。在这交流中说出的要比我们在一封信里所能表达的更多。在这交流和我们日常的工作中说出了更多：对我而言，我做的一切，您的思想都以某种方式在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含蓄的，但却是必然的。有时会受到质疑，您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在思想产生的时刻它是必然的。我在此无法进行解释，但我要说，两三年来，通过《暴力和形而上学》尚未产生的某种运动，我感到，以另外的方式，我同您既更接近又更遥远。<sup>①</sup>

即将到来的更加体制化的前景则让德里达难以兴奋起来。主持第三阶段论文评委会和撰写答辩报告的是十分传统的亨利·古耶。我们可能还记得他1951年在一次学士学位考试中“赏给”德里达一个5分（满分20分），并肯定地告诉他等到愿意“接受规则而不是在需要询问时却去创新”的时候再回来：现在他得到《论文字学》的回报了！德里达希望得到第二名评委会成员保罗·利科更多的关注和善意，但利科只是浏览了一遍作品。他将为此向德里达致歉。……33年之后，他写道：“我用沉默迎接了您交给我的论文，我后来知道这让您失望了。”<sup>②</sup>

220 至于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他在答辩几周前承认尚未“真正阅读”此书，但他说能感觉到讨论将沿着怎样的方向进行。无论怎样，他们只有很少的时间，答辩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因此不可能严肃地就整体进行讨论。

关键是您拥有所需的头衔。您的名气毫无用处（《现代》杂志的调查指出，您已属于巴黎的风云人物，但不属于恐怖组织），但我们将很高兴正式向您重申我们很久以来对您的敬重。<sup>③</sup>

实际上，答辩过程并不像冈迪拉克所说的那样平静。正如德里达对德基讲述的，

---

① 德里达致列维纳斯的信，1967年6月6日。

② 利科致德里达的信，2000年4月7日。

③ 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2月14日。

“在学院的花束和表示钦佩云云之下”，在古耶所谓“‘张开双臂’的欢迎之下”，答辩过程是一场“战争行动——激烈、狂躁，所有现实的压力均施加于上，除了没人读过我的论文”<sup>①</sup>。德里达在一封给布努尔的信里反复提到，在他看来，答辩是“一种深刻的‘不理解’”，甚至是“一种盲目的抵制”，尤其来自利科，这让他吃惊而受伤。“误解在积聚，即便是在急于鼓掌的人们那里。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大学之外，我都感到不自在。但这是自在不自在的问题吗？”<sup>②</sup>

这一切都令人痛苦，特别是这只是附属论文，而且德里达远未完成大学的要求。关于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的选题，他同伊波利特商议对胡塞尔的符号理论进行新的解读，更确切地说，是讨论“胡塞尔符号论中的话语和文字”，但不大知道他何时能有精力从事此项研究。<sup>③</sup>

※ ※ ※

此刻，在几个月不间断的工作之后，他在尼斯，确定让自己什么也不做：“我从早到晚在水里和阳光下，找到一些彼岸的时间。我让事情慢慢积淀。”他有“强烈的欲望，翻过这层皮，这层旧皮”，幻想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重拾从前的计划，埋藏在巴黎和大学的紧迫工作下的古老计划”<sup>④</sup>。不过，他很快需要思考下一年关于黑格尔和波尔-罗亚尔逻辑学的课程。“至少需要一年绝对退隐的时间……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爆炸了。”<sup>⑤</sup>

221

他同索莱尔斯保持着有规律的友好通信。作家肯定地对德里达说：“我一直在想着您，就像我渴望对仅有的‘申诉机构’展示穿越我的和正在书写中的东西。”<sup>⑥</sup>德里达本想早点回信，但在“家庭带来的一些窒息感和泛泛的麻木感”，以及“与地中海重新结成的‘婚礼’”之间，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处在很久没有过的闲暇状态，新的工作也许正在成形，新的尺度正在被采纳。”<sup>⑦</sup>

这一年夏天，索莱尔斯和德里达的友谊将遭遇第一个小障碍，直接与一个新来者有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她于1965年12月自保加利亚来，修比较文学博士，认识了戈尔德曼、热奈特和巴尔特，不久又结识了索莱尔斯。这年轻女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德基的信，1967年7月10日。

②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7年7月9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onctuations, le temps de la thèse”,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50-451.

④ 德里达致德基的信，1967年7月10日。

⑤ 同上。

⑥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7月20日。

⑦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7年7月25日。

子的美貌、聪慧与魅力，作为“异乡女子”<sup>①</sup>的魔力立即引起了震动。她带来了新的参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还有她创造的充满活力的概念——互文性（l'intertextualité）、泛文主义（le paragrammatisme），这使她在几个月之内登上巴黎知识界舞台，先是在马克思主义杂志《思想》上，后从1967年春天起，在《批评》和《原样》上发表文章。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的关系一开始非常友好。德里达阅读胡塞尔的全新方式令她十分着迷。特别是，她认为他是唯一能够将经过精神分析学过滤的现象学与文学体验相结合的哲学家。<sup>②</sup>但很快发生了第一件事：索莱尔斯激烈指责德里达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文章《意义与时尚》（关于巴尔特的《时尚体系》）在《批评》杂志发表之前先给了弗朗索瓦·华尔（François Wahl）看。德里达对这指责表现出吃惊和受伤，索莱尔斯立即道歉，说没有什么比他们之间的误解更让他难以忍受了。但他想提供更多的情况：

在克里斯蒂娃这里，问题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关于这一突然而具决定性的思想的出现，已经有过许多的波折，许多的争论，许多小小的事件。我看见华尔对我说在《批评》上发表的关于巴赫金的文章是“胡言乱语”；我看见因为米勒和巴迪乌激烈谴责《原样》上的文章而引发的这样那样的争论；我又看见某个精神分析学家对这些作品的激烈谩骂；我又看见，仿佛在试管里孕育着的，以前称为最高效的一切阴谋的迹象。<sup>③</sup>

藏在这封信和以后几个月的见面之后的真相，是德里达被隐瞒了一个重要事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菲利普·索莱尔斯的恋情，以及随后他们在1967年8月2日严加保密的婚礼。当时他们两人都把对方视为秘密，如果不能称为地下情的话。<sup>④</sup>

玛格丽特和德里达在8月初回到弗莱斯纳等待他们第二个孩子的诞生。让·路易·埃玛纽埃尔·德里达出生于1967年9月4日，略早于预产期，但健壮安静。这三个名字不是偶然的：让源于热内，路易源于阿尔都塞，埃玛纽埃尔源于列维纳斯。孩子出生后的日子里，德里达得承担家事，对此他很不习惯。有了两个孩子，弗莱斯纳

① 《异乡女子》是罗兰·巴尔特就克里斯蒂娃写的文章，刊登在1970年6月1日的《文学半月刊》上，重载于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Seuil, 1984。

② 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访谈。

③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9月28日。

④ 关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刚到法国时的更多细节，见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Seuil, coll. "Fiction & Cie", 1995, p. 249-259。

的公寓变得十分逼仄。德里达和玛格丽特开始考虑买一所房子。德里达因为给一小群美国学生上研讨课而使得收入增加,但他们很快意识到需要离巴黎更远些。

1967年确乎是所有诞生的年份。德里达有两本新书在秋天面世。

《声音与现象》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在伊波利特主持的丛书中出版。这部小书简单地呈现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的介绍”。但它实际上对《书写与差异》和《论文字学》讨论的问题进行了阐发,用另外的方式质疑了整个西方历史赋予在场和声音的特权。正如德里达在序言中所解释的:

我们的问题的最宽泛的形式是这样规定的:现象学的必要性,胡塞尔分析的严密与细致,它所响应的要求,亦即我们应当首先承认其合理性的要求,这一切难道不是仍然掩藏着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吗?……

因此,以符号这个得天独厚的概念为例,可以看到现象学批评仍然如同不容置疑的形而上学内部的一个时刻。或者不如说,可以开始证明,现象学批评的源泉就是形而上学设想本身,就在于其历史的完结,及其起源之重建的纯粹性。<sup>①</sup>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现象学的问题,简而言之,就在于激发其研究工作的最深刻的欲望:解放“原初的”经验,抵达“事物本身”,就在其“纯粹的在场”。在《声音与现象》中,他努力阐明“存在于人称思想和某种符号、标记或踪迹的游戏之间的依赖性”<sup>②</sup>的哲学深意。

许多哲学家认为《声音与现象》是德里达的重要作品之一。康吉莱姆和伊丽莎白·德·丰特奈读完第一遍就向他表示钦佩。比利时著名的现象学家雅克·塔米尼奥(Jacques Taminiaux)也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热情,将它与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置于同样的高度。让-吕克·南希在今天仍然将它视为德里达著作的一个巅峰:“《声音与现象》在我看来仍然是他作品中最权威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最令人激动的,因为它包含了它全部工作的核心:自我在场的疏离,在无限与有限之间维系着艰难联系的延异。这对我来说确乎是他思想的核心、动力、能量。”<sup>③</sup>

但在1967年问世的三部作品中,《论文字学》仍然是最著名的。尤其是,通过这

① 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UF, coll. “Épiméthée”, 1967, p. 2-3.

② Denis Kambouchner, “Derrida : déconstruction et raison”, 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的讲演, 2007年5月23日(我在此感谢 Denis Kambouchner 转给我这篇尚未发表的法文版文章)。阅读 Daniel Giovannangeli 的文章 “La fidélité à la phénoménologie” 也会获益良多, 载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430, avril 2004, p. 40.

③ 让-吕克·南希致笔者的信。

本书，德里达思想开始在美国生根。不过，德里达自认该书由“有些不自然地组合在一起的异质的两部分”<sup>①</sup>组成。第一部分，《字母之前的文字》是发表在《批评》上的文章的扩充：此处对基本概念进行了阐发。第二部分，《自然，文化，文字》，耐心冷静地分析了《忧郁的热带》中的一章《文字课》，阐述了作者（列维-斯特劳斯）怎样处心积虑将南比夸拉（Nambikwara）人暴力的出现与文字联系在一起。

德里达刚刚质疑了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随之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学叙事发起抨击，这绝非偶然。它们是结构主义叙事的两个支柱，德里达认为这种统治着西方思想界的叙事仍然羁绊于“形而上学层理中的整整一层，有时是最丰硕的一层——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人们却过快地宣称已然‘超越’了它”<sup>②</sup>。

列维-斯特劳斯甚至不试图掩饰恼怒。德里达的这一章节在《分析手册》第四期发表后不久，他给杂志的编委会写了一封尖锐的信。

225

我还需要告诉你们我是多么重视你们最新的一期杂志对我的关注吗？但我无法摆脱不快的情绪，用更适合探讨斯宾诺莎（Spinoza）、笛卡尔或康德的注意力去探究我的文章，这难道不是演出一场哲学闹剧吗？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我写的东西值得如此关注，特别是《忧郁的热带》，其中我并未声称展示真理，而只是呈现一名民族学家在田野的遐想，我并不确认其逻辑性。

我也无法不让自己感觉到，德里达先生在剖解他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时，以精微的手法操纵着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总之，我很惊讶，以你们这样敏锐的头脑，假设愿意仔细阅读我的书的话，怎会来责备我，而不曾探询我为什么以如此轻率的方式运用哲学。<sup>③</sup>

但在德里达的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只占据了一章的篇幅。《论文字学》的第二部分主要用来讨论让-雅克·卢梭，特别是他的《论语言的起源》，这是一本当时几乎被人遗忘的小册子，德里达大胆地将其与《忏悔录》的某些段落联系起来。德里达将地位和风格都迥然不同的作品相对照，关注其最微小的细枝末节，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也许可以说是接近于精神分析师的流动倾听。他追踪着“替补”（supplément）一词的踪迹，发现它常常与形容词“危险的”相连，揭示出卢梭将该词时而与文字时而与手淫联系在一起，并在一种着迷的贬抑中将它们相结合。

①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②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op. cit., p. 148.

③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刊登在《分析手册》上的信，第8期，1967年。

他如此构筑的解读“应该始终指向作家未曾觉察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他运用的语言架构中他所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东西之间”<sup>①</sup>。这是一种“阅读应该产生的有意义的结构”，哪怕作品看来消失在其负载的所指内容面前。同经院传统相反，哲学或人文科学的叙事被视为彻底的文本。

《论文字学》的问世更加确认了《批评》杂志分两期刊登的文章所激起的兴趣。226  
10月30日，在《文学半月刊》上，弗朗索瓦·沙特莱以《书籍之死？》为题用一整页热情的文字介绍该书。11月8日，从1944年起主持《世界报》哲学专栏的让·拉克鲁瓦用一篇半页长的完整文章介绍了德里达。开头的几行便奠定了基调：

哲学正在经历危机。这危机也是一场更新。在法国，一批（相对）年轻的思想家正在改造着哲学：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等等。在这些名字之后，今后应该加上雅克·德里达。他为一小群出身高师的热情赞赏者所知，刚刚在六个月内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特别有名的是《论文字学》，这使他为更广大的公众所知。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使他看上去接近于“结构主义者”。他还他们以公平，承认普遍的思考从对语言的焦虑那里获得了奇妙的动力，这种焦虑只能是对语言的焦虑和语言里的焦虑。但他同他们拉开距离之处在于，这位毁坏传统者远不是从科学模式那里汲取灵感，他仍然是哲学恶魔的猎物。……德里达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解构”形而上学。哲学的根本概念将逻各斯、理性关闭在一种“终结”中。必须打开这“终结”，尝试去越轨。<sup>②</sup>

“延异”的概念在这篇扎实善意的文章中也得到了介绍，“字符”（gramme）和“印迹”（trace）亦然。拉克鲁瓦强调了德里达思想同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特殊联系，同时避免了后来的一些误解。他强调：“德里达并不愿忽视话语，独尊文字。”

三天前，在《日内瓦论坛报》上，阿兰·佩纳尔（Alain Penel）激动地向这位“质疑西方思想”的作者致以敬意，这次重点在《书写与差异》。赞扬毫无保留，有时十分坦率。

在他之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德·索绪尔、雅各布森 227  
（Jakobson）、列维-斯特劳斯等人都显得黯然无光。这是因为，总的来说，德里达比他们都要激进，他的思想考验着其他所有人的思想，他的思想希望并且成

① *De la grammatologie, op. cit.*, p. 227.

② 载《世界报》，1967年11月18日。

为对当代思想的思考。雅克·德里达指出，形而上学继续毒害着西方思想，从而使自己成为最大胆的当代思想者。他的工作定然会成为所有那些对我们的文化演变怀有兴趣的人——评论家、哲学家、教师、学生——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思考领域。<sup>①</sup>

这部备受期待的书为作者带来了大量信件。从夏天起就读完了全部手稿的索莱尔斯立即称之为“当之无愧的天才文字”<sup>②</sup>。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收到了题献给她的作为“默契的象征”的书，为此十分感动；她为自己从他的研究中已汲取的和将继续汲取的一切感谢他。<sup>③</sup>她不久便寄给他一系列问题，他将以此《符号学和文字学》<sup>④</sup>为题进行长长的书面回复。罗兰·巴尔特则从巴尔的摩向德里达热情致谢：《论文字学》“好像一本在宗教审判的国度出现的伽利略的书，或更简单地说，是在蛮荒之地出现的一本文明书！”这评价在今天看来不乏机智。

也是从美国，来了另外一封热情和充满期许的信，其中保罗·德·曼对德里达说，《论文字学》令他“深感兴味”。他期待这部著作带来“对他本人思想的澄清和进展”<sup>⑤</sup>，这是德里达在巴尔的摩的发言和他们最初的交谈让他预感到的东西。在前一年的研讨会期间，两人在早餐桌旁的交谈中意识到他们各自都对《论语言的起源》感兴趣。这是友谊的缘起，它将变得至关重要。德里达后来说，从这初次相遇开始，再没有什么能将他们分开，“没有一丝分歧的阴影”<sup>⑥</sup>。德·曼不久在《让-雅克·卢梭年鉴》上发表了一篇优美的介绍，随后又写了一篇长篇评论<sup>⑦</sup>，很快促使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位新的思想家展开研究。

当时正在师从保罗·德·曼准备论文的萨缪尔·韦伯（Samuel Weber）还记得，

① *La Tribune de Genève*, 15 novembre 1967.

②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7月20日。

③ 克里斯蒂娃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0月31日。

④ Cet entretien écrit sera publié dans la revue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VII en juin 1968, avant d'être repris dans *Positions* en 1972.

⑤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0月6日。

⑥ Jacques Derrida,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Galilée, 1988, p. 16.

⑦ Paul de Man, “Rhétorique de la cécité : Derrida lecteur de Rousseau”, *Poétique* n° 4, 1970. 这篇文章是下列著作中的重要部分：*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Londres/Minneapolis, Methuen & Co./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3. 德里达在德·曼死后提及这篇文章时说：“在欧洲和美洲，无论是否关乎解构，我都和保罗·德·曼一样，并且常常同他一起，幸或不幸地，激起了众多强烈的反应：许多的‘批评’，像人们所说的。这些批评在我眼中没有任何一种像保罗·德·曼的‘The Rhetoric of Blindness’那样，严谨中如此大度，不掺杂任何反语，尊重未来但从不媚俗。没有任何一种像他所做的那样让我觉得易于接受。没有一种给予了我如此多的东西去思考，尽管我感到并不同意他的评论，但也并非简单地不同意。”（Jacques Derrida,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124.）



在巴尔的摩会议之前的1966年年初就听德·曼谈到德里达：“刚刚读完《批评》发表的《字母之前的文字》，他就兴奋地同我谈论他。我立即读了此文，深感震动。我很快感到德里达完成了德·曼试图做到的事情。为此，德·曼本有理由对他至少是怀着暧昧的态度，但我从未感觉到这一点。他对他既无嫉妒也无怨怼，只有坦诚的谢意。”<sup>①</sup>

应保罗·德·曼的请求，德里达从1967年秋末起在巴黎为十几名来自康奈尔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学生开设了一门研讨课，题目是《文学评论的哲学基础》。他讲的课令他们着迷，特别是他对对话和个人接触抱着尤为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几人一样，大卫·卡洛尔留下了双重激动的回忆，因为他就在这门课上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

在巴黎的这门研讨课颠覆了我所有关于文学的想法，当然其中大多数确实是常规之见。简要地说来，雅克向所有参加研讨课的学生，这些期待着全然不同的东西，或者像我一样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的学生，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种双重的和双重批评的分析。他每周的课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展示出文学与哲学之间复杂而矛盾、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我被震撼了，我们全被震撼了，为他的风格，为他阅读、提问、分析文本的方式。一切都需质疑，一切都需重新讨论，并以另外的方式。为此，特别需要找到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文体，另一种书写。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sup>②</sup>

229

热拉尔·格拉奈尔并不满足于向“所有这些诞生，包括书和孩子”<sup>③</sup>表示祝贺。正在阅读他尚未发表的论文《胡塞尔哲学中时间与知觉的意义》的德里达成为他眼中唯一重要的读者。格拉奈尔则为《批评》撰写了一篇深入介绍德里达最近三部作品的评论——《雅克·德里达和划去起源》。

在这篇20多页的文章中，他礼赞一种深刻崭新思想的诞生。他大概是第一个使用了“德里达（式）的”（derridien, derridienne）这样的形容词。开始的几行不会不动他旧日的校友：“这已然是完整的作品，但绝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已然是完

① 同萨缪尔·韦伯的访谈。

② David Carroll, “Jacques Derrida ou le don d'écriture—quand quelque chose se passe”,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00.

③ 热拉尔·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9月8日。

整的书写，在一年的时间里像一面旗帜在我们头顶展开。在天空中看上去很美，有着全新的色彩。”<sup>①</sup>但在赞扬德里达及其保持着“尊重与绅士派头”的“战争法”时，格拉奈尔不惮对列维纳斯表现得更恶毒——他看不出后者如何能够从“德里达在他四周编织的网中逃脱”，对福柯更是如此：

福柯先生为他在《疯癫史》中对笛卡尔的处理招来了《几点评论》，里面有着无懈的耐心，可怕的温柔。从中也许能更好地看到，失落在作品中的一个“特殊点”如何能够使人先是逐渐地，随后突然而完全地进入这部完全开放的作品本身，而该作品就此被隐秘地击溃。甚而至于，只需将《疯癫史》的不足之处原封不动地转移（甚至不用转换）到《词与物》上，作为其纲领的“考古”这一概念之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亦将崩裂。<sup>②</sup>

此前一直“以热情的友谊”对德里达加以鼓励的福柯，这时希望德里达至少对这一段十分暴力的文字提出反对，如果不是反对整篇文章的话。但德里达这时已是《批评》的编委会成员，他向福柯重申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对与他有关的文章不加干预，既不支持也不反对。”<sup>③</sup>后果很快产生：虽然应让·皮埃勒的请求进行了修改，这几行字还是让两人的关系大为冷淡。根据德里达的说法，格拉奈尔的这篇文章甚至成为1972年福柯发出激烈反击的导火索。

对于这场糟糕的争执，格拉奈尔情愿一无所知。在文章发表几周后写给德里达的长信中，他说再次吃惊地看到两人的研究“出乎意料地近似”，还有这“突然出现的宿命的一致性，就好像被封闭在一间彻底孤立的监室里十年，（他）却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打墙壁或管道”。他感到只有他们两人能够推进哲学，因为“海德格尔会死去，而且无论怎样，（他们的）写作，如果说源于海德格尔的话，却是在海氏之后开始的”，让·波弗莱写不出人们期待于他的作品，其他的一切则迷失在无名的“学科”里。在他和德里达感兴趣的事情旁边，只有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索邦大学，总之是“林林总总不可救药的游荡”<sup>④</sup>。

① Gérard Granel, “Jacques Derrida et la rature de l’origine”, *Critique* n° 246, novembre 1967.

② *Ibid.*

③ Jacques Derrida, “Gérard Granel”, in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p. 319. 德里达在文中确认格拉奈尔从不知道围绕着他这篇文章在《批评》上的发表而引发的争论。对来往信件的分析则证明，事实与之相反。1967年10月20日，将一些语句的口气进行削弱后，格拉奈尔给德里达写道：“你真的相信‘人家’会大喊大叫吗？拭目以待吧……”

④ 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2月4日。



对德里达的第一次访谈刊登在1967年12月的《法兰西文学》上，这是阿拉贡主持的一个文化周刊。在这篇经过仔细修改的文章里，德里达有意以迷宫般的方式对亨利·荣斯(Henri Ronse)解释了他刚刚发表的三部作品之间的关系。

——《论文字学》可以看成是由两部分结合而成(其结合处是理论的、系统的而非经验的)，在它的中间可以嵌入《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对之常常有所参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卢梭的论述也可以作为该书的第十二部分。反过来，《论文字学》也可插在《书写与差异》的中间，因为该书的六篇文章，于实于理，均早于两年前发表在《批评》上的预示着《论文字学》的文章；从《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开始的最后五篇文章已经算是文字学的开场白了。但您可以想象到，并不能这么简单地重组。不管怎样，这两“部”书相互刻画在彼此当中，这是因为有一种奇异的几何形式，您会承认这些文章是与此同时的……

231

——那么《声音与现象》呢？

——我忘记了。这也许是我最为看重的文本。也许我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长长的注释放在另外两部作品里。……但如果一种传统的哲学结构中，《声音与现象》将是第一位的。<sup>①</sup>

对德里达而言，海德格尔成为比胡塞尔更为重要的哲学家，他将不间断地与之一起建构自己的思想。在《法兰西文学》的访谈中，他说对海德格尔感到“一种极端的暧昧”，“一种有些矛盾的景仰”<sup>②</sup>。

没有海德格尔问题的打开，我所尝试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虽然对海氏的思想多有借鉴，或者不如说，因为这借鉴，我尝试着在海氏的文本里——它并不比任何他人的文本更加均质、连续，在其所有最强有力之处和其问题的所有后果上都更均衡，我尝试着从中辨认出从属于形而上学或者从属于他称为本体—神学论的征兆。<sup>③</sup>

① “Implications”, entretien avec Henri Ronse,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n° 1211, décembre 1967. L'entretien est repris dans *Positions*, op. cit., p. 12-13.

②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in 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 op. cit., p. 103.

③ “Implications”, entretien avec Henri Ronse, *Positions*, op. cit., p. 18-19.

具体说来，就是从这时起，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之间开始了一场持续好几年的不断错过的相遇。皮埃尔·奥邦克（Pierre Aubenque）——前高师学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大学者，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曾十分赞赏地引用过他——当时在汉堡任职。他将请海德格尔共进晚餐，后者告诉他自己希望了解最近的法国哲学；他似乎对结构主义特别感兴趣。“我一定会褒奖地提到你……”<sup>①</sup>，奥邦克对德里达称。

232 在最近的一部著作《应该解构形而上学吗？》中，皮埃尔·奥邦克在一个注释里提到了这次谈话。在1967年年底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工作表现出真正的好奇。他通常热情赞扬德语在哲学上的优势，但这次甚至愿意仔细考虑一个深植于法文的概念的微妙之处。

他对“延异”这一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将之翻译成德文，但没有成功。法语“différer”（延迟/区分）的两个意思在德语中用两个词表达：“verschieden sein”（不同的）和“verschieben”（在时间上推迟）。尽管发音相近，这两个词根却是不同的。德里达的文字游戏只能体现在拉丁文（动词“differre”有这两个含义）和罗曼语言中。英文有两个近似的动词——“to differ”指第一个意思，“to defer”指第二个意思，代表了一种中间的情况。海德格尔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法语要比德语走得更远。”他请我向德里达转达与他见面的迫切愿望，可惜未能实现。<sup>②</sup>

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德里达也希望结识海德格尔，但他不会在任何情形下都与他会面。大师的法国学生十分令他恼火，他不愿考虑第二年夏天前去参加在托尔——位于伊斯勒-絮-拉索格，勒内·夏尔（René Char）故居附近——的研讨班，格拉奈尔和德基都会参加。海德格尔把这私人研讨班设计成庄严的课程，参加者们好像“幼儿园”的孩子，他会突兀地向他们提问。由于翻译上的困难，也由于“经过菲迪埃（Fédier）直接搭建的古怪关系和他身边充满滑稽感的人”，德基断定德里达将难以忍受。<sup>③</sup>

① 皮埃尔·奥邦克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2月6日。

② Pierre Aubenque, *Faut-il déconstruire la métaphysique ?*, PUF, 2009, p. 60.

③ 德基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9月10日。也见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op. cit.*, p. 240-260.

# 第 13 章 轻微的后退

(1968)

亨利·博肖与妻子劳尔在格施塔德经营着一家豪华的寄宿院，房间分布在七所乡村木屋内。学校放假期间好几所房间是空着的。应博肖之邀，德里达一家连续两年在这里度过圣诞假期。那些长长的夜晚使他们之间诞生了真正的友谊，既智性又亲密。博肖几周后写到，他们共度的时光是多么生动的回忆。 233

对于我们，这次在冰天雪地中的会面有着不同寻常的时间感，它构成了一个事件。确实有些新的想法产生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接触和我们的个性。您个性中混合了严谨与柔和，让我十分震动，还有您对一切极为开放的态度。……这几天里有些什么发生了，我并不想去定义它，但它对劳尔和我十分重要。<sup>①</sup>

在一封更晚的信中，博肖表明这次相聚对他是多么重要：

不仅是您的思想，还有您本人。是这柔情与坚定，严谨与日常的混合，是聆听时间的流逝而不丢弃任何东西，特别是这父性。超越父亲的世界而不否认父性的纽带，这让我在看到你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时感慨良多。<sup>②</sup>

在一次谈话中，德里达对博肖解释说，他面对的受众“很确定，很有限”，要在以后能够承载他的思想。已是小说家的博肖对此感到困惑。德里达回答说，他的工作要求 234

---

① 亨利·博肖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1月16日。

② 亨利·博肖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7月11日。

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必须通过媒介才有机会被人理解：“我确信直接对‘大街上的人’讲话不会让他理解，也不会让任何人理解，或者只能产生十分微弱的效果。”<sup>①</sup>

※ ※ ※

无论如何，当时的德里达远非对着大街上的人讲话。1968年年初他十分活跃，但每次发言都是在精心选择的情境中。1月16日，他在法兰西学院让·伊波利特的研讨课上发言，题目是《井和金字塔——黑格尔符号学导论》。这篇后来收入《边缘》的文章是他几个月前提交的新的博士论文题目的唯一痕迹。

伊波利特仍然是德里达在大学里忠实的同盟，下面这封支持他注册“高等教育资质名单”的动人推荐信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我在高等师范学校第一次遇到当时是我的学生的德里达先生时，我的印象是找到了一名真正的真实的哲学家，这样的印象并不常有。我感到，尽管他的研究（关于胡塞尔）有许多困难和一些晦涩之处，我还是能够信任他。这一信任是正确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最早的几部作品将取得的成就，况且他不曾迎合任何意见，也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我为此祝贺他。……我指导他的主要论文本来可以采用他对胡塞尔的研究，但德里达向我要求考察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个问题。指导这样的哲学家，实际上只能跟随他。……德里达的作品就在那里；他注册高等教育资质名单将让人认可其作品的存在及其作为哲学家和教师的素质。说我支持他注册是太轻了，我毫无保留地祝他成功。<sup>②</sup>

235

1968年标志着德里达已然节奏频繁的旅行的开始。1月25日，他与热奈特和韦尔南一起乘火车到苏黎世参加保罗·德·曼组织的研讨会，这是巴尔的摩研讨会的一种延续。热奈特对在瑞士逗留期间与德里达共同度过的夜晚保留着生动的回忆：

德·曼把所有人安置在老城一座可爱的旅店里，但因为地方不够，他让我和雅克挤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就在要熄灯的时候，我这位共度一夜的室友发现他忘了带睡衣，不过幸好没忘带他的手提打字机。打字机补偿了睡衣。他问我他工作的声音会不会吵到我。我只能妥协，他于是把我们那天夜里

① 德里达致博肖的信，1968年1月30日。

② 让·伊波利特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2月13日。

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打字，我猜是为了准备另一个研讨会的发言，如果我有经过训练的更敏锐的听力，我应该能够从触键中听出其不同声音的内容。<sup>①</sup>

这并不是凭空猜测：德里达如此匆忙打出的文章是他在第二天，即1月27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在索邦大学米什莱阶梯教室所做的题为《延异》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受邀在法国哲学会面前讲述自己的研究，这群人还是颇令人生畏的，但很可惜缺少了因论文答辩而无法前来的两名同盟：列维纳斯和冈迪拉克。

这篇文章的起首将十分著名：

我要谈的是一个字母。

它是第一个字母，如果相信字母表，以及从中生发的许多思辨的话。

我要说的是字母“a”，这第一个字母，它看来是必然地在这里或那里介入了“différence”（差异）一词的书写。这发生在讨论文字的书写过程中，也发生在文字当中的文字中，其不同的路径，在一些十分确定的点上，都经由某个庞大的拼写错误而来…… 236

因而我提醒大家，以最初步的方式来说，这一隐秘的书写上的介入首先并非单纯为了让读者或语法学家感到惊愕，它是在讨论一个文字问题的写作过程中精心设计出来的。但事实是，这一书写上的差异（“a”取代了“e”），这在表面上是声音记号之间标记出的差异，仅止于纯粹的书写：它可写可看，但听不出来。<sup>②</sup>

在这场兼具总结性和奠基性的讲演之后的讨论中，第一个反应——来自让·华尔——还是颇为善意的。但随后是布里斯·帕兰（Brice Parain）被激怒的发言，他认为这个延异是“一切的源泉”，让人“无法理解”，并将之与否定神学的说辞相提并论，这是德里达坚决反对的。随后是热娜·赫什（Jeanne Hersch）的发言，她是一位传统的人文主义者，质疑“当代哲学的某种风格”，质问她是否说明“在表达上不够谦卑”。她不满德里达的表述方法，认为最好“让人觉察不到说话的方式”。更让她恼怒的是，“延异”这样的概念是一种对语言的用法，她认为这种用法仅仅是由于德国的影响才进入法国哲学的。德里达提醒她说，这种不会让人察觉不到的表述恰恰是他关注的主题。随后他嘲讽地补充道：“也许我确实受到了您所指的德国哲学

① Gérard Genette, *Bardadrac*, Seuil, coll. “Fiction & Cie”, 2006, p. 78.

② Jacques Derrida, “La différence”, *Marg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p. 3-4.

的影响。……但德国的影响，在哲学界，难道是有为的吗？”<sup>①</sup>

237 康吉莱姆几天之后写信给德里达，说他从这次研讨会回来以后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激动，尽管此会同他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但他也肯定地说，他的同事们对之并不大欣赏。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法国哲学体制日益扩大的鸿沟上溯到这个时间。德里达一年出版了三本书，并在非专业期刊上刊登文章，在国内外他的名字四周也开始出现光环，这使得此前一直被认为有才华和前途的德里达变得碍事起来。

1月31日，他在旧日学生让-玛丽·伯努瓦（Jean-Marie Benoist）的鼓动下前往伦敦。他参加了2月3号和4号举行的一个卢梭研讨会，在那里发表的讲演后来成为《日内瓦语言学圈子》一文。在这第一次去英国的旅行中他还去了牛津大学，再次就《延异》发表讲演。但英国的听众比法国哲学会更加不欣赏他。“解构”和“延异”这样的词被认为丑陋不堪，整个发言激起了“冷淡的不安”，紧接着逻辑实证主义大师阿尔弗雷德·于勒·埃尔（Alfred Jules Ayer）失去冷静，大为光火。德里达后来在牛津和剑桥遭遇厄运时始终保留着对这一奠基性事件的回忆。<sup>②</sup>

※ ※ ※

德里达发现旅行和各类邀约越来越多，“变得很荒谬”，必须“停止”<sup>③</sup>，但在国外的讲演和讲课只不过刚刚开始。他的名字渐渐流传开来，讨论他的文章开始在许多国家出现，包括在著名的《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最具体的倡议来自德国。两年前因保罗·德·曼而发现了德里达的萨缪尔·韦伯现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系主任彼得·斯兹狄（Peter Szondi）任命他负责一门关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研讨课，他强烈希望德里达同意做一次讲座。“作为您的作品的热情仰慕者，我肯定您能在德国找到许多重要的听众。”他确定德里达的思想能够“对德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十分有利的影响”<sup>④</sup>。

238 一段时间之后，德里达第一次到达柏林，却造成一次意味深长的误会。韦伯来到位于城外的柏林-特格尔小机场接他。韦伯的一位女性朋友见过德里达，形容说他“有点像件黑色夹克”。但对他早期文章的阅读必定在韦伯的脑海中形成了对德里达

①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tome LXIII, 1968, p. 109-110。以一种很说明问题的挑衅态度，《延异》一文于1968年秋同时发表于这期语调严厉的 Bulletin 和“原样”团体在瑟耶出版社的合集 *Théorie d'ensemble* 中。它们面对的是两种读者，也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

② Jacques Derrida, “Le ruban de machine à écrire”,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103-104.

③ 德里达致亨利·博肖的信，1968年1月30日。

④ 萨缪尔·韦伯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2月28日。



至少同样强烈的想象：“我想象着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在机场大厅，我看到一位英俊的男士，有点像维托里奥·加斯曼（Vittorio Gassmann），身穿一件大敞开的丝绒衬衣，夹着一摞侦探杂志。我对自己说：‘没错，这就是未来的哲学家的形象。’我迎向他，对他打招呼；他感谢我来接他，我们一起走向我的敞篷汽车。他的第一个问题让我有些吃惊：‘酒店里有游泳池吗？’我颇为震惊，暗想：‘这可真是后哲学啊。’但我还是有些尴尬地回答他说，在讲座之前可能没有时间游泳。‘什么讲座？’我的对话者问，‘我来是为了拍电影。我是制片人。’我终于意识到发生了误会，转过身去，看到机场前面站着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先生，茫然窘迫的样子，徒劳地试图找到一辆出租车。德里达——真正的德里达——抬眼打量我，又看了看我的乘客——这情景让后者大笑不止——理解了这轻慢。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怎能把他和那个人混淆。‘呃……您知道……形而上学的暴力……’我对他说。他恼火地说：‘也许是暴力，但不是暴行！’……故事还没完。星期天我送他到机场时，我们看到那位假德里达在吧台边，身边围着几名想必是他为拍电影招来的漂亮女子。他瞧着我们，笑着在姑娘们耳边讲述发生过的事……而事实是，德里达那时还不是十分自信。他像个老派的教授一样衣着暗淡，在社交场合不很自在。他慢慢才放开，发明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和他所特有的性感方式。”<sup>①</sup>

这件事给德里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之后去德国的旅行中有时会提到此事。239  
但这第一次去局势已很动荡的柏林的旅行特别标志着他同彼得·斯从狄关系的开始，后者是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学院的创办人，也是当时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包括在抗议学生的心目中。他是著名心理医师雷奥坡德·斯从狄之子，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他全家被流放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来受益于与纳粹的谈判而经由著名的“卡斯特纳火车”<sup>②</sup>被送到瑞士。彼得·斯从狄将终生感到幸存者的负罪感，正如他的挚友保罗·策兰（Paul Celan）——正是因为斯从狄，德里达才得以结识这位重要的诗人，而其实从1964年起他们两人有时会在于姆街相遇。

实际上策兰在许多年间曾是我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事，我却不认识他，我们也没有真正相遇。他是德语教师。这是个十分低调，十分不为人所知，不外

<sup>①</sup> 同萨缪尔·韦伯的访谈。这个故事还有几个变种，特别是在海因兹·维斯曼（Heinz Wismann）讲述的版本中，那位“假德里达”变成了一个色情电影制片人。

<sup>②</sup> 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f Kastner）这个人物及其使1684名犹太人得以离开匈牙利去往瑞士的谈判激起过激烈的争论。可参看维基百科文章：[http://fr.wikipedia.org/wiki/Rudolf\\_Kastner](http://fr.wikipedia.org/wiki/Rudolf_Kastner)。

露的人。甚至于有一天，因为一些行政事务在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我从校长的话里听得出他并不知道谁是策兰。我的德语同事开口道：“不过，校长先生，您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教师就是在世最伟大的德语诗人吗？”这说明这位校长的无知，也说明策兰的存在就像他整个人和全部举止一样，极为低调、简单、不为人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是他的同事，而我们却没有过交流。<sup>①</sup>

斯丛狄来巴黎时终于将策兰介绍给德里达，两人交谈了几句。随后的几次见面都很短暂而且沉默：“沉默是他的，也是我的。我们交换了几本互相题献的书，几句话，随后便都消失了。”有一次，策兰与德里达在雅贝斯家里共进午餐，仍然并不多话：“我相信，他所经验的与许多法国人的关系相当令他绝望。”要知道，当时策兰240 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被翻译成法文。尽管德里达的德语知识足以让他研究哲学文本，策兰的语言对他来说仍然如谜一般难以接近。他还需要好些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开始读他。

※ ※ ※

德里达在相当奇特的情形下与另一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甚为迷恋的作家接近，并从1964年起与之通信：莫里斯·布朗肖。

一切都开始于向让·波弗莱致敬的一本书《思想的磨砺》，这是他的学生弗朗索瓦·菲迪埃在1967年发起的倡议，菲迪埃曾向德里达、克斯塔斯·阿克塞洛斯、米歇尔·德基、勒内·夏尔、莫里斯·布朗肖、罗日·拉波尔特和其他几人约稿。德里达没有立刻接受：“我刚开始有些犹豫，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觉得同波弗莱特别接近；我同他私交很好，但我感到自己既非波弗莱的信徒，也非波弗莱式的海德格尔信徒。”<sup>②</sup>但菲迪埃殷切地坚邀德里达撰稿，终于使他同意提交一篇来自研讨课的旧文，即《存在与文码——对〈存在与时间〉一个注释的注释》（“Grammè, note sur une note de Sein und Zeit”）。

几周之后，在弗莱斯纳共进午餐时，罗日·拉波尔特讲起了波弗莱的一些反犹言论，其中一条涉及列维纳斯。德里达大概比拉波尔特想象得更为震惊。第二天他就给菲迪埃写信，告知这个令他难以容忍的严重问题。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La langue n'appartient pas”, entretien avec Évelyne Grossman, *Europe* n°861 - 862, janvier-février 2001.

<sup>②</sup> “Entretien avec Derrida”, in 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op. cit., p. 97.

有人刚刚对我谈到——对我来说是绝对的惊愕和震撼——让·波弗莱说过好几次的話，简单说就是一些严重的、清晰的和粗俗的反犹言论。尽管错愕不已，我却绝不可能质疑我听到的话的真实性。……从中我至少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您自然应该第一个知情：我应该把我的文章从文集中撤出；我的决定无可更改，但我会保守秘密，并且，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外界的借口来做出解释。……我交给您的文章表明我不仅不属于任何反波弗莱的“密谋”团体，甚至希望在所有有关……波弗莱的问题上……打破我认为难以忍受的某种圈子或循环。<sup>①</sup>

241

尽管德里达很谨慎，弗朗索瓦·菲迪埃还是很快就发现“情报人”是罗日·拉波尔特。他告知了波弗莱，后者立即抗议这“窃窃私语的诽谤……圈子”，并激烈要求得到解释。几天之后，对质发生在德里达的办公室。波弗莱情绪激动，脸色苍白，激烈地否认被归到他身上的言论，而拉波尔特则感到自己成了被告。他离开时的状态让妻子雅克琳娜决定告知布朗肖，已隐居多年的布朗肖为此颇感“折磨”。1968年2月初，德里达和布朗肖第一次见面，共同考虑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sup>②</sup>

布朗肖没有立刻理解，波弗莱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列维纳斯。他并未将自己的文章从《思想的磨砺——向让·波弗莱致敬》一书中撤下，但在3月10日，他要求菲迪埃加上这样的题词：“致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四十年来我同他结下的友情比同我自己更加密切：与犹太教之不可见性的关联。”

1968年4月2日，布朗肖和德里达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准备寄给此书的所有撰稿人。他们在信中解释说，在“一场艰难的辩论”之后，他们决定保留自己的文章：让·波弗莱否认最严重的有关言论，也反驳了人们对其他言论的诠释，他们因而感到没有权利通过撤下文章而提起“如此严重的、谴责一般的指控”<sup>③</sup>。布朗肖将这些信寄给了出版人，请他收转，但它们将不会到达收信人手中……

※ ※ ※

经过这一段对德里达来说有些过于动荡的时期，他想要重新更安静地投入工作。 242

① 德里达致弗朗索瓦·菲迪埃的信，1967年11月27日。

② “波弗莱事件”在Christophe Bident的著作 *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中有详细叙述，Champ Vallon, 1998, p. 463-467。

③ 莫里斯·布朗肖和雅克·德里达致《思想的磨砺——向让·波弗莱致敬》一书所有撰稿人的信，1968年4月2日。

教师资格的课程安排让他在这一年重新发现了柏拉图和黑格尔这样“不可穷尽”的作者。正如他给布努尔所写：“尽管大学藏书中关于他们的书数量巨大，但人们永远会感到还没有开始阅读他们。从根本上说，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sup>①</sup>

《柏拉图的药》一文分两期刊登在《原样》的冬季号和1968年春季号上，文章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一种新颖的语调，更加自由，带有更加明确的文学性。开始的段落十分著名：

文本，只有在它对不经意的目光和不经意的人隐瞒其构造准则及游戏规则时，才成其为文本。而且一篇文本始终是不可察觉的。准则与规则并不藏身于不可接近的秘密，它们只是永远不会，在目前，将自己交付给任何能够严格地命名为感觉的东西。

由于其本质，它便如此永远地冒着彻底自我迷失的危险。人永远不会了解这样的消失。<sup>②</sup>

最后的几段也并不少冲击力：

黑夜过去。早晨，听到门上有撞击声。似乎来自外面，这一次，撞击声……

两下……四下……

但这也许是余下的，是梦，梦的片段，夜的回声……这另外的剧场，这些来自外界的撞击……<sup>③</sup>

不过，这篇长文——源于高师的一个研讨课——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对《斐德罗篇》的细致而且几乎是语文学的解读。我们还记得德里达只是到后来才学习了古希腊文，但此时却似乎游刃有余。他使用的是布德（Budé）出版社的雷翁·罗班（Léon Robin）的公认的译本，同时不断回到原文，对一些段落重新翻译，特别是涉及药（*pharmakon*）的部分。德里达在对柏拉图的阅读中跟踪着这个词，它确实有时译成“疗法”，有时译成“毒药”、“药品”或“药剂”。这些变化在他看来殊为可惜，

① 德里达致布努尔的信，1968年2月6日。

② Jacques Derrida, “La Pharmacie de Platon”, *La dissémination*, Seuil, 1972, p. 71. 该文又作为附录附于 Garnier-Flammarion 出版的柏拉图的 *Phèdre* 之后。

③ *La dissémination*, *op. cit.*, p. 197.

他致力于表明“这一概念的可塑的统一性，或不如说它的规则，还有将它与其能指联系起来的奇特的逻辑，这一切都遭到分散、掩盖、磨灭、冲击，带来相对的不可读性，原因自然是译者的粗心或经验主义，但首先是因为翻译上无法简化的巨大困难”<sup>①</sup>。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更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成为“哲学素”（philosophème）的具体词语在柏拉图那里扮演了比“替补”（supplément）在卢梭那里更核心的角色。苏格拉底被判服下的毒堇汁本身“在《斐德罗篇》中除了‘药’（pharmakon）之外别无他名”<sup>②</sup>。哲学文本在其语言中的印记问题，亦即翻译问题，将成为德里达持续的关注点，尤其是他本人作品的各种外文译本将不断使他面临此问题。



一次聚会结束时，索莱尔斯将他的两本新书《逻辑》和《数目》的手稿交给德里达。德里达读过收在《逻辑》中的大部分文章，但《数目》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很快深深沉浸于“这部算术和戏剧的机器”，“这严格的算法，这些不可胜数的精子”<sup>③</sup>。他很快表示出写些东西的欲望，同时也估计到了这篇奇异的、充满对照性的虚构文本将使评论面临尤其巨大的抵抗。

我幻想着某种天才的灵机——但我并无天才——或者某种写作的灵机，让我可以“措手”，可以以一篇文章的篇幅写就一个文本，又能操作您的机器，同时让人看到它自相交缠，消耗殆尽。我从未有过这样艰难而又必需的危殆任务。即使我能做到，这一切也将首先被您说尽，先是在《数目》，随后在《文学半月刊》发表的那篇在各方面令人瞩目的访谈中。<sup>④</sup>

如果说他同索莱尔斯的友谊看上去再次万里无云，他同让-皮埃尔·费伊的关系则变得十分困难。费伊比德里达年长五岁，是作家，也是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在《原样》编委会中他是唯一正式的科班出身。两人从不曾十分亲近，但长时间保持着多于礼貌的关系。1964年，德里达就费伊的小说《类比》寄给他一封热情的信。后者也好几次表示了对他研究的赞赏。收到《书写与差异》之后，费伊向德里达肯定

244

① *La dissémination op. cit.*, p. 80.

② *Ibid.*, p. 144-145.

③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无日期（1967年12月或1968年1月）。

④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1968年4月24日。

地说《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一文是他多年来读到的“最令人兴奋”的哲学文章。<sup>①</sup>全神贯注地阅读了《论文字学》之后，他又向德里达再次肯定地表示，他的学术经历“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sup>②</sup>。

但在索莱尔斯和费伊之间孕育多年的危机爆发于1967年秋，时值雅克琳娜·里塞（Jacqueline Risset）和皮埃尔·罗滕博格（Pierre Rottenberg）进入《原样》编委会。费伊不满该刊最近的变化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正在取得的地位，于11月15号辞职。随后的几周，他试图将德里达拉到自己这边，让他小心《原样》对其行动的“滥用”，特别是在罗滕博格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费伊说尤其震惊地看到该文“突兀地将言语/文字的对立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的对立置于等价地位”<sup>③</sup>。

让-皮埃尔·费伊很快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改变》（*Change*），也由瑟耶出版，这让索莱尔斯觉得像在背后被捅了一刀。费伊数次给德里达写信，又请他共进午餐，希望拉他做同盟。但德里达友好而坚定地与之保持着距离。从这时起，两人之间的不信任开始占上风。费伊不久后承认，在重读《论文字学》时感到“一些问题”，请德里达与他重新讨论<sup>④</sup>，但这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245 当时的思想界既复杂又充满变化，《原样》和《改变》之间的对抗只能在更为广阔的格局下才能理解。在1966年的阿让特伊大会之后，法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新的政策。《新批评》月刊在党内享有相对的自主权，成为向先锋知识分子特别是《原样》开放的地域，后者的工作突然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科学水平”。三名光彩夺目的年轻女子代表着杂志的现代性：卡特琳娜·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和克里斯蒂娜·布希-格鲁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德里达在今后的路途上将数次与她们相遇。

1967年年底，《新批评》发表了一篇同索莱尔斯和杂志其他编委的访谈，并在介绍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其研究抱有极大的同情，能从其中学到许多。”<sup>⑤</sup>在此精神下，1968年4月16日至17日举行了第一届克吕尼大会，主题是“语言学与文学”。德里达没有参加，但他的作品被大量引用。在所涉及的主题之外，这次会议的明确

①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②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1月2日。

③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67年12月8日。关于让-皮埃尔·费伊同《原样》的决裂以及《改变》的创办，详见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281 - 288 et 342 - 346。

④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4月16日。

⑤ 《新批评》1967年11—12月号，引自 Françoise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I*, op. cit., p. 330。

目标是“打破研究中的种种隔离”，“找到丰富交流的领地”<sup>①</sup>。根据一位参加者的观点，双方应该都感到满意：共产党终于走出了教条主义和僵化作风，先锋派则肩负起了责任和战斗感。这一理论上的接近很快产生了具体成果：4月24日，《法兰西文学》在第一版刊登了雅克·亨利克（Jacques Henric）对索莱尔斯的访谈，标题是《写作与革命》。

※ ※ ※

法共和《原样》均未预感到1968年5月的到来。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亦然，尽管他们同最政治化的学生有着日常的接触。正如樊尚·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的出色解释：“法国的知识阶层在1968年5月遇到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震荡：人们已谈论了如此之久的革命没有任何预兆就爆发了。但这场革命，说到底，也许并不是革命……骚乱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传授知识、用自己的能力赋予自己权力的人——教师……”<sup>②</sup>

事件从5月3日起就在索邦大学爆发，起因是抗议关闭南泰尔（Nanterre）大学，并在纪律委员会门前进行了一系列学生集会。几天之内，整个拉丁区都燃烧起来。5月9日，运动扩展到外省学生并迅速发展。两天之后，主要的工会呼吁大规模罢工。5月13日，将近100万人在巴黎游行，从西站一直到当菲-罗什洛广场。这是法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它短暂地将学生和工人聚集起来。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十年，够了！”“我的将军周年快乐！”与《原样》并肩游行的德里达碰到了冈迪拉克，后者询问他论文的进展情况，令他目瞪口呆。

246

在这动荡的几周，巴黎和弗莱斯纳之间的旅程变得很困难，这使德里达同让·热内接近起来，好几次同他单独共进晚餐。他们在巴黎的夜里共同漫步到黎明，德里达对此保留着生动的回忆：“在这没有一辆车的街上，面对着因为缺油而突然间静止瘫痪的城市，热内对我说：‘啊，多么美！啊，多么美！啊，多么优雅！’”<sup>③</sup>

德里达继续定期见面的莫里斯·布朗肖也十分兴奋。这位《黑暗托马》和《文学空间》的作者多年来健康状况十分不容乐观，却好像在运动中重新获得了力量：他参加所有的游行，所有的大型集会，参加起草传单和动议，并提出了1968年5月

①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291.

② Vincent Descombes, *Le Même et l'autre. Quarante-cinq ans de philosophie française (1933—1978)*,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p. 196—198.

③ Jacques Derrida, “Contresignature”, communication au colloque de Cerisy *Poétiques de Jean Genet, la traversée des genres*, août 2000, IMEC, fonds Jean Genet.

最美的口号之一：“做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对于布朗肖这样的激进者，什么都不会失去，因此没有什么好去拯救的。他为纯粹叛逆而狂热，并迷恋于无名写作，这“悲惨的孤立精神”<sup>①</sup>的突然报复。

在一次同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的访谈中，德里达承认自己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六八’一代”。

247 虽然当时我参加了游行，组织了在于姆街的第一次大集会，但我感到有所保留，甚至很忧虑，面对某种自发主义的、熔炉般的、反工会的欣快感，面对终于“解放”了的话语和恢复了“透明”的激动之情，我从不相信这样的东西。……我并不持反对态度，但我总是难于与这种节奏保持协调振动。我不觉得自己在参加一场伟大的动摇世界的运动。但现在我相信，在这场我甚无兴味的欢腾中，有些其他什么来临了。<sup>②</sup>

德里达承认在这份距离感中有“一种隐秘的共产党的遗赠”，他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的访谈中表明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我没有对“六八”说不。我上街游行过，我组织了高师的第一次大集会，但我的心并不在那些路障上，无论对错。……让我不安的不是我并不相信的表面自发性，而是自发主义的政治雄辩，呼吁透明度，呼吁直接和立刻的交流，呼吁摆脱所有工具，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自发主义，如同工人主义和贫困主义，在我看来都是可疑的。我并不是说我对此事很有觉悟，这一切并不简单。今天……我对自发主义的批评将更加谨慎地提出。<sup>③</sup>

德里达并非唯一不曾认识到整个事件之规模的人，将许多学生推向政治激进化和毛主义的阿尔都塞面对所发生的事也不知所措，他整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都在一间诊所里度过。马列主义青年共产党员联盟的创始人罗贝尔·林哈特也受到心理问题困扰，开始进行催眠治疗。对于索莱尔斯，1968年5月则是个机会，让他选择站在通常十分反感学生运动的共产党一边：根据《原样》夏季号的说法，1968年5月

---

① Christophe Bident, *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op. cit., p. 473。我的叙述也基于对埃里克·奥普诺（Éric Hoppenot）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Une ‘folie’ doit veiller sur la pensée”,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358。

③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仅仅反映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革命”左派的昙花一现。

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从5月30日起再次风起云涌。将近100万名示威者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支持戴高乐将军。几周之后的立法选举让他以压倒性多数获胜。1968年7月10日，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卸任，接替他的是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248

在此期间，德里达一家终于在位于巴黎东南部足足有20多公里的里斯-奥朗吉斯购买的新房中安顿下来。他们将不再搬家。对于德里达，远离法国首都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巴黎的公寓对他意味着与人群混杂，他更愿意有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在这个并非真正乡村的郊外。

他在尼斯度过夏初，没有玛格丽特和孩子。经过前几个月的动荡，这些日子对他大有益处，正如他对博肖所说：

在寂静和闲暇中，这是巨大的回归，甚至是巨大的隐退：这里有我童年的地中海，我的身体真正重新浸入其中。还有，向母亲的回归。我独自同父母生活，12年来还从没有过……我知道您了解这奇特的体验……<sup>①</sup>

德里达想就柏拉图写一部完整的书，但此刻占据他的主要是《数目》。他对索莱尔斯小说的激情始终强烈，遗憾自己好几个月之后仍然没有完成评论文章：“这部书异乎寻常，我感到自己不足以评价它，特别是在一篇‘文章’里。‘播散’（La dissémination）倒是进展顺利，但它已经太长了，如我预料的必须用《批评》的两期登完。”<sup>②</sup>

读完这篇几乎同它所评论的小说一样长的文章，索莱尔斯再次感谢德里达，尽管在收到这样的礼物之后这感谢显得微不足道：“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这样坚持：请允许我，如果我有这样的力量的话，在默默无闻中走得更远。您所带给我的真是意想不到的奇异帮助。”<sup>③</sup> 事实则更加暧昧。因为这极为密切的时刻也标志着小说与评论之间一种微妙的竞争形式。哲学家以让人几乎无法区别的方式把自己的和索莱尔斯的文字混合在一起，使作家有一种“被吞噬的渗透”<sup>④</sup>之感。对抗将很快到来。 249

8月初，德里达到拉萨茨与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会合。经过从春天起就将他和索莱

① 德里达致博肖的信，1968年7月27日。

②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无具体日期（1968年夏）。

③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9月24日。

④ 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访谈。

尔斯与克里斯蒂娃拉开距离的“所有的动荡和沉默”之后，他渴望在安静的氛围中再见到他们。他利用在沙朗特短暂逗留的时光同他们一起去雷岛度过了一天。但这次见面后不久，一个新的事件将动摇他们的关系。8月20日，华沙条约同盟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结束了“布拉格之春”。阿拉贡和《法兰西文学》明确反对苏联干涉，《原样》成员们则站在强硬的立场，表示支持这一行动。索莱尔斯给友人雅克·亨利克写道：“别指望我，哪怕是一秒钟，能让红军解除武装（更别说那些保加利亚坦克，我对之甚至感到一种有罪的激情）。四处散发的肮脏自私的人道主义臭味已经让我绝望。”<sup>①</sup>在一次晚餐中，宝洛·泰弗南发出“激烈的抨击，谴责捷克反革命分子，赞扬苏联”，这使餐桌上的气氛顿然冷淡。<sup>②</sup>我们不禁猜想：玛格丽特·德里达的娘家生活在布拉格，她对形势的看法至少是不同的。

※ ※ ※

1968年夏天也预告着另外一段冒险，德里达将在其中扮演隐秘而又重要的角色：文森纳（Vincennes）大学的创办者。在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组成的十分保守的政府内部，新的国民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是个例外。他是自由派  
250 和现代主义者，享有戴高乐将军的信任，后者仍然震惊于5月运动，理解到法国的大学亟须变革。

1968年8月5日星期一，索邦大学新任校长雷蒙·拉斯韦尼亚（Raymond Las Vergnas）向埃德加·富尔陈述了建立一所与现有大学完全不同的大学的梦想，它将向劳动者特别是没有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放，教学将是灵活和跨学科的，可以聘请在自己领域有专长的教授，哪怕没有传统上要求的学位。……这一计划并非空穴来风。它很大部分源于雷蒙·拉斯韦尼亚与埃莱娜·西克苏的交谈。几个月前，他用惊人的强硬措施，派这名论文尚未答辩的年轻女子在南泰尔担任教职。她怀着最大的关注就近观察了5月事件，惊讶地见证了其广度及其彻底颠覆一切的欲望。

同教育部长会面之后，拉斯韦尼亚向埃莱娜·西克苏宣布部长委托他建立“一所预先设计好的大学分校，即索邦大学在文森纳森林的分校”<sup>③</sup>。他请这位人脉广泛

<sup>①</sup> 索莱尔斯致亨利克的信，1968年9月9日，引自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33.

<sup>②</sup>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33.

<sup>③</sup> Hélène Cixous, “Pré-histoire”, in *Vincennes, une aventure de la pensée critique*,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Michel Djian, Flammarion, 2009, p. 22.

的乔伊斯专家帮助他创办一所实验性大学。德里达是西克苏第一个联系的人。早在8月7日,由于里斯-奥朗吉斯房子里还没有电话,她给他发了一封电报:“需建议实验大学计划。”<sup>①</sup>

西克苏解释道:

我请雅克·德里达做我的顾问(秘密:他不曾被任命,但得到拉斯韦尼亚亚认可)。我也通过他来招聘专家委员会,这是保证受聘者质量的学术圈子,其中将有康吉莱姆或罗兰·巴尔特。因为学术正当性自然而然的是此次行动的条件。<sup>②</sup>

德里达没有表现出任何去文森纳任教的意愿。这时他在高师还感到很自在。但他对这个实验大学的计划很感兴趣,多次参加西克苏在罗蒙街的公寓举行的初步讨论,与会者有弗朗索瓦·沙特莱、让-克洛德·帕斯隆、让-皮埃尔·理查德(Jean-Pierre Richard)、吕塞特·菲纳(Lucette Finas)、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其他几人。德里达的角色对于奠定哲学系的基础当然是决定性的,但他至少也对引入精神分析学满怀热情,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由于这时拉康及其周边的人不愿听闻此事,因而德里达建议将建立精神分析学系的责任委托给信奉拉康的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塞尔日·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e),并使康吉莱姆采纳了这一建议。<sup>③</sup>

251

几个月来,德里达也在利用自己的关系让贝尔纳·波特拉得以离开让他烦心的高中。波特拉于是刚刚24岁便被调往于姆街,在哲学家们身边支持阿尔都塞和德里达。随着波特拉的到来,德里达有了一个同道,甚至是弟子。马克思主义对高师的控制还十分明显,阿尔都塞大概想在学校内部保持某种平衡。波特拉当然是接近“毛—自发主义者”的,这些代表着1968年5月之后新动向的左派更倾向于群众的革命自发性,而不是有组织的政党和组织。但他尤其是一位扎实优秀的哲学家,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一,完全是“德里达相容的”<sup>④</sup>。

贝尔纳·波特拉非常高兴能很快来到高师。但他也有关于阿尔都塞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其健康状况改善得很慢,至少整个8月他都不会在学校。这个时段很不好,

① 西克苏致德里达的电报,1968年8月7日。

② Hélène Cixous, “Pré-histoire”, in *Vincennes, une aventure de la pensée critique*, op. cit., p. 22.

③ 同西克苏和热奈特的访谈。关于成立文森纳大学的详情,亦见 Gérard Genette, *Codicille*, et “Bâtons rompus”, entretien entre Hélène Cixous et Jacques Derrida, in *Derrida ici, Derrida là*, op. cit., p. 190.

④ 同多米尼克·东布勒和贝尔纳·波特拉的访谈。

特别是德里达本人准备离开巴黎，一直到11月底才会回来：美国人对他在1966年的表现赞叹不已，再次邀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课两个月。他无法拒绝这一提议，哪怕仅仅是从金钱的角度出发。波特拉因而需要独自完成开学时的哲学课程：252 “当然，我将尽力而为，适应局势，但我承认这让我有些焦虑。”<sup>①</sup>

※ ※ ※

9月底，雅克和玛格丽特飞往美国，同行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皮埃尔五岁多，让刚刚过完一岁生日，他将在巴尔的摩的房子里开始走路。

容易焦虑的德里达对这次在美国的停留有些担心。实际上，一切都很顺利。他很快同理查德·马克塞结下友情，马克塞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主任，著名的1966年研讨会的共同组织者。德里达欣赏他“奇妙的好客性”和惊人的藏书，那是他再不曾见过的“最神奇和最安全的”<sup>②</sup>藏书。他还去瞻仰了埃德加·坡(Edgar Poe)的墓地和故居，这在后来成为仪式性的朝拜。

他在巴尔的摩第一学期的课程重拾并延续了他在高师关于《柏拉图的药》的研讨课。但他也对波德莱尔、阿尔托、尼采特别是马拉美进行了解读，勾勒出后来成为《双重场次》(*La double séance*)的轮廓。由于那时用法语授课，他只有20多名学生。但其中的许多人立刻被德里达征服，例如希利斯·米勒，他那时接近乔治·普莱与维也纳学派，后来成为美国解构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希利斯·米勒回忆道：“参加第一次课时，我担心我的法语不足以让我听下来，但我立即被德里达讲话的力量迷住了。这真是异乎寻常，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讲话。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形成一周一次共进午餐的习惯。一开始我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随后他开始用英文和我交谈。”<sup>③</sup>

253 在美国的停留刚开始时相当“安静、缓慢、隐蔽”，但从10月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真正的讲座之旅。在随后的几周里，德里达去了纽约、耶鲁、普罗维登斯、华盛顿、布法罗和芝加哥。他给索莱尔斯写道：

我始终自问，从我久远的神经衰弱的脆弱感的最深处，我如何能够度过——而且总的来说还不错——这一系列我以为自己完全无力承担的旅行推销员般的展示活动。我成功了，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既为了展示，而且，我敢于这么希

① 波特拉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8月29日。

②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69.*

③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

望，也为了货品（我这么说是因为您也在其中……）。我继续研读《数目》，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尤其是，但不仅仅是，课程——不断地把我带回到这部书，并让它继续生长，远远超出我离开法国时留在身后的播撒。<sup>①</sup>

在纽约，他在“哲学与人类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将成为划时代标志的重要演讲——《人之终结》。正如后来的习惯做法，德里达首先强调了发言时的情境：“一切哲学研讨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他指出，特别是当其被称为国际研讨会时；其可能性本身同“民主的形式”密不可分。

这就是准备这场会议时降临于我的问题，在其最普遍和最纲领性的原则中，从收到邀请和随后的构思，一直到接受和起草此文，我可以精确地记得写作日期是1968年4月：我们还记得，在那几周里，越南和平谈判开始，马丁·路德·金被刺。不久以后，我在准备此文的打字稿时，巴黎的大学第一次应一位校长的要求被治安机关控制，随后在你们知道的抗议运动中再次被学生占领。……我只是想，我在准备此次发言时的历史环境，我应该将之记录下来，标记下来，并与你们分享。这些情况在我看来完全有权归属于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视野和问题。<sup>②</sup>

254

其后的内容——写作日期颇具象征意义地标为1968年5月12日——试图回答“关于人的问题，以及法国处于何种状况”。德里达在文中提到黑格尔和科耶夫、萨特和尼采，但主要集中论述海德格尔及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这次讲演和其他的发言都受到了欢迎，但德里达很快厌倦了这些没完没了累人的旅行。他每周在巴尔的摩只有一两天，剩下的时间都在旅途上，“像个梦游者，认不出经过的地方、讲堂、人、话语，等等”。他确定自己想很快“结束这连轴转的生活，以及它有时可能带来的快感”<sup>③</sup>。但这过快的节奏并没妨碍他欣赏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及其舒适平和的特点，这同高师永远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里达的在场激起了巨大的兴奋：他指涉作品的独特性，他强有力的概念，

①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无具体日期（1968年10月）。德里达将从纽约建议索莱尔斯在美国大学进行一系列讲座，这在他眼中有两点好处：证实《原样》和索莱尔斯本人在美国的存在——今后“《原样》被视为最独特、最确定无疑的法国文化的产物”，以及获得15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的报酬。索莱尔斯对此提议没有做出回复，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

② Jacques Derrida, “Les fins de l’homme”, in *Marges, op. cit.*, p. 135.

③ 德里达致亨利·博肖的信，1968年11月14日。

还有他本人的平易近人都使他的声名经久不衰。随后的两个秋季，当热奈特担任同一职位时，他强调德里达留下了怎样“令人瞩目的回忆，因为无数足够好的原因，再加上这一条：自拉法耶特（Lafayette）以来唯一给人好感的法国人。而其他所有人都傲慢无礼”<sup>①</sup>。

※ ※ ※

这段时间在巴黎，关于文森纳大学的商讨继续紧张进行，时有冲突。尽管距离遥远，德里达还是很担心一些友人的命运，例如吕塞特·菲纳和米歇尔·德基。热奈特对他解释道：

255 所有人都感到，一天数次被推开，拉近，又被推开，随着磋商的进展，也随着外界压力和拉斯韦尼亚十分圆熟复杂的游戏，他目前仍然是唯一最终做决定的人。……这一切都十分艰难，不再是最初快乐的一群人，一些“现实原则”强势回归。<sup>②</sup>

人们以为莫里斯·布朗肖本人会远离这些微不足道的有关大学的商讨，但他感到自己有必要参与。他很高兴德里达因为距离遥远而逃脱了这些“十分艰巨的争论”。尽管对自己必须参与进来感到遗憾，他还是试图阻止知识分子团体把相互的竞争“表现成无私的要求，以便于发动学生”<sup>③</sup>。

贝尔纳·波特拉则向德里达报告有关哲学系的磋商。他同可能与文森纳教学工作相关的高师校友经常接触。这方面的讨论也不简单：

因为政治和个人的原因，巴里巴尔和其他几人最初的反应十分消极，但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似乎突然有了转机：巴迪乌、米勒、巴里巴尔、马舍雷，还有其他几人都在候选之列，然而最终的职位是有限的。塞尔应该可以来，而福柯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叫来德勒兹，后者刚刚因为非常严重的肺结核紧急住院。<sup>④</sup>

在高师，德里达不在期间只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载的事。让·波弗莱曾是几名新

---

① 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70年10月31日。

② 热奈特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9月28日。

③ 莫里斯·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10月25日。

④ 波特拉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10月15日。

生在亨利四世高中时的哲学教师，应他们的要求，学校邀请波弗莱做一次讲演，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尽管有些反感，德里达并没有加以反对。但就在波弗莱讲演的那天，一群以1968级入学考试第一名的学生菲利普·卡斯特兰（Philippe Castellin）为首的左派学生起哄阻止他讲话。听闻此事，德里达请波特拉给波弗莱打电话表示歉意；因为年初的事件，他本人不能亲自打电话。

※ ※ ※

11月底，五岁多一点的皮埃尔对父母称：“该回去了，我的法语要丢光了。”<sup>①</sup> 256  
对德里达也一样，到回巴黎的时候了。但这次的旅程颇为艰辛。从巴尔的摩起飞的飞机因天气延误，使他们耽搁了在波士顿转机。德里达难以忍受这意外状况和混乱的旅途。在第二天的飞行途中，他始终烦躁不安，双拳紧握。玛格丽特建议他放松，他生气地冲她喊：“你知不知道我只凭自己的意志维持着飞机在天上？”他为此受到长久的创伤，将在好几年里拒绝乘坐飞机。<sup>②</sup>

重新回到巴黎的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因为德里达在美国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伊波利特——他的论文导师和长期以来的保护人，在10月27到28日夜间突发梗塞去世。正如德里达12年后在答辩时所解释的，这一损失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伤痛的时刻，它也标志着翻过了一页：“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它标志着，在这个日子——1968年秋，不错，就是秋天——某种对高师的归属感的终结。”<sup>③</sup>

让·伊波利特之死的确像是一个预兆，一个象征。文森纳动员起了各方力量，古老的索邦大学则一片混乱，尤其是哲学系。在亨利·古耶、让·吉顿（Jean Guilton）和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退休之后，没人知道谁来填补他们的教授席位，重要的大课该怎么办，谁能确定授课内容和课程安排。据冈迪拉克说，“老教授们对事件的反应十分不同，与他们合作十分困难。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过学生的抗议。”<sup>④</sup>

几周之后，希望获得“学术休假年”的冈迪拉克给德里达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反映了当时的氛围。他请德里达原谅在前一年的答辩中他本人和评委会其他成员“以笨拙的方式”表达的“忧虑”，尤其是德勒兹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冈迪拉克意 257

①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69-271.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Ponctuations. Le temps de la thèse”,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52.

④ 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10月20日。

识到5月事件“为某种仪式性的关系敲响了丧钟”。“现在您是老师，而且是严格的老师。对于我们，气喘吁吁追随着运动希望继续学习的我们，适应有时是困难的。请为我们的善意而原谅我们。”<sup>①</sup>

老教授们失去了方向，德里达本人和他同辈的许多教师也感到非常迷茫。去美国执教，或者像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尔特那样去突尼斯，能让他们暂时逃离几乎难以生存的法国大学环境，但无论怎样，这同德里达渴望的严肃工作不能相容。在克莱蒙费朗任职的让-克洛德·帕里安特回高师开了一门关于卢梭的研讨课，他在回到“这个混乱世界”时颇为理解老同学的疲倦。“在此亦然，那些委员会、会议、讨论等让人筋疲力尽……我们为学生准备考试，11月底重新开课，但代价是不间断地待在学校并时刻保持警觉。”<sup>②</sup>

※ ※ ※

同前一年一样，德里达一家去博肖在格施塔德的家里度过圣诞假期。这又是长谈的机会。博肖以一种真正的远见卓识，鼓励《柏拉图的药》的作者投入更具文学性的写作，正如晚些时候的一封信所表明的。

我在想，您是否已开始在哲学之外写作，同时仍然像您出色地描述过的，带着“您所有的负载”。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您都会这么做，您身上有些东西只有诗才能表达。……但也许您还想看清楚，而诗的领地是晦暗的。<sup>③</sup>

德里达在写给布努尔的最近的一封信中谈论的也是诗。这封信以马拉美的一句诗。开始——“我停驻在浪涛翻卷的堤岸的喧哗声中”，他接着说，回到法国后这“浪涛”的确十分猛烈。他更想与布努尔分享儿子皮埃尔的一个可爱的小故事。五岁半的皮埃尔还不大认字，却对马拉美着迷，试图背会《希律皇后》的开头：“她被废黜，可怕的羽翼浸在泪中。”早在美国，皮埃尔就在有时候晚上来陪他的德里达的美国女学生们面前得意地帮助她们解读马拉美。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他有时候会中断自己的游戏，搬着一把小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来到我的书房，要求“给我你的马拉美”，然后郑重其事地坐下，把书

① 冈迪拉克致德里达的信，1969年1月21日。

② 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致德里达的信，1968年12月30日。

③ 亨利·博肖致德里达的信，1969年4月23日。



总是翻开在同一页，费力地研究同一篇艰难的诗——《梦中之梦》。他选择它大概是因为其简短。不过，除了这些小小的关于马拉美的装腔作势外，皮埃尔不断有诗情的迸发，有时令人难以置信，这对我们来说是日常的奇迹。<sup>①</sup>

而德里达被太多“琐事和忧虑”占据，梦想着“离开，退隐，悠长持久的时间”。他感到他的社会和职业生活摧毁了他的力量，而更让他痛苦的是，他看不到任何出路。应布里耶克·布努尔之邀，他应该于5月23日到布莱斯特做一篇讲演，题为“燃烧的藏书”（“La bibliothèque en feu”），或者也可以说成“游戏的藏书”（“La bibliothèque en jeu”）<sup>②</sup>。他尤其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再次见到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就在旅行前一个月，老作家于1969年4月23日逝世，这次旅行因此失掉了其主要的存在理由。对于德里达，一名重要的对话者，而且是极少数他完全信任的人之一，不在了。

---

① 德里达致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信，1969年1月14日。

② 法文中“feu”（火）与“jeu”（游戏）谐音。——译注

## 第 14 章 不适的位置 (1969—1971)

259 1968年秋季开学时，德里达还在巴尔的摩的时候，《原样》的“理论研究小组”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开始组织一系列讲座。这些仍然带有5月事件火辣痕迹的夜晚吸引了大量听众。菲利普·索莱尔斯在10月16日开启了讲座系列。随后两场的主讲人是让-约瑟夫·古（Jean-Joseph Goux），这是一名年轻的研究者，在《原样》发表了《马克思和劳动的印记》和《古钱学》，深受德里达的赏识。

古深为《论文字学》所吸引，大胆地将德里达的思想扩展到几个新的领域。“这是我读过的关于马克思的最有趣的文章”，德里达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对他说。德里达没能参加他主讲的两场题为“黄金，父亲，阳具，语言”的讲座，但怀着最强烈的兴趣读了这篇文章。<sup>①</sup>古绝妙地代表了《原样》出版的合集《集体理论》的精神：超越传统学科，在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拉康改造过的弗洛伊德主义以及文字理论之间至少建立起真正的桥梁，如果不是将其统一的话。<sup>②</sup>在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e*）的概念里我们大概有理由看出一种“古—德里达式”的倾斜。从1970年代初期起，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比，德里达将越来越偏爱这一说法。

260 1969年1月，德里达回到法国几周后，理论研究小组有三个晚上的讲座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主讲《语式的源起》。这是对索莱尔斯的《数目》的解读，与德里达几乎同时在《批评》分两期发表的《播散》同样宽泛。但克里斯蒂娃将生成文本（*génotexte*）和现象文本（*phénotexte*）加以区分，建立了一种“语义分析”

---

① 这篇文章将重载于瑟耶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合集 *Économie et symbolique* 中。

② 同让-约瑟夫·古的访谈。

(sémanalyse), 这样的角度与德里达十分不同。今天, 索莱尔斯承认, “关于《数目》, 可以说在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竞争”<sup>①</sup>。这也是当时同三名主人公都很接近的古的印象: “很可能索莱尔斯害怕德里达给《原样》杂志和他自己的研究留下太强烈的印记。除了敬意, 他应该从德里达关于《数目》的巨制里读出占有的意图。这部远远超出评论的作品让索莱尔斯既得意又恐惧。德里达日益增长的威望应该使他感到危险, 这时特别要推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作为期刊的主要理论家上升。”<sup>②</sup>

但此刻, 冲突只是暗流涌动, 如果不是尚在潜伏状态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好。1969年2月26日和3月5日, 德里达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作了没有宣布任何标题的讲演, 后来在《原样》上以《双重场次》为题发表。这些年间德里达有了更多的自信: 他在这两个晚上更多的是表演而不是传统的讲演。正如不久之后卡特琳娜·克莱芒给他写的:

您的讲演恍如魔咒, 却以其对文字的呼唤而与之不同; 恍如哑剧, 却以其非表现性而与之不同; 恍如歌剧 (声音—手势—身体—布景的结合), 却以其距离的消弭而与之不同; 恍如丑角……却以其能指之间无所关联而与之不同。然而, 其中并没有为了显示解读/阅读的丰富性而独尊一种。<sup>③</sup>

占据《双重场次》中心位置的是德里达很久以来的偶像作家之一马拉美。这次他着力解构的主要是主题评论法的基础, 其最为壮观的成就便是让-皮埃尔·理夏尔的《马拉美的想象世界》。261

众所周知——这一点仍将得到证明——我们研究“白” (blanc) 或“褶” (pli) 的例子并非出于偶然。既因为它们马拉美文本中的特殊效果, 也因为它们恰恰被现代批评系统地认可为主题。然而, 如果我们窥到“白”和“褶”不能被当作主题或意义来把握的话, 如果正是在某种处女膜的白与褶当中, 文本的文本性才得以刻画的话, 我们便将勾勒出主题批评的局限性本身。<sup>④</sup>

① 对索莱尔斯的访谈。

② 对让-约瑟夫·古的访谈。也见 Philippe Forest 在其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259) 中对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三人之间这盘“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棋局进行的精彩分析。

③ 卡特琳娜·克莱芒致德里达的信, 1970年5月4日。

④ *La dissémination*, op. cit., p. 276-277.

照德里达的说法，白是指在文本中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白，“再加上这一全体性所产生的……文字之域”。但并不能就此将书写之页的“白”作为“这个系列中基本的所指或能指。这‘后面的’白（或也可说是‘最初的’白）既不在系列之前，也不在系列之后”<sup>①</sup>。什么都不能也不应该将处于文字核心的滑动或偏差的游戏加以固定。对于“多义性”（*polysémie*）这一诠释学概念，德里达想代之以“播散”。他此时开启的这种崭新的阅读方式，将在5年后的《丧钟》中进行最激进地实践。

※ ※ ※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1969年春的重要事件是戴高乐将军的离开。经过此前的危机，他希望重新找到个人的正当性。地区改革因而成为举行全民公决的理由。4月27日，“否”票获胜。戴高乐兑现承诺，第二天辞职。几周之后他的前任总理乔治·蓬皮杜当选共和国总统。

262 虽然德里达一直是左派，他却并不认可许多同时代人发自肺腑的反戴高乐主义。在后来接受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伯特（Franz-Olivier Giesbert）的访谈时，他甚至将戴高乐将军引为除了纳尔逊·曼德拉之外他唯一真正崇敬的政治人物：“尽管我在1960年代是反戴高乐主义者，我却对这个人着迷。他懂得把一切相结合：高瞻远瞩与工于心计，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同所有高明的政客一样圆熟狡猾，但却以他伟大的理想、在记者招待会上如珠的妙语和戏剧化的演绎胜过他们所有的人。”<sup>②</sup>在这个问题上，德里达同莫里斯·布朗肖截然相反，后者持久而且尖刻地厌恶戴高乐。将军离职几天之后，布朗肖写信给德里达：“我承认有一刻惊讶地发现自己更加自由地呼吸，而且，夜里醒来时自问：‘怎么了？如释重负？哦，对了，戴高乐’。”<sup>③</sup>

在于姆街，另一个人的离开要比戴高乐将军更加扰乱人心：雅克·拉康。从1964年起，每个星期三中午之前，于姆街的人行道上总挤满了豪车和美女。拉康本人则开着他的奔驰300SL跑车到达，随后进入黑压压挤满人群的杜萨纳礼堂。人们抽烟很凶，特别是大师本人也抽烟；浓重的烟雾从天花板一直侵入楼上，常引来抱怨。在高师校长的眼里，拉康不过是个热衷于上流社会的演说家，而且善于制造混乱；校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摆脱他的理由。多米尼克·勒古回忆道：“1969年

① *La dissémination, op. cit.*, p. 284 - 285.

②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7/philosophie-ce-que-disait-derrida/1038/0/31857>.

③ 莫里斯·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1969年5月13日。

一天早晨，罗贝尔·弗拉瑟利埃罕见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勒古先生，您是哲学家，我见过您旁听拉康关于真理的课，我想知道您的看法……据您看，他讲的内容严肃吗？我个人的意见，他所有这些有关阳具的故事，我觉得很淫秽。……我向您请教，因为德里达先生和阿尔都塞先生对我说是严肃的。”这场景颇为荒诞。我试图辩解，不知道他已决定赶走他。弗拉瑟利埃认为这些上流社会式的场景和挑衅的姿态同学校的使命毫无干系。但当他想要行动起来驱逐拉康时，产生了许多骚动。”<sup>①</sup>

1969年6月，拉康将弗拉瑟利埃写给他的逐客令公之于众：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被放逐。刚一下课，好几名忠实的听众，包括艺术家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菲利普·索莱尔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安托瓦奈特·富克（Antoinette Fouque）——法国女权主义的重要人物，临时兴起占领了校长办公室。局势很快恶化：菲利普·卡斯特兰——他在前一年秋已经领导过反对让·波弗莱的活动——开始吸弗拉瑟利埃的雪茄，随后给了他一记耳光。<sup>②</sup>索莱尔斯则满足于拿走了一摞有学校抬头的纸，并愉快地使用了几个月。但这整个事件并非仅仅是趣事。索莱尔斯承认：“拉康的问题让我更与德里达拉开了距离。他和阿尔都塞一样，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体制中人。他们两人对拉康只给予了软弱的支持，而拉康当时正处在可怕的孤独当中，被他的女儿和女婿抛弃。我就在这时开始接近他。”<sup>③</sup>

※ ※ ※

在于姆街，“毛主义者”长期以来占大多数，至少在哲学家那里如此。1967年加入高师的多米尼克·东布勒（Dominique Dhombres）回忆：“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保罗·利科转向毛泽东，然后是工厂劳动，这好像已成规律。”对德里达而言，幸好在1960年代末有几个更加倾向海德格尔的学生来到高师：埃玛纽埃尔·马尔蒂诺（Emmanuel Martineau），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雷米·布拉格（Rémi Brague），阿兰·勒诺（Alain Renault），让-弗朗索瓦·库尔提那（Jean-François Courtine）……

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则于1968年进入高师。在其著作《喜剧》中，他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见到德里达的情景。

① 同多米尼克·勒古的访谈。

② 同多米尼克·东布勒的访谈。

③ 同索莱尔斯的访谈。更多详情见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61 - 363,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op. cit.*, p. 542 - 543。

开学了。在我们所有人梦想过的于姆街的办公室里，老师单独约见新来的高师学生。他在那里，有血有肉，比我想象得年轻，也更和善，几乎是友好的。什么？这位哲学家，这位巨人，这位无情的解构主义者，这位神秘的作家，我从没想象过他会谈论诸如“论文计划”、“论文主题”、“学位课程”或“教师资格考试课程”这样无足轻重的问题。是他吗？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原样》的同行者，艺术家，就这样，简简单单，花时间去接待他的新学生，对他们说着所有高师老师说的话。不错，是他。我快哭了，的确是他。我说不出话来，如此激动。“您是谁？您做什么？您是德语学者，还是希腊学者？您倾向康德还是尼采？倾向黑格尔还是倾向柏拉图的辩证学家？某种思想？某个概念？”<sup>①</sup>

贝尔纳-亨利·莱维因为终于面对自己读过所有著作的大师而如此胆怯，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介绍自己，只想起来说自己是贝奈斯蒂（Benesti）的朋友：贝奈斯蒂是德里达的一名表兄，成功的药剂师，常供给他苯丙胺。这位表兄认为“杰基”是家族里一事无成的人，而自己则是本领域的成功者。提到他使得气氛骤然变冷，这第一次会面就此结束。“混淆了柏拉图的药和贝奈斯蒂的药”是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是个让莱维认为永远损害了同德里达的关系的错误。

不过，几个月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改善。像许多高师学生一样，莱维先天地感到自己更为阿尔都塞所吸引，但德里达更容易见到和接近。在一次谈话中，他为这位未来的《人面兽心》（*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的作者避免了一场大错：“1971年德里达帮了我个大忙！我重新整理在他的研讨课上作过的关于阿尔托和尼采的报告，想要出本书。我在《世界报》上读到一则广告，一名出版商在寻找书稿……关于普世思想！我心跳着给他们寄去了我的稿子。他们回复说很感兴趣，但需要支付1万法郎资助出版。我对他说起此事，德里达大笑：‘您疯了，这是诈骗’。”<sup>②</sup>

德里达的研讨课越来越受到赞赏，但他有时会想到离开高师这座“金城堡”，重回大学。从让·伊波利特去世后他便放弃了撰写传统论文的想法，而且1968年5月事件后的新规定似乎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他向成为索邦大学教师的皮埃尔·奥邦克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后者作出了鼓励的答复。他说最近同冈迪拉克就两三名哲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有可能获益于新的规定，可以就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撰写论文并答辩：“我们尤其谈到了你和阿尔都塞，冈迪拉克预计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特别

① Bernard-Henri Lévy, *Comédie*, Le Livre de poche, 2000, p. 13-14.

② 同贝尔纳-亨利·莱维的访谈。

对你。”<sup>①</sup> 不过他还需继续考察，因为极少有这样的先例。1969年秋天，德里达和奥邦克分别同冈迪拉克再次谈到此事，后者个人十分赞成，但担心某些同事会在原则上有些顾虑，至少在当下。这一计划被埋藏了很久。<sup>②</sup>

国外大学的情况更加简单些，德里达在那里受到日益热烈的欢迎。1969年7月初他再次来到柏林，第二年更加稳定，在比较文学系为40多名学生开研讨课。就在这些旅行中他认识了一名年轻的卢森堡人——鲁道夫·加什（Rodolphe Gasché），他很快成为德里达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并为伽达默尔的杂志撰写了一篇《论文字学》的书评，随后开始为一家大出版社苏尔坎普（Suhrkamp）进行《书写与差异》的翻译。他还遇到了维纳·哈马舍（Werner Hamacher），他同加什一样，将长期留在高师旁听德里达的研讨课，后来成为德里达在美国和德国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266

在马克思主义的压力与巴黎同样强大的柏林自由大学，德里达同萨缪尔·韦伯结下了最默契友好的关系。他也同彼得·斯丛狄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尽管后者在系里日益孤立，并抱着怀疑态度观察着研讨课的演变。斯丛狄有些苦涩地给一位友人写道：“人们越来越多地像德里达那样故作玄虚（我并不愿这么说，因为我很喜欢德里达）；人们对着文本奇思臆想，就像李斯特（Liszt）对巴赫（Bach）的主题随意进行发挥。”<sup>③</sup>

在英国，人们也开始对解构感兴趣。1969年9月25日，署名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对《论文字学》的严肃的长篇介绍刊登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激起了强烈的好奇。<sup>④</sup> 应1959年在瑟里斯认识的阿兰·蒙特菲奥（Alan Montefiore）的邀请，德里达在1970年2月和5月前往牛津贝里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蒙特菲奥回忆道：“我请他来部分是出于矛盾的心理。他和其他一些法国哲学家的作品在英国受到蔑视。我逆此潮流，在《哲学》上常常发表文章介绍法国新出版的作品。但对于我的学生，甚至有时对于我，德里达的作品仍然难以接近。在这些见面时我请他先让参加者就不理解的地方提问。在这种讨论中，他的表述十分清晰。”<sup>⑤</sup>

① 皮埃尔·奥邦克致德里达的信，1969年7月21日。

② 皮埃尔·奥邦克致德里达的信，1970年1月13日。

③ 彼得·斯丛狄致埃尔贝·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的信，1970年11月20日，载 Peter Szondi, *Briefe*, Suhrkamp-Verlag, 1993；由本书作者译成法文。彼得·斯丛狄于1971年10月18日在柏林自尽，在保罗·策兰之后一年多，同他一样也是自溺。

④ 该文也发表于 *Tel Quel* n°39, 1969年秋，标题是《月球上的一步》，随后成为《论文字学》阿根廷译本的前言。

⑤ 同阿兰·蒙特菲奥的访谈。



267 在法国，这段时期发生了几场有些令人费解的论争。现在共产党失去了其主要的威望和地位，在1968年后很难体现其重要性，而这时许多年轻的知识人选择加入共产党以抵制戴高乐主义的压力。安托万·卡萨诺瓦（Antoine Casanova）是当时《新批评》的主编，也是1970年以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承认，今天几乎不可能理解那时共产党人的“思想、行动、理论的旧框架中能够产生的突破、局限、模糊性和困难”<sup>①</sup>。共产党远不是铁板一块，它经受着许多知识思潮的冲击，这些思潮有时也围绕着一些奇特的问题展开。

1969年9月12日，《人道报》刊登了让-皮埃尔·费伊的一篇长文，题为《马拉美同志》。索莱尔斯和《原样》是其主要目标，但费伊也隐晦地攻击了德里达。他激烈反对这样的思想，即西方的全部历史都建立在“话语对文字的‘贬低’和压制”上。根据他的说法，有些人甚至“非常严肃地将话语与资产阶级、文字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费伊并不满足于这漫画似的抨击。<sup>②</sup>他通过隐晦地指向海德格尔和神话（*mythos*）的概念，试图在政治上质疑德里达，暗示他的研究与促使希特勒上台的“倒退的革命”有某种关联。

德里达克制地未作出回应。但随后的一周，《人道报》上出现了两个回应。一个是《新批评》的编委会成员克洛德·普雷沃（Claude Prévost）。另一个是菲利普·索莱尔斯：

268 雅克·德里达在他开创性的著作《论文字学》中建立了我们认为具有科学依据的文字理论，而费伊先生只抓住了其中被曲解的一个零星的方面，却通过对文字理论的影射，断定它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继续。这一提法极为严重。德里达在多处批判过海德格尔，而且，暗示这部作品可能与纳粹主义有着哪怕最微小的共同点，这是诽谤。费伊先生既通过《原样》指向德里达，又通过德里达指向《原样》。他声称（始终是旁敲侧击地）我们“将话语与资产阶级、文字与无产阶级联

<sup>①</sup> “Des contradictions douloureuses”, table ronde avec Bernard Frederick, Antoine Casanova, Frédérique Mattonti, *Nouvelles Fondations* n° 3-4, 2006.

<sup>②</sup> 早在1967年，德里达在《法兰西文学》的访谈中就激烈地抗议过这样的解读。他肯定地说，他从未想过通过为文字平反来对抗话语，或者对声音提出反抗。他的着重点在于分析“一种等级化的历史”，而绝非“用一种文字中心主义来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者总的来说，用任何一种中心来对抗另一种中心”（*Positions, op. cit.*, p. 21-22.）。德里达那些热情的评论者们则不一定总是持有同样的谨慎。



系起来”；说我们支持的论点是“历史在西方不曾停止过倒退”，等等。而这样的说法无论在德里达那里还是在《原样》那里，严格地来说都无迹可寻。<sup>①</sup>

奇怪的是，让-皮埃尔·费伊给德里达写信，说人们算到他头上的关于德里达的言论“是个粗糙的谎言。说这些话的人要为此负责。至于我，我可以清楚而公开地说，您的名字不能与这一切混为一谈，也不能使用这样的口气。我也想说数年来我对您的工作所抱有的尊重与敬仰，您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还希望同他进行计划了好几个月的“友好的交谈”。但费伊还是要求德里达“暂时地”，而且“为了避免任何新的曲解”，不要公开这封信。<sup>②</sup> 10月10日，他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澄清”，肯定地说对德里达及其思想只有尊重和敬仰。

但论战在《原样》和《改变》上继续进行，并愈演愈烈。费伊一段时间以来在研究纳粹主义的哲学根源，他在《洛桑日报》上明确攻击德里达，确认他的论述中“有个受到海德格尔哲学影响的盲点，这在其哲学本身也已然是个盲点，一个意识形态的污点，它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意识形态中最为反动的东西”<sup>③</sup>。此后，德里达和费伊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抗性的，并将在十几年后产生不容忽视的后果。

就在这些阴郁的事件间隙，德里达同让-路易·乌德比纳（Jean-Louis Houdebine 269）接近起来。他是共产党员，是《诺言》（*Promesse*）杂志的活动分子，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的朋友，经常在《新批评》上发表文章，试图使之更加向现代性开放。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在筹备新的一次克吕尼会议时，乌德比纳给德里达写信，说对他言论的“掩盖和压制”在党内仍然十分严重。“这是源于十分深刻、十分难以战胜的抵制力量”<sup>④</sup>，正如索莱尔斯警告过他的。

第二届克吕尼研讨会于1970年4月2日至4日举行，主题是“文学与意识形态”。德里达的参与并不比第一届更多，但他的作品常常被提及。会上《原样》和《诗学行动》（*Action poétique*）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后者是亨利·德吕（Henri Deluy）的杂志，也同共产党有关，但要折中得多。紧张气氛一触即发，以于一位参加者晕了过去。年轻的女语言学家、让-皮埃尔·费伊的密友米佐·罗纳（Mitsou Ronat）负责攻击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而且十分恶毒。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则抨击德里达，把他的研究与荣格（Jung）相提并论，令他错愕。

① 载《人道报》，1969年9月19日。

②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69年9月24日。

③ 载《洛桑日报》，1970年10月10日至11日。

④ 让-路易·乌德比纳致德里达的信，1970年3月17日。

鲁迪奈斯库对这些对峙保留着精确的记忆：“晚上，《原样》成员们向组织者抱怨攻击的激烈性。米佐·罗纳和我收到了一封指责信，我们只好连夜协商好不让它公之于众。克里斯蒂娜·布希-格鲁克斯曼和卡特琳娜·克莱芒被指派第二天对我们做出回应。表面上我们是少数，但实际上，《原样》失掉了党控制思想和文学这场战役。他们本想强加一条‘路线’，一种唯一的和僵硬的理论，这是我们绝不希望的。很大程度上，由于这场失败，索莱尔斯在第二年更激进地转向了毛主义。”<sup>①</sup>

※ ※ ※

这些争执尽管常常对德里达提出质疑，实际上却与他无关，也与他关注的问题十分遥远。在1969—1970年间他开始结下新的同盟。

1969年，他同斯特拉斯堡大学年轻的讲师让-吕克·南希开始交流。交流由南希发起，他给德里达寄去了一篇讨论其作品的文章，在它发表于《斯特拉斯堡文学院简报》之前。德里达回了一封长信，表明他完全了解这位年轻哲学家的研究工作。

我在《精神》上读到过好几次您的文章，因此我早已知道我们必须见面，或无论怎样必须相遇。您的来信和文章超出了我的期待，我为此向您致以热忱的谢意。

我无法答复您有力而谨慎地提出的所有问题——它们是决定性的和尖锐的。我自己也提出了这些问题，您该想得到，而您在信中所称的困惑，您很知道……我也同样感到了。……是的，关于“意识形态”，关于“科学”。我们以相似的方式阅读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必须工作。但这领地比以往遭到了更多的破坏。<sup>②</sup>

在信末，德里达提到了他认为就让-吕克·南希提出的问题走得“最远”的文章——《人之终结》，这是他准备在纽约之后于布鲁塞尔发表的演讲。他提议给他寄去这篇文章，他不打算在法国发表，至少眼下不会：“此刻我对发表文章甚少兴趣，甚至感到忧虑。我相信这种感觉还会持续下去。”

这封信让南希十分感动，他预感到的亲近让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但他不知道是不是敢和德里达会面，担心不能“恰当地表达也许还不曾把握得足够好的直觉”。

---

<sup>①</sup> 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访谈。也见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op. cit.*, p. 544-545, e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50-354.

<sup>②</sup>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69年4月22日。

让-吕克·南希的出生环境与德里达十分不同。他1940年出生于波尔多一个天主教家庭，受到过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的培养。经过几次高师考试失败后，他在保罗·利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他起初为了研究神学来到斯特拉斯堡，但很快就与之相脱离。就在那里，当时文学系的讲师吕西安·布劳恩（Lucien Braun）把他介绍给了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271

我们的相遇直接而强烈，虽然我们十分不同。菲利普不信教，比我更加政治化也更加文学化。他曾在《新商业》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同他在勒芒时的高师预备班老师热奈特关系密切，后来在波尔多成为热拉尔·格拉奈尔的学生。我们两人经由不同的路径都曾对《论文字学》产生极大兴趣。德里达对我们而言代表活的哲学：一个就在我们眼前进行哲学实践的人，在创造着今后应当加以研究的概念。德里达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链条上加上了缺失的环节，他让我可以去阅读胡塞尔。布劳恩担心我去南泰尔，因为利科想让我在那里做助教。他直觉地感到把菲利普和我联系起来的话就能够把我们两人都留住……1968年5月的斯特拉斯堡十分动荡，有许多辩论，还有巨大的激进的欲望。我们对共产党充满怀疑，模糊地受到毛主义的吸引，但对境遇主义则更感兴趣，特别是菲利普。<sup>①</sup>

1970年初，南希和拉库-拉巴特邀请德里达参加关于修辞的研讨课，这是在他们刚刚创立的“符号与文本理论研究小组”框架内的课程。热奈特和利奥塔（Lyotard）也将出席。德里达的发言题为《白色神话》，是他在高师研讨课的摘录。

这里讨论的是“隐喻”在哲学文本中的地位，这使“隐喻”这一概念的“形而上学”特点得以显现，这个概念可能会引领并消解这个问题。……这一分析的起因或曰导线，是法朗士（A. France）（没错！）的《伊壁鸠鲁的花园》中的一段。真正的导线则将经过尼采和海德格尔之间。<sup>②</sup>

272

德里达在1970年5月8—9日第一次来到斯特拉斯堡。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在德里达逝世后不久草就的一篇动人的致敬文字中，详细讲述了这次在许多方面来说堪称奠基性的会面。

①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70年4月21日。

他是“六八后”让-吕克和我成功创立的“研究小组”第一次请到的三位嘉宾之一。让我震惊的是三样东西，不可磨灭：他眼神中无限的忧伤，在他同热奈特走出火车站，看到前来接站的让-吕克和我之前。这是照片上卡夫卡的眼神，也是策兰的眼神（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我们宣告他刚刚得知的策兰之死）。随后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王者之风，当他发表讲演《白色神话》时，这讲演让必须随后发言的我震撼、沮丧、语无伦次、羞愧万分（但很快，电光石火一般，他的善意，他的仁慈，他远远超出简单的关注的理解：他的笑容……）。最后，到了晚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快乐，他的活力，或不如说他独有的喜悦，突如其来。<sup>①</sup>

在这篇吊唁文章几个月之前，当德里达最后一次来到斯特拉斯堡时，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一起谈起了这次见面的其他时刻。

我们记得一次散步：菲利普和热奈特在前面，让-吕克和德里达跟在后面。（利奥塔还没到。）热奈特和菲利普互相认识，边走边聊；让-吕克则发现了德里达保持沉默的能力，有些担心自己不得不给他指点沿途风光……而在另一刻他变得多话起来，讲述刚刚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事，年幼的孩子没得到许可就骑车上了国道。现在还能明显感到他当时的恐惧。我们模糊地感到吃惊：我们发现，同哲学家不必非谈哲学，研究是通过文本进行的。<sup>②</sup>

273

同南希和拉库-拉巴特的联系很快变得十分紧密，并带来许多共同的计划。

大概就在同时，德里达认识了萨拉·考夫曼，并很快将她介绍给了这两位并非土生土长的斯特拉斯堡人。她1934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拉比，1942年被捕并遭流放，她童年时东藏西躲度过了整个战争末期，经历了极为戏剧化的情形，这些经历她只在最后一本书《奥德奈街，拉巴街》里才有所透露。1968年她开始了同德里达的交往。萨拉·考夫曼正在让·伊波利特的指导下准备论文《尼采和隐喻》。伊波利特去世后，她请德里达接任导师。由于他还没有担任导师的资格，最后由吉尔·德勒兹承担此任。但萨拉·考夫曼成为于姆街研讨课最为忠实的听众之一，并

---

<sup>①</sup>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Hommage", *Rue Descartes* n°48,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75.

<sup>②</sup> Jean-Luc Nancy,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Derrida à Strasbourg", *Penser à Strasbourg*, Galilée, 2004, p. 14 - 15.

与德里达接近起来。

1970年6月，德里达主要为父亲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而担忧。埃梅·德里达患了肾绞痛，令人惊慌地消瘦。医生诊断出胃溃疡，然后又说是精神抑郁。不断加重的病痛使夏天变得阴郁，医生却无法确诊。雅克烦躁疲倦，无法专注于他带到尼斯的关于冈迪拉克的文章。“父亲的病到今天还带给我许多不安，带走了我所有的力量与勇气”<sup>①</sup>，他给让-吕克·南希写道。

埃梅·德里达因胸膜炎住院，“在两个月的焦虑、不确定，甚至是迷茫之后”<sup>②</sup>于1970年10月18日去世。实际上他患的很可能是胰腺癌——雅克本人就在同样的年纪死于此病。<sup>③</sup>在最后的几周，德里达频繁来往于尼斯。现在他继续常常前去给母亲支持，这些旅行令人十分疲倦，尤其是他拒绝乘飞机。这意料之外的逝世让他深受打击，他感到惶惑失落，“几乎无力维持职业的形象”<sup>④</sup>。

274

※ ※ ※

高等师范学校在1968年后的几年间一直动荡不安，在1971年年初更是经历了一场危机。2月，罢课运动持续了几周。推动罢课的“达摩克利斯”行动委员会决定组织一场巨大的庆典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1971年3月20号晚在学校聚集了5000多人。但晚会的组织者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夜晚在暴力中结束。死者纪念碑被毁坏，大量建筑物遭劫，包括图书馆，还发现火灾的苗头。3月21日星期日早晨，学校如同战场。高师校友、总统蓬皮杜为所发生的一切深感震惊。他前所未有地要求国民教育部部长奥利维耶·吉沙尔（Olivier Guichard）将学校关闭两个月。总统听说罗贝尔·弗拉瑟利埃当晚不在场，十分震怒，要求他辞职。人们预测德里达的密友皮埃尔·奥邦克会领导学校。但蓬皮杜更愿意请与他同级的人学习成绩第一名获得者、希腊学者让·布斯凯（Jean Bousquet）出任校长。<sup>⑤</sup>

事件发生几周后，德里达同玛格丽特、皮埃尔和让出发去阿尔及利亚两周。他要在阿尔及尔大学讲授一系列课程，但更让他享受的是1962年夏天后第一次回到青

①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70年9月13日。

② 德里达致罗日·拉波尔特的信，无具体日期（1970年10月）。

③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④ 德里达致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信，1970年11月5日。

⑤ 关于这一时期的更多详情，可见 Robert Flacelière, *Normale en péril*, PUF, 1971, et Christian Hottin, “80 ans de la vie d'un monument aux morts, le monument aux morts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http://labyrinthe.revues.org/index262.html>), ainsi que Pierre Petitmengin, “Georges Pompidou vu de l'École” (<http://www.georges-pompidou.org/prixgp/ens.htm>)。

年时代度过的地方。可惜这次停留远远谈不上成功，正如他对罗日·拉波尔特所讲。

275 这次旅行在各个方面都是痛苦的：一次令人抑郁的回归我童年时的“古老”之地；这是一个让人很高兴看到其独立的国家，总的来说，运转正常，但也陷入一些一眼看去十分明显的严重问题（失业、人口过多，等等）；一所人满为患的大学（1.8万名学生），但没有政治自由（学生社团被解散、十分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集会和张贴政治海报的权利被拒绝，等等）。还有孩子们的不适，几乎一直在下雨。我们于是早于原定计划回来。<sup>①</sup>

但德里达仍然在以后的几年中感到一阵阵强烈的“阿尔及利亚乡愁”。他在给长期在阿尔及尔教书的朋友皮埃尔·富歇的信中说：“这所有深埋的过去沉默而强有力地对我产生着作用。”<sup>②</sup>“我有时感到如此冲动的令人跌倒和晕厥的乡愁。我并不夸张。只要一有机会（时间、金钱），我就会回去过几天。”<sup>③</sup>

※ ※ ※

就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人，热拉尔·格拉奈尔在1968年5月之后也经历过巨大的精神危机。在此之前他似乎并不关心政治，此后却将之置于首位。他将自己新近发表的文章寄给德里达，并就好几点向他提问，一开始就是“他对马克思保持沉默之谜”<sup>④</sup>。格拉奈尔当然不是第一个就此提出疑问的，但却是德里达费心给出长篇坦率回复的唯一一人。“如果我早看到在马克思和所有以他为名产生作用的一切中，‘要点’基于何处，如果我早能够对这一切进行解读，而且同‘我’在别处的尝试并非倒退关系的话……我本会就马克思发表意见的”<sup>⑤</sup>，他给格拉奈尔写道。

他解释说，当然，有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应当有恰当的意见。有人提议就田径运动对他进行采访，为的是出版一本书，其中也可能会有让·罗斯当（Jean Rostand）、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的论述，但他“自然”对采访者表示了自己“坚决的沉默”。同样，

①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1年4月21日。

② 德里达致皮埃尔·富歇的信，1974年6月14日。

③ 德里达致皮埃尔·富歇的信，1975年3月2日。

④ 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月28日。

⑤ 德里达致格拉奈尔的信，1971年2月4日。

他也拒绝了一次关于布朗肖的广播节目，尽管布朗肖是对他最重要的作家之一。<sup>①</sup>因此他并非仅就马克思保持沉默。《资本论》作者的文本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并无‘真理’”，但它目前受制于一种诠释的策略，德里达认为这一策略“在其主要的部分上，是形而上学的和倒退的”。他不愿正面攻击这一策略，因为在目前局势下这将是一种反动的举动。“我将永远不会陷入反共产主义，因此我将之关闭。我知道这惹恼了所有的人，我也知道有些人像你一样，不大在乎‘尊重’我的沉默。”

德里达承认他的态度“能够带来非政治化的错觉，或不如说‘非实践’（*apraxie*）感”，他的长信的末尾好像预告了22年后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我只有在完成工作以后才会走出这沉默。这工作，我了解我的方式和节奏，我预感到它永远不会是一种“皈依”，而是倾斜的剖解，侧面的移动，追随着马克思主义文本或它所表述的“革命”的难以觉察的种种风格。……在此之前，还能做什么呢，除了在力所能及的严格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并每一次都尽可能“靠左边”行动——在我们见到或掌控的领域里，当局势相当清晰时——但对这种“行动”的微观意义并不抱大的幻想。

“每一次都尽可能‘靠左边’行动”，这就是雅克·德里达从这时起的行为准绳，而有些人却不公正地指责他只是到后来才介入社会。当形势在他看来“相当清晰”<sup>277</sup>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对他提出的请求予以答复。1970年11月12日，他签署了请愿书，抗议查禁皮埃尔·吉约塔（Pierre Guyotat）的《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签名的还有热罗姆·兰东、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皮埃尔·布列兹、米歇尔·福柯，以及新小说派和《原样》等的大批作家。两周之后，他和其他400名法国知识分子响应了《新批评》要求释放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呼吁。1971年1月19日，在《人道报》上，他首次表明了对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关切。在约旦军队反复的血腥侵略之后，他签署了《反对所有消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企图》的呼吁书，呼唤“全体民主力量的意志，以求得在人民自决权力之外别无考虑余地的政治解决”<sup>②</sup>。

<sup>①</sup> 德里达致比利时广播电台的拒绝信完全表现出那时他对媒体的态度。他不信任一切媒体，哪怕是他的工作最为关注和最为尊敬的媒体。“您也许知道我对布朗肖思想的重要性是多么深信不疑——而且人们尚未真正了解——以及它对我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出于这一原因，我感到很难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谈论它’，并‘将我的思绪固定下来’，围绕几个问题在几分钟之内把我的所见所闻汇集起来。我非常真诚地表示遗憾，并请您理解我的顾虑。”（德里达致RTB一位负责人的信，1969年12月13日。）

<sup>②</sup> 这些请愿书的剪报保存在德里达在IMEC的档案中。

几个月之后，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事件使他的介入更加个人化。杰克逊是一位黑人活动家，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一次骚乱中，一名白人看守死亡，他与其他两名黑人囚犯被不公正地判处谋杀罪。杰克逊在其著作《索莱达的兄弟》中讲述了此事，该书深刻影响了公众舆论，使这位 28 岁的年轻美国黑人成为黑豹斗争的象征。这部作品的法文版由迦里玛出版，让·热内作序。热内同黑人革命者共同度过了三个月，同他们肩并肩走遍了美国的大学。1971 年 7 月，热内发起了“成立一个黑人政治犯支持委员会的呼吁”<sup>①</sup>，随后请签名者为一本关于杰克逊的书撰文。

278 德里达在去往美国的途中以一封致热内的信的形式写成一篇文章。但在 1971 年 8 月 21 日，就在开庭审判两天前，杰克逊被警察打死，官方理由是他企图逃跑。预计出版的书失掉了其存在理由，德里达撰写的精彩文章将不会发表。文中他再次确认对黑人囚犯的支持，同时也向热内传达了对斗争形式的顾虑。他尤其担心这样一部作品会使“这个巨大的问题沦为或多或少文学性的甚至社论性的事件，沦为一出法国甚至巴黎式的表演，忙于签名的一群知识阶层自我欣赏的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犹豫是否参加您对我说过的集体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担心有一天人们可能施加于这位您称为“文学才俊”的“诗人”杰克逊的压力（自然，您是对的，应该承认他的才华。我在此怀疑的并不是您，我也同意应该对此加以利用），还有其他类似的陷阱。谁能知道在这个舞台上谁在陷害谁呢？……以世界上最善良的意愿、最真诚的道德愤慨反对这确实不可容忍的事，却可能把声称想要解放的重新关押起来，将罪行驯化。<sup>②</sup>

279 无论是否公开，这些具体的介入行动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在德里达身边，还有人比格拉奈尔更加急于让他就他们认为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开始。《诺言》的主导者让-路易·乌德比纳和居·斯卡尔佩塔（Guy

① 热内同时发表了一份宣言，题为《为了乔治·杰克逊》，重载于他的遗作 *L'Ennemi déclaré*（热内的文章和访谈，Albert Dichy 整理注释，Gallimard, 1991, p. 353）。在宣言的倒数第二段，热内写道：“行笔至此，为了拯救黑人，我呼吁对白人从事犯罪和杀戮。”这极端暴力的句子同德里达一生采取的所有政治立场都是矛盾的。我们不妨认为签名者们——其中有莫里斯·布朗肖、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皮埃尔·吉约塔和菲利普·索莱尔斯——读过和赞同的只是为黑人囚犯的呼吁书，而不是与之相伴的热内写下的宣言内容。但我仍然感谢《最后的热内》的作者（Seuil, coll. “Fiction & Cie”, 1997）阿德里安·拉罗什（Hadrien Laroche），他提醒我注意此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在此无法进行的长篇分析。

② 德里达致让·热内的信，1971 年 8 月 20 日。全文首先以英文版发表于 *Negotiations :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Elizabeth Rottenber 汇编并介绍的雅克·德里达文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后重载于关于德里达的 *Cahier de L'Herne, op. cit.*, p. 318—320。



Scarpetta) 便是如此。《诺言》起初只是普瓦提埃的一本诗歌杂志，但乌德比纳和斯卡尔佩塔将它逐渐改造为《原样》的分刊。1971年5月，当他们请德里达接受一场深入的访谈时，《双重场次》的作者立即心知肚明。“数月以来有着怎样充满意识形态的局势啊！冲突中有着怎样的暴力啊！”<sup>①</sup> 乌德比纳最近给德里达写道。德里达同意迎接这样的暴力。

采访于1971年6月11日<sup>②</sup>下午在德里达高师的办公室进行。讨论很激烈，语气却礼貌客气。乌德比纳和斯卡尔佩塔对他都十分敬仰。德里达称自己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法则和发布宣言的模式”，并无躲闪之意。从让-皮埃尔·费伊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攻击之后，他尚未公开回应，如今则做出有力且时带讽刺的明确答复。他重申自己对《原样》和索莱尔斯的支持，但拒绝卷入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旗下，并断定“在条件尚未完全清晰时，匆忙建立接触或联系将不会有任何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好处”。在他的解构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之间，“联结是不会立刻给出的”<sup>③</sup>。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状况下，他认为“必要而迫切的”，“是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出现条件及其局限性进行综合的确定”。作为对费伊的隐晦回应，德里达坚持说海德格尔的文本对他极为重要：“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我们还远远未能探索其批评的全部源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发表的“所有论述”中都标明了“相对于海德格尔论题的一种偏差”<sup>④</sup>。

第二天，乌德比纳热情感谢德里达耐心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几天之后，当他向索莱尔斯讲述采访过程时，他说到德里达“防卫性多于进攻性的立场”，还有许多的“小心”和“谨慎”<sup>⑤</sup>。事情远未结束。7月1日，乌德比纳将采访记录寄给德里达，伴以一封列宁主义语气十足的信，信的一部分将附在采访之后。德里达并不满足于仔细审阅自己的言论，他补充了一篇关于拉康的极为激烈的长注，因为就此问题“一些友人，出于有时相互矛盾的原因，对他的中立感到遗憾”。

280

在我到目前为止发表的文章中，的确几乎完全没有引用过拉康。其原因不仅仅是他以侵占的形式或出于侵占的目的而表现出的攻击性，这一点从《论

① 乌德比纳致德里达的信，1970年12月20日。

② 该采访时间并非《立场》中所记载的6月17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op. cit.*, p. 85.

④ *Ibid.*, p. 73.

⑤ 信件片段，引自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68.

文字学》在《批评》上发表（1965）以来（甚至更早，人们对我说），拉康就直接或间接地，私下或公开地，在他的研讨课上，还有，从这时起——我本人可以证明——在他几乎每一篇文字中，一再地重复。……这话语上的痉挛——我对此很遗憾——并非无足轻重，在此亦然，它呼唤一种沉默的倾听。<sup>①</sup>

德里达称，在写作最早期，他只读过拉康的两三篇文章，但早已“确信其提出的问题在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性”。此后，在仔细阅读《作品》后，他确定在其中看到了几个重大的主题，也是他本人试图质疑的问题：“充实的话语在其与真理……的本质联结中所具有的目的性 (*telos*)”，“对语音学的权威性，更确切地说，是对索绪尔语言学权威性的不假思索的轻松参照”，再加上对“文字的概念”缺乏具体的考问。他自称对《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课》很感兴趣，并将很快重读这部作品。<sup>②</sup>他确实这么做了，那是1971年5月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之时。此次演讲大概在耶鲁又做了一次。

281 7月31日，乌德比纳确认收到了修改好的完整的采访记录。他认为整体将构成“一篇重要的文本，到秋季时将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一系列丰富的印记”；他并不怀疑它将“产生一些反响”。<sup>③</sup>德里达坚持在杂志于11月出版之前不让任何人看到此文。但这并不妨碍乌德比纳在雷岛与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见面时详细谈到采访的内容，包括关于拉康的补注。

※ ※ ※

秋天的开学季看来的确将十分激进。在《原样》这边，毛主义的压力越来越大。1971年6月，索莱尔斯促成瑟耶出版了《论中国》，这是阿尔都塞的一位女性朋友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一篇充满激情的报道。困惑的德里达向老朋友毕仰高请教其看法。《中国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并未掩饰对这拙劣的宣传所感到的愤怒，它宣扬的这场“文化革命”的血腥暴力是欧洲人不愿看到的。正如德里达在晚期的一篇文章里所说，与毕仰高的交往让他很早就警惕“在一些地方窃窃低语的蒙昧主义的恐怖”，特别是“此时，最令人忧虑、最危险，有时也最可笑的教条主义的颞颥统治

① *Positions, op. cit.*, p. 112-113.

② *Positions, op. cit.*, p. 115-118.

③ 乌德比纳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7月31日和8月7日。

着某种巴黎的“文化”舞台”<sup>①</sup>。此刻他则尽量避免这一主题。尽管政治上很坚决，但他与索莱尔斯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对话；与克里斯蒂娃亦然，她刚刚正式加入杂志编委会。《播散》的出版正在筹备中，看样子德里达自然会去参加来年《原样》在瑟里斯组织的研讨会“阿尔托/巴塔耶”。

无论怎样，和1968年一样，出发去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放松。这次旅行是乘船，从8月中就开始，因为德里达还无法克服对飞机的恐惧。与雅克和玛格丽特同行的有他们的两个儿子，还有外甥女玛蒂娜·麦斯凯尔——雅尼娜的女儿，她刚刚在尼斯考完中学毕业会考。她回忆道：“我童年时，雅克有点像个美国舅舅。他遥远的旅行令我遐想。1971年7月，我正在着急地等待法文会考成绩，他对我说：‘我想带你去美国，但你知道，这要看你的会考成绩。’实际上，他口袋里有我的成绩，很好……几周之后，我们一起登上了法兰西号轮船。我记得雅克指出在豪华轮船与他支持斗争的美国贫困黑人之间的距离。在海上的旅程中，我感到进入了对我来说崭新的精神世界。玛格丽特让我读了几本弗洛伊德的作品，雅克则让我读《柏拉图对话录》。第二年，我的哲学课立刻取得了好成绩，这决定了我的方向。”<sup>②</sup>

282

前几周主要是旅游。玛格丽特和雅克开着用法兰西号运来的他们自己的白色雪铁龙，想让玛蒂娜和孩子们看到尽可能多的东西。皮埃尔那时8岁，让即将4岁。玛蒂娜·麦斯凯尔讲道：“我们在纽约停留了几天。雅克很高兴，也很自豪地让我发现这座他已很熟悉的城市。他坚持开车穿过哈勒姆。有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拍照。他说我们不能停车，因为很危险，但还是觉得需要带我们去。”

在波士顿中转后，他们一起去了蒙特利尔，第十五届法语哲学协会大会于8月29日至9月2日在那里召开。保罗·利科主讲第一场。之后便是德里达的讲演，题目是“签名、事件、语境”，是对奥斯丁（Austin）的解读，几年之后这个解读将导致他同约翰·R. 塞尔的再度论争。但此时，德里达与利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热烈的讨论，讨论随后在各自的文章中继续。<sup>③</sup>

① Jacques Derrida, “L’ami d’un ami de la Chine”, in *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n hommage à Lucien Bianco*, op. cit., p. II-III.

② 同玛蒂娜·麦斯凯尔的访谈。

③ 利科与德里达的演讲以及他们的讨论发表于 *La Communication, Actes du XV<sup>e</sup>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des sociétés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e*,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éditions Montmorency, 1973。利科的文章重载于他的著作《活的隐喻》，他将此书送给德里达，并题词：“给雅克·德里达，这解释的开始，期待新的交汇，此致，忠实的思想。”这场有时被称为隐喻之争的辩论在德里达的几篇文章里延续：“La mythologie blanche” (*Poétique* n° 5, 1971, repris dans *Marges*, Minuit, 1972)，以及“Le retrait de la métaphore” (in *Poésie* n° 7, 1978, repris dans *Psyché*, Galilée, 1987)。详情见 François Dosse, *Paul Ricoeur*, La Découverte/Poche, 2008, p. 359-363。

283 玛蒂娜不久即返回，升入毕业班。随后的几个月，在十分宁静的秋季，雅克、玛格丽特及两个孩子回到巴尔的摩，又见到了约翰·霍普金斯的朋友们。他们住在斯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住过的一所宽敞的公寓里。雅克的母亲和一个姨母将来此度过几周。德里达的教学任务虽然繁重，但最初的几个星期还是十分愉快的。

师生们十分热情，大学行政部门运转“润滑”而轻松，让人难以置信。所有的舒适和“灵活”——例如在图书馆——便构成一出戏，一件物品。显然，金钱让一切便利。而且，看来这是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最安宁的大学之一。一些学生对此不满。他们在巴黎待过一年，每日跟踪着巴黎的政治文学事件，就好像住在迦里玛、马斯佩罗和瑟耶出版社之间。<sup>①</sup>

学生当中有些已经了解德里达的研究，因为他们听过他在巴黎奥德翁广场进行的小型研讨课，那是康奈尔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附属部门。阿兰·巴斯（Alan Bass）便是其中一位，他后来成为德里达最优秀的美国译者之一。“在巴黎，德里达1970年给我们上的课是关于洛特雷阿蒙的。他的讲课方式迷住了我，我开始系统阅读他的作品，并在我的文章里大量引用。在巴尔的摩，他主要讨论对拉康的解读，特别关注的是《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课》。为了好好理解拉康，我决定也尽可能系统地阅读弗洛伊德。这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入门，后来成为我的职业。这些课结束后，我完成的作业让德里达很满意。他在他的公寓里接待了我，还有玛格丽特和孩子们，并同我谈了很久。我至今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雅克·德里达本人就坐在我旁边，修改我的语法错误！几天之后，德里达最热情的辩护者之一，那时也在霍普金斯执教的希利斯·米勒建议我注释并翻译《书写与差异》，作为我的论文。我感到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机会。雅克和米勒谈到了我的未来和他们计划为我安排的角色。第二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我开始了《书写与差异》的翻译，逐条确认引文。例如碰到引自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一句话时，我就去阅读全书。”<sup>②</sup>

这时，德里达在美国大学界的声誉仍然局限于一些小圈子。首先因为他用法语给数量有限的学生上课，其次因为他还没有一本書被译成英文。阿兰·巴斯在翻译《书写与差异》，一位孟加拉裔年轻女子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则开始翻译《论文字学》。但这两本书都要到几年之后才能面世。因此，短期内解构理论

① 德里达致米歇尔·德基的信，无日期（1971年9月或10月）。

② 同阿兰·巴斯的访谈。

通过研讨会和个人会面在美国慢慢传播。从10月中旬起，德里达一边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上课，一边开始每周去别的大学讲课。保罗·德·曼刚刚离开巴尔的摩，加入耶鲁，这将很快产生重大的后果。此刻，他请德里达为比较文学系做一次题为“文学与精神分析”的讲演。德·曼向他保证说，同第一次到耶鲁遇到的情况相反，这次他将面对的是“高度感兴趣的听众”，而且他们读过他的作品。<sup>①</sup>的确，这次讲演“真理的因素”令听众惊叹，它后来变成一篇同名文章。11月6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值瓦雷里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德里达作了另外一场重要的讲演《夸尔·凯尔》（“Qual Quelle”）<sup>②</sup>；这是他自青年时代后第一次沉浸于瓦雷里的作品，之后常常加以引用。

※ ※ ※

德里达在美国期间，波特拉和阿尔都塞告诉他于姆街的消息。新校长让·布斯凯到任了，他是蓬皮杜的老同学，一位“有些煽动性的老绅士”，但“明显比前任更加灵活有礼”<sup>③</sup>。德里达不应该“对学校及其哲学家有一丝担忧的阴影”<sup>④</sup>：在这方面，一切都将变得更好。

但这两位同事和友人特别要告诉他巴黎的动荡：其剧烈并不亚于1968年秋天他在巴尔的摩的时候。索莱尔斯当然向波特拉新近在瑟耶出版的《太阳的版本——尼采的形象与体系》表示了祝贺。但他特别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一件大事，与《论中国》有关。1971年9月，马西奥奇这本书被禁止参加《人道报》举办的共产党庆典，这加速了索莱尔斯与共产党的决裂。德里达在回来之前应该适应新的形势，因为“‘修正主义者’这个修饰词以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一锤定音”<sup>⑤</sup>。在雅各布街的瑟耶出版社社址，《原样》的办公室里铺满了大字报，其中很多是马塞兰·普利耐的手笔。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下面这条：“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阿拉贡还是毛泽东？同志们，该选择了！”<sup>⑥</sup>

阿尔都塞则在从事复杂的游戏。虽然对他来说不可能离开党，他还是见了乌德比纳，后者想在《诺言》为他出一期专刊。他听说即将刊登同德里达的访谈，深受

①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0月13日。

② 这是德里达从瓦雷里的作品《泰尔·凯尔》（*Tel Quel*，意为“原样”）中化来的文字游戏。——译注

③ 贝尔纳·波特拉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0月16日。

④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0月29日。

⑤ 波特拉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0月16日。

⑥ 关于这些悲喜剧般的曲折情节，见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384-441.

吸引：“我想他会在出版之前先让我看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知道，我希望理解你写的东西，而不仅满足于一些零星的片段。”也许这篇访谈将成为他进入自己从前学生思想的大门。“令人吃惊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受你干扰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出配得上你的写作的评论。”<sup>①</sup>

286 刊登了德里达长篇访谈的那期《诺言》发表于11月20日，在新的一期《原样》发行后不久，“为的是利用时间差实现独家销售”<sup>②</sup>。正如乌德比纳想象的，这期杂志并非悄无声息，其销量比平时要高。但另一件事让德里达深感受伤：乌德比纳没有通知德里达就将杂志直接寄给了拉康，并对他解释说，有关他的长篇注释是后来加上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已发表的访谈中我们对德里达的批评意见没有做出反应，而我们远非总是同意这些意见。但我们并没有向德里达隐瞒与他的分歧……尽管并未因此而考虑对其进行删减。”在信中，乌德比纳也向拉康保证说，他最终的答复也将在杂志上发表。<sup>③</sup>

德里达12月7日从美国回来。接下来的两周，他陷入类似于崩塌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巴黎小圈子目前的躁动不安”<sup>④</sup>。他头脑清醒，但又不愿同一位好友以及自己仍然重视的一个圈子绝交。为迎接即将在《原样》中出版的《播散》，索莱尔斯撰写了一篇热情的介绍文章：“播散，在毫无保留的铭刻中，既是风险、分散，也是最严格的限制。最艰难，最险峻，也是最欢快的思想。”德里达则在将出版的书中下了好几处赌注以示默契：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用于论述《数目》，而且好几次以赞扬的口吻暗指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马塞兰·普利耐和让-约瑟夫·古；他还引用了马克思、列宁、阿尔都塞，甚至《毛泽东选集》。但这一切终将不够。

① 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0月29日。

② 乌德比纳致德里达的信，1971年11月2日。

③ 这一段摘自乌德比纳1972年3月12日致德里达的信，当时两人之间的辩论已激化。

④ 德里达致鲁道夫·加什的信，1971年12月21日。

# 第15章 决裂

## (1972—1973)

德里达长期以来保持着年底写贺信的习惯。他给很久没见的亨利·博肖写了一封调子忧伤的长信。 287

我过的日子，不幸也是我们很多人要过的日子，变得日益忧伤和荒谬，特别是因为我们荒芜、冷漠、抽象的悸动不安，它带走了最坏的日子，当然还有最好的日子。我越来越难以忍受无法见到朋友，无法同他们谈话，同他们共度时光。妨碍我的事不断增加，让我接近难忍的致命的窒息。……“巴黎的舞台”令人窒息——而且虚荣。<sup>①</sup>

几天之后，他寄给索莱尔斯一封热情的信，尽管在谈到后者的新小说《法则》时多少有些尴尬：“原谅我的延迟。因为我还想重读此书。当然不止一遍。……很难，几乎不可能就《法则》作出评论。这机关重重的文本，每一刻都有可能落入错误的游戏格（监狱、井、迷宫等），但这是怎样的游戏呀！”<sup>②</sup> 这远比不上他第一次读完《数目》后立即表现出的激动。

随后的日子里，事情迅速发展。1月18日，德里达告知乌德比纳他已接受了《新批评》主编安托万·卡萨诺瓦的邀请，尽管《原样》和共产党今后已完全断绝关系。但他坚持说明，这次见面绝谈不上是与之结盟：“关于这一点，我对您所作的预测已完全得到证实。我重申了我已为人所知的‘立场’，而且十分坚定明确地对禁止 288

① 德里达致亨利·博肖的信，1972年1月7日。

② 德里达致菲利普·索莱尔斯的信，1972年1月14日。

《论中国》参加《人道报》庆典表示反对。这些就是访谈的主要内容，别的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出的。”<sup>①</sup>

当晚，雅克和玛格丽特应邀在宝洛和伊夫·泰弗南家里共进晚餐，受邀的还有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普利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三位《原样》成员并未出现。德里达和泰弗南很快发现这是“一次警告”，是对他与安托万·卡萨诺瓦见面的报复。<sup>②</sup> 这态度激怒了泰弗南和德里达，他们立即采取了措施。第二天，他们各自通知瑟里斯的负责人，由于同索莱尔斯和“原样”团体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他们将不参加已宣布的关于阿尔托和巴塔耶的研讨会。“我很遗憾，但我做出了最后决定，我想我应该立即通知您，以便您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公之于众。”<sup>③</sup>

索莱尔斯知情后试图有所挽回，他装作将德里达的态度同宝洛·泰弗南区分开来。

雅克：

在我看来，一切都可以没有太多波折，难道不是吗？

您知道，我考虑过，而且我想应该深入到马西奥奇事件的根本。

能否请您说明以下两点？

(1) 对宝洛：我看没必要暗示我们将攻击她（她的研究等），而且，当然，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

(2) 对伊夫：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朱丽娅和我——都对他保留着我们诚挚的友情。

谢谢帮助。

请向玛格丽特致意。

289

给您，加之所有您所知的（已写下）。

索莱尔斯在附言中说：“宝洛到处说她和德里达已同《原样》决裂，这是否有绝对的必要性呢？”<sup>④</sup> 而事实上，一切已无法挽回，尽管《播散》将于几周后在“原样”丛书中出版。德里达希望同几个圈外人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雅克琳娜·里塞——她在意大利，远离这些纷扰，但不再想听到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普利耐的名字，

① 德里达致让-路易·乌德比纳的信，1972年1月18日。

②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op. cit., p. 402.

③ 德里达致艾迪特·埃尔贡的信，1972年1月19日。

④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72年1月23日。



他们则不会错过攻击他的机会。

粗暴的言行将很快肆虐开来，这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1972年2月25日，这些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毛主义积极分子皮埃尔·奥维内（Pierre Overney）在比朗库尔的雷诺工厂门前被保安杀死，当时他正在散发传单，呼吁纪念十年前的沙罗纳地铁屠杀事件。3月4日星期六，他出葬的那一天，大约20万人参加了穿越巴黎的大游行，从克里希广场一直到拉雪兹神父公墓。让-保罗·萨特一直走在棺材旁边。米歇尔·福柯和其他许多人物也在人群中。人们说，那天阿尔都塞称：“左派被埋葬了。”<sup>①</sup> 回头看，皮埃尔·奥维内之死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法国极左派避免了陷入一场将不仅仅是言语上的暴力的混乱。

※ ※ ※

德里达同菲利普·索莱尔斯从1964年起就结下了深厚友情，这次决裂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直拒绝谈论此事，只是请大家“一方面去‘阅读文本’，包括他自己的，特别是1965—1972年间的杂志和丛书。……另一方面不去相信任何‘原样’成员就这最后的场景所作出的公开解释—重构（‘荒诞的造谣’）”<sup>②</sup>。德里达漫长的沉默使得他同埃里克·克莱芒（Éric Clémens）的通信更值得关注，后者是位年轻哲学家，是古和波特拉的朋友，TXT杂志编委会成员。

流言说，德里达可能“实际上已登记加入法共”，克莱芒在1972年3月4日给他的信中写道。为了驳斥这恶毒的谣言，他希望德里达在TXT上发表一篇类似《对〈立场〉的补充说明》的文章，“不是针对《原样》，而是对有关他同中国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关系及/或对其的兴趣问题”做出回应，以便最终结束这“暧昧状态”。同当时许多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克莱芒那时正变得日益激进。但他试着不放弃哲学，至少不放弃德里达的哲学，他几年来在鲁汶大学一直以之为题开设一门研讨课。今天，埃里克·克莱芒回忆道：“我们那时幻想形而上学的解构向‘文化大革命’开放。我们希望德里达像我们一样迈出这一步。”<sup>③</sup>

290

这个举动让德里达十分恼火，但他还是做出了回应，并对这几个月来的形势进行了解释，此后他再未这样做过。他说读克莱芒的信毫无愉快之感，只觉得是“压力”，或者至少是“急切地要求清算和做出保证”，对此他毫无退让之意。

① 转引自 Morgan Sportes, *Ils ont tué Pierre Overney*, Grasset, 2008。

② “Curriculum Vitae”,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305.

③ 同埃里克·克莱芒的访谈。

在理论或政治争论中，我尽量不为了让步于可能的或实际的催促或恐吓而做出决定。做到这一点很难，从来不是简单可能的，但要努力去做，这是我到目前为止一直恪守的准则——理论和政治准则。我同《原样》的分手也有此意义，尽管不全为此。<sup>①</sup>

因此，仅仅“以友谊的名义”，而且绝不可能在 *TXT* 上发表，德里达才接受对克莱芒做出答复。他详尽地逐条进行了辩解。首先是关于法共的问题：“今天有人想把我看成共产党的同盟甚至成员——我不知道和谁，也不知道以怎样的可信度  
291 结盟，反感中国（!!!）。这，简单说来，只能让我发笑。”对于中国，他说他在原则上并无任何反对。他在这封信里甚至比在其他所有公开的文章中都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层面上，在我们共同的领域里，我想我不是最后一个（曲笔）参照中国的。……在最现实的政治层面，我对之也毫不反对。然而，在这清楚的事实（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肯定性参照的必要性）和从中能够产生的所有后果之间……存在着进行严密而艰难的分析的空间：我还没有从事此种分析，但我也并未看到别处有人在做这件事，大概是为了一些已可供分析的原因吧。无论如何，对于人们就此可能对我们提出的所有意见，我坚持要保持最冷静的批判的警惕。

对于克莱芒在信末提到的“其根源未必关乎理论的分手风波”，德里达担心他可能过于简单化了。不错，最后的事件无足挂齿，但它本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沉重、古老、复杂的底子”的话，而这一切不可能在简单的一封信里进行分析。“有人指出我会见（后来又补充说……我没有询问‘原样’组织就会见了）《新批评》的卡萨诺瓦是不可容忍的。”而这短暂的见面并没有让他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如果说我的举动——未征得‘原样’组织的‘许可’就接受见面——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话，那就在于此，对此我负全责：在今天，会见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并不遭到禁止，更不用说与之交谈了。”<sup>②</sup>

① 德里达致埃里克·克莱芒的信，1972年3月18日。

② 同上。



德里达与共产党的关系值得关注。关于这点，迈克尔·斯普林科就阿尔都塞的谈话再次带来了一些珍贵的内容。德里达从不曾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同路人，因为自从1950年代初在高师见识过斯大林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起，他就一直无法忍受它，哪怕是其较为温和的形式。他作为指导教师回到高师后，每日仍需忍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自然不会让他改变态度。

292

我头脑中已经有了法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的形象，在我看来它同我始终想要保持忠诚的民主左派并不相容。……从个人角度，我看到这时的法国共产党已封闭在一种自取灭亡的政策当中，它是输家。二取其一，或者它强化其斯大林主义，那么它是输家，因为它将失去选民，孤立于欧洲；或者它将自己改造成改革主义、社会民主式的温和社会主义，那么它还是输家，因为社会党占领着这块地盘。这就是难题，致命的绝境。……在某种方式上，（阿尔都塞主义）代表着共产党强硬的一派。从这一点看，它比法国共产党还要自取灭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比法共好些，因为它寻求真正理论思维的复兴，对此我非常真诚地相信应当致以敬意。<sup>①</sup>

所有这一切并没妨碍德里达同《原样》分手之后立即与好几名党员接近，第一位是他认识多年并十分欣赏的让·里斯塔：里斯塔曾是他在索邦大学的学生，后来出版了第一部书《尼古拉·布瓦洛和儒勒·凡尔纳的床》，德里达认为“令人钦佩”。随后的一部作品，即长诗《失去的线（儿子）》，仿佛是将《柏拉图的药》谱成了诗篇。但此时里斯塔主要被认为是阿拉贡的密友。他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法兰西文学》上撰稿，成为先锋派，特别是《原样》的辩护人，直到索莱尔斯及其群体突然同法国共产党决裂。<sup>②</sup>

就是让·里斯塔筹划并组织了1972年3月29日《法兰西文学》有关德里达的专刊。这期大开本12页杂志的撰稿者都赫赫有名。封面是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

<sup>①</sup> “Politics and Friendship”, entretien entre Michael Sprinker et Derrida, paru dans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op. cit., 引自保存在IMEC的法文手稿。

<sup>②</sup> 同里斯塔的访谈。阿拉贡在《法兰西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德里达的一组文章后的第二天，德里达向他表示了感谢。1972年3月30日，他给阿拉贡写信说“幸福地”读了他的书《亨利·马蒂斯，小说》（*Henri Matisse, roman*）。

son) 的原创, 后面的名字有罗兰·巴尔特, 卡特琳娜·巴克-克莱芒、于贝尔·达米什 (Hubert Damisch)、让-约瑟夫·古、罗日·拉波尔特、克洛德·奥利耶、宝洛·泰弗南和让·热内。热内已搁笔多年, 这次在短暂路过巴黎时专门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热内将德里达视为纯粹的作家, 他引用了《柏拉图的药》的头几行之后确定地说:

对我们而言, 这个开篇同《如花少女》的第一页一样著名, 一样崭新, 却被雅克·德里达从我们那里夺去, 让它成为他自己的话, 又在此刻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句子是孤独的。它完全是孤独的。但如果我们轻松地读, 带着德里达那样细腻的欢乐, 单纯地去读, 跟随其文字游戏, 那么句子全部的意义便会温柔地颤抖, 将之引向下一句。在德里达那里, 衔接两个句子的常见的粗糙的动感被一种十分微妙的磁力取代, 这磁力不在词语之中, 而在词语之下, 几乎在书页之下。<sup>①</sup>

热内认为必须“轻柔地阅读。对词语意料之外的进入轻柔地微笑。首先接受优雅地赐予我们的东西——诗歌。然后意义便会作为补偿十分简单地伸向我们, 就像在一所花园”。这美好的礼赞来自一位德里达最钦佩的作家, 只能让他感动。

罗兰·巴尔特也以写给让·里斯塔的一封信的形式参与, 同时表示很遗憾, 不能与专刊“完全合作”。缺少时间可能并非唯一的原因。巴尔特同索莱尔斯关系密切, 他在这个人人需选择阵营的时期处在极为微妙的境地。虽然如此, 在短短几行中, 钦佩和感谢之情仍然清楚有力地表达了出来。

我与德里达, 很可能还有其读者, 不是同一代人。德里达的作品出现在我生命和研究的中途, 那时我的符号学规划已形成并部分地完成了, 但它有自我愉悦地封闭在科学妄想中的危险。德里达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们帮助我理解了我自己在研究上(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的问题。他破坏了结构的平衡, 打开了符号: 对我们来说, 他是摘下链条顶端的人。他的文学评论(关于阿尔托、马拉美、巴塔耶)是决定性的, 我的意思是, 不可逆转的。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有一些新词, 一些跃动的词(他的文字因此暴烈而富于诗意), 还有对我们的精神舒适感(即我们用自己的思考自我安慰的状态)不间断的破坏。最后, 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些缄默的东西, 令人着迷: 他的孤独来自他将

<sup>①</sup>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n°1429, le 29 mars 1972.

要说的话。<sup>①</sup>

德里达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几天后，他感谢巴尔特这位“亲爱的朋友”“庄重而慷慨的开放性”，并借机表示他的作品对他有多么重要，这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您的作品已始终在那里，帮助我，如同不可取代的批评的源泉，也如同默契的无限严谨的目光，让我写作，使我写作。这联结，也来自这孤独，是的，就是您说到的孤独，这联结对于我，在工作中，是如此亲切、秘密、隐晦，它绝不会成为话语的对象。<sup>②</sup>

他又说，莫里斯·布朗肖是唯一能够同他有类似关系的人，即“密切、感恩、默契”的关系，他能够“用赤裸信任的方式”与之对话。这样的赞美来自德里达并非微不足道。虽然同《原样》的分手带来一些困难，但双方对彼此的敬意和友情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尽管两人很少见面。这位《明室》的作者悲剧性地离世不久，德里达将写下一篇极为优美的文字——《罗兰·巴尔特之死》。<sup>③</sup>

※ ※ ※

在索莱尔斯和《原样》团体眼里，与让·里斯塔靠拢亦即与阿拉贡靠拢，这就像是对他们宣战。4月30日，《1971年6月运动简报》第二期问世，这是马塞兰·普利耐主持的手工作坊似的小型刊物。这小册子用毛泽东的一首诗开始并结束，德里达则两次受到攻击。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将很有名：《噢，致术士德里达》（“Ô mage à Derrida”）<sup>④</sup>。此文本身就囊括万千，包括其拙劣之处在内。

《法兰西文学》用专门一期来反对左派和“无赖”奥维内？非也，这期专刊是关于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阿拉贡的火炬难道不是一块政治海绵吗？众所

①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n°1429, le 29 mars 1972.

② 德里达致罗兰·巴尔特的信，1972年3月30日。

③ “Les morts de Roland Barthes”, in *Poétique* n°47, Seuil, septembre 1981, repris dans *Psyché* (Galilée, 1987), puis dans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④ 标题中的“Ô mage”与“hommage”谐音，但后者意为“致敬”，前者则带有讽刺意味，指“术士”。——译注

周知，哲学同政治毫无关联，但自然——除非故弄玄虚——也是法共<sup>①</sup>意识形态武器库里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让·里斯塔这位阿拉贡-卡尔丹（Cardin）之精神线索（之子）<sup>②</sup> 服务于改变的时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这期杂志多有矛盾之处，我们看到：德里达的书《播散》是个借口，汇聚了支持法共的知识分子，书的题目来自一篇100页的评论（占全书三分之一），关于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数目》。还用说吗？在这期《法兰西文学》里面，实际上找不到索莱尔斯作品的痕迹，甚至没有德里达评论索莱尔斯的痕迹。<sup>③</sup>

第二篇署名“思想斗争前线”的文章标题为《德里达或反黄祸》。攻击来得既突兀又别扭。无论如何，《书写与差异》的作者曾长期是《原样》的支柱之一：

3月29日——《法兰西文学》——向德里达致敬。

296 唯心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两年前发表的文章让修正主义者激动万分。折中主义的谰妄，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杂货箱（上流社会的巴克-克莱芒和马克思主义者让·热内）。的确，一旦参照革命的中国，一切就变得清晰许多。德里达，先锋派历史上准确的时刻，通过修正主义可耻地放弃了一切哲学斗争的哲学家。但理智的唯心主义要一千倍地优于愚蠢的唯物主义。今天的德里达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理论中被先锋派收买并超越。退却的修正主义把残渣洒向云端。钩心斗角：修正主义只靠盘剥先锋派过时的成果为生，而先锋派则在谴责修正主义。<sup>④</sup>

巴尔特在这期《法兰西文学》上的文章自然无人提及。

在皮埃尔·奥维内的葬礼上，贝尔纳·波特拉遇到了米歇尔·福柯，后者问道：“您在做什么？还是营营于蝇头小字的哲学吗？”<sup>⑤</sup> 这攻击越过波特拉，明显指向他刚刚批评过两次的德里达。这次论战与德里达同《原样》的分手完全同时，但处于截然不同的层面，它将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论战之一。

① 原文为 pcf，而不是通常的 PCF。小写表明文章作者对法国共产党的高度敬意。多加的字母“r”则是“révisionniste”（修正主义者）的起首字母，这是当时最大的侮辱。下面一句里，“服务于改变”当然影射被《原样》团体驱逐的费伊的杂志《改变》。用来命名运动的1971年6月则是马西奥奇出版《论中国》的日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影射有待破解。

② 原文为 fil (s)：没有“s”是“线”的意思，加“s”是“儿子”的意思。——译注

③ *Tel Quel*——*mouvement de juin* 71——*informations* n°2-3. IMEC 档案。

④ *Ibid.*

⑤ 同波特拉的访谈。

一切开始于几个月前的日本，当时《教育》(Paideia)杂志的负责人干高中野(Mikitaka Nakano)打算用一期专刊研究福柯，并向他递交了一份计划。其中一位撰稿人正在翻译《我思及疯癫史》，因而打算写一篇题为《福柯的话语和德里达的文字》的文章。但福柯对德里达文章的恼怒随着后者声誉日隆而更盛：他向日本方面提出增加一篇未出版过的文章，即他已酝酿了一段时间的《对德里达的回应》。

在这篇激烈的文章里，福柯承认德里达的分析“的确令人瞩目，无论是其哲学深度还是其阅读的细度”。他肯定地说，无意逐条加以回复，而只是作“几点补充”。他首先把问题转移到原则上来。这是个聪明的举动，这等于将解构带回到最为传统，甚至最为规范的法国哲学一边。福柯认定，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哲学自设的地位就如同一切话语系统的“法则”。人们对此可能犯下性质特殊的“错误”，这些错误“就像基督教原罪和弗洛伊德口误的混合”，“一丝裂痕即可使整体暴露”。福柯认为，这种哲学观把哲学置于“一切事件之外及之内”的位置：“对之不仅什么都不会发生，而且能够发生的也早已在其意料之中或被其覆盖。”<sup>①</sup>

297

在写作《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的时代，福柯认为他本人尚未完全超越此种哲学的教导，因为他“软弱地把对笛卡尔文本的分析置于一章之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显得对其很重视”。“这可能是我书中最不重要的部分，我乐于承认，如果我想要连贯地保持对哲学的潇洒态度的话，我本该放弃这一部分。”但福柯并不拒绝直接的冲突：起首之后，他转向笛卡尔这几段著名的文字，意在推翻德里达的分析。

事情本可以到此为止，停留在遥远的异乡，在一部非公开的出版物里。不妨想象日本读者的茫然，当他们面对笛卡尔《形而上学沉思录》里一小段文字的拉丁文和法文版的详细比较时。但福柯想进行更猛烈的攻击：他利用迦里玛再版《疯癫史》之机增加了两篇附录。在第二篇，在动人的标题《我的身体，这纸，这火》之下，他再次对德里达发起了论战。同《教育》里的文章相比，语气明显强硬。福柯的论辩是双重的：既推翻德里达的立场，又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给他一个教训。福柯将笛卡尔的文本同德里达的评论进行了详细对照。语调始终是讽刺的，伤人的意图显而易见。福柯扮演着语文学家和拉丁学家的角色，也不放过对波特拉提到的“蝇头小字”的话。他想同时在所有的领地占尽优势，表现出比德里达更加理解笛卡尔文本的字面意义，尽管这并非他的主要目标。总之，他与最初的热情相去甚远，而却像1950年代初在高师可能有的举动，重拾一篇他判定是失败的论文。

298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Réponse à Derrida", in *Paideia* n°11, février 1972. L' article a été repris in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 1150—1151.

最后两页毫不留情，越过《我思及疯癫史》，直指德里达的全部研究路径。

也许应该质疑的是，德里达是这般细心而关注文本的作者，却怎会不仅有如此多的遗漏，而且制造出如此多的移位、颠倒、置换？但也许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德里达所做的只不过是他的解读复活了一个古老的传统。而且他很清楚这一点，这忠诚似乎很有理由让他满意。不管怎样，他不愿认为古典的诠释者出于疏忽而没能辨别出这段有关疯癫与幻想的文字的重要性与独特性。<sup>①</sup>

至少在一件事上，福柯说同他试图击败的对手持同样的意见。传统论者抹平了《形而上学沉思录》这一段落的粗粝之处，这绝不是出于疏忽或不屑，而是“系统性的”做法。

德里达是这一系统最终状态的最具决定性的代表：将推理实践简化为文本踪迹；忽略其产生的事件，只抓住解读中的一些印记。……

我不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是隐身于将推理实践“文本化”之中的这种形而上学及其终结。我想要说的更远：我要说这里明显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小教学法（une petite pédagogie）。它教给学生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一切只存在于文本中，存在于其字里行间，其空白及其未名之处，那里才是原初保护区的乐土。因此根本不必向别处寻找，就在作为修改踪迹的文字中，就在其格子间才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教学法反过来赋予大师的声音以无限的权威，使他可以以不确定的方式重新讨论文本。<sup>②</sup>

299 “小教学法”：这一说法将载入史册。对于德里达的诋毁者，无论他们来自何方，福柯的攻击都成为意外的收获（约翰·R·塞尔本人也在后来的一次论战中对此加以引用，而这次关于笛卡尔的十分技术性的争论同他关注的问题天差地远）。解构让人害怕，它看起来动摇了西方形而上学和思想基础，此刻却被拉回到最学究、最隐蔽的传统，仿佛写作《播散》的哲学家只关心细枝末节。

福柯将《疯癫史》第二版寄给了德里达这位他从前的学生和朋友。在题词中，

①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op. cit.*, p. 1135.

② *Ibid.*



他请他“原谅这过于迟来的太不全面的答复”<sup>①</sup>。两年之后，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再次刺激德里达，说他同哲学史的关系“令人痛心”<sup>②</sup>。这不再是讨论问题，而是毁灭对手，尽管福柯在他最后的采访中说厌恶这样的举动。<sup>③</sup>两人很久不再说话，甚至避免碰面。这次争执成为德里达很快同《批评》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

在这两次戏剧性的分手之后，德里达同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早年一次一起在里斯-奥朗吉斯度过的晚上，他们谈了许多。德里达想尽可能地帮助这两名他越来越欣赏的年轻哲学家。虽然在大学界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向他们保证提供出版上的支持，特别是在《批评》杂志和子夜出版社。

他也数次单独或一起邀请他们在高师就他们自己选择的主题进行演讲。南希和拉库-拉巴特提议开关于拉康的研讨课，这让德里达很高兴。让-吕克·南希承认：“在《诺言》的访谈之后，这看起来像是共同协商的策略。但事实上，我们希望真正阅读拉康，首先为我们自己，其次为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学生。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逐行细读《文字的行为》，这是《作品》里的一篇重要文章。一开始我们并不理解什么。渐渐地，我们发现了来自黑格尔、巴塔耶和海德格尔的东西。”<sup>④</sup>

这时，德里达幻想着推进高师，例如在考试之外，凭真才实学招收一些学生。他希望增加学科间的经验，打开真正的学术空间，但他在各个方面都遇到了学校保守派的阻力。新校长让·布斯凯相当恶意地鼓励他回到教授笛卡尔拉丁文作品的老路上去。愤慨的德里达请让·博拉克和海因兹·维斯曼开一门研讨课，用全新的视角阅读希腊哲学作品。德里达很晚才开始学习古希腊文，他一直想深入对希腊语和希腊思想的研究，并极为详细地引用原文。

※ ※ ※

1972年3月，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子夜出版社《批评》中出版了《反俄狄浦斯》，

① 雅克·德里达的个人藏书。

② Michel Foucault, “Prisons et asiles dans le mécanisme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op. cit.*, p. 1389.

③ “我喜欢辩论，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尽力回复。我确实不喜欢加入论战。如果我打开一本书，看到作者指责对手是‘幼稚的左派分子’，我就会立刻合上它。这种做法不是我的；我不属于使用这种方式的人。我坚持这一差别，这很关键：这关乎道德，关乎对真理的寻求和与他人的关系。……而论战者则带着他们事先取得的优势前行，从不对之加以质疑。他原则上拥有允许他战斗的权利，使得这场斗争成为正义行为；在他面前并非寻求真理的伙伴，而是犯了错的有害的对手和敌人，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Michel Foucault, “Polémique, politique et problématisation”, *Dits et écrits, II*, Gallimard, coll. “Quarto”, p. 1410）。

④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301 取得很大成功。在文体方面，德勒兹从著名的开篇起就明显表现出与自己从前作品的决裂：“它运转顺畅，时而持续，时而断裂。它呼吸，它发热，它吃东西。它排便，它做爱。”从理论的角度看，正如樊尚·德孔布后来指出的，德勒兹和加塔里似乎成功地做到了“所有人徒劳地想要完成的事——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合成，但他们采取了一种不敬的文体”，作品因而最终既非弗洛伊德式的又非马克思主义的。<sup>①</sup>

德里达的反应是大为光火。在同热拉尔·格拉奈尔的一次晚餐中，他如此激烈地抨击德勒兹和加塔里这本出人意料的畅销书，以至他的对话者放弃了讨论。<sup>②</sup> 德里达认为《反俄狄浦斯》是一本“糟糕的书（含混，充满痉挛的否定，等等），但却代表了十分重要的症状，因为它显然回应了一种需求，而且在十分广泛和十分可疑的舆论范围内受到了欢迎”<sup>③</sup>。显然，这恼恨不仅出于理论原因，它也是针对德勒兹长期的盟友福柯。德里达坚信“一个连续一贯的‘《改变》—《原样》—德勒兹—福柯’阵线”正在形成，在许多方面令人不安。“似乎他们想传播这一思想，即他们所面对的一切就是法国共产党（您知道我与之并无契合之处，而且从根本上，它并不信任‘我们’，这大概是对的），您可以想象孤立与‘围攻’的效果。”<sup>④</sup>

302 在日期上一个讽刺的巧合是，1972年7月10日至20日在瑟里斯举行的尼采研讨会紧跟在另一个著名的十天研讨会之后：这就是《原样》杂志社组织的德里达本要参加的“阿尔托/巴塔耶”研讨会，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举行。两场会议的与会者们差点碰面。“今天的尼采？”由冈迪拉克和波特拉这奇怪的二人组合主持，会议将遭遇一些骚乱的时刻。在场的有好几拨人：古典派与现代派，还有德勒兹派和德里达派。在开幕讲话中，波特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会议面临的挑战：“我们都多少明白在‘今天的尼采？’这样的会议上会出现什么情况。……每个人关于尼采都有想说的话，而所有这些想法绝无妥协的可能。”

如果说与会者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时间还算平静的话，理论上的冲突却不少。一位与会者询问德勒兹“打算怎样略过解构”，后者礼貌而清楚地回答说，尽管他很“赞赏”这一“方法”，它却与自己无关。

我在任何方面都不将自己看成文本评论者。对我而言，文本不过是文本外

① Vincent Descombes, *Le même et l'autre*, op. cit., p. 202.

② 在1975年4月8日格拉奈尔致德里达的信中，在另一场争执的第二天，他提到了这次不平静的晚餐。

③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2年6月24日。

④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2年6月4日。

实践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问题不在于用解构方法或文本实践方法，抑或其他方法去评论文本，而在于考察将文本延伸的文本外实践能起到什么作用。<sup>①</sup>

这同几个月前福柯用显然更加激烈的词语进行的抨击相差不远。德里达记得看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大堂工作。“‘您工作到最后吗?’我问他。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在打磨我的武器’，友人一敌人清晰可辨。”<sup>②</sup>值此“六八”后年代，没有必要再对传统文本加以评论，哪怕是以全新的方法，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德里达是最早发表长篇演讲的发言者之一，这将很快成为瑟里斯传奇的一部分。他的文章在次年“10/18”丛书出版的论文集中占据了50多页的篇幅；后来独立成书，即《马刺》(Éperons)。发言题目是“风格问题”，但德里达随即证实“主题将是女人”：

不存在一个女人，一种关于固有女人的固有真理，他至少是这么说过，女人的类型如此广泛，成群的母亲、女儿、姊妹、老姑娘、妻子、管家、妓女、处女、祖母及其作品中大大小小的女子。

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存在一种关于尼采或尼采文本的真理。<sup>③</sup>

他沿着文字的踪迹跟随着这些女性形象，确定“女性问题搁置了真实与非真实之间决定性的对立”，驳斥“寻求文本真实意义的诠释方法”，并将阅读从“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这样的前景中”<sup>④</sup>解放出来。 303

本身也是尼采专家的萨拉·考夫曼铿锵有力地开启了讨论：“首先我向德里达精彩的演说表示感谢。他的话的确充满威仪，此后没有什么可说了……”但海因兹·维斯曼一边承认这场讲演的风格可能会改变接下来的会议，一边严厉地向德里达提出一个语文学问题：尼采心目中的真理是“Frau”还是“Weib”？“是Weib”，德里达立刻回答。但维斯曼感到德里达在演讲中始终混淆了这两个德文词，它们均指女性，但却有着几乎相反的含义：“Frau”是个高贵可敬的词，而“Weib”则多少带些贬义，指令人产生欲望的女人、母兽，甚至妓女。……所以应该尽量跟踪尼采文本中

① Nietzsche aujourd'hui? 1 -Intensités, 10/18, 1973, p. 186.

② Jacques Derrida, “Le modèle philosophique d’une ‘contre-institution’”, in *Un siècle de rencontres intellectuelles : Pontigny, Cerisy*, IMEC, 2005, p. 258 - 259.

③ Jacques Derrida,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Champs-Flammarion, 1978, p. 82.

④ *Ibid.*, p. 86.

“Frau”和“Weib”的游戏，以充分理解其关于真理的隐喻。<sup>①</sup>

最有意义的是弗茨亚·阿萨德（Fauzia Assaad）的发言：“通过您的文章，难道不是能找到一种以女性方式研究哲学的可能吗？”狂喜的德里达接住了从空中抛来的球：“您是在向我提出一个个人问题吗？我也希望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我在尝试……”这话并未被忽略。这次的瑟里斯会议以及后续出版的书将在女权主义者对德里达的接受上产生重要作用，尤其在美国。德里达和常常被西方哲学传统忽视的女性很快结成了一种同盟。一个私人因素很可能与之有关。



304 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是传记家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从1972年起产生于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和德里达之间的漫长恋情是本书作者面对的最为特殊的困难之一。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不愿对此置评，她同德里达的大量通信似乎也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接触到。<sup>②</sup>因此我只能根据其留下的痕迹从外部接近这个故事。但很难想象不去提及这段恋情，特别是它已为大众所知——尤其是从2002年总统竞选开始，一直到出现在维基百科上，而且它常常与德里达的作品及斗争密不可分，从Grephe——哲学教育研究小组——一直到《明信片》及更远。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以及德里达多次确认的保守秘密的态度，但我们也该记得他关于一场更著名的恋情所说过话，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恋情。雅克·德里达在1995年1月11日的一次研讨课上谈到此事，可以想象他曾仔细掂量自己的用词。

305 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我想我们有一天很应该公开地、尊严地、哲学

<sup>①</sup> *Nietzsche aujourd'hui ? 1-Intensités, op. cit., p. 117.*

<sup>②</sup> 人们也许还记得，连最小的纸片都会保存下来的德里达在他最后一次同让-吕克·南希与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公开谈话中说，他有一天“带着可怕的狂野”毁掉了一些信件：“我毁了一通我本不该毁掉的信件，为此我将后悔终生。”（*Rue Descartes n°52, PUF, 2006, p. 96.*）大概和其他人一样，我首先想到这些毁掉的信件是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写的。但这件事也在《明信片》中提到，被写成发生在雅克和希尔维亚认识好几年前发生的：“世界上最美的信件，比所有文学都美，我在塞纳河边开始撕毁它们，但这么做需要24小时。我把它们全部塞进车里，开到我不认识的郊外停下来，在路边，我慢慢地把它们全部烧掉。我对自己说以后我绝不会再这么做。”（*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38.*）我不知道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寄给德里达的信在哪里，但人们知道他并没销毁它们。根据一些亲友的说法，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可能保存着上千封德里达的信。随着本书的展开，读者可以看到德里达撰写书信的才华。我们不妨幻想这些信有一天能出版，哪怕这一天还很遥远。

地、适当地，并根据恰当的尺度，谈论这场将他们两人在人称“整整一生”的时间里联结起来的相互的伟大情感，穿过或超越那些大陆、战争、屠杀。这场奇特的情感，其档案，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随着它无数不可分割的政治的、哲学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昭显的或隐秘的、学术的和家庭的历史线索，正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这场一生的激情值得更好地去对待，而不是泛泛而谈，一边是窘迫或羞怯的沉默，另一边是庸俗的流言或学术走廊里的窃窃低语。<sup>①</sup>

同样，德里达称2001年保罗·策兰与妻子吉赛勒·策兰-莱斯特朗日(Gisèle Celan-Lestrange)通信的出版使他震惊，这并不是出于原则上的反对，而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其他的爱情信件，特别是策兰与瑛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和伊拉娜·施姆利(Ilana Shmueli)的通信，这样的版本会令人产生误解。<sup>②</sup>

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是一名1922年到达法国的波兰矿工的孙女，她于1945年5月4日出生于阿利耶的纳德，在里昂长大。在朱丽耶特-雷卡米埃高中上学时，她演过戏剧，同姐姐索菲一样，后者以此为业并嫁给了演员和幽默家让-马克·蒂博(Jean-Marc Thibault)。希尔维亚在里昂文学院上大学，在那里听过德勒兹的课。她1967年移居巴黎，在《巴黎竞赛画报》做过一年按行数取酬的工作，亲身经历了1968年5月事件。据许多当时同她交往的人说，她“美得令人窒息”。她希望成为演员，但最终重拾学业，老师中有海因兹·维斯曼。她在中学教师资格证书的哲学笔试中名列第一，随后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成为苏瓦松圣奥迈尔中学的教师，接着在巴黎卡尔诺高中的高等商业学校预备班当老师。

从1970年开始，希尔维亚同当时的男友、作家让-诺埃尔·维阿尔奈(Jean-Noël Vuarnet) 306 一起在高师听德里达的研讨课，并从1972年3月起，在维斯曼在里尔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同雅克结下了亲密关系。她在瑟里斯的十天研讨会之前刚同让-诺埃尔·维阿尔奈分手，气氛十分紧张。德里达用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开始了他的演讲。

1972年(悲剧的诞生)，尼采从巴塞尔给玛尔维达·冯·梅森葆(Malvida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未发表的研讨课，IMEC档案。

<sup>②</sup> 同莫里斯·奥兰德尔(Maurice Olender)的访谈。德里达并未取消奥兰德尔组织的一天的讨论会——他是出版此书的“21世纪书库”的负责人，但他最终没有与会。但奥兰德尔向他宣布过策兰其他的通信将在以后出版。

von Meysenbug) 写信。我从他的信中截下一段题铭的形式——游荡的题铭。  
“终于，致您的小包裹（或小褶子：*mein Bündelchen für sie*。人们终能知道他们之间是怎样称呼的吗？）准备好了，终于您再次听懂了我的话，在我不得不似乎沉沦于真正坟墓的死寂之后（Grabesschweigen）……我们本可以庆祝我们在巴塞尔的相遇，我心中对它保留着回忆。”<sup>①</sup>

这是第一条这样经过加密的信息，雅克和希尔维亚将在一本接一本书里——至少直到《明信片》——如此经常地交换这样的信息。

就像在瑟里斯的许多研讨会一样，至少在那个时代，气氛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让-吕克·南希兴奋地发现了这个地方，他还记得这次的十天会议带着“一种酒神的气质”，正是“六八”后的特征：“在每个角落、每个方向都有讨论，这是一场小小的精神的狂欢，同时也是感官的狂欢。”<sup>②</sup> 其中或隐或显地结下了许多关系。雅克·德里达早有引诱者的名声，这也不是他的第一次艳遇。但这大概是第一次转化为激情的相遇。为了逃离城堡多少有些压抑的气氛，雅克和希尔维亚好几个晚上避开众人去杜维尔或卡堡。而且他在瑟里斯逗留时间很短，他像自己宣布的那样在会议结束之前就离开了。

307 随后的几周里，深受打击的让-诺埃尔·维阿尔奈半遮半掩地提到了围绕着瑟里斯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紧张空气。从这时起，希尔维亚和他“无可挽回地闹翻了”<sup>③</sup>。在自己的信中，德里达同最亲密的友人都不曾透露与这位年轻女子的关系，但他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安。拉库-拉巴特对他讲述了会议最后几天的情形，尤其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反对德里达的爆发，德里达在回信中写道：

对我一样，这次研讨会给我留下了一些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回忆，幸运的是，我还同几位朋友见了面，首先是您，伴随着对我来说很罕见——越来越罕见的信任感，这支撑着我。正如您让我读的出色的文章支撑着我：它严密、质朴，毫无讨好之意，向今天的确需要捕捉的东西敞开，就在这里，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说就在我们只有很少几个人流连的地方。……在目前的情形下——您可以想象我常常感到十分痛苦孤独——我刚刚对您讲到的我同极少数

① Jacques Derrida,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op. cit., p. 25.

② [http://www.ccic-cerisy.asso.fr/temoignages.html#jeanLuc\\_Nancy](http://www.ccic-cerisy.asso.fr/temoignages.html#jeanLuc_Nancy).

③ Sylviane Agacinski, *Journal interrompu*, Seuil, 2002, p. 85.

人(除了您本人、南希、波特拉之外几乎没有别人)的关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sup>①</sup>

德里达与拉库-拉巴特和南希正在结成真正的同盟。会议期间,在城堡花园的一次散步中,德里达同他们谈到米歇尔·德洛姆(Michel Delorme)和正在筹办的新的合作性出版社伽利略(Galilée)。他建议他们把对拉康的研究写成一部小书,而不是一篇长文,并承诺向德洛姆推荐此计划。他本人正在完成一篇关于孔狄亚克(Condillac)的文章,作为《人类知识起源论》的序言,文章题目将是《琐屑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frivole”)。但他感到疲倦,工作起来“缓慢,没有兴味”。“关于孔狄亚克的是一篇常规文章,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sup>②</sup>,他对拉波尔特说。

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因为他还在修订两本将于秋天在子夜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在校样:《边缘——论哲学》(*Marges——de la philosophie*)和《立场》(*Positions*)。德里达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校对者,这枯燥的工作使他在尼斯的小公寓里度过的几周更加阴郁。在寄给米歇尔·德基的信中,他并不试着掩饰自己的坏情绪,但他向老朋友隐瞒了造成这坏情绪的主要原因:无法见到希尔维亚。

308

假期从未如此这般地为“家庭”所占据、磨蚀、毒化,该多好。不适、混杂、拥挤,使得写张明信片都成了冒险。你可以想象还有十几个令人恼火和疲倦的日子。可怕的一团糟。不管怎样,这是对我们而言,对所能做到的而言,因为孩子们是灿烂的。<sup>③</sup>

同1967年一样,1972年对德里达而言对应着三部新作:在《播散》之后——它春天在瑟耶出版,因为与《原样》的决裂而困难重重,《边缘》和《立场》于秋天在子夜出版社出版。在《文学半月刊》上,德里达试图向当时与他十分密切的吕塞特·菲纳阐述两部主要作品的关系,强调它们之间没有丝毫断裂。

表面看来,当然,《播散》主要通过所谓的“文学的”文本来进行阐发,但

① 德里达致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信,1972年8月4日。这封信用红墨水写成,雅克·德里达在1972年8月和下一年年底之间寄出的信大多如此。这个习惯让他的一些通信人恼火,首先就是宝洛·泰弗南,她从这时起与他的关系开始变得困难起来。

②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2年9月18日。

③ 德里达致德基的信,1972年8月20日

也是为了考问文学性是否“发生”(avoir-lieu)。表面看来,当然,《边缘》意在哲学,接近或穿越哲学。这通常是些挑衅的言论,而且被认为如此,它面对的是堂皇的大学受众,时或法国味十足(法兰西学院、法国哲学学会、法语哲学协会)。……因此,这两本书并无安详而学院气的从文学到哲学的联结,需经文学与人文科学院的审定。不如说它们考问的是在我们文化的这些区域之间形成的界限与通道以及默然的对立。<sup>①</sup>

309 一般的报刊,无论是否出于好意,都难以理解这些作品。例如盛夏的一期《世界报》仅仅满足于再简洁不过地提这么一句:《播散》被描述为一部“了解此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德里达思想之演变的困难而关键的作品”。下一个月,该报提到即将在秋天问世的出版物中有“这位著名哲学家的两部作品:《边缘——论哲学》,汇集了十篇未发表过的文章,再次证明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密而广泛的‘解构’的必要性;《立场》是关于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三篇访谈录”。这对潜在的读者几乎毫无助益。

而就连《她》(Elle)这样的杂志都会谈到德里达,尽管是以滑稽模仿的口吻。几个月前,雅克琳娜·德莫内(Jacqueline Demornez)提到“将令1972年增色的不曾写下的法则”。她肯定地说,现在《词与物》风光不再,应该使用来自德里达的口令,应该说“他的新作《播散》是有关毒品的最好作品。如果有人要求您作进一步分析,您大可引用作者的话来为自己辩护:‘一个文本始终是难以觉察的’”<sup>②</sup>。

※ ※ ※

1972年12月2日,在《日内瓦日报》上,约翰·杰克逊(John E. Jackson)将雅克·德里达描写为“一名艰险的作者,但却是海德格尔唯一钦佩的当代哲学家”,“人们说海氏把他当成唯一名副其实的当代哲学家”<sup>③</sup>这一措辞颇为大胆,但《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对《书写与差异》的作者的好奇心看来的确十分强烈。在斯特拉斯堡,与海德格尔熟识的吕西安·布劳恩数次试图安排一次见面,并坚持认为它应该是非正式的。1973年5月16日,海德格尔回复他说,很高兴“认识德里达先生,他已寄来过一些著作”,但他在接下来的几周事务缠身,希望将访问推迟到秋天。<sup>④</sup>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ntretien avec Lucette Finas”,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16 - 30 novembre 1972.

<sup>②</sup> Jacqueline Demornez, “Le nouveau savoir-vivre snob”, *Elle*, février 1972.

<sup>③</sup> 载《日内瓦日报》,1972年12月2日。

<sup>④</sup> Lucien Braun, “À mi-chemin entre Heidegger et Derrida”, *Penser à Strasbourg*, Galilée, 2004, p. 24 - 25.



不过海德格尔在继续了解德里达。1973年9月,在将成为最后一次的研讨课期间,他在家里接待了比利时现象学者雅克·塔米尼奥。经过45分钟的交谈后,他突然问:“塔米尼奥先生,人们对我说雅克·德里达的研究十分重要。您读过吗?我很感谢您为我解释一下它重要在哪里。”塔米尼奥感到很窘迫,特别是离哲学家夫人习惯性地打断会谈只有15分钟的时间,而且他得用德语作答。

我无法对他谈论“解构”而不把自己陷进去,因为他对“Destruktion”一词的使用更早而且与之不同,这对我造成了障碍。至于使用“a”的“延异”(différance)一词,算了吧,当您的思想是罗曼语的时候,怎能够把它翻译成德文而不掉书袋呢?而且,更有甚者,面前是这位有关本体论差异的思想家。由于前一天他通过《逻辑研究》讲到了他与胡塞尔的关系,我低着头竭力对《声音与现象》进行了不可能的概括。……我快速对胡塞尔有关表达(expression)和指示(indice)的区别问题进行了过于简略的概述。我很快从海德格尔的反应中知道我失败了:“Ach so! Sehr interessant!”<sup>①</sup>他对我说,并急于补充:“但在我写的东西里,我想有些同您刚才说的很接近。”海德格尔夫人进来结束谈话了,我语无伦次道:“对,对,很可能,他受您的影响很大,但这仍然是完全不同的。”<sup>②</sup>

1973年10月,拉库-拉巴特通知德里达说,海德格尔过于疲惫,要求再次推迟会面;但他仍然想要保持信心:“既然海德格尔似乎很坚持,这次见面总归会实现的。”<sup>③</sup>但情况并非如此,大师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至1976年5月26日去世。会面始终未能实现。但德里达并不一定真的感到遗憾:真正名副其实的会面早已不大可能。

※ ※ ※

在他与两名斯特拉斯堡哲学家的关系中,另一位大人物占据着中心地位:雅克·拉康。南希和拉库-拉巴特的著作《文字的标题》(*Titre de la lettre*)阐发了他们在高师的研讨课。阅读此书手稿时,德里达并不掩饰他的敬佩之情,赞赏这“非

① 德文,意为:“哦!非常有趣!”——译注

② 塔米尼奥1998年11月7日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向德里达致敬的讲演。我十分感谢塔米尼奥给了我这篇未发表过的文章。

③ 拉库-拉巴特致德里达的信,1973年10月7日。

常谨慎、巧妙而无从措手的严格性。能让你们吃惊的人是相当聪明的”<sup>①</sup>。有趣的是，“无从措手”似乎是德里达与拉康相连的词：他在1966年感谢拉康惠赠大作时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形容词从《作品》的坚固城堡转到了这部精妙严密的论著中。

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书出版于1973年年初。两名作者写下敬重的题词寄给了拉康。拉康没有给他们作出个人的答复，但在2月20号的研讨课上长时间谈到此书。

今天——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有些矛盾——我推荐你们读一本书，至少它与我有关系。这本书题为《文字的标题》，出版于伽利略出版社的“字面”丛书。我不说作者是谁，他们这次在我看来不过是扮演了从属的角色。

但他们的作品并不因此而减色，我要说，对我而言，我怀着最大的满足感读了此书。我希望你们去考验此书，它以最坏的恶意写成，你们可以在最后的30页判断这一点。我不能更多地鼓励它的传播。

这么说吧，它是优秀解读的范例，我可以说我遗憾在我身边的人那里从未有过可与之媲美的东西。<sup>②</sup>

下课后许多听众急忙去购买此书。消息迅速传开，伽利略出版社必须尽快重印。“这本书的成功对我们有十分暧昧的意义，”让-吕克·南希回忆道，“被看成是德里达的从属让我们受伤，也让德里达恼火。我们对德里达直觉到的一些东西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我们是唯一为此书负责的人。但在很长时间内，也许永远如此，这本书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同他联系在了一起。”<sup>③</sup>

※ ※ ※

自从同米歇尔·福柯发生论战以来，德里达与《批评》的关系不再那么简单。他继续就让·皮埃勒交给他的文章提出意见；有时也把自己赞赏的作者的的文章转去，如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吕塞特·菲纳或让-米歇尔·雷伊（Jean-Michel Rey）。但对于这些符合他口味的文章，皮埃勒却常常不分享他的兴奋，比如皮埃勒拒绝在子夜出版社出版萨拉·考夫曼的《艺术的童年》，后又试图在杂志上发表一篇严厉的书评。

①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72年10月2日。

② Jacques Lacan, *Encore*, Seuil, 1975, p. 62.

③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1973年8月4日,德里达给皮埃勒寄了一封打字信:“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离开《批评》编委会。他提到一些个人原因,回忆了十年来他对杂志和丛书的兴趣:“这一合作曾经颇为持久和友好,我特别希望我的离开不要留下不忠实的意味。”德里达强调精力过于分散和积累的疲劳,但很明显这顾虑还有其他原因。

为了继续或集中于自己正在尝试做的事,我尤其需要更大的距离和自由,特别是尽可能地退离这个我比任何时候都感陌生的巴黎舞台。……这大概是虚幻的,但我愿意为此(对我),至少在表面上,带来某种重生……<sup>①</sup>

应皮埃勒的要求,德里达同意成为杂志荣誉委员会一员,这是个更大的圈子,但他并无任何具体的参与:“那样就不可能把我的引退解释为一种决裂,感谢您让我如此清晰地表明这一点。”皮埃勒请他“以最友好的坦率”解释退出的具体原因,但德里达肯定地说并无此类原因。他所能够补充的也无法更具体:“也许属于小事”,但他想要日渐远离的恰恰是这鸡毛蒜皮的舞台。<sup>②</sup> 313

但在巴黎的舞台上他却远非默默无闻。1973年夏天之前,《世界报》用两个版面刊登了题为《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者》的一组文章,伴以一幅提姆(Tim)的漫画。该漫画把他表现为埃及抄写人的形象,留着惊人的长发。这组稿件的发起人吕塞特·菲纳强调说:“德里达在国外的接受远超法国。”她有些夸张地证实说,他的大部分作品已译成十几种语言,随后简洁且尽可能通俗地介绍了几个概念,如踪迹、延异、替补、药、处女膜……

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Christian Delacampagne)曾是高师学生,后来成为《世界报》定期撰稿人,他试图定义“解构”。由于“整个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的整个文化”应被视为一个文本,因此解构首先关乎阅读行为。解构“并非用拳头天真地摧毁或攻击一座堡垒。从19世纪中期起,哲学之死就被提上了日程,但这一判决难以实施:哲学的死亡应该是哲学性的”。

奇怪的是,菲利普·索莱尔斯也参加了这场礼敬,与在《1971年6月运动简报》上的攻击截然不同。德里达为文学带来的贡献在他看来“具有彻底的决定的重要性:随着‘文字学’建立起了文学实践与哲学之间的崭新关系”。德里达表述了一个哲学始终未能提出的问题,旨在改造文学的身份本身。索莱尔斯丝毫没有影射前一年的分手,但他仍然以略带家长式的作风表现出一些保留。

① 德里达致让·皮埃勒的信,1973年8月4日。

②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73年8月15日。

314 德里达制造的危机和盈溢也许是成果丰硕的，但只有当他不封闭于大学圈子的运用时才会如此，因为有必要把德里达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快速发展的“德里达主义”区别开来。……我相信他本人也需超越那种可能变得让人舒适的论述方法。<sup>①</sup>

另外，《拱》杂志想以完整的一期来讨论德里达。卡特琳娜·克莱芒交给他一份提纲，其中作家多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埃莱娜·西克苏、弗朗索瓦·拉鲁埃尔（François Laruelle）、克洛德·奥利耶、罗日·拉波尔特、埃德蒙·雅贝斯……但德里达仍然突兀地否定了他接受过的克莱芒的访谈录：他说既无时间也无勇气将这60页的稿子缩减成要求的格式，特别是他并不太满意当时即兴说的话。“我参加的几次访谈总是让我多少有些不满意（当然是对我自己）。”<sup>②</sup>

不顾这一出版计划流产的危险，德里达同样坚决地拒绝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更不必说像所有已发刊号那样登在封面上。他在广播节目《赏心乐事》中向迪埃·卡昂解释了这一毫不妥协的立场。

在十几二十年间，我试着阻止——出版人、报刊等等，这并不是一直很容易——发表照片，这绝非为了表示一种空白、缺席或影像的消失，而是因为左右这些图像生产的规则及其遵从的框架、社会影响（表现作家的头部，把他框在他的书前，总之所有这套造型语言）在我看来极其无聊……同我试图书写和研究的正相反。因此，我认为有理由不把自己毫无抵制地交出去。很可能并不是一切都仅仅出于这种警惕性。可能我同自己形象的关系相当复杂，使得欲望同时被压制、反驳、抗击。<sup>③</sup>

315 不过这期杂志终于成形，封面是埃舍（Escher）的一幅素描：一群小美洲鳄鱼逃离一张纸又回来。在介绍文章《野人》中，卡特琳娜·克莱芒分析了她认为的“德里达的歧路”。

① 载《世界报》，1973年6月14日。

② 德里达致卡特琳娜·克莱芒的信，1973年5月17日。同克莱芒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Il n’y pas le narcissisme’ (autobiographies)”, in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210.

他不他的位置，与众不同，野人。哲学家？不错，职业如此，因为他教授哲学。作家？也许。大学教师？不错，或许，既然他是高师的助教；但被放逐在他强力批判的运转空间里。……哲学素材对他而言毫无特权，其他素材亦然：“文学”，“戏剧”。身份不明的文本（叙事？传记？歌？诗？）的不确定场域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场所。然而，解构方法到处同虚构相遇。……这期《拱》怀着理想，请读者将其视为一部集体虚构作品，德里达便是标题、前文、理由。<sup>①</sup>

在这组专稿中有列维纳斯的文章，题为《以完全另外的方式》。这位《时间与他者》(*Temps et l'autre*)的作者开篇便赞扬德里达“这些异常精确而又如此奇特的文章”的重要性，并询问他的作品是否“通过一条分界线切断了西方思想的发展，仿佛康德主义将教条哲学同批判哲学相分离”。这是极致的褒扬。除了在提到解构时，列维纳斯提出了一个可怕而模糊的意象。

一开始，一切各就其位，几页或几段之后，在一种可怕的质疑效果之下，思想无处可住了。在那里，在命题的哲学意义之外，存在着纯文学的效果，新的震颤，德里达的诗。读他的书总让我重新看到1940年的大逃亡：撤退的军队来到一无所察的地方，那里的咖啡馆还开着门，女士们“赶着时髦”，美发师们在美发，面包师在烤面包，子爵们同其他子爵会面，互相讲述子爵们的故事。316  
在那里，一小时后一切被损毁，被破坏，紧关着或任由大门敞开的房间里空无一人，一列列汽车和行人穿过恢复成“深远的过去”模样的街道，庞大的迁徙人流将道路刻印在久已湮灭的过往。<sup>②</sup>

文章以更加平和的语气结束，列维纳斯承认他不能也不愿“延续一种思想的轨迹，沿着同其语言散播开来的相反的边际”前行，也更加没有“‘调整’一位真正哲学家的可笑的野心”。“在他的道路上与之相逢已经很好，这也许是在哲学上相逢的方式本身。我们指出德里达所提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因为想要表达在交叉路口的中心相遇的快乐。”<sup>③</sup>

德里达从十年前写下有关列维纳斯的第一篇长文起，对他作品的兴趣就不断增加。在这篇文章里，他只想记住让他们彼此接近的东西。他立即对列维纳斯表示

① Catherine Clément, “Le Sauvage”, *L'Arc* 54, Jacques Derrida, 1973, p. 1.

② Emmanuel Levinas, “Tout autrement”, *L'Arc* 54, *op. cit.*, p. 33-34.

③ *L'Arc* 54, *op. cit.*, p. 37.

感谢：

亲爱的朋友：

从我心深处（从交叉路口），我要对您说谢谢。请允许我简单地对您说您的慷慨让我感动——您知道……我们共同居住在一个交叉路口，我不想说是同样的，但这是一个奇异微妙的X路口，带着谜一般的亲和力。当所有的参照消失（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体制的），当一切都因战争而“被损毁、被破坏”，这坦诚的默契——对我——是生命攸关的，是生命的最后信号。<sup>①</sup>

317 《拱》这期专刊出版后几周，法亚尔（Fayard）出版了第一本专论德里达的作品。作品题为《偏差》（*Écarts*），由让·里斯塔发起汇集了四篇论文：吕塞特·菲纳的《德/骰子的一掷与/是犹太》<sup>②</sup>，萨拉·考夫曼的《一个熟悉的陌生哲学家》，罗日·拉波尔特的《双重策略》和让-米歇尔·雷伊的《行文手记》。最初还试探过让-诺埃尔·维阿尔奈，他谢绝了——我们猜得出更多是出于个人的而非理论上的原因。

这部作品常常很难读，有时带着无益的模仿，但它有助于巩固德里达的地位。不错，《边缘》的作者处于歧途，但已无法绕过。他刚刚承受的批评就是其直接后果。

---

<sup>①</sup> 德里达致列维纳斯的信，1973年10月9日。德里达在以后的通信中多次提及这篇文章。1976年3月6日，他给列维纳斯写道：“我说得不好，我说不尽您寄来的文章让我多么感动，还有它们让我阅读和思考的东西。原谅我。您如此清醒而慷慨地描述的奇异关系‘在交叉路口中心的相遇’对我始终是生动的体验。尤其是在这交叉路口——这也是交叉路口的逻辑——我常常感到不够确定，需要走到您那边去。……越过距离、沉默、分散，所有使得会面如此不易的困难，我请求您相信我十分专注，十分友爱，十分热忱地在您身边——因为我确信心灵总是更愿意处在交叉路口的中心。”

<sup>②</sup> 原文为“Le coup de D. e(s)t Judas”；其中“D”是德里达名字的首写字母，发音又与“dé”（骰子）相同；“Le coup de D.”也暗指马拉美的著名诗篇“Le coup de dé n’abolit pas le hasard”（《掷骰子并不消除偶然》）。——译注

## 第 16 章 《丧钟》

(1973—1975)

形式极为复杂的《丧钟》并非出于无端。1967 年刊登在《原样》上的让·热内 318  
撰写的关于伦勃朗的文章《撕裂成有规则方块且被掷入茅厕的伦勃朗画作残余》，排  
版时已分成了不对称的两栏，完全与《边缘》的第一篇文章《鼓膜》一样。但就在  
写作《丧钟》之前，德里达已开始构思另外一部分两栏的著作《语言的计量》(*Le  
calcul des langues*)，围绕着孔狄亚克展开。保存在出版资料馆的未完成稿共有 78 页  
打字稿：很明显，纸张被两次装入机器，调成两种不同的宽度。每栏文字时而有几  
行空白，好让德里达能够控制两栏之间的呼应，尽管他采用的方法再手工化不过了。  
此后，第二栏文章放弃了孔狄亚克的书写艺术，将位置留给了一篇对弗洛伊德的  
《超越快乐原则》的评论，德里达将在《明信片》中长篇论述该文。在其余部分，  
《语言的计量》还算中规中矩，在排版和文体上远远不及《丧钟》狂野。

这部在各个方面都异乎寻常的书的手稿可惜找不到了：无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尔湾分校、出版资料馆还是伽利略出版社似乎都无迹可寻。但德里达多次提到过  
《丧钟》的缘起，他与当时主要的对话者之一罗日·拉波尔特的通信里有许多珍贵的  
细节。1971 年在蒙彼利埃被任命为教授的拉波尔特起初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立，但很 319  
快同法塔·莫加纳 (Fata Morgana) 出版社的负责人布鲁诺·鲁瓦 (Bruno Roy) 结  
下了友情。这个小小的出版社希望将“精湛手工与文学水准”相结合，已经发表了  
福柯、德勒兹和列维纳斯的一些短文，还有布朗肖的《白日疯癫》。德里达首先将这  
部十分特别的作品交给了这家出版社。1973 年 4 月，在给罗日·拉波尔特的信中，  
他第一次提到就热内作品撰写一部排成两栏的书的计划。他这时想到的仅是一册 70  
到 100 页的“排版有些复杂”的书，这个计划看来完全符合法塔·莫加纳出版社的  
要求。虽然需要同以往一样超额工作，帮助学生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德里达还是在 6

月30日说正在持续写作此文，把孔狄亚克“暂时放在一边”<sup>①</sup>。

夏天，先在拉萨茨，后在尼斯，德里达在一种狂热中写下了作品的主要部分，除了他的小机械打字机外别无其他工具。他很快意识到《丧钟》的形式与篇幅一定会给排版与出版造成问题。但写作越是进展，他就越是“产生这样的印象（迷信、焦虑、神经质的），即这是他最后的写作，也是第一本书（其构思和计划都是这样考虑的）”<sup>②</sup>。

他将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节目《赏心乐事》里讲到，他首先整理了关于黑格尔的文章，来源是1971—1972年关于“黑格尔的家庭”的研讨课，“同时在回忆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或者在计划中”酝酿关于热内的文章。

320 当我写作时，这两栏文章已经居住在我的脑海中，随后我才在其上进行估算并加入一些孔洞。但具体而言，整个过程十分手工化，必然有许多重写、修改、粘贴，在手稿和页面上的剪切。但这种手工劳作在某种意义上模仿着理想的机器，我希望造出这种机器，好能够一次写成。<sup>③</sup>

几周过去，文章“有点令人恐怖地延长”，德里达意识到它的实现和出版将带来许多问题。《丧钟》的节选将发表在1973年9月份的《拱》上，让他很不满意；它“同他所有希望的相反”，特别是因为只截取了一小段关于热内的部分，丝毫没有体现出整体布局。<sup>④</sup>

随着学校开学，德里达承担了许多事务，写作速度慢下来，但他仍然希望在圣诞节假期完成。《丧钟》的篇幅使得它在法塔·莫加纳出版失去了意义：布鲁诺·鲁瓦的出版社专注于小书，无法承担这样技术复杂又有财务风险的计划。于是作品将在伽利略出版社出版。德里达越来越满意伽利略出版社的做事方式，而伽利略这个名字也同作品围绕展开的词语链条有着奇妙的联系——从菖兰（glaïeul）到短剑

① 德里达致罗日·拉波尔特的信，1973年6月30日。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德基的信，1973年8月4日。

③ 法国文化电台播出的节目《雅克·德里达的快乐》，1986年3月22日；文稿保存在IMEC的德里达档案中。德里达早已在同莫里斯·奥兰德尔的一次广播访谈中回忆过《丧钟》的起源，1977年2月21日，比利时广播电台。在更晚的一次访谈中，他确切地说：“我在电脑出现之前早已尝试过最不符合线性书写规范的文章。现在对我来说更容易进行这样的工作——分割、版面创新、嫁接、插入、剪切、粘贴，但我已不再从这个角度和在这样的形式下对此感兴趣。……《丧钟》的奇特排版表现在，它像一篇管风琴的短论文，描绘出直到今天的乐器史，我在一架小小的机械打字机上完成了它。”（“La machine à traitement de texte”，*Papier Machine*，Galilée，2001，p. 158-159。）

④ 德里达致罗日·拉波尔特的信，1973年9月26日。



(glaviot), 从战船 (galères) 到荣耀 (gloire)。

同米歇尔·德洛姆和制版专家多米尼克·德·弗勒里昂 (Dominique de Fleurian) 讨论出书方案时, 德里达估量着此书的出版将会多么困难和昂贵。排版工作需要几个月无数的讨论和不间断的调整。早于文字处理和电脑辅助出版整整十几年, 《丧钟》无论对作者还是出版者而言都代表着技术上的奇迹。要知道, 头几份校样出在热敏纸轮上, 必须把它切下来, 用手贴在光板上。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将导致一切重来。该书于1974年9月27日印刷完成, 出版于让·里斯塔主持的“复式书写” (Digraphe) 丛书中。首版印量5300册, 要好几年时间才告罄。 321

书的外表首先夺人眼球。开本为25厘米乘25厘米, 这对一部论著来说颇为奇特。封面是简朴的灰色, 封底完全没有介绍文字。打开书更令人吃惊:

首先, 两栏。从上到下被截断, 从侧面被剪切: 插入, 文身, 镶嵌。第一次阅读似乎是这样的, 两篇文章相互对立, 或彼此无关, 之间没有交流。在某种方式上, 不错, 这都是故意的: 前文, 物体, 语言, 文体, 节奏, 法则。一边是辩证法, 另一边是银河系, 天差地远, 效果难以分辨, 直到有时令人晕眩。<sup>①</sup>

《丧钟》强化了开始于《边缘》和《播散》的探索, 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延伸了马拉美的“书”之梦。<sup>②</sup> 其针对传统规范的挑衅性登峰造极。作品无头无尾, 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分割开来, 颠覆了排版规范, 也完全不带学院气: 没有一个脚注, 也没有书目。更特别的是, 《丧钟》叠加在一起的是“对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巨制的诠释和对热内这样一位出格的诗人—作家的重新书写”。 322

一种伟大的哲学理论话语遭到被认为是可耻或淫秽的文学文本的传染, 还有好几种写作规则或类型的混合, 这看起来可能是暴力的, 而且在其“排版”上已然如此。但它结合了或者说唤醒了—种古老的传统, 即页面在其文字整体、

① 夹在书中的“请插入”页。

② 德里达1974年年初在集体著作 *Tableau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里发表了一篇不太为人知的关于马拉美的文章, 它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像是《丧钟》的使用手册。在远远超越能指和所指的犹疑不定的游戏中跟踪着音节“or”, 德里达感兴趣的是“这些无限广阔、强大而且互相交缠的链条……仿佛没有依托, 总是悬在空中”。“因而剩下的只有‘字’, 其解体或其重新刻印的碎片, 永远无法在其独特的在场中辨认出来, 最终只指向其自身的游戏, 事实上从不走向其他东西。” (“Mallarmé”, in *Tableau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allimard, 1974, p. 375.)

诠释及内部边缘中别样的分布，亦即别一种空间，别一种阅读、书写、解释的实践。我用这种方式践行着《论文字学》里的一些命题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命题涉及书籍和文字的线性。<sup>①</sup>

受时代影响，《丧钟》亦可视为对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反俄狄浦斯》的回应，该书曾如此令他恼火。因为无论有怎样的挑衅性和文本游戏，德里达并不愿放弃论辩的严密。最具连续性的左栏文章源于1971—1972年的研讨会：德里达从中抽出一根线索，即“黑格尔的家庭”，从其最具传记性的方面直到最概念化的方面；该文还对《法哲学原理》中的几章进行了详细分析。右栏文章则更具断裂性，它源于热内的全部作品，显示出花朵无处不在，并由此表现出作家的名字无处不在。整个过程是开放和自由的：与萨特的《圣-热内：演员与献祭者》不同——德里达对其数次抨击，他从不企图给出“人一完整作品及其精神分析一存在主义的终极意义的‘钥匙’”<sup>②</sup>。

323 《丧钟》带来了真正的阅读上的困难：从字面来看，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不可能逐页平行阅读两栏文字，因为其内容将很快消解。但读完一栏再读另一栏则更为荒谬：这等于否认全书深刻的一致性，误解两边文字不间断的呼应。读者因而必须发明自己的阅读节奏，准备好先读第五、十或二十页，然后再回头，一边不断地瞧瞧另外一栏。他需要建立起文中隐含的关系，即介于黑格尔家庭和热内家庭的缺失之间，介于《法哲学原理》里理论化的生殖的性和《小偷日记》或《玫瑰的奇迹》里同性恋的放浪形骸之间。

《丧钟》对传统阅读构成了长久的挑战——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文学的阅读，它面向的是无处可寻的读者，在黑格尔和热内的文本中都能游刃有余。借用德里达式的说法：这是一名将来的读者，就如被书本创造。

※ ※ ※

大部分书店陷于尴尬，对这样一本版式特殊、无法归类的书不知如何是好。评论界则颇为积极。1974年11月1日，在《文学半月刊》上，皮埃尔·帕舍（Pierre Pachet）就这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写了一篇两个版面的文章。几周之后，在《费加罗报文学副刊》封面上，克洛德·亚努（Claude Jannoud）善意地提到“德里达的福音书”，同时也询问这是否还算哲学。让-玛丽·伯努瓦在《活的艺术》上撰文认为，

---

① Jacques Derrida, “Une ‘folie’ doit veiller sur la pensée”, entretien avec François Ewald, in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360-361.

② Jacques Derrida, *Glas*, Galilée, 1974, p. 37.

该书的力量正在于这一挑战：“哲学的书写，宗教的书写，诗的书写，身体，性，死亡，一切都在这丧钟之下纷飞，这在当今法国的文字生产中是独一无二的举动。”《世界报》毫不掩饰兴奋之情，1975年1月3日，克利斯蒂安·德拉康帕涅赞扬此书表现出“质的飞跃”。

终于，雅克·德里达给了我们他的第一本书。对，您读得没错：他的第一本书。他以前的作品——从《声音与现象》直到《播散》，还有中间的《论文字学》都只是文集。相反，《丧钟》是德里达像书那样酝酿并撰写的第一本书。这并不是说这是一部光滑统一、连续线性的文本，事实并非如此。<sup>①</sup> 324

但友人与同事对这部冒险的作品的反应对他来说至少同样重要。个人风格完全相反的阿尔都塞寄给德里达一封抒情的信。他将《丧钟》放在客厅的矮桌上，向所有来家里的人赞扬它。

我呢，我经常一段一段地读你的书——有时一口气多读些，但都是在晚上。缓慢地读。总是在这个矮桌边，在这里不能工作，而是聆听对面的人讲话——我读书就是在聆听你。……你写下了异乎寻常的“一些东西”。你比在读你的我们更了解。你走到了前面！已经写出来了，但我们追上来，只是为了发现你已经又在别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匆匆忙忙，说着我迟到的语言：雅克，我被这文本，这书，这两栏，其双重独白及其契合，艰辛与灿烂，中和与痛苦，暗淡与光彩，所震撼——还有在这对比合唱中出现在每条“路径”上的内在的重复。请给我这些词语，它们无关紧要，但却经由黑格尔和热内，“说着”闻所未闻的东西。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哲学文本，它是一首诗，我不了解的诗。我在继续阅读。<sup>②</sup>

更令人吃惊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也表现得十分热情。

亲爱的老友：

我想十分真诚地感谢你的《丧钟》，我很快乐地读了它。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你的构图追求让我很感兴趣。我也在努力以另外的逻辑打破传统的修辞法，

① 载《世界报》，1975年1月3日。

② 路易·阿尔都塞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而你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让我深受鼓舞。在深处，在我能够预感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做到……我相信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我有时对自己说，如果我研究哲学，我想做到你所做的。<sup>①</sup>

325 在美国，《丧钟》尤其激起了保罗·德·曼在耶鲁的同事杰弗雷·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热情。在这部奇异的书中，他看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梦想成真：“哲学交响乐”，艺术与哲学的共生。<sup>②</sup>

同宝洛·泰弗南则更为困难。1974年10月20日，德里达带着不安与胆怯给她寄去了此书。几个月前他给她读了关于热内的部分，她表现得十分严厉，评价说文章“未完成”，“写得太快”，特别是“不如热内机智”<sup>③</sup>。该书问世不久，德里达从好几方听说她针对《丧钟》发起了一场真正的“诋毁运动”。他为此忧伤地责备她，她则十分强势地回复。

您是想对我生气，我很久以来就知道。相信我，从《丧钟》前很久就开始了。您也许是为了让我对此书做出回应，《丧钟》敲响了许多决裂的声音，我在其中读到了。您编织的网没给想要自卫的人留下什么余地。

从根本上说，您对与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分手耿耿于怀。为了释怀，您需要推翻所有让您想起与他相交甚悦时的东西，还有些配角。他们毫不重要。他们从不算数。为了摆脱这个时候的回忆，您需要除去所有在其中起过作用的人：安托南·阿尔托，我。在《丧钟》里，透过热内，我读到了这些。您没法让我相信，您不想用葛兰（glaceul）的利剑（glaive）切下索莱尔斯的声门（glotte）的一部分（gli）。<sup>④</sup>

泰弗南坚决地说，自己克制着不去谈论此书，只是评价其外观不够精美。她也承认曾经两次走出自己的保留态度，特别是同“《复式书写》的人”一起进晚餐时。事实上，如果说她难以忍受此书，那可能是因为她感到德里达想从她那里偷走热内，就像其他人曾试图夺去阿尔托一样，而她希望这两位作家完全属于她。在宝洛·泰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② Geoffrey Hartman, *A Scholar's Tal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宝洛·泰弗南致德里达的信，1974年10月20日。

④ 宝洛·泰弗南致德里达的信，1974年12月22日。

弗南和雅克·德里达之间，不快持续了两年多，这期间他们避免碰面。他们的关系将永远不会恢复到最初几年的友谊。

另一个人的反应对德里达很重要，就是让·热内本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萨特在《圣-热内：演员与献祭者》里的分析在他身上激起了十年多对文学的抵制。正如德里达将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萨特“意在进行控制性的解释，这再次将热内囚禁在他的真相中，这是一种可能刻画在他原初意图里的真相”，这种意愿尤其攻击性，因为它误读了文字本身。<sup>①</sup>德里达尤其不愿用《丧钟》漫长的偏航阻滞热内的脚步，“把他带回去，束缚他”。他在书里强调了这一点：“在像人们说的‘就’某人写作时，我第一次害怕被他阅读。……他几乎不再写作，他埋葬了文学……这些关于丧钟、签名、花朵、马匹的话会让他嗤之以鼻。”<sup>②</sup>《丧钟》出版后，德里达将非常感动于热内私下里说的几句友好的话，但他将小心地避免同他谈论此书。

※ ※ ※

有趣的是，这部版式极具创造性的书给他带来的最美的一个惊喜不是形诸文字的。1975年11月3日，让·里斯塔和让·热内的朋友、导演安托纳·布尔塞耶(Antoine Bourseiller)在雷卡米耶剧院组织了一场《丧钟》公开朗读会。书中的一些篇章投影在屏幕上，玛丽娅·卡萨莱斯(Maria Casarès)和罗兰·贝尔丹(Roland Bertin)朗读了其中的段落。这次体验将令德里达深为感动，正如他给布尔塞耶所写的：

您成功地做到了我以为不可能的事。我对您率先冒此风险万分敬仰。在这次朗读会中，您给予了我奇异的和解的欢乐（同我所写的来自别处的东西和解，它们突然间变得可以接受）。非常好。不只对我，我现在知道。所有经历这场景的人都感到仿佛是一种戏剧的和革命性的弥撒，强烈、质朴、毫不退缩，您该当此成就，您知道。<sup>③</sup>

同一天，安托纳·布尔塞耶对德里达讲述了这个晚上给他带来的全部喜悦，随后提议道：

327

<sup>①</sup> Albert Dichy et Michel Dumoulin,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pour le film *Jean Genet l'écrivain*, 1992, IMEC, fonds Jean Genet.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Glas*, Galilée, 1974, p. 45.

<sup>③</sup> 德里达致安托纳·布尔塞耶的信，1975年11月9日。

事实上，在《丧钟》的朗读过程中……让我震撼的，是其中散发出的悲剧感，这在星期一整个晚上清晰可感。……有些时刻是属于“原”戏剧的，这个字取其工业上的意义，无论是在排演时，还是在面对公众时。……它不再是一位哲学家的作品，不再关乎现代性，它关乎戏剧。剧场里的寂静从不欺骗。

那么，亲爱的雅克·德里达，我直奔主题了：您需要尽快尝试写作一篇对话，不必关心它是否是戏剧化的，用简单的方式，不是两栏，而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形式排列在纸上，安排好时间地点，但我再说一遍，千万别在意其内容是否是戏剧的。您选择的主题一定会火，我们只需将它投射在舞台上。我真诚地相信，在这次朗读体验之后，您也是某种戏剧形式的作家，这种戏剧尚无法定义，雄辩而又感人。……试试吧，您会损失什么呢？相对您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不过是形式上的限制而已。<sup>①</sup>

布尔塞耶的直觉强烈而正确。德里达在此之前从未尝试过，但他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投入这种写作方式，它不是直接作为戏剧来构思的，但运用了对话的形式。例如1976年刊登在《字符》(Gramma)杂志，后收入《海域》(Parages)的文章《脚步》(“Pas”)便是如此。他还怀着很大的热情制作了两本书的有声版：先是《遗烬》(Feu la cendre)——同卡洛尔·布凯(Carole Bouquet)一道，后是《割礼忏悔录》，他一个人完整而出色地演绎了全文。<sup>②</sup>

※ ※ ※

同《丧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画家瓦雷里奥·阿达米(Valerio Adami)的重要相识。玛格(Maeght)画廊负责出版的诗人雅克·迪班(Jacques Dupin)建议德里达与一位画家合作完成一幅结合线条、绘画和文字的版画。他提出了阿达米的名字，把他的画作展示给德里达，并预定在1974年10月的一次晚餐上见面。但在约好的日期之前，雅克和玛格丽特在别的情形下认识了阿达米及其夫人。

出于奇特的巧合，我在翻阅过他的作品目录之后几个小时有幸与他相遇，当时我们两人都受邀赴龙街共同的朋友处。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瓦雷里奥

① 安托纳·布尔塞耶致德里达的信，1975年11月9日。

② 《遗烬》和《割礼忏悔录》的有声版本分别于1987年和1993年由女性出版社(Éditions des Femmes)出版。

的面容。他脸孔的线条，他作为素描家的笔迹，他的笔迹本身——他书写与描绘字母的方式——这一切对我立即构成一个世界，一个不可分割的构图。这一切仿佛在第一个晚上就汇合在24小时统一的情节里，就像乔伊斯所说的。<sup>①</sup>

这是第一次，德里达冒险写作关于绘画的文章。但他们的相遇并不只建立在审美兴趣上。阿达米具有深厚的文学和哲学素养，也喜爱德里达着迷的一些作品和作家。

在阿达米那里，立即吸引我并使我接近和进入他画作的东西，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然是这一点，即如果说他是一位绝对意义上的绘画者，或至少是一位画家的话，那么他在自己署名的空间里还接纳了多种艺术，特别是文学——那里有句子、文章、文学人物、作家群体，例如乔伊斯或本雅明。<sup>②</sup>

他们要共同完成的版画是阿达米倡议的，他建议以刚刚出版的《丧钟》为基础，因为他深深震惊于该书的造型性。正如德里达讲述的：

他选了一个段落，挑出一个句子，让我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来并签名，随后他开始工作。他不久便让我看到一幅图画，它很快变成一张巨大的画，其中他穿过钓鱼钩尽头的一条大鱼写下了那句话。他的作品与《丧钟》的文字相呼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在其上加上了自己的签名，还采用了少年时代的一句诗：“池塘之胶我的溺亡之乳”，我在作品中对这行诗进行了长篇评论。<sup>③</sup>

329

德里达和阿达米将在500幅大型版画上共同签名。随后，哲学家将为玛格画廊的杂志《镜后》写作一篇题为《+ R (而且)》[“+ R (par-dessus le marché)”]的文章。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评论：德里达在其中延续了对字母和签名、线条和框架的思考，随后考察了本雅明关于技术复制性和艺术市场的问题。同往常一样，对环境很敏感的德里达特别考问了自己的介入带来的后果：“当一种增值被自我映射时

① Entretien avec J. Derrida et V. Adami, in Valerio Adami, *couleurs et mots*, Le Cherche Midi éditeur, 2000, p. 27.

② Valerio Adami, *couleurs et mots*, op. cit., p. 31.

③ Ibid.

会发生什么呢？”<sup>①</sup>

这本来不过是短暂的合作很快成为长久深厚的友谊——与瓦雷里奥，也与他的妻子卡米拉。从1975年起，德里达一家将连续几个夏天在阿达米一家在阿罗纳的湖边的大房子里度过。这是一座部分毁于战争的巨大宫殿，充满了故事与传说，让孩子们有些害怕。第一层和第二层完全没有人住，第三层有一所整理好的独立套房，接待来自各地的友人，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或以色列。正如阿达米讲述的：“在这个有些破败的大房子里，每个人都有空间，它在夏天便会复苏。我们在长着奇花异木的花园里散步。周围村庄里有五个电影院。每天晚上我们去看一场不同的电影。多亏了这座别墅，我才能留住如此忠实而深厚的友谊。”<sup>②</sup>

330 对德里达，在阿达米这里度过的几周比在尼斯或拉萨茨更像真正的假期。当然，他起得很早，整个上午都用来工作，但其他时间则很放松。他喜欢同瓦雷里奥谈话，也喜欢他妻子热情的挑逗。“我经常逗他，”卡米拉·阿达米回忆道，“这让他有点狼狽，因为他更习惯同男人交谈。尽管他喜爱女人，同女权主义也很接近，但他仍然保留着一点轻视女性的方面，就像那一代的许多男人。但当他感到放心时，他能够表现得非常风趣。我们开了许多玩笑，大概因为他走出了自己熟悉的圈子。他还热衷于跳舞……他也接受对他完全陌生的经历：每年瓦雷里奥都排演一出受古典绘画启发的活的画作，如《奇迹的垂钓》或《屠杀无辜》，雅克与玛格丽特和孩子们都乐于参与。”<sup>③</sup>

---

① *Derrière le miroir* n° 214, Éditions Maeght, mai 1975. Ce texte sera Repris, avec trois autres, dans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Champs-Flammarion, 1978, p. 175.

② *Valerio Adami, couleurs et mots, op. cit.*, p. 24. 同瓦雷里奥和卡米拉·阿达米的访谈。

③ 同卡米拉·阿达米的访谈。将近30年之后，德里达在一篇文章里评论了卡米拉·阿达米的画作，见“Tête-à-Tête”，in *Camilla Adami, Villa Tamaris centre d'art, La Seyne-sur-Mer*, 2004。



# 第 17 章 捍卫哲学

## (1973—1976)

对于出版人，雅克·德里达一直坚持表明自己的独立性。从他签的第一个合同起，他就划去了优先条款，这一条款要求随后的作品都交给同一家出版社。他在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与杂志社而非出版人保持联系：他与子夜出版社不如与让·皮埃勒和《批评》杂志更接近，与瑟耶出版社不如与菲利普·索莱尔斯和《原样》更接近。但这两边的关系都变得很困难或不可能维系。出版了他最早的有关胡塞尔研究的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对他以后的计划来说则过于传统。与米歇尔·福柯决裂之后，伽里玛出版社显然不想要他。 331

对米歇尔·德洛姆和伽利略出版社，德里达立即表现出热情。小规模、合作性、对纸质装帧方面的关注，这些都吸引他。《文字的标题》成功之后，德里达想要走得更远，开发一套真正的丛书。1973年夏末，他同德洛姆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者看起来“准备接受一切”，正如德里达给菲利普·拉库-拉巴特所写。实际上，德里达希望拉库-拉巴特与让-吕克·南希和萨拉·考夫曼合作主持这一计划。10月底或11月初，德里达提议在巴黎聚会，“材料在手，重新全面仔细地审视所有的可能性”<sup>①</sup>。

让-吕克·南希的《思辨的评论》（*La Remarque spéculative*）深受德里达推崇， 332 它将成为第一批书中的一本，此外还有伊丽莎白·德·丰特奈的《马克思的犹太形象》（*Les Figures juives de Marx*）和萨拉·考夫曼的《暗箱》（*Camera obscura*）。德里达确信他们心目中的哲学丛书能满足真正的需求。这套丛书将很快占据“十分必要和积极的地位”<sup>②</sup>。伽利略出版社的优势之一就是反应快，事情迅速落实，第一批

① 德里达致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信，1973年8月22日。

②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无日期（1973年夏）。

著作从 1973 年年底起就开始问世，尽管“实效的哲学”丛书直到次年秋天才真正创立。

德里达对这初步的进展十分满意，特别是因为 1974 年 1 月，也是在伽利略出版社，创办了一份由他提出题目的新杂志——《复式书写》。杂志负责人是让·里斯塔，在编委会里，他身边起初有让-约瑟夫·古、露丝·伊利格瑞和达妮埃勒·萨勒纳夫 (Danièle Sallenave)。《复式书写》看上去像个朋友的杂志，意欲成为新的《原样》。德里达在上面多次发文，包括刊登在第 2 期和第 3 期的长文《边缘》，但他很小心，不太涉入具体运营。

※ ※ ※

在 1970 年代初，对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来说，共同体思想绝非一个词或一个概念。他们两人都为最早的德国浪漫主义耶拿 (Iéna) 团体所吸引，其中诗歌和哲学密不可分：他们很快就此写出一部重要作品《文学之绝对》(L'Absolu littéraire)。<sup>①</sup> 尽管南希和“拉库”的气质十分不同，他们却一起开课，经常合作写作，共同策划许多活动，特别是在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但正如让-吕克·南希所写，“他们的私人和家庭生活”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状态”，居住在夏尔-格拉街的同一家房子里。许多斯特拉斯堡人认为这种受乌托邦精神激发的团体生活之地具有高度的颠覆性：整整十年间，“六八”精神继续搅动一切，包括“生活与思想的形式，政治构架以及社会的、性的或文化的表现”<sup>②</sup>。

对这样的理想，这样的生活方式，德里达个人感觉不能够再遥远了，就如他最后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与南希和拉库-拉巴特会面时将说的：

这种双手、三手或四手的写作或思想对我始终是一种诱人的、可敬佩的、谜一般的幻象，但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在这种同我所说的公共经验密不可分的私人生活中，他们这种家庭共同体的联系实在难以想象，我感到这是我自身的限度。<sup>③</sup>

这并不妨碍德里达提议四人集体主导《实效的哲学》，并立即想要出版一部集体

---

① Jean-Luc Nancy et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L'Absolu littérair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du romantisme allemand*, Seuil, coll. "Poétique", 1978.

② Jean-Luc Nancy,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à Strasbourg", *Europe* n°973, mai 2010, p. 12-14.

③ Jacques Derrida, "Le lieu dit : Strasbourg", in *Penser à Strasbourg*, op. cit., p. 46.

著作。萨拉·考夫曼提出“模仿”（Mimesis）一词，这在他看来如同一个开放和联合的概念，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如重复、生产、繁殖、反射、影像、偶像、理念、圣像、幻影、模仿、双重、面具、同一，等等”<sup>①</sup>。德里达建议在这四人之外再加上两名作者：贝尔纳·波特拉和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他们六人于1974年6月底聚集在巴黎，确定全书的大纲。让-吕克·南希回忆道：“就在这时，菲利普和我明白了拉克和希尔维亚的关系不仅仅是哲学上的。”<sup>②</sup>德里达对《模仿》（*Mimesis*）一书很有信心，这将是这位年轻女子的第一部出版作品，德里达明显想要突出她。但他行事巧妙，不向合著者们施加任何压力。

你们想到过文章次序的问题吗？我对所有预设某种解释或造成某种视角的选择都不满意，强烈倾向于按照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其任意性将中止有关意义或体系的疑问。而且这样的话会以最不“公众的”名字开始，我看好处多多。请坦率地告诉我你们的想法。<sup>③</sup>

334

德里达希望此书尽快问世，并将利用夏初撰写他自己的文章《经济模仿》（“*Economimesis*”），这是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些段落的挑衅性解读。他给拉库-拉巴特写道：

我急于读到你们的文章，这一共同出版物——就像我们共同做的一切——让我十分高兴。……《模仿》应该在畜生们中间引起巨大的骚动，让理论人群忙乱/恐慌，让他们追着牲口奔跑，就像在牲畜集市里放了一所妓院，或者像大敞农业展览会的一扇大门，我要确切地说，是朝向出口的大门。我感觉到这情景的到来。<sup>④</sup>

这鼓动的口气和粗俗的比喻在德里达的信件中极为罕见，证明《模仿》在精神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也是《丧钟》的延续。但出于各种原因，该书的出版将延迟。

① *Mimesis*, Aubier-Flammarion, 1975, 封底。

②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③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无日期（1974年11月）。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的第一本书《旁白——克尔凯郭尔的观念和死亡》（*Aparté. Conceptions et morts de Søren Kierkegaard*）将于1977年3月出版于“*La philosophie en effet*”丛书。

④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信，1974年9月4日。

南希和拉库-拉巴特请德里达为他们筹备的以《相混合的文学与哲学》为题的一期《诗学》(*Poétique*) 专刊撰写文章, 他于是将 1974 年夏天余下的时间投入这项工作。他选择将 1971 年就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课》所做的演讲整理成文, 但文章将比预计的要长得多, 其内容也让他很担心。把文章寄给《文字的标题》的两位作者时, 他请他们“非常坦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是否感到有些东西“有错误, 是粗糙的误读或极不充分的解读, 抑或在舞台上过于让人不快”。明显是因为想到了三年前接受《诺言》的采访时遇到的麻烦, 他坚持除了他们和热奈特之外, 手稿不让任何人读到, 尤其是瑟耶出版社的人: “唉, 我了解这整个圈子, 我有正当的理由提出这个请求。”<sup>①</sup>

拉库-拉巴特立刻逐条让德里达放心: 长度不是问题, 因为这期专刊就是围绕着他的文章设计的, 而且他们当然不会让任何人读到手稿, 尤其是弗朗索瓦·华尔, 他是拉康在瑟耶出版社的对话者。至于内容, 他认为《真理的因素》一文始终令人印象深刻: “没有任何‘卑鄙的手段’——对拉康作品甚至流露出尊敬和同情, 这消除了舞台上所有令人不快的特征”, 更何况这个舞台已令人期待多年。<sup>②</sup>

不管拉库-拉巴特怎么说, 这是德里达最著名也是最强硬的文章之一。首先, 它针对的不是《作品》里随便的一篇文章, 而是拉康选择置于卷首, 因而赋予其战略地位的文章。但尤其是, 德里达将拉康送回到传统的立场: 他把《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课》与玛丽·波拿巴 (Marie Bonaparte) 对埃德加·坡的分析进行对比, 从中认出“实用精神分析学的古典景象”。坡的短篇小说“就像一个简单的案例”被引用, 其文学书写远远不曾获得应有的分析, 而仅仅“处于说明的地位”<sup>③</sup>。虽然拉康不断提到能指, 但“就在他宣称从中‘辨识出’‘真理’以及代表性的‘信息’之时”, 文本的形式结构被漠视了。德里达强调, 埃德加·坡的小说要比对它的评论巧妙得多。一个关键问题因而变成: “当一篇被解释的文本本身已自我解释时, 对它进行精神分析学阐释变成了什么呢? 当它比解释者说出更多的时候 (弗洛伊德不止一次承认从中获益) 呢? 尤其是当它额外地为解释者刻画出解释的场景时呢?”<sup>④</sup>

在这篇对拉康的细致解读中, 遭到解构的还有拉康赋予阳具的崇高地位。用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 (phallogocentrisme) 这一概念, 德里达致力于表明逻各斯和阳具

①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信, 1974 年 8 月 24 日。

② 拉库-拉巴特致德里达的信, 1974 年 8 月 27 日。

③ Jacques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in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Aubier-Flammarion, coll. “La philosophie en effet”, 1980, p. 453.

④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442.

是“单一的和同样的系统”的两种表现，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密不可分：“父系逻各斯的勃起（话语，朝代专有名词，国王，法律，声音，我，‘我一真理—我一说’的面纱，等等）”和作为“得天独厚的能指（拉康）的阳具”<sup>①</sup>。这个问题在女权主义者正处于理论上强势复兴的时代非常重要。露丝·伊利格瑞——其著作《窥镜，另一个女人》（*Speculum, de l'autre femme*）和《此性非一》（*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在1974年造成很大影响——试图用不同于阳具权力经济和弗洛伊德传统所规定的话语来思考女性，但她并不隐瞒从德里达那里获得的帮助。卡特琳娜·克莱芒和埃莱娜·西克苏在1975年出版的《新生的年轻女子》（*La Jeune née*）里阐发了类似的主题。德里达和很快将被称为“女性研究”（*les études féminines*）的领域正在建立起真正的联盟。同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的亲密关系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

※ ※ ※

这段时期德里达在法国十分紧张繁忙，在美国的生涯也真正开始成形。在此之前，德里达只在1968和1971年在巴尔的摩待过两段较长的时间。其余时间，他在巴黎为约翰·霍普金斯和康奈尔的学生主持一个研讨课。他本应于1974年在巴尔的摩停留两个多月的时间，但他在前一年就谢绝了，他解释说是因为有些无法逾越的障碍。

主要是因为学校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孩子们的学校。皮埃尔刚刚进入中学，让在“重点学校”里，缺课三个月的后果我们都得小心。而如果与他们分离这么久，我心理上会过于痛苦。其次是我的学校。我被坦白地告知我多次的缺席（因会议或教学的旅行，尤其是长时间的旅行）令校方和学生不满。特别是，我的同事阿尔都塞常常生病，他在病情严重恶化之后刚刚离开学校住院，他离开的时间还无法确定。<sup>②</sup>

337

他向对方肯定地说，这一决定对他来说损失也很大，因为两次在约翰·霍普金斯的逗留给他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他也很珍惜那里的朋友们。由于以后的几年还可能无法成行，他推荐他们邀请吕塞特·菲纳来替代他，但这个建议并不令他们满意。实际情形看来比他所宣称的要更复杂些。在给保罗·德·曼的一封信中，德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ntretien avec Lucette Finas”,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16 - 30 novembre 1972. Repris in *Écartés*, *op. cit.*, p. 311.

<sup>②</sup> 德里达致埃里亚斯·瑞弗尔斯（Elias L. Rivers）的信，1973年10月8日。

里达说希望和保罗·德·曼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与约翰·霍普金斯的关系使他“一段时间以来处于尴尬的境地”<sup>①</sup>。可能他在当地没有一个真正的对话者。保罗·德·曼立即抓住机会同希利斯·米勒商讨准备把德里达“转移”到耶鲁，他在那里的停留将短暂许多。从1974年4月起，主要的准备工作已就绪：“您在耶鲁的停留虽说会是断续的，但我们的热情一定能超越行政上的障碍。”<sup>②</sup>

这一计划能够得以考虑，主要是因为从前一年起德里达重新开始乘飞机，结束了他从1968年秋开始的恐惧症。这对萨缪尔·韦伯邀请他每两周去一次柏林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最初的旅程中，他只能靠大量吞咽药片来应对，但安全感渐渐回来。这才使他有可能考虑在美国短暂停留。在这一年的过渡期，德里达于1974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和耶鲁之间待了两周。

1975年1月，保罗·德·曼终于能够正式确认德里达被任命为耶鲁为期三年的访问学者。条件极为优越：预计他于高师开学之前的9月份到达，停留大约三周。338 他要给研究生们开一门研讨课，主题由他决定，大约20次：前六七次在耶鲁，其他课时在巴黎，面向在那里进修的美国学生。年薪为12 000美元，这是一笔丰厚的薪金，尽管德里达需承担主要的旅行和住宿费用。<sup>③</sup>这就结束了之前同约翰·霍普金斯的合同，但这所大学和康奈尔的学生还可以继续参加他在巴黎的研讨课。

耶鲁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在纽约东北部大约120公里，是美国最富有、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在文学研究方面，它也是192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主流新批评主义的摇篮。但德里达眼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保罗·德·曼。从他们1966年第一次相遇起，围绕着对卢梭的共同兴趣，两人的关系就不断接近。保罗·德·曼虽然是文学系负责人，却给予了哲学重要的位置：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他而言是无法绕过的参照。两人互相的敬重很快转变为“罕见的友情”。正如德里达第一次回来之后不久所写：

在耶鲁，在您身边度过的三周，就好像失落的天堂，它已经不太真实，极度远离这里滋扰我和分裂我的一切。我已经很拙劣地对您说过，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您关怀而亲切的接近。除了您留给我的时间和关注……我还非常感动于您对我正身处其中并试图工作的“困难”的默默关切。我感受到了您的理解，您从教学和文字游戏的背后看到了这困难。这“困难”（我不愿使用别的词语）

---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74年1月22日。

②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4年4月28日。

③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5年1月7日。

在今天要比任何时候都更糟。<sup>①</sup>

德里达说，他已经在考虑下一次的停留，以及“应该从这第一次中提取的经验”。保罗·德·曼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他也感觉找到了同道，能使文学研究系得以充分发展。 339

我无法向您尽述您的逗留是怎样让所有人获益：您在这里的友人，所有满怀热情听您课的人，尤其是我本人。您授课的成果开始显示出来。我看到好几名学生想要继续同您一起学习，他们明年将去法国，还有一群年轻的教师自发每周组织起来阅读您的旧文并进行讨论。这确实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一群背景不同的人围绕着一个知识主题聚集在耶鲁。而且，您走后人们感到寂寞，一切都显得灰暗和单调。<sup>②</sup>

在法国，1974—1976年，围绕着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对于德里达而言，这并不是与他个人工作无关的简单的斗争。就像他将在一篇采访中所说的，他看到这个时期的哲学解构工作只是针对内容，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目标：“如果不去抨击哲学体制的话，便只剩下纯理论的活动。”讨论过哲学文本的边缘及框架问题之后，德里达认为迫切需要关注这些“体制的边界”，即教学实践、师生关系、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形式和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印记。他就此与一小群同道投身于“体制解构实践”<sup>③</sup>。

现实亦在产生作用。距1968年5月已经过去了近六年，现在的氛围是保守力量重新掌控着大学工具。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动力源于抗议1974年3月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哲学评委会发表的尤为反动的报告：“在教学要求的掩护下”，评委会抨击新的哲学趋势在考试中造成的后果，呼吁回归最为学院派的规范。几周之后，30多名师生通过了“成立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前期方案”。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历史或理论性的，另外一些则是具体的，有时十分迫切，关于考试科目、试卷形式、评委和评估标准、教师的招聘及其职业等级、研究的地位，等等。<sup>④</sup> 340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75年10月12日。

②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4年10月17日。

③ Jacques Derrida, “La langue de l'autre”, entretien avec Tetsuya Takahashi, IMEC 档案。

④ 该文件发表于集体著作 *Qui a peur de la philosophie?*, Champs-Flammarion, 1977, p. 433-437. Repris dans Jacques Derrida,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1990, p. 146-152.

政治环境将起到加速的作用。乔治·蓬皮杜于1974年4月2日在任上去世。5月19日，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当选共和国总统，略微胜出左翼联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新任国家教育部长勒内·阿比（René Haby）在1975年3月提出全面改革中等教育的方案，其中一个方面即有关哲学。

就在改革细节公布之前，德里达迅速反应，在《世界报教育增刊》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题为《被压制的哲学》。他直截了当地说明，即将宣布的措施将“比其他一切更深刻地影响”哲学教育。

341

如果新的“毕业班”根据全部“选修”的体系进行安排，那么在迄今为止唯一教授哲学的班里将不再有必修的哲学课。在最后一将有3个小时的哲学课：相当于今天哲学课最少的“毕业班”部分的平均课时。在考察这一做法的预期或宗旨之前，先看事实：对于学生整体来说，哲学课时已大量缩减。哲学已经是被限定在学业末期唯一一个班级的唯一学科；它仍会被限定在唯一的班级，但课时会更少。如此，对哲学课的攻势在公开加快，而这攻势在过去的几年里还是以更谨慎和更隐晦的方式进行的：强化科学与哲学的分割，积极选择并引导“最好的学生”转向不重视哲学的方向，缩减课时、系数、教师岗位，等等。而这次的方案看来清晰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任何对哲学的恰当的启蒙都不可能在这3小时内完成。还有什么疑问呢？学生在整个学制期间对哲学没有过任何其他接触，那么选择“哲学”的考生将越来越少。<sup>①</sup>

德里达拒绝单纯的行会式的防卫。他发起的斗争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因为他认为正在进行中的“对哲学课的毁灭”将造成的主要后果是“使大批中学生脱离哲学和政治批评及历史批评的训练，而历史再次成为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靶子”。

在高中，在开始选举的年龄，哲学课难道不是唯一的场所，在此，诸如理论的现代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文本，还有些许机会得到阅读和诠释吗？从1968年在高中出现“抗议”以来，政权不断增加压力反对这样的课堂，反对一些师生，这绝不是偶然的。<sup>②</sup>

① 雅克·德里达：《哲学及哲学课》，载《世界报教育增刊》，1975年3月。Repris dans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229-237.

②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232-233.



德里达认为，只坚持维护现有的毕业班哲学教育是一种纯属倒退的思维方式，等于为压迫提供武器。在反对阿比改革的同时，他想要推行自己非常重视的想法，将哲学课扩大到中学其他班级，即更年轻的学生那里。

先设想一下那些想要耸耸肩的人的反对意见。不是要把在“毕业班”已难于实施的教学放到“低年级”课堂上，而是像对所有其他学科那样，首先接受精心衡量的渐进原则，这是知识的启蒙、学习与获得的原则。我们知道在一些条件下，一个“孩子”的“哲学能力”可以十分强大：这些恰好是必须释放的条件。循序渐进既关乎现代性也关乎传统的问题与文本。……尤其有必要在这种哲学教学和其他也在变革中的教学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联结，或毋宁说重新建立联结：实际上，谁能怀疑这一点，即通过法国文学、语言、历史甚至科学，已经在传授一种十分确定的哲学？人们是否为此这些其他的教育感到过担忧，比如宗教教育、道德教育？<sup>①</sup> 342

1975年1月15日正式组成的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将在反对阿比改革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影响。在伏尔泰高中教师罗兰·布吕内（Roland Brunet）的有力支持下，德里达周围聚集了20到30人，其中有伊丽莎白·德·丰特奈、萨拉·考夫曼、玛丽-路易丝·马莱（Marie-Louise Mallet）、米歇尔·勒多夫（Michèle Le Doeuff）、贝尔纳·波特拉和让-雅克·罗萨（Jean-Jacques Rosat）。还有他的外甥女、正在准备哲学学士学位的玛蒂娜·麦斯凯尔，以及出现率很高、非常活跃的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很可能是她让德里达对高中毕业班的哲学教育敏感起来，他对此只有遥远的和更多是痛苦的回忆。

虽然活动在整个法国发展起来，但是小组的临时总部还是定在高师，大部分会议也在那里举行。德里达并无秘书，行政和实际工作很快变得繁重。玛丽-路易丝·马莱回忆道：“他不仅仅是参加而已，而且他从未在最无回报的工作面前退缩。当时令我吃惊的一件事是，他对所有参加者一视同仁，不论其头衔、职务或社会地位如何。在我们的回忆中，有一种十分友好的气氛，带着活跃的创新和创新的欲望，这似乎让他很高兴。”<sup>②</sup> 343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哲学及哲学课》，载《世界报教育增刊》，1975年3月。Repris dans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235-236。

<sup>②</sup> 同玛丽-路易丝·马莱的访谈。又见马莱与雅克·德里达的对话，“Du Grep aux états généraux de la philosophie et au-delà”，in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op. cit.*, p. 221-223。

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斗争随着阿尔都塞与体制的问题而重新活跃起来。1975年6月，阿尔都塞在亚眠大学进行了研究工作论文答辩。但几天之后，大学顾问委员会拒绝为《保卫马克思》的作者在讲师资格能力名单上登记。德里达撰写了一份呼吁书，经小组大加宣扬，阿尔都塞的名气让此事影响甚大。

只要对哲学活动、政治理论、政治斗争（等等）感兴趣，就知道我们不必再介绍阿尔都塞的工作。人们知道这些工作深刻地影响、更新、滋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全世界，而且不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们卓越地表现了在法国和全世界最强大、最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不错，其所提问题的新颖性，其所开创的介入或阐述的风格，以及在大学里同政治实践的关系，使得某种权力和某种特定哲学体制传统的守护者感到不安。这些人带着恼羞成怒的无礼，对他设置了他们无法掩饰其政治特性的障碍。<sup>①</sup>

自然，这样带有偏见的措施打击的不仅仅是阿尔都塞，但他的情况令人吃惊地暴露出问题的政治层面：政府的政策凭借“教学中最倒退的力量”，从事着“对学校344 和大学的粗暴打击”。对小组呼吁书的回应大量涌来。德斯坦政权和大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将对德里达及其友人心怀顽固的怨恨。

※ ※ ※

在日益强硬的体制环境中，高师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德里达始终关注它的开放性，尽可能邀请对他重要的思想家前来，如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海因兹·维斯曼、让·博拉克等。他本人的研讨课也越来越著名。像从前拉康的研讨课一样，常有外面的听众来参加，尽管其主题始终与教师资格考试相关。德尼·康布施奈（Denis Kambouchner）还是路易大帝高中高师预备班的学生时就开始旁听，后来成为德里达的密友。他出色地描述了研讨课的仪式，其中每节两课中有一次是德里达仔细撰写的分析，另一次则是更加自由的讨论。

这些场次主要由阅读课组成，不是用解释文章或教条分析的传统方法，而

---

① *Qui a peur de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69-470.

是以高度的质询方式，分解各个层面，引人入胜地研究文本最细微之处，大胆地将最重要的因素与表面上最不起眼的因素拉近，在被忽视的段落里分辨出关键主题和复杂的结构，并通过哲学或文化史来显现出一些呼应的结构，用渐进的方式，重建作者的“姿态”，将之重新置于巨大而又私密的“场景”中，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样的结合。事实上，德里达在写作和教学中一直寻求最清晰的解说，但他的教学要求还是很高，许多人可能难以掌握其问题的核心。……德里达有一天说，自己“不去抹平皱褶”，他会迅速将你置于其中，置于这样的想法之中，即践行哲学就意味着立刻对复杂性感兴趣，并接受它。<sup>①</sup>

同高师学生的工作十分个人化。尽管极为繁忙，德里达还是在他一楼的办公室花很长时间接待学生，对每个人的关注点表现出罕见的关心。“从他身上散发的一切——手势、语言答复，都很生动，同时极为协调。从不含糊，从无松懈，时有停顿。早在这个时代，他在你面前已经仿佛是力量与记忆的堡垒。”<sup>②</sup> 345

无论各方的哲学倾向如何，阿尔都塞、波特拉和德里达仍然是大多数学生十分欣赏的教学三人组。学生的每份论文都进行两次修改，最后是详尽的分析。几乎每个星期二，三位导师都一起聆听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的“讲课”。1970年代末的一名学生苏勒马纳·巴希尔·迪亚涅（Souleymane Bachir Diagne）保留着生动的回忆：“‘讲课’练习是重大时刻：每人要针对导师为我们选择的题目讲一次课，随后他们会‘述评’。德里达有一种奇迹般的能力，能够评估学生的意图及其讲述中发生的事件和原因。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能够进入他人的推论过程。除了资格考试，他实际上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在学校时向他交过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尼采的《道德谱系》的，另一篇有关非洲哲学及其概念本身。德里达同我讨论了这些论文，最后建议我‘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思考’。这让我着迷：对我来说，关于尼采的论文和关于非洲哲学的文章是针对无关主题的不同的练习。然而，我常常思考德里达的意见，它教会我这并不是简单的‘练习’——就此就彼进行写作。放在一起思考，亦即明确我想做的：经由尼采和对非洲哲学的讨论。我继续带着这一观点在我的哲学道路上行进。”<sup>③</sup> 346

① Denis Kambouchner, notice sur Jackie Derrida, parue dans l'Annuaire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ENS, 2005.

② Denis Kambouchner, "Jupiter parmi nous", *Rue Descartes* n° 48, PUF, 2005, p. 95-98.

③ 同苏勒马纳·巴希尔·迪亚涅的访谈。



在出版方面，事态很快恶化。他同伽利略出版社的关系远远未能达到期望。1975年3月，米歇尔·德洛姆拒绝了《模仿》，并特别提到了刚刚让《丧钟》成为牺牲品的“出版危机”<sup>①</sup>。本希望革新出版业做法的德里达深感失望。

几个月来，德里达的旧日学生，在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出版社工作的若斯·若利耶（Jos Joliet）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4月，“实效的哲学”和“复式书写”的团队加入了这家位于拉辛街的出版社。丛书仍然是集体负责，但亨利·弗拉马里翁坚持让德里达履行“技术转移”的职责，这是个相当繁重的任务，对此他既无真正的能力也无特别的兴趣。

在这动荡的几个月之后，德里达将1975年夏初用于撰写《签名蓬热》（*Signéponge*），这篇讲演在8月初在瑟里斯举行的弗朗西斯·蓬热研讨会上将占去整整一天的时间。此文主要探讨签名的作用，似乎蓬热的全部作品都生发于“他名字”的运气”。文章以几乎模仿的方式向这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的诗人致敬。开始的几行与其说是起始不如说是致词。

弗朗西斯·蓬热——从这里我呼唤他，为了致敬与赞美，我该说出那声名。这有赖于我想让人听出来的语气。一种语气做出决定。但谁来决定它是否属于话语？

但他已自称，弗朗西斯·蓬热。他将不会为了呼唤自己而等我。

至于声名，那是他的东西。<sup>②</sup>

347 可惜像往常一样，夏天余下的时光并未给德里达带来他所希望的休息。汽车故障令人焦躁而且花费昂贵，让他情绪糟糕，此后全家在芒顿的逗留也不十分成功，他母亲租的公寓“不适而且喧闹，几乎令人难以忍受”<sup>③</sup>。但他还要在那里准备秋天的课，同时写作关于布朗肖的长篇对话《脚步》，对话的一方是一个“明显为男性”的声音，另一方则是一个“更多为女性”的声音。

德里达回到巴黎，比离开时更加疲惫，带着无法满足的“沉默、休息、闲适的

① 德里达致罗日·拉波尔特的信，1975年3月2日。

② Jacques Derrida, *Signéponge*, Seuil, 1988, p. 9. 这篇文章的片段曾发表在 *Digraphe* 第8期，1976年，第二年发表于会议论文集 *Francis Ponge*，由“10/18”编辑出版。

③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5年9月4日。

需要”。10月初从耶鲁回来时，他又看到案头如许搁置的工作，无法掩饰沮丧。“我筋疲力尽，一切都不可能（特别是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学校、弗拉马里翁、若利耶和萨拉……）”<sup>①</sup>，他给拉库-拉巴特写道，就在《模仿》结稿的时候。

该书于1975年11月出版于奥比耶-弗拉马里翁（Aubier-Flammarion）出版社，既有为“实效的哲学”丛书宣言的气势，同时也是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理论呼应。当《文学半月刊》邀请六名作者进行圆桌讨论时，德里达当即称《模仿》并非哲学作品，而是在文字和主题上“致力于将哲学移位，把它重新安置于它似乎一直掌控的领地”。

我们反对对哲学霸权的“信仰”，反对将哲学话语的编码和规则连接在其他不被承认为哲学的话语上，例如霍夫曼（Hoffmann）、布莱希特（Brecht）以及其他几处。简言之，这不是一本符合今天人们所期待的哲学话语规则的书，这些规则还充满学院气地强烈束缚着众多被认为是反哲学的书。<sup>②</sup>

《世界报》则更加彻底。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指出这些作者想要一致传达的声音：“这就是结果：一篇‘集体’签署的谈话录，这大概是这一体裁的首创。”一位撰稿人坚持说，《模仿》“并未围绕着一个‘主题’去‘汇集’文章”。相反，此书寻求“摆脱由好几个署名‘作者’带来‘贡献’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在作为序言的奇文里，“一个虚构的我，既非单数亦非复数，也非集体人称，指向六个所谓的‘专有’名词”<sup>③</sup>。这种微妙精深的态度迥异于主体和作者自我的大举回归，后者是即将取胜的“新哲学”的特征。

348

德里达在各种活动中尽管如此活跃而高效，但他对自己的生活仍然不满。在一封给保罗·德·曼的信中，他出色地描写了自己的两难境地。

“巴黎的舞台”（我这么说是为了简单便捷）和所有让我卷入其中的东西使我疲倦失望——直至绝望，使我无法工作，我梦想着不知何样的割裂、转变、退隐。但我不会再抱怨。事实上，尽管我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太过熟悉的舞台投注着绝望的目光，我仍然有力量——不知从哪里来的——在其中做事、表演（研讨课，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出版……）但每晚我都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继续

①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明信片，无日期（1975年秋）。

② 载《文学半月刊》，第231期，1976年4月16日至30日。

③ 《六名作者，一个无名之声》，载《世界报》，1976年4月30日。

下去。<sup>①</sup>

在美国，在1976年这一年，德里达的声望迅速提高。正如保罗·德·曼的旧日学生，后来成为德里达的美国译者之一的理查德·兰德（Richard Rand）所说：“人们滥称‘耶鲁学派’的发展主要是保罗·德·曼的作为。他对学生影响很大，而且对大学之间的关系拥有异乎寻常的政治头脑。他雄心勃勃。尽管学识渊博，著述杰出，他却在某种意义上站在德里达身边，因为他立刻觉察出后者的伟大，感到他应该能够改变美国学界的框架。是他为德里达在美国成名起到了决定作用。同德里达一样，保罗·德·曼拥有斗士的性格，如果不算是好战的话。他定期在《纽约书评》  
349 上发表文章，常常十分辛辣。‘We must draw blood’（必须流血），他有时这么说。对论战的喜好也让他和德里达接近。”<sup>②</sup>

在法国，时德里达作品的接受开始于大学体制的边缘，在美国则是在一流大学的中心，并通过更为传统的传播获得了合法性，开始在更广泛的公共空间传播。正如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解释的，德里达在美国的成功并非自然而然：它首先需要经过一种“再定位”，将之从哲学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再散播于日益广泛的大学网络。<sup>③</sup> 的确，美国的环境与德里达在法国所了解的全然不同：他最早的法国读者最熟悉的参照——索绪尔的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属于他的美国听众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这些人大多数哲学知识有限，他们常常是通过德里达才发现了黑格尔、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在耶鲁，参加他研讨课的学生一年多过一年，尽管他用法语授课，所讨论的作家也极少翻译成英文，如弗朗西斯·蓬热和莫里斯·布朗肖。应该说，德里达越来越掌握美国教学的特点。研讨课通常晚上7点开始，进行到很晚，之后许多听者聚集在乔治·哈里或老海德堡等咖啡馆，一边啜饮一边继续讨论。<sup>④</sup> 其余的日子，德里达表现得极易接近。耶鲁一名教授在他去世后第二天说：“这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教授，真正改变了许多学生的生命。”<sup>⑤</sup> 这些年间他慷慨陪伴过的许多人很快在美国各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76年4月8日。

② 同理查德·兰德的访谈。在Geoffrey Hartman的自传体著作*A Scholar's Tale* (*op. cit.*)里也有对保罗·德·曼的出色描绘。

③ Michèle Lamont, "How to become a French dominant philosopher: the case of Jacques Derrid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n°3, novembre 1987, p. 584-622.

④ 同艾伦·伯特（Ellen Burt）的访谈。

⑤ *Yale Daily News*, 11 octobre 2004.

地被任命为教授，而且常常有他的支持，这有利于以后几十年间他的作品与思想的传播。

一位印度裔年轻女子加亚特里·查克拉沃提·斯皮瓦克对于德里达在美国的接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于1961年自加尔各答来，在保罗·德·曼指导下作论文，后来激动地发现了《论文字学》。斯皮瓦克花了数年时间从事这极为艰难的翻译工作。她在1973年夏天来到巴黎，几次与德里达见面，向他询问翻译中遇到的主要困难。1974—1975年间，她在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开了一门关于德里达的研讨课，并以此为出发点为自己的译文撰写了长篇介绍，于197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发表。这篇百页文章显然比其介绍的原文要明白易懂得多，它将成为几代美国大学生的教科书。斯皮瓦克的译文虽然遭到很多批评并多次修订，但这本《论文字学》的英文版（*Of Grammatology*）达到了10万册的惊人销量。

在引人入胜的《法兰西理论》（*French Theory*）一书中，弗朗索瓦·居塞（François Cusset）出色地描述了斯皮瓦克实现的“重要转向”：她将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陈述为“原文字学家”（proto-grammatologues）。

从那时起，美国人在德里达身上看到的不尽是哲学传统的异端延续者，甚至不是消解其文本的人，而更多的是其至高无上之点，由德国先行者们铺好路的批评思想的一种登峰造极的形式。……

从1976年这一年起，这些还只在理论计划阶段的东西将得到阅读、研究，并很快被主要是耶鲁和康奈尔的研究生们的一些文学课上写成论文。人们渐渐开始应用解构，从中提取出对文学经典进行新的“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用放大镜观察其机制，透过这机制，参照对象消解了，内容不断被书写本身延迟。<sup>①</sup>

在德里达眼里，除了所有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每年去耶鲁的主要因素依然是同保罗·德·曼在个人和思想上的契合。刚回到巴黎，苦恼于搁置的大量问题，他说自己充满了怀念。

我梦想着在纽黑文、月桥和贝森尼之间的旅程，在那节奏下的每一天（多么幸福，是啊！），就像梦想着我未能留住的不知什么遥远的神话。而且——每

<sup>①</sup>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op. cit., p. 122.

年都多一些——在耶鲁的时刻对我而言就像您友谊的信号，那十分罕见，十分珍贵的友谊，它不顾谨慎，或者透过谨慎，清晰而深刻地在我的心中回荡，因为有些东西在我身上日益稀少而变得更加响亮，同时友谊的空间则奇怪而危险地缩小，而另一方（我不知该如何称呼，或许是来自某种上层社会）则日益扩大并增加其网络、装置及陷阱。……

那些对我的行事或写作的热情感到惊讶的人们（有时候包括您）不是总能看到（但您能看到）这一切是在怎样幻灭、疲惫和失望的情形下进行的（我甚至不敢再说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sup>①</sup>

出版方面的压力对他大概比对别人更加沉重。他第一次与友人拥有一套丛书。但他们的决策力仍然从属于出版社的真正老板，这常常令他恼火。为了让他重视的出书计划在奥比耶-弗拉马里翁那里通过，德里达有时必须撰写长篇序言。沃伯顿（Warburton）的《论埃及象形文字》便是如此，玛丽亚·托洛克和尼古拉·阿伯拉罕的《狼人语录》更是如此。德里达1976年夏为此著撰写的长文《裁决》在许多方面意义重大。

德里达从《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起就不断向精神分析学靠拢，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尼古拉·阿伯拉罕和玛丽亚·托洛克的友谊。德里达1959年在瑟里斯-拉萨勒举办的“起源与结构”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尼古拉·阿伯拉罕。后者1919年出生于匈牙利，起初是哲学家，1958年成为精神分析学家，试图在“既无现象学者亦无精神分析学者”<sup>②</sup>涉足的领域里将胡塞尔现象学和弗洛伊德思想相结合。他与伴侣玛丽亚·托洛克也是桑道尔·费勒齐（Sandor Ferenczi）的作品在法国的主要介绍人。<sup>③</sup>

这两对伴侣之间的友好关系带来的不只是理论上的成果。1960年代末，实际上是尼古拉·阿伯拉罕和玛丽亚·托洛克说服了玛格丽特·德里达从事教学分析，也是他们向她推荐了深受韦尼克特（Winnicott）和梅拉尼·克莱因影响的分析师乔伊斯·麦克杜加尔（Joyce McDougall）。<sup>④</sup> 玛格丽特被巴黎精神分析协会接纳并不容易：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76年10月10日。

② Jacques Derrida, “Moi——la psychanalyse”, in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op. cit.*, p. 148.

③ 关于尼古拉·阿伯拉罕和玛丽亚·托洛克的更多详情，见 <http://www.abraham-torok.org/>。

④ 玛格丽特·德里达从事教育分析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在此期间她翻译了梅拉尼·克莱因的几部著作：*Deuil et dépression, Psychanalyse d'enfants*，还有 *Envie et gratitude et autres essais* 的一部分。同时她还是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aldimir Propp）的《童话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的译者，该书是叙事学的开山之作。



1974年，她的入会先是被“延迟”，这让勒内·迪亚特金非常吃惊，他是入会资格的审核人之一。在一次开会时，一名教育家可能这么说过：“您应该意识到，让德里达夫人进入就是对雅克·德里达敞开了大门。”玛格丽特在第二年被接受，在佛扬蒂纳街开了一家心理分析所，但她尽量远离撕裂精神分析界的体制斗争。<sup>①</sup>

※ ※ ※

对于德里达，为《狼人语录》撰写的长篇序言《裁决》是一个“因为各种原因而充满危险的练习”<sup>②</sup>，而且一年前尼古拉·阿伯拉罕的死为之蒙上了阴影。但此书深深吸引他，他想尽力使人了解这两位精神分析边缘人的工作。阿伯拉罕和托洛克基于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一位病人狼人的回忆录，在《狼人语录》里对这个被多次评论，特别是经拉康和德勒兹-加塔里评论的病例提出了新的解读。狼人的真名是塞尔格伊·潘克杰夫（Serguei Pankejeff），他们用全新的眼光重读了他关于梦境的记述，指出在他个人故事中起过作用的四种语言之间的游戏：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阿伯拉罕和托洛克还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我的表皮”（*écorce du moi*）和“内层”（*crypte*），某种“充满幻影的虚假无意识，亦即石化词语，活死人和异体”<sup>③</sup>。

353

《狼人语录》出版于1976年10月，获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在拉康的信徒当中，这让拉康本人颇为恼火。1977年1月11日，他在研讨课上花了很长时间抨击此书，同时清算了好几笔账。首先是关于哲学的——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但特别是：

有一样东西，我应该说，让我惊恐。就是题为“实效的哲学”的丛书。实效的哲学，以能指为实际，这恰恰是我竭力摆脱的东西。我想说，我不相信所谓的从事哲学，人们所做的总是比所认为的多，没有比这个领域更滑溜的了。你们用你们的时间也在从事哲学，而这一定不是你们最喜欢做的事。<sup>④</sup>

随后，拉康更确切地瞄准了让他“有些许惊恐”的东西——讨论起“署名尼古拉·阿伯拉罕和玛丽亚·托洛克”的《狼人语录》，就好像这是对他本人有关狼人论

①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萨拉·考夫曼的信，1976年8月6日。

③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op. cit.*, p. 602.

④ Jacques Lacan,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a mourre*, Séminaire XXIV, 1976—1977, p. 48.

我引用的是来自互联网的国际弗洛伊德协会内部资料（[emc.psycho.free.fr/lacan](http://emc.psycho.free.fr/lacan)）。发表在 *Ornicar* 第17~18期的正式版本（Seuil, 1978）有大量删减。影射德里达的部分——暗示他正在接受分析——被删除了。

述的无来由的回应。但他很快谈到他眼中关键性的东西，即德里达的序言。这是继《真理的因素》在《诗学》上发表以来拉康第一次谈到德里达，而且毫无掩饰。

354

还有一件事，我应该说，比我所知的人称我的教学和思想的传播更让我惊讶。一件更让我惊讶的事，不是正在流行的《狼人语录》，而是某个人。说真的，我相信他在接受分析——我以前不知道他接受分析，但这仅是假设。这个人名字叫雅克·德里达，他给这本书写了篇序言。他写了一篇十足狂热的序言，我从中看出一种战栗——我不知是同两名精神分析家之中的哪一位有关系，肯定的是，他把他们结合了起来。我应该说，虽然我努力过，但我还是看不出这本书和这篇序言有恰当的笔调。我在谵妄中对你们这么说，我不能说希望你们去看这本书，我甚至愿意你们不去看，但我知道你们最终会奔向奥比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哪怕只是为了看看什么是我所说的出格。<sup>①</sup>

拉康下结论说，让他“惊恐”的是他感到自己“对于打开了本来可以合上的闸门多少要负些责任”。关于德里达可能在接受分析的说法招致哄堂大笑，有人很快告诉了德里达。其他人则不吝传播流言。德里达将在《明信片》中讲到此事。<sup>②</sup>十年之后，他还将在“拉康与哲学家”<sup>③</sup>的研讨会上再次详细提及此事。

在1月11号的讲话中，拉康还抨击了雅克与玛格丽特的另一位好友勒内·马若尔(René Major)，尽管他并未点名，只说“他的教学传播到那些精神分析团体的另一个极端，并在精神分析学会的名义下发展”<sup>④</sup>。勒内·马若尔从1974年起任该学会会长。

马若尔于1932年出生于蒙特利尔，1960年抵达巴黎，通过尼古拉·阿伯拉罕认识了雅克和玛格丽特。1966年，他怀着兴奋之情聆听了《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的讲演，开始系统阅读德里达的著作。德里达这时就对他宣布：“他们会让您对我工作

355

① Jacques Lacan,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a mourre*, *op. cit.*, p. 52-53.

② “在蒙特利尔，在一次颇受关注的演讲中，塞尔日·杜布洛斯基(Serge Doubrosky)想从他认为应该让听众知情的一个新闻里获得某种效果：我可能在接受分析！狂妄的家伙，你没发现吗？……注意，我并不那么吃惊。后来，在《狼人语录》和《裁决》出版时，拉康没能抵制住同样的诱惑，就在研讨课上信马由缰（不惜后来在‘Ornicar’里的省略号下面收住脚步），流言于是变得合情合理了。”(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218.)

③ Jacques Derrida, “Lacan avec les philosophes” (1990), *Résistances—de la psychanalyse*, *op. cit.*, p. 86-87.

④ Jacques Lacan,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a mourre*, *op. cit.*, p. 52.

的兴趣付出沉重代价，我向您保证。”<sup>①</sup> 马若尔在法国精神分析运动中很快占据了独特的地位。1973年，他与友人多米尼克·热尚（Dominique Geahchan）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次年命名为“对抗”（Confrontations），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马若尔还负责奥比耶-蒙田出版社的一套丛书，题目是德里达建议的：《字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prise au mot*）。<sup>②</sup>

1970年代末，“对抗”致力于打破法国精神分析界众多团体和协会的对立。正如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所解释的，马若尔在圣雅克街精神分析学会主持的研讨课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弗洛伊德学派不同的代表人物前来讨论他们的故事、冲突和作品，而不导致分裂”<sup>③</sup>。讨论并不限于内部：马若尔也邀请知识界名流，如卡特琳娜·克莱芒、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在此情形下，“对抗”于1977年11月21日接纳了《丧钟》和《真理的因素》的作者。这场令人难忘的讲演——它将成为《明信片》的最后一部分——经过精心准备，几乎像一出戏。德里达即兴演讲的能力让听众吃惊，而其实一切都已写好，包括马若尔的发言。德里达延续了将他和拉康对立达十年之久的对话，似乎直接面对拉康，并在高超的语言技巧中抬高自己。他并不停留在与此圈子及其争议无关的哲学家的位置，毫不隐瞒自己令人生畏地了解一切。后来将自己定义为“精神分析之友”的他特别讽刺了“分片分析”（*tranche d'analyse*）的思想，还有法国精神分析界“四片”的分割。

在法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分成四片的精神分析学会，只要把它们接起来就能组成整体，并重新组合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如果是块蛋糕的话，那它并不是四分之四的。 356

每个团体……都声称是唯一真正的精神分析学会，是唯一合法拥有弗洛伊德的遗产，唯一能在其实践、教学、组成和再造中获得真正发展的学会。……

后果是，在另一个团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团体）切一片下来（它完全不是一片），这就是转切到非精神分析者身上，后者便可以反转切到精神分析者身上。<sup>④</sup>

① 同勒内·马若尔的访谈。也可参见他的著作 *Lacan avec Derrida*, Champs-Flammarion, 2001.

② 马若尔致德里达的信，1976年11月26日。

③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II, *op. cit.*, p. 608.

④ Jacques Derrida, “Du tout”,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538.

## 第 18 章 另一种人生 (1976—1977)

357 从 1960 年代初起，玛格丽特就将雅克从大部分家务中解放出来了。为了让他在最舒适的条件下工作，她担当起全部家事，包括财务问题和孩子教育。这并不妨碍德里达成为一个慈爱的、会关心人的父亲。皮埃尔讲道：“我不记得小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过很多故事，他也没有真正同我们玩耍过，但他和蔼可亲，肯为我们花时间。他很少操心我们的学业。的确，让和我一直都是好学生，他有时会为此骄傲。母亲和他一样较为自由，很少对我们说不。晚上有客人的时候，我尽可能长时间地赖着不走。我还记得那些晚上，家里有宝洛·泰弗南、萨拉·考夫曼、让·热内、让·里斯塔、卡米拉和瓦雷里奥·阿达米、尚塔尔和勒内·马若尔……”<sup>①</sup>

358 在小儿子让的记忆中，他是个几乎永远在工作的父亲。“从我们最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习惯看到他把自己关起来，我们也不曾徒劳地试图进去。他书房的门把手是垂直的时候说明他不愿被打扰。这是我和哥哥明白并且服从的信号。但在我们童年时，他比后来出差要少得多，几乎每天晚上在家。播电视新闻时，他要我们安静，然后他很乐意看部电影或电视剧。虽然他认为电视节目很差劲，但他还是应该能从中受益。我想这对他像是一种治疗。对我们他通常表现得很开放，很少干预。比如，他小心地不直接干涉我们的阅读。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永远的忧虑：我们小的时候，他害怕我们出去玩或者走得太远；后来，摩托车和毒品成了纠缠着他的问题。他发脾气总是出于焦虑，特别是当我们比预计回来得晚的时候。”<sup>②</sup>

德里达的亲友们都指出他多么想把儿子们留在身边，而且容易为小事担心。卡

---

①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 (Pierre Alféri) 的访谈。

② 同让·德里达的访谈。

米拉·阿达米还记得：“在许多方面，他的举动就像一个犹太母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让他担心，他可以打两三个电话。但他的焦虑也是情感上的。如果孩子晚上没有来拥抱他，他会立刻陷入真正的痛苦。一次糟糕的再见足以让他沮丧。”<sup>①</sup>

这让德里达如此眷恋的家庭生活从1972年起因为与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的关系而陷于混乱。德里达挣扎在这秘密中，尽可能保持谨慎，除了与哲学教育研究小组有关的会议或编辑工作之外，他从不公开与她在一起露面。只有几位密友，如吕塞特·菲纳，有时一起接待他们。但德里达的许多友人都猜出了他生活中这另外的一面。<sup>②</sup>

皮埃尔自己从十一二岁起就理解了父亲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家里有一条电话线是他专用的，一天我接起电话，结果那头刚好是希尔维亚。她很尴尬，立刻中断了谈话。不久之后发生了小说似的一幕。我同母亲和让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去巴黎。我们偶然碰到了雅克和希尔维亚，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再清楚不过。但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冲突：母亲表现得好像一切十分正常，我们同希尔维亚打招呼，仿佛她是一位同事……我记得我们甚至一起去咖啡馆喝了一杯。”<sup>③</sup>

359

※ ※ ※

在私生活方面，无论是同玛格丽特还是同希尔维亚都不大容易，他时而产生危机和忧郁感。在几封给本来就容易感到虚无的拉波尔特的信中，德里达隐约谈到令他感到瘫痪和窒息的“这张大网”。他有时表达出“开始另外的新的旅程”<sup>④</sup>的欲望。几个月之后，他还说：“生活对我也越来越沉重、艰难，几乎变得不可能。我甚至没有说起的勇气。”<sup>⑤</sup>但他开始把无法说出的东西写出来。从1956年在纽约之后，他第一次重新开始写私人日记，这对他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如果说的确有一个从未离开我的梦——不论我写过些什么——那就是写下一一些以日记为形式的东西。在深处，我写作的欲望是穷尽一切的逐日记载。我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怎样写得足够快，好留住脑海中的一切？我有时会重拾以前的笔记和日记，但每次又都放弃了。但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我想写的就

① 同卡米拉·阿达米的访谈。

② 同玛蒂娜·麦斯凯尔、玛丽-路易斯·马莱和米歇尔·德基的访谈。

③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④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6年3月16日。

⑤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76年12月24日。

是：一部“完全的”日记。<sup>①</sup>

1976年圣诞节假期开始时，雅克·德里达开始使用两个笔记本。一个小一些，记载着有关割礼的确切细节，这是1970年年末父亲逝世后不久他开始构思的“埃里的书”。另一本稍大些，是个硬皮本，其封面将重印在1990年与杰弗雷·贝宁顿合著的书中。<sup>②</sup>在一切具体计划之前，他首先为了写作的愉悦而写，“为了在机器之后重新拿起笔”，在一张印有“厚厚的，有些粗糙的”图案的纸上书写。在这内心危机的时刻，笔记很快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逐渐描绘出一部引人入胜的自传的碎片。

比如，德里达试图统计从童年起承受的所有打击，并指出它们“总是以这样同样的方式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我，也许没有什么伤害不是在某个地方同种族主义和/或反犹太主义的经验相关联的。”许多段落围绕着割礼展开，在他看来这不啻是“一条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穿越自传的好的导线”。

12月23和24日，他记下了大量笔记。一个意义重大的真正的计划渐渐形成。

如果我不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新的“风格”，新的句子，这本书就将是败笔。这并不是说应该从那里开始。相反，它在旧的语言中开始，然后引领着自己（和读者）走向一种习语，它在起初的语言里最终将是无法翻译的。<sup>③</sup>

他面对的是“《丧钟》之后”的问题，是超越《丧钟》的问题，也许是只有“艰辛地、渐进地，在很长时间里停止发表……”<sup>④</sup>才能抵达的问题。总之，德里达希望找到与迄今为止的实践完全不同的语调，抵达一种“无编码语言”。这是“古老的梦，唯一吸引（他）的梦”，他在同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和亨利·博肖的谈话中早已提到。

在这里写作，用这样的语调，让我终于能够出现在另一边，即无从辨认的一边。因为我始终是难以辨认的——彻底的难以辨认，而非人们惯常理解的意义。关于我，人们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已经读过的，没有任何东西在预料之中。我自己也不能。留在这本书里的将只有对我——对今天的我——无法辨认、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Sur parole...*, *op. cit.*, p. 18-19.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et Geoffrey Bennington,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87.

<sup>③</sup>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6年12月24日的记录，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这段文字将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割礼忏悔录》中，见 Jacques Derrida et Geoffrey Bennington,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10-111。在《割礼忏悔录》中引用的笔记片段经过了大幅度的改写。

<sup>④</sup>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6年12月28—29日的记录（夜），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

无法预测的一切。

他希望自己现在已做好准备。他在1970年父亲去世后不久即第一次计划写作，361但从未实施。割礼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该书却不应被视为一部论著。德里达想在其中讲述许多其他东西，包括在勒芒的抑郁。他将回顾死去的兄弟和“家庭里所有的沉默”。他想要最深刻地改变写作的方式。为了使这本书真正不同，他必须走出哲学话语，“讲述许多故事”，“尽情投入琐事”。

与内容无关，也不论是否有趣，同琐事的关系本身就需要改造。它在我这里被窒息、扭曲、压制。压抑它的所有“善意的理由”都应受到质疑。到底要隐藏和禁止什么呢？医生的恐惧：他将发现什么？我说的是传统的医生，甚至不是精神分析师。<sup>①</sup>

笔记中还有几处记录了梦境，伴以解析。

梦。参加全国政治会议，我发言，控诉所有的人。[同往常一样，我从不与人结盟，而是向四面八方开火——独自一人。让人恐惧的是结盟，是维持结盟的安全感。我对之真正感到恐惧，这让我的孤独毫无英雄气，倒不如说是某种胆怯和懦弱：“人们赢不了我”——寻找“逃离结盟”的一边，还有对“共同体”（communauté）的厌恶。这个词本身就让我作呕。]<sup>②</sup>

阅读这些大部分未发表的笔记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种困惑。因为，比最私密的信件更甚，这些文字介于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脆弱的界线上。正如德里达所写：“无论是362

① 个人笔记，无日期（1976年12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

② 个人笔记，1976年12月30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

这种与共同体完全对立的关系是德里达与让-吕克·南希的深刻差别之一。1983年，南希在《偶然》（*Alé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功效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的长文，后来独立成书。莫里斯·布朗肖1984年在子夜出版社出版的《不明言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里对此继续进行了思考。两人都试图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坍塌的时候重新思索有关共同体的思想。我们刚刚看到，在友人间的争论发生前好几年，德里达就抛弃了共同体的思想及其“词汇本身”。也许这个词对他来说仍然与被动的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归属联系在一起，无论这归属是种族的还是宗教的。不应忘记，许多犹太人说到“共同体”时不加以任何明确的界定：德里达从1942年起就试图逃离这一现实，以及当时所谓的“联盟”学校，还有当他结婚的时候。读者在本书第三部分里将看到，德里达晚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在设想一种摆脱了所有共同体模式的“新的国际”。

谁，不认识我，没有全部读过并完全理解我在别处写的东西的人，读这些笔记的时候都是又聋又哑的，但却会感到终于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它们。”<sup>①</sup> 这些笔记的内容常常十分私密，但德里达仍然选择将它们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在他最美的文字之一《割礼忏悔录》里，他多次提到这些笔记，并引用了一些经过部分修改的长篇段落。他在这些笔记几个月之后开始写作的《明信片》里的“发送”部分则几乎是其直接的延续。一旦知道了这些笔记的存在，就不可能忽略它们。

除了一切文学或哲学问题，德里达很明显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他感到包围自己的“灾难的气氛”让他在某些日子里无法写作。他深陷其中的感情上的分裂和必须面对的来自各方的责难唤醒了他的忧郁倾向，使他对死亡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实可感。他在12月31日记道：“我的分裂，至少在我身上的分裂，这并非超验的词汇。”

363

我是（好像）这样的一个人：从漫长的旅程（在一切之外，地球、世界、人类及其语言）归来，试着在事后写下旅行日记，用一种史前的语言和文字，一种已被遗忘的、碎片式的、粗糙的工具；试着理解所发生的事，并用石头、木片——早于聋哑学校的聋哑人手势，早于布莱叶盲文的盲人的摸索——去进行解释……他们将用这些来重新建构一切。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将感到害怕，甚至不会去尝试。<sup>②</sup>

1977年1月3日是他不愿提起的“可怕的一天”，他只说这一天“就是一个世界”。这天之后，笔记变得越来越少，到2月底完全中止，这时发生了一件他对之保持沉默的事，因为“关于秘密应该永远只字不提”，但我们可以猜想是感情方面的。

1977年的前5个月里，我能够找到的信件很少，这极不寻常。2月21日，德里达给保罗·德·曼写道，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寄去秋季耶鲁研讨课的计划，是因为“比平时更想停下来”<sup>③</sup>。显然，德里达只做必须做的事，很少写作，更少旅行。<sup>④</sup>

他6月初在牛津的居留构成了占据《明信片》一半篇幅的“发送”的出发点。这部通信集奇异而优美，后来的出版使之十分难以确定——后面我将谈到这一点，但一切都让人猜想本未有任何发表计划的原始信件是写给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的。

① 个人笔记，1976年12月24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

② 个人笔记，1976年12月31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这一段经轻微改动后重新出现在《割礼忏悔录》中，159~160页。

③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77年2月21日。

④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德里达写了《有限责任公司 abc……》（“Limited Inc abc…”），这是给约翰·R·塞尔的回复，是他最激烈的文章之一。本书第20章“发送与考验（1979—1981）”将谈及此事。



第一个片段标注日期为1977年6月3日。

是的，你说得不错，我们今后——今天，此刻，每一刻，在地图上的这一点，只是“被忽略的”残余：是我们所说的，别忘了，我们互相所做所写的一切的残留。是的，你说得不错，这些“通信”立刻超越了我们，为此本该将之全部销毁，全部，直到无意识的灰烬——而“它们”将永远毫不知情。<sup>①</sup>

日期为同一天的第二封信更加抒情。信件形式接替了私人笔记，有一种致词的意味，使作者走出独白。

当我呼唤你——我的爱，我的爱，我在呼唤你还是我的爱？你，我的爱，364  
我这样命名的是你吗，我是在对你说话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提得好，它让我害怕。但我确定，如果有一天我收到答案的话，它将来自你。只有你，我的爱，只有你将知道答案。<sup>②</sup>

6月2日，德里达偶然发现了那张著名的明信片，上面表现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它将成为全书的核心。这幅奇特的图片来自13世纪的一本占卜书，它似乎直接在对他说话，好像为了重新激起他对话语和文字关系的永恒思考。

你看到这张明信片了吗？看到这张明信片背面的图了吗？我昨天在博德莱安(Bodleian, 牛津著名图书馆)碰巧看到它，我会讲给你的。我惊奇地停下来，仿佛在幻觉中(疯了吗？它把名字弄错了!)，又如醍醐灌顶，末世的启示：苏格拉底在写字，在柏拉图前面写字，我一直都知道，就像一张存放了25个世纪的待洗的照片底版——当然是在我心里。只需要在光天化日下写出来。启示者就在那里，除非我还不知怎样解读这幅图，而实际上这是最有可能的。苏格拉底，书写者——坐着，弯着腰，顺从的书记员或誊写员，像柏拉图的秘书。他在柏拉图面前，不，柏拉图在他后面，更小(为什么更小?)，但站着。他伸着手指，看来在指示、示意、指明道路或下命令，或在口授，权威地、庄严地、专横地。几乎是恶毒的，而且是故意的，你不如此认为吗？我买下了所有的存货。<sup>③</sup>

① 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11.

② *Ibid.*, p. 12.

③ *Ibid.*, p. 13-14.

围绕着这幅图片的思考在许多信件中继续，随后，通信在6月11日他从英国回来后暂时中断。

德里达略感好转，但并未真正恢复。从于姆街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之后，他为《黄斑》(Macula)杂志写了一篇对话形式的长文，讨论凡·高关于鞋子的画作，海德格尔和迈耶·夏皮罗(Meyer Shapiro)也曾讨论过此画。这项工作让他筋疲力尽，365 他给萨拉·考夫曼写道：“我难以完成，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感到很累，对这个夏天该做的事，特别是耶鲁的课失去勇气。”萨拉也很抑郁，她常常如此。德里达建议她休息，这建议也是给他自己的，尽管他很难做到：“我们需要停顿，需要缓慢地咀嚼，需要一段‘恢复’的时间……理想的状况甚至是停止教课一段时间。”他自问是否以某种方式将研讨课中断一年。眼下，他全家要去康加德马里尼一段时间，阿达米一家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我要尽量多游泳。我身体很不舒服。我胖了(每次当我疲倦时都这样)，感到自己沉重得像一袋铅。”<sup>①</sup>

此地令他惊叹，保存完好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古迹让他印象深刻。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庞贝，一个他愿意再来的地方。但这个八月并未满足他所有的期待。也许因为他未能像和希尔维亚梦想的那样“跃到西西里岛”<sup>②</sup>，也许还因为他没能充分地放松。他在给拉库-拉巴特的一封长信里做了解释，并要他给让-吕克·南希看这封信。

我试图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工作，也让自己劳碌，但今天很难做出计划。总之，我昨天回来时……筋疲力尽，为将要发生的事感到无力—焦虑—沮丧。我10号出发去耶鲁(那边工作也很繁重)。好吧。……若利耶请我为《田野》(Champs)写篇文章，我要用《真理的因素》，前面再加一篇题为《超越快乐原则》的评论和一篇序言，全部题名为《弗洛伊德的遗产》(Legs de Freud)。我本想夏天完成，但延迟了。我还是希望10月底交稿，冬天或春天出版。<sup>③</sup>

《明信片》1980年最终的样子还远未成形。这时，《发送》还根本不在计划之中。366 1977年9月10日，德里达出发赴耶鲁，但保罗·德·曼在法国修学术年假，这让这次的停留不如往年愉快。“您在英国的影响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谬见和强硬的态度”<sup>④</sup>，德·曼对他这样说过。

① 德里达致萨拉·考夫曼的信，无日期(1977年8月)。

②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91.

③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信，1977年9月1日。

④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7年5月14日。

搁置8个月之后，德里达在10月12日即将从美国返回时重拾他的笔记本。这些个人笔记同《发送》的写作相交缠，呈现出新的“一直在寻找自我的不间断的写作”，其中自传占据着一席之地，带着抒情和常常是痛苦的笔调。

我失去了你：我不再有你，因不再有你而造成你的失去，我将你推向你的失去。

如果我说——这是真的——我在此刻失去了生命，那么它很奇特地与失去你是一样的，就好像“我的”生命就是我将之推入消亡的他人的生命。<sup>①</sup>

.....

而今天，2月份标志着一切中止的事件（又）发生了，并在事后确定下来，好像从前没有发生过，需要时间与自身重叠，永远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从怎样的秘密开始写作，我说出来也无济于事。<sup>②</sup>

德里达在耶鲁期间，里斯-奥朗吉斯的房子进行了改建，将阁楼做成了书房，需要登梯上去，在里面可以站着。今后他拥有了一处只属于自己的地方，并感到此地好像是对家人的放逐或隔断。

我把这间阁楼（它给了我，让我登上去，让我居住、工作，将我分割，哄骗我，界定我）称为我的绝顶。

凌绝的，天空之下，我升华之境的工作室和出发点，我接受的分离，我热爱的弃绝，灾难的安宁。已然渴望在此死去。于是，关上拉门。人们尊敬地把我关起来，因为不懂或不能触摸我，为了我所是的和我所可能是的而爱我。<sup>③</sup>

德里达将长期在这间很不舒服的阁楼里工作，他的美国同事们去里斯-奥朗吉斯拜访他时不由得感到惊诧。冬天，小小的电暖器起不了什么作用，德里达只得用围

367

①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7年10月12日的记录，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这一片段在《割礼忏悔录》中略微不同地重新出现，188~189页。

②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7年10月12日的记录，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割礼忏悔录》，193页。

③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7年10月14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德里达描述了关于这间顶楼和他的工作方法的一些细节，见“Je n'écris pas sans lumière artificielle”，entretien avec André Rollin, paru en 1982 dans la revue *Le fou parle* et repris sur le site <http://www.hermaphrodite.fr/article731>。

巾包住脖子，穿着罩衣有时是外套写作。耶鲁学派的大人物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表达了“他的惊奇与错愕”，当他想到“署名雅克·德里达的伟大作品”就是在这里，“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阁楼里”<sup>①</sup>问世的时候。

但目前，舒适度并不是他最在意的。在许多方面，他的新情况就好像昭示着新的生活。他寻找的是一种写作形式，让他能“在如此长时间的迷失（被谁呢？）之后找到自我”。自传比以前更加直接地进入他的作品。1977年秋，雅克·德里达开始用“旅行日记”的形式写作几篇文章，它们接替了他不再使用的私人笔记。

也许并非与此毫无关联，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1977年3月在“实效的哲学”丛书里出版的第一本书《旁白——克尔凯郭尔的观念与死亡》中，在最长的部分里采用了“阅读日记”这样极为自由的形式。她写道，这样的形式看起来“允许摸索、流浪、反复”，并“在原则上宽容某种不连贯性”。“至于其余，如果这里需要一根导线或一个指导思想的话，我们可以说，自始至终，以及在所有的意义上，一切都是关乎断裂的。”<sup>②</sup>就好像希尔维亚和雅克之间的对话通过这些年他们发表的著作延续着，但当然是以隐秘的方式。

为合著《解构与批评》所写的长篇文章《余存》（“Survivre”）的头几个词回荡着一种特别的力量，如果我们联想到德里达刚刚经过的日子的话：“但是谁在谈论生活？”而正文下面的长篇注释以这样的记载开始：“1977年11月10日，谨以《余存》纪念我的友人雅克·艾尔曼（Jacques Ehrmann）。”<sup>③</sup> 艾尔曼是第一次邀请德里达到耶鲁的负责人，而且是《文学之死》的作者……五名所谓“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自己规定的题目是每人用各自的方式讨论雪莱的诗《生命的胜利》，但德里达带有先兆性地掉转方向，更多讨论了布朗肖的《死之中止》和《白日疯癫》。

《边框》（“Cartouches”）的笔调同样阴郁。这篇文章起初题为《旅行笔记》，伴有127幅热拉尔·提图斯·卡迈尔（Gérard Titus-Carmel）的绘画，表现的是一些“棺材”，这是小小的桃花心木盒子，让人想起微型棺材，“口袋棺材”，德里达写道。第一则笔记是1977年11月30日，最后一则是1978年1月11日和12日。德里达几年之后将在《密语——致保罗·策兰》（*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里阐发对日期

① Avital Ronell, *American Philo*, entretiens avec Anne Dufourmantelle, Stock, 2006, p. 250.

② Sylviane Agacinski, *À part. Conceptions et morts de Sören Kierkegaard*, Aubier-Flammarion, coll. “La philosophie en effet”, 1977, p. 112-114.

③ Jacques Derrida, “Survivre”, *Parages*, Galilée, 1986, p. 119. 此文第一次用英文发表于合著《解构与批评》中，合著者还有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雷·哈特曼和哈洛德·布鲁姆（New York, Continuum, 1979）。它被视为耶鲁学派宣言。在整篇正文之下以日记形式出现的无尽脚注将变得极其著名。

的思考，但此时，在这些篇章里，“唯一一次”和“密室”的主题就强有力地提出了。

1978年1月7日。

当日期本身成为一间密室，当它作为秘密之地，他们终将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日子写下这些吗？骰子的一掷。

这个字也有被给予的意思（*le date, le datum*）。有今天的日子，他们将对给予生命的——以及从生命被拿走的——永远一无所知。

日子本身将成为秘密之地，成为唯一留下来的，除了心灵之外。<sup>①</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Cartouche”,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Champs-Flammarion, 1978, p. 275-276.

# 第 19 章 从“新哲学家” 到哲学大会 (1977—1979)

369 从电视节目《呼语》（“Apostrophes”）于 1975 年 1 月 10 日开办之日起，法国媒体界发生了巨大转变。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每周五晚九点半在电视二台主持的这个节目很快在文学和知识界占据了重要位置。一名作者只要出场就常常带来销量的剧增，而表现出色则能将一部难读的书变成畅销书。

这个节目很快颠覆了出版界的做法，并有利于新一代作者崭露头角。他们伴随电视成长，擅长对之加以利用。他们绕过传统的正名渠道，想要直接面对大众。他们同《呼语》的利益一致，不只在传媒方面，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贝尔纳·皮沃来说，重要的不是书，而是书激发的辩论。这有助于对当时重大问题的讨论，例如集权主义。索尔仁尼琴（Soljenitsyne）是最早的嘉宾之一，其《古拉格群岛》于 1974 年被翻译成法文，影响巨大。而“新哲学家”们则总能让《呼语》成为有利的讲台。<sup>①</sup>

370 1977 年 5 月 27 日，皮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发射平台，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题为《新哲学家是左派还是右派？》。出场的一边是贝尔纳-亨利·莱维、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莫里斯·克拉韦尔（Maurice Clavel），另一边是弗朗索瓦·奥布拉尔（François Aubral）和格扎维埃·德尔古（Xavier Delcourt）——《反对新哲学》（*Contr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的作者。“新哲学家”们的表现被认为比其对手更加出色。莱维的第一本书《人面兽心》从第二天起就销量

---

<sup>①</sup> 关于法国出版和媒体界的变化，见 Olivier Bessard-Banquy, *La Vie du livre contemporain. Étude sur l'édition littéraire, 1975—2005*,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 du Lérôt éditeur, 2009, ainsi que *Les Intellocrates* d'Hervé Hamon et Patrick Rotman, Ramsay, 1981.

激增，很快达到8万册。

“新哲学”获得大型媒体包括《世界报》和《新观察家》的大力支持，它剧烈地撕裂了知识界，特别是这些年轻作者中有好几位出身于高师，曾与他们攻击的人为同学。安德烈·格鲁克斯曼1975年在瑟耶出版了《女厨师和食人者》（*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米歇尔·福柯和友人莫里斯·克拉韦尔都对他表示了支持。从中国回来后不久便与毛主义决裂的菲利普·索莱尔斯与贝尔纳-亨利·莱维结成了真正的同盟，一以贯之地为他的作品辩护。罗兰·巴尔特也对《人面兽心》表示支持，在《文学新闻》（*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上发表了早前致作者的信。而吉尔·德勒兹则在一个小册子里喊出了自己的愤怒，题为《关于新哲学家和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他开门见山，认定“他们的思想一无是处”。

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运用的是粗糙庞大，如同龇齿一般的概念：法律、权力、主人、世界、反叛、信仰，等等。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粗糙的混合，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律与反叛者，权力与天使。与此同时，思想的内容越是贫乏，思想者就越是重要，相对于空虚的话语，说话的主体也就越发自视甚高……以这两种方式，他们毁了自己的工作。……虚荣的作者或空虚的主体、刻板简略的概念大举回归，这代表着一种可恶的倒退力量。<sup>①</sup>

在文中，德勒兹将“新哲学家”的行为同哈比改革相比：这两种情形都构成了 371  
“对哲学‘方案’的严重削减”。但对他来说，比莱维或格鲁克斯曼更加重要的是这一“销售行为”给知识界带来的深刻变化：“它实际上代表着一切思想屈从于媒体。与此同时，它给予这些媒体最低限度的保证与精神上的安宁，以免创新的尝试令其自身产生改变。”

德里达宁愿远离争论。但在夏末，让·皮埃勒请他为自己正在筹备的《批评》专刊撰稿，主题是《今天哲学还有什么用？》，并且并不隐瞒这个想法源于“自称‘新哲学家’的所谓研究工作的无耻的、令人作呕的和滑稽的炫耀”。皮埃勒起草了一份“语气相当中性”的问卷，将它寄给了许多他尊敬的哲学家和“很多十分年轻的作者”<sup>②</sup>。受到邀请的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犹豫是否参与。德里达希望他们和他本人都不参加这期杂志的撰稿，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同谁一起出现，

<sup>①</sup> Gilles Deleuze, *A propos des nouveaux philosophes et d'un problème plus général*, supplément gratuit au n°24 de la revue *Minuit*, mai 1977.

<sup>②</sup> 皮埃勒致德里达的信，1977年8月29日。

也不知会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

我不想指责皮埃勒（那会有太多的话说，我离开《批评》并非没有仔细考虑过他的做法所产生的效果，但这并不重要），肯定的是，很久以来他在“我们的”方向上没有做过任何积极的事，他主要的动机就是反对“新哲学家”，而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并不一定坚持这一点……

在一封信里无法即刻对制造出巨大的新哲学泡沫的舞台进行分析，但我想我们可以就一点达成共识：今天，主宰此舞台或从中获利的力量因在此前行的一切以及所有的大喊大叫而越发壮大，哪怕那些喊叫是为了攻击。某些明确的表面上的沉默，某些冷静的坚持，在别的地域有时可以更为有效，更令人生畏。<sup>①</sup>

372 几天之后，德里达以相当不同的口气向皮埃勒重提此事。的确，他对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新哲学家”的问题十分敏感。当然他也自问什么能够成为“最有效、最恰当、最政治性的，也是最肯定的分析与答复”，能够超越这“阴暗现象”让他感到的“恶心”。他即将赴美国五个星期，那边的工作计划也已满满当当。但如果要写些东西的话，德里达希望是严密的分析，真正去评估他认为深刻而重要的现象，“无论其中的作品及其参与者表现出怎样的贫乏”。

或者正因为这贫乏，在一个对其明显有利并规定着当今一切公共交流的力量场里，新哲学的马戏能够轻而易举地增加力量和地盘，总之从与它相关的一切中获利。……您知道吗？新哲学在所有媒体工具上都拥有——这并非偶然——强有力的高音喇叭，从《玛丽-克莱尔》到《新观察家》，从《花花公子》到《世界报》，从法国文化电台到法国电视一台、二台、三台，还不必说其他更让人吃惊、关系更密切的出版机构。……所有这些现象，虽然没有任何“哲学”意义，却让我间接地感兴趣。它们至少值得写一篇长篇复杂的分析，触及一切，并上溯到更远。<sup>②</sup>

尽管从根本上说德里达与德勒兹的立场无甚不同，他却不同意后者在其小册子中提出的策略。但他不久对丹尼尔·乔瓦南杰里（Daniel Giovannangeli）——撰写了

①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信，1977年9月1日。

② 德里达致皮埃勒的信，1977年9月9日。



第一篇关于德里达的论文并在列日大学答辩——吐露，“新哲学家”的言论使他想就马克思写些东西，但又补充说，他不会写，因为这将给他们带来其不配得到的增加值。<sup>①</sup>几个月之前，他曾在《复式书写》的一篇访谈中称：

您知道我在面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或假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泛滥时保持着怎样的冷漠，即便它是恐怖的或唬人的，而且有时离我经过的领域很近。我认为今天那些相信自己终于登上“后马克思主义”大陆的人更加不值一提，更加反动。他们有时是同一批人，对此谁会吃惊呢？您了解这新的巴黎共识，以及所有在其中纠缠的利益。<sup>②</sup> 373

在此期间，德里达和“实效的哲学”三名合作者的出版工作在奥比耶-弗拉马里翁那里继续，并常常是在困难的情形下。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集体著作《谁害怕哲学？》以口袋书小开本出版，销量很快突破1万册，但丛书的四位负责人难以让出版社接受他们最重视的作品。1978年4月4日，德里达在给奥比耶-加巴耶（Aubier-Gabail）夫人的一封长信里苦涩地抱怨了这种情况，她是位于孔蒂胡同的奥比耶出版社的负责人，“实效的哲学”丛书的所有作品今后都由那里经手。他刚刚知道她拒绝出版沃尔特·本雅明的一部重要作品《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起源》，也排除了所有其他翻译计划。而在丛书编辑的眼中，一些对他们的战略和研究重要而有益的国外作品 374

① 同丹尼尔·乔瓦南杰里的访谈。这篇论文的修订版于1979年出版于“10/18”丛书，标题为“Écriture et répétition, approche de Derrida”。

② Jacques Derrida, “Ja, ou le faux-bond”, entretien avec D. Kambouchner, J. Ristat et D. Sallénave paru dans *Digraphe* n° 11, mars 1977. 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76.

贝尔纳-亨利·莱维和德里达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以为的更加紧张和暧昧。在1974年5月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因而远在《人面兽心》使之出名之前），莱维抨击的更多是弟子而不是导师，他肯定地说德里达“不是一名精神导师”：“有德里达的信奉者，但没有德里达主义。雅克·德里达有弟子，但他不是精神导师。这也许就是他文本中巨大的模糊性及其深奥难解的钥匙。德里达主义者？他们有点像新时代的女学究。这是一个奇特的哲学种族，围绕于姆街和《先锋杂志》旋转。他们说着大师的语言，模仿他最微小的举动。他们用‘a’写‘différence’，在文章里阅读希腊文。他们去参加研讨课就像别人去参加弥撒或逛街：为了寻找圣体或最新潮的概念。今天是‘处女膜’，昨天是‘药’，前天是‘元一痕迹’。您不明白吗？人们回答您说，没什么好明白的，因为这不是‘概念’而是‘文本工作’……”根据莱维的说法，德里达解构的真正要害仍然在于政治：“它们触及我们理论形势的最敏感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身份。在人们大言超越它的时代，德里达也许第一个谈到了溢出。”在《马克思的幽灵》问世20年前，这种说法并不那么不受欢迎。莱维总结道：“确实，拜占庭主义有其好处，产生了无可怀疑的效果。德里达孤独固执的工作从今以后可归于伟大的锤子哲学的传统。这些辛辣、粗暴而严厉的哲学首先是大举去神秘化的哲学。这些可怕而冰冷的思想对它们置身其中的妥协主义发起攻击。在意识形态的集市上，德里达式的大锤也许是我们的严格标准之一。”

显然应该列于丛书当中。“本雅明的作品便是如此。为此我更加惊讶——无疑是无限的惊讶，这样一部在许多方面具有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在全世界被引用，在法国却令人羞耻地不为人所知。”<sup>①</sup>

对这个问题，就像对德里达提出的其他困难那样，女出版人做出了尴尬的回答。一个月之后，大部分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他不满“实效的哲学”转到奥比耶，要求回到总社，在那里物质支持应该更有保障。亨利·弗拉马里翁已经表示原则上同意，应该能很快转到拉辛街。但地址的变化远远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德里达仍然是出版社的主要对话者，他难以忍受各个部门间的程序。1978年8月7日，他对萨拉·考夫曼抱怨此事，她的著作《谬差——奥古斯特·孔德的女性转变》应在不久后出版，他本人的《绘画的真理》也应在“田野”丛书中直接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但大量插图使之变得棘手。“我从那里出来时筋疲力尽，不过放心了。希望我们不会再失望。如果仍然如此的话，我明年就不干了。”<sup>②</sup>

375 接下来的几个月，事情并没变得更容易，而是恰恰相反。对拉库-拉巴特的书《哲学的主体：文型学1》，印刷厂弄糟了引文中所有的希腊文，使得出版不得不推迟。南希和拉库-拉巴特鞭长莫及，并疑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值得费心负责这套丛书。<sup>③</sup>德里达难以忍受这常常没有回报的工作，也说自己“疲惫，失望，沮丧”，而且很不幸地完全无能为力。在弗拉马里翁遇到的问题，他说在瑟耶、子夜、法国大学出版社也曾遭遇过。他想与拉库-拉巴特深入探讨此事。可惜同萨拉是不可能的：“她对我，同我，比以往更加‘难以相处’（怎么说呢？）。这显然不能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我感到很疲倦，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如此重复而无效。”<sup>④</sup>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里达不愿想象把他们的丛书转到另一家出版社。“其他地方，别忘了，那会是（弗朗索瓦·）华尔或（让·）皮埃勒：这两种情形都更糟。”因为问题的根本是经济上的，同后来的公众意见相反：“实效的哲学”丛书难读难卖。

至于《上帝的遗嘱》（贝尔纳-亨利·莱维的新作）则不会有任何延迟，我猜这不仅因为书里没有希腊文，而且，你知道，其出版与“推销”的全部条件都不一样。只要我们不是给所有人写作普瓦罗-戴尔佩奇及其所代表的东西，我们就会在艰难且几乎不可能的境地中挣扎。……

现在，需要保留我们的丛书吗？这显然是你對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我

① 德里达致玛德莱娜·奥比耶-加巴耶的信，1978年4月4日。

② 德里达致萨拉·考夫曼的信，1978年8月8日。

③ 让-吕克·南希致德里达的信，1979年4月22日。

④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无日期（1979年4月）。

应该说，也是我长久以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的分析和计划并不一定完全重合。无论怎样，必须每人做出选择，承担责任。我个人从未有过哪怕是微小的动力去主持（哪怕是集体的）一套丛书。后来将我推向这一任务的兴趣并非出于个人原因，你应该知道。（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便捷，舒适，权力……）因此，没有个人兴趣，相反——以某些个人兴趣为代价——让我感兴趣的是理论——政治目的，是的，我想这也是你们感兴趣的。……只要你们对此不再确信，就有足够的理由放弃；而且这样的话我将走上符合我自己口味和节奏的最“自然”的坡道。<sup>①</sup>

尽管有这样一条“自然的坡道”，德里达还是感到必须重新加入战斗保卫哲学。哈比改革虽然在1975年6月投票通过，但被延迟，却也没有就此被放弃。它会在1981年秋季开学时实施，因此必须对此做出反应。1979年3月，21位名人（包括弗朗索瓦·沙特莱、吉尔·德勒兹、让-图桑·德桑蒂、伊丽莎白·德·丰特奈、弗拉基米尔·扬科勒维奇和保罗·利科）发出了召开哲学大会的呼吁书。罗兰·布吕内是发起者，但若没有德里达的持续参与，事情永远不会产生如此大的规模。呼吁书很快收集到2500多个签名。

6月16日早晨，哲学大会在索邦大学的大阶梯教室召开。来自法国各地的大约两百人参加了该会议。唯一的缺憾是，学生很少：选的日子确实不是很有利。从斗争一开始就与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站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扬科勒维奇揭开了序幕。他明言“哲学教育的存在本身遭到了威胁”，并赞扬罗兰·布吕内和雅克·德里达的“明智与勇气”。当然，在眼下，危害分子是很狡猾的：“人们似乎并不想损害哲学，而只想给它带来好处：人们想使它‘现代化’，为它掸去灰尘，将它的窗口打开，使之朝向‘现代世界’。”但“这些甜美的诺言”背后的目的是逐渐削弱哲学的地位，减少哲学教师的人数。<sup>②</sup>

德里达随后发言，以“个人名义”阐述了哲学的应有之义。他当然反对哈比改革，呼吁为所有的高中毕业班保留至少四个课时的哲学，但他特别阐述了他最关注的想法，即“将哲学教育至少延伸到整个高中第二阶段”。不幸的是，他忍不住再次掀起了另一场战争，即两三年后将大学里的哲学家同时髦的年轻思想家们相对立的战争。德里达小心地不点出对手的名字，但每个人都听得出来，特别是贝尔纳-亨

①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无日期（1979年4月）。

②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Pour la philosophie”, in *États généraux de la philosophie*, Champs-Flammarion, 1979, p. 23-26.

利·莱维在大会两周前又一次引人注目地在《呼语》节目里出现。

今天，无论是稍微清醒些的哲学家，还是在这些领域（出版、报刊、电视）里多少有些辨别能力的人，没有一个敢于援引这些人来见证哲学的活力或要求，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出现在最醒目的平台上，在各种演播室里嘈杂地宣讲哲学。在那里，从最近一个十分确定的日子以来，嗓门最高的讲话者发现人们递来的话筒最多，却不问问（在最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突然向他们提供栏目与频道，让他们这么说，而且只说这个。<sup>①</sup>

反诘很快来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是小组讨论，星期日下午举行了一次新的全体大会，由让-吕克·南希主持，进行综合和总结。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激烈的事件。

贝尔纳-亨利·莱维同一小群朋友来到会场，其中有多米尼克·格里索尼（Dominique Grisoni），他是1976年的集体著作《哲学的政治》的主编，德里达与沙特莱、福柯、利奥塔和塞尔都曾参与撰稿。莱维本人承认，他们对哈比改革不感兴趣，他们来到大会就是为了打仗。“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两年来不断地以各种立场反对我，”  
378 莱维后来讲道，“我把他们视为敌人。我对自己说，有两种保卫哲学的不同方式。这是当时我在很多场合发言的主题。我那时在同大学交战，大学反过来也与我彻底交战。”<sup>②</sup> 多米尼克·格里索尼首先发难，从会场后面打断德里达的讲话。有人建议他像其他发言者那样使用话筒，但大部分听众想继续会议程序，立刻开始嘘他。格里索尼无法使自己的声音让人听到，莱维于是试图“为同志报仇”。“我下来走近讲台。我想上去抢过话筒，一边推开反对的人群。德里达本人也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我们动起手来，就像他和我打架斗殴的少年时代。”<sup>③</sup>

这混乱的一刻之后，让-吕克·南希宣布“请贝尔纳-亨利·莱维发言，如果大会愿意听取的话”，但他反复了数次，讲台上的人才同意莱维上来。下面的场景出现在不久后发表的书中，值得援引。

**B.-H. 莱维：**我惊讶地看到，当有人（人们让我发言，我会发言的）在这里

---

① Jacques Derrida, “Philosophie des états généraux”, in *États généraux de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37.

② 同贝尔纳-亨利·莱维的访谈。

③ 同上。

发言，为了做出解释，为了讨伐哲学体制，为了讨伐这些人——这些多年来适应了这体制，只在感到威胁时才做出反应的人——的时候，人们却不让他发言。……我很惊讶，当人们建议我发言的时候，某些人前来拿走我的话筒制造事端。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要说的。昨天，我惊讶地听说有人声讨媒体：你们相信最早揭发苏联劳改营的人是哲学教师吗？是电视和媒体。你们相信一年前博列日涅夫来巴黎那天，格鲁克斯曼是以哲学教师的身份将他的“自由论坛”交给了东欧的三名不同政见者并掀起轩然大波的吗？是媒体。不是哲学大会。我很惊讶，今天，马来西亚政府把76 000名越南人扔进大海，而这里只字不提。379

我很惊讶，就在包括哲学教师蒙多罗尼（Mondoloni）在内的科西嘉活动者们上国家安全法庭的前一天……

**德里达：**已经讨论过了。不要信口开河。

**B.-H. 莱维：**好极了，那我订正一下吧。那就说我很惊讶有人说要警惕媒体。以前人们说的是警惕法西斯。如果就为这个而召开哲学大会，我不仅吃惊，而且极为失望。

**S. 阿加辛斯基：**我只想对B.-H. 莱维说一句话。他昨天就在场，但认为单独一人不适合发言。今天他和朋友一起来了，他们对着会场叫喊，为的是破坏会议，重新把持这次行动。<sup>①</sup>

关于以后发生的情况叙述不一，从记录了这两天的发言与辩论的书中只能了解一部分，有些“听不清的”片段无法记载下来。莱维在今天仍然确定说自己被“清退出场”，然后被“扔到索邦街上”。几个月之后，在《精神》杂志组织的一次圆桌讨论中，德里达给出了十分不同的版本，说这是一次“短促轻微的推搡”，然后补充道：“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但我本来不会在这上面耗费太多时间，如果我不是刚刚听说，按照索莱尔斯和B.-H. 莱维的一次谈话说，莱维在大会上可能遭到了‘毒打’。‘毒打’！希望这位能言善辩的人权捍卫者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并衡量其后果。”<sup>②</sup>

由于大会参加人数众多，媒体报道广泛，德里达不得不第一次接受拍照，或者至少是妥协了。在此意义上，这两天的会议也标志着一个转折。但德里达与报刊的关系仍然艰难。大会之前不久，他拒绝《早报》刊登卡特琳娜·克莱芒对他的采访，因为对稿件不满意。她并不对他隐瞒她的不快：这篇采访本应是大会深度报道的关键文章，她感到受辱的是，“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随意性”，德里达“单方面且无

380

<sup>①</sup> *États généraux de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205 - 206.

<sup>②</sup> “Qui a peur de la philosophie?”, in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548 - 549.

任何讨论可能”地撤下了稿子。

记者的职业您显然并不了解。……大学教师们蔑视有时仇恨记者，您就是其中之一。……您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这并不赋予您任何权力去蔑视也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我还认为您走不出这条死胡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很清楚，您同报刊的关系充满了不快，而人们能猜到为什么，如果您到哪里都采取同样的做派的话。<sup>①</sup>

在许多方面，卡特琳娜·克莱芒一语中的。同布尔迪厄一样，德里达对报刊媒体的不信任将持续很久，让“新哲学家”毫无顾忌地占领了这块地盘。<sup>②</sup>

但此次事件绝不限于这些轰动一时的花絮。在体制层面上，大会表现出的深广的行动力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在电视上，国民教育部部长在6月16日晚肯定地说，不理解是什么——在尚未颁布的实施法规中——能够令哲学如此不安，应该存在着信息不畅或误解。<sup>③</sup> 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布吕内的努力并非完全徒劳：尽管哲学教育研究小组最具创新性的想法被当作纸上谈兵，但是至少哈比改革不再可能，毕业班的哲学教育也将长期得到保护。

---

① 卡特琳娜·克莱芒致德里达的信，1979年6月22日。我深深感谢克莱芒，她在最初的犹豫之后同意发表这封很有说服力的信。

② 对此现象的深入分析见 Geoffroy de Lagasnerie, *L'Empire de l'Université. Sur Bourdieu,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journalisme*, Éditions Amsterdam, 2007.

③ <http://www.mediapart.fr/club/edition/les-invites-de-mediapart/article/050210/defense-de-philosopher>.

## 第 20 章 发送与考验 (1979—1981)

1979年6月23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彼得·斯丛狄的专题讨论会上，德里达遇到 381  
了一个人，其重要性将很快显示出来。他立即在《明信片》的《发送》部分里讲述道：

离场时，有各式引见与介绍。“同您已经不能做自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子（我认为）对我说。她让我明白她已经读过（在我之前，因此她来自美国）《我，精神分析》一文，我在其中用英文让难以翻译的词汇相互产生作用，如表现、表演、“介绍”，等等。我坚持要知道她的名字（说“坚持”有点过分了），她只说“形而上学”，拒绝多说一字。我感到这个小游戏相当有力量，也从这轻忽的交流中感到她已走得很远（人们后来对我说她是“德语学者”）。<sup>①</sup>

阿维塔尔·若奈尔（Avital Ronell）对此场景的叙述略有不同：“我同我的朋友，策兰的遗孀吉赛勒·策兰-莱斯特朗日一起来参加会议。当时我的身份颇为模糊：我多少还算是学生，尽管已经开始教书。对这一天的见面我没有准备。我没想到房间里人这么少。休息时，德里达过来问我是谁。我不知为什么要回答他：‘可是……您不认识我吗？’他看着我，有些尴尬：‘哦……不，我想我不认识。’我追问：‘真的 382  
吗？这可不好。我就是形而上学。’我把自己扮演成他文章的效果。他有些惊讶和迷茫：‘哦，您就是形而上学？’……我陷入自己的游戏，不得不继续。我又说了些话，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nvois”,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211-212. “Moi, la psychanalyse” 第一次以英文出现在 1977 年春季号的 *Diacritics* 中，后收入 *Psyché*。

诸如：“是的，我不太喜欢您至此为止对待我的方式……”<sup>①</sup>

阿维塔尔·若奈尔 1952 年出生于布拉格。她的父母是以色列外交官，从 1956 年起在纽约生活。她在那里开始学业，后来进入柏林自由大学，师从诠释学教授同时也是拉比的雅各布·托布斯（Jacob Taubes）。1979 年，与德里达相识的那年，她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在很短的时间里，阿维塔尔·若奈尔成为与德里达派联系密切的人物，也是最独特、最有力的人物之一。她解释说：“我那时在研究歌德和爱克尔曼（Eckermann）。爱克尔曼的形象让我着迷，他懂得记录大师的话，让他安心和开心。我崇拜爱克尔曼那种极其完美的被动。不久之前，伽达默尔对我说我需要找到一名导师，一位真正的思想者不能不依靠一名导师。因此，我大概在幻想成为德里达的爱克尔曼。很快，我认为我看到并理解了他巨大的孤独，我想向他的方向抛出一条绳索。当时他的名气正在迅速提高。德里达多多少少有意识地构建了一个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我能够扮演‘德语事务部部长’的角色。我申请这并得到了个职位。在好几年间，我们有过许多高水平的交谈，讨论歌德、克莱斯特（Kleist）、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卡夫卡（Kafka）。”

《论文字学》的英文版自 1976 年出版以来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两年之后，383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兰·巴斯的《书写与差异》的出色英译本。<sup>②</sup> 此后解构大行其道，德里达到处受邀。1979 年夏末，他在北美展开了一系列讲演，由 16 岁的长子皮埃尔陪同。后者回忆道：“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显示出的精力。我们几乎每天换一个城市。每次都要乘飞机，吃早餐，作长篇讲演，然后通常是酒会和持续到深夜的晚餐。真正是摇滚歌星的节奏。几天之后我已疲惫不堪，这让我父亲非常吃惊。他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神采奕奕。我感到旅行让他精力无穷。”<sup>③</sup>

这并不妨碍皮埃尔对这次旅行留下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在芝加哥和耶鲁同保罗·德·曼的见面。德里达也说他很喜欢这次经历：“十分独特，丰富，而且最终非常神秘。”<sup>④</sup> 但皮埃尔只参加了旅途的一部分，随后便回到里斯-奥朗吉斯准备开始毕业班的学业。从 9 月 24 日起，德里达在耶鲁进行了三周的研讨课，题为“比较文学

①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② 收到此书后，德里达向阿兰·巴斯表达了诚挚谢意，感谢这部译作“堪称典范的智慧、严密和贴切，还有其清正与慷慨。……一本书在美国的翻译仿佛重生……这全因为您”（德里达致阿兰·巴斯的信，1978 年 11 月 23 日）。阿兰·巴斯从这时起虽然成为精神分析师，但他还是在 1980 年代初翻译了德里达好几部重要著作——《立场》、《边缘》和《明信片》。

③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④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无日期（1979 年 12 月底）。这次见面在《记忆：致保罗·德·曼》中曾提及，Galilee, 1988, p. 18。



的概念和翻译理论问题”。之后到蒙特利尔进行了一场题为“尼采的耳朵自传”的讲演，又停留了两天，同一些对他最感兴趣的人进行自由讨论，如克洛德·列维斯克 (Claude Lévesque)、克里斯蒂·麦克唐纳 (Christie V. McDonald)、欧金尼奥·多纳托和鲁道夫·加什。<sup>①</sup>

雅克和玛格丽特都慷慨好客。许多同事、译者甚至学生经常被邀请到里斯-奥朗吉斯的家中。1979年圣诞节假期，阿维塔尔·若奈尔好几次来做客。还不到17岁的皮埃尔是个优秀的年轻人，热爱音乐和文学。他和阿维塔尔很快开始恋爱。雅克惊讶而不安。虽然思想自由，他仍然为他们的年龄差异而担忧：阿维塔尔比皮埃尔年长11岁。德里达还发现她过于眷恋自己的圈子，皮埃尔则渴望独立。“父亲和我之间从未十分亲密，”他回忆说，“成长期间，我试图与他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但我们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身体上。很早我就感到保护自己的需要，对几乎所有对我重要的事都保守秘密。我同阿维塔尔的事让这一切暴露出来。我想在会考后离家一年，这让他觉得无法理解。我对上高师文科预备班犹豫不决，考虑休息一年，这更让他担忧。他请我们共同的朋友——很久以来我就主要与比我年长的人交往——试着说服我改变主意。不过在学业上他们达到目标了。”<sup>②</sup>

384

阿维塔尔·若奈尔证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至少在一开始时并不简单。“雅克担心我和皮埃尔的关系，就像他担心所有与孩子们有关的事。他的担心肯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同时，我同皮埃尔的关系也标志着我进入这个家庭的一种方式。玛格丽特对我总是表现出无比的慷慨。”1980年6月，刚刚以极为出色的成绩通过会考，皮埃尔就同阿维塔尔住进了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巴黎的旧公寓。阿维塔尔将被德里达的信徒们继续长时间称为“形而上学”。她回忆道：“对我，这些在巴黎度过的几年对应着一场美梦。如果在别的情况下，和别的主人公在一起，这个故事则很可能变成肥皂剧。我同德里达在家庭的私密范围和精神生活的两极之间绕行。我们的关系十分沉重，有时十分复杂。我在那儿常常为了逗他笑，像个小丑。因此，我有权向国王说出真相。奇特的是，虽然有一家人的亲近感，但我们还是继续以‘您’相称。在我心里，这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您’，它标志着更加真实的亲密。”<sup>③</sup>

※ ※ ※

德里达在1979年夏初赴美国之前完成了《明信片》。为了整理《发送》部分，他

385

① 讲演和讨论会将以《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为题出版，蒙特利尔，VLB，1982。

②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③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买了一台电动打字机。在长长的爱情通信集中，德里达重新找到了自己最初的欲望，即朝向“文学比哲学能更好地接受的东西”，一种“习语的书写，（他）了解其可望而不可即的纯粹，但仍继续幻想”<sup>①</sup>。原始信件均已消失或无法得到，所有的猜测都被许可甚至得到鼓励。“您不妨把它们视为——如果您愿意的话——新近销毁的信件的遗迹”<sup>②</sup>，德里达在前言里这么说。文字常常叙述其构思过程，但乐于搞乱路径。这些信件应该提前避开“所谓起源式评论的核心。不会留下任何草稿让人理清踪迹”<sup>③</sup>。

《发送》说尽了一切，但它设下了微妙的圈套，让人永远无法判断私密与公开、经验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这并不妨碍德里达在文中留下“各种参照：人名和地名，真实的日期，真实的事件，它们紧闭双眼冲来，以为终于抵达目的地并找到了我们，而我一辨道岔把它们送往别处，看看我们是否还在那里”<sup>④</sup>。从大量原信中，德里达只撷取了些片段，因为他自定的规则是只留下能够同全书的其他三篇文章——《思辨——关于“弗洛伊德”》、《真理的因素》和《关于一切》——“相互组合”的东西，就好像《发送》只是一篇长序。当然，没有什么能保证有些信件不是专门为了此书而在事后撰写的。

386 让-吕克·南希收到《明信片》几乎完整的手稿之后第一个做出了回应。他与萨拉·考夫曼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同时收到手稿，这很正常，因为作品应当列入他们的丛书。书稿虽然很长，但他还是很快读完了，特别是《发送》部分，感到“被吸引、捕获，时而很感动”。“无论编委会如何决定，我都要说此文感动了我。仿照你的用词：它触动了我。就是如此，触动（也是抵达目的地），亦即一部有关触感与皮肤的文本。”南希承认“几乎感到遗憾《发送》没有独立成书”，尽管他知道这样的话此文将改变身份，离开哲学而成为文学。<sup>⑤</sup>但他并不是唯一如此想象的人。

《明信片》实际上是一部精心构制的作品，也同《丧钟》一样有力地一分为二，只不过从视觉上看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同样的问题贯穿全书，“在邮局和分析行动之间，在快乐的原则和沟通的历史之间，在明信片和被窃的信之间，简言之，是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的转移，以至更远”<sup>⑥</sup>。但在占据了前一半篇幅的《发送》和其后的三篇文章之间，写作机制和阐述方法几乎截然相反。《思辨——关于“弗洛伊德”》源于在高师的题为“生死”的研讨课，是对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的一篇细

① 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27.

②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7.

③ *Ibid.*, p. 248.

④ *Ibid.*, p. 191.

⑤ 让-吕克·南希致德里达的信，1979年7月22日。

⑥ *La Carte postale*, op. cit., 封底。

致而引人入胜的分析，其中也谈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真理的因素》是对《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课》的细致的再解读，但这篇重要文章也与全书其余部分相唱和。全书以《关于一切》作结，这是与勒内·马若尔的佯作偶然的相遇，首次发表在《对抗》杂志上。能够真正阅读这四篇文章并将之相结合的读者十分罕见，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

《明信片》的翻译任务将比德里达除《丧钟》之外的其他作品更为艰巨。第一次读到此书时，已不是新手的阿兰·巴斯感到与把乔伊斯翻成法文同样复杂。德里达承认《发送》藏有许多机密，并同意在必要时为他提供说明、解释和建议。“这份工作主要以通信完成，”阿兰·巴斯回忆道，“他把我的稿子寄回来，加上许多批注。但我们至少在火车站餐厅，趁他换乘的机会，有过一次长长的会面。有许多细节如果不是他提醒我注意的话就溜走了。比如，在‘是否不说出一个名字？（Est-ce taire un nom?）’这句话里还应该读出‘埃斯泰尔’（Esther），这是他母亲的一个名字，也是在书中很重要的一个《圣经》里的名字。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许多这样的效果还是在译文里消失了。”<sup>①</sup>《明信片》的德文译者汉斯·乔辛·麦茨格（Hans Joachim Metzger）也将投入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德里达给他写道：“读到您的问题时，我又一次发现您比我更好地阅读了此文。这就是为什么译者绝对令人难以忍受。他越是出色就越让人害怕：他就是一个具体的超我。”<sup>②</sup>

387

※ ※ ※

1980年冬末，德里达将《明信片》题赠友人，他似乎一成不变地使用了“致你”这样的说法，带来些多余的误解。每位读者，尤其是女性，都感到该书是写给自己个人的。伊丽莎白·德·丰特奈出色地描述了此书引起的困扰。

面对《明信片》，我感到自己就像勃朗特（Brontë）姐妹笔下的英国老姑娘，出于爱情而爱着。这同在阅读中过着间接生活的事实毫无关系，您能够理解。它更接近一种神圣性。我长久地陷于此书初次给我的天真印象之中。我将固守这本反常的书带来的初步印象，好占据一个这样的位置。<sup>③</sup>

但是有一些人，特别是最密切的人，看来难以忍受《发送》中通篇与现实的游

① 同阿兰·巴斯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汉斯·乔辛·麦茨格的信，1981年9月13日。

③ 伊丽莎白·德·丰特奈致德里达的信，1980年6月10日。

388 戏。皮埃尔还记得自己很快退却。“《明信片》出版时，我感到里面多少有一些经过伪装的隐私与秘密的泄漏，甚至是暴露。我丝毫不愿面对这些，至少不愿在这种形式下面对，也许这让我最终很少读父亲的书。”<sup>①</sup>

评论文章大多热情洋溢。它们都有些简单化地关注第一部分。在《阅读日记》中，作家马科斯·热奈夫（Max Genève）激动地称其为“自小克雷彼翁（Crébillon fils）以来最美的书信体小说”<sup>②</sup>。在《文学新闻》里，简·艾尔弗（Jane Herve）对“德里达邮差”表示赞扬，尽管带有些许沉重的嘲讽，《改变》杂志的前编委菲利普·布瓦耶（Philippe Boyer）则在《解放报》（*Libération*）上就《明信片》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哲学家的情书》的热情的文章。

无论文学还是农业，大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待在家里照看好奶牛。小说归小说家，菜谱归美食家，哲学归哲学家……但是当雅克·德里达竟突然撸起袖子干起文学，并在人们期待着一份理论概述的地方制造出一部爱情小说时，发生了什么呢？<sup>③</sup>

虽然报刊反应积极，但相对德里达之前的作品，其评论文章却少得多。需要说明的是，从1980年代初起，时代变化的征兆增加了。1月5日，拉康签署了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信，随后把自己封闭在沉默里；他于1981年9月9日去世。罗兰·巴尔特未能从一次事故中复原，于1980年3月26日去世。4月15日，轮到萨特陨落，5万人跟随葬礼车队出殡，大概预感到了所有与之一起埋葬的东西。事实上，意识形态环境在迅速变化。马克思主义从1970年代中期起在法国就已十分脆弱，这时让位给了同样傲慢的自由主义。出版界也改变了。潮流比任何时候都对艰深的东西不感兴趣，好几种要求甚高的丛书都消失了。

389 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下，1980年5月在迦里玛出版社创刊的杂志《争鸣》（*Le Débat*）很能说明问题。在结构主义飞跃期间起过关键作用的皮埃尔·诺拉明确希望翻过一页。在开篇题为《知识分子能做什么？》的宣言中，他让人感到他在攻击自己的丛书“人文科学文库”和“历史文库”的作者，而且是从米歇尔·福柯开始。在杂志第3期，诺拉选择的主编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发表了题为《人权不是一种政治》的文章，极其猛烈地对拉康和德里达开火。“新哲学家”最为

①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② Max Genève, *Qui a peur de Derrida?*, Anabet, 2008, p. 103.

③ 载《解放报》，1980年6月6日。

粗俗的大杂烩似乎找到了对手。今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想要揭发“思想导师”的人们。

在政治概念之外，必须指出同极权主义心理的从属或同谋关系，它藏身于无数精致的反人道主义版本当中。例如拉康对能指链条裹挟的主体圈套的指责，德里达将文字视为差异性的审判，在那里自有的同一性消失殆尽。<sup>①</sup>

在大学界，一个十分诱人的可能性似乎触手可及。在南泰尔，保罗·利科在“六八”后遭到粗暴对待，甚至有一天头上被扣了个垃圾桶<sup>②</sup>；1970年代末，经过好几次被告知心脏病的危险之后，他决定结束在南泰尔的教学和在帕尔芒提耶街的现象学研讨课。尽管他同德里达有过芥蒂，开始在美国传播的“德里达热”也不止一次令他恼火，利科仍然感到接替自己的只能是这位从前索邦大学的助手。《声音与现象》的作者在他看来是唯一能够继续他对胡塞尔和现象学研究工作的人，哪怕是以批评的方式。<sup>③</sup>在正式提出辞职之前，利科以完全私密的方式告知了德里达。

1979年7月1日，即哲学大会刚刚结束几天后，德里达用一封长信作出了答复。390  
经过“日复一日的踌躇与思考——还有焦虑”之后，他选择放弃利科“如此慷慨地打开”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必须承受工作论文答辩过程中所有的不确定和不透明，也不仅出于他同“某种大学的权势”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他不肯定自己愿意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

我有些害怕，是的，害怕这新的职责、新的生活将使我认为自己必须坚持的某种工作，甚至是某种行动和斗争变得更加困难。这微小的责任超出了我的能力，但仍然是一种责任。高师不是一个理想的承担此责任的地方，但不论怎样，今天我感到，我工作上的自由将在一段时间里受到较少的限制。也许我十分严重地错了，而且很可能我会为此决定后悔，但今天我还看得不是很清楚，难以做出另外的决定。我没有这样的力量。<sup>④</sup>

① Marcel Gauchet, “Les droits de l’homme ne sont pas une politique”, *Le Débat* n° 3, juillet-août 1980, cité par Didier Eribon, *D’un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çaise*, Léo Scheer, 2007, p. 102.

② 细节见 François Dosse, *Paul Ricoeur, les sens d’une vie (1913—2005)*, édition augmentée, La Découverte/Poche, 2008, p. 405—418.

③ 同弗朗索瓦·达斯图尔的访谈。

④ 德里达致利科的信，1979年7月1日。

德里达在信末重复说利科表现出的信任让他多么“感动并深受鼓舞”，而且仿佛得以“正名”。利科也说感动于他坦率的解释：“说我理解您的理由，这太轻了。我从您的立场中看出精神上的正直，我对之怀着最深的敬意。”<sup>①</sup>他借此机会也向昔日的对手表达了自己深厚的友情。

但在11月份，南泰尔的问题再次出现，而且更加紧迫。一个周六的早晨，利科冒着瓢泼大雨花了一个小时赶到学校，却发现在教师资格考试课的教室里只有一名学生。利科忍无可忍，立即上楼找到行政部门要求提前退休。<sup>②</sup>利科的好几位友人于是回头去找德里达，对他保证说当选只是程序问题，成功地说服他不再犹豫。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快再出现。

申请职位的第一步是尽快就一部以已有成果为基础的国家论文进行答辩。德里达很赞赏的让-图桑·德桑蒂将担任导师，尽管其研究工作与他相差很远；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任评委会主席，评委有皮埃尔·奥邦克、亨利·若利（Henri Joly）、吉尔贝·拉斯科（Gilbert Lascault）和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他汇集了六篇文章，起名为《哲学的印记——文字诠释的研究》。为了更易于“接受”，德里达去掉了最冒险的作品：《丧钟》、《马刺》和《明信片》。

答辩于1980年6月2日星期一下午两点在圣雅克街46号举行。教室爆满，天气酷热。身穿蓝色西装的德里达在讲话前脱去了外衣。<sup>③</sup>在题为《标点：论文时刻》的动人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的历程，并未隐瞒他同大学的复杂关系，而且承认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忽视了论文，后来决定不再提交。对于这态度的转变，他当然只能做出隐晦的解释。

就在几个月前，考虑到众多我在此无法做出解释的因素，一段本来是无休止的思考突然结束，我得出结论：能够说明我从前立场（当然是关于论文）的一切可能在以后的几年不再适用了。特别是，出于一直拴着我的体制政策上的原因，也许，我说的是也许，最好准备做出新的变化。……也许因为我开始有点过于清楚地了解，不是我要去哪里，而是我在哪里，不是抵达而是止步。<sup>④</sup>

① 利科致德里达的信，1979年7月17日。

② François Dosse, *Paul Ricoeur, les sens d'une vie (1913—2005)*, premi, ère éd, La Découverte, 2001.这一章在最后的版本中被删除，网上可自由查阅（d05431\_chapitres.pdf, p. 99）。

③ 同弗朗索瓦·昂日利耶（François Angelier）的访谈。

④ Jacques Derrida, “Ponctuations. Le temps de la thèse”, in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58.

申请人的鼎鼎大名和拥挤的人群让皮埃尔·奥邦克有些恼火，他在开始的声明中宣布将“坚决扮演评判的角色，遵守一切现行的大学标准”<sup>①</sup>。相反，列维纳斯十分慷慨地赞扬这次答辩，肯定地说这是“异乎寻常的典礼”，因而无法“遵循固定的仪式”。

您著作的重要性，您影响力的广泛，您在世界范围内的听众，在巴黎围绕着您的学生与弟子的数量和质量让您很久以来跻身于我们这一代的大师之列。但一位像您这样的哲学家坐在这里——虽说只有几个小时——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不得不回答问题，这是一种特别有必要探究的现象——至少我将就此进行研究。这次答辩大约是一个研讨会，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次机会。<sup>②</sup>

让-图桑·德桑蒂的发言虽然有些让人狼狈，但答辩还是顺利完成了。接任利科的第一步通过了，其余的步骤还要等待……

※ ※ ※

1980年7月23日，德里达50岁生日后一周，性质不同的更加友好自由的研讨会在瑟里斯-拉萨勒开幕。会议举办地的负责人艾迪特·埃尔贡和会议策划顾问让·理夏杜好几年前就希望组织一场关于《丧钟》作者的会议，但德里达本人表现得十分犹豫。1977年年底，值会议论文集《蓬热：创造者与古典作家》出版之际，埃尔贡重申她的提议。这一次德里达原则上接受了，条件是把会议办成从他的研究出发的对话，而不是对他的名字和作品的庆祝。他不愿参与会议议程和与会者的遴选，提议由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共同负责此次的十天会议，并将之定名为“人之终结”，以纪念《边缘》中最显著的一篇文章。

南希和拉库-拉巴特制定的议程极为紧凑。发言者中主要有萨拉·考夫曼、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露丝·伊利格瑞、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路易·马兰(Louis Marin)、鲁道夫·加什和维纳·哈马舍。但会议也包括一系列小组讨论，议题涉及精神分析、文学、翻译、政治、艺术、哲学和教育。虽然尽力避免明星化，但人们还是争相期待德里达出席。

大会以德里达和吕克·费里(Luc Ferry)、阿兰·勒诺二人的激烈争论开始。在

① 引自 Alain David, “Fidélité (la voie de l’animal)”, in *Derrida*, Cahiers de L’Herne, 2004, p. 155.

② 引自列维纳斯手写的笔记，保存在德里达在 IMEC 的档案。

他们题为“海德格尔之后的伦理问题”的发言之后，德里达指责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混淆主义”，批评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同海德格尔“保持了不可逆转的距离”。尽管德里达肯定地说自己对海德格尔从未有过“教条的毫无保留的默认态度”；但他不能接受用他们刚刚表现出的简单化来清算《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争论很快激烈起来，两名作者急匆匆地离开了瑟里斯。五年之后，他们将在《“六八”思潮》（*La Pensée* 68）中直接攻击德里达。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发言《讨论，或“奥斯威辛”之后的遣词造句》构成了另一个强音，其表现方式却平静得多。在气氛紧张的尼采研讨会过后八年，德里达十分感谢利奥塔前来参加关于自己的十天研讨会这一“慷慨举动”。他也将参加1982年夏天围绕着利奥塔举办的研讨会“判断力”。两人将不断地接近和对话。

394 《人之终结》的众多与会者无论在国籍还是精神历程上都十分多元化。这次研讨会是真正的交流，并不惧怕深入的讨论和时而有之的质疑。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都对这十天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印象：“主持一次瑟里斯的十天会议，这对我们是令人兴奋——令人沉醉？——的职责。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丰富而高强度的聚会，当然因为——此时此刻——德里达是一方面，主题是另一方面，它代表了我所称的‘巨大承载器’，负载着所有人的兴趣、关注和疑问。看来我们抓住了一种可能的思想的形式，抑或其多种形式，这种思想思索着正在形成中的超越‘六八’的世界，始终对其气势满怀信心，又为政治上的必要性所激励。”<sup>①</sup>

激动的气氛一直延续到8月2日，即研讨会最后一天。在总结和告别的时候，日本与会者小林康夫（Yasuo Kobayashi）起立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发言。

既然说到了感情，我允许自己在这里表达我的个人感情。……我来到这里——并非没有担心，并非没有恐惧。然后，不知该对谁——但我终于要对大家说：我爱你们。在我心目中，这就是布朗肖谈到的友情。以此名义，我感谢你们。我要对你们再说一遍：我爱你们。

会议的间接效果之一是，他同伽利略出版社恢复了5年前《丧钟》发表不久就恶化的关系。《人之终结》首先考虑在“田野”丛书里出版，但弗拉马里翁的负责人拒绝出版长度超过一卷的书，这将使该书成书后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发言，并删掉所有讨论。8月份，“通过奇特的机缘”，德里达在圣-保罗-德-旺斯的玛格基金会遇到

<sup>①</sup> 让-吕克·南希2009年1月29日致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



了米歇尔·德洛姆，同他谈起了这些困难。

他立即表现出狂喜的激动（他的风格，您知道——而且他听说过这次会议）。他提议把全部内容印成一本大书，第二年1月或2月出版，如果稿件10月份收讫的话。他想干件大事：漂亮的封面，高质量的印刷，等等！这一切就发生在楼梯上，在十分钟之内：我对他说，我尽快和你们商谈此事，由你们来做决定。

你们认为如何？在我看来，虽然很可惜不能在弗拉马里翁出版口袋版，但我觉得伽利略是更好的办法，因为德洛姆明显急迫而殷切。<sup>①</sup> 395

南希和拉库-拉巴特当然同意德里达的分析，而且很高兴能够出版几乎完整的内容（缺少一些讨论的记录）。但稿件的整理工作十分繁重，必须大家分担。“你们至少可以算上希尔维亚和我”<sup>②</sup>，德里达说。出书计划惊人地迅速实现，毫无在奥比耶和弗拉马里翁那里遇到的麻烦。1981年春，一部704页密密麻麻的巨著由伽利略出版社出版，封面是阿达米的原创绘画。尽管如此厚重，南希和拉库-拉巴特还是在序言里指出这部论文集只能让人部分地看到“在瑟里斯的十个夏日里真正发生的一切，包括对立（直到对抗）、询问（直到呼斥）、合作与友谊（直到庆典）”<sup>③</sup>。

※ ※ ※

秋天，一场悲剧发生了。1980年11月16日星期天早晨7点，被允许离开诊所几天的路易·阿尔都塞用拳头砸响了高师医生皮埃尔·埃蒂安娜（Pierre Étienne）的房门：“皮埃尔，快来，我可能杀了埃莱娜”，他张惶大叫。医生披上一件晨袍陪着这位结交了30多年的老友到达住处。埃莱娜·阿尔都塞，闺名丽特曼（Rytmann），抵抗时期以“雷戈蒂安”（Légotien）的名字为人所知，她倒在床脚，已被扼死。正如多米尼克·东布勒所讲，“路易·阿尔都塞处在极为狂躁的状态中。‘快做点什么，不然我就烧了房子’，他对医生说。他不停地重复同一句话：‘我杀了埃莱娜，接下来怎么办？’埃蒂安娜医生给圣安娜医院打电话接他入院。救护车在警察赶到前十几分钟到达，高师校长让·布斯凯叫来了警察。路易·阿尔都塞陷入如此深的迷茫状态，以至当晚来到圣安娜的预审法官居伊·若

396

①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的信，1980年8月25日。

② 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的明信片，无日期（1980年9月）。

③ *Les Fins de l'homme*, à partir du travail de Jacques Derrida, Galilée, 1981.

利（Guy Joly）放弃对他宣布他犯了故意杀人罪。哲学家似乎无法理解这一司法文件的意义。”<sup>①</sup>

这一可怕事件并未完全让路易·阿尔都塞身边的人吃惊。多米尼克·勒古回忆道：“从我认识他起，我就从未见过他处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试了一种新药，对他显然不成功。他处在如此的谵妄之中，有时甚至没法去看望他。不过，迪亚特金还是让他出门。他一直为路易和埃莱娜的魅力所折服，并照顾两人。但阿尔都塞情况并不见好。我们几个人害怕他会自杀。埃莱娜常给我打电话告知他的消息。德里达和我经常说起阿尔都塞的情况，满怀担心和忧虑。”<sup>②</sup>

将这位全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置在单独的病房之后，医生们开始寻找他的家人。埃蒂安纳·巴里巴尔解释道：“实际上阿尔都塞没有家人，因为当时他的侄子还十分年轻。他们于是转向很久以来仿佛代替了他家庭的高师。人们立即通知了德里达，其举动在这整个过程中令人钦佩。”<sup>③</sup> 这个阴郁的星期天早上，他是最早到达的人之一，同来的还有雷吉斯·德布雷，他与之在前一年筹备哲学大会时恢复了联系。他们一起去了圣安娜医院，等了几个小时，未得到许可可见阿尔都塞。<sup>④</sup>

第二天，媒体用大标题报道这件在各个方面都异乎寻常的社会新闻。《巴黎日报》将发起一场真正的运动反对阿尔都塞和高师。但第一天的消息仍然十分混乱，人们只是在谈论“高师的秘密”。

397

问题是他（阿尔都塞）是否直接对他妻子的死负责。从昨天起，羞耻的面纱遮住了夜里的事件。高师校长布斯凯先生联系不到。看门人得到指示，保持沉默。高师的医生则当即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人们总是过分戏剧化，阿尔都塞的妻子在夜里去世，他则有严重的抑郁症。”但医生也许只是在尽力让公众舆论的幽灵远离这所名校。<sup>⑤</sup>

星期二早晨，《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克制地证实确是谋杀：“心理学家在为阿尔

---

① Dominique Dhombres, “Louis Althusser, le coup de folie du philosophe”, 载《世界报》，2006年7月30日。路易·阿尔都塞在其遗著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tock-IMEC, 1992) 中给出了杀死埃莱娜的详细描述——从他的视角出发。

② 同多米尼克·勒古的访谈。

③ 同巴里巴尔的访谈。

④ 同德布雷的访谈。

⑤ 载《巴黎日报》，1980年11月17日。

都塞做检查。法官没能向他宣布他有罪，因为哲学家无法理解整个事件。”《巴黎日报》的口气则强硬许多，它用了一整版来报道这件事，并发表了多米尼克·雅麦（Dominique Jamet）一篇刻薄的社论：“这么多的谨慎，先生们，这么多的踌躇，这么多虔诚的谎言，笔在墨水瓶里转了又转拔不出来，这么多发展成同谋的友谊，这么多的沉默或半沉默，有些是自我克制，另外一些则很可能是因为政治的或社会的禁言。”<sup>①</sup>

右翼分子最夸张的仇恨四下泛滥：按照社论作者的说法，如果是别的随便什么人，人们会马上叫警察，但阿尔都塞是“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同时还属于“法国知识界的体制”：

他在强者一边，尽管他满怀同情俯向弱者。……难道存在着国家特权吗？难道一名哲学家永远不能有一双肮脏的手吗？这些人是谁，给予自己这样超出公共权利的特权？……那些抗议不平等和阶级正义的美德典范怎敢企图为自己的利益谋求这样的不平等？

多米尼克·雅麦在11月19日星期三再次发起攻击：《阿尔都塞，丑闻》，《巴黎日报》在头版这样宣布，然后提到“那惊人的集体阴谋，那么多声称想要取消阶级的人都是同谋，而他们这么说大概是为了更好地保存等级”。该报严肃地质问：“是否应该害怕哲学？”让·迪图尔（Jean Dutourd）也在《法兰西晚报》上大加攻击，而极右派周刊《密纽特》（*Minute*）则把哲学家形容为“不正常的上等人”，并且不幸言中：“阿尔都塞事件多么令人震惊地浓缩了整个共产主义，它开始于哲学的迷雾，结束于阴森的木偶剧。”同前高师学生、司法部部长阿兰·佩莱菲特（Alain Peyrefitte）一样，他们希望将此案提交给重罪法庭。 398

在这最初的日子里，“雅克·德里达，心痛不已……对阿尔都塞无比忠诚的他拒绝一切评论”。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不信任媒体。“太沉重了”<sup>②</sup>，这是他面对《世界报》记者时唯一脱口而出的话。这并不妨碍他迅速高效地做出反应。11月18日，他用高师抬头的信笺给一位律师写信，信上有几位同事一起签名。他们解释说，以路易·阿尔都塞目前的状态，他无法自行选择律师，“因此在我们看来保障他的辩护权是我们的义务，哪怕是临时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他的友人之家——

① 载《巴黎日报》，1980年11月18日。

② 载《世界报》，1980年11月19日。

请您担任路易·阿尔都塞的律师”<sup>①</sup>。

“友人之家”这一说法完全符合事实。在悲剧之后的几周里，德里达、德布雷、巴里巴尔和勒古竭尽全力奔走。一旦得到许可，他们就去圣安娜医院隔离区探访阿尔都塞，同时尽力处理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德里达尽可能地承担一切，这但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若斯·若利耶惊恐地看到他“如此折磨和受伤”，提出以某种方式友好地帮助他。<sup>②</sup>

399 从法律上来看，案件颇为棘手。预审法官判定不予起诉，因为在事件发生时，心理紊乱使他丧失了对行为的辨别力或控制力，这样阿尔都塞将被判处不可撤回的心理禁闭，但这将使他免于审讯和诉讼。<sup>③</sup> 1981年1月23日宣布的这一决定虽然完全符合情况，但还是重新激起了关于哲学可能享有支持与破例权的争论。第二天，共和国检察官重申此次程序毫无特别之处，意在中止一切模糊性。<sup>④</sup>

从医学角度看，事情也不简单。多米尼克·勒古讲道：“事情发生后不久，迪亚特金把我和德里达、德布雷、巴里巴尔叫到了办公室。他被自己的责任压垮，害怕有人找他算账，对我们讲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感谢我们没有质疑他。他继续否认事实：‘人们知道埃莱娜死了，但我也完全确信路易不可能杀了她，因为这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在圣安娜医院，阿尔都塞由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者负责，并与之建立了奇特的关系。就像很久以前的迪亚特金一样，这位学者正落入阿尔都塞的掌控之中，开始相信阿尔都塞比他更了解自己的情况。”<sup>⑤</sup>

400 由于收容必须延长，圣安娜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阿尔都塞得到迪亚特金的支持，希望转到索瓦希-絮塞纳的活水诊所，在那里他已经多次接受治疗。但这一要求

① 致一位未被证实的律师的信，1980年11月18日；签署此信的有丹尼尔·贝纳甘（Daniel Bennequin，数学助理教师）、雅克·德里达（哲学讲师）、让-皮埃尔·勒费弗尔（Jean-Pierre Lefebvre，德文讲师）、贝尔纳·波特拉（哲学讲师）。

② 若斯·若利耶致德里达的信，1980年11月28日。

在阿尔都塞事件之前，德里达似乎再次受到焦虑的困扰，父亲去世十周年对此不无影响。在一封给拉库-拉巴特的信中，他提到自己几周来反常地热衷于端详照片，“好像（他）就要死去”。他去摩洛哥的第一次旅行十分糟糕，尽管受到热情的接待：“我到达摩洛哥那天，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我成功地恢复到不知是什么的境地，生活或是一种表面的正常，作了四次讲演，沿着大海漫步，甚至跳了舞，一个人，面对我的朋友卡蒂比（Khatibi）为我请来的音乐家，等等。现在我试图重新出发，但很脆弱”（德里达致拉库-拉巴特的信，无日期，很可能是1980年10月）。根据玛格丽特的回忆，德里达可能在深夜给卡蒂比打过电话，然后离开酒店住到他家。

③ 这是法国刑法第122第1章条（原来的第64条）。更多详情见Jean-Paul Doucet明确讲到阿尔都塞事件的文章：[http://ledroitcriminel.free/dictionnaire/lettre\\_a/lettre\\_a\\_as.htm](http://ledroitcriminel.free/dictionnaire/lettre_a/lettre_a_as.htm)。

④ 载《世界报》，1981年1月25日至26日。

⑤ 同多米尼克·勒古的访谈。

被警察局拒绝，且没有正式解释。德里达、巴里巴尔和勒古再次出面干预。

从患者的利益出发，我们对这一否定感到强烈的遗憾之情。很明显，目前照顾他的医生也承认，他目前所在的急诊处并不适合长期治疗。……我们认为同意这一要求并非特别的优惠，而是合理的人道的决定。<sup>①</sup>

1981年6月，阿尔都塞被秘密转送到索瓦希-絮塞纳。在以后的几年里，德里达继续定期前去探访他。埃蒂安纳·巴里巴尔说：“雅克·德里达是我们这个小团体里最年长的。他承担一切，表现得智慧而大度。在索瓦希，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看望路易；他就像他的亲人，每次得到许可都把他带回里斯-奥朗吉斯的家中。雅克在国外时就由玛格丽特接替……这样的忠诚令人惊讶，特别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的关系十分复杂，是敬仰、友情和嫉妒的特殊的混合。路易处在躁狂状态时会表现得十分刻薄，尽管他常常用讽刺掩饰他的攻击性。‘我见过的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我们说。一切尽在那语气中。”<sup>②</sup>

※ ※ ※

这段时期还有别的烦恼困扰着德里达。1980年8月8日，瑟里斯研讨会结束后不久，南泰尔的教师、皮埃尔·维达尔-那凯的表兄弟雅克·布隆斯维格（Jacques Brunshwig）寄来一封口气尴尬的信。最近通过的论文答辩当然除去了一个障碍，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首先，保罗·利科的职位被取消了。当新的职位开放时，一名同事恼怒地感到这个位置似乎是留给德里达的，意欲提出申请。布隆斯维格窘迫地解释说，近几个月来南泰尔的气氛恶化：“不幸的是，我远远不能像你期待的那样给你一个清清楚楚、不存在单边运作的一致的选举决定。”他建议德里达在宣布申请此职位之前咨询别人的意见。

401

从那时起一切都不顺利。德里达的踌躇让好几个南泰尔的教师感到恼火，认为他在端架子。根据老同学阿兰·蓬斯——他那时是南泰尔的政治哲学教师，但不在负责利科职位接任的小组——的说法，德里达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人一些卑鄙的行为：人们害怕德里达的干扰，嫉妒他的名气。但也不能低估分管大学的女部长、倒

<sup>①</sup> 《关于路易·阿尔都塞先生情况的说明》，无日期文件，由雅克·德里达、埃蒂安纳·巴里巴尔和多米尼克·勒古共同签署。

<sup>②</sup> 同巴里巴尔的访谈。

行逆施的阿丽斯·索尼埃-赛依特（Alice Saunier-Séité）的压力：她刚刚铲平了文森纳的校园<sup>①</sup>，现在要极力阻挠德里达这位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创办者和哲学大会发动者的发展道路。而且，要得到南泰尔的教授职位，德里达还要进行一个体制上的步骤：通过大学机构高等委员会（CSCU）的申听。这将是 he 最糟的回忆之一。

同一天被拒的多米尼克·勒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1981年3月初，我们两人都经历了同样的考验。出于偶然，我的申听就在他之后进行。我看到他脸色苍白地出来：‘我永远不会再迈进这个地方一步。你愿意怎么样都行，但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后来他对我说，某些评委大声朗读他作品的片段，极尽嘲讽之能事。许多同事仇恨他，因为他的优秀、奇特和他毫不后退的作风。他的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和哲学大会背离了总监察局的意志。这次申听是他们的报复。”<sup>②</sup>

投票时德里达只得到一张选票。继任保罗·利科职位的是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专家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他同时也接手了现象学研究室，“而他从未参加过帕芒蒂耶街的研讨课”<sup>③</sup>。对德里达，失败还要加上耻辱：他在踌躇多时后才决定对工作论文进行答辩，只是因为人们向他肯定这个职位是为他保留的。<sup>④</sup>

这时正值总统选举，德斯坦和密特朗的竞争看来会很激烈，此事在法国甚至国外媒体上产生了许多反响。德里达收到好几位友人与同事的来信，为这“愚蠢的决定”感到激愤，说它将只会增加“鲜活的思想与大学之间的分裂”<sup>⑤</sup>。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平静下来。几周以来，一些他希望不太严重的健康问题令他倦怠无力。特别是，玛格丽特和他刚刚得知儿子让患了糖尿病，这使他们十分惊慌。

1981年5月，德里达向保罗·德·曼讲述了刚刚经历的种种磨难。

南泰尔的事以最坏的大概也是最意料之中的方式结束了，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国家短暂的大学生涯将会是怎样的。目前我留在高师，希望几天来预示中的

① 拆除文森纳校园并将之迁至圣德尼后，这位女部长称：“他们抱怨什么呢？他们的新大楼将位于自由街、列宁大街和伏尔加格勒大街之间，他们会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自 Claude-Marie Vadrot, “Quand Vincennes déménage à Saint-Denis”, *Politis* n° 30, avril 2008, p. 32。）

② 同勒古的访谈。

③ François Dosse, *Paul Ricoeur, les sens d'une vie (1913—2005)*, *op. cit.* (d05431\_chapitres.pdf, p. 99).

④ 在杰弗雷·贝宁顿著作的《生平》部分里，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1980年后，人们催促他进行论文答辩，好成为接任利科的教授职位候选人，但这个职位随即被索尼埃-赛依特撤销，而当取而代之的另一个职位在规定条件下被授予时，曾经‘邀请’他递交申请的大学同事和国家机构人员投票反对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304.）这一段，像《生平》中的其他许多段落一样，显然是德里达本人撰写的。

⑤ 多米尼克·亚尼克致德里达的信，1981年3月20日。

政治变动（希望但不过分相信）至少能让我获得些许安宁。

冬天过得很不好，至少从2月起一直不好，我“偿还”了许多，感到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疲劳（身体的和精神的）。……在秋天的“工作”之后（教学，数篇文章，讲演，一直到2月份的旅行）是由“肾绞痛”带来或表现出的身体与心灵的折磨，我想说是在精神疲惫和无尽沮丧的形式下意识和无意识的作用。<sup>①</sup>

他对这“似乎是最糟糕的情况”感到焦虑，特别是由于他的症状同夺去父亲生命的病况近似，但他仍然尽量完成日常工作。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德里达在一次同伽达默尔的辩论中表现出的攻击性。20年后，他在向这位已逝的伟大德国诠释家致敬时承认：

有人指责我从未真正进入伽达默尔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开启的公开对话，似乎我在试图逃离。我准备相信他们说的。

我们在1981年会面时他对我的答复做出了以下的回应，我想说我对之完全同意，而且满怀对他的善意、他微笑的大度和敏锐心智的敬仰：“一切寻求理解的阅读都只是一条无尽长路上的一步。走上这条道路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永远不能抵达文本的‘终点’；他将接受打击。如果一篇诗文让他感动到‘进入’其中并认出自己，这并非说明这是对自我的认同或确认。人为了找到自我而自我放弃。当我强调说人永远不会预先知道他在找到自我时是怎样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同德里达距离很远。”<sup>②</sup>

德里达说过希望但不太期待的政治变化到来了，像个惊喜。1981年5月10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在1981年6月14和21日的立法选举中，一场“粉红浪潮”使得社会党及其同盟获得大多数选票。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被任命为总理，杰克·朗（Jack Lang）任文化部部长，阿兰·萨瓦里（Alain Savary）任国民教育部部长，四名共产党员进入政府。德里达为此新形势感到高兴，但远未预料到这对他将产生的重要性。对法国，特别是对法国大学，他不愿再抱任何期待：“事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1年5月8日。

② Jacques Derrida, “Coomme il avait raison! Mon Cicérone Hans Georg Gadam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mars 2002。德里达和伽达默尔1981年4月25日的谈话发表在《国际哲学杂志》(*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第151期，1984，333~347页。

404 情现在会产生变化吗？对于有关教育和文化的领域，我怀着最保守的谨慎。”<sup>①</sup>

※ ※ ※

在美国，保罗·德·曼仍然是无出其右的同盟。尽管遭到时旦益顽强的抵制，他还是在研究生事务负责人希利斯·米勒的支持下为德里达签署了访问学者的合同。同在牛津和剑桥一样，耶鲁哲学系并不掩饰对德里达和整个“法兰西理论”思潮的仇视。其中一位教师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纯实证主义者和形式逻辑专家——甚至把这当成个人事件，年复一年试图阻止在她看来是骗子的德里达的到来。德里达与约翰·塞尔在好几期《字形》杂志上的激烈论战使分析哲学的支持者们态度更加强硬。<sup>②</sup> 解构的成功对传统主义者构成了威胁，现在文学界也有众多敌人，只有比较文学系还保留着对他热情的接待。

405 尤其从个人角度来说，与保罗·德·曼的关系对德里达变得很关键，它接替了与米歇尔·莫诺里、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和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友谊。保罗·德·曼几年来的信任对他至关重要，他确定从中汲取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很久以来就是这样，今天尤为如此。”<sup>③</sup> 接下来的几个月，好几件事将使两人更加接近。保罗·德·曼一直极为谨慎，尤其缄口不谈到达美国之前的时期，但有一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亨利·托马斯（Henri Thomas）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从他身上汲取的灵感：小说在一本杂志上首次发表时题为《荷尔德林在美洲》，在迦里玛出版时题为《伪誓》。“这个题目不那么讨喜，但更加真实”<sup>④</sup>，德·曼在1977年的一封信里预言式地补充说。从那时起，德里达开始有意无意地寻找这本书。他最终在1981年复活节假日假期时在尼斯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它。刚一读完他就给德·曼写了封长信：“我无法对您说出更多，但我不应当保持沉默，《伪誓》……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心潮起

① 德里达致拉波尔特的信，1981年6月28日。

② 一切开始于德里达在 *Glyph, A Journal of Textual Studies* 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是德里达讨论约翰·奥斯丁（John L. Austin）的文章《签名、事件、语境》的英文版。该杂志1977年由萨姆·韦伯创办。在第二期，杂志刊登了一篇约翰·塞尔的答复文章《重谈差异性：对德里达的回答》，指责他未能理解奥斯丁及其话语行为（speech acts）理论。德里达在一篇题为《有限责任公司 abc……》的文章里强硬而嘲讽地做出了回应。由于塞尔承认从几位友人那里汲取了灵感，德里达便在文中将他视为一个集体：“为避免‘3+n名作者’这种科学表达法的烦琐，我在此并从此刻起决定将《答复》假定的集体作者命名为‘有限责任公司’，在法语中的常见缩写为‘Sarl.’。”这种论战法并不符合美国大学学者在论战中的回应规则，因而激起了长久的怨恨。例如，塞尔将拒绝在《有限责任公司》一书中把自己的文章同德里达的放在一起，该书汇集了所有资料，先在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后在法国（伽利略出版社，1990）出版。

③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1年5月14日。

④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77年7月8日。



伏，总之在我心中激起了深刻的反响，‘诡异’（unheimlich），既吃惊又不感到惊讶。但我已说得太多。”<sup>①</sup>的确，小说的主题不同寻常。主人公沙利耶（Chalier）被控重婚罪：与一名年轻的美国女子结婚时，他宣誓自己从未结婚或离异，但后来调查显示，他在欧洲已婚并有两个孩子。“人们关于美国之前的年份都知道些什么呢？”叙事者问道。这个问题在几年之后又一次悲剧性地对保罗·德·曼提出。德里达将再次仔细阅读亨利·托马斯的小说，大概在想象如果德·曼和他不是都那么热爱秘密的话，此书本可能使他吐露些隐情。<sup>②</sup>

在年初的磨难之后，1981年夏天对德里达仿佛是一种“修复”。“这么说吧，我并不工作，或任由自己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知道要去向哪里，过得怎样。不过，幸运的是比冬天最糟的时候要好些。”<sup>③</sup>皮埃尔在纽约，与阿维塔尔一家在一起，让的健康状况稍稍让人放心。但德里达惧怕开学，尤其是因为他很多年来第一次不能在耶鲁度过秋初。

数学家乔治·普瓦图（Georges Poitou）刚刚接替让·布斯凯执掌高师，许多教师担心会有“新的政策，也许是新的结构”。阿尔都塞不在，开学初的日子德里达的在场就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情况让他感到忧伤和沉重：“我有时对我在耶鲁度过的秋天感到揪心的思念（我在掂量我的用词）。怎样的生活……”<sup>④</sup>他对德·曼倾诉道。同样在耶鲁，虽然知道他春天会回来，人们还是很想念德里达：“恐怕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您的出现，没有您的九月显得空空荡荡。”<sup>⑤</sup>

此后的德里达在高师感到焦躁不安。学生们仍然同他很亲近，他也仍然关注他们的个人发展，但从阿尔都塞走后事情变得十分困难。一个关键的联结消失了，学校对他而言与此悲剧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他和贝尔纳·波特拉的关系疏远起来。正如后者所讲：“不管他怎么说，德里达鼓励身边的人像弟子一样行事，而且喜欢他人的模仿。我在好几年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没有完全意识，因为我对他的崇拜是如此热烈。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十分符合那条老规则，即‘不同我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一旦有分歧，或者一旦他怀疑有分歧，就会产生后果。同他在一起意味

①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1年5月14日。

② 向希利斯·米勒致敬的文章《伪誓，也许（“句法的突兀跳跃”）》发表于由 Ginette Michaud 和 Georges Leroux 编纂的专刊 *Derrida lecteur, Études françaises*，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38，1~2，2002。重载于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2004，*op. cit.*。这篇动人的长文可以看成《记忆：致保罗·德·曼》的补注来读。

③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81年7月23日。

④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1年10月13日。

⑤ 杰弗雷·哈特曼致德里达的信，1981年9月1日。

407 着完全对他称是。但我并不是个听话的人，此外，我觉得实际上不会有德里达学派，因为解构首先是一种风格，他的风格，他一个人的。他给弟子们留下的只是余迹。在某种意义上，这使他接近海德格尔，后者也许是最让他萦绕于心的哲学家。当然，像南希和拉库-拉巴特这样的人极力避免出这样的差错，也许他们做到了，因为他们开始同他合作时已经受过了训练，而我不是这样。我因而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躲开这引力，找到自己的轨道。而且，我要承认，德里达，我曾如此热爱和钦佩的人，教会我那么多东西的人，已经变了，他总是忙忙碌碌，看看记事本再看看手表，总是处在两场约会和两个电话之间。这可以理解和接受，尽管在我看来不大‘哲学’。但这个时候，我承认，我有点难以忍受他不停地抱怨：‘你要是知道的话……我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他显然竭尽全力为自己构筑了这样热闹荣耀的生活。”<sup>①</sup>

408 尽管十分倦怠，但在1981年最后几个月里，德里达并未彻底放弃高师。似乎是最后的尝试，大概抱着对新校长到任和最近的政治变化的希望，他起草了一份相当激进的改造于姆街教学的方案。除了哲学，他还对整个文学院的未来提出了质疑，并在一份13页的打字稿上详细提出“预案的一些建议”。一开始的陈述是严厉的：“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要求，不能任由一个仍然十分稳固丰硕的科研与教学机构的潜力遭到削弱和摧毁。”因此需要确定“文学院的存续与发展的条件”。德里达认定，到目前为止，文学院从未获得过与官方文件制定的研究使命相符的条件。他认为，在不减弱传统的考试招生和预备班体系的同时，应该尽快开放“另外的空间”，“在另一个层次上，并根据另外的标准”招收自由研究者；还应该创建研究中心，最好是面向新的学科或前所未有的主题，并可颁发特殊的学位。对这些中心的运转提出初步设想后，德里达总结说，这样的发展在他看来是文学院的唯一未来：“如果不能下决心创新的话，这一伟大设想将没有任何实现的机会：新的工作形式，新的课程，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在大学，在其他机构，甚至在法国依然显得特别的研究主题。”<sup>②</sup>

方案激起众多反响——大部分是积极的，至少对其前提条件的反响是积极的——并引出了几次会议。但在此期间形成了对德里达的真正攻击：1981年12月初，高师前学生、海德格尔专家埃玛纽埃尔·马尔蒂诺（Emmanuel Martineau）回过头来反对自己从前的老师，向他的“同志们”抛出十点呼吁。他认定德里达以教师资格考试研讨课为借口，沉溺于“‘机智的’语言杂技，缺乏严肃性，没有任何哲学意义，而且完全无益于考生准备这场以艰深著称的考试”。他还认为德里达的个人

① 同波特拉的访谈。

② 雅克·德里达：《文学院的未来，对一个预案的几点建议》，1981年11月，IMEC档案。

成果是“纯粹的文学，同普遍哲学和个别哲学史均无任何关系”，它对所有尊重“我们的学科传统”的人来说是“既不堪忍受又烦琐多余的资料”。由此，他呼吁学生们进行“抵制”<sup>①</sup>。这份呼吁的第一个后果是激起了对德里达表示支持的请愿。

这场论战尽管如此低俗，却仍然伤害了他，并增强了他尽快离开高师的愿望，他试图发起的改革方案也很快陷于停滞。他认为学生们如果想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话，无论如何不能引用他或以他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里上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409  
“甚至不需要提醒，他们都知道”，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免受牵连。“因此我被异化了，我忘记了我自己。我在批改论文时试着忘记自己。上课是另一回事。在研讨课上我总能做我想做的。但批改论文和资格考试作业的时候，我在做完全非个人化的练习。”<sup>②</sup>

年底，一声真正的惊雷震响，将深刻改变德里达的处境。

---

① 埃玛纽埃尔·马尔蒂诺的传单，1981年12月，IMEC档案。

② “Bâtons rompus”，dialogue d'Hélène Cixous et Jacques Derrida, in *Derrida d'ici, Derrida de là*, *op. cit.*, p. 197.

## 第 21 章 布拉格之夜 (1981—1982)

410 从 1968 年 8 月“布拉格之春”政治体制改革运动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尤为黯淡。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强力迫使局势正常化，使之成为向苏联看齐的国家之一。1976 年 12 月，一封题为《77 宪章》的请愿书开始传播开来，要求政府遵守关于自由的承诺。宪章的作者和最早的签名者中有剧作家、未来的总统瓦克拉·哈维尔（Václav Havel），外交官基瑞·哈杰克（Jiri Hajek），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哲学家、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前学生扬·帕托卡（Jan Patočka）。宪章仅提出了如此基本的要求，发起者们还是很快遭到了镇压。帕托卡在经受漫长残酷的审讯之后不得不住院，并于 1977 年 3 月 13 日死于脑出血。

1980 年，一个教师小组在牛津成立了扬-胡斯（Jan-Hus）教育基金会——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 1415 年在康斯坦茨以异端罪遭火刑的宗教改革家。基金会的目的是为捷克斯洛伐克大学教师提供帮助，组织秘密课程和研讨班，给当地带去禁书或为地下出版物的出版提供财力支持。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阿兰·蒙特菲奥往返于英国和法国。他的妻子、也是哲学教师的卡特琳娜·欧达尔（Catherine Audard）不久便发起成立了协会的法国分会。协会章程于 1981 年 8 月 4 日注册。著名历史学家、前抵抗运动成员让-皮埃尔·韦尔南当选主席，雅克·德里达承担副主席的责任：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十分敏感，特别是因为他去过数次，而且通过玛格丽特的母亲一方常常能了解到该国的局势。

411 扬-胡斯协会的主持者们并不满足于寄钱。他们轮流前往，尽管知道旅行风险不小，必须多方小心。最初的几次旅行就出了好幾次事：行李遭到仔细搜索，书籍被

没收，深夜被遣送回边境。<sup>①</sup> 1981年12月26日，就在德里达预计离开巴黎赴布拉格的日子，整个苏联阵营的局势极为紧张：不到两个星期前，雅鲁泽斯基（Jaruzelski）将军宣布波兰戒严。玛格丽特对旅行并不反对，但希望推迟到更合适的时间。但德里达的时间表很难安排，不愿再改变日期。

玛格丽特的直觉很快得到证实：在奥利机场，尚未登机，德里达已感到被跟踪。到达布拉格之后更无可怀疑。他处在不断的监视之下，正如后来他在研讨课上以故作愉快的口气讲述的：

早晨，在酒店，我已经感到被警察包围。我回过头去，看到旅馆经理看了看时间，抓起电话报告我的情况。我注意到有人跟着我，我问自己：“这真的是跟踪吗？”——对我这是被跟踪的开始，抑或“我出于忧虑而‘发明’了这场跟踪？”……

我上了地铁，他还在那儿，也在我旁边上了地铁……我对自己说：得把他甩开。我于是调动起自己所有的小说阅读经验和心理学知识，试图回忆起各种技巧。地铁停下来。车门打开几秒钟，我必须在最后一刻跳出去……但我被困在地铁里。<sup>②</sup>

412

在到达约会地点之前，德里达想要保护联系人的身份不被发现，再次试图甩掉跟踪者，穿过了好些商店和过道。但在这复杂行程的每一阶段，他总是发现那个不动声色的跟踪者。

《77宪章》的签名者之一拉迪斯拉夫·海达奈克（Ladislav Hejdiánek）教授恢复了从前在帕托卡家里上“室内”研讨课的传统。就在他家里，几名学生和同事前来聆听德里达的讲课。他的题目与政治毫无直接关系：同这年在高师的研讨课一样，德里达讨论的是笛卡尔和语言的关系。讲话内容相当具有技术性，只让一部分听众感兴趣；一名学生询问在他们所处的形势下这种哲学有什么用。演讲末尾的谈话更加随便一些。德里达隐晦地提到自己被跟踪，并惊讶地发现他的东道主们畅所欲言，并不顾忌可能被窃听。

德里达在结束讨论走出大楼时遇到检查，但没有什么后果。交还给他护照的警察说“没有问题”。他越来越感到别扭，回到酒店收拾东西住到了玛格丽特的姨妈基里娜·赫拉瓦蒂（Jirina Hlavaty）家里；他决定放弃预定的第二场讨论。12月29日

① 同卡特琳娜·欧达尔和阿尔兰·蒙特菲奥的访谈。

② 1982年1月6日星期三的研讨课，IMEC档案。

星期二，海达奈克教授没有他的消息，感到很担心，去中央酒店又没有找到他。教授随后与法国使馆联系，使馆让他放心，说没有听说什么不正常情况：德里达应该在第二天下午如期乘机返回。<sup>①</sup>

413 就在机场行李检查时，德里达中了圈套。在他出关的时候，女海关职员把位子让给了一个从帘子后面冒出来的“大胖子”。德里达被带到一间小屋里，人们仔细检查了他的行李，还让狗去嗅。一开始德里达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以为海关职员在寻找稿件。后来他对法国电视 2 台讲道：“我想象过所有的场景：审讯，驱逐出境……但从未想到过这种阴谋——毒品。然而，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新闻的意义上，我都明白这种布景。”<sup>②</sup> 海关职员要求他撕开箱子的灰色帆布夹层。德里达自己取出四个极为可疑的褐色小袋子……其他海关职员来到屋里，很快有警察到达，宣布他被捕，并把他带到了最近的警察局。

德里达被控“制造、运输和转移毒品”，他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一个成年教师怎么会突发奇想到捷克斯洛伐克贩毒？“人们对我说，首先，没有我的同谋，毒品不大可能进入我的箱子；其次，整个警察部门都知道贩运毒品的常常是不受怀疑的人——外交官，知识分子，歌手，等等。”<sup>③</sup> 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不是两年前在日本被捕吗？

尽管审讯在许多方面看来只是个幌子，但还是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德里达徒劳地多次要求告知家人和法国使馆。

检察官、警员、翻译和指定律师十分清楚设下这个陷阱的原因，他们也知道别人都很明白，而且在互相监视，于是用一丝不苟的智力进行这场喜剧表演。……我了解这场景，我想我也在做应该做的，但怎样描绘在这表面下奔涌着的所有远古的心理活动呢？<sup>④</sup>

414 午夜后不久，德里达被带到机场附近的监狱。寒冷，雪，巨大阴郁的楼房，这一切再加上那些侮辱与粗暴的对待，让他有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先

---

① 我部分参考了 Barbara Day 的书，*The Velvet philosophers*，Londres，Claridge Press，1999。

② 1982 年 1 月 2 日雅克·德里达在电视 2 台 20 点新闻节目中接受的采访，见 <http://www.ina.fr/video/CAB91050888/liberation-de-jacques-derrida.fr.html>。

③ 1982 年 1 月 2 日雅克·德里达在电视 2 台 20 点新闻节目中接受的采访，见 <http://www.ina.fr/video/CAB91050879/recit-derrida.fr.html>。

④ 雅克·德里达与卡特琳娜·大卫的访谈录，以《不屈的德里达》为题刊登在《新观察家》杂志上，1983 年 9 月 9 日至 15 日。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op. cit.，p. 137。

是一个人在牢房里，不断地用拳头击打房门，重复着“使馆”和“律师”这两个词，直到一名看守佯装要打他。早晨 5 点左右，一名匈牙利吉普赛人被带进牢房，但他不会讲一个英文字。这位难友被哲学家的惊慌触动，帮他草草打扫了牢房。随后，为了消磨时间，两人开始在德里达画的纸巾上玩起了“OXO”游戏。

12 月 31 日晨，未来的《法的力量》(*Force de loi*)的作者接受了痛苦的登记过程。他后来讲述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被拍过这么多照，从机场到监狱，穿着衣服或裸体，然后又穿上了囚犯的‘制服’。”<sup>①</sup>他又被带到另一间牢房，里面已经有五个年轻人，五个“孩子”，他后来说，他能够用英文与他们交谈。他们向他解释了可能等待他的命运：等待审判，然后是大概两年的监禁。德里达开始想象自己在这漫长的没有一本书的孤独中将会变成怎样。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在一种惊恐万状的狂喜中”，他幻想着这监禁将通向悖谬的解脱，让他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作，没有限制，没有约稿。



在巴黎，人们很晚才得到德里达被捕的消息。12 月 30 日下午很晚的时候，玛格丽特白白地在奥利机场等了很久。他的航班先是宣布推迟，然后取消，但在冬天这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忧的。直到晚上，玛格丽特才接到姨妈的电话，后者得到了律师的通知。“她发了疯一般：‘雅克被抓起来了。你看我们活在一个多么肮脏的国家！可耻，我真感到羞耻……’我猜她的电话被监听了，于是我徒劳地想要让她平静下来，害怕别轮到她惹上什么麻烦。”皮埃尔这时同阿维塔尔·若奈尔在美国。玛格丽特和在里斯-奥朗吉斯小住的父母在一起，还有只有 14 岁的让。

415

惊慌的玛格丽特先给卡特琳娜·欧达尔打电话，后者给了她一个联系人的电话，他是德尼·德尔布尔 (Denis Delbourg)，是德里达往日的一名学生，在外交部部长克洛德·谢松 (Claude Cheysson) 的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东西方关系。玛格丽特回忆道：“我立刻给他打电话。他对我说第二天一早就处理此事，但这不能让我放心。我想让他立刻行动，他最终答应了。早晨 6 点时，我决定给德布雷打电话，他那时是共和国总统身边的顾问。几小时后，他让我放心，告诉我弗朗索瓦·密特朗十分重视此事，说准备召回法国大使并以经济制裁威胁捷克人。”

很快，德里达被捕的消息被公开。总理府文化事务总负责人雅克·蒂博 (Jacques Thibau) 给《早报》的文化栏目主编卡特琳娜·克莱芒打电话，要求她尽可能

<sup>①</sup>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37.

为德里达的被捕制造声势：得到克洛德·佩尔德里耶（Claude Perdriel）的同意后，她决定第二天用头版报道此事。从一早的新闻播报开始，里斯-奥朗吉斯家里的电话就没停过，玛格丽特到处忙乱：“我一整天都穿着晨袍，没有时间换衣服，也没有时间考虑真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宝洛·泰弗南家见过好多次的罗兰·加缪（Roland Camus）给我打电话提出帮忙。他准备立即同我去布拉格，但只有他问我雅克是否真的运过毒品。”<sup>①</sup>

在此期间，捷克斯洛伐克驻巴黎大使扬·普德拉克（Jan Pudlak）先生被召到总理府。16点，他受到负责东方国家事务、俄国人熟知的中间人哈里斯·皮塞（Harris Puisais）和德尼·代尔布尔的接见，后者因为同德里达及知识界的密切关系而主持会谈。大使无法理解这件事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直至政府最高层。当时还是年轻外交官的代尔布尔对这次见面保留着清晰的记忆：“我对这次以携带毒品为借口的拘捕表示了我们的惊讶和谴责，大使坚定地回答说，法国大学内部非法物质的流通有教师的同谋，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国家有充足的理由镇压贩毒！我打断他：‘您知道德里达教授是谁吗？德里达教授是个朴素的人，他在法国和国外整个学术界享有最高声誉，您找不到一个人会有一秒钟相信这样的指控。’我记得我用了‘朴素’这个词，并在心里自问教授本人是否赞同这个概念，但我使用了自认为在面对共产主义道德标准的代表时最适合的语言……我在讲话时看到大使在做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了‘朴素’这个词。我接着说：‘我本人就是德里达教授的学生，我可以为您举出许多来自于姆街高等师范学校他从前的学生和同学，现在都身居高位，比如共和国总统的顾问雷吉斯·德布雷……’会谈结束时，大使虽未改变语言，却改变了态度，我猜想他开始严肃地考虑站在什么立场。毫无疑问，在布拉格的当权者们倒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在探测我们的反应。”<sup>②</sup>

实际上，捷克部门并未意识到德里达的声誉。几个小时之内在媒体、各部，一直到爱丽舍宫汹涌的抗议浪潮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晚上，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告知法国要求立即释放哲学家。布拉格和莫斯科都不想同法国爆发公开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除了服从，别无他途。

※ ※ ※

12月31日至次年1月1日夜，前一天拘捕德里达的警察们前来释放他，这次十

<sup>①</sup>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sup>②</sup> 同德尼·代尔布尔的访谈。



分恭敬。由于在前一天的审讯中数次提到卡夫卡——正在为利奥塔研讨会准备题为《面对法律》的发言的德里达在捷克期间去了卡夫卡的墓地——律师对他“私下里说：‘您应该感到经历了卡夫卡的故事。别把事情想成悲剧，把它当成是一种文学体验吧。’我回答他说，我把事情当成悲剧，但首先是为了他——或者为他们，我不再知道”<sup>①</sup>。

筋疲力尽的德里达在人们正在打扫新年接待会残羹时到达大使馆。他被安顿在一个房间里草草休息，他在此重读了《墓外回忆录》里有关布拉格的段落。第二天下午，他乘火车到达巴黎，一名使馆官员一直陪他到了德国边境。在斯图加特，法国电视2台的一个采访小组等到了他，记者希尔维·马里翁（Sylvie Marion）对他进行了长时间采访。

1982年2月2日早晨7点半到达巴黎东站时，他被记者和摄影师包围。外交官、同事、学生和友人也来等待他。但德里达几乎没有时间同他们打招呼。他同玛格丽特和让前往法国电视2台演播室与记者一起观看在火车上录制的采访：由于主题颇为敏感，他坚持不愿因为某句笨拙的话而损害什么人。<sup>②</sup>

对于今天的电视观众来说，在12点45分的新闻节目中播放的采访片段十分奇特，尤其是人们给哲学家留了异乎寻常的7分钟时间讲述发生的事。德里达讲得很慢，特别是开始时，而且不看镜头。讲述了去布拉格的背景之后，他同意叙述整个事件，但尽力避免哗众取宠和自怜的姿态。

418

我于是被扔进——我想该用这个词——一间牢房。……我不想描述事情的暴力性，这在一方面是常见的，另一方面是专门留给我的，我想。随后是普通犯人的一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对之进行描述，但我经历了只从图像或书本中了解的东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在您身后关上的牢门，犯人的囚服。然后，在第二天的夜里，这一次是带着对教授先生的彬彬有礼和学术上的尊敬，有人来释放了我。其间我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无法知道法国当局、我的家人等，是否被告知，是否知道我在哪里。人们向我暗示，事情可能持续至少几天，至少到节日结束，使馆才会得到通知而与我联系，而且诉讼在两个月的预审之后可能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对于这类指控的刑罚是两年，会把我和其他捷克知识分子卷入人们可以想象各种场景的诉讼中。

①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37.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就个人而言，我从这次事件中希望记取的，也希望人们记取的是，这是一个阴谋，目的主要是恐吓和瓦解所有想去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无论是否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为了表明同当地人权斗争者团结一致的人们，无论这些斗争者是否签署了宪章。是的，我就是想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在真正英勇的条件下，亦即默默无闻的条件下进行斗争。<sup>①</sup>

采访的另一部分在 20 点的新闻里播放。德里达始终受到正式指控，他希望调查尽快结束，但同时仍然强烈表达了将扬·胡斯协会的使命继续下去的愿望，以表明同 419 捷克不同政见者的团结一致。他本人也称随时准备回去。

当天晚上，让·热内同泰弗南一起来到里斯-奥朗吉斯。他追问德里达，仿佛这次的拘捕使他们更加接近：“监狱，您闻到那味道了吗？……您是否怀疑过就是您身边的人置您于这一境地的？”在这最后一点上，热内看得很正确：德里达在短暂的监禁中被近似偏执的情感吞噬。尽管他在回来时尽力显得神色自若，例如在研讨课上用几乎是幽默的口气叙述他的历险，但这整个事件对他仍然是一场真正的冲击。据好几名他身边的人说，布拉格的影响将在好几个月间不断重现：他常常感到被跟踪、监听或陷害。<sup>②</sup>

1 月 8 日，德里达给古斯塔夫·胡萨克写信要求正式道歉并洗清全部指控。这封信由外交部门转交，直到 18 个月后才收到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一份含糊的证明信，证实对他“没有进行任何司法程序或刑事追究”。德里达最终收回了个人物品，但尽管多次要求，他却从未收回被没收的箱子。<sup>③</sup>

※ ※ ※

在对这次拘捕表示同情的大量信息中，有一条尤其重要：菲利普·索莱尔斯寄给他的信，在他们决裂几乎整整十年之后。

我亲爱的雅克：

吁！

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刻人们才发觉爱的是谁。收音机，凌晨。

很奇怪，在我眼前立即出现的是您的笔迹。

---

① 法国电视 2 台关于德里达归来的全部节目可在 INA 的网页上观看：<http://www.ina.fr>。

② 同让·德里达与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③ 外交部 Courneuve 外交档案。文件 EU 1981—1985，TCH 13-2。

不管怎样，我们在一部该死的小说里，有教皇、毒品、警察、大使——以及其余。

你好爱伦·坡！显然！

新年好——拥抱您和玛格丽特（我常常想念你们所有的人）。<sup>①</sup>

420

德里达在一张印着布拉格老犹太人墓地的明信片上做了回复，看得出伤害仍然十分强烈。

谢谢，谢谢您的来信。您对我说的话直入心灵。

也就是说，需要这一切（监狱及其余）！

没关系，您的举动仿佛是我从我们的友谊中希望看到的，将近十年时间，已经十年了……

您应该知道，但我应该或者我更想说出来：就是为了严格忠于这友好的过去，我才在面对最糟的情形（攻击，侮辱，可耻的诽谤，等等）时保持沉默，而且现在回归沉默。在您的信之后，这沉默对我也许有了别样的意味，我尤其想为此向您表示感谢。<sup>②</sup>

德里达将就此为止，并且在酒会等场合，当索莱尔斯靠近时不加掩饰地躲开：这场决裂对他是属于不可弥补的。

同米歇尔·福柯则不同，后者刚一听说他被捕就在广播里发表讲话，强烈要求释放他。两人恢复了联系，先是远距离的。但一段时间之后，福柯应一位在法兰西学院短暂逗留的美国教授的请求，邀请雅克和玛格丽特在家里聚会，他的热情招待令德里达十分感动。1984年6月25日福柯的早逝使他们没有时间真正恢复关系。但在1991年，值《疯癫史》出版30周年之际，德里达以真正的慷慨大度回顾了福柯的作品，首先提到他们过去的友谊，以及“这阴影使他们在将近十年间相互视而不见，无法交流”，并肯定地说这“风暴般的争论”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像对生活”，也像对自己的全部过去那样热爱它。<sup>③</sup>

① 索莱尔斯致德里达的信，1982年1月2日。

② 德里达致索莱尔斯的信，无日期（1982年1月）。

③ Jacques Derrida, “‘Être juste avec Freud’ . 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de la psychanalyse”, in *Penser la folie. Essais sur Michel Foucault*, Galilée, 1992. Ce texte a été Repris dans le livre de Derrida *Résistances—de la psychanalyse, op. cit.*, p. 93.



421 在捷克斯洛伐克，德里达事件对法国的形象产生了十分重大和积极的影响。扬-胡斯的活动几乎立即重新开始。其中十分活跃的埃蒂安纳·巴里巴尔回忆道：“我们知道有被骚扰、搜查甚至所带书籍被没收的风险，但我们确信，在这次失败之后，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即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仍然不愿扬-胡斯协会停止活动。今天我们继续为博士生提供帮助。”<sup>①</sup>

雅克和玛格丽特到数年之后才从当年在家里秘密主持研讨课的拉迪斯拉夫·海达奈克口中得知故事的结局。1981年，一名外省官员刚刚被任命负责该警察部门。他想用一场漂亮的行动表现自己，独自设计了整个事件。他对雅克·德里达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支持异见分子的讨厌的扬-胡斯协会的积极成员。这并非针对德里达个人，事情本可以落到随便一名外国访客身上。这名官员完全不知德里达的名气，一刻也不曾想到这次拘捕带来的国际反响。他过度的意愿反倒害了他：他被降职遣回外省。许久之后，在“天鹅绒革命”后，他本人因贩毒被捕。

对德里达，布拉格事件始终是抹不去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1942年10月他从本·阿克努中学被逐出的那个阴郁的日子。仿佛他整个一生“被嵌在两重栅栏——两个沉重的金属禁令之间”：“无论被逐出学校还是被投入监狱，我一直相信他人有足够的理由指控我。”<sup>②</sup>这次被捕将他很不情愿地置于舞台前景，但这无疑是让他在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事件之一。他有一天写道：“在布拉格的这次被捕从根本上说是我一生中最名副其实的旅行。”<sup>③</sup>

① 巴里巴尔的见证。

② Jacques Derrida,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71 et 277.

③ Jacques Derrida et Catherine Malabou,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39.

## 第 22 章 新的牌局 (1982—1983)

1981 年春，雅克·德里达对于左派上台不如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表现得那么热情。的确，他个人的情绪正处于最阴郁的阶段。1981 年 11 月，他接受了《解放报》题为《哲学礼赞》的长篇采访，质询新的社会党政府准备赋予哲学什么样的地位。弗朗索瓦·密特朗本人十分关注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和哲学大会反对哈比改革的斗争，曾在选举前保证一旦胜利，哲学教育将得到“维持与发展”。德里达认为亟须提醒他注意自己做出的承诺。<sup>①</sup> 422

从布拉格事件和爱丽舍宫为释放他而直接干预之后，形势变得十分有利。他从不同的方面获知哲学将不会被遗忘。但德里达并非唯一在积极活动的人。1982 年 1 月 19 日，在杰克·朗组织的“创造与研究”研讨会上发言后几天，让-皮埃尔·费伊同研究与工业部部长让-皮埃尔·舍维纳芒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取得了联系。这时弗朗索瓦·沙特莱正试图在巴黎第八大学组建一个实验性的哲学系，巴黎八大的前身即遭到阿丽丝·索尼埃-塞伊特破坏的文森纳大学。舍维纳芒为了汇集所有的想法，在 1982 年 3 月 13 日组织了一次工作午餐。这次聚会可以看成国际哲学院的奠基行动。 423

多米尼克·勒古解释道：“前高师学生、部长办公室技术顾问菲利普·巴莱 (Philippe Barret) 在此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他是骨干人物。巴莱完全清楚德里达在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和哲学大会中的作用，他知道没有他什么都做不成。他想请德里达加入费伊和沙特莱的倡议，也让我加入团队，使得科学哲学不被人遗

---

<sup>①</sup> 载《解放报》，1981 年 11 月 21 和 22 号。这次采访重载于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499-510。

忘。他忽略了德里达和费伊之间的旧日怨怼。后者很难接受把项目协调的工作交给德里达而不是他，而这在沙特莱和我本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的。”<sup>①</sup>

创办国际哲学学院的工作于1982年5月18日起步。按照部长的定义，这项计划完全符合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和哲学大会的宗旨。

哲学研究今天在法国仍然只有狭小的空间，仅限于大学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某些部门，通常互不相干。

目前，政府准备将哲学的学习扩大到中等教育阶段，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应该保证最适应其发展的条件和工具。……

为此前景，我认为应当研究创办一所国际哲学学院的条件，它将是科学研究与培训的中心，有利于创新思想，接纳新的研究与教学经验，并可同国外类似机构结成富有活力的关系。<sup>②</sup>

5月25日，一封邮件在法国和许多国家广为传播，报刊也对该项目做出了回应。424 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提供帮助的要求大量涌入。有些日子一天能收到几十封，有许多是致德里达本人的。正如他对保罗·德·曼所说，他生活在“一种疯狂的亢奋中，完全不符合（我的）兴趣和口味”，背景则是面对与国际哲学学院相关的一切“虚荣、危险和阻碍所感到的焦虑”。特别是这一计划的发展处于“陷阱、贪婪、仇恨与战争”的氛围，他让德·曼自己去想象。至于个人情形，德里达像往常那样做出了相当阴暗的观察。

从本质上看，相当奇怪和可疑的是，新政府对我表现出不少“象征性的”尊重，发出了许多同我方向一致的信号，但从未真正做出什么承诺（比如看不到任何迹象会有一个稍微体面些的职位）。人们对我做出了最好的表示，但仅限于表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也了解自己——我并不排除这一切可能有个糟糕的结局。<sup>③</sup>

这并不妨碍德里达在7月底陪同杰克·朗赴墨西哥参加世界文化部长会议。在将载入史册的讲演中，杰克·朗谴责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德里达几天后为这

① 同多米尼克·勒古的访谈。

② Lettre citée dans *Le Rapport bleu, les sources historiques et théoriques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ouvrage cosigné par François Châtelet, Jacques Derrida, Jean-Pierre Faye et Dominique Lecourt, PUF, 1998, p. 2.

③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2年7月15日。

“十分丰富的体验，这次机会和这项荣誉”而感谢他。他对“这几天的友好默契”感到高兴，希望国际哲学学院能够从他的建议和支持中获益。<sup>①</sup>

※ ※ ※

早慧的皮埃尔 19 岁时一次成功进入了高师。这激起了德里达的许多回忆：“整整 30 年了，一天不差。我进入同一所学校时 22 岁，经过两次失败和那许多痛苦……奇特的经验，奇特的情形，不是吗？”<sup>②</sup> 他给保罗·德·曼写道。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踌躇之后，皮埃尔最终选择了哲学，在他看来哲学课程更自由也更有趣，尽管文学仍然是他的最爱。但名叫“德里达”可不那么容易成为哲学家。“我向一位老师宣布决定选择哲学时，他对我说这无异于自杀”<sup>③</sup>，皮埃尔回忆道。 425

可惜另一个消息给这个夏末蒙上了阴影。虽然几个月来身体一直不适，保罗·德·曼却下不了决心去看医生。1982 年 7 月，因为担心他的状况，杰弗雷·哈特曼和妻子为他约见了一名医生，后者立即送他去纽黑文接受深入检查。就在肝旁边诊断出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德里达是保罗·德·曼最早通知的人之一，先是在电话里，随后在一封几乎很平静的信里。

从回家以来我好多了，开始吃饭，睡觉，偶尔散散步，品尝养病期间秘密的快乐。所有这一切，像我对您说的，在我看来奇迹般地有趣，很好玩。我一直都知道，但这次得到了证实。像人们说的那样，离死亡越近就赢的越多——这“被谤称死亡的清浅的小溪”。比起“肿瘤”的暴力来，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说法。<sup>④</sup>

接下来的几个月，德里达和德·曼常常通过信件和电话联系。疾病与死亡的危险使他们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

※ ※ ※

1982 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提出建议无果之后一段时间——雅克·德里达第

① 德里达致杰克·朗的信，1982 年 8 月 5 日。

②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2 年 7 月 15 日。

③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④ 保罗·德曼致德里达的信，1982 年 8 月 24 日。这个片段被德里达在《记忆：致保罗·德·曼》中引用过，18 页。

一次接受在一部电影中露面。在英国导演坎·麦克马伦 (Kan McMullen) 的长片《鬼舞》(Ghost Dance) 里，他在帕斯卡·欧吉尔 (Pascale Ogier) 旁边扮演自己，有一种既奇特又引人注目的情调。拍片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向哲学家解释电影术语“eye-line”，即眼睛在对方眼睛里，互相注视，他对此记忆深刻。

426 影片更长的一段在德里达的办公室展开。帕斯卡·欧吉尔问他是否相信鬼魂，他于是就“幽灵性”(la spectralité) 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演讲，这一主题将很快在他的作品中占中心地位。

人们是否首先会问一个鬼魂是否相信鬼魂呢？在这里，鬼魂就是我……当人们让我在多少有些即兴成分的电影脚本中扮演我自己时，我感到这是让一个鬼魂在我的位置说话。诡异的是，我不是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在我不知情时让一个鬼魂自我腹语，也就是在我在的地方说话。……电影是鬼魂的艺术……是让鬼魂归来的艺术。……在我看来，这一切在今天应该在电影艺术前所未有之处与精神分析的某些东西进行交流。我相信“电影 + 精神分析 = 鬼魂”的科学。……我相信未来属于鬼魂，科技将成倍放大鬼魂的能力。<sup>①</sup>

德里达谈到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还有他的对话者的鬼魂。当时他怎能想到女演员将在1984年24岁时陨落呢？他将数次提到，她的死给这次谈话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回响。

我在即兴发言的最后大概是这么对她说的：“那么您呢，您相信鬼魂吗？”她在导演要求下至少重复了30遍这短短的一句话：“是的，现在，是的。”就在镜头里，她重复了至少30遍。这已然有些奇异，幽灵般的，错位的，出于自身，一次中发生了好几次。但想象一下我的体验，两三年之后，其间帕斯卡·欧吉尔已经过世，我在美国应希望同我讨论的学生的要求重新看了这部电影。我看到银幕上突然出现了帕斯卡的面容，我知道这已是一名死者的面容。她在回答我的问题：“您相信鬼魂吗？”她几乎直看进我的眼睛里，继续在银幕上说：“是的，现在，是的。”什么现在？几年后在德克萨斯，我惊奇地感到她的幽灵的回归，她的幽灵的幽灵回来对我说，此时此刻对我说：“现在……现在……现在，”

427

---

<sup>①</sup> 这一片段可在互联网上观看，特别是以下网址：<http://www.youtube.com/user/kenmcmullen-web>。



也就是在另一个大陆的一间幽暗的大厅，在另一个世界，就在那儿，现在，是的，相信我，我相信鬼魂。”<sup>①</sup>

在离他更近的地方，很快会有另一场丧亡萦绕着他。1983年4月3日，德里达在耶鲁时，他的外甥马克——雅尼娜和皮埃罗·迈斯凯尔的儿子、玛蒂娜的兄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这场突兀的死亡对他和全家都是“令人惊恐的伤痕”<sup>②</sup>。德里达将一直在书桌旁摆放马克的照片，就在他的父亲和小弟弟诺尔贝的照片旁边。

※ ※ ※

从1982年夏天起，关于未来的国际哲学院的会议越来越多。在给德里达的一封信里，让-皮埃尔·费伊说很高兴他们的两种方案将结合起来：“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共事许多年。”<sup>③</sup>可惜现实并非如此，而是冲突不断。

多米尼克·勒古讲道：“我们没有立刻意识到德里达和费伊彼此仇视，而且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消极情绪。一开始，弗朗索瓦·沙特莱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他不久病倒了。杰克·朗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本人大概给想要掌管学院命运的费伊带来了希望。他确信德里达窃取了本应属于他的位置。两人之间关系持续紧张，事件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断发生。不断有诸如钥匙、办公室的分配等冲突的阴影。”<sup>④</sup>

在根本问题上，分歧同样很大：让-皮埃尔·费伊幻想将学者与艺术家聚集在一所声名卓著的机构：他对勒内·托姆（René Thom）、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和“自我—组织”这样的问题深感兴趣。而对德里达，首要问题是接纳关于新的形成中的主题的横向研究，同时避免国际哲学院迅速变得与别的机构没什么两样。他在《解放报》上解释道：

428

我们预计采取独特的方式，以保证尽可能严格的职业伦理。例如没有教授席位，没有任何长期职位，只有相对短期的合同。因此而有轻巧的结构、团体性、机动性、开放性、多元化，注重恰恰不够“合法化”的研究，或者是在法

① Jacques Derrida et Bernard Stiegler, *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Galilée-INA, 1996, p. 133-135.

② 德里达致皮埃尔·富歇的信，1984年1月25日。

③ 让-皮埃尔·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82年9月6日。

④ 同勒古的访谈。关于国际哲学院的成立经过也基于对玛丽-路易丝·马莱和让-皮埃尔·费伊的访谈。

国或国外机构中太少进行的研究。<sup>①</sup>

德里达认为，在这个不应该变成“贵族的封闭的‘高等研究中心’”，甚至也不是“高等教育中心”的地方，关键是能够严格选择研究计划。他坚持认为学院应当向“来自‘科学’、‘技术’、‘艺术’的最激烈的挑战”开放。但他也希望——他一直抱持这个想法——能够不独尊学历地招聘教师和课程负责人。

1983年10月10日星期一，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他接任让-皮埃尔·舍维纳芒、杰克·朗和罗日-热拉尔·施瓦兹堡（Roger-Gérard Schwartzberg）正式将国际哲学院安置在笛卡尔街1号原综合技术学校作为临时校址。哲学院设置了一个双重结构：一个是“临时学院”，德里达全票当选为院长，另一个是“高级智囊委员会”，由让-皮埃尔·费伊主持。但这个对立结构并未缓和紧张关系，反而增加了冲突。首先，所有决定需经两位负责人共同签署，包括所有研讨课的课程表，但立即出现了学院全面瘫痪的危险。在临时学院威胁集体辞职之后，学校通过了更加灵活的内部规定。费伊很高兴能够达成共识，并再次表示，希望看到两个部门“相互促进和丰富”<sup>②</sup>。

429 外部事务并不更简单，因为就在开幕前，国际哲学院已经招来了许多幻想和覬觐。许多人希望在其中找到自己梦想的职位。萨拉·考夫曼就对德里达抱怨说没能加入“组织”。她对她说，自己很快理解到，如果除了几个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这样遥远的同盟之外，再加上“人们说的‘四人帮’或‘强盗帮’之外的又一位朋友”，将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的，而且在策略上是笨拙的”。由于需要外省人，他提名菲利普或让-吕克，还有里昂的玛丽-路易丝·马莱。这些详尽的解释仍未能让萨拉·考夫曼感到自己未被排除在外。<sup>③</sup>

德里达也希望委任阿维塔尔·若奈尔一些职责，她尽管在普林斯顿和柏林获得了赫赫的学位，其职业生涯却未能起步。她讲道：“负责的人看到我的简历时，一切都很好，但一旦他们面见我，事情就糟了。和我的脾气也许有关系。身为女人当然没什么用。国际哲学院成立后，德里达想让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我掌握英文、德文和法文，对这三个国家又有充分的了解，他认为我能够负责国际交流，对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D’un certain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encore à venir”, entretien avec Jean-Loup Thiébaud, *Libération*, 11 août 1983. 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19.

<sup>②</sup> 费伊致德里达的信，1983年9月28日。

<sup>③</sup> 德里达致萨拉·考夫曼的信，1983年9月23日。这封信激起了萨拉的伴侣亚历山大·克里特索斯（Alexandre Kyritsos）的粗暴回应，对之德里达也强硬地做出了答复。

此他非常重视。但最终没能实现，我在伯克利找到了职位，这让他不太高兴，因为这所学校在他眼里是个顽劣的‘敌人’，特别因为塞尔在那里。但我情愿把自己定义成解构的‘忠诚战士’，这是一个去那里的附加理由：在美国西海岸，德里达那时的影响很小，因而可以开展许多斗争。但他有时不信任我。他在我们关系的早期说过，有一天我会向他开战，而我早已决定永远不会如此，无论怎样，开战都不会因为我。”<sup>①</sup>

国际哲学院的创立迫使德里达比以往更多地出现在媒体上。1983年夏，一篇两页的访谈发表于《解放报》，配有一幅相当有浪漫色彩的肖像，似乎对标题提出反证：《学院将不会有院长》。9月9日，轮到《新观察家》发文《不屈的德里达》。介绍短文很能说明那时公众对他的看法：

430

如果说在德斯坦的七年任期内，哲学受到的威胁一直到高中的话，今天它则以最有利于人类智慧未来的形式享尽荣耀，这全亏了雅克·德里达，这位刚刚在三个部的支持下成立的国际哲学院的主要发起人。然而，这位53岁的思想家—作家在法国既著名又不被了解，既受尊重又被无视。他不受保护僵化知识的大学的青睐，在公众舞台上也极为低调。雅克·德里达并不玩游戏。他是边缘的探索家，在他多形态的作品中，他使哲学、精神分析、文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对这位热心游走于他人——胡塞尔、康德、弗洛伊德、尼采、热内、雅贝斯、列维纳斯、莱里斯——作品的思想家，人们常常责备他风格的艰涩。他尽量简单地向卡特琳娜·大卫解释了他认为今天对思想构成威胁的误解与陷阱。<sup>②</sup>

就在这次谈话中，德里达第一次接受吐露了一些自传性的事实，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反犹主义、他成长的年代，并回顾了布拉格事件。他对媒体的态度开始转变。无论多么犹疑，他知道今后无法摆脱它们。1981年4月，《读书》（*Lire*）月刊推出一项大型调查，目的是确定最有影响力的法国知识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名列榜首，随后是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贝尔纳-亨利·莱维位居第九。德里达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36人的名单上。尽管当时他的工作并不面向公众，但这一缺席只能让他感到受伤。

431

从1981年反对他的运动开始，高师的形势远未好转。新的领导层增加了许多令

①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若奈尔致德里达的信，1983年10月8日。

② 《新观察家》，1983年9月9日至15日。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23.

哲学导师烦恼的措施，规定了一些此前没有过的行政限制。德里达比以往更想离开。他必须找到新的职位，而国际哲学院无论如何无法为他提供这样的位置。1983年8月，他在给鲁道夫·加什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进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HESS）的可能性。那里有可能为他设立一个“哲学机构”的研究指导职位。选举应在11月举行。“虽然人们对我说，我的机会很大，经验还是让我对依赖于学院派和我亲爱的同事的一切抱着极为谨慎和不信任的态度。我将把这一态度保持到最后一刻。”<sup>①</sup>

尽管几年来一直担任高等研究学校研究主任的毕仰高向他保证，不必“有任何担忧”<sup>②</sup>，德里达仍然忧心忡忡。11月份选举接近时，他坚持要老朋友尽量积极地支持他。

原谅我又用这个问题来打扰你。我本不敢这么做，如果在这些可恶的机构剩下的时间里，事情对我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见到了（雅克）·雷韦尔（Revel）（历史学家），他看起来（虽然并不想让事情戏剧化）很担心，以至他本人希望12月9号时你在场。当他对我这么说的时侯，我理解事情可能因为几张选票而变化。请你这么做让我感到很尴尬，很有负罪感，但你现在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怎样的世界！）如果你能来尽量说服你的朋友，我就会放心些。<sup>③</sup>

投票当晚德里达将在威尼斯参加一个研讨会，但他请毕仰高事后立即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无论结果如何。“这一切让我忧伤，出于许多原因，但怎么办呢？”《中国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十分了解旧日室友的秉性，他表现出无懈可击的支持。

我会来的……我已经决定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不想让任何旁人对你宣布结果，它只会是好消息。别担心！我知道你还是会担心，但你不必。两周之后，别了高师！以后你尽可以同高等学校这另一个“可恶的机构”作对，但至少这是个美差。<sup>④</sup>

这一切都不能让德里达完全放心。几天之后，他又对热拉尔·热奈特提出请求，尽管几年来他与热奈特几乎已没有什么来往。南泰尔的伤口仍然新鲜，德里达想不

---

① 德里达致加什的信，1983年8月22日。

②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83年9月20日。

③ 德里达致毕仰高的信，无日期（1983年11月）。

④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1983年11月27日。

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次失败。

你大概知道我是高等研究学校的候选人，投票将在12月9日进行。如果你不反对我的候选资格的话（这是我今后唯一的机会，不把余下的职业生涯耗在这个让我“无法生存”的学校里当助教），能否请你到场？我本来永远不敢向你要求这样的支持，如果事情对我不是十分严重的话，如果不是令人不安的流言传到我耳中的话，我不知道流言来自哪里，也难以衡量其严重性。我只能体面地向两三个朋友谈起此事——同时还在犹豫……原谅我的举动。<sup>①</sup>

幸运的是，投票如毕仰高预测的一样顺利完成。在许多方面，这个在高等研究学校的新职位对德里达将意味着真正的解放。不幸的是，几天之后，阴郁的消息从美国传来。保罗·德·曼的病情严重恶化。两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几乎每天长时间通话。德里达为友人的状况而震惊：

刚才在电话里我感到您的声音是如此疲倦，而我是如此失望地得知情况好转还需要等待，我感到如此无奈，无语。但您知道，不是吗？我的心在您身边，我的牵挂在这场考验中时刻陪伴着您。我同您一起等待，守候着消息，我多么希望能够帮助您耐心地等到体力恢复。<sup>②</sup> 433

1983年12月21日，保罗·德·曼死于癌症。德里达取消了去波兰的旅行，很快抵达美国。他怎能想象得到德·曼的逝世不久将对他和解构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① 德里达致热奈特的信，1983年11月29日。

② 德里达致保罗·德·曼的信，1983年12月12日。



Ⅲ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84—2004





## 第 23 章 解构的领地 (1984—1986)

在 2003 年 3 月同埃莱娜·西克苏进行的一次公开讨论中，德里达提到 1984 年夏天在一个研讨会上人们问过他的问题。“为什么你说 1984 年？”西克苏问道。下面的简短对话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无关紧要。 437

**德里达：**因为这是一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在 1984 年，因为 1984 年对我是十分特别的日子或年份，这一年我写了关于乔伊斯的这篇小东西（《尤利西斯留声机》），这一年，几个月之后，我在乌尔比诺朗读了它。那时发生了这……

**西克苏：**你仍旧记得日子吗？了不起！

**德里达：**不，1984，我不会用这个来烦你，我有理由记得这一年，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特别年份之一……就是这样。

**西克苏：**他的记忆力让我惊讶。

**德里达：**不！我是深刻的遗忘症患者，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在 1984 年确实工作和旅行都十分繁忙，但他记得这个日子首先出于一个私密的原因，在这场公开讨论的环境中无法吐露。这一年年初对他是个震撼： 438

---

① Hélène Cixous et Jacques Derrida, “Bâtons rompus”, in *Derrida d'ici, Derrida de là*, op. cit., p. 218.

关于这一年的重要性，我还有另一个纯粹个人的信号。1984 年 8 月 21 日，德里达终于给我和玛丽-弗朗索瓦丝·普里萨寄来了他为摄影集《注视的权利》撰写的评论文稿，他在信中写道：“你们能原谅我这漫长的延误吗？如果我能向你们描述去年夏天以来我的‘生活’的话，也许你们会多少原谅我。”这句话当时在我看来不过是个永远过于忙碌而且极为细腻的人的修辞手法。直到写作本书时我才真正理解它。

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向他宣布自己怀孕了。孩子的问题从1972年起就在他们之间提出来了。“绝对的幸福”从1978年开始坍塌：双方不无痛苦地取得了一致，希尔维亚接受了流产。但这一次，她38岁了。雅克感到瘫软，他无力承担一个孩子，然而他又曾对此有过幻想，像面对既希望又不可能的事。<sup>①</sup>同玛格丽特的联结在他眼里牢不可破，做父亲对他太过重要，他不能接受只经历一半。他让希尔维亚独自做决定，但对她保证无论她怎么做他都会同意。他本人则不能承担两个家庭。希尔维亚发现自己面临着生命中最重大的抉择。赌注并不仅仅是同雅克的分歧，而首先是一个孩子的降生。她必须做出这关乎生死的决定。<sup>②</sup>

439 希尔维亚和雅克之间的关系已经历过好几次波折，但每一次激情都占了上风。这一次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们的故事没有出路。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能一下斩断。雅克·德里达和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并在许多项目中有合作。她在1986年作为课程负责人和指导委员会成员进入国际哲学院，后来又在1991年作为资格教师进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直到1996年，她一直继续在“实效的哲学”丛书发表作品。当希尔维亚和雅克在同样的职业环境里见面时，他们的关系看起来颇为平和，至少在头几年是这样。<sup>③</sup>

丹尼尔·阿加辛斯基出生于1984年6月18日，是雅克为他取了这个名字。希尔维亚先是独自抚养孩子，后从1990年起和利奥奈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共同抚养，并在1994年与若斯潘结婚。德里达在孩子出生不久大概至少见过一面。但他对这第三个儿子的存在极力保守秘密，特别是在母亲、兄长和妹妹那里。他对皮埃尔和让只字不提，但他们很快便知道了。“我很早就从伙伴们那里听说了丹尼尔的出生，”皮埃尔回忆道，“从童年起我就同父亲身边的人来往密切，其中好几位成为我的朋友。虽然他小心翼翼，但不少人还是知情的。无论怎样，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勒内·马若尔和其他几人在他们分手很长时间之后继续与希尔

---

① 在1977到1979年间撰写的《明信片》中的《发送》部分里，孩子的主题已然无处不在。但在那里，孩子被指为是不可能的。“见鬼吧孩子，我们将只说这个，孩子，孩子，孩子。我们之间不可能的信息。……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同意，就从那天起，当一切很清楚，我们之间永远没有任何和约，任何封缄的担保，甚至任何回忆都不会将我们挽留——甚至没有孩子。”（*La Carte postale, op. cit.*, p. 29-30.）“在我们之间，我一直以为（你不这么想，我知道）没有子女便是运气。这是对无穷尽的世代传承，亦即毫无世代传承的赌注，最终相爱的条件。事情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孩子留下来了，活的或死的，所有幻想中最美和最生动的，就像绝对的知识那样无可估价。只要你不知道什么是孩子，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幻想，也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Ibid.*, p. 45.）

② 希尔维亚同意告诉我这一段确切和十分私密的过程。我为此向她表示强烈的感谢。

③ 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勒内·马若尔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维亚交往。但家里一直是彻底的沉默。这件事不可能被提起。”<sup>①</sup>

不过还是在玛格丽特的建议下，雅克在1986年3月6日决定正式承认这个他并不认识的孩子。但这只会让事情更加混乱，因为德里达在后来与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谈话中说，决定父性的是认可，远比基因更重要。

指出基因传授者并不等于指定一个父亲。基因传授者不是父亲！父亲是那个认可孩子的人，母亲认可她的孩子，而且不仅仅是以法律的方式。所有的模糊性都凝聚在这被太快称为“认可”的“经验”里。在法律之外或之内，其形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扭曲的；在一个结局永远无法确定的故事里，这些形态可以扩展，变得稳定或不稳定。这种“经验”将建立起一种十分复杂的象征的可能性结构，并在“基因传授时刻”和“象征时刻”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总是多少有些稳定和脆弱，从来不确定）。<sup>②</sup>

对于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由于这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有关性别差异特别是母性的问题将成为她主要的思考主题。她将在《性别冲突：易卜生、斯特林堡、伯格曼》<sup>③</sup>中研究男性/女性关系，伴侣之间的子女与冲突等问题，并在《碎片的身体》<sup>④</sup>中研究生物性与传记性之间的关系。极具揭示意义的，《性的政治》中有一章节题为“自由与繁衍”；在那里，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拉开了距离。她明确地说：“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女人只有否认她最美和最具回报的那种可能性才是自由的。”

人们常常认为，作为母亲的女人被男人利用和工具化，但人们忘记了对子嗣的关注并非男人的特权。由此观之，“工具性”是具有相互性的，谁利用了他者，谁将他者变成手段或工具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决定。今天，避孕与分娩技术让女人拥有了对自己生殖的控制，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永远不合时宜的尼采在《快乐的知识》里写道，对于一个女人，“男人只是一种手段：目标永远是孩子”。这一挑衅性的说法正在变成事实，女人庄严地选择她们将从哪个父亲那

①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78.

③ Sylviane Agacinski, *Drame des sexes. Ibsen, Strindberg, Bergman*, Seuil, coll. “Librairie du XXI<sup>e</sup> siècle”, 2008.

④ Sylviane Agacinski, *Corps en miettes*, Flammarion, coll. “Café Voltaire”, 2009.

里、在哪一时刻拥有孩子。<sup>①</sup>

这一年年初还留给德里达别的感伤。虽然无法参加保罗·德·曼的葬礼，但他还是取消了预定很久的波兰旅行，参加了1984年1月18日耶鲁大学悼念德·曼的仪式。但他只做了十分简短的发言，因为“只有力气说几句简单的话”：“以后，我会试着更好更平静地讲述将我和保罗·德·曼联系起来的友谊（它曾经并且一直是独一无二的），还有我和许多人一样，从他的慷慨，他的理智，他如此柔和的思想力量中获得的一切。”<sup>②</sup>

接下来的几周，德里达写下了三篇长篇演讲——《记忆女神》、《记忆的艺术》、《行为：一种既定话语的意义》——春天时，他在耶鲁用法语，随后在洛杉矶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用英文作了演讲，他大概是第一次去那里。这些致敬文字也许开启了他作品的新时期。首先关于记忆，他说与之有着既激情又痛苦的关系：

我从来不会讲故事。

由于我如此热爱回忆，还有记忆本身，漠涅摩叙涅（记忆女神），我始终感到这种无能仿佛是一种不幸的残缺。为什么我被剥夺了叙述？为什么我没有收到这记忆女神的馈赠？<sup>③</sup>

也是关于悼亡，它与记忆不可分割。因为这三场讲演延续了德里达在《罗兰·巴尔特之死》里开始的思考，并开启了一个长长的悼亡系列，这些文字后来汇集在《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中。这样的话语立即带有不可能性的含义，因为它们首先指向今后任何呼唤都无法抵达的那个人：

死亡揭示出名字的全部力量，这力量就在于它仍在命名甚至仍在呼唤着被称为名字的负载者，而他不再能对他的名字作出回应，或为他的名字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它揭示了死亡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它并不等待死亡，或在它那里死亡并不等待死亡。在呼唤或命名某个活着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会超过他的存在，而且已经超过他而存在，从他活着时就开始摆脱他，每次被命名或被呼唤时都说出并负载着他的死亡，每次他被写于一份名单、一个身

① Sylviane Agacinski, *Politique des sexes*, Seuil, coll. "Points", 2001, p. 83.

② Jacques Derrida, "In memoriam : de l'âme", in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15-16.

③ *Ibid*, p. 27.

份证件或一个签名时亦然。<sup>①</sup>

记忆 (Mémoires) 这个词, 德里达将用来作为以后先在美国出版的著作的题目, 我们应该在所有的意义上去理解它, 包括其最字面的含义。因为对他而言, 这次向保罗·德·曼的致敬也是回顾自身历程和几乎是第一次进行总结的机会。20多年来, 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环境使然, 来自文章、讲演和研讨课。除了《丧钟》, 他的书都是文集, 其整体轨迹只是若隐若现。而现在, 在美国, 随着翻译越来越多, 德里达成为教学的对象, 并出现了许多总结性的研究工作。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在1982年出版了《论解构》, 其明确目标就是“描述和评估文学研究中的解构实践”, 同时也将之“作为哲学策略”<sup>②</sup> 进行分析。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尝试一样, 卡勒想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归纳并使之变得有用。这种尝试意在将艰巨的、极为分散的、同所论述文本几乎无法分割的著作改造成一种万用方法。这将产生许多误解, 而德里达亦将不知疲倦地对之加以拆解。

442

※ ※ ※

这三场致保罗·德·曼的演讲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这也是战斗的文字。因为两年来反对德·曼、德里达和耶鲁学派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对抗先是局限于大学领域, 随后扩大到更广泛的报刊媒体上。其文章题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纲领: 《英文研究的危机》, 《颠倒的文字》, 《毁灭文学研究》。德里达写道:

拥有盛名, 亦即拥有强大学术权力的教授们发起一场运动, 反对在他们看来对这权力, 对其话语、公理、修辞、理论与领土范围等等的基础本身构成威胁的东西。在这场运动当中, 他们不遗余力, 却忘记了自己声称以其名义斗争的基本阅读准则和语文学规范。他们相信认出了共同的敌人: 解构。<sup>③</sup>

443

战争不只限于美国领土。耶鲁学派公开的敌人露丝·巴肯·马库斯甚至给工业与研究部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写信, 对她认为让德里达担任国际哲学院院长的“任命”提出抗议。她言之凿凿地说:

① Jacques Derrida, “In memoriam: de l’âme”, in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62-63.

②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34-35.

在德里达的主持下建立一所“国际哲学院”是个笑话，或者更严肃地说，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国家部门是否成了知识欺诈的牺牲品。大多数对哲学及其学科间联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同意福柯的话，他把德里达描写成一个实行“恐怖的蒙昧主义”者。<sup>①</sup>

部长只是将此信的一份复印件转给了德里达，并建议他“下台阶时千万别走在这位女士前面”。

※ ※ ※

无论是否有马库斯女士，国际哲学院的运转都颇为棘手。1984年初，学院真正开始活动，共设立了70个研究小组或研讨班。但正如德里达在给所有项目负责人的长信中所说，“这最初的成功只是因为特别繁重而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堪重负的工作”。与长期的紧张也不无关系。为了有所弥补，德里达提出一个重要的内部规则的变动：按他的提议，学院院长也应主持高级智囊委员会。这一提议激起了让-皮埃尔·费伊的尖刻回应。但德里达并不是为了扩大个人权力。他在信末解释道：

444 1984年10月10日，我当选一年之后，我将放弃院长的职责。我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这么做，无论我们那时到了预定程序的哪一步。……我必须这样决定，仅职业道德便已构成充足的理由，还有个人原因：简言之，为哲学院服务三年之后，负担过重，精力过度分散，疲劳，希望留些力量给别的工作。<sup>②</sup>

在这整整一年期间，尽管许多活动取得了成功，国际哲学院仍然给德里达带来了许多烦恼。行政事务在他看来十分繁重，特别是同让-皮埃尔·费伊的困难关系并未找到解决办法，尽管有过好几次与之靠近的尝试。但更深层的是哲学院的精神本身并不符合他的期望。正如勒内·马若尔所说：“一开始德里达是学院的中心和灵魂，但他没能保持很久。他同利奥塔和其他著名的负责人参加了大量会议。但很快，甚至比别的机构还快，哲学院就充斥或再次充斥了我们在别处无法容忍的缺陷。我们曾梦想的是比这个很快成立的机构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和更加国际化的体系。”<sup>③</sup>

① 露丝·巴肯·马库斯致洛朗·法比尤斯的信，1984年3月12日。德里达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引用了这封信。归于米歇尔·福柯的说法“恐怖的蒙昧主义”将被约翰·塞尔在对德里达的攻击中没完没了地引用。

② 德里达致行政管理委员会、高级智囊委员会及哲学院临时学院的信，1984年1月12日，IMEC档案。

③ 同勒内·马若尔的访谈。

当学院庆祝其20周年时，德里达不惮严厉地质询它是否只是在“苟活”。维持下来并在发展中的哲学院是他们曾经梦想的吗？“我们应该始终尽力了解这个时期是以什么为代价实现的，什么是可接受的让步、妥协或交易的界限。”<sup>①</sup>除了理论上的争辩以外，别忘了德里达的个性是他与之迅速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其他计划中还会多次出现。

我曾非常热爱哲学院，因为我是梦想并创立它的人之一，但我很快无法再留在那里。首先，领导职责过于繁重。甚至总的来说，我十分厌恶共同体，也无法忍受帮派。因此我退了出来，但对学院及其许多成员仍然怀着善意、支持和友谊。但这不是适合我的空间。<sup>②</sup> 445

这根本的保留态度将不会妨碍德里达表示与国际哲学院的团结，每当它遇到困难或其存在遭到威胁时。

对于雅克·德里达来说，就像对于其他许多人一样，美国成为国际化中转站。他的书首先被翻译成主要的欧洲语言，随后在世界各地传播。从这时起，旅行越来越多。仅1984年，除了他去了两次的耶鲁，他或演讲，或主持研讨班，或参加研讨会，足迹遍及纽约、伯克利、尔湾、康奈尔、迈阿密、俄亥俄、东京、法兰克福、多伦多、波伦亚、乌尔比诺、罗马、西雅图和里斯本。<sup>③</sup>他就各种主题发言，将周边环境变成演讲的出发点。此时此刻成为他讲话的第一个动机。他在康奈尔和哈佛的讲演《心灵，他者的发明》很能说明这一点：

我还能发明什么？

这也许是一次讲演的发明性的开头词。

请想象，一位演说家敢于这样出现在他的主人面前：他似乎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傲慢地宣称他准备即兴演讲。他必须当场发明，而他还在自问：我该发明什么呢？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在暗示，不无自负地，即兴讲演将是无法预测的，亦即同平常一样，“还是新的”，原创，独特，总之是发明性的。实际上，

① Jacques Derrida et Jean-Luc Nancy, “Ouverture”, *Rue Descartes* n° 45, *Les 20 ans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PUF, 2004, p. 28.

② *Rue Descartes* n° 45, *op. cit.*, p. 46.

③ 从1980年代初起，德里达的旅行是如此之多，不可能在本书中一一提及。在卡特琳娜·玛拉布（Catherine Malabou）和雅克·德里达合著的书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1999) 中有动人的记述。

这位演说家要足以打破规则、共识、礼节、客套话，总之打破所有社会性常规，以便从开始的第一句话起至少发明一些东西。<sup>①</sup>

446 尽管德里达著作等身，到处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却感到自己的工作配不上“工作”这个词的“高贵含义”<sup>②</sup>。特别是，他感到身体不适，正如他在1984年9月给萨拉·考夫曼所写：

我度过了（又一个！）十分难熬的夏天，我不愿用文字呻吟。（相当严重的健康问题：医生考虑了最糟糕的情况。对脾和肝的超声波检查排除了一些，还剩下胃，我害怕将在巴黎做的纤维透视检查。我瘦了6公斤——我有8和6的血压……）我好些了，下周将继续检查。<sup>③</sup>

保罗·德·曼的去世以及同希尔维亚的分手大概与几个月来侵蚀他的“不祥的预感”不无关系。最终诊断出一块大结石，需在12月底切除胆囊。这是他第一次手术和住院，对这样一个“害怕医学界的人”<sup>④</sup>，这是很可怕的事。医生建议德里达减少活动，尤其是旅行。但几乎没有效果。

※ ※ ※

此外还有出版问题令他烦恼。由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的负责人无意翻译保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德里达也不愿把自己献给友人的书交由他们出版。1985年初，他感到自己不再真正拥有出版人，于是同1962年起任迦里玛出版社编委会成员的米歇尔·德基提到将两本书交给这家权威出版社的可能性。<sup>⑤</sup>但他主要从让·里斯塔那里知道，迦里玛的人并不很欣赏他。

德基表现得十分积极。但为了让出书计划得以通过，他必须找到同盟。他认为《记忆：致保罗·德·曼》一书“也会甚至特别会让所谓的‘历史学家’感兴趣”。447 这再明显不过地暗指他们的老同学皮埃尔·诺拉，但后者没有表现出丝毫热情。德

---

① Jacques Derrida,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in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op. cit., p. 11. 他在1980年代初的许多讲演汇集在这本密密麻麻650页的书中。Peggy Kamuf在“Venir aux débuts”中对德里达的开头词进行了精彩的分析（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329-334）。

② Maurizio Ferraris, *Jackie Derrida. Ritratto a memoria*,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2006, p. 36.

③ 德里达致萨拉·考夫曼的明信片，无日期（1984年夏）。

④ 德里达致大卫和苏珊·卡洛尔（Suzanne Carroll）的信，1985年1月5日。

⑤ 德里达致米歇尔·德基的信，无日期（1985年2月或3月）。



基感到“相当孤立”，但还是说准备“一直走到底”<sup>①</sup>。除了关于德·曼的书，他也希望德里达别的作品在伽里玛出版。但德里达对之不再抱有幻想。德基将在两个月后告知他《记忆》一书被正式拒绝。在1988年出版的《编委会》中，德基生动地回顾了这段过程：

我给皮埃尔（诺拉）打电话——很久——因为他拒绝就此事面谈。我知道在复审时我们需要他的支持，以及几乎是他的决定。……他在大学和知识界的大多数敌人，主要是严格遵循海德格尔的人，都好像认为德里达思想的一切都是“滑稽的”。对一小句引语噗嗤一笑就是证明。我当然知道皮埃尔·诺拉及其顾问不属于“德里达主义”的热情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有他客观的支持。这也许是过快地忘记了这一点，即除了其他障碍之外，对于这些曾一起在路易大帝高中度过一部分青年时代的同代人和友人来说，认可曾与自己同等的人的才华是很难的一件事，他们不会为其历史命运做出贡献。皮埃尔·诺拉拒绝对此计划感兴趣，最后告诉我得“一个人想办法”。<sup>②</sup>

此事在几个月后显示出其全部意义，那时伽里玛在“当今世界”丛书中出版了吕克·费里和阿尔·勒诺的书，题为《六八思潮——论当代反人道主义》。这本题献给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小册子——它将获得可观的成功——曾受到《争鸣》杂志的主要编辑马塞尔·戈谢和弗朗索瓦·菲雷的遥控。<sup>③</sup>德里达对费里和勒诺并不陌生：这两人曾一起在瑟里斯的“人之终结”研讨会上发言；在他们演讲之后的讨论中气氛曾极为紧张。

《六八思潮》竭力表明，这一反人道主义思潮“无论有怎样的论战和分歧，其灵感来源是一致的”，该书意欲“无情地拆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和法国式的弗洛伊德主义”，最后呼吁“真正批判哲学的复兴”<sup>④</sup>。这次清算有着十分清晰的意识形态设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和拉康是其主要对象。第四章全部用来讨论德里达，其作品被形容为对海德格尔的“夸张的重

448

① 德基致德里达的信，1985年3月14日。

② Michel Deguy, *Le Comité. Confessions d'un lecteur de grande maison*, Champ Vallon, 1988, p. 75-77. 德里达只是间接地在伽里玛出版，即与宝洛·泰弗南合著的《安托南·阿尔托的绘画与肖像》(*Dessins et portraits d'Antonin Artaud*)，该书最初在德国出版商 Schirmer-Mosel 那里出版。也是在伽里玛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集体著作《致纳尔逊·曼德拉》(*Pour Nelson Mandela*)，他是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

③ 吕克·费里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在1997年3月3日《解放报》对他的专访中。

④ 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 *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 contemporain*, Gallimard, 1985, 封底。

复”。对费里和勒诺，一切都可以概括成几个简单化的公式：“如果‘福柯 = 海德格尔 + 尼采’，能写成‘拉康 = 海德格尔 + 弗洛伊德’，那么法国海德格尔主义可以定义为‘德里达 = 海德格尔 + 德里达风格’。”<sup>①</sup> 别了，对卢梭、黑格尔、胡塞尔、列维纳斯和其他许多人的分析。照两位作者的说法，在德里达和他的榜样之间，“除了修辞之外别无差异”。

因此法国海德格尔主义将彻底投身于本体论差异的象征化行动。它是法国的，甚至是非常法国的，它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其高超的品位与才力，可从一种简单而且相当贫乏的外来哲学主题中炮制出文学上的变种。这品位与才力同法国获取哲学知识的特性密切相关（论文，高师预备班，教师资格考试），因而得以服务于精神史上最惊人的搬演。<sup>②</sup>

449 尽管这分析相当粗糙，但该书仍将产生很大影响，以至德里达 15 年后在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对话录《明天会怎样》<sup>③</sup> 里进行了回顾。不错，就在《六八思潮》问世时，伊丽莎白和他在多年的不信任之后和解。她讲道：“我在第二次克吕尼的研讨会上攻击过他，轻率地将他的研究主题与卡尔·居斯塔夫·荣格拉近，德里达冷酷地回击了我。在‘面对面’的会议上，每次我发言时他都不掩饰他的恼火。但《法国精神分析史》第一卷已于 1982 年出版，我正在撰写第二卷，我感觉他应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应该跨越这陈年的矛盾。1985 年 3 月，我们第一次在里斯-奥朗吉斯见面，他询问我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在我的书中出现。我说他将被列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读者之一，并列出了他所有提及弗洛伊德的文章。还有他同拉康、勒克莱尔、亚布拉罕和托洛克，当然还有勒内·马若尔等人的关系。我们的谈话越来越自由。他特别对我详细讲述了拉康有关他儿子皮埃尔的冒昧举动。”<sup>④</sup>

德里达要求重读所有关于他的段落，但只进行了细微的改动。鲁迪奈斯库则在叙述中明确指出德里达十分独特的地位：

我越往前走就越意识到您在 20 世纪下半期法国精神分析史中的重要作用。

---

① 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 *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 contemporain*, Gallimard, 1985, 封底, 167 页。

② *Ibid.*, p. 185.

③ 在第一章《选择他的遗产》里数次提到了费里和勒诺的书，见 *De quoi demain... , op. cit.*, 2001。该书 2003 年再版于“Champs-Flammarion”丛书。

④ 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访谈。

我相信，在您同“弗洛伊德问题”的关系上，您的地位（而非您的理论）可同战前布勒东的地位相比：矛盾的和恒久的质询。最后，只有您不是模仿，您是对拉康有关重复、崇拜或单纯抵触等问题提出了质询。<sup>①</sup>

对于《六八思潮》的另一个攻击目标路易·阿尔都塞，德里达的忠诚保持不变。1983年7月，阿尔都塞秘密离开苏瓦希诊所，搬进他位于20区吕西安-娄文街的公寓。但情况仍然十分棘手，埃蒂安娜·巴里巴尔解释说：“行政收容的解除引起一片哗然，并被《费加罗报》将事态放大。他的地址被披露，我们非常担心。在公寓楼入口指示的是一个假名：贝尔日。阿尔都塞在心理上仍然十分脆弱，常常回诊所。我还记得他有一次狂躁发作，德里达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阿尔都塞对我们宣布他想要高调回归，想租下互助会址组织一次关于‘今天的共产主义’的见面会。450 这一倡议让我们很惊恐，因为这将唤醒所有的仇恨。但路易什么也听不进去。德里达和我凭经验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新的抑郁阶段开始之前让他住院。但为了避免长期住院带来的麻烦和风险，我们需要说服阿尔都塞自己要求住院。我竭尽全力也无法说服他。而德里达一次见面就做到了，这很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坦率地说，我相信任何其他人都无能为力。”<sup>②</sup>

尽管职责越来越重，旅行越来越多，德里达还是继续定期探望阿尔都塞。他们有时一起散步到离他家几步远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他们之间的交流比以往更加自由和深入。阿尔都塞开始阅读或重读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身体状况好时他很乐意同德里达讨论，后者将在同迈克尔·斯普林科的谈话中讲到：

阿尔都塞始终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着迷，但他从未公开表示过。……海德格尔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如果我允许自己以这种有些突兀的形式说出来的话，是本世纪无法绕开的伟大哲学家。……他对我说过多次，就在最近这些年在医院里还说：“听着，你得和我谈谈海德格尔。你要教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对他是个巨大的（口头）参照，他从未属于那些试图否定或贬低海德格尔思想的人，哪怕是为了您所知道的政治原因。但您知道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的某种格局，甚至是某种相互的吸引—排斥是这个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现象

① 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致德里达的信，1985年6月6日。

② 同巴里巴尔的访谈。

之一，对此我们的思考还没有完成，假设我们已经严肃地开始这么做了的话。<sup>①</sup>

451 1985年3月，就在德基徒劳地想让他在迦里玛出版时，德里达同伽利略出版社老板米歇尔·德洛姆恢复了联系。后者在1981年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人之终结》；也是在他那里，十分自然地，两年后出版了德里达的讲演文章《哲学从前采取的末世语调》。但现在涉及的是十分不同的东西。如德里达给让-吕克·南希信中所写，德洛姆提议以比弗拉马里翁更好的条件重印全部“实效的哲学”丛书。他说准备不经审议每年出版四种书，除非是集体著作或页数很多才需酌情协商。德里达希望尽快同萨拉、让-吕克和菲利普商谈此事。他个人认为“这次变动只有好处，而且也将是一次回归”<sup>②</sup>。

三位主编赞同德里达的分析。变化很快落实。1985年7月15日，夏尔-亨利·弗拉马里翁毫无遗憾地做了备案，表示愿意终结这套他们在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负责的丛书。

我理解并服从这一决定，我也要感谢你们所从事的并想到托付给我们的思考与编辑的工作。这工作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其解决方案也并非总是令人满意。……但在这十年间仍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已经或将会在哲学领域产生影响。同样确定的是，知识界的情况如出版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也许呼唤着新的思考。<sup>③</sup>

452 对德里达本人，除了丛书以外，转到伽利略出版社也并非一件小事。他同米歇尔·德洛姆很快建立起真正信任和默契的关系。与大出版社相反，伽利略的模式是德里达喜欢的“反体制”型，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他可以出版他希望出版的东西并按照他的方式，而且以越来越持续的节奏。当然，德洛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更谈不上是哲学对话者，但这大概也不是德里达所寻找的。在伽利略出版社可观的人文科学书目中，德里达的作品毫无争议地处于中心：他有大约40本书将在1986和2004年间出版。但德里达在那里也有很好的同伴。除了萨拉·考夫曼、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所有收入丛书的作者，伽利略还出版了众多名家作品，如埃蒂安纳·巴里巴尔、让·鲍德里亚、安德烈·戈兹（André Gorz）、让-弗朗索

①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and Friendship", entretien avec Michael Sprinker, paru dans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op. cit. 我的引文来自保存在 IMEC 的法文稿。

②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85年3月15日。

③ 夏尔-亨利·弗拉马里翁致“实效的哲学”丛书的四位主编，1985年7月15日。

瓦·利奥塔、保罗·维里利奥 (Paul Virilio) 等。

※ ※ ※

德里达在伽利略出版社早期出版的一本书《海域》收入了1975至1979年间撰写并发表的四篇文章：《脚步》、《余存》、《标题待定》、《体裁的法则》。这四篇文章都谈到了莫里斯·布朗肖的小说，特别是《死之中止》和《白日疯癫》。德里达在全书序言里说：

布朗肖的其他作品陪伴了我很久，它们被不恰当地归于文学批评或哲学领域。……但虚构对我来说仍然难以企及，就如同陷入浓雾，传来的只有引人的微光，或有时来自岸边看不见的灯塔的断续的光芒。我并不是说它们此后走出了这保留地，完全相反。但就在它们的隐藏中，就在它们难以企及的遥远中，就这样，它们给出了名字并降临其上，再次向我显现。<sup>①</sup>

虽然两人从1968年起就没有见过面，信件来往也很少，他们却借由一种“思想的情谊”相连接，这对他们双方始终是“生命的恩惠”<sup>②</sup>。1985年8月，一次电话交谈的第二天，布朗肖给德里达写道：“聆听您，聆听到您，这是如此感人的事件，以至我几乎不知如何回答。这也许无关紧要。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触动最深的和可说的，正在不说当中。”<sup>③</sup>六个月后，收到《海域》之后，他再次说：“对于这份对您本人而言并非没有风险的馈赠，对于这本书以及您的书，以及与此同时漫过它们的一切，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也是对与您同行过一段的感激之情。”<sup>④</sup> 453

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小书《密语——致保罗·策兰》，这是1984年在西雅图的一次讲演。德里达日益重视这位诗人，这篇十分个人的解读主要围绕着作为标题的字眼进行：*Schibboleth*，这是一个希伯来字，除了具有多重意义之外，它在这

① Jacques Derrida, *Parages*, Galilée, 1986, p. 11. 此书于2003年再版，增加了一篇文章《莫里斯·布朗肖死了》。

② 《恩惠（应该）归还雅克·德里达》是布朗肖为《法国及国外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所写的文章的题目（第2期，1990年4—6月），后收入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③ 莫里斯·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1985年8月21日。

④ 莫里斯·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1986年3月10日。引自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op. cit.*, p. 464。

里还起到了口令的作用，即许可或禁止通过严密监视下的边界。

以法莲人（Éphraïmites）被耶弗他（Jeftah）的军队打败；为了防止士兵过河逃跑，每个人必须说出“schibboleth”这个字。然而，人们知道以法莲人不能正确发出“schibboleth”里面“schi”这个音，这个字从那时起变成他们无法发音的名字。他们说的是“sibboleth”，在“schi”和“si”之间这个看不见的边界，他们对哨兵暴露了自己，冒下了生命的风险。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差异，因为对“schi”和“si”之间的语音差别不加区分；他们自我标记，因为不能对一种经过如此加密的标记进行重新标记。<sup>①</sup>

超出所有意义之外，而且不可翻译，“schibboleth”对德里达来说就意味着诗歌的完美暗喻——但他也在其中找到了其他珍爱的主题：排他与联盟，秘密与割礼。同许多时候一样，他的方法远不能让研究策兰的专家满意，他在几个月前谈到乔伊斯时嘲讽过这些“专家”。<sup>②</sup> 在1970年代初与德里达关系十分密切的著名语文学家让·博拉克承认，他们的关系在《密语》的时代恶化了：“我们两人都在西雅图的策兰研讨会上发了言。我们之间气氛仍然十分友好，但我们的研究路径难以调和。1959年起，我曾是保罗·策兰和彼得·斯丛狄的朋友。策兰死后，我感到欠了些什么。1980年，我开始致力于研读他的文字。我花了数年时间学习‘策兰的语言’。在我看来，德里达提出的解读过于大胆。我给他写信说对策兰的文字不能玩这样的游戏，而应该更多考虑到这种诗歌语言特有的结构。我本希望同他一起研读他引用过的句子，试图通过上下文加以理解。可惜德里达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不能或不再能允许这种交流。”<sup>③</sup>

《海域》和《密语》，还有数月后出版的《尤利西斯留声机》都是对读者要求很高的书，节奏十分特殊，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文学批评。就在这时，德里达同迪迪埃·卡昂一起筹备第一个广播节目《赏心乐事》，但大多数记者保持沉默，读者也日渐减少。在《别样的日记》里，卡特琳娜·大卫出色地概括了此后的主流意见：

① Jacques Derrida, *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 Galilée, 1986, p. 45.

② “我于是决定在你们面前提出能力、合理性和乔伊斯的体系问题。谁有公认的权利谈论乔伊斯，就乔伊斯进行写作，谁能做好？这就是能力、成就。”（Jacques Derrida, *Ulysse gramophone. Deux mots pour Joyce*, Galilée, 1987, p. 94.）

③ 同让·博拉克的访谈。

舆论毫不留情：德里达越界了。他不堪卒读，就连哲学家也不再理解他。有人带着暧昧的微笑承认这一点。有人疑惑这位思想家在寻求什么，他曾经把语言学置于哲学的中心，从而开创了法国精神方式的美好时代，现在却固执地迷失在令人困惑的深奥难解中。……他的书一直都很难以阅读，但从前人们至少懂得其关键所在：哲学。就算是从《明信片》开始吧，人们不再明白。他声称哲学也能经由情书、邮票、电话亭达到。他混淆了一切！别再说他了……<sup>①</sup>

卡特琳娜·大卫则确信，如果说很难对德里达进行评论的话，阅读他则是完全可能的。

为此，需要接受像在梦中的阅读，没有方法，伴随着跳跃、坠落、通向虚空的道路、开放的问题。怀着耐心……不像普通的阅读那样重在“理解”。……而在于别的，思想细微的行程，对细节、字母、沉默时间的凝想。……在这个热爱直线和捷径的时代，常识重新统治着思想的王国，被德里达放大的缓慢和曲折已成为哲学勇气的现代表现形式。 455

如果说法国对德里达无甚兴趣的话，他在美国的名气则继续扩大。解构从法文系进入比较文学系，然后又进入英文系，这让他的影响大为增加。但抵制力量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1986年2月9日，《纽约时报杂志》对耶鲁学派和德里达开火，说他是“发明解构的人”。封面宣告了《耶鲁批评家的专制》。文章的语气与之一致：“从1970年代末以来，人称‘诠释黑手党’的一群人在耶鲁文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最醒目的一些批评家采取了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努力散布他的声名与风格，同时也传播他们自己。”<sup>②</sup>

但在这个时代，耶鲁学派已不过是回忆。保罗·德·曼逝世后，这所位于纽黑文的大学对德里达已失去了主要的吸引力。只有希利斯·米勒的在场还能留住他。但1985年夏，米勒对他吐露将不再留在耶鲁。米勒解释道：“保罗·德·曼去世后，我感到翻过了一页。反对我们所代表的东西的战争不断扩大。我们再也无法获得任何一位友人的正式任职，甚至邀请德里达也越来越困难。我感到以后的几年要比我们经历过的更不快、更无趣。一位优秀的人物穆雷·克里格尔（Murray Krieger）建

<sup>①</sup> *L'Autre journal*, 22-27 mai 1986.

<sup>②</sup> Colin Campbell, "The Tyranny of the Yale Cr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9 février 1986.

456 我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这是位于洛杉矶南部的一所新学校。他是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但主要主持批评理论学院。我有意接受他的提议，但还没有做出决定。1985年8月，我在里斯-奥朗吉斯的花园里同雅克谈到此事。我还能听到他对我说：‘如果你去尔湾，我会很高兴同去。那将是一场回春浴。’他意图离开体制，害怕与之纠缠过久，成为囚徒。但大概多少也有‘征服西部的欲望’……当我说起邀请德里达来尔湾的可能性时，穆雷·克里格尔的反应很热情，他知道他的前来会照亮整个人文学科。由于他同大学副校长威廉姆·利利曼（William Lillyman）是密友，行政障碍得以迅速跨越。当我提出德里达的报酬问题时，利利曼立刻问我他在耶鲁的报酬，然后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数额上增加50%，并正式任命他为特聘兼职教授。’调动在1986年实现。”<sup>①</sup>

转到尔湾的时候，德里达决定以后用英文授课，这将使他面对广泛得多的听众。如果是较为正式的发言，比如在研讨会上，他会朗读事先翻译好的稿子。但对于研讨课，这样的程序太过烦琐。德里达满足于在法文版上加上批注，然后直接自己翻译，开始时有些缓慢，但很快就十分流畅。尽管如此，语言的变化对他仍然是个问题，理论上更甚于实践上。萨缪尔·韦伯回忆道：“一天，一名听众试图让他放心：‘您的英文十分出色，我们完全听得懂。’德里达回答他：‘问题就在这儿，我只能做到让人听懂。’擅长嬉戏于法语源泉的他很长时间里忍受着只能用英文‘沟通’的痛苦。但他对英文的掌握越来越精细。最后的几年，他能够就‘maybe’和‘perhaps’之间的细微差别做一场讲演。”<sup>②</sup>

德里达还促成萨拉·考夫曼、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登陆美国，尽管他们的英文远不如他流利。在他看来美国比法国要开放得多，而且这时“法兰西理论”风头正健。他希望他们的职业生涯从中获益，从不吝撰写既热情又有效的推荐信。1985年，让-吕克·南希来到离尔湾不远的圣地亚哥大学执教两年，这方便了他们见面。为了支持拉库-拉巴特的《文型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德里达写了40页的序，表示对这一思想的“力量和严密”充满敬仰。

我与拉库-拉巴特分享的观点，我们两人也与让-吕克·南希分享，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但我要迫切地提请注意，在他们两人和我们三人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轨迹和工作，但每人的经历仍然绝对不同，就在其独特的接近中，而这——尽管注定不纯——却是习语的秘密。秘密，亦即首先是分离、无关、中

①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米勒致德里达的信，1985年8月26日。

② 同萨缪尔·韦伯的访谈。



断。最紧要的，我将全力以赴破除一切熟悉感，避免谱系的诱惑、吸纳或同化。<sup>①</sup>

一读完这篇出色的文章，拉库-拉巴特就感动地给德里达写了一封信。友人文字的力量使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唯一来到脑海的词就是我“震撼不已”。除了我并不否认的“简单的”自恋：这是第一次我看到有人阅读我，这个人是你，不仅是你所代表的，而且是让我在思想上获益太多的你，你知道，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你是我感到归属的学派的大师，尽管我从未曾真正处在你的学生的位置。但在此自恋之外，还因为你带给这些文字的东西，对之我一直感到很不自信，无论表面上的语气如何。458 你赋予这些文字我以为不可能的信任，我刚刚开始理解它们试图说出而我却不知如何表述的东西。<sup>②</sup>

这段时期德里达还遇到了好几名前途远大的年轻哲学家。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同德里达取得了联系。如他在一本小书《过渡到行动》里所讲，他在图卢兹附近一段长期监禁过程中开始学习语言学，随后在热拉尔·格拉奈尔的支持下学习哲学。“这五年的监禁是我一生的机会，”他解释说，“由于时间是我唯一可支配的东西，我可以系统地阅读一些伟大的哲学作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还有德里达。《论文字学》在我看来像本超人的书。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我被德里达深深吸引，格拉奈尔鼓励我给他写信。我花了一些时间做决定，因为从入狱以来我就选择了一种在我看来有益的态度：对外界毫无期待。我因此十分害怕他不回复，让我灰心。然而他立刻回信了，而且十分慷慨。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10月，在巴黎，在我最早获得的一次出狱许可期间。尽管他竭力让我轻松，我还是激动得无法动弹，惊讶地发现面前就是对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作者。”<sup>③</sup>

在监禁的最后几个月中，斯蒂格勒给他寄去了一篇关于柏拉图的文章，后来成为他的硕士论文。德里达立即感到此文的质量。斯蒂格勒在信中吐露心声，令德里达十分感动，特别是因为不久前德里达刚刚经历过在布拉格的短暂拘禁。斯蒂格勒

① Jacques Derrida, “Désistance”, in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op. cit., p. 602-603.

② 拉库-拉巴特致德里达的信，1986年11月5日。

③ 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访谈。提到这段故事的 *Passer à l'acte* 一书2003年由伽利略出版社出版。

459 说对最终的释放感到恐惧多于期待：“我目前进入了写作的核心，几乎感到舒畅，我怕这自由将打碎我所有尽可能拥有这些文本的努力——在这一点上监狱是非常有用的。”<sup>①</sup>

斯蒂格勒于1983年出狱后，德里达继续陪伴着他的哲学研究。他将德里达视为不可企及的大师而崇拜，但令他惊异的是，《论文字学》的作者对他的职业未来也很关注，尽力帮助他融入社会。1984年，斯蒂格勒当选为国际哲学院为期6年的研究计划负责人。1986年，他注册在德里达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与他那时的女友卡特琳娜·玛拉布同时，她曾是丰特奈-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

德里达自从当选加入高等学校后便可以指导论文，他对此十分认真。但对学生而言，在法国的体制下，这情形远非没有风险。卡特琳娜·玛拉布解释道：“同德里达接近，还不必说同他做论文，这有点与大学决裂的意思。在法国，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都遭到过惩罚。直到今天，德里达主义的标签还贴在我身上，哪怕我的研究同他不再有什么关系。每次面对评委会时，我都会被问到几个关于他的通常是恶意的问題。当然，对总监察，特别是对教师资格考试评委会，德里达有时表现出相当大的挑衅性，但我想最令人不安的是他始终代表着对体制的独立。这独立性恰恰是我喜欢他的地方。我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不害怕可能的报复或社会颜面的人。他无法容忍对体制的顺从超越思想，用规则战胜精神上的严格要求。在更加深刻的层面，解构本身有些东西容易招致打击，即一种令人不安的思想方式。”<sup>②</sup>

460 对于雅克·德里达，解构仍然首先是一种思考哲学的方式。它并非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史谱系，分析“其概念、假设、命题，不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而且考问其体制、其社会和政治实践，简言之，考问整个西方的政治文化”<sup>③</sup>。这颇有些限制性的定义并不妨碍德里达对新的领域敞开，并投身于危险的历程。

许多人已远离政治领域，他则愈益直接地面对政治。1984年的作品《没有末日，不是现在》（*No apocalypse, not now*）讨论核战争危险，并关注里根政府的言论。他还为一场反对种族隔离的巡回展览撰写了《种族主义的最后答案》一文，分析南非政权的特殊性及其享有的国际同情。南非的事业令德里达深为感动。1986年，他为《致纳尔逊·曼德拉》一书撰写了一篇有力的长文，该书汇聚了15名作家——包括

① 斯蒂格勒致德里达的信，1982年12月16日。

② 同卡特琳娜·玛拉布的访谈。

③ Evando Nascimento,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Folha de São Paulo*, 15 août 2004.

内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埃莱娜·西克苏、卡代布·亚辛那和莫里斯·布朗肖等——共同向这位全球被关押最久的政治犯之一致敬。

在这篇题为《对纳尔逊·曼德拉的敬仰》的文章中，德里达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致敬。他深入分析了这位非洲民族议会 (ANC) 前领导人的个性、态度和写作的特点。“为什么他迫使人们产生崇敬？”他问道。首先因为“曼德拉的经历或政治热情从未脱离理论思考：关于历史、文化，特别是法律”<sup>①</sup>。德里达在曼德拉身上看到的是他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一直梦想的人物：能够利用英国民主模式反过来对抗种族隔离的拥护者，而这就是一种行动中的解构。“曼德拉始终是一位法律人，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他始终呼唤法律，尽管在表面上他不得不反对这样那样的既定法规，尽管有些法官迫使他在某一特定时刻成为法外人。”<sup>②</sup> 曼德拉在遵守法律与更加迫切的遵守良心之间建立了区别，这在许多方面接近于德里达几年之后将在《法的力量》里阐发的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区别。

461

※ ※ ※

这时德里达也开始论及神学与宗教问题，这在他的工作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6年6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高等研究学校组织的“缺席与否定性” (Absence et négativité) 的研讨会上，他以《怎样能不说》的讲演为会议拉开了序幕。他讨论了否定神学和法官狄奥尼西 (Denys l'Aréopagite) ——人称伪狄奥尼西 (Pseudo-Denys) ——的作品，也与他从前的学生，也就是《偶像与距离》和《无存在的上帝》的作者让-吕克·马里翁展开了对话。很快，德里达的工作更多以批评的方式向否定神学靠拢，他承认一直为其所吸引：

我曾经徒劳地拒绝将关于踪迹或延异的思想等同于某种否定神学，我的答案相当于承诺：有一天必须不再拖延，有一天必须尝试直接就此主题做出解释，最终讨论“否定神学”本身，假使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

如此承诺之后，仿佛不由自主，我不知道怎样能够履行这一承诺。……特别是，我不知道在何处及何时履行它。明年在耶路撒冷，我对自己说，也许是为了不确定地推迟诺言的实现。但也是为了让自已知道，我完全收到了这个信

① Jacques Derrida, “Admiration de Nelson Mandela”, *Psyché, op. cit.*, p. 454.

② *Ibid.*, p. 463.

息，在我真正去耶路撒冷的那天，不可能再推迟，必须要实现。<sup>①</sup>

462 这场丰富的讲演在许多方面为《割礼忏悔录》做了准备。在一个注释里，德里达也承认这是他从未尝试过的最为“自传性的”言论：“如果有一天需要讲述自己，这篇叙述中并没有什么会开始讲述，尽管我碰到这样的事实：因为缺乏能力、技巧或自我许可，我从未能像人们说的那样，谈论我的出生所能够给予我的最密切的东西：犹太人，阿拉伯人。”<sup>②</sup>

※ ※ ※

在这 1980 年代中期，德里达的好几次演讲涉及美学领域。他提出用一种对话形式的“阅读”来伴随《注视的权利》，这是玛丽-弗朗索瓦丝·普里萨的无声情色摄影叙事集，后来借助酷儿理论被重新发现。<sup>③</sup> 他还撰写了一篇对安托南·阿尔托的新研究，题为《逼迫画布》(Forcener le subjectile)，讨论宝洛·泰弗南编辑并介绍的阿尔托的素描和肖像画。<sup>④</sup> 他还第一次涉足莎士比亚研究，时值友人丹尼尔·迈斯基什(Daniel Mesguich) 1986 年在圣-德尼的杰拉尔-菲利普剧院排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sup>⑤</sup>。虽然他承认在莎士比亚作品面前感到“畏惧”的尊敬，他说还是希望有一天成为“莎士比亚专家”<sup>⑥</sup>。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中部分实现了这个计划，其中《哈姆雷特》出现的次数几乎同马克思一样多。

1984 年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提耶里·沙比(Thierry Chaput)筹备在蓬皮杜中心举办一场大胆展览，题为“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德里达也参与了。其中一块场地用于展出 20 多名作家的“写作校样”，包括丹尼尔·布兰(Daniel Buren)、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弗朗索瓦·沙特莱、莫里斯·罗什

① Jacques Derrida, "Admiration de Nelson Mandela", *Psyché*, *op. cit.*, p. 545-546.

② *Ibid.*, p. 562.

③ Marie-Françoise Plissart, *Droit de regards, suivi d'une lecture de Jacques Derrida*, Editions de Minuit, 1985 ; nouvelle édition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2010. 希利斯·米勒为《德里达与酷儿理论》(*Derrida and Queer Theory*)写的序中主要讨论了这部作品。该书是由 Michael O'Rourke 主编的集体著作，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

④ Paule Thévenin et Jacques Derrida, *Antonin Artaud, Dessins et portraits*, Gallimard, 1986. 这部与德国出版社 Schirmer-Mosel 合作出版的著作将为作者与阿尔托的版权所有人惹来一场官司，后面我将会提到此事。

⑤ Jacques Derrida, "L'aphorisme à contretemps", in *Psyché*, *op. cit.*, p. 519-533.

⑥ Jacques Derrida, "Cette étrange institution qu'on appelle la littérature", entretien avec Derek Attridge, *Derrida d'ici, Derrida de là*, *op. cit.*, p. 285.

(Maurice Roche) 和雅克·鲁伯 (Jacques Roubaud)。利奥塔希望“探测‘新机器’对思想形成的作用”，向他们提倡一种互动写作的方式。每人要从一张清单里选择一定数量的词并撰写短文，随后对他人的文章做出回应。概念虽然诱人，技术却尚不成熟。人们费力地在里斯-奥朗吉斯安装了一台沉重的计算机，带有一个调制解调器，还有一本简单的说明手册。当这台机器被搬进房间时，德里达感到人们带来一个怪物。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计算机，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他使用起来却将困难重重。<sup>①</sup>

※ ※ ※

这一时期最离奇的计划就是同当时最具创新精神的两名建筑师合作，即法裔瑞士人贝尔纳·楚米 (Bernard Tschumi) 和美国人皮特·艾森曼 (Peter Eisenman)。在1970年代，像那一代的其他建筑师一样，楚米努力在其学科之外寻找新的概念，特别是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他在十年间热衷于纸上建筑，展览和发表的作品多于实际建筑物。他在1982年获得拉维莱特公园国际招标项目，这是一片55万平方米的开阔地，位于原巴黎屠宰场。楚米决心标新立异。这块地方要连接大演出厅、音乐城、科学城、球幕影院和天顶剧场，他想将此地变成“21世纪第一公园”，用一连串他称为“疯狂”的红色小建筑物点缀空间。楚米是这个宏大项目的首席建筑师，希望邀请别的创造者参加。他首先想到利奥塔与保罗·舍莫托夫 (Paul Chemetov)，但利奥塔这位《后现代状况》的作者表现出颇为怀疑的态度。楚米回忆道：“德里达则正好相反。我打电话时他立刻表现出兴趣，并来到我那时在巴黎北站附近小小的事务所与我见面。我同他说起皮特·艾森曼，他是引人注目的纽约建筑师，出生于1932年，但还没有名气。几个月后在美国我引见他们两人认识。德里达表现出的慷慨仍然让我吃惊。他尽管如此繁忙，却总能找到必需的时间。”<sup>②</sup>

虽然对建筑和解构之间过于轻易的移植持怀疑态度，德里达仍然为这一历险所吸引。他就楚米的工作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随后同意与艾森曼合作。楚米交给他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in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 17, 2001.

<sup>②</sup> 同楚米的访谈。德里达有两篇文章与拉维莱特公园项目有关：《疯狂之点——现在建筑》[“Point de folie—maintenant l’architecture” (première publication in Bernard Tschumi, *La Case vide*, coffret comportant des essais et des planches, édité à Londres en 1986)] 和《为什么皮特·艾森曼写了这么好的书》[“Pourquoi Peter Eisenman écrit de si bons livres” (première publication dans la revue japonai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Tokyo, 1987)]。两篇文章均重载于 *Psyché*, *op. cit.*

464 们一块 30 平方米左右的相当狭小的土地，但他们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建造一座“疯狂”小屋。德里达的第一个贡献是纯粹哲学性的：一篇关于 *Chora* 或 *Khôra* 的文章。这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用词，在他看来无法翻译，意思是处所、空间或位置。<sup>①</sup> 但是当具体讨论开始时，一种奇特的分歧出现了。德里达常常回到极为实际的问题——他担心天气不好的时候没有长凳、植物和遮蔽处，而更强调概念的艾森曼则为对话者的“建筑保守主义”感到恼火。德里达终于采取行动，在一次见面时说：“皮特，我提个建议：在我们的合作中，就当您是梦想家，而我是建筑师和技师。您将是理论家，我来负责实际效果。”<sup>②</sup>

经过两年时而艰难的讨论，项目最终搁浅，主要是出于预算原因。最终只留下一本书《*Chora L 作品*》，讲述了他们的合作经历。但德里达并未放弃建筑。很快出现了一个对他的概念不无扭曲的解构潮流，是德里达式的解构与俄国构成主义的奇特结合。1988 年，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组织了一场题为“解构主义建筑”的展览，汇聚了一系列最前沿的建筑师——扎哈·哈西德（Zaha Hadid）、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皮特·艾森曼、贝尔纳·楚米和奥地利建筑师事务所蓝天组。尽管德里达并未参与，法国媒体仍然做出了负面反应。让-皮埃尔·勒当代克（Jean-Pierre Le Dantec）说德里达被“一个小团伙吸了血”，让-路易·科昂（Jean-Louis Cohen）则认为，无关理论，“俄国先锋派与法国哲学家的交配仿佛产生了一个怪胎”<sup>③</sup>。

① *Khôra* 先于 1987 年出现在“Poikilia. Etudes offertes à Jean-Pierre Vernant”一文，后来独立成书，1993 年，伽利略出版社。

② 德里达参加的七次工作会议的记录后来收入 Jacques Derrida et Peter Eisenman, *Chora L Works*,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7, p. 48。我翻译成法文。

③ Propos cité par François Chaslin, “Derrida: déconstruction et architectures”, *L'Humanité*, 26 octobre 2004。德里达和解构主义运动的关系是下面这本书的主题：Mark Wigley, *The Architecture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s Haunt*, MIT Press, 1993。

# 第 24 章 从海德格尔事件 到德·曼事件 (1987—1988)

进入高等研究学校以来，德里达能够每年选择自己的主题而不必再考虑教师资格考试。他从 1984 年起关注的问题是“哲学上的国籍与民族主义”。从 1986 年秋天起，他给予了这个题目一个特别的转折，将之命名为《康德：犹太人，德国人》。问题是哲学的，却毫无学究气：465

你们可能已经理解，在这个研讨课上，我感兴趣的是犹太—德国这一组概念的现代性，其过去和未来，我相信它独一无二，就其类别而言独一无二，没有它就无法理解德国的历史、纳粹的历史、犹太复国主义……亦即我们时代的许多事件。<sup>①</sup>

一堂接一堂课，德里达耐心地研读费希特（Fichte）、尼采、阿多诺（Adorno）、汉娜·阿伦特，还有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米什莱·托克维尔（Michelet Tocqueville）的文字。别忘了还有海德格尔，他几乎每年都回到这位哲学家这里，带着激情与张力。德里达断定“人只能在他者的语言里思想”，与海德格尔展开了明确的论辩，后者在身后发表于《明镜》周刊的著名访谈中支持下面的观点，即“人只能在他的语言——他自己的语言里思想”，并意欲“阐明希腊文和德文作为思想性语言的优势、卓越和不可替代性”。

德里达直接延续这些思考，于 1987 年 3 月在国际哲学院组织的“海德格尔——466 开放的问题”研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论精神》的演讲。德里达追溯了“精神”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Kant, le Juif, l’Allemand”, séminaire inédit, archives Irvine.

(*Geist*) 一词在海德格尔最经典的哲学文本及其 1933 年著名的《校长就职演讲》中的轨迹。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访谈中解释的，“就在其言论耸人听闻地站在纳粹一边时，海德格尔重拾他过去禁用的词‘精神’，去掉了曾经加上的引号。他对从前投身的解构运动加以限制。他秉持着一种唯意志的和形而上学的话语，后来又对之加以怀疑”<sup>①</sup>。

研讨会开完几周之后，对克劳斯·巴比 (Klaus Barbie) 的高度媒体化的审判将纳粹问题推到了时事前沿。1987 年 7 月 4 日，经过两个月的审讯之后，巴比被罗纳重罪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同年 10 月，维克托·法里亚斯 (Victor Farias) 的书《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引起强烈反响。书中提出的问题却不是新的。比如，在法国，让-皮埃尔·费伊就长期研究过这一问题，德里达则早在 1969 年就面对过他的抨击。<sup>②</sup> 但关于海德格尔的争论同关于塞利纳 (Céline) 的争论一样，像条海蛇一般每 15 或 20 年就会浮出水面。

法里亚斯的作品虽然用西班牙文写成，但的确首先在法国出版。这并非出版程序上的偶然。序言作者克里斯蒂安·让贝 (Christian Jambet) 说：

海德格尔在战后成为一名法国哲学家。在法国，他的思想遇到最多的反响，也是在法国，它被认为是最适应现代性事件的哲学。……他的思想对许多研究者来说具有一种不辩自明的效果，这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任何其他哲学在法国都未曾获得过的。本体论完成于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有步骤的解构。<sup>③</sup>

467 克里斯蒂安·让贝的话引起的反响几乎超过了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生平的研究，随后的几天里立即在许多文章中被转载和放大。乔治-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 在 1987 年 10 月 15 日的《早报》上以《海德格尔——纳粹斗士和思想家》为题写道：“维克托·法里亚斯的书今后将使人无法再进行原地打转的哲学思考，并迫使‘巴黎的海德格尔者们’直面一些问题，他们早就知道这些问题将使它们企图在文中阐述的东西变为空谈。”《胜利万岁海德格尔!》是第二天的《解放报》上的标题：其试图攻击的对象也是法国的海德格尔者，作者罗贝尔·马焦

---

① Jacques Derrida, “Heidegger: l'enfer des philosophes”, entretien avec Didier Eribon, *Le Nouvel observateur*, 6 novembre 1987. Cet entretien est Repris dans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97.

② C'est En 1972 qu'est paru aux éditions Hermann le livre de Jean-Pierre Faye, *Langages totalitaires* (précédé de *Théorie du récit*).

③ Christian Jambet, “Préface”, in Victor Farias, *Heidegger et le nazisme*, Verdier, 1987, pp. 13-14.



利（Robert Maggiori）谴责他们从不愿思考“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犯下的恶行所保持的绝对沉默”。

就在此刻，德里达的两本新书在伽利略出版：一本小书《论精神——海德格尔和问题》（*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及一本巨著《心灵》（*Psyché*）。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误解，《论精神》被看成是对法里亚斯的回应，而德里达并不曾做出这样的声明，但他不想逃避。在接受迪埃埃·埃里邦的长篇采访时，他立即用激烈的论战口气提到了法里亚斯的书：

关于重要的“事实”，我在这份调查中不曾发现任何不是早已为人所知的事，只要是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人。至于某些档案的整理工作，其成果在法国可供参阅是件好事。其中最可靠的部分从伯恩德·马丁（Bernd Martin）和雨果·奥特（Hugo Ott）的研究开始就可以在德国找到，该书作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引用。除了需要谨慎对待的某些资料和一些事实问题，人们将特别讨论——关键在于讨论应该始终是公开的——姑且说是有关诠释的问题，这种诠释将这些“事实”与海德格尔的“文本”和“思想”相联系。文中的解读，如果算是解读的话，很不充分，或者说值得商榷，时而又如此粗糙，让人怀疑调查者对海德格尔的阅读有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人说他曾是海式的学生。这样的事确实会发生。我引用原话，当他平静地宣称海德格尔用“显然是他特有的形式和风格”“传达了”“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时，他指出了 468 一个深渊，而且不止一个，每个词下面都有一个深渊。但他没有一刻去接近它们，似乎也未曾想到去接近它们。<sup>①</sup>

德里达认为法里亚斯的书中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东西，除了对毫无了解的人，因为前面已有历史学家更为严密的研究工作，还有莫里斯·布朗肖、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等思想家就此主题的思考。德里达肯定地说，他本人从最早的文章开始就曾在所有对海德格尔的指涉中表示了保留态度。对此他比以往更加确定：在对“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战后的沉默进行毫不含糊的”谴责的同时，也要继续“超越既定的或轻松的概括”去进行分析。

为什么可憎的档案看来令人难以忍受却又引人入胜？恰恰因为没有一个人

<sup>①</sup> “Heidegger : l'enfer des philosophes”, in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93.

能够将海德格爾的全部思想成就简化为某种纳粹意识形态。而这份“资料”除此之外并无大趣。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家能够略过对海德格爾的“解释”。如何否认呢？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即20世纪如此众多“革命性的”、大胆而令人不安的哲学或文学作品都冒险进入了这样的地域，在那里萦绕的是对自诩为左派的民主的自由人道主义哲学来说魔鬼般的东西？难道不应该试着思考这份经验，即我们时代的经验，而不是抹去或试图遗忘，而不是相信此后这一切都已经一清二楚？<sup>①</sup>

德里达很快成为论战的中心，就好像在海德格爾之外，他才是确定无疑的靶子。他发表作品已有25年，在知识界闻名已有20年。但对于法国公众，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布拉格事件——听说他。

维克托·法里亚斯在《致雅克·德里达的13个事实》一文中直接对哲学家提出了质询，文章先发表在《国家报》(*El Pais*)上，随后重载于《新观察家》和许多欧洲报纸上：“德里达说什么？事实就在那里，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哲学思考的话，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更有甚者，德里达‘在这一调查中还未发现任何不为人长期以来所知的东西’。”法里亚斯随后列举了一系列在他的书出版之前“至关重要且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最后用下面的话作结：“如果德里达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对我们只字不提？他本可以免去我12年的辛劳。”<sup>②</sup>法里亚斯的海德格爾研究的一些方面将在以后的几年间受到质疑并加以修改，但这一攻击不会不产生后果。<sup>③</sup>

情绪在1987年11月27日仍未平复，那天罗贝尔·马焦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双版面的文章，题为《德里达威胁着海德格爾》。文章本身含义暧昧：马焦利耐心地跟踪着《论精神》的分析；他指出了其旨趣及重要性，随后惋惜德里达未从“概念的判断”走向“道德的愤慨”。结论则突然变得激烈：

我们用轻松的口气来说吧：德里达的分析的确精微犀利，但是，分析海氏

① “Heidegger : l'enfer des philosophes”, in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93.

② Victor Farias, “13 faits pour Jacques Derrida”, *El Pais*, 17 décembre 1987. 我认为值得说明，在一篇最近的题为《海德格爾，政治和法国知识分子》(“Heidegger, la politique et l'intelligentsia française”, repris dans le recueil *Essais IV. Pourquoi pas des philosophes ?*, Agone, 2004, p. 129-161) 的文章里，雅克·布弗雷斯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论战，提到德里达的次数甚于海德格爾。

③ 几年之后，法里亚斯失控地试图证明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实际上只是‘最终解决方式’的信徒，反犹太主义者，反同性恋者，‘低等民族’的攻击者：总之，一个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纳粹”(Élisabeth Roudinesco, *Retour sur la question juive*, Albin Michel, 2009, p. 294)。2005年，阿连德总统基金会(Fondation Président Allende)向法里亚斯提起控告，告他对死者的纪念造成损害。

的“说话”，关键远远不是规定某点教义或澄清某个概念，而是在哲学上对纳粹主义进行定义，那么在这分析中为什么如此装腔作势？为什么伦理的或政治的立场如此不清？为什么海德格尔的作品造成了威胁，好像一把剑？<sup>①</sup>

德里达深受伤害，被文中仿佛起到概括作用的小标题——“从不揭露任何东西”、“甚少道义的愤慨”，还有特别是“装腔作势”一词。马焦利今天同意：“这个过于通俗的词让他感到受冲击。如果我用‘谨慎’或‘高深’这样的词，他也许容易接受。文章刚一发表他就寄给我一封激烈的信，此后四五年不再同我说话。他如此易怒，更是因为《解放报》对他很重要，而我是少数能对哲学作品撰写深度文章的记者之一。但报刊最终总是将问题简单化，哪怕只是在标题或小标题上，而且我对之远不能负全责。这是他从不能接受的事。”<sup>②</sup> 470

一周之后，轮到《世界报》做出反应。罗日·波尔·德鲁瓦（Roger Pol Droit）就德里达的两部作品写了一篇长文，这次终于比《解放报》的文章宽容些。他强调的不是法里亚斯和让贝发起的论战，而更多的是著作本身：

著名却不被理解，（德里达）总是做出惊人之举，沿着哲学与文学的隔板前行，对本性、名、词进行拆解，以至于书，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然而，与《论精神》同时出版的这本书（《心灵》）是多么富于创造力啊，清晰、犀利，甚至欢乐！……如果让我们在法国发现雅克·德里达呢？<sup>③</sup>

后患却远未消除。就在《争鸣》杂志以一辑厚厚的专刊讨论《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之时，时任海德堡法国学院和大学联系专员的米莱耶·加尔-格鲁伯（Mireille Calle-Gruber）邀请雅克·德里达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及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共同就此题目展开讨论。

1988年2月5日晚这场面对上千人的辩论在许多方面都异乎寻常。经过一系列关于法国的讨论后，海德格尔问题终于回到了德国，而且是在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就在这间大厅，1933年6月30日，海德格尔发表了题为《新帝国的大学》的演讲。公众前来是为了德里达，也是为了伽达默尔，后者年事已高，是当地的名人：这也是从1981年错过对话之后德里达和他的首次会谈。当发言者们进入大厅时，公众以 471

① Robert Maggiori, “Derrida tient Heidegger en respect”, *Libération*, 27 novembre 1987.

② 同罗贝尔·马焦利的访谈。

③ Roger-Pol Droit, “Jacques Derrida et les troubles du labyrinthe”, 《世界报》, 1987年12月4日。

德国方式击打桌子表示欢迎。<sup>①</sup>

会面用法语进行，持续了四个小时，气氛在主题许可的范围内保持着平静。伽达默尔首先带来了自己作为同代人对海德格尔之“迷途”的见证。但这个晚上也使他有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机会，走出当时漫长的沉默期。德里达开始时回顾了维克托·法里亚斯作品的重要性：无论对之有怎样的保留，他仍然说“此书迫使职业哲学家更加迫切地并立即作出解释”。拉库-拉巴特与德里达很快集中讨论海德格尔战后对参与纳粹活动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保持沉默的问题。这即便在保罗·策兰面前都顽固地保持的沉默，在莫里斯·布朗肖和其他许多人眼里始终是“一种思想之伤”。但还有其他可能吗？用几句熟滥的道歉话来寻求原谅，难道不是太轻而易举了吗？德里达提出了他自己也承认有些冒险的假设：

我想，也许，海德格尔这样想：我不能发出对纳粹的谴责，除非我能够在这样一种语言里——它不仅同我说过话相称，也同已发生的事相称。而对此他是无能为力的。……我想，海德格尔的可怕的也许是无法原谅的沉默，我们希望听到的话语的缺失……这一缺失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遗产，一道命令，命令我们思想他未曾思想的。<sup>②</sup>

听众的提问意在将发言者们更深入地引向这个问题。德里达强调，他在1968年就从让·波弗莱那里得知海德格尔有过纳粹党证：“后来有了雨果·奥特的文章……我们是否本应做出与我们已做出的不同的举动？也许。”拉库-拉巴特提醒大家，在瑟里斯举行的“人之终结”研讨会上，这些问题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但这一切472 面对论战已然转移的媒体舞台似乎毫无作用。德里达比往常更加焦虑地重申：

在我看来更重要、更迫切的是试着阅读海德格尔的文本，像我能够做的那样，试着教授海德格尔，同时在他的文本中寻求理解在其纳粹活动事实与其文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而这需要耐心，很多耐心。……我相信自己没有忘记在这个范畴里你们称为伦理或政治

---

① 同米莱耶·加尔-格鲁伯和米歇尔·利斯（Michel Lisse）的访谈。

② 1988年2月5日海德堡讨论的未发表过的记录稿，IMEC档案。在这里德里达暗中对莫里斯·布朗肖做出了回应。在1988年1月22日的《新观察家》上，布朗肖重申：“海德格尔无法弥补的错误就在于他对种族灭绝的沉默。”（引自Christophe Bident, *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op. cit.*, p. 58-69.）

责任的意义。<sup>①</sup>

许多法国和德国的记者参加了活动，第二天又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延续，发布会在海德堡著名的金太阳饭店举行，饭店墙上挂满了伽达默尔的照片。随后德里达和伽达默尔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努力在海德格尔之外开启一个真正对话的空间。<sup>②</sup>

在这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立场看起来同德里达接近，但已开始产生距离。事实上，就在此前不久，拉库-拉伯特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的虚构》（“La Fiction du politique”）：这是对海德格尔的强烈控诉，他将其哲学指为“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唯美主义”。按照当时在德里达指导下撰写论文的菲利普·贝克（Philippe Beck）的说法，拉库-拉伯特日益强烈的反海德格尔主义是德里达与他渐离渐远的因素之一，同时与让-吕克·南希则日益接近。“我觉得拉库-拉伯特一直遗憾没能加入在斯特拉斯堡十分活跃的境遇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他与德里达的联盟，除了与南希共有的真正的崇仰之情外，还有些策略上的东西——这很正常。他大概希望使政治意义上的解构更加激进，但并非不计代价，比如拉库并不虔诚地参照德波（Debord）。也不应该忘记他与德里达分享的对本雅明的阅读。南希则更多采用跟随而非反对的方式思想，我想他更喜欢对理性的批评，而非批评的理性。”<sup>③</sup>

473

※ ※ ※

海德格尔事件也再次激发了更早的矛盾，例如酝酿已久的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冲突。布尔迪厄曾在一封激动的信中赞美《丧钟》，但五年之后在其重要作品之一《区分》的最后几页里严厉抨击了德里达。不错，这篇补记——《对“纯粹”批判的“通俗”批判概要》——表面上讨论的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及其对“审美判断中

① 这次不同寻常的见面的记录最先准备发表，但审读之后德里达认为至少在眼下不适合发表。拉库-拉伯特也有同感：“即便做少许‘整理工作’，我们仍然不能冒险以成文的形式在法国或德国公开发表”（拉库-拉伯特致德里达的信，1988年9月4日）。但当晚发言者和讨论的水准之高，使得这一问题在今天值得重新考虑。

② 2003年2月5日，伽达默尔逝世不久，德里达在海德堡发表了“公羊，不间断的对话：在两个无限之间，诗歌”（Béliers. Le dialogue ininterrompu; entre deux infinis, le poème）的演讲，并于第二年在伽利略出版。在这次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对话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问题。

③ 同菲利普·贝克的访谈。

社会类别的否认”<sup>①</sup>，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康德之后，布尔迪厄主要试图攻击的是德里达和他的《花边》（“Le Parergon”，1978年重载于《绘画的真理》）。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德里达的解读虽然揭示了康德哲学中关于鉴赏力判断的某些隐藏的假设，但它仍然“服从于纯粹阅读的审查”。尽管“违反了正统评论最为形式化的规则”，其对哲学公设的质疑在他看来仍然是表面多于实际。德里达进行的“极致高深的游戏”不过是表面上的侵略，它实际上延续了“哲学阅读的存在与权力”<sup>②</sup>。

474 综合考虑的话，布尔迪厄的攻击同七年前米歇尔·福柯的行为不无关系，后者在另一篇补记，即《疯癫史》的再版补记中对德里达发起了抨击。对于《区分》的作者，目的还在于将哲学从其制高点的地位拔除。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解构只是一种十分烦琐的陷阱般的形式。他认为实际上“谈论哲学的哲学方式使得就哲学所说的一切失去了现实性”。那些“纯粹阅读的最大胆的精神决裂”，无论多么微妙，或许也正因为其微妙，都不过是为这门在他看来受到单纯解构威胁的学科找到的一条“终极的救赎之路”<sup>③</sup>。

德里达对此批判没有立刻作出回应。但他讨论康德在《科系之争》里提出的问题时，同时在1983—1984年间的研讨课上用了好几个课时对《区分》的补记进行了详尽分析，随后在《特权》一文中再次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以这篇文章开启了《从权利到哲学》（*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这本大书。德里达尽力表明布尔迪厄所做的恰好是他所指责的：他想要赋予社会学一种“绝对的，即哲学的霸权，凌驾于知识的众多领域之上，社会学由此不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sup>④</sup>。经由此惊人的壮举，布尔迪厄翻转了知识的古老等级，将社会学变成新的学科之王，能够扮成所有其他学科并揭示出其未曾说出的东西。这远非他所宣称的革命，不过是单纯的政变企图。

这场两个学科之间的冲突也喻示着这两名同样是科班出身的同时代人的竞争。布尔迪厄最初希望成为哲学家，像德里达一样，但他很早就从胡塞尔转向了卡比利亚，随后转到社会学，但并未终结对哲学的怀念。同两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迪迪埃·埃里邦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布尔迪厄被德里达的形象纠缠着，他关于哲学的许多言论和表面上的选择都无法解释，如果不是通过这层潜在关系来理解的话。这层关系要比他为了隐

①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p. 578.

②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p. 579.

③ *Ibid.*, p. 581.

④ Jacques Derrida, “Privilège”, in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106.

瞒真相而试图让人看到的更加深刻，即和他大概在内心深处视为自己唯一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关系。这个人归根到底是他的对话者，既享有特权又遭到否认。475  
（他有一天对我说：“同代人里面总有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手”……之后说出了他的对手的名字，当然是德里达……只要读读《区分》里关于康德美学的附录就能察觉这一点！）<sup>①</sup>

同许多时候一样，海德格尔仿佛催化剂，重新激发出一些同他只有很间接关系的古老冲突。1988年3月10日，《解放报》抛出一篇双版面文章，标题振聋发聩：《通过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海德格尔：哲学的崩溃》。这实际上是一篇对布尔迪厄的访谈，谈的是关于他的书《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此书是1975年一篇文章的修订版。布尔迪厄似乎从一开始就暗指德里达：“法里亚斯的书的价值在于迫使那些海德格尔者们离开他们龟缩的高傲的保留地。”惯于“滥用象征性权力”，并蔑视历史及人文科学的哲学在此必须同实证科学交锋。布尔迪厄不惮指出，“如果这种哲学和这些哲学家们被拖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大溃败中，这在（他）眼中并不是失败”。

随后的攻击更加直接，提到几个月前《新观察家》发表的对德里达的访谈：

我发现相当滑稽的是，德里达对我1975年的文章很熟悉——他读过它，我也在他的研讨课上讲过它，而并未引起丝毫异议，他为了否定社会学的分析，援引了这样一种分析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超越内部理解与外部解释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我很久以来提出的计划，而且我看已经实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海德格尔的辩论将他置于很大的困境。<sup>②</sup>

布尔迪厄将遭到严厉反击。当时在德里达家里小住的年轻英国哲学家杰弗雷·贝宁顿还记得那天早晨下楼早餐时看到他激动不已。“狂怒的德里达给我看《解放报》476  
上对布尔迪厄的采访。我感到他过于冲动，建议他等一等再寄走他的回复。‘太晚了，传真已经发出去了’，他对我说。”<sup>③</sup>

德里达的反驳在第二周发表。对他来说，这是个清算与这位校友的关系的机会。

<sup>①</sup> <http://didiereribon.blogspot.com/>.

<sup>②</sup> Robert Maggiori, “Heidegger: le krach de la philosophie”, entretien avec Pierre Bourdieu, *Libération*, 10 mars 1988.

<sup>③</sup> 同杰弗雷·贝宁顿的访谈。

显然，这件事在他看来远不仅仅是“滑稽”而已。请允许我大段引用这篇后来并未发表过的文章：

在布尔迪厄所持的所有可争议的（而且神经质的，如此神经质！）言论中，我只摘出最不容置疑的反真相的东西。我说反真相的时候大概是在践行可能会被布尔迪厄称作委婉化措辞（euphémisation）的做法。是的，当然，我知道布尔迪厄的文章。是的，他确实在我的研讨课上介绍过此文（实际上是一次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研讨课，当时他对之很感兴趣）。但是布尔迪厄竟敢说他“在（我的）研讨课上讲过它，并未引起丝毫异议”，这是弥天大谎，30多名参加者可以作证。我并非唯一提出异议的人。异议众多。<sup>①</sup>

德里达借此机会扩大战场，轮到 he 十分“神经质”地回顾了最早的伤痕：

我一直发现布尔迪厄的分析（以及受他启发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在其哲学公理上……及其实践上均是如此，特别是有关哲学文本，或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文本。不必成为“海德格尔者”（谁是？）或停留于“海德格尔式的结论”，就可以察觉到支撑布尔迪厄研究的概念性是前海德格尔的。这一概念性从未经受过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的考验。……我对布尔迪厄的文章如此难忘和重视，以至（例如）当我说到需要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阅读的对立时，我也想到了他。因为我相信在布尔迪厄那里，两种阅读是相重叠的，而且两者都差不多同样不充分。事实上，他的“内部”阅读，如果还能分辨的话，在我看来比“外部”的更加简短，而且不仅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也在离我们更近的法国的语境中。

到此为止我还一直没有如此直接地写些什么，也没有回应《区分》里本该加以回复的众多轻蔑之言，这并不是为了避免写下让人尴尬的文章，而是因为受到伤害的友谊中还有条件反射似的忠诚感或羞耻感（可能已过时，甚至过于“高贵”）。不错，我常常宁可沉默。多亏了这最后的侵犯，现在我脱离了保留态度。

信尾相当清晰地表达了否定：

还有一句话：关于海德格尔的辩论从未将我置于“巨大的困境”，像布尔迪

<sup>①</sup> “Derrida-Bourdieu. Débat”, *Libération*, 19 mars 1988.



厄宣称的那样，其修辞法在我看来属于选举用的社会学；我的安宁从未受到影响。因为不管怎样，我对激起辩论并使之复杂化的一切并不陌生——而且不只是通过我最近的一本书。很久以来直到最近仍然如此。多少读过我一些文字的人十分了解这一点。

《解放报》这一版由布尔迪厄简略的概括作结。他对冲突的规模之大感到窘迫，说很遗憾自己访谈中“某些不幸的用词”会伤害到德里达。他对《论精神》的作者刚刚说出的“预言般的诽谤”感到惋惜，但以他们“旧日友谊”的名义更希望事情不再恶化。事实上，两人很快会合，并在整个1990年代共同投入了许多斗争。而在布尔迪厄的遗作《自我分析简述》中再次出现根本上的冲突，对德里达的刻薄话也多次可见。在开始的几页里布尔迪厄就回忆道，年轻时他是高师的学生，专业为哲学，即“学科等级的顶端，在一个看来哲学高于一切的时代”。哲学那时是“学科之王”，他坚持说，接着承认：“有时，有点自嘲地，我认为自己是反对哲学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解放运动的领袖。”<sup>①</sup>

478

※ ※ ※

与海德格尔事件恰好同时，保罗·德·曼事件对德里达而言来得最不是时候，因为它使人轻易地把一切混为一谈。如果说海德格尔事件主要涉及法国的话，保罗·德·曼的论战则首先在美国掀起。

不过一切开始于比利时，因为一名年轻的弗拉芒研究者奥特温·德·格拉夫（Ortwin de Graef）的研究工作。后者讲述道：“我1986年开始在鲁汶大学做论文。我的计划是就保罗·德·曼的批评与理论进行研究，但我知道他出生于安特卫普，并听说他的叔父是著名的亨利·德·曼，是两次大战期间重要的社会党政治家，后来与德国人合作过。尽管同我的题目关系不大，我还是很好奇地想读到保罗·德·曼到美国之前的早期作品。在弗拉芒文化生活档案馆里有他的资料。我首先发现了1942年他在《弗拉芒的土地》（*Het Vlaamsche Land*）上刊登的几篇文章。1986年11月，我给《耶鲁法国研究》杂志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对发表与此有关的文章感兴趣，但没有得到回音。1987年春，我发现一大厚本《晚报》：这是德·曼1940年12月24日至1942年11月28日在比利时法语区最大的日报上发表的170篇文章，该日报当时主要由德国占领者控制。我读了这些文章，其中许多无关紧要，但有几篇

<sup>①</sup> Pierre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Raisons d'agir, 2004, p. 94.

内容很丰富，而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7月，一个国际性的文学研讨会在鲁汶召开，我宣读了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理论工作的论文。与会者中有萨姆·韦伯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我对他们讲了我新近的发现。回去以后韦伯将此事告知德里达。后者立即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就在出发服兵役之前，我匆匆忙忙寄给他一系列复印件，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现最明显的文章。”<sup>①</sup>

1987年8月底，德里达确信全部文章应该尽快尽可能大量地公开。

需要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自由地阅读和解释它们。讨论不应有任何限制。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人们可以提前想象这些“爆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在美国的大学里。不必是预言家就能预料到即将出现的各种反应的规模。<sup>②</sup>

德里达建议利用几周后将在位于塔斯卢卡萨的阿拉巴马大学举行的关于学术体制与政治的研讨会（“我们的学术契约：美国的学院之争”）就此事进行讨论，与会者中将有好几名保罗·德·曼的前同事和学生。这一发现让德里达深受震动。他神色阴郁，将《晚报》上一些文章的复印件分发给各人，其中一篇题为《当前文学中的犹太人》。10月10日，与会者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关于事情的根本所在和需要采取的决定”<sup>③</sup>。许多人处于惊愕中，不知如何应对。但德里达十分坚定：所有材料都应该发表，而且必须由他们，即保罗·德·曼的友人来发表。<sup>④</sup>会议组织者理查德·兰德同意这一分析，并坚持尽快行动：“我当过记者，立即感到此事将爆发。我认为必须迅速在《牛津文学评论》上发表主要的材料，从而表明我们的良好用意。但一些未出席阿拉巴马会议的人对这一策略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应当更小心地做出反应，不要匆忙。德里达可惜被说服了。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很不好。”<sup>⑤</sup>

流言很快传开，“事件”以最坏的方式爆发了。1987年12月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宣布：《纳粹报纸上发现了耶鲁学者的文章》。文章没有署名，对保罗·德·曼的情况和德国占领期间比利时的政治局势多有模糊和不实之处。事件在整个美国

① 同奥特温·德·格拉夫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Comme le bruit de la mer au fond d’un coquillage: la guerre de Paul de Man”,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201.

③ *Ibid.*, p. 202.

④ 同阿兰·巴斯的访谈。

⑤ 同理查德·兰德的访谈。

产生了相当大的规模，随后在保罗·德·曼的名字只为少数专家所知的别的一些国家也扩大开来。德国报刊表现得极为刻毒，而在瑞典，保罗·德·曼被指为“后现代主义的瓦尔德海姆（Waldheim）”<sup>①</sup>。但德·曼引起争议的文章却看不到：这些文章直到1988年秋才被公开。<sup>②</sup>

※ ※ ※

德·曼事件及其荒谬的扩大化，其关键之一在于两个世界之间截然的分割：一边是比利时，他青年时代的文章在那里发表，但那里的人们对后来这位耶鲁学派领袖所获得的荣耀几乎一无所知，更不必说他作品的内容；一边是美国，保罗·德·曼的学术生涯在那里成就，但人们不了解德国占领期间比利时局势的全部复杂性。

最令人吃惊的是保罗·德·曼这些青年时代的文章这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这些文章署了他的真名，在整整两年期间发表在比利时最大的日报上，因此很容易读到。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让-玛丽·阿波斯托利代斯（Jean-Marie Apostolides）的说法，此事本来很有可能在早几年爆发：“我在美国应该是第一个知道这些文章的人”，他讲道。“我当时正在完成我的书《丁丁变形记》，因为埃尔热占领期间在《晚报》上发表过文章，我便让人把这些报纸寄到了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1982年底的一个下午，杰弗雷·迈尔曼（Jeffrey Mehlman）在阅览室走近我，我当时正在浏览战时《晚报》的一份装订本。他曾长时间是德里达的密友，后来对莫里斯·布朗肖青年时代的文章感兴趣。我对他说：‘既然你对知识分子混乱的过去感兴趣，那就来看看我刚刚对保罗·德·曼的发现。’我给他看了前些天读过的文章中一些有意义的段落，但并未表示出特别的重视。与我相反，他立刻感到这些文章将产生炸弹般的效果。但他本人来自耶鲁，曾经认识保罗·德·曼并与其共事，而且希望进入哈佛。他鼓励我一个人揭开此事。我拒绝了，因为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平庸且无关紧要，而且保罗·德·曼在我眼里是个次要的文学批评家，不值得如此论战。但我向他保证把这些报纸在寄回比利时之前再保留一两周。他有索书号，如果他还想加以仔细研究，只要下次来图书馆时要求阅览即可。我认为他什么都没做，尽管他从我刚给他看到的東西中立刻理解到事件的人物和结果。我也向德里达的另一位友人芭芭拉·约翰

481

① 瓦尔德海姆事件爆发于1986年。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 1918—2007）曾任1972至1981年间的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是奥地利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他被揭出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德国国防军任职，使得许多政府首脑在他1986—1992年任内对他不予理睬。

② 收集了保罗·德·曼战时文章的集子以 *Wartime Journalism, 1939—1943* 为题出版（Werner Hamacher, Neil Hertz 和 Thomas Keenan 翻译并介绍，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逊提到了这些文章，但她未加关注：她对历史不感兴趣。”<sup>①</sup>

482 必须承认，只要对两次大战和占领期间比利时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很容易追溯保罗·德·曼的道路。我们只需探究他同叔父亨利·德·曼（1885—1953）的关系即可，后者是著名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从1938年起任比利时工人党主席，在占领期间与纳粹结盟。亨利·德·曼是个一等重要的人物，其影响力在1930年代远远超越了比利时国界。他从前的政治斗争伙伴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就这么说过：“他的错误，巨大的错误，使他遭受了谴责和流放，但我仍然要说他是20世纪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也是少有的几个有时让我认为是天才的人物之一。”<sup>②</sup> 历史学家兹夫·斯特海尔（Zeev Sternhell）则在其著作《非左非右，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中赋予了他重要的地位，说亨利·德·曼的“计划主义”“是两次大战期间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深刻的尝试。那是一种独特的经验，对于政治理论极为重要”<sup>③</sup>。但是保罗·德·曼的过去本可以通过另一个渠道追溯。因为著名评论家、《人类时间研究》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和苏黎世的教授乔治·普莱是罗贝尔·普莱的弟弟，后者是比保罗·德·曼激进得多的比利时纳粹合作者：他于1945年被捕并判处死刑，后生活在流放中。由此看来，难以想象乔治·普莱不知道“保罗·德·曼的战争”，或至少其梗概。如果说德·曼在世时事件未曾爆发，那也是因为没人希望如此，因为他当时主持着美国最好的比较文学系。

所有认识德·曼的人都指出他对抵达美国之前的生活缄口不言。他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之前的事无关紧要。杰弗雷·哈特曼有一次对他1953年前出版的作品之单薄提出疑问，对他说在此之前也该发表过东西，德·曼简单地回答：“除了新闻之外没有什么。”<sup>④</sup>

483 1987年底，《纽约时报》引发的丑闻产生了可观的影响。如同海德格尔事件，论战很快延伸到整个解构运动。德·曼去世已四年，但德里达和他的友人都还健在，而且活跃于舞台。对于耶鲁学派和德里达作品的诋毁者来说，这个机会似乎来得出乎意料。据《新闻周刊》的说法，波士顿大学法文教授杰弗雷·迈尔曼甚至宣称

① 同让-玛丽·阿波斯利代斯的访谈。欲了解更多比利时占领下的详情，见其作品 *Les Métamorphoses de Tintin* (Seghers, 1984 ; rééd. Flammarion, coll. "Champs")。也可见笔者本人的书 *Hergé, fils de Tintin* (Flammarion, 2002)，其中谈到许多关于 *Soir volé* 及其撰稿人的情况。

② Notice sur Henri de Man parue dans la *Biographie nationale publiée par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 t. XXXVIII, fasc. 2, p. 535-554, Bruxelles, Éditions Émile Bruylant, 1974.

③ Zeev Sternhell, *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 Fayard, 2000, p. 274。该书第一版于1983年在Seuil出版。

④ Geoffrey Hartman, *A Scholar's Tale*, *op. cit.*, p. 82.

“有理由从整个解构中看出为二次大战的合作政策平反的意图”<sup>①</sup>。这种荒谬无耻混淆一切的说法将在随后的几周甚嚣尘上：《新共和》发表了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的文章，而《洛杉矶时报》则提到《把混蛋放进解构里的人》[*The (de) Man who put the con in deconstruction*]<sup>②</sup>。

报刊上的躁动远未结束之时，德里达进行了激烈的反击。1988年1月，《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刚刚一个月，他就着手对事件进行了细致分析。标题颇具诗意——《如同贝壳深处的海声：关于保罗·德·曼的战争》，正文则充满战斗性，比德里达以前的文章都更加直接。形势使然，这篇长文首先发表在美国，由友人佩吉·卡穆夫翻译，她从这时起就是他最忠实的译者之一。<sup>③</sup>

此文在进入分析之前先像是记叙文。德里达在保罗·德·曼去世后不久说自己从不会讲故事，但这次不得不如此。他回顾了发现《晚报》资料的过程，并不掩饰自己最初的惶惑：

从第一次阅读，我就相信自己认出了（唉！）将被我粗略地称为一种意识形态格局的东西，一些推理框架，鲜明的逻辑和一整套论据。通过经验和训练，我从孩提时代就能毫不困难地辨认出它们。更有甚者，多么奇异的巧合，我四年来的研讨课和最近一本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书讨论的正是这些主题。我首先感到的是受伤、惊愕和悲哀，我不想掩饰亦不想展示。<sup>④</sup>

德里达并不害怕历史精确性，他将保罗·德·曼战时在《晚报》上发表的文章重新置于其历史背景。这些文章大多数无关紧要。随后停留于最具争议的文章：《当前文学中的犹太人》。 484

① “There are even grounds for viewing the whole of deconstruction as a vast amnesty project for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引自 David Lehman, “Deconstructing de Man’s Life”, *Newsweek*, 15 février 1988, p. 63）。Jeffrey Mehlman 说这句话被记者改头换面，见 *Adventures in the French Trade. Fragments Toward a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8~79。Jeffrey Mehlman 从 1986 年在分析莫里斯·布朗肖青年时代发表的政论文章时就开始抨击德里达，见其文章 “Writing and Deference: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Adulation” (*Representations* n° 15, été 1986; 法文译文见 *L’infini* n° 22, 1988)。

② 标题里隐含了两个文字游戏：“混蛋”（con）是“解构”（deconstruction）词的一部分，“人”（man）则是德·曼名字（De Man）的一部分。——译注

③ “Like the Sound of the Sea Deep within a Shell: Paul de Man’s War”, *Critical Inquiry*, printemps 1988, vol. 14, n° 3.

④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161.

在尽可能贴近原文进行分析时，我准备说的一切丝毫不能磨灭我最初感到的痛楚，当时我屏住呼吸，发现了报刊上最经常摘录的东西，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明确的反犹主义，在这种情形下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与最阴森的排他甚至流放接近的反犹主义。<sup>①</sup>

这并不妨碍德里达以一种稍显极端的巧妙和慷慨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细读”。年轻时的德·曼写道：“庸俗的反犹主义乐于认为战后（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化现象是腐朽和没落的，因为是犹太化的。”《书写与差异》的作者针对这句话的潜台词展开了精妙的游戏：

这显然是对庸俗反犹主义的谴责。这是作者公开宣称并加以论辩的首要意图。但是，嘲笑庸俗的反犹主义就等于嘲笑反犹主义的庸俗性吗？这后一个句法的转变通向两种解读。谴责庸俗的犹太主义，这可能让人理解成存在着一种高雅的反犹主义，以之为名可以判断庸俗性。但也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种解读可以一直暗地里影响到另外的解读：谴责“庸俗的反犹主义”，特别是从不提及另外一种反犹主义，这也就是谴责本身就是庸俗的反犹主义，永远是而且本质上就是庸俗的。德·曼亦未提及这层意思。即便他想到的话——我永远不会排除他可能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当时情况下也不能明确说出。<sup>②</sup>

为保罗·德·曼撰写这篇长篇辩护词时，德里达猜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这么做是出于对亡友的忠诚，也是出于正义感，由此为自己在1984年所做的关于承诺的演讲赋予了全部的重要性，这承诺“只有在他者死亡之时才意义重大”：“我无法知道，有一天，在这样一种受伤害的体验中，我需要为保罗·德·曼作出答复，需要继续说，关于他和为了他，当他不再在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当他有可能在其回忆或传承中遭到指责时。”<sup>③</sup>

但《如同贝壳深处的海声》也是一份正当防卫书。因为保罗·德·曼这些年轻时代的文章给德里达的敌人提供了一个彻底反攻的机会。从始至终的反对者们——实证哲学家、保守的人道主义者、“左倾”马克思主义者——抓住这个在他们看来从天而降的意外收获，突然间集合力量以图摆脱困扰他们许久的这个人 and 这套理论。

---

①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187-188.

② *Ibid*, p. 191-192.

③ *Ibid*, p. 156.

德里达以讽刺开始，随后转向反击：

人们仍然可以带着同样微笑的宽容诘问：解构同1940—1942年间一名年轻人在一份比利时报纸上写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了45年前比利时报纸上的文章而向一个人发起指控，并扩大到一种“理论”以及所有对其感兴趣并加以阐发的人，这难道不是滑稽的和不诚实的吗？何况这一理论本身已被简单化和同质化，更何况还可以说人们并未读过这些文章？……

为什么人们佯作不知，解构可以是任何东西，但绝非人们常说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尽管那么多文章都明确地、主题鲜明地、20多年来不间断地表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为什么只要对理性——其形式、其历史、其演变提出一个问题，人们就大呼非理性主义？对人的本质及其概念的建立刚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大呼反人道主义？……

总之，他们在害怕什么？他们想让谁害怕？<sup>①</sup>

同许多时候一样，德里达在脚注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最具进攻性。他对若·维纳（Jon Wiener）发表在《国家》上的题为《德·曼之解构》的文章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抨击。

从题目直到最后一句，这篇充满仇恨、谬误百出的文章汇集了我到此为止提到的几乎所有的阅读错误。想到作者在大学里教授历史不禁令人战栗。他试图把一连串诽谤或恶意中伤的影射转嫁到解构及其“政治”（如他所想象的）上，竟敢把德·曼说成“学术上的瓦尔德海姆”。因此毫不奇怪，若·维纳的文章成为楷模。而该作者因为在《国家》上的失误而著称：这份报纸不止一次被迫在这位不合时宜的撰稿人发文之后发表烦琐而严厉的说明。<sup>②</sup>

德·曼事件在美国大学里几乎到处制造出引人注目的风波，并带来许多分裂，即便是在德里达的信徒中间。1988年4月26日，一名最早的忠实者大卫·卡洛尔给德里达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不是针对内容，而是针对所采取的战略表达了自己的异议。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德里达如此极端地维护保罗·德·曼，不惜自己承受所有的攻击，甚至“担当其所写的最糟的文字，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其承担责任”，而这些文

①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224.

② *Ibid.*, p. 220.

字同德里达的一切政治信仰和选择完全背道而驰。<sup>①</sup> 德里达过于冲动，无法接受这些看来很温和的批评。他暴怒地批注了大卫·卡洛尔的文章，感到自己旧日的学生没能读懂他。两人的关系将在几个月间大受干扰。

事情在阿维塔尔·若奈尔那里也并不更容易：“在德·曼事件中，我们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他想会合所有的自己人，不惜一切代价组成一个阵营。这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好的策略。绝对而且几乎盲目地维护保罗·德·曼年轻时代的文章，这不该被看成自称是德里达信徒的义务。但这时他比以往更难忍受微小的内部分歧。可惜没有一个人足够有力，能够说服他采取另一种策略，少些攻击性，去更适应美国的情况。他在《如同贝壳深处的海声》里的回应方式让事情更加严重。人们看到的是操纵文本的练习，就好像解构式阅读的精深技巧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为反犹太主义文章寻找理由，让一篇文章信口雌黄以洗清其纳粹主义的指控！这整个事件是场灾难。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从未恢复过来。”<sup>②</sup>

在《如同贝壳深处的海声》发表之后的几个月里，《批评探索》编辑部收到许多信件，大多数十分激烈。“可以不夸张地肯定，您的文章比我们记忆中发表过的任何文章都激起了更多的讨论，带来了更极端的反应”<sup>③</sup>，杂志的一位负责人给德里达写道。其中六篇评论准备在《批评探索》上发表，但因为它们对德里达发出了强烈的质疑，于是编辑部先将之寄给了他，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1988年最后的几天，他写了一封集体回复。文章立刻由佩吉·卡穆夫翻译成英文，题为《可生物降解的。七个日记残片》。这篇60多页的文章的法文版一直未曾发表，因为它同美国的情形紧密相关。震怒的德里达强硬地对散布批评或疑问的人作出了回复，无论其性质如何。1942年，就在保罗·德·曼在《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同时，他被驱逐出中学，他承认“很难接受人们就此教育他要提高警惕”<sup>④</sup>。

要等到1990年3月10日，一次更平和更深入的讨论才可能在巴黎举行，这是在国际哲学院星期六的活动框架中进行的。迈克尔·德基、伊丽莎白·德·丰特奈、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Alexander Garcia Düttmann）和玛丽-路易丝·马莱各自对《记忆：致保罗·德·曼》作出了回应，之后德里达进行了认真的回复，并没有立即抛开有人对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他承认，这些问题对他仍然

① David Carroll, “The sorrow and the Pity of Friendship and Politics; An Open letter to Jacques Derrida”, inédit, archives Irvine. 最终发表的是文章的另外一个版本，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和文学问题：正义、痛苦和政治错误（一封致德里达的公开信）》，*Cultural Critique*, n° 15, printemps 1990。

②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③ 阿诺德·大卫逊致德里达的信，1989年1月26日。

④ Jacques Derrida, “Biodegradables. Seven diary fragments”, *Critical Inquiry*, été 1989, vol. 15, n° 4.



是“艰巨的考验”。同丰特奈对话时，他质问保罗·德·曼对包括他在内的人保持的沉默：

488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都没说，对我，为什么他几乎没有对别的任何人说，对如此少的人说。……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我只有猜测。我 1966 年结识德·曼，1975 年起同他关系密切，从那时起我每年去耶鲁三四个星期。保罗·德·曼成为——并且一直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朋友，但我们互相了解不多，我们互相对我们的“生活”了解很少，这种事时有发生！

德里达利用这个机会描述了他对友谊的理解，还有秘密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不相信友谊的条件是熟悉，“或者是人们平静地称之为亲密无间或对他人的了解”。

我们的“交流”，如果用这个可笑的词的话，始终十分审慎。友谊的信号十分清晰，但我们说的很少。两人都是。也许我一直都知道，也许他认为我一直都知道，我不能排除他对自己说过大概这样的话：这些事足够为人所知（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对别人说过），也许正在流言中被散布开来，也许雅克·德里达知道，他没有说，这些事已经 30 年了，不必再说了。这是有可能的。你们知道“在场面上”事情是怎么样的：某人有一个秘密，但他自己尤其处在秘密当中，他是唯一不知道所有人都知情的人。……

为什么我从未提问？我知道保罗·德·曼有过复杂的过去：战争刚一结束他就离开了比利时，他在美国的立足充满动荡，至少在学术上。一天他对我说：“如果您想了解我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之间所说的话——“读一读亨利·托马斯的小说《伪誓》吧”。……我买了这本书，读了，震惊不已。同比利时无关，这件事发生在后来，在美国。我给德·曼写信告诉他我的感受。他没有回 489  
 复。他本人有一天对我说：“您的有些书暗指《丧钟》和《明信片》我不能同您谈论。我对您将只字不提。”友谊伴随着一些沉默、不可说和秘密，这对友谊来说并不见得致命。<sup>①</sup>

就在国际哲学院的这次会面中，据我所知第一次，德里达提到了不可宽恕 (l'impardonnable) 的主题，这将在他的思想中占据决定性的位置。

<sup>①</sup> “Papiers” du CIPH n° 11: “Autour de Paul de Man”。这场丰富辩论的全文可自由查阅：[http://www.ciph.org/fichiers\\_papiers/papiers11.pdf](http://www.ciph.org/fichiers_papiers/papiers11.pdf)。

我从不知道谁有权利要求别人供认，如果说有供认的话，特别是，谁有权利宽恕，说“我宽恕”。“我宽恕”这句话在我看来不可能，或至少不可能确定地做到，与要求别人供认一样不可能——也许与供认本身一样不可能。但我还是写下了“不可宽恕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做得对，至少我并不感到满意。

在这段困难重重的时期还有些其他的论战。尤尔根·哈贝马斯 1985 年在德国出版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于 1988 年在迦里玛翻译出版。这 12 篇演讲中有两篇讨论德里达。但是，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由于“德里达的论辩风格并不多么出色”，他上来便宣称自己的分析将基于其弟子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论辩环境里完成”<sup>①</sup>的研究工作。他所参照的主要是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

哈贝马斯一直是海德格尔的攻击者，因此他将德里达视为海氏传承者并无丝毫赞美之意。他认为两者的方式几乎完全重叠：“著名的形而上学自我超越的旋律为德里达的工作奠定了基调：destruktion 被称为 déconstruction。”<sup>②</sup> 哈贝马斯在这里似乎接近费里和勒诺的《六八思潮》，根据他的说法，德里达除了语调之外毫无新意，而这语调导致最有害地抹杀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差异：

从解决问题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正如德里达所建议的——并且转向文学批评的目标，哲学思想就此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其严肃性，而且是其生产力及效率。反过来，文学批评的判断力也丧失了其力量，当它开始承担起对形而上学的批评，而不是试图了解审美经验的内涵时，就像德里达的信徒们在美国大学的文学系里信奉的那样。将两种研究错误地相结合，使得两者都丧失了本质。<sup>③</sup>

哈贝马斯的大名和他在德国的巨大影响使得德里达必须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德·曼事件之际德国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激烈反对他的文章。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曼弗莱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把对法西斯主义或“新达尔文”的前法西斯主义的怀疑扩大到由德里达、德勒兹和利奥塔组成的整个“法国国际”那里，说

---

① Jürgen Habermas,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Gallimard, 1988, p. 228.

② *Ibid.*, p. 192.

③ *Ibid.*, p. 247.

他担心看到德国青年落入“法国人之手”<sup>①</sup>。按照亚历山大·加尔西亚·迪特曼——他曾在法兰克福求学，后来成为德里达的密友——的说法，哈贝马斯公开提醒学生提防德里达的影响，将他的思想形容成虚无主义的、蒙昧主义的和政治可疑的。

德里达在《记忆：致保罗·德·曼》的法文版出版之际加了一条长长的注释，以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方式表示愤慨开始，他提醒道，在关于他的两章之一里，他在整整30页的篇幅中遭到批驳，却“没有援引（他）的任何一篇文章”，而他“被明确指为据称已经讨论过的主题的作者”。德里达在指出一系列理解错误之后对哈贝马斯的哲学原理本身发动了更加直接的抨击：

始终打着伦理的旗号，一种号称民主的伦理，始终打着透明沟通和“共识”491的旗号，却最粗暴地违反了基本的讨论规则（有辨别的阅读或对他者的聆听，证据，论辩，分析与引用）。始终是众口一词的道德家言论——至少是佯作真诚呼唤一致的道德家言论，它实际上造成了对理性与民主的传统规范的无礼侵犯。<sup>②</sup>

所有这些主题在1988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中处于核心地位：《走向一种辩论的伦理》。这是《有限责任公司》一书的后记，此书汇集了十年前他与约翰·塞尔激烈冲突的文章。德里达回顾了塞尔的文章《重申差异：对德里达的回复》，还有他本人辛辣的反驳《有限责任公司 abc……》，并越过当时具体的理论内容，着力分析“这一论战‘场景’还能够让人读出的症状”<sup>③</sup>。

德里达越来越多地承认学术或知识言论中暴力的一面，包括在他本人的研究步骤中。他在晚年同艾芙琳·格洛斯曼（Évelyne Grossman）的访谈中解释道：

当我试图思想、研究或写作，当我相信一些“真实的”事情应该在公共空间和舞台上提出来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这与勇气无关，但当我相信应该说或思考一些事的时候，哪怕是以“真实的”但还无法让人接受的方式，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我丧失勇气不将它说出来。……有时

① *Frankfurter Rundschau*, 1988年3月5日。亚历山大·加尔西亚·迪特曼提醒德里达注意到这篇文章，使他取消了预计在曼弗莱德·弗兰克执教的图宾根大学进行的讲演。

②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225.

③ Jacques Derrida, *Limited Inc.*, *op. cit.*, p. 202.

我会写下我知道将会造成冲击的文字。例如对列维-斯特劳斯或拉康的批评——我还是相当了解所处的环境的，知道这将会产生冲突。不过，我不可能缄口不说。这是一种法则，就像一种冲动和一种法则：我不能不说出来。就在我们两人之间这么说吧，有时，我写下这种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挑衅性的抗议文章，写下一些东西，然后，在我有些倦意的时候，在一种半睡眠状态中，我身上有一个更清醒更警惕的人说：“可你完全疯了，你不该这么做，你不该写这些东西。你明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随后，当我睁开眼睛开始写作，我就这么做了。我没有听从这谨慎的建议。我将之称为真理的冲动：应该承认这一点。<sup>①</sup>

无论怎样，德里达这两年不间断的斗争标志着一个决裂点。随后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联盟，还出现了一个更加平和的德里达。好像为了对指责作出回应，伦理和政治问题将很快走向前台。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La vérité blessante ou le corps à corps des langues”, entretien avec Évelyne Grossman, *Europe* n° 901, *Jacques Derrida*, mai 2004, p. 21.

## 第 25 章 生动的记忆 (1988—1990)

各种各样的职责，繁忙的旅行，堆积的信件，使德里达越来越不堪重负。如阿维塔尔·若奈尔所说，他在法国没有教授职位，工作中既无助手也无秘书，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找东西，复印，校对，处理一切”：“我仍然看到他拖着装满了书的纸箱子，去接受一个评委会的审听。有些时候他就是自己的无产者，至少就美国大学的标准而言。”<sup>①</sup> 493

尽管工作能力极强，德里达有时也无法完成任务。1987 年秋，他对伊丽莎白·韦伯 (Elisabeth Weber) 产生了好感，这名年轻女子在准备《尤利西斯留声机》的德文译本，好几次在研讨课后前来询问遇到的问题。“几个月之后，我在完成博士论文时，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帮帮他，特别是处理邮件。从 1988 年初开始，我每个星期天去里斯-奥朗吉斯在他身边工作。早上，德里达向我口述对积累了一星期的信件的回复。下午通常处理文件以及他收到的稿件和书籍，还有整理藏书。”<sup>②</sup>

但伊丽莎白·韦伯的角色很快越来越重要。她解释说：“一段时间之后，他也交给我好几本书的结束和修订工作：汇集了同塞尔论战文章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大部头的访谈录《省略号》(*Points de suspension*)。这一出书计划是我的倡议，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从我制定的范围出发，我们详细讨论了对访谈的选择。我还参与了《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书稿的准备工作，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弗朗索瓦·达斯图尔、让-吕克·马里翁和迪迪埃·弗朗克 (Didier Franck) 对之都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定于 1990 年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任务主要是核对德文引语， 494

<sup>①</sup> Avital Ronell, *American Philo*, entretiens avec Anne Dufourmantelle, Stock, 2006, p. 249-250.

<sup>②</sup> 同伊丽莎白·韦伯的访谈。

从胡塞尔的德文全集中找到出处——1950年代尚不存在这一全集——并在必要时对译文进行修改，补充最近发表的法文版的相关文字。我一直为他工作到1991年9月，那时我获得了加利福尼亚桑塔巴巴拉大学的职位。但每次我去法国我们都继续友好地见面。”

※ ※ ※

另一次重要的合作将使德里达结识布莱顿·苏塞克斯（Brighton Sussex）大学的年轻教授杰弗雷·贝宁顿。他从1980年代末起就对德里达的作品深感兴趣，先是为德里达在牛津时充当译员，后来负责监控英文翻译的质量。但德里达很快为了一个更重要的计划找到他。“1988年1月，我在《牛津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尖锐的长文，介绍了最近发表的关于他的几篇文章。他对我说很赞赏这篇文章。一段时间之后，他建议我撰写瑟耶出版社打算在“当代人”丛书里出版的关于他的书。我受宠若惊，几乎不敢相信。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德里达坚持不要由法国人或公认的德里达支持者写这本书。在一次同丛书主编德尼·罗什（Denis Roche）进午餐时，我提议德里达本人也参与写作此书：也许是《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让我想到了这个主意。很快我便有了想法，即分析他的作品而完全不引用他的文字。我在1988年的学术休假中就进行过此项工作，花了不少时间在我的电脑上构思一种‘德里达软件’。我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数据库，以此为出发点写我的文章。我越往前走就越为他作品的严密性和稳固性所震撼。他的写作方式和他相对于哲学的立场将论者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德里达不仅对哲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品作出了解读，而且也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好几次，我在他的书里发现了以隐秘的方式写出的我以为自己独立发现的思想。1989年初我交给了他‘德里达数据库’（Derridabase）。经过一段对我显得十分漫长的时间，他给我打电话，大加褒奖。但他对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保守秘密。我只知道他设定的具体限制：59段——他当时59岁——在他使用的文字处理软件MacWrite所允许的长度内。我当时对主题全然不知。”<sup>①</sup>

在贝宁顿和德里达之间形成了两种写作的对峙形式。《割礼忏悔录》首先尝试对“杰弗”建立的数据库作出回应，这数据库“使任何读者，不需任何引语，就能通过高度信息化的索引找到……所有的定理和所有的出处”<sup>②</sup>。德里达焦虑地看到自己被这样置于框架内，想写些文字逃离贝宁顿设置的系统化图景。在批评家“未曾保留

<sup>①</sup> 同杰弗雷·贝宁顿的访谈。

<sup>②</sup> Jacques Derrida, “La machine à traitement de texte”,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août 1996. Repris in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155.

一个完整碎片”<sup>①</sup>的正文旁边，他重新引入了身体，包括自己的阴茎。就在杰弗雷·贝宁顿有条不紊的阐述使他几乎成为可以让人接受的哲学家时，德里达竭力从内部解构这部关于自己的作品。

为撰写这些文字，德里达采用了关于割礼的笔记，这些笔记首先出现在他1976—1977年（《丧钟》后不久）和1980—1981年的笔记本（就在《明信片》之后）496中。那时他幻想着写一本《埃里之书》，“一部四栏的小说，有四层话语”<sup>②</sup>，尽管在表面上此书并不一定像《丧钟》那样直接反映他。这一计划在《割礼忏悔录》里还留下些痕迹，其中交缠着四个主要的主题：在垂危的母亲枕边的沉思，自传性的回忆，关于割礼的笔记摘录，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摘引。写作断续完成于整个1989年和1990年前几个月。这好像是对母亲病情的私密回应，也像刚刚结束的两年痛苦的论战之后的一种自我找寻。

生于1901年，故已十分高龄的乔吉特·萨法尔长期卧床，并患上了“阿兹海默综合征”。在她无尽的垂危期间，雅克一有可能就来尼斯，有时在她的床边校对书稿。其余时间，他几乎每天给她打电话。从1988年底一次几乎夺走她生命的发作开始，她就“处于奇特的迟钝状态，在生死之间，确实是‘在家住院’，不再认得出（他），不大说话、看、听”<sup>③</sup>。《割礼忏悔录》仿佛一种异样的守灵，是雅克·德里达最冒险的作品之一，大概也是他最感人的作品。写作这59段不加删减便无法引用的文字时，他希望

将我母亲多少还能辨别得出的最后的话托付给这本书下面的部分，她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还活着，但已没有记忆能力，至少没有了我的名字的记忆，一个对她变得至少是无法发音的名字，我写下这些，就在我的母亲不再认识我的时候，这时她还能吐字或发音——些许，她不再呼唤我，对于她，亦即她在世时，我不再有名字……

那天在尼斯，那是1989年2月5日，问她是否疼痛（“是”）和哪里疼痛时，她用一种不可能的修辞显现出如此的大胆，可是，唉，她将一无所知，大概也不曾知道什么，她的答复穿透了黑夜回答我：“在我妈妈那里疼”，就好像她在497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9.

<sup>②</sup> 1981年9月4日的笔记，同上书，254页。

<sup>③</sup> 德里达致热拉尔·格拉奈尔的信，1989年11月9日。

为我说话，既朝向我的方向也处在我的地方……<sup>①</sup>

乔吉特·萨法尔于1991年12月初逝世。雅克给见面越来越少的老朋友米歇尔·莫诺里写道：“这三年漫长漫长的死亡并不减弱哀悼，事实上也不曾为之作准备。”<sup>②</sup>

※ ※ ※

与《割礼忏悔录》完全同时的是《盲者的记忆》（“Mémoires d'aveugle”），此文也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也是基于痛苦的基调。文章缘起只是为了酝酿卢浮宫的一次展览，选择一系列画作并加以评论。这一提议让他既兴奋又不安，他对自己将要“采取的立场”还一无所知。但1989年6月，德里达患了短暂的面瘫，特别是左眼完全不能动。可以想象他的恐慌。7月初，他不得不取消了同帮助他选画的三位美术馆研究人员在素描陈列室的一次会面。

十三天来，我忍受着一种因病毒导致的面瘫，称为面貌变形（面部神经发炎，左半边脸僵硬，左眼不能动，在镜子里看很恐怖，眼睑不能正常闭合，因此无法“眨眼”，即无法实现这短暂的让视觉呼吸的目盲）。7月5号，这种常见的感染开始见好。两周的恐惧之后证实能够痊愈。7月11号，我痊愈了（改变或再改变的感觉，重新眨眼，我的脸仍然为变形的幻影所缠绕），第一次去卢浮宫赴约。当晚，就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展览的主题出现了。<sup>③</sup>

7月16日，德里达梦见一些盲人向他扑过来。他越来越确信：“素描是盲的，如果不是画家是盲的话。素描的行为，作为这样的行为，并且就在其行为发生之时，  
498 同目盲有些关联。”这一确信将成为展览及其目录的主题。

※ ※ ※

1989年还有另外的一次震动，对德里达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更加重大。他的儿

---

①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3-24.

② 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92年1月4日。

③ Jacques Derrida, *L'autoportrait et autres ruine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0, p. 37-38. 这部优美的作品可惜很长时间以来难以看到。展览于1990年10月26日至1991年1月21日在拿破仑展厅举办。



子皮埃尔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后很快在路易·马兰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多亏了刚刚在子夜出版社创办了一套新的哲学丛书的迪迪埃·弗朗克的帮助，论文立即以《吉约姆·多克阿姆：独特者》为题出版。但年轻人选择了外祖母的姓，署名皮埃尔·阿尔菲利。在德里达的书架上，这本书上写着这美好的献词：“给你，爸爸，我欠你的比一个名字更多。给你，妈妈，我欠你的比一个名字更多。”

对皮埃尔来说，这绝非一时冲动的决定。他解释说：“从少年时起，我就感到德里达这个姓并不真正是我的，就好像它已经被别人用过。如果用与父亲同样的姓出书，我会感到自己像个寄居蟹。当然，我并没有天真到以为用皮埃尔·阿尔菲利署名别人就不知道我是谁。但这还是让我在表面上有一点自由。我没问雅克，刚开始他对此很不快。不管怎样，就算被看成是敌意的行为，我也准备承担，因为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把这个署名用于我所有其他的作品。‘皮埃尔·阿尔菲利’不是个简单的化名，它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常用名。”<sup>①</sup>

对雅克·德里达，签名问题很久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无法理解自己的长子为何想要改姓。在他眼里这几乎等于否认。当列维纳斯对他认为这个决定“很高贵”<sup>②</sup>时，他十分困惑。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的交谈中，德里达吐露：“在父性这一思想里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东西。你不能为自己的儿子或某部作品签名。成为父亲，就是经历极其欢乐和痛苦的过程，即不是父亲的体验。……父性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一种属性。”<sup>③</sup>他将在一本小书《受难》（*Passions*）中着重强调关于“接受或自我给予的名字”这个问题，并将之转变为彻底的哲学问题。

499

假设 X，一样东西或一个人（一些踪迹，一部作品，一个机构，一个孩子）带着你的名字，亦即你的头衔。天真的翻译或常见的幻想：你把你的名字给了 X，于是所有回到 X 那里的东西，直接或间接，直截了当或转弯抹角地，都会回到你这里，就像是对你的自恋的祝福。……反过来，假设 X 不想要你的名字或你的头衔，假设，出于某种原因，X 自我解放，选了另一个名字，对原初的断弃又进行了反复的断弃，那么你的受到双重伤害的自恋将就此变得更加丰富：带着、曾经带着、将要带着你的名字的东西，看起来自由、强大、富于创造力且独立自主，足以独自生活，彻底摆脱你和你的名字。这时轮到你的名字，你

①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的名字的秘密，能够消失在你的名字里。<sup>①</sup>

长子的成长还有别的原因让德里达担忧。他一直赞赏他，为他的早慧而兴奋，高兴地看到他走向哲学。但有点像在勒芒时的雅克，皮埃尔在成长过程中因紧张而崩溃。他很快决定离开哲学转向文学，这并不让父亲放心，后者在子女问题上同别人一样传统。德里达对米歇尔·莫诺里解释说：“皮埃尔受不了了，他计划离开教学，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他第二年获得了国家图书中心（CNL）的奖学金，写作，忙于许多事情，看来不怎么关心职业问题。”<sup>②</sup>

皮埃尔承认，“我中断哲学的时候，他为我的职业前途十分忧虑。首先，他认为大学教师是个美好的职业。更深层的，他应该很惋惜我远离了哲学，几乎不再去读。即便是他自己的书，我承认也只读了一部分，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我感到受不了他越来越快的出书节奏：我刚刚开始一本，已经又收到了另外一两本。我个人的哲学道路很不德里达式：我最感兴趣的书完全不是通过他接触到的。我的弟弟让完成民族学的学业后，比我更多地从事哲学，但他也进入了几乎完全没有德里达式评论的领域。他没有成为教师，他找到了自己的领域，从事个人的研究，主要关于普罗提诺（Plotin）和新柏拉图主义。”<sup>③</sup>

接下来的几年，皮埃尔·阿尔菲利与奥利维耶·卡迪奥（Olivier Cadiot）创办了《综合文学评论》杂志，并在 P. O. L 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包括一本充满了自传性细节的小说《家庭影院》，德里达将向好几位友人推荐此书。“我从事过各种小职业，”皮埃尔说，“我当过书商，在出版界工作过，写过歌词。我还为巴亚尔（Bayard）出版社翻译过几部分《圣经》，这是出于写作的乐趣，也是我当时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说父亲的模式在我的成长方向上起过作用的话，我主要是继承了他当作家的欲望。也许我以我的方式延续了他的欲望。一天晚上，他来到卡迪埃基金会观看一场我同鲁道夫·布尔日（Rodolphe Burger）制作的表演。其中有影像、朗读，还有音乐。最后他前来表示祝贺并对我说：‘实际上我们做的是有些相似的事情。’他有意越来越像艺术家那样从事哲学。他常常感到同作家、画家或建筑师比同大学里的学者更加接近。”<sup>④</sup>

① Jacques Derrida, *Passions*, Galilée, 1993, p. 31-32.

② 德里达致莫诺里的信，1992年1月4日。

③ 2010年，让·德里达在伽利略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La Naissance du corps (Plotin, Proclus, Damascius)*。

④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然而德里达继续同哲学教师们打交道，尽管并不总是很情愿。1988 年底，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部长利奥奈尔·若斯潘成立了一个关于教学内容的磋商委员会。委员会由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弗朗索瓦·格罗 (François Gros) 主持，任务是审查教授的指导意见，增强其一致性。在此框架中成立了哲学与认识论委员会，由雅克·布弗雷斯和雅克·德里达共同主持，成员有雅克·布隆斯维格、让·东布勒、卡特琳娜·玛拉布和让-雅克·罗萨。这一小群人在 1989 年 1 月到 6 月间集合在一起。在德里达看来，这项工作延续了开始于 1974 年的哲学教育研究小组和 1980 年代初的国际哲学院。但为了实现他坚持的理想，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同布弗雷斯的协调：后者好几年以来常常攻击他，并针对国际哲学院说过很强硬的话。不过两人同意一起工作，因为他们都确信改革必不可少。在一条没有日期的笔记中，德里达直接回顾了委员会的工作：

问题和任务如下：在布弗雷斯和我之间，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在我们两人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东布勒、布隆斯维格、玛拉布和罗萨——之间，首先浮现的不是哲学上的接近，也不是风格、实践、方法、哲学对象上的近似，更不必说职业情况的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甚至是我们集合在一起的规则。在我们的一些人当中，在别的场合下甚至可以说有冲突。问题和任务因而是：今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共同之处？我们能够就什么达成互相理解，以继续讨论并提议继续讨论，亦即继续哲学工作？这个国家最多样化的哲学家和公民——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代表的——能够就什么达成理解，以辨明问题，形成假设，展开讨论，简言之，以服从讨论的原则？<sup>①</sup>

卡特琳娜·玛拉布证实：“一开始，布弗雷斯和德里达两人都怀有戒心，但最终他们之间进展顺利。他们对形势有同样的看法，也很容易地对一整套建议达成了一致。一天晚上，他们甚至谈论了其分歧的实质：既然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接近于解构，为什么德里达对之从无兴趣？他们一直到这项艰巨计划结束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sup>②</sup>

在他们主持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当中，其中一项是在哲学课教学大纲中标明一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无日期的笔记，IMEC 档案。

<sup>②</sup> 同玛拉布的访谈。

系列定义清晰的问题。这种方式能够明确对学生的要求，应该有助于弥补会考中太多考生差强人意的成绩缺憾，减轻该学科在许多学生那里激起的恐惧感。“如果说今天绝大部分的会考试卷无法达到最低的哲学要求的话，这主要是因为学生，他们本该预料到一切，但实际上无法提前做出任何准备，普遍缺乏对所提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最基础的了解，他们不明白对他们的要求，总的来说也没有必要的理论工具做出回答。”<sup>①</sup>

503 这些提议尽管如此温和，却激起了激烈的论战。一份反对这份报告的请愿书征集到1200个签名。1990年10月18日，一次极为动荡不安的会议在笛卡尔街的庞加勒阶梯教室举行。在场的教师们十分激烈地攻击报告内容和德里达本人。玛拉布还记得这些艰难的时刻。“法国哲学会和法国哲学教师协会是此次计划最猛烈的抗议者，最终导致计划被束之高阁。雅克知道他在总监察那里有许多敌人，但他不理解为什么哲学教师们拒绝使论文相对化，而且不考虑将哲学课扩展到高中二三年级。他就像一个被彻底抛弃的工会会员，为毫不支持他的人们斗争。这次报告之后，他感到厌恶，决心再也不插手这种事情。”<sup>②</sup> 经历过此次风波的雅克·布弗雷斯同样沮丧：“在内容上，我坚持认为我们的建议完全合情合理。德里达在逝世前不久的一次电视节目中说，必须承认哲学教师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很倒退的。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想象这样的宣言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sup>③</sup>

※ ※ ※

另一次同样痛苦的危机发生在几个月前，在筹备“拉康与哲学家”研讨会期间。研讨会由国际哲学院倡议，应该于1990年5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论战由阿兰·巴迪乌发起，针对的是德里达在拉康继承者中的地位。巴迪乌在1989年12月2日给勒内·马若尔写信，要求他更改发言题目：《自拉康以来，是否存在一种德里达式的精神分析？》。在巴迪乌看来，标题中出现德里达这个“在整个研讨会上提到的唯一在世的哲学家”的名字，将使他们所有的工作“意味深长”<sup>④</sup>。这一要求刺伤了

<sup>①</sup> 委员会关于哲学教育的报告，1990年。见 [http://www.acireph.org/cote\\_philo\\_1\\_chomienne\\_reforme\\_programmes\\_128.htm](http://www.acireph.org/cote_philo_1_chomienne_reforme_programmes_128.htm)。

<sup>②</sup> 同玛拉布的访谈。

<sup>③</sup> Jacques Bouveresse, “Défendre la vérité désarmée”, propos recueillis par Évelyne Rognon et Régine Tassi, *Nouveaux Regards, Revue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de la FSU*, n° 34, juillet-septembre 2006, p. 71-74.

<sup>④</sup> 这封信同论战的其他文件一并收入论文集的附录，见 *Lacan avec les philosophes*, Albin Michel, 1992, p. 425。

马若尔和德里达，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查禁。

事情很快恶化。好几名参加者威胁说，如果保留这个有争议的标题的话，他们将退出组委会。这一年主持国际哲学院的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很希望巴迪乌参会，他感到在政治上同他相当接近。妥协最终达成，马若尔同意将标题的第二部分“是否存在一种德里达式的精神分析？”用一个简单的破折号代替。他的演讲将以此事出发，对这一荒谬的划痕加以评论。

研讨会于1990年5月27日在教科文组织的大演播厅举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德里达发表了闭幕发言，以《为了对拉康的爱》为题，回顾了同拉康动荡不安的关系，504  
口气时而讽刺，时而敬佩：“如果我现在说：‘您看，我相信我们彼此曾经很喜欢对方，拉康和我……’我确信大概在座的许多人会感到难以忍受。这就是为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说。”<sup>①</sup>拉康去世已经十年了，此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环境使德里达与之更加接近：

无论从哲学、精神分析学还是普遍理论的角度来看，当前乏味的复辟运动试图掩盖、否认或禁止的就是这一点，即过去几十年间得以改造思想空间的一切没有同拉康一道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没有拉康式的挑衅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人们对之有怎样的接受或讨论。<sup>②</sup>

在演讲中，德里达不点名地暗指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新出版的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小说《武士》（*Les Samourais*）。其中拉康成为罗赞（Lauzun），德里达则变成了萨伊达（Saida）。在小说中两人都将对方视为“供出口的赝品”，而德里达则遭到了更多的讥讽。攻击直截了当，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小说手法使之更具杀伤力：

萨伊达利用梅（Mai）获得勇气并战胜了时间。他的思考受到《芬尼根守灵夜》和海德格尔的启发，让哲学家们恼火，文学家们缄默，而这两群人都被指向其超验的愚蠢。所有人都被刺伤，没有人受到吸引。弥撒持续了大约三小时，有时甚至分成两次，两个三小时：六个小时。出门的幸存者历历可数。他们将成“建解构”（*condestruction*）理论最早的膜拜者：这个组合词是为了让人理解没有摧毁就永远不应有建设。这个概念并不那么优美，听起来也不像法语，甚至显得很老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建解构”？而从前很腼腆的萨伊达把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Résistances de la psychanalyse*, op. cit., p. 60.

<sup>②</sup> *Ibid*, p. 64.

505 每个词拆成许多微小的部分，让这些种子长出了柔软的橡胶枝条，他用它们编织着他自己的梦，属于他的文学，有些沉闷，但因为深奥而更显深刻。这是他大鳄光环的开始，这光环将淹没美国及其女权主义者，她们都因为对萨伊达的热爱和内生的不满而变成了“建解构者”。<sup>①</sup>

第二场危机在会议几周之后发生。巴迪乌因为马若尔和德里达在发言中多次影射这场纷争而深感愤怒。他认为，为了平衡大家的论文而给了德里达太多的特权，因此他想撤下自己的文章。通过拉库-拉巴特的再次调停，所有当事人在1990年8月10号一起开了个会，再次达成妥协：巴迪乌同意保留他的文章，条件是与伦战有关的所有信件和文件附于作品之后发表。

这件事本来无关紧要，但它在拉库-拉巴特和德里达之间造成了不仅仅是短暂的分歧。熟知事件所有主人公的菲利普·贝克说：“巴迪乌当时很孤立。他需要结盟，此时十分接近拉库，并意欲批评海德格尔。拉库在某些地方也批评巴迪乌，但他在德里达耐心专注的解构与巴迪乌论战的哲学姿态之间犹豫不决。他选择了同后者一致，而不是站在勒内·马若尔一边，这让德里达无法原谅他。但在拉库那里，至少在当时，占据诗学中心地位的是政治批评。而后来巴迪乌和德里达的接近显然为此事蒙上了奇特的色彩。”<sup>②</sup>

506 但此事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索。这两个有着将近20年深厚友谊的朋友之间的危机还源于许多其他因素。从《政治的虚构》开始，菲利普就对海德格尔产生了一种愤怒。他找不到更强硬的词来批评海德格尔。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他对德里达没有足够地谴责海德格尔感到不满。很可能德·曼事件也令他恼火。犹太问题在思想家之间是一个真正的紧张点。拉库-拉巴特不是犹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亲犹。他对纳粹浩劫的创伤感同身受，几乎同萨拉·考夫曼一样强烈。<sup>③</sup>德里达则拒绝将奥斯威辛视为绝对的特殊事件。在1990年3月11日国际哲学院的一次辩论中，德里达重申并明确了他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回顾了十年前在瑟里斯研讨会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发言之后的辩论。

当我说我忧虑地看到所有关于纳粹的浩劫，关于种族屠杀与灭绝的思想都

<sup>①</sup> Julia Kristeva, *Les Samourais*, Fayard, 1990; je cite d'après l'édition Folio, p. 145. 德里达在 *Résistances—de la psychanalyse* 中提到此书, *op. cit.*, p. 68. 德里达不会忘记这次攻击, 后来在1997年断然拒绝了克里斯蒂娃想与他接近的意图。

<sup>②</sup> 同菲利普·贝克的访谈。

<sup>③</sup>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集中于唯一的奥斯威辛时，这并不是为了使奥斯威辛相对化。浩劫已经不仅仅是奥斯威辛。这不是为了使奥斯威辛和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相对化，这是带着种族灭绝在我们身上激起的无限尊重、回忆、无底的痛苦，为了至少获得这样的教训，即其他种族灭绝早已发生，曾经发生，还可能发生。在那里“我们”的问题也仍然是开放的。如果将其关闭，如果此刻中止这链条，问题将由于我不必说明的原因而十分严重。就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为了将奥斯威辛相对化或次要化。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我相信正是出于对纳粹统治下的犹太牺牲者的尊重，我们才必须不把所有可能的牺牲者们都集中于此。<sup>①</sup>

但除了一切哲学或政治问题，个人因素在两人的冲突中也起到了决定作用。德里达难以忍受拉库-拉巴特自我毁灭的一面。他呼吸越来越困难，却从早到晚不停地吸烟，有时给人危在旦夕的印象。酗酒问题更让人担心。让-吕克·南希忧伤地讲述道：“菲利普开始喝酒，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瞒着我们喝烈酒，特别是威士忌。他酗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任何东西任何人都帮不了他。”<sup>②</sup>

507

他们共同的朋友们无奈地见证了德里达和拉库-拉巴特的疏远。萨缪尔·韦伯回忆道：“渐渐地，他们的关系变得疏远，冲突越来越频繁。然而很多因素还使他们接近。菲利普比让-吕克更具诗人和艺术家气质，后者则更加哲学化，更加严肃。但菲利普也更具悲剧性，更易抑郁。也许他唤醒了太多雅克本人的焦虑感。”<sup>③</sup> 菲利普·贝克说：“德里达是个备受折磨的地中海人。拉库-拉巴特代表了许多令他着迷的东西：朴素，政治上的严谨，同诗歌相亲。拉库的真正梦想大概是文学的：用巴迪乌的话来说，他认为德里达‘发明了散文’，而他梦想着追随荷尔德林和策兰发明诗歌。当然这个梦想带有政治意义。”<sup>④</sup>

※ ※ ※

与拉库-拉巴特疏远的同时，德里达与让-吕克·南希更加接近。后者很早就有心脏问题，但从不愿去关注。等到1989年夏天一次严重的发作才让他最终意识到自

<sup>①</sup> “Papiers” du CIPH n° 11, “Autour de Paul de Man”, 全部辩论见网页 [http://www.ciph.org/fichiers\\_papiers/papiers11.pdf](http://www.ciph.org/fichiers_papiers/papiers11.pdf)。

<sup>②</sup>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sup>③</sup> 同萨缪尔·韦伯的访谈。

<sup>④</sup> 同菲利普·贝克的访谈。

己状况的严重性。不擅照料自己的德里达恳请朋友这么做：“多休息，旅行中不要劳于工作，为了我这么做，平静地写作，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安静地，在夏尔-格拉街。”<sup>①</sup>他反复对南希说，他的思想、文字和友谊对他多么重要：“像我一样关心你的心脏。要走路，不要吸烟（少吸烟），学会慢慢来，给自己时间，许许多多时间。”<sup>②</sup>

1990年7月19号，南希通知德里达很快需要接受心脏移植：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他只有六七个月的生命。“既是为了疗养，也是为了有可用的心脏时做好移植的准备，我不再有权利离开斯特拉斯堡”，让-吕克·南希讲道。“雅克专程往返来看了我一趟，这让我很高兴，也相当害怕。对移植器官的等待无疑让我们接近，他不断给我打电话。这令人印象深刻，让我身边所有的人吃惊。我对雅克开玩笑说：‘我毕竟是最好的德里达信徒。我实实在在地用到了你的移植体概念’。”<sup>③</sup>亚历山大·迪特曼证实德里达在这段痛苦的等待期间对朋友多么关心：“就在他接受心脏移植前不久，德里达对我说：必须就让-吕克·南希进行讨论，必须强调他的工作。他向佩吉·卡穆夫建议《段落》杂志为他策划一期专刊，并撰写了《触感：让-吕克·南希》的初稿，这篇长文后来成为完整的一本书。就好像他优先选择了让-吕克·南希作为继承人。因为南希并不模仿，因为他的思想既相近又独特，而且在基督教方向开启了新的空间。”<sup>④</sup>

1991年春天，雅克正在加利福尼亚度过几周的时间，让-吕克向他宣布当晚将接受手术。同已然最亲密的朋友如此遥远令他难过，德里达冲动地回答：“别担心，我会和你一起醒过来。”<sup>⑤</sup>手术成功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承受着严重的健康问题，让-吕克·南希却将比其他所有接受心脏移植者都有着更加活跃的生活。

※ ※ ※

1990年秋天，一起重要的丧亡震动了德里达。1990年10月22日，路易·阿尔都塞逝于依弗里纳的拉维利耶尔医院。他们两人有过将近40年的交情，我们已了解其复杂性。在韦罗夫莱的小公墓举行的葬礼上，由德里达面对几名最后的忠实信徒讲话。他不能隐瞒有些东西将他们分裂，有时使他们对立，但他重申这一关系对他

①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明信片，无日期（1989年）。

② 德里达致让-吕克·南希的信，1990年7月9日。

③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也可见其作品《闯入者》（*L'Intrus*, Galilée, 2000），其中对心脏移植进行了出色的思考。

④ 同迪特曼的访谈。

⑤ Jacques Derrida, *Le toucher*, Jean-Luc Nancy, Galilée, 2000, p. 135.



是多么宝贵：

当然，在我心里拂之不去的，今天最生动、最亲近和最珍贵的，是他的面庞，路易那额头宽大如此英俊的面庞，他的笑容，所有在他身上的，在那些平和的时刻，他有过的，你们中许多人知道，闪耀着善良、渴求和爱的馈赠。<sup>①</sup>

五年前，克洛德·萨洛特（Claude Sarraute）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将阿尔都塞与日本食人者佐川一政（Issei Sagawa）相提并论，后者在杀死并吃掉一名年轻的荷兰女子后因精神错乱而未被起诉。此文让阿尔都塞深感受伤。不久他开始撰写自传《未来长存》。叙事一开始他就回顾了自己享受的“不予起诉令的两难后果”。“因为就在这不予起诉、沉默和公开死亡的墓碑之下，我不得不苟活并学会生活。”<sup>②</sup> 这标题颇具预见性：1992年，这部遗著将激起巨大反响。随后的几年里出版了许多阿尔都塞未发表过的作品，让人彻底重新评估他的著述和命运。《未来长存》几乎是医疗记录，同时又是自我剖析，也以细微的笔触向“德里达这位巨人”致以异乎寻常的身后礼赞，称他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我们时代唯一的伟人，也许在很长时间里是最后的一位伟人”。

---

① Jacques Derrida, “Louis Althusser”,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p. 148-149.

② 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op. cit.* Je cite d'après *Le Livre de poche*, 1994, p. 23.

## 第 26 章 六十岁哲学家的肖像

510 1992年，雅克·德里达接受了奥斯瓦尔多·穆诺兹（Osvaldo Muñoz）的采访，并以一篇传统的“普鲁斯特问卷”作结。这篇为《国家报》准备的文章最终并未发表，也许是因为德里达认为它暴露了太多。

对您来说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丧失记忆。

您希望在哪里生活？——在一个我能随时回去，也就是能随时离开的地方。

您最能宽恕什么样的错误？——保守一个本不该保守的秘密。

您喜爱的小说主人公？——巴托比。

在真实生活中您喜爱的女主人公们？——这里我保守秘密。

您欣赏的男人的品质？——懂得承认他的恐惧。

您欣赏的女人的品质？——思想。

您欣赏的品德？——忠诚。

您喜欢做的事？——聆听。

您希望成为的人？——也许对我有些记忆的另一个人。

我性格的主要特点？——某种轻盈感。

我的幸福之梦？——继续梦想。

我最大的不幸会是什么？——死在我爱的人们之后。

我想成为的：一名诗人。

我最讨厌的：讨好和庸俗。

我最赞赏的改革：有关性别差异的。

我想要拥有的天赋：音乐天才。

我希望怎样死去？——绝对出乎意料。

我的座右铭：更愿意说是。<sup>①</sup>

信念与悖论，焦虑，希望和错失，占据一切的愿望，诗歌，记忆与秘密，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囊括其中。

※ ※ ※

“雅克永远处在超负荷运转中，”儿子皮埃尔解释道，“太多的演讲和旅行，太多的职责和义务，太多要写的文章和书。他几乎天天没完没了地抱怨自己超载。与此同时，虽然总是处在紧张状态，他却能够适应，走在前面。他必须回复，而且最经常的是需要马上回复。”<sup>②</sup> 同梅尔维尔（Melville）笔下的巴托比（Bartleby）及其著名的“我宁愿说不（I would prefer not to）”相反，德里达更喜欢说“是”。他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时光流逝，他有越来越多的计划在等待中，信件在搁置中，还有预期的旅行。他“溢出”了，正如极少数始终追随其职业生涯的人之一米歇尔·德基所写：“‘太’是他的衡量单位。但‘太’什么呢？比如太长。当宣布雅克·德里达‘发言’时，朋友们的微笑仿佛在暗示：‘他会讲多长时间？’永远无法知道。如果他说很短，那您最好给他留出两三个小时。”<sup>③</sup>

极端而全身心投入，德里达在同他人的关系中，在发怒和怨怼时也是如此。他和蔼、乐于助人、友善倾听，但其反面是有时突然而强烈的怒火。只要有一点分歧或粗俗就足以失宠，被打入敌营。他的儿子让证实：“他很容易感到受伤。他有些伤痕，最小的事情就足以重新揭开它们。如果某人在文章中触犯或攻击了他，他会永远记得。”<sup>④</sup> 在这种情形下，他可以表现得强硬和毫不妥协，甚至不公正。克莱尔·南希见证道：“德里达脆弱而不安，有时把世界视为足球场。一天，他给我勾勒出一幅世界地图：有些国家是他的，有些被他的敌人主宰，还有一些尚不分明。”<sup>⑤</sup>

512

他占据着一块领地，在那里既是前锋又是后卫，这种视角使他谨慎而没有信任感，甚至有些恐慌。无论怎样成功，他看到的都是威胁。即便处在主导地位，他仍

① 雅克·德里达，未发表的访谈，IMEC 档案。

②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③ Michel Deguy, “Pour Jacques Derrida”, in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78.

④ 同让·德里达的访谈。

⑤ 同克莱尔·南希的访谈。

然保留着牺牲者的形象，而且不止一次如此，特别在体制空间里。“他的态度里有些孩子气的东西，”贝尔纳·斯蒂格勒承认，“要求无尽的爱。”但这永远要求被爱的需求绝不是单方面的。德里达也极为多情和慷慨。他十分关心身边的人，包括他们的生活和亲友。尽管如此繁忙，他却总是通过写信或电话了解每个人的情况，表现出真正的同情心。他对他们的困难也表现出真诚的忧虑，而且懂得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动。有一天阿兰·巴斯给他看自己几个月大的小女儿的照片，德里达惊喜不已：“好好享受，时间过得很快。”他本人也为孩子们太快离开家而感到痛苦。

很多接近他的人，如萨缪尔·韦伯或外甥女玛蒂娜·麦斯凯尔，还记得他的大笑。德里达与自己在一些文章中证实的相反，很喜欢讲故事，但这些故事，尤其是犹太笑话，让他大笑不止，常常无法讲下去。“笑对他来说就像是另一种悖论。这是他个性中的重要一面，与忧郁毗邻，”韦伯证实说，“我还记得他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在我看来揭示了他的焦虑：有个人去看医生，做了许多检查。他几天后回来时，医生对他说：‘放心吧，一切都好，一切都很好……只要再做几个小检查……’‘哦，好的’，病人说……‘但什么时候？’‘哦，明天早晨吧，一大早。’这让他笑个不停。这是他对死亡的永恒焦虑的搞笑版本。”<sup>①</sup>

513 但随着荣耀和权威的上升，他不那么爱笑了。德里达在公共场合表现得更严肃，这是为了符合人们对他的期待。私下里，他的性格常常是阴郁的。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仍然震惊于他不可思议的自责感，就好像他觉得应当为一切负责：“在他去世前15天，他提到贝尔纳·皮沃在‘呼语’节目里的问卷，对我说：‘当我到达圣皮埃尔面前时，我会说：‘我请求宽恕’和‘风景很美’。请您记住这话。’”<sup>②</sup>德里达越来越为流逝的时间所纠缠，死亡的念头总是更加强烈。“生命将已是如此短暂”，他反复这样使用他认为如此恰当的未来过去时。他仿佛有一种紧迫感，需要不断地创作，大量地计划，留下痕迹。对有时责备他出版太多的人，如克莱尔·南希，他的回答是：“我无法阻止自己。这是我与死亡斗争的方式。”

※ ※ ※

虽然死亡的念头从未稍离，德里达却在许多方面都有力而活跃。让-吕克·南希强调指出“雅克的在场是多么强烈，引人，迷人，令人印象深刻——不仅是像一座巨大雕像那样的存在，更是像柔和关切的感性，像清醒的关注，像敞开和保留的混

<sup>①</sup> 同萨缪尔·韦伯的访谈。

<sup>②</sup>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Derrida: l'exercice des médias lui a été profitable”, *L'Humanité dimanche*, 16 janvier 2005.

合。如此解构过‘在场’的他却是压倒一切的对在。”<sup>①</sup>

在一篇优美的致敬文章《我们中的朱庇特》里，德尼·康布施奈也强调了这最初的具体效果，而今天读他的书可能会让人忘却这一点：

德里达是引人注目的身体：面貌、声音、皮肤、目光、头发、肩膀和手势。这具身体强烈而独特地打动着你。……聆听德里达，同他谈话，这不是与词语或他的对话相遇，而是在一种解读和表征的纯粹能力下，遇见了朱庇特式（没有对应的希腊词）的精神。不是一个外露的、庄重威严的朱庇特，而是一个内在的、对事物高度了解、意志明晰的朱庇特，同时具有有欲望的生命，简单的情感，对疲倦的挑战，永远清醒的想象力，从未远离的苦难，还有直到病中仍然不堕的思考的信念。<sup>②</sup>

514

学生时代，德里达说自己很脆弱，并在“健康饮食”餐厅吃饭。从那时起他的健康状况很好，但他仍然怀疑自己多病，为最小的症状惊慌不已。他有自行车手或马拉松运动员的心跳节奏，每分钟脉搏不到 50 下，这让他拥有超常的体力和恢复能力。他在意饮食，并不特别爱好葡萄酒，但对朋友勒内·马若尔在这方面的知识欣赏不已。从克雷阿时代他就戒了烟，而更喜欢小雪茄。在儿子让的催促下，他终于也戒了小雪茄，开始用烟斗，但他常常忘记点燃，只是有时候乐于被这样拍照。实际上，如果说他十分饮食有节的话，他对健康的持续关注与此不无关系。他有太多的计划，太多的书要写，他希望自己长寿。

让-吕克·南希在越洋旅行中总是被德里达的精力震惊。他在短暂的休息后，不顾时差就能做一场长篇讲演，参加辩论或接受采访，随后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招待会上。在一次为国际哲学院去墨西哥的途中，德里达对南希承认：“到达的时候我真是支撑不住了。我试着在接我的车里睡了一会儿。但一旦开始讲话，所有疲劳的痕迹就消失了。”随后他补充道：“我真是疯了。”在公共场合，听众的兴趣刺激着德里达。他的体力比年轻时要好得多。他自己承认：“20 岁的时候我如果做我现在的一小

515

部分事就会倒下。对我工作的接受给予了我这份能量。”<sup>③</sup>

他晚期的文字，当然还有他的研讨课和发言，有着几乎是戏剧化的口头表演的一面，对这一点不应低估。如米歇尔·利斯指出的，德里达的许多文字是为了表演

①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② Denis Kambouchner, “Jupiter parmi nous”, *Rue Descartes* n° 48, *op. cit.*, p. 95-98.

③ 雅克·德里达，访谈，载《洛杉矶周报》，2002 年 11 月。

而写：“节奏时而缓慢，时而快速；德文引文打断了法文的句子，好几种语言混在一起。有些十分严肃的段落因为明显的悖谬和语句的重复而引人发笑。”<sup>①</sup>他的老朋友、作家马科斯·热奈夫常常阅读德里达，但从未听过他当众讲话；在德里达一次演讲的第二天，热奈夫说自己“受到了吸引，不仅因为文章本身起伏的大胆，还因为他的表演，他完美的语调，他精力过人的手势，特别是表示引号的手势，让人想起发出投枪时的斗牛士或手持双枪的牛仔”<sup>②</sup>。连续几个小时，有时整整一天的讲话，参加一场辩论或一次高要求的采访，这些都是体力活动，就像在伟大的运动员身上能释放出让人欣快的内啡肽。比起写作来，德里达更喜欢“讲哲学”<sup>③</sup>。他从自己的话语及其在听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中汲取养分。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的焦虑都忘却了。也许他从未感觉到如此充实地存在着。

在公共场合，无论做什么，德里达今后都占据着空间，吸引着目光。刚到巴黎时曾胆怯且不大自信的他，曾羡慕地观察着自信的格拉奈尔的他，随着时间流逝有了越来越闪亮的一面。许多接近他的人提到他的自恋。有些人称他“可怕”，因为他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恋：德里达将之推到极限，并使之成为一种哲学姿态。莫里斯·奥朗德尔的说法也许最为恰当，他说这是一种“光芒四射的自恋”<sup>④</sup>。

对于德里达，吸引他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需求。他几乎从不谈论和女人的关系，那是因为在这个方面，关于秘密的思想更令他萦绕于心。但许多人知道，在他那里，女性总是复数的。德里达在回答普鲁斯特问卷时赞美忠诚，那是因为每一次关系对他都是唯一和不可替代的，他因此认为自己能够拥有许多的忠诚。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将永远不会再这样暴露自己，他将永远不会再这样痛苦，也不会再这样使人痛苦。但他始终是个了不起的诱惑者，他欣赏成功和荣耀，也是因为那让事情更加容易。他对女人的巨大尊重，特别是他面对她们时有点像精神分析师的那种奇妙的聆听态度，都成为令人生畏的武器。如玛格丽特·德里达所说：“我一直认为雅克首先是通过倾听的能力吸引女人的。”这种在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在他这样具有强烈个性的人那里更为罕见，使许多他身边的女人印象深刻。他的朋友玛丽-克莱尔·布斯乐于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绝对的倾听能力，这在任何其他人那里从未见过。不带任何道德判断。在任何情形

① Michel Lisse, *Jacques Derrida*, ADPF/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05, p. 32.

② 马科斯·热奈夫致德里达的信，1991年12月10日。

③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211.

④ 同莫里斯·奥朗德尔的访谈。

下他都想聆听生活。”<sup>①</sup>

“对女人的爱甚至在青春期之前就存在，”他有一天对埃莱娜·西克苏吐露，“那已经是一种认同和同情的混合。我感觉在她们一边。”<sup>②</sup> 随着时光流逝，他越来越喜欢女人而不是男人的陪伴，而且认为她们最能够读懂他。无论怎样，无论同女权主义者在理论上如何一致，德里达还是喜欢这样的女人：她们确认并且平静地承担自己的女性特征。一个生理上不能吸引他的女人很难让他感兴趣，无论其精神质量如何。“在我们结交之初，”阿兰·巴斯讲道，“他常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可怕的地中海大男子主义者’。”

517



雅克和玛格丽特的结合尽管充满波折，却始终至关重要，坚不可摧。在他们48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按照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说法，“玛格丽特从没把任何人视为对手。她总能在接近或过于接近雅克的女人身上找到优点，但这并不是说她不曾为此难过”<sup>③</sup>。

从他们最早相识起，玛格丽特就确信他将是那一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她对他立即产生的崇敬之情因而不必一再表现。如果说雅克惊奇地看到妻子对他获得的外界认可并没有太多赞叹的话，那是因为她不必等到成功才相信他。德里达对荣誉并非无动于衷，在他看来这像是对他承受过的许多艰苦和拒绝的回馈，但荣誉对她并不多么重要。她有时称丈夫为“外星人”，这并不是为了惹恼他。

为了方便他的工作，玛格丽特从1960年代初起就承担了所有日常的束缚，并处理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房子、单据、孩子上学、税表和无数其他琐事。她吐露：“雅克连银行在哪里都不知道。工作人员从没见过他。我给他们带去我让他签好字的文件时，有人笑着问我：‘他真的存在吗，您的德里达先生？’”<sup>④</sup>

他们的朋友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讲述道：“雅克对玛格丽特永远有一种绝对的信任。她是不可触犯的。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他配不上她。”德里达乐于请客——友人、同事、译者、学生，而负责和应对一切的总是玛格丽特，尽管她也有自己的事，但她总能准备好美味的晚餐。她待人简单热情，就好像一切自然而然。有时她会对丈夫表现出嘲讽，但总是善良默契，从没有丝毫恶意。德里达了解玛格丽

518

① 同玛丽-克莱尔·布斯的访谈。

② 同埃莱娜·西克苏的访谈。

③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④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特的细腻优雅和无与伦比的恰如其分，她没有任何能伤害他的地方。<sup>①</sup>

最后，唯一有时让玛格丽特恼火的是雅克善妒的脾气：“他一刻找不到我就不高兴。每时每刻他都想知道我在哪儿，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但如果不幸我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就会说：‘啊，非得有来有往！’”<sup>②</sup>

※ ※ ※

德里达对巴黎有着“无条件的膜拜”，他说有时候赞赏它的每条小街，知道它将超越他的生命存在下去<sup>③</sup>，但他从不想在其中生活。对于在埃尔-比亚的高地长大的他，大城市里有些令人难以呼吸的东西。夫妇俩忠实地守着1968年在里斯-奥朗吉斯买的房子，随着时间流逝将之慢慢改善并扩大。德里达每次旅行之后都高兴地归来，这里到处是书架和书房。每间屋子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这里有从他来到巴黎起积累的信件、报刊文章、他自己著作的各种语言的版本。那里是哲学著作，许多因为反复阅读和注释而残破。另一间屋子里是他收到的题赠的书籍。在楼梯的小隔间里是收藏的杂志。单独一处存放着“心爱的文学”书籍。在他的“绝顶”，那小小的几乎无法站立的小阁楼里度过多年之后，他把自己安顿在游廊，后来又搬进来一个大书架。德里达需要如此多的空间，因为他保留一切：旧电脑，论文，40年间积累的学术论文，还有最无关紧要的纸张。在里斯-奥朗吉斯的花园里还有他养过的每一只猫的坟墓，以及他移植于此的每棵圣诞树。对他，踪迹并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519 每一刻的现实。每个物件，无论多么卑微，都承载着其生命的时刻。任何一个日常或平凡的举动都是见证和未来的承诺：“当我把一张纸片留在家里，或者当我在书的边缘记下些什么——比如一个惊叹号，我总是想谁会读到它，我的孩子们如果读到了会怎样。”<sup>④</sup>

德里达不止一次称：他的第一愿望不是哲学或艺术著述，而是保存记忆。他投向过去的目光拯救了他，并在某种意义上令他心醉神迷：

我有着这样幸运的天性，即我生命中没有一刻——哪怕是最糟的时刻——

---

① 同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的访谈。参见 Düttmann, *Derrida und ich. Das Problem der Dekonstruktion*, Reihe Edition Moderne Postmoderne, 2008。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③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04.

④ “Dialogue avec Jacques Derrida, Jean-Luc Nancy et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Rue Descartes* n° 52, op. cit.



让我想说：我宁愿不曾经历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一再证实，一再重复，当我说：我爱我爱过的，那并不只是一样东西或一个人，而是我爱着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爱我所有的经历，这是真的，我想保留一切。这是我的运气。但我很少在当时感到幸福，感到简单地爱着我正在经历的，幸福感是过去，一切在我看来已被爱过，应该被再次证实。<sup>①</sup>

从年轻时代德里达就习惯早起，大约6点。喝完一杯咖啡他就开始工作。3个小时之后同玛格丽特共进早餐时，他有时会说已结束了一天的备课工作。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会在午饭后小睡一会儿，但他承认这一点有时不无窘迫，特别是刚开始的几年。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无限持续地工作，废寝忘食。他在电影《德里达》里说：“白天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我不换衣服，我一直穿着睡衣和晨袍。”<sup>②</sup>

从1986年起，最重要的工具必然是有着超强存储和存档能力的电脑。“现在我离不开它了，这台小苹果电脑；我甚至想不起来或者没法理解以前没有它我是怎么工作的。”<sup>③</sup>他承认对它有一种“吸毒者的依赖”。电脑对他很快变得不可或缺，但刚开始很容易让他焦虑。头几次看到屏幕上出现爆炸的图像时，他感到真正的恐慌。皮埃尔和让用全部的耐心才帮助他慢慢掌握了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说电脑给予了德里达巨大的工作潜能，它也带来可怕的危险，即丢失文件。最初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520

现在我敢承认，我在家有三台电脑，其中两台还带有一个极碟驱动器，一个附加的硬盘。……当我在写一篇长文，长时间没有打印时，我离家之前一定复制好几个文件。我在不同的地方至少留着十份备件，因为还有火灾盗窃等危险。在我包里就有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随着技术而产生的神经质。<sup>④</sup>

他不在里斯-奥朗吉斯的时候更加焦虑。假期或旅行前夕，德里达将文件复制在好几张盘上。他留一张在自己身上，一张放在行李箱里，第三张留给玛格丽特或其兄弟。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时，把一份电子文件交给希利斯·米勒，另一

①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62.

② *Derrida*, long métrage d'Amy Ziering Kofman et Dick Kirby, Jane Doe films, 2002.

③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152-153.

④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in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 17, 2001.

份以纸版形式留下。莫里兹奥·菲拉里斯在他的小书《雅克·德里达：记忆的肖像》中讲到，他的档案运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时，他很高兴人们不仅给他留下了一整套复印件，还有一台复印机。

※ ※ ※

521 在日常生活中，德里达几乎是病态的准时，特别是在赶火车或飞机时：耽搁了他的人倒霉了。他不喜欢持续到深夜的晚餐；在餐馆里他会表现出不耐烦，如果菜上得不够快的话。他更喜欢朋友间小型的聚餐，甚于正式晚宴。他在晚宴上的噩梦是被夹在不认识的或让他烦闷的人中间。迪特曼回忆道：“在如此深奥的复杂思想之外，他身上有着惊人的简单平易的一面。我有时在里斯-奥朗吉斯他的家里度过几周。晚上，如果玛格丽特不在，我们就吃意大利面，然后看电视。通常雅克在晚餐后不久睡觉。他一般都有办法掩饰他需要睡眠。在研讨会上，他有时把头埋在手心，仿佛在深入思考。实际上他在小憩，而这并不妨碍他之后向发言者提出再恰当不过的评点。”<sup>①</sup>

电视在他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旅行途中。他乐于承认：“比起没有自来水的房子，我更害怕没有电视的旅馆房间。”<sup>②</sup> 这一依赖也杂有负罪感：

我想我花了太多时间看电视，自然同时我也责备自己读书时间不够或者没去做别的事。……我有时候看糟糕的电视剧，法国的或美国的，或者给我更多文化意识的节目，比如 Arte 电视台，政治辩论，轰动一时的面对面辩论，通常是有关政治的，“真相时分”，“7 天大事”，或者老电影。我能够 24 小时观看好的政治档案片……我几乎什么都看，主要根据时候。<sup>③</sup>

522 星期天早晨，他一边在家里蹬健身自行车，一边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 8 点 45 分到 9 点 50 分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节目。<sup>④</sup> 在美国，他可以着迷地连续几小时观看电视福音转播。但让他更感兴趣的，如佩吉·卡穆夫所讲，是国会听证会直播。1987 年，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第二届任期末，他长时间观看证人讲述尼加

① 同迪特曼的访谈。

②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9.

③ Jacques Derrida et Bernard Stiegler, *E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Galilée, 1996, p. 153.

④ *E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op. cit., p. 155.

拉瓜反政府军和伊朗的美国人质事件。所有这一切当然对他后来在研讨课上讨论的见证或伪誓的主题不无影响。<sup>①</sup>

※ ※ ※

在饮食上，德里达对家庭传承一直很敏感。他继续喜爱儿时的食品。玛格丽特学会了做没有肉的阿尔及利亚古斯古斯：用料是黄油、豌豆、白奶酪、煮蛋。他喜欢美食，尽管他的口味始终相当简单。阿维塔尔·若奈尔是个坚定的素食者，她讲道，一天同尚塔尔和勒内·马若尔吃晚餐时，她没有取用一道菜，引起一些尴尬。当她说她不吃肉是出于十分可敬的哲学原因时，德里达转向她询问是什么原因。阿维塔尔于是说将他者的肉体融入自身对她意味着什么。不久之后，对这类事接受力超强的德里达开始讨论肉食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carnophallogocentrisme*），而不仅仅是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后来，同我在一起和在我面前时，他说他是素食者。但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他吃了一份鞑靼牛排，那是最彻底的肉食。我觉得他好像背叛了我。当我对他提到这事时，他先是把我看成密探，然后说了句漂亮话：‘我是个偶尔吃肉的素食者’。”<sup>②</sup>

在里斯-奥朗吉斯的晚餐结束后，德里达乐于把没开车的客人送回去。他喜欢开车，总是开车去巴黎。他很早就用父亲的汽车现学现练学会了开车。但他从未学过交规，完全凭个人的想法，这有时带来吓人的后果。比如他认为大部分的禁行不是为他规定的，大路应该自动对小路有优先权。开车时德里达很容易着急。遇到堵车他几乎能神经发作。为了解决这一切，一遇停车他就开始做笔记。在一封给埃里克·克莱芒的信中，他在附注里写：“原谅我的笔迹，我是开车时写的（什么生活啊！），不过是停下来时，甚至不是在红灯前面。我突然想到一个书名——《写在红灯前面……》。”<sup>③</sup> 他开车虽不让人放心，却从没出过事。

523

玛格丽特说他们一直有一辆雪铁龙，不是因为特别的偏爱，而是因为附近有家修理厂。“有一段时间他接手了他父亲的DS车，但他忘了加机油，把车毁了。一天，他加满了柴油而不是汽油。”后来他便选择了更简朴的车，尽管他并非不喜欢好车。勒内·马若尔讲道：“我刚刚买了一辆莲花的‘精神’（Esprit）。他怀着强烈的兴趣观察它，对这名字啧啧赞叹：‘多么奇妙。我正在写一本书，就叫《论精神》。……’

<sup>①</sup> Peggy Kamuf, “Affect of America”, in *Derrida's Legacie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45. 同卡穆夫的访谈。

<sup>②</sup> 同若奈尔的访谈。

<sup>③</sup> 德里达致埃里克·克莱芒的信，1986年8月12日。

我能试试吗？”<sup>①</sup>

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衣着却是例外。在路易大帝高中当学生时，杰基不幸只能忍受那灰外套；青年时代当教师时，他的穿着稍嫌暗淡。但从第一次去柏林之后发生了变化，那次萨姆·韦伯严重刺伤了他，因为德里达同韦伯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不同。从1970年代初起，他开始偏爱强烈的色彩，闪烁的质地和鲜明的反差。他穿着讲究，尽管并非人人喜欢他追求醒目的口味。马若尔回忆道：“我们对衣着互相发表评论。尚塔尔和我知道他真的爱美。我们经常送给他领带和衬衣。他喜欢名牌，特别是高田贤三（Kenzo）。”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指出：“也许在他身上有两处未经推敲的地方：衣服和同女人的关系。”<sup>②</sup>

※ ※ ※

524 德里达在很长时间里并不富裕。他们很欢迎糊口的活计好让收支平衡，无论是玛格丽特的翻译还是雅克在商校的口试。但从1960年代末开始，随着应邀到美国讲学和给巴黎的美国学生上课，生活显得宽裕些了。德里达在耶鲁有一份丰厚的薪酬，后来在尔湾和纽约亦然，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工资和版权，尽管他并不急于提出要求。当然他讲演的报酬也越来越高。但德里达并不是个爱财的人，钱也从不是他生活的动力：他不再在意报酬，现有的对他足够了。他甚至经常不询问自己演讲的酬金。他花几周的时间准备研讨会上的长篇发言，常常没有酬金。在美国，他承认有时惊异地看到同属“法兰西理论”的其他一些人提出高额要求，而那些人名气还没有他大。在他教书的大学里，他从不要求提薪。这并非出于轻蔑或天真，谈钱，特别是讨价还价，并非他的天性。

“在餐馆他讨厌计算和分账，”佩吉·卡穆夫说，“而且一般来说总是他为所有人结账。”他喜欢在账单送来之前暗中结账。他也不喜欢别人坚持请他，特别是更年轻或没有他宽裕的人。大卫·卡洛尔回忆道：“他是我见过的最慷慨的人，在时间、精力、帮助他人、提供意见还有金钱上均是如此。”<sup>③</sup> 阿兰·巴斯还记得一天晚上对他说：“可是雅克，不能每次都由您来付账。”

525 同孩子们他总是表现得十分大度。对处于困境的人亦然。他在帮助他人时总是不事声张，巧妙得体。在好几年时间里他尽力帮助弗拉马里翁的前负责人若斯·若利耶，并为其小说《带狗的孩子》写过序。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德里达从未放弃他。

① 同马若尔的访谈。

② 同鲁迪奈斯库的访谈。

③ *Rue Descartes* n° 45, *op. cit.*, p. 109.

德里达对金钱的高贵态度是一种尊严的体现。

大部分时间里他生活规律，如果不是有些朴素的话。但他身上有一种地中海式的享乐倾向，他尽力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抑制。他有时在旅行中会让它自由释放，特别是当他想给年轻女子留下深刻印象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吝奢靡的花费、大酒店和短暂的奢侈。这一爱好大概源自母亲，她对扑克有着强烈的热情。德里达本人看上去不是个赌客，但他可以愉快地进入赌场，或者在加利福尼亚逗留时溜去拉斯维加斯一趟。在《国家报》的采访中，他不是多少有些奇怪地承认自己性格的主要特点是“某种轻飘感”吗？

德里达同阅读的关系十分特别。玛格丽特讲道，在拉萨茨的一天，她正沉浸在《烟花女荣枯记》里，雅克看了看她在读的书，然后对她说：“你啊，你面前真正有完整的人生！”德里达则难以拥有“无缘无故的”阅读。

相当长时间以来，我越来越难以不带着写作计划去读书，这让我感到仿佛是真的不幸，这选择过、筛选过、被关注和让人关注的阅读。我阅读是间断的，经常是在写作时，将写作植入阅读。但我感到越来越被剥夺了那种如巨流般引人入胜的阅读。这是真正的被剥夺。<sup>①</sup>

在德里达研读的书上，能看到“铅笔的暴烈痕迹，惊叹号，箭头，下划线”<sup>②</sup>。阅读已经是工作，是写作的第一步。

我阅读时头脑里带着计划。我很少不带目的地阅读，因此我的阅读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太有选择，不够被动。……

我读书时很不耐烦，这种选择性的不耐烦很快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可能有许多不公正和疏忽。但经常，翻到一本书的中间时，这种不耐烦把我扔到了我正在找的地方，或者我不知道我在寻找而我找到了。……

我发觉我在就一部文学作品写作时才开始读它，我的初次阅读由断续的微光组成，十分疏漏。……从根本上来说是教学让我阅读。<sup>③</sup>

书写技术一直令他感兴趣。他很乐意提醒大家尼采是第一个拥有打字机的西方

①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51.

②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in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cité avec Daniel Ferrer.

③ *Genesis* n° 17, 2001.

思想家，而对海德格尔，只有手写才是真正的书写。<sup>①</sup> 在很长时间里，对所有重要的文章，德里达都用笔开始写，并数次修改。只有在文章已开始形成，语调和总体方向已勾勒出来时，他才开始用机器。

他使用的打字机先是带国际键盘的小奥利维蒂，后来是电动打字机。所有听过他打字的人都惊讶于他的速度。希利斯·米勒讲道：“一天，在耶鲁，我和哈洛德·布鲁姆去找他共进午餐。但在走廊里听到他敲击打字机键盘的声音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都不敢敲门。他的创造力似乎同打字节奏相关，就像许多美国作家一样。他写作时真的是用手指思考。”<sup>②</sup> 如果说打字很快的话，他的写作时间则很短。15到20分钟后，他起来踱步，或者沉浸在一本书里：“写的东西越吸引我或者越要求我投入，我就越快中止。”<sup>③</sup> 工作同身体的关系至关重要，工作的位置也绝非无关紧要。

527 我有时躺着写，做梦醒来时做笔记。……坐着写时，我将思想、念头、思维活动组织起来，它们总是在我站着的时候，做别的事的时候，走路、开车、跑步的时候到来。总是在跑步的时候（现在我不跑了），最完整的思想来到我的脑海。有时候我去跑步时在口袋里装一张纸好记下来。随后，我坐在桌旁……开始组织、探索那些飘忽的、尖利的，有时如电光石火的东西，它们总是在我跑步时到来。我很快意识到，在我站着的时候这些好东西才能出现。<sup>④</sup>

大概是在同《解放报》的撰稿者帕特里克·莫利耶斯（Patrick Maurières）的一次见面中，他对创作过程进行了最好的回顾：

当我开始写一篇文章时，感到最困难的总是我称为语调的东西。我通常难以忍受呈现在面前的语调。写作的困难总是在于姿态，在于“我将置身何处”这一问题。这不是一件在自我和自我之间决定的事：必须任由接受者找到，语调才能安置好。根本的工作在这里：我将编写出怎样的接受者，要求我用这样的语调，让我满足这样的要求？我被要求什么？谁在要求我什么？<sup>⑤</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La main de Heidegger”, *Psyché, op. cit.*, p. 435.

②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Je n'écris pas sans lumière artificielle”, entretien avec André Rollin, *Le fou parle, op. cit.*

④ *Genesis*, n° 17, 2001.

⑤ Patrick Maurières, “Jacques Derrida, la déconstruction du monde”, *Libération*, 8 août 1985.

德里达说他写的东西通常“比一篇文章长，比一本书短”，感到总是写得过长。他同时就好几样内容写作，“或者不如说就一样内容”，他更正说，“头脑中带着折磨我的好几个计划”。比起应约的写作，德里达更愿意用“机会”（occasion）这个说法。“我简直从没写过文章，如果不是因为外界机会的话；随后，当然，我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纯粹自发的东西，我要写的‘那本’唯一的书，曾经被不确定地推迟、滞后……”

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的谈话中，德里达也强调指出了这种机会的诗学。接受讲话或写作的邀请，这是“一种‘被动的’决定”：

我从未计划过写作。我写的一切，即便是结构性很强的书，都是借着邀约的机会。……为什么写作？我总是感到可以既谦虚又夸张狂妄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感到自己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允许我说：“这就是我自己计划的” 528  
的书，没有任何人要求过。”<sup>①</sup>

因此，邀约的问题——或不如说要求的问题——在他的写作方式中是基本的问题。德里达为自己规定的责任便是不间断地作出答复：针对一个研讨会的题目，其举行地点、邀请者或当时的情形。尽管人们常常指责他，这却远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姿态。这是一种在原地思考哲学的方式，将每一次发言视为特别的情势，不再回头的此地和现在，也是应该试图理解的东西。德里达的一次讲演或一次会议发言首先是一个话语行为（speech act），是奥斯丁意义上的述行句（performatif），他曾同这一理论展开论战，但仍然认为它是20世纪“主要的最为丰硕的理论事件之一”<sup>②</sup>。关键在于描述周遭的环境，以将之更好地转移或解构，还在于分析会谈以什么名义举行，哪怕要长久耽搁于此，冒着似乎永远不谈事实的危险。

同阅读一样，旅行在德里达那里同工作和任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有时甚至感到在追随着父亲的踪迹：“我会像他那样吗，出于偶然，在用一生反抗他的奴役生活之后？难道我的巡回讲演就是一个被侮辱的父亲的翻版，只不过加以戏剧化，更高雅，更升华？”<sup>③</sup> 像新时代的圣保罗，雅克·德里达从事着奇异的职业：思想的旅行推销员。任何哲学家都不会有像他那么多的旅行。不过“移动”一词也许更合适，

①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② Jacques Derrida, *Marx & Sons*, op. cit., p. 27.

③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40.

因为他肯定地说，在自己身上有这样一个人：“从没喜欢过旅行，甚至坚决不旅行，甚至从未旅行过。”<sup>①</sup>

在我的原始法语中，旅行等同于工作、奴役、赶路，甚至还有某种屈辱，社会屈辱的起源。后果和原则：永不将工作与闲暇、慵懒，甚至与积极的旅游、观光、好奇心联系起来。我在旅行时很少“观光”，也不旅游，除非佯装如此，而且在被迫旅游时烦闷欲死。<sup>②</sup>

529 也许是内疚感使他让这画面显得阴暗。卡特琳娜·克莱芒还记得看到德里达在日本时兴奋得“像个快活的孩子”，尽管日程极满。他喜欢成为被注意的对象，打破日常生活的节奏，短暂回归单身的美妙。同激起一切焦虑感的居家度假或家庭度假相反，旅行是德里达治疗抑郁的理想药方。但同许多时候一样，现实极为暧昧：如果说他很高兴离开，他至少也同样高兴回来。

当让-吕克·南希对他接受某个邀请进行长途劳累的旅行表示惊讶时，他总是回答：“这是朋友，我不能拒绝。”友谊是选择的第一标准。德里达喜欢再次见到亲近的人，回到熟悉的地方，再造一种习惯的形式。在纽约和在尔湾一样，他创造出自己的仪式。在巴尔的摩，他习惯性地喜欢回到爱伦·坡的故居和墓地。在布拉格，他从不会不去拜访卡夫卡故居。同其他东西一样，一个地方的价值在于其激起的回忆。最令人留恋之地是充满回忆之地。

意大利之旅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在《侧道》里写道，这是他唯一愿意“永恒回归”的国度。这是极少数这样的国家之一，他“有时没有公开的或学术的‘借口’，只是前去逗留，‘陪伴’情感或精神上的友人”<sup>③</sup>。南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今后难以抵达的阿尔及利亚。德里达热爱那不勒斯、庞贝、卡普里、帕埃斯图姆和西西里。菲拉里斯说，有一天在伦德，德里达说自己很高兴来到卡拉勃瑞，因为在阿尔及利亚常听说卡拉勃瑞的强盗：“晚餐后我们出去散步，雅克对我说从年轻时起他就多么迷恋黑手党的故事。就在这一刻，旁边的房子里飘出了《教父》的音乐……”<sup>④</sup>意大利北部则同他的朋友瓦雷里奥和卡米拉·阿达米联系在一起，他喜欢同玛格丽特一起在他们身边度过几天的假期，早几年在阿罗纳，后来在大湖边的梅

①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83-284.*

② *Ibid., p. 40, 42.*

③ *Ibid., p. 143, 145.*

④ Maurizio Ferraris, *Jackie Derrida, Ritratto a memoria, op. cit., 2006.*



纳。他很高兴参加那里的夏季研讨课。对他这是真正的梦，理想的幸福：“两三天时间在湖上的阳光下，面对意大利学生和艺术家，谈论类似艺术作品的起源这样的题目”<sup>①</sup>。

旅行并不总是简单的。他在五年的时间里因焦虑而无法乘飞机。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但他渐渐喜欢上了坐飞机，特别是他的身份使他得以受邀乘坐商务舱或一等舱以后。这些漫长的旅途成为特别的时机，让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紧张工作，好像悬浮在时间之外。但焦虑感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加散漫：“我每次出发旅行……远离‘家’的时候，都想象我会在回来之前死去，脑海里交织着图像、电影和戏剧影像。”<sup>②</sup>

他也为家人焦虑，就好像他的离去将他们置于险境。他刚到一处就给家里打电话好让自己放心。“我一进入旅馆房间，还没有看看四周（有时候连续几天都不会看），我就急于知道电话，当地的 MCI 或 ATT 代码，好赶快打电话。”<sup>③</sup> 早在耶鲁时代就是如此，当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来肯尼迪机场接他的时候，他刚取到行李就赶忙打电话。“事件”（événement）、“到达”（arrivance）是他钟爱的主题，但他却不断祈祷“什么都别发生，就好像到来的最终都是坏事”<sup>④</sup>。



德里达少有闲暇。他年轻时代最大的激情之一足球没能在离开阿尔及利亚之后继续。他从克雷阿之后再没踢过，看电视比赛也不多。1960年代初，他常常打网球：索莱尔斯印象中关于德里达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在—辆 2CV 的后座上放着一支球拍。1980年代，他进行过慢跑，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养成的习惯，但期待的快乐迟迟不来，他最终放弃了。他从不喜欢步行，以后越来越避免走路。只有游泳仍然让他开心，但他只在海边才游泳。

531

戏剧，从迈克尔·莫诺里拉着他去看戏的时候起就让他感觉烦闷，除了莎士比亚。当然，他关注朋友们的戏，如埃莱娜·西克苏的剧作，丹尼尔·迈斯基什的制作，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参与的戏。但这些更多是出于友情而非出于真正的兴趣。

电影则重要得多。在阿尔及尔的童年和在拉丁区的学生时代，他看过许多电影。

①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56-57.*

② *Ibid., p. 15.*

③ 转引自 Catherine Malabou, “Prières”, in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105.

④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3.*

在里斯-奥朗吉斯要麻烦些。德里达因此主要在美国时去看电影。与写了两部关于电影的重要著作的德勒兹相反，德里达绝非影迷。他在电影院里寻找的首先是超越禁忌和忘记工作。在《电影手册》上发表的一篇优美的采访中，他强调这“不留痕迹的文化”的一面：

这是一种始终是大众的艺术，甚至是唯一伟大的大众艺术。……真的必须使之如此。……在纽约或加利福尼亚时我看了无数美国电影，碰上什么看什么，或者看人们谈论的电影，因为我很大众。那时我有这样的自由和可能性，重新找到同电影的通俗关系，这对我是必需的。……这是我青年时代得到的馈赠，我对电影有无限的感激之情，因为它让我时常离开教学的位置。电影对我始终是一种巨大的享受，隐藏的，秘密的，贪婪的，饕餮的，因而也是孩子气的。<sup>①</sup>

532 他对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只是一般的欣赏，觉得他过于欧洲化。他最喜欢的是黑手党电影和在他看来纯粹的美国电影。他不知疲倦地观看“教父”三部曲，塞尔吉奥·莱奥内 (Sergio Leone) 的《美国往事》和希米诺 (Cimino) 的《天堂之门》。“我喜爱电影中的智慧，不是知识或智力上的智慧，而是编导的智慧。”<sup>②</sup> 他也喜欢亚历山大·阿卡迪 (Alexandre Arcady) 的《赎罪》，是关于一个卡伊德犹太移民的家族故事。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爱好：一天有人问他，戈达尔 (Godard) 的电影对他的工作或思想是否产生过影响，德里达以一种自称粗鲁的真诚回答说“没有丝毫影响”<sup>③</sup>。这并不妨碍他愉快地参演了坎·麦克马伦的先锋片《鬼舞》，当然他扮演的是自己，并且在帕斯卡·欧吉尔身边。

在《国家报》的采访中，他自称梦想拥有“音乐天才”，但他对音乐甚少兴趣，除了儿时的阿拉伯安达卢西亚音乐之外。他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喜欢爵士乐，有时利用在纽约的时间去听音乐会。他在宝洛·泰弗南家里见过几次皮埃尔·布列兹，但对当代音乐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通过曾经是哲学家的音乐家鲁道夫·布尔日，特别是儿子皮埃尔，德里达很欣赏斯特拉斯堡乐队卡特·奥诺玛 (Kat Onoma)，并去

---

<sup>①</sup> Antoine de Baecque, *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 Petite bibliothèque des Cahiers du cinéma, 2008, p. 71.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再次引用了在《电影手册》1999年4月第534期刊登的采访，题为《电影及其幻影》。

<sup>②</sup> Antoine de Baecque, *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 Petite bibliothèque des Cahiers du cinéma, 2008, p. 72.

<sup>③</sup> Carole Desbarats et Jean-Paul Gorce, *L'Effet Godard*, Milan, 1989, p. 110.

听过几次。

虽说从年轻时起就喜欢去博物馆，但德里达在不曾研究过的领域里对自己的审美品位感到不大自信。他并非矫情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当人们就视觉艺术向他提问时，他坚持说：“我从未主动谈论过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东西。每次这么做都因为受到邀请。”<sup>①</sup>

※ ※ ※

答复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与朋友联系的动力。直到 1980 年代初，德里达一直保持着超人的通信量，写下了长长的丰富的信件，可视为除书籍和研讨课之外其著述的第三方面。

德里达确乎拥有各个时代的朋友，他以十分慷慨和个性化的方式努力与其保持联系。如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讲，“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注意力，对一切人和事都不可思议地敞开。就像他必须充分地经历其思想”<sup>②</sup>。但是，随着走遍全世界的旅行、课程和讲演，德里达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超大的越来越难以应付的社会网络。从 1980 年代中开始，他无力应对来自各处的请求。信件来自世界各地：过去和现在认识的人，同事、学生、编者、译者、记者。人们请他做讲座，参加研讨会，写文章，写推荐信，写请愿书……但他既无助手又无秘书，他无法再应对。信件变得更加事务性，他的抱怨成了常事，让身边的一些朋友恼火。在 1960 年代与他接近的玛丽-克莱尔·布斯继续给他写长信吐露心声，但并不隐瞒她的不满：“你显得无法接近。你不给我写信，不答复我。我永远不知道你对我的信到底是什么反应，以及你自己的难处，你的努力，你的希望，这让我厌倦。”<sup>③</sup> 德里达的回复常常很简短，而且相对于他激起的期待而言令人失望。

533

1988 年，在一封给老友皮埃尔·富歇的信中，他承认“严重的写信恐惧症，一种真正的肉体与灵魂的病症”使他越来越难以回复日益堆积的信件，特别是在旅行中。<sup>④</sup> 对朋友，他今后更愿意打电话。他曾经以如此优美的文章回应赠书，如今却不再有勇气这么做。尽管如此，他总是答应自己尊重的友人或同事请他写推荐信的请求。在他的信件中有十几封推荐信，每一封都完美而且有效。他的许多友人的职业

① “The Spatial Arts :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entretien réalisé par Peter Brunette et David Wills, i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同斯蒂格勒的访谈。

③ 布斯致德里达的信，1982 年 8 月 30 日。

④ 德里达致皮埃尔·富歇的信，1988 年 2 月 5 日。

生涯部分要归功于他的慷慨。

534 在友情上，德里达是个完人。无论是德·曼、阿尔都塞还是南希这样的名人，抑或是无名之士，德里达对他爱的人绝对忠诚。但他要求很多回报，有时过多。如斯蒂格勒所说，这是“他友好慷慨的消极一面”。他因之而恐慌，担心最亲近的人有一天会被怀疑不忠，或更糟的，背叛。米歇尔·德基说：“雅克有无穷的疑虑。他只能忍受毫不犹豫接受他才华的人。”在公共场合出现冲突时，他要求朋友与自己完全一致。在德·曼事件当中，他因此疏远了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因为她未像他希望的那样采取足够清晰的立场。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他在尼古拉·阿伯拉罕死后不久不再与玛丽亚·托洛克见面。好些朋友暗自担心这突然决裂的噩梦，害怕被归到“敌人”、“反对他”的人一边。

这强硬态度的反面是倾向于喜欢恭维。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承认不止一次为这种“小圈子”的效果感到恼火。“我很恼怒，德里达对某些人如此关照，而他们值得一提的几乎只有对他的忠实。但他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被爱，更甚于被理解。”<sup>①</sup>德里达有时会为他所引起的模仿感到不快，但他在许多方面接受并鼓励这种模仿。“我相信他真诚地确信大部分奉承者都是高水准的人，”阿维塔尔·若奈尔判断道，“他大概在弟子们那里发现了具有镇静效果的镜子。问题在于，许多人因为被反复告知自己是何等出色而开始相信这一点，变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sup>②</sup>也许他不愿看到他们的平庸，也许他对他们可能提供的帮助并非无动于衷。

※ ※ ※

535 长久以来，他在公开言论中并不提及阿尔及利亚和犹太性。随着时光流逝，德里达越来越认可自己的出身，并在他的文字和思想中给予其一席之地。但就像对许多事那样，这里也始终存在一种暧昧感。大多数时间，他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抹去并控制住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北非口音。但听录音时，他从自己的口语里还是听得出某些特点：“我相信并不强烈，并不太明显，但还是比较容易听出来。表现在‘e’的闭口音，某种叙述方式，某种语速，嘴巴有点闭……我不太满意这口音。”<sup>③</sup>他激动或愤怒的时候会流露出阿尔及尔口音，这让他不快：“我的声音，一边

① 同迪特曼的访谈。

②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③ “Le bon plaisir de Jacques Derrida”, émission de Didier Cahen, France Culture, mars 1986. 引自 IMEC 记录。

是权威性的，一边是原来的口音，混在一起让我难以忍受，更何况控制它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失败。”<sup>①</sup>

德里达同自己家庭的关系极为暧昧。在那里重新成为杰基的他面对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抵抗。他有时感到恼火，几乎是羞耻，失望于他们不试着读书，真正的谈话内容是如此稀少，但又对他们极为眷恋。但当他发现母亲“几乎什么都没有保留，最多只有几封”他“在30年间，每周两次”<sup>②</sup>写给她的明信片或信件时，他深受伤害。但他仍然在每年父亲的忌日回去，仿佛为了使家族重聚。每年夏天，玛格丽特和他都在尼斯附近过上几周，整天同家人待在同一小片海滩上，就像从前在阿尔及尔。他的表妹米什琳·莱维说他坚持待在家里人中间，讨厌有人哪怕稍稍离开。他想把家人留在身边，虽说他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沉浸于阅读。<sup>③</sup>

无论在拉萨茨或蓝色海岸，假期都极为仪式化，德里达的主要要求就是能够紧张地工作。他们在维勒弗朗士时先住在凡尔赛旅馆，但雅克觉得那里太喧闹，很快搬到了拉弗劳尔，也在村子的高处。<sup>④</sup>他常对兄长和妹妹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和平时一样，他六点起床，喝杯咖啡后投入工作。下午，他长时间游泳。哥哥勒内回忆道：“他总是说‘我在重新生活’。”爱美的德里达很高兴晒黑一些，让退隐在日常生活里的生命活跃起来。他享受着在巴黎缺少的阳光和大海，这同他对加利福尼亚的热爱不无关系。远离社交圈的时候，德里达也喜欢与朋友们重聚，回到他喜爱的地方，如马蒂斯美术馆和玛格基金会。每年他都去埃兹（Èze）完成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寄一张明信片给在那里长期生活过的布朗肖。

536

※ ※ ※

德里达从未摆脱过家庭传承下来的一些古老元素。母亲酷爱扑克，她为了不打破运气有很多礼仪。据佩吉·卡穆夫说，德里达尽管自嘲，却始终十分迷信。他为了不触犯某些规则而制造出小小的秘密仪式，进行各种各样磨人的计算。他母亲讨厌绿色，对他来说这种颜色也总是同不幸相连。他小心避开所有带绿色的衣服，也不喜欢玛格丽特穿着绿色。这种迷信能够变成纠缠不休的念头并染上严肃的调子。罗伯特·哈威证实说，有一天在纽约，德里达推迟了一次讲演，就是为了避免坐在一张绿椅子上。而他的恐惧症绝非只有这一种：

① 雅克·德里达，个人笔记，1976年12月30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档案。

②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52.

③ 同米什琳·莱维的访谈。

④ 同雅尼娜和皮埃罗·迈斯凯尔，勒内和艾弗林·德里达的访谈。

至于家族迷信，我到今天仍然尊重：离开时，越过门槛后绝不再退回来。这弄出过我不敢描述的场景。特别是，出远门前，母亲或姊妹或妻子早已在门脚处冲着你泼了水，一旦出去，你只能转身说再见。只有如此才能活着回来。<sup>①</sup>

这并不只是简单的传统。这些信仰直接与他的焦虑有关。一天，玛格丽特回来取忘在房子里的东西，德里达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想让我一整天担心吗？”但如果说他有时对这一传承有种模糊的负罪感的话，他也试图使之成为真正的思考对象，幽灵性（spectralité）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不管怎样，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很着迷，特别是在他同费勒齐的关系中。在题为《心灵感应》的文章里，德里达怀着好奇与同情研究了那个有时受人嘲笑的兴趣。<sup>②</sup>

※ ※ ※

德里达，“过度”的人，至少也是同样“缺乏”的人。他的孤独巨大而深沉。阿维塔尔·若奈尔记得他能够完全处于失神状态，特别是有时在进餐时：“他身上有着可怕的栅栏。他并不真的寻求建立联系，让别人能与他真实地对抗。当我发起某种侵入性的行为时，他会接受，但他本人从不把事情置于这个领地。”<sup>③</sup>这位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对朋友和身边人关怀备至的人，却终其一生精心建构和保护私密性。从很早开始，哪怕在他的抑郁期之外，他总是有些脆弱和秘密的东西，非文字不能言说。这是一些重要的和不可能东西，同他心目中的哲学不可分割：艰难而危险的行程，与轻而易举的对话大相径庭。一天他承认：

哲学家是这样的人，具有绝对疯狂的欲望与野心；最了不起的政治家的权力欲在哲学家的欲望旁边是绝对渺小而幼稚的，哲学家在一部哲学作品中既表现出控制欲，同时又放弃对一种度量或广度的控制，我认为这种度量和广度比在别处都更无限强大。对于我，哲学，如果我对之有兴味的话，那是因为这种过度；这种相对于其他话语，有时甚至相对于所有艺术规则的出乎寻常的过度。<sup>④</sup>

①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63.*

② “Télépathie” initialement paru dans la revue *Furor* en 1981, a été repris dans *Psyché, op. cit.*

③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④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149.*

## 第 27 章 在体制的边界 (1991—1992)

1991年初，瑟耶出版社的“当代人”丛书里出版了杰弗雷·贝宁顿与德里达合著的《雅克·德里达》一书。它在很长时间里将是对德里达作品的最佳介绍。德里达对此书的贡献并不限于《割礼忏悔录》。他也是《体裁的法则》这一部分的主要作者，该章节将提供很久以来最完整的编年史，伴有许多个人照片。贝宁顿解释道：“虽然那些传记部分的署名作者是我，但其实他撰写了关键内容。德尼·罗什坚持要有事实的成分，但德里达和我都不愿囊括类似于传统传记的东西。省略什么由他决定，我从他愿意提供给我的材料出发写作。”<sup>①</sup>关于家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披露了许多隐情，包括在勒芒时“严重的抑郁期”，但从发表作品开始，编年就变成纯粹的事实记录了：“我只记录了公开的‘事实与行动’，也就是过度曝光的或‘客观的’——像人们所说的——‘可证实的’部分。这些并不总是最有意义、最有趣或最具决定性的。”这些关乎生平的大部分标志性事件都是“由德里达提供的，有些断续，出于偶然，带着不均衡的热情”<sup>②</sup>，贝宁顿说。

刚一出版，此书就为德里达带来了好几位年轻时代友人的动情的来信。让·贝勒曼-诺埃尔仍然“逆着官方的‘雅克’”称他为杰基，说在“感动的泪水中”读了他的文字。《割礼忏悔录》让他回忆起杰基在他生活中“某种存在的形式”，它依然“保存无恙，仿佛在时间之外”。“我确实对这些十分感动、惊奇：被侵犯，但是来自

① 同贝宁顿的访谈。

② “Actes (La loi du genre)”,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96-297.

上面；被迫抬起眼睛，为了面对。”<sup>①</sup> 其他年轻时的伙伴，如罗贝尔·阿比拉舍德和皮埃尔·富歇，都有同感。

报刊的态度十分肯定，也强调了德里达的贡献。在《新观察家》上，迪迪埃·埃里邦赞扬了《割礼忏悔录》。“用这篇电光石火般的文字，交杂着不可能的自传和成长小说，哲学家（作家？）给了我们他最精彩的成功之作。”<sup>②</sup> 马克·拉贡（Marc Ragon）在《解放报》，克洛德·亚努在《费加罗报》也表示了赞誉。很晚才在《世界报》上作出反应的罗日-波尔·德鲁瓦则显得困惑：《割礼忏悔录》在他看来“颇为奇特，混合着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厚颜和狡黠，但也有粗犷冒险的单纯”。“此书适于所有读者，也可能会激起不快，其中大概永远难以分辨矫饰和真诚，激愤与情感。”<sup>③</sup>

《割礼忏悔录》是德里达最独特、最易于接近的作品之一，其内容直接与此书构思的框架相关。德里达的文字同贝宁顿的严密分析相互对话，以更好地将之解构，并为之难分难解。此文被局限于版面下部三分之一处，底子是相当阴郁的灰色，像是个超长的脚注，初看并不引人，然而完全值得独立成书。它远远没有《丧钟》的排版奇技，也远非德里达在好几年间梦想的关于割礼的大书。当然，这本书就是这么构思的。尽管如此——这篇内置的文章在此遇到了局限，使许多潜在的读者远离，但是对此文极为重视的埃莱娜·西克苏常常同学生一起讨论它，并建议他们使用去掉灰色底色的放大的复印版。在《作为年轻犹太圣徒的德里达画像》中，她将《割礼忏悔录》的几页放大复制，把一些字母和词加上彩色，突出了德里达的文本之美。德里达为女性出版社录制的有声版本也表现出了这种美感。<sup>④</sup>

※ ※ ※

与瑟耶出版的《雅克·德里达》同时，另一本体裁完全不同的小书在子夜出版社问世：《另一个海岬》（*L'autre cap*）。这是前一年在图灵由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主持的“欧洲文化认同”研讨会上发表的讲演。在这次重要的政治讲演

① 诺埃尔致德里达的信，1991年3月1日。

② 载《新观察家》，1991年3月14日。

③ 载《世界报》，1991年7月12日。

④ 《割礼忏悔录》引来了好几部几乎是犹太法典式的作品：Hélène Cixous, *Portrait de Derrida en jeune saint juif*, Galilée, 2001; Bruno Clément, *L'Invention du commentaire, Augustin, Jacques Derrida*, PUF, coll. "Écriture", 2000; et le collectif *Des Confessions. Jacques Derrida, saint Augustin*,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université de Villanova en septembre 2001, dont la version française est parue chez Stock, coll. "L'autre pensée", 2007.



中，德里达特别阐发了这样的思想，即文化的特质就是与其自身不同一：“不是没有同一，而是不能与自身认同，不能说‘我’或‘我们’，只有在与自身的非同一起，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在与自身的差异中才能获得主体的形式。”<sup>①</sup>就在民族主义常常以血腥的方式觉醒之时，例如在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德里达对欧洲的边界进行了思索。欧洲一直想要给予自己的定义，例如在胡塞尔和保罗·瓦雷里那里，难道不首先是否定的，以排他性为基础的吗？对于这样的欧洲，德里达远远不能完全认同。

我是欧洲人，我大概算是欧洲知识人，我喜欢记得这一点，喜欢提醒自己记得这一点，为什么要禁止自己这么说呢？以什么名义？但我不是，也不感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由此我想说，我坚持说，或者我应该说：我不愿也不应该成为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彻底的”归属和“彻头彻尾”本该是不可调和的。我的文化认同，我以之为名在讲话，它并不仅仅是欧洲的，它并不与自身同一，我也并非彻头彻尾“文化的”。<sup>②</sup>

1991年初，至少在法国，德里达作品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3月，《文学杂志》专门组稿对他大幅评介，并不无尴尬地这样说：“独一无二的雅克·德里达变得大名鼎鼎。他的名字传遍五大洲。他令人着迷又令人不安。德里达是个谜一般的名字。是解开这个谜的时候了。”<sup>③</sup>这期杂志有一篇同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长篇访谈，还有许多文章与研究，但主要的新颖之处大概是卡洛斯·弗莱尔(Carlos Freire)的摄影报道。德里达在瑟耶出版的书籍发表个人照片时就开始了这种做法。这位巴西摄影师拍下了他在家，在办公室，在他的阁楼里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收藏的烟斗，他的小雪铁龙；我们看到他在拉斯帕耶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就在去高等研究学校的阶梯教室上研讨课之前，随后在吕特提亚酒店的沙龙里。尽管同摄影师十分友好，德里达对影像的态度更多的却是认可而不是投入：“他摆出头略微缩进肩膀的姿势，像个拳击手”<sup>④</sup>，卡洛斯·弗莱尔回忆道。

542

这一态度的转变让一些人恼火，他们见过德里达在整个1960和1970年代拒绝公开照片，例如贝尔纳·波特拉：“我曾很欣赏他的‘反媒体’态度。他不接受采访，

① Jacques Derrida, *L'autre cap*, Éditions de Minuit, 1991, p. 16.

② *Ibid.*, p. 80.

③ 载《文学杂志》，1991，286，16页。

④ 同弗莱尔的访谈。本传记重新刊登了其中四幅照片。

不让人给自己拍照。我看到他和贝宁顿合作的书，还有关于他的《文学杂志》第一期的，十分震惊。里面到处是照片，包括私人的或完全无关宏旨的照片。我承认我感到失望。”<sup>①</sup>

※ ※ ※

543 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德里达作为教育者的轨迹便是创造出了适合自己的听众，为他而来的听众，对他们他能够说出自己希望说的话，不必顾及所有课程安排或考试限制。在索邦大学，他已经比在勒芒的高中时要自由些。在高等研究学校则比在高师自由得多。随着岁月流逝，他越来越任由自己充分享受这尊崇的地位，不去寻找任何借口。

德里达的研讨课在周三17点到19点，他在于姆街时就是这个时间。他带着一个装满了书和文件的旧书包，仔细地把要用的纸张和书籍摆在面前。他实际上仍然把讲演从头至尾写下来，然后在阶梯教室里即兴一般“说出来”。

他有本事能立即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其方式有时让人想到拉康：

这一次将是关于爱的简短论述，像往常一样，像我所有的研讨课一样，像它们本来应该的那样。请别认为我宣布对你们谈论爱是为了哗众取宠。我马上会使用的谈话方式恐怕会把前来聆听夜谈的人吓跑，而不是留住他们。<sup>②</sup>

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的一个困难，即他必须面对的听众中可能大多数是他的忠实者，但同时还要让第一次来的人有所把握。因为一切“序”都是“跋”，每次新课都接续着上一堂课：

同每年一样，我必须做不可能的事：重新开始，继续开始，重复已说过的，重复新的开端。重拾中断的一堂课的线索，而这总是过早，以便接续下去，沿着余下的继续，而这总是过多，接续余下的之余。但就在我重新开始之时，我必须为你们中间去年及前些年不在场的人开始，因为事实上这是同样的研讨课，它从至少六年前开始缓慢而持续地演变。题目的改变（《国籍与哲学的民族主义》，《康德：犹太人，德国人》，《友爱政治学》，《爱—吃—他者》，等等）不过

① 同贝尔纳·波特拉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Aimer-manger-l'autre”, séminaire inédit, séance du 7 novembre 1990, archives Irvine.

是同一关注的换喻而已，是问题的同样焦点，事情在那里尚未完成。<sup>①</sup>

头几次去听德里达课的时候还不到20岁的伊夫·沙尔奈 (Yves Charnet) 出色地描绘了他的惊羨之情：

这个声音柔和地开始——对每一个狂热的被俘获的听众——施加着令人沉迷的魔力，这对我来说始终是这位思想巫师的有声签名。雅克·德里达不停地转动，在每次两个小时难忘的授课中围绕着他的思想转动。不错，使得思想转动。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全世界国际化的年轻人组成了这激情四溢令人印象深刻的听众。……我想强调他个人的美感，他特有的光芒……让这话语更加令人晕眩，其诗意的能量穿透了我们。……这种将教学空间集于一身的方式，这投入教学行为的身体，让学生们从生理上感受到话语的激情。<sup>②</sup>

年复一年，德里达的讲课超越了所有的大学授课法。他甚至经常辗转面对哲学传统，允许自己常常走题。在1991—1992年的“承担秘密”的研讨课上，他花了很长时间讲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托比》，但也提到了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的《地毯上的图案》，米歇尔·福柯的《雷蒙·鲁塞尔》，安妮·勒克莱尔 (Annie Leclerc) 的《钥匙》，奥维德 (Ovide) 的《变形记》，《约伯记》，还有圣马蒂厄 (saint Matthieu) 的福音书。别忘了还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帕托卡。随后的两年主题是“见证”，德里达穿越的作品有普鲁斯特、策兰、布朗肖和利奥塔，还出人意料地跳到雨果、海明威、安托尼奥尼 (Antonioni) 的《春光乍泻》(Blow up)、克洛德·朗兹曼 (Claude Lanzmann) 的《浩劫》，以及在洛杉矶对罗德尼·金 (Rodney King) 的审判。

研讨课是他的实验室，是他准备和测试自己新思想的时刻。他在那里检验将在书中或大型讲演中阐发的路径。但这也是专享的时刻，话语自由、快乐、庄严。弗朗索瓦丝·达斯图尔说得好：“在1987到1994年我追随他研讨课的几年间，我见证了一些罕见的东西：正在形成的思想，可以说没有任何保护地正在形成中。”<sup>③</sup> 阿维塔尔·若奈尔也证实了这些时刻对她的重要性：“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研讨课仍然

① Jacques Derrida, “Aimer-manger-l'autre”, séminaire inédit, séance du 7 novembre 1990, archives Irvine.

② Yves Charnet, “Un jour pour parler”, hommage à Derrida prononcé en 2004 et publié sur le site [http://remue.net/cont/derrida\\_charnet.html](http://remue.net/cont/derrida_charnet.html).

③ 同达斯图尔的访谈。

是一种安宁的形式。所有的义务都悬置起来。在两三个小时里，他拥有话语并随心使用。他从不停下来喝水，并对此抱以孩子般的骄傲。但他难以忍受有人只参加第一堂课，或者只在第二堂开始时到达。”<sup>①</sup>

※ ※ ※

德里达在高等研究学校感觉很好，但他仍然梦想着法国最具盛名的机构：法兰西学院。柏格森、瓦雷里、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巴尔特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在那里执教。这是“神圣异端分子”之地，正如从1982年起在那里执教的布尔迪厄有一天所说的。尽管同德里达的关系起伏不定，布尔迪厄还是希望他能入选法兰西学院。但当他在1990年春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这一想法时，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为寻找同盟，布尔迪厄转向了担任诗歌教授的伊夫·博纳弗瓦（Yves Bonnefoy）。

博纳弗瓦和德里达至少从1968年起就认识：两人都定期在美国执教；两人都曾是保罗·德·曼的友人，他们都认为德·曼在法国籍籍无名是个耻辱。经过思考，博纳弗瓦认为成功的机会很现实：

您在这里有几个对手，但并不多，一切都在我们的研究者那里决定。布尔迪厄本人也激起过不信任，他知道，但比他认为的要少。因此我抱很大希望，并对我们的朋友说如果他认为可以期待的话，我准备推荐您。这可以让我们的  
一些同事安心。<sup>②</sup>

546 德里达对他的支持十分感动。他担心自己的申请会让博纳弗瓦遭遇许多困难，但很高兴这一计划在他看来并非毫无希望。1990年秋，初步的磋商谨慎进行。博纳弗瓦向安德烈·米盖尔（André Miquel）靠拢，后者显然最适合对支持和反对的票数作出估计。如果估计是有利的，德里达便可开始准备正式材料。博纳弗瓦证实他准备“投入（并怀着幸福）地”努力支持他的申请，这将需要相当曲折的策略：

不是从简单的学术质量的角度来介绍您，我认为更有用的方法是立即把自己置于一个大的选择方案中，这会让我的一些同事感到不安：展示出您是他们

---

①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② 博纳弗瓦致德里达的信，1990年7月14日。

的对手，他们需要您，好让他们的思想在对话的情景下走得更远，这种情景应该是学院最为内在的使命。<sup>①</sup>

1991年1月，布尔迪厄和博纳弗瓦感到形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德里达需要在夏天准备好“职务和成果手册”，以备在11月时呈交申请。<sup>②</sup>这一“美好”计划可惜没能实现。布尔迪厄感到了困难，于是向同事们建议让德里达和布弗莱斯同时进入学院：将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当代哲学思潮纳入法兰西学院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从前不是有过米歇尔·福柯和于勒·维耶曼（Jules Vuillemin）吗？他的运气不好：雅克·布弗莱斯的申请相当容易地递交了，而随后德里达的申请则遭到强烈反对，以至不可能正式提交。据迪迪埃·埃里邦的说法，“布尔迪厄为此颇感苦涩。他甚至对此失败感到愤怒（‘我真像个傻瓜一样被人耍了’，当时他对我反复这么说）。而且他感到懊恼，很难过没能成功地让德里达当选”<sup>③</sup>。

还用说吗？德里达更为懊丧：他很生气布尔迪厄把他引入这一困境，让他恼怒地回想起南泰尔的情景。这一次，他确定无疑：他对法国的体制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547

※ ※ ※

如果说这次的失败尚不为人知的话，不久之后的另一件事将使舆论大哗。1992年3月，德里达将接受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掀起了一场抗议。自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85年被其对手牛津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以来，英国从未有过如此耸人听闻的大学之战。论战很快在各大报刊展开。

1992年5月9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题为《一个荣誉问题》。署名者是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名哲学家，包括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德里达永远的敌人露斯·马库斯在这场运动中当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签名者当中还有著名的数学家勒内·托姆。这封信不禁让人想起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信中说德里达的“虚无主义”作品代表着可怕的危险，其主要的后果是“否定和摧毁了奠定所有大学学科基础的证明与论辩水平”：

在我们看来，德里达先生将类似达达主义和具象诗歌的奇计淫巧搬演于学术界，似乎成功地建立起某种职业生涯。从这个角度看，他无疑表现出可观的

① 博纳弗瓦致德里达的信，1990年12月12日。

② 博纳弗瓦致德里达的信，1991年1月19日。

③ <http://didiereribon.blogspot.com/>。

独特性。但这种名声却绝不足以使他成为令人信服的荣誉博士候选人。<sup>①</sup>

随后的几周，论战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传播开来。为了抨击德里达的风格和思想，人们发明了一种纯粹捕风捉影的说法，叫做“逻辑阳具/谎言”（logical phallusies）。英国文学史教授霍华德·埃斯金-希尔（Howard Erskine-Hill）是《丧钟》作者最无情的讨伐者。照他的说法，德里达的方式与高等教育及知识的概念本身完全无法调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相当于任命一名纵火狂为消防队长”<sup>②</sup>。一名大学教师萨拉·里奇蒙（Sarah Richmond）则在德国《明镜》周刊上宣称德里达的思想构成了“年轻人的毒药”，无意中重拾了25个世纪前反对苏格拉底的论据。《观察家》则把德里达的作品描述成一种“电脑病毒”。似乎一切都可用来攻击这位法国哲学家：在一些文章里，人们甚至指出他曾因为“贩毒”在布拉格被捕，却并不说明那是预谋的陷害。

5月16日，剑桥大学的教师们应邀投票支持或反对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赞成”或“不赞成”。这是30年来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投票。反对者们被迫屈服：支持者以336票对204票获胜。1992年6月12日，在国王学院参议院庄严的哥特式背景中，德里达身披长袍，从名誉校长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手中接过了荣誉学位。由于这一年的英国王室正经历着严重的动荡，女王的丈夫私下对他说了一句：“我本人，在家里，一段时间以来正在尝试解构。”<sup>③</sup>

10月，《剑桥评论》为此事刊发了完整的背景资料，并附了一篇对德里达的长篇采访。后者解释说他在事件结束前将有意避免在报刊上发表意见。但他在接受别处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不会忘记提起这场发生在剑桥的“严肃而滑稽的战争”。“这样的事件……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荣誉学位有时并非纯粹传统的仪式。”<sup>④</sup>

※ ※ ※

难道是为了回应海峡那边的论战，或是为了试图使人忘却法国的大学对他极少认可？1992年7月14日，德里达在杰克·朗部长的提议下被任命为荣誉勋章骑士。当时的索邦大学校长、一位密友米歇尔·让德洛-玛萨-鲁（Michèle Gendreau-Massa-Loux）向他颁发了勋章。德里达这一天的讲话未曾发表过，它远非纯

① 载《泰晤士报》，1992年5月9日。

② Cité par Marc Roche dans *Le Point*, n° 1029, 6 juin 1992.

③ 同阿兰·蒙特菲奥尔、卡特琳娜·欧达尔和杰弗雷·贝宁顿的访谈。

④ 《运气与好客性》，1995年10月28日在安大略女王大学发表的讲演，IMEC档案。

礼节性的。

请原谅我，如果我还在自问：我配得上它吗？……

我有时会对一种狡猾的传统给予几分信任，这种传统坚持作出这样的暗示，即拒绝荣誉勋章是不够的。还需要配不上它，人们说。也就是别去考虑体制所特有的讽刺性。

我想我得花上一生的时间同体制的这种讽刺性法则和诡计打交道，特别在我所谓的学术生命中，幸好它不是我全部的生命。<sup>①</sup>

哲学家继续他的思考，关于国家、荣誉，以及自己同体制特别是大学体制的关系。他用环境所能许可的最大真诚描述了自己的两难境地。

无论写作还是思想，教学还是研究，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我丝毫不曾反对体制，但我一直热爱反体制 (contre-institution)，无论它是国家的或恰恰是非国家或反国家的。我也相信，要向体制开战只能以体制的名义，就好像是向其致敬，而且要通过背叛对它的爱，这里用的是“背叛”这个词全部的意义<sup>②</sup>。……讽刺的是，最典型的体制，即国家，安心地认定没有绝对的外界能够反对它，于是总是最终认可那些反体制，而就在此时，这些被选举、被选择或被证实的反体制重新变成了秩序与勋章。<sup>③</sup>

瑟里斯是他钟爱的这些平行的体制之一。1992年7月11到21日，第二次十天研讨会围绕着他展开，题目为“穿越边界”。两年前，德里达接受了此次会议的原则，并希望以“更新”作为其标志： 550

当然，1992年的十天会议将对所有参加过1980年会议，并希望回来参加讨论和回顾前次会议的人开放。在许多方面这将是件好事。但是难道不该规定其余一切都应该是新的吗？我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者和主要的主持人，以及普遍的或不那么普遍的主题，还有开幕讲演的负责人，等等。我肯定能够（因此我觉得，应该）邀请法国和国外的新的参加者，许多年轻人，就不同的领域或其他

① 1992年7月接受荣誉勋章演说，IMEC档案。

② 包括流露、表达等义。——译注

③ 1992年7月接受荣誉勋章演说，IMEC档案。

主题进行讨论。<sup>①</sup>

最初，会议计划交给一个集体来筹备，包括勒内·马若尔、夏尔·阿吕尼（Charles Alluni）和卡特琳娜·帕奥莱蒂（Catherine Paoletti）。但实际上，研讨会繁重的筹备工作由玛丽-路易丝·马莱承担，她“和蔼的高效率”<sup>②</sup>产生了奇迹。会议议程极为丰富：上午为三场同时举行的研讨会——哲学、文学、政治——往往让人难于选择，下午是两场讲座，晚上也多用于讨论。这样的强度后来看有些太大，但120名参加者将对友好欢乐的气氛留下记忆。被接纳便是特权：城堡里挤满了人，许多申请人未能登记。四处受邀的德里达表现出超强的聆听和反应能力。杰弗雷·贝宁顿回忆道：“他对每次发言都给予真正的关注，随后能够找出好的线索，使不一定有趣的东西变得有趣。他有本事对平庸的问题或简单化的反对意见给出慷慨且具有创意的答复。”<sup>③</sup>

德里达在7月15日62岁生日那天发表了题为《绝境》（*Apories*）的讲演。许多  
551 年以来一直经历的，并且“最近更加迫近的”，“这个古老的词”<sup>④</sup>降临于他。绝境是一种“思想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方式：德里达拒绝一切二元逻辑，越来越将矛盾置于他所思考的对象中心。他不断回归这一原则，穿越了许多主题，如宽恕、好客性或自身免疫。但1992年的讲演首先是关于终极界限的，绝境之绝境：死亡。“我的死亡是可能的吗？”德里达自问，同时考问狄德罗、塞内克（Sénèque），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文本，但也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如菲利普·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和路易-文森·托马（Louis-Vincent Thomas）。

对德里达和大部分瑟里斯来客，这十天等于“不可思议的成功”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节日”。这使得回归日常生活更加困难，正如他给卡特琳娜·玛拉布所写：“没有什么（比这次会议）更好的事能够发生在我身上，但正因此而带有一种爱与死的味道，还有，从未有过的强烈，那见证了我所有欢乐与享受的幽灵性。”<sup>⑤</sup>回来后他便感到了其反作用力；他立即重新投入工作，但既非喜爱亦非被迫，只是为了信守承诺……

① 德里达致埃迪斯·埃尔贡的信，1990年8月5日。

② 德里达致埃尔贡的信，1992年3月20日。

③ 同贝宁顿的访谈。

④ 该文首先刊登于大部头论文集 *Passage des frontières*, Galilée, 1994, 随后单独成书: Jacques Derrida, *Apories*, Galilée, 1996, p. 32。

⑤ 德里达致玛拉布的信，1992年7月27日。



## 第 28 章 解构在美洲

如果说解构的风潮也许是在 1980 年代中期，即德·曼事件前夕，达到顶峰的话，德里达本人及其作品在美国激起的兴趣在 1990 年代初仍然超乎寻常。西海岸和东海岸都对他热情有加；然而加州北部的著名大学，如斯坦福，特别是伯克利——约翰·塞尔的领地——大多对他仍然抱有敌意。 552

1991 年 7 月，米切尔·斯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同德里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天，随后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长篇报道。文章毫无新意地题为《解构雅克·德里达》，试图寻求进入他的作品。斯蒂芬斯激动地在尔湾分校校园的露天快餐厅见到了“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哲学家”，并看到他为自己“深奥的理论”辩护。这位记者解释说，德里达的思想在最多样的领域里找到了反响，而且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到影响。“像从前的存在主义一样，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负责人会说正在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部分进行必要的‘解构’，或者米克·贾格（Mick Jagger）会问：‘有人真正知道解构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吗？’无论如何，德里达理论的影响力在校园里最为明显。”<sup>①</sup>

晚上，在新港海滩的海明威餐厅，德里达任由自己对记者倾吐心声。这位复杂性的先驱，不满足于简单对立的学者对米切尔·斯蒂芬斯说，他有时梦想写一本单纯直接的书，一本“简单”的书。它也许是小说，但更确定地说是自传性叙事。德里达勾勒出了成为后来的《他者的单语主义》一书的轮廓，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553

---

<sup>①</sup> Mitchell Stephens, “Deconstructing Jacques Derrida”, *Los Angeles Times*, 21 juillet 1991. Je traduis.

一名阿尔及尔小犹太人，感到自己既非法国人亦非犹太人，一名穷学生，努力跨越巴黎知识界的心理与社会障碍。<sup>①</sup> 哲学家称：“我深深认定，我还没有写出我希望写出的和早该写出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至今为止创作的一切就如同朝向那唯一真正计划的前期演练，他担心永远无法完成这一计划。“我知道不可能以绝对纯真的方式写作，而这是我的梦想。”<sup>②</sup>

几周后，德里达荣幸地在《伦敦书评》上占据了封面位置，并配以另一篇报道。这次记者是在芝加哥大学追随着“了不起的雅克”。记者首先震惊于他的姿态：“德里达个头不高，但精力十足。……他的眼睛是细腻的浅蓝色，头发纯白。他戴着眼镜时像一名法国高官，不是上司，更像殖民官员。不戴眼镜时，他像法国电影明星让·迦本（Jean Gabin）和阿兰·德龙（Alain Delon）的混合。”记者聆听了一次讲演，惊讶于其优美与清晰。讲演是《给予时间》（*Donner le temps*）<sup>③</sup>里的一段，记者承认惊奇地发现并没有人们通常与其写作风格相联系的晦涩性。他特别为德里达的友善和绅士风度所震动，并惊奇地听到一名女性崇拜者说他跳舞十分出色。<sup>④</sup>

※ ※ ※

554 开始使用“解构”一词时，德里达远未想到它将产生如此大的反响，直至成为像弗朗索瓦·居塞所说的，“在美国大学话语市场上推出的收益最大的产品”<sup>⑤</sup>。在他看来，这是个概念的工具，而绝非“一个主导词”<sup>⑥</sup>。从1984年开始，德里达就多少带些否定性地承认：“如果不是被那么经常地同解构联系起来的话，我会微笑着提出这样的假设：美洲，便是解构。在这个假设中，美洲将是解构正在进行的专有名词，它的姓，它的地名，它的语言和地点，它的主要居所。”<sup>⑦</sup>十年之后，这一

① 这篇动人文章的第一个版本将于1992年4月在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大学由Édouard Glissant和David Wills倡议的题为“来自他处的回声”的研讨会上发表。《他者的单语主义》将于1996年由伽利略出版。

② Mitchell Stephens, “Deconstructing Jacques Derrida”, *Los Angeles Times*, 21 juillet 1991.

③ *Donner le temps* 源于1976—1977年在高师的研讨课，撰写于那时。1991年在伽利略出版时题为《给予时间1：伪币》（*Donner le temps 1: la fausse monnaie*）。第二卷从未出版。

④ Richard Stern, “Afternoons with the Grand Jacqu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5 août 1991. Je traduis.

⑤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op. cit.*, p. 118.

⑥ 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225.

⑦ Jacques Derrida,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op. cit.*, p. 41.

假设付诸实施，变成在纽约大学一次研讨会的题目：“解构是/在美洲”。<sup>①</sup>

让-约瑟夫·古——他曾在法国与德里达相识，随后的几年失去了联系，后来在美国（他成为休斯顿莱斯大学教授）再次见面——惊讶于法国德里达与美国德里达之间的反差。“即便从外形上看，变化也十分明显。在美国，德里达在我看来始终显得更光彩、更具威仪。他在法国从未有过的明星化自然与之不无关系。1980年代初，许多院系被法兰西理论和德里达思想征服。一切开始于法文系，然后是比较文学系。但建筑、美学、人类学、法学也很快表现出对解构的接受。解构思想使学科之间得以建立起联系，因而激起了巨大的热情。就是在这时，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真正占据了统治地位。许多教师要求学生相对德里达来定位。这变成了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无论学科为何。这种冲动现象有十分美国化的特点……唯一真正敌视解构的领域仍然是哲学，这造成了一些误解和歧途。因为对德里达作品的了解常常并不基于本来是必要的第一手哲学知识。许多教师，特别是学生，缺乏预先的训练，只是通过德里达去接触柏拉图、康德或黑格尔。”<sup>②</sup>

555

德里达最早的学生之一鲁道夫·加什也在《镜子的镀锡》<sup>③</sup>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他认为德里达的作品是深刻而明确的哲学作品，突出其文学性只能歪曲它。但另外的人则认为解构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他十分不同的方面。阿维塔尔·若奈尔在同安娜·迪弗尔芒泰勒（Anne Dufourmantelle）合作的访谈录《美国哲学》中激烈地讲述道：

当德里达登上美国舞台时，无法想象大学界封闭到何种程度。没有任何偏移的空间，甚至没有地方放置这所谓精神分析的美丽谬误。德里达除了为我们带来他本人光彩夺目的作品之外，还开辟了道路。他有意无意地践行了一种传播策略。他精妙的政治思想按照我们的标准属于左翼，这思想四处传播，在最高尚博学的神圣田园里撒下了种子。大学里突然五光十色：色彩和不合时宜的女性，这是让人难以轻易原谅他的地方。……德里达一反严肃哲学的常规，带着一种原女性的力量掠过我们的市民和我们身披长袍的学生，而且他本人就常

① 这次研讨会于1993年在安瑟姆·哈弗坎普（Anselm Haverkamp）的主持下召开；汤姆·比绍普（Tom Bishop）和哈弗坎普选择了标题，德里达说对此标题感到惊讶，并在他的讲演“时间出离”中进行了长篇评论。大会论文集于1995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同让-约瑟夫·古的访谈。

③ Rodolphe Gasché, *The Tain of the Mirro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此书于1995年翻译成法文在伽利略出版，题为 *Le Tain du miroir*。

被视为女性。<sup>①</sup>

按照若奈尔的说法，解构运动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与新一代女性的结盟，她们“超性感，奇异，大胆，如冲浪者一般抵达法兰西理论的浪尖”：“她们发现这一理论令人可以居住和呼吸，而哲学系——不仅是哲学系——对于女人和少数人来说则相对无法居住”<sup>②</sup>。先锋之一是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她在翻译并介绍了《论文字学》之后，肇始了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以及少数人种、黑人、墨西哥、亚洲或“下层”（subalternes）研究。如同德鲁西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辛西亚·彻斯（Cynthia Chase）或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她的思想对主要的女性理论家产生了重要作用，如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们开创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及随后的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的思潮，这些思潮意欲“探索性别认同的所有中间区域，所有含混不安的区域”<sup>③</sup>。

在一切学术问题之外，法兰西理论以典型的美国式的适应力，首先将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性，一种对少数族群和政治少数派、对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的开放性带到了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无疑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德里达在文学思考语境中阐发的概念“播散”的借用，她由此创造了一个新词“散族”（DissemiNation），意指将一个民族解体，为的是更好地将之归还给其少数族群。这远不止是变形，而是真正的再发明，是完全符合德里达精神的创造性移译。<sup>④</sup>

※ ※ ※

就在他的思想出人意料地打开通路时，德里达本人在美国的舞台上也十分活跃。从在高等研究学校授课起，他的研讨课总是从11月开始到3月底结束，这使得旅行更容易安排。从1980年代中期起，他每年至少到美国两次：春季在西海岸，秋季在东海岸。除了他执教的主要大学外，他还利用旅行的机会在许多其他城市参加研讨会或举办大型讲座。尽管还有些口音，他对英文的掌握仍然令人惊叹。在讨论中他已能够真正做到即兴发言。安德泽·沃曼斯基（Andrzej Warminski）说“他对他的

① Avital Ronell, *American Philo*, *op. cit.*, p. 260-261.

② *Ibid*, *op. cit.*, p. 186.

③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op. cit.*, p. 165.

④ Homi K.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reprint* in H.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res, Routledge, 1994, p. 140.

英文本该更有信心。他直接自我翻译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英文越来越地道。557  
他本可以直接用英文写作，但他拒绝这么做，因为语言的问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sup>①</sup>。

※ ※ ※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三位教授分享一个职位：秋季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冬季是沃尔夫冈·伊瑟（Wolfgang Iser），春季是德里达。在十分密集的五周里，他承担传统上十周的内容；在1990年代，他每年大约有3万美元薪酬。穆雷·克里格尔坚持让德里达来尔湾是对的。因为他的在场，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系成为美国最负盛誉的系，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优秀学生以及许多其他人物。例如曾当过十年的舞者和编舞家，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斯蒂芬·巴克尔（Stephen Barker），他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申请职位，就因为《丧钟》的作者也在那里执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尼采和德里达。我有幸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他所有的研讨课。我远远不是唯一。许多人特意做出安排，为了能够在4月份来尔湾分校。”<sup>②</sup>

德里达尽管有着无可争议的明星效应，但他首先是一名真正的教师，同以往一样关注学生。大卫·卡洛尔回忆道：“他给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开了一门公开课。许多听课的人是历史或人类学专业。只有哲学系的负责人试图劝阻他们的学生前去听课。有些人最终还是冒险前去，但坚持听课的人很快离开了哲学专业。即便在尔湾也不可能用德里达的标签在哲学系做论文……他的课总是有大量的听众，哪怕是他号称不对外的研讨课上也挤满了人。但这并不妨碍德里达花很多时间接待学生，同他们讨论作业、论文和个人计划。他应该每周在办公室六个小时，但他总是558  
是延长，给每人必要的时间。”<sup>③</sup>

周一到周三在学校时，德里达表现得十分易于接近。研讨课后，他邀请身边的人到附近最好的一家日本餐馆进餐。<sup>④</sup>周二，他通常同希利斯·米勒一起吃午餐。其他日子则同他欣赏的友人和同事一起。“德里达喜欢找回他的习惯和友人，”艾伦·

① 同沃曼斯基的访谈。关于德里达对语言的看法，除了《他者的单语主义》之外，可参见他1998年在“第十五届文学翻译大会”上的讲演《什么是“恰当的”翻译》（“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该文重载于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561-576。

② 同斯蒂芬·巴克尔的访谈。

③ 同大卫·卡洛尔的访谈。关于德里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教学详情，可参见凯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和沃曼斯基在他去世后不久发表的致敬文章：[http://www.humanities.uci.edu/remembering\\_jd/lawrence\\_warminski.htm](http://www.humanities.uci.edu/remembering_jd/lawrence_warminski.htm)。

④ Peggy Kamuf, “Affect of America”, in *Derrida's Legacie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op. cit., p. 145.

伯特回忆道，“总是沃曼斯基和希利斯去机场接他。在他逗留期间给他当助手的总是同一名学生。每周的其他日子，他常常快速往返于其他大学，跑讲座或研讨会。但最后的几年，他旅行较少，更愿意留出时间来安静地工作。”<sup>①</sup>

大卫·卡洛尔和妻子苏珊娜·吉尔哈特（Suzanne Gearhart）给他租了个小房子，先是在拉古纳海滩，后来在稍微偏僻些的维多利亚海滩。德里达十分高兴能在海边生活几周时间，尽管他很少能游泳，因为春天太平洋岸的海水还相当凉。他大量地工作，但生活节奏没有其他时候那么紧张。他喜欢在沙滩漫步，观看这里众多的海鸟，同他的译者和密友佩吉·卡穆夫去吃晚餐或看电影。

※ ※ ※

穆雷·克里格尔与希利斯·米勒同时邀请德里达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克里格尔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是一位真正的创新家。1990年，他向德里达提议把个人档案保存在学校主要的朗森图书馆里。德里达为此十分感动：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的档案表示感兴趣。第一份向“批评理论档案”赠送的协议于1990年6月23日  
559 签署。“所有一切以相当慷慨和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佩吉·卡穆夫解释道，“但在一开始，学校应该建议德里达请律师协助并起草一份更具司法性质的文件，这样能够避免许多问题。有一点始终很明确，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对于所保存的资料没有任何发表的权利。研究者可以完全自由地查询这些档案，但复印和摘录则需经德里达本人同意。他不愿将信件托付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版权的不同：在美国，收信人是信件的唯一所有者，这将使他面对所有给他写过信的人感到窘迫。”<sup>②</sup>

鉴于德里达保存的各种手稿与文件数量巨大，具体挑选和复印的工作量将十分可观。托马斯·迪托瓦（Thomas Dutoit）是德里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当时生活在德国。他听说档案赠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之后立即提议帮忙。在1991和1998年间，他在里斯-奥朗吉斯度过了很长时间，将文件归类并复印。大多数档案已经过相当细致的整理——课程已分类，书稿和校样逐卷放在一起，等等，但还需打开箱子和文件夹，全部进行整理。

迪托瓦回忆道：“从一开始就同意，雅克·德里达将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留一份复印件。因此我复印了大量的东西，但并非全部，比如不包括校样。我工作时德里

---

① 同艾伦·伯特的访谈。

② 同佩吉·卡穆夫的访谈。

达常常在家，但他只远远跟随我的工作。他开始时告诉我可以随时打断他，向他咨询：‘所有的中断都是重新开始的承诺。’但当我为一份文件询问他时，他很快表现出不耐烦。有时他对我说‘这真要命’，因为让他沉湎于过去……我有房子的钥匙，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打开所有抽屉。我很快学会分辨他的笔迹；我对所有的日子了如指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最了解他的档案……每年9月份，当卡车来拉他的资料时，德里达总是很不安：‘好吧……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食言的。’当他同意赠送时，他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很显然，他有过遗憾。一天，在车上，在尔湾和拉古纳海滨之间新修的马路上，落日很美，他对我说：‘好吧，我的资料放在这里不是个坏主意。’<sup>①</sup>

560

※ ※ ※

从1992年起，纽约成为德里达在东海岸主要的执教地。纽约大学位于华盛顿广场，格林威治村中心。从1956年第一次惊喜地发现了这座城市起，德里达就对之产生了真正的热情，他每年9月的旅行同一系列仪式相连。

现在我每年都在一个周六下午抵达肯尼迪机场。永恒回归的柔情在我心中仿佛恩赐的沉醉，平静下来的热烈，就在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中央公园。在诗人小径上我大声对每位诗人讲话，他们是我的拉古纳海鸟朋友的亲眷。每年必来，这期待已久的时刻，它应该首先保留着回归的印记，已然如此。……

另一个秋季的快乐时刻，常常在回去的前一天：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漫步。我重新踏过我所有漫游的足迹，从炮台到哥伦比亚，穿越曼哈顿。我充满敬仰，就是这个词，而且觉得更熟悉，特别是下城（格雷莫西公园，联合广场，华盛顿广场，苏荷，南街海港），我想说比起对巴黎别样的熟悉，我对“她”有着无条件的崇拜。<sup>②</sup>

在纽约，德里达承担三周十分紧张的教学工作。最初邀请他前来的是纽约大学法国文明与文化中心主任，法美关系的主要人物汤姆·比绍普。之后，随着他开始用英文讲课，他受到了由安瑟姆·哈弗坎普主持的英文系诗学院的邀请。最后的几年是应阿维塔尔·若奈尔之邀：他成为“杰出全球教授”之后，受到英文系、法文

561

<sup>①</sup> 同托马斯·迪托瓦的访谈。

<sup>②</sup>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03-104.

系和德文系的邀请。如比绍普所讲，“德里达在纽约如旋风一般，有超乎常人的活动量。尽管声誉正隆，他却完全不像个明星。在法语中心，限制人数的研讨课围着一张大桌子举行，有30多人。这样他能够使用自己热爱的对话形式；我特别记得他有一次朗读雨果和加缪关于死刑的段落，令人惊叹。但纽约大学只是他在此期间的一小部分活动。他听任自己到处奔波，疲惫不堪，但从来无法说不。他有时乘夜车去康奈尔或普林斯顿做讲座。”<sup>①</sup>

若奈尔证实，“长期以来，10月份在纽约就等于德里达之月。有一年，我们给他安排了至少一天一项活动。我们害怕太繁重了，但他很高兴。因此随后的几年我们如法炮制。十月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有犹太教赎罪日（Yom Kippour），尼采的生日，还有他父亲的忌日。雅克精力无限。除了纽约大学和新社会研究学校之外，他还在城市大学和卡多佐法学院授课。有时他一天有三场讲话。他不停地见人，上研讨课，做讲座，接受访谈；他似乎能够同时过十倍的人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够适应见面的每个人，而且立即进入向他提出的新问题。在纽约大学，他不上课的时候，他的门对所有可能对他提出想法的人敞开。他开放而慷慨地接待那些自由来往的人，各方的不同意见者，还有可称为知识界居无定所的人们。”<sup>②</sup>

562 “有时候你像个普鲁士将军”<sup>③</sup>，一天让-吕克·南希对德里达说。这好战的一面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随后扩大到别处。很久以来，德里达在心里把美国大学分成两类：友好的和敌意的。例如，斯坦福大学请求了好几年时间，他才同意前去做了一场大型讲演，题为《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与艺术的未来》，后来成为《无条件的大学》。<sup>④</sup>他在芝加哥则十分活跃，那里有许多友人：在芝加哥大学，他高兴地再次见到了《批评探索》的主编托马斯·米切尔和阿诺德·大卫逊（Arnold Davidson）；在保罗天主教大学，有迈克尔·纳斯（Michael Naas）和帕斯卡-安娜·布劳特（Anne

① 同汤姆·比绍普的访谈。

② 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③ “Dialogue entre Jacques Derrida et Jean-Luc Nancy”, *Rue Descartes* n° 45, *Les 20 ans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op. cit.

④ 斯坦福比较文学系主任汉斯·乌里奇·冈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寄出的第一封邀请信日期是1990年1月23日。德里达认识冈布莱希特，他曾在德国锡根任教。但他仍然对去斯坦福讲演犹豫不决，尽管对方保证说对他的工作不再有敌意。直到1995年，按照冈布莱希特本人的说法，经过五年类似“学术骚扰”的反复催促之后，德里达才表现出愿意考虑“找到一种方式”来斯坦福。其间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加尔西亚·迪特曼在那里开了关于他作品的研讨课，再次对他说他的到来将是“给所有人的一件大礼，一个需要抓住的真正机会”（迪特曼1993年4月24日致德里达的信）。1998年1月6日，德里达同意前来做一次盛大的讲座，并最终于1999年4月15和16日实现，面对大约1700名听众，由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做了热情的介绍。密集的一天顺利结束。今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出版德里达作品最多的出版社之一。



Pascale Brault) 这样忠实的译者和朋友。其他重要的地方有波士顿学院, 约翰·萨利斯 (John Sallis) 在那里执教。特别还有费城附近的维拉诺瓦大学, 约翰·卡普托 (John D. Caputo) 1994 年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大陆哲学系, 尤其对德里达的研究开放: 德里达为一个大型圆桌会议主持了开幕式, 讲演后来以《坚果壳中的解构》为题发表。<sup>①</sup>

自然, 这幅大学的图景并非固定不变。如南希所言, “他总是看到有仗要打, 有堡垒要攻取, 有同盟要建立或巩固。他不久就坚持要我们——菲利普、萨拉和我去美洲, 并向外交部文化事务处负责人伊夫·马班 (Yves Mabin) 提议对我们发出邀请。不可否认, 他寻求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起一个网络。在此框架下, 他很重视保持与一些潜在同盟的联系, 即使从学术角度看他们并非第一流的。他知道自己需要很多接续者才能让解构发展壮大。”<sup>②</sup>

就在德·曼事件爆发前, 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在题为《怎样成为法国的主导哲学家: 雅克·德里达案例》的著名文章中尝试将德里达的美国生涯解读为对一个文化市场的有步骤的征服。<sup>③</sup> 这种几乎是攻城略地的观点值得加以调整。的确, 德里达在美国的做法比在法国更为机智, 但看起来他更多获益于有利的环境因素, 就好像解构恰逢其时。特别是, 应该将他的成功范围相对化。解构的思想已进入日常话语, 德里达也在美洲变得大名鼎鼎, 但他的作品却从未超出过学术界。他没有任何一本书成为真正的畅销书。只是在多年之后《论文字学》才终于达到 10 万册销量。他的其他英文版著作都在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销量摆动在 5 000 到 3 万册之间, 比法文版荣耀得多也成功得多, 但仍然远离大众市场。德里达在美国得以仰赖几家大学杂志的支持——《字形》(Glyph)、《实质》(SubStance)、《边界 2》(Boundary 2)、《批评探索》——但在大型文化报刊上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敌意。《时代文学增刊》对他始终充满敌意, 《纽约书评》更是如此。<sup>④</sup>

但也不该忽视德里达热引发的一些民间后果。在《法兰西理论》一书中, 弗朗索瓦·居塞写道, 一些装饰杂志邀请读者“解构花园的概念”, 一部连环画的超级主角面对的是“解构博士”, 时装杂志则鼓吹“德里达外套”和“解构主义西装”<sup>⑤</sup>。就在“莫尼卡门”事件正酣时, 比尔·克林顿本人也运用解构来为自己辩护。他宣称

① “The Villanova Round Table: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③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n° 3, novembre 1987, p. 584-622.

④ 同迈克尔·纳斯和安娜-帕斯卡·布劳特的访谈。

⑤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op. cit., p. 132-133.

自己同年轻实习生没有发生性关系，为此被控撒谎，总统回答：“那要看什么是‘是’”（It depends what ‘is’ is），这是典型的德里达式说法。

《明信片》的作者则更多的为这些肤浅的影响感到恼火。他也并不欣赏伍迪·艾伦 1997 年的电影《解构哈里》（*Deconstructing Harry*）。这一指涉——它在法文标题《癫狂的哈里》（*Harry dans tous ses états*）中颇具说明意义地消失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对大学界进行轻巧讽刺的借口。在访问斯坦福时，德里达在一次采访中说，对解构在此片中的运用十分失望。他提高声音为这个词辩护，好像它是自己的孩子：“我认为这是对‘解构’的剥削。在影片结尾，那个女大学生把这个词当成陈词滥调来使用，为的是摧毁它，损害它，使它庸俗化。”<sup>①</sup>而这难道不是人称荣耀的代价吗？

---

① <http://prelectur.stanford.edu/lecturers/derrida/nytderrida.html>.

# 第 29 章 马克思的幽灵

## (1993—1995)

1990年2月，雅克·德里达生平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柏林墙几个月前倒塌，苏联正在崩溃之中。以他特有的挑衅性，德里达特别讲到了马克思，颇引起了一些躁动。几周之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谈到这次旅行，并分析“苏联归来”这一特别的文学体裁时，德里达清楚地解释了他始终如一的立场：565

我从不曾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在年轻时怀着对纪德的仰慕，15岁（1945）就读了他的《苏联归来》，该作令人毫无疑问地看到了苏联革命的悲剧性失败，今天在我看来仍是一本重要、坚实和清醒的书；后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巴黎时，我身边的友人和知识界同仁不得不对斯大林或新斯大林式可怕的政治—理论恐吓进行抵制，这并不容易，但这一切从未妨碍我怀着希望与思念分享安田朴（Étienne）在对苏联革命的热爱中怀有的某些类似不设防的热情或孩子气的想象。我听到《国际歌》时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想要“走上街头”同反革命斗争。……我无法描述这第一次前往改革中的莫斯科之旅，如果我不至少提一句有关这革命情绪、这感情或这眷恋的历史的话，对之我不能，事实上也不愿，完全放弃。<sup>①</sup> 566

两年之后，伯恩德·玛格努斯（Bernd Magnus）和斯蒂芬·卡伦伯格（Stephen Cullenberg）在河滨分校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他们请德里达作开幕演讲。河滨分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进步主义校区，他的友人迈克尔·斯普林科在那里执教。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Moscou aller-retour*, Éditions de l'Aube, 1995, p. 46 - 47.

讲演题目为“Wither marxism?”，意为“马克思主义向哪里去”，但在更隐秘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是否正在消亡？”德里达同往常一样，将就此“游戏和含糊”<sup>①</sup>的题目进行多重解析。

已经将近30年了，朋友们，特别是法国的朋友们，责备他从未就马克思写下任何东西：其中有过阿尔都塞和他在高师的友人，《原样》和《诺言》时代的索莱尔斯、乌德比纳和斯卡尔佩塔，热拉尔·格拉奈尔，还有最近的贝尔纳·斯蒂格勒和卡特琳娜·玛拉布。而就在没有人料想到的时候，在美国西海岸，德里达突然决定就此主题发言。他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的访谈中解释道：“马克思研讨会本来可能不举行，那样也许我不会写关于马克思的书。我犹豫过，试着问自己对这次活动作出回应是否经过战略上的深思熟虑。我经过了长时间思考，但最终，无论如何权衡，有一个时刻我说：接受吧，接受。”<sup>②</sup>

德里达总能工作得很快。但他从未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任务。就好像他很久以来一直就怀着这本书，只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希利斯·米勒回忆道：“1993年的一天，在尔湾，应该是3月初，雅克忧虑地对我说：‘我得给河滨研讨会写篇发言，但我还无从着手。’他必须抓紧了，即便佩吉·卡穆夫跟随他的写作同时  
567 在进行翻译。四五周后，《马克思的幽灵》初稿完成。他写完了这篇全新的长文，同时还在上研讨课，接待学生，很可能还在外面进行过两三次讲演。”

1993年4月22和23日，德里达用他独有的奇特的讲演开启了河滨研讨会。开幕词神秘而令人难忘：

某个人，您或者我，前来说道：我想最终学会生活。

最终，但为什么说“最终”？

学会生活。奇特的命令。谁学？从谁那里学？学会生活，但为了谁？能知道吗？能知道生活吗，首先说“学会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最终”？<sup>③</sup>

但他很快宣布了调子：要讨论的正是马克思，其持久性和适应性。在德里达眼里，不去反复阅读并讨论马克思“将永远是个错误”，今天更甚于任何时候。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机器和意识形态工具（国家、政党、小组、工会及其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Galilée, 1993, p. 10.

②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引自保存在 IMEC 的法文手稿。

③ *Spectres de Marx*, op. cit., p. 13.

他教义生产场所）正在消失，因此我们除了托词外不再有理由背离这一责任。没有这一责任将没有未来。没有马克思便没有未来。没有马克思的记忆和遗产便没有未来：至少需要某个特定的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精神财富之一。因为这将是我们的设定或不如说我们的立场：不止一个，应该有不只一个。<sup>①</sup>

德里达想要至少把马克思的“精神财富之一”还其应有的地位，同时指出了穿越其许多文本的幽灵性，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开始：“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将马克思作为哲学家和作家去阅读，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使马克思最具理论性的作品回荡着对莎士比亚，特别是对哈姆雷特的多重指涉。幽灵性至少从电影《鬼舞》开始就纠缠着德里达，而萦绕学（*hantologie*）的概念看来是一种新的指代延异的方式；但他却并未发明这些主题：他从《德国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中揭示出这些主题。正如德里达在22年前对格拉奈尔宣称的那样，为了走出对《资本论》作者的沉默，他必须等待“完成工作”。他早已预感到这一工作导向的将不是“皈依”，“而是倾斜的切入，侧面的移动，跟踪马克思文本中每每不为人觉察的纹理”<sup>②</sup>。

568

《马克思的幽灵》并不只是新的解读，它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回应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一年引起相当大反响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德里达对共产党制度坍塌后的胜利者言论作出了回应，列举了“世界新秩序”的伤口：失业，大举驱逐无家可归者，经济战争，外债加重，军备工业和贸易，核扩散，种族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倒退，黑帮与走私……不，历史尚未终结。

“新的国际歌”穿越这些国际法危机在寻找出路，它早已揭露了人权言论的局限性，这种言论将始终是不合时宜的，有时是虚伪的，至少是形式化的和自相矛盾的，只要市场法则、“外债”、科技、军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不公平，它与主宰今天的、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不公平同样邪恶。因为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就在一些人敢于以自由民主的理想的名义进行新的福音布道的时候，在他们看来这理想终于抵达了自身，如同抵达了人类历史的理想：在地球和人类历史上，暴力、不公平、排外、饥荒，亦即经济压迫，从未影响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要在历史终结的欣悦中歌唱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理想的降临，不要欢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解放之宏大叙事

① *Spectres de Marx, op. cit.*, p. 35 - 36.

② 德里达致格拉奈尔的信，1971年2月4日。

569 的终结，让我们永远不要忽视由无数个体的痛苦构成的宏观明证：任何进步都不能让人无视这一点，即在绝对数字上，地球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受奴役、饥馑或灭绝。<sup>①</sup>

经过随后几个月的扩充，《马克思的幽灵》在一种紧迫感中几乎立即出版。德里达在给弗朗索瓦丝·达斯图尔的一封信里请她原谅自己迟来的回复，并这样介绍此书：“在惯常的疲倦和超负荷工作中，我致力于一本关于幽灵的小书，其中，以我突兀和笨拙的方式，我试图想象什么是‘Wir sterben um zu leben’（‘我们为了生而将死去’），但并不能太过相信它，唉，这也是我的弱点。”<sup>②</sup>

书中有多处题外话和尖锐的分析，但并不妨碍全书裹挟着一种真正的抒情气息和巨大的慷慨气概。玛格丽特还记得在冰岛时读到《马克思的幽灵》的校样；她陪着雅克去了雷克雅未克，当晚她启程前往美国。夜里，在旅馆房间，她一边完成校对一边流泪，深深为之感动。

对这部著作的接受与德里达之前的作品无法比拟。《马克思的幽灵》来的正好。标题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吃惊，而且满足了一种模糊的期待。毫不奇怪地，《巴黎日报》嘲讽地撰文《马克思，德里达的幻象》，而贝尔纳-亨利·莱维则在《观点》杂志的专栏里说自己听说“回到马克思”时“以为在做梦”。

570 在《新观察家》杂志，由于编委会总的来说倾向于敌对态度，迪迪埃·埃里邦提议在纽约进行一次长篇采访而不是仅仅撰写书评。访谈开始他便回顾了德里达在美国的成功，强调这不是简单的时髦现象，而是“研究界巨大的精神动荡”。关于《马克思的幽灵》，埃里邦指出“这本奇特的书既是一份政治宣言，又是一部高度技术性的哲学著作”，而且实际上也很难读。但他猜测这将不会妨碍它的冲击力。德里达本人也说，《马克思的幽灵》首先是“一个政治行为”：

最重要的并不是对马克思作品的解读工作。……具有当前意义的，让我在采取政治立场的形式下提高声调的，是在面对着这种蔓延至所有言论的欢欣可笑的共识时，我感到不断增加的不耐，我想我并不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所有对马克思的援引都变成了某种遭诅咒的东西。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祛魅与合谋的意愿，值得进行分析和反抗。在某种方式上，我的书是一本反抗的书。

① *Spectres de Marx*, op. cit., p. 13.

② 德里达致达斯图尔的信，1993年8月20日。“Wir sterben um zu leben”引自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Hypérion*)，达斯图尔在之前给德里达的信中提到过此作。

这显然是个不合时宜的举动，逆时而来。……人们在逆流而动时总希望顺应时势，在必要的时候完成。<sup>①</sup>

在《解放报》上，《马克思的幽灵》获得了罗贝尔·马焦利一篇长文的礼赞。他提醒说德里达“从不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在所有人都是的时候，而且……不曾有过此意愿”，随后认定此书“将像奠基石那样令人难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魂灵再度偶然吹拂过我们的国度的话”<sup>②</sup>。在《世界报》上，尼古拉·维耶（Nicolas Weill）也承认了作品的重要性和作者仅在柏林墙倒塌后四年便就此著述的大胆，尽管他认为“同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讨论不应仅限于对福山的反驳”<sup>③</sup>。同热拉尔·盖冈（Gérard Guégan）在《西南星期日报》上的反应一致，许多人确信《马克思的幽灵》将让那些不敢说出马克思的名字更不敢研究他的人重获信心：“在这本幽灵寄居的书的四周将聚集起继承人。……不只是哲学史，更是世界的命运要求如此。”<sup>④</sup>

法国共产党人不会放过这部名人巨著所代表的机会。《人道报》在9月23日就刊登了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赞扬文章，又在11月13日发表了详尽的书评。德里达立即向阿尔诺·斯皮尔（Arnaud Spire）致谢，并通过他向全体编委对他的“慷慨关注”表示感谢：“我一定要对您说，我感动于——就像面对一个好的信号，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而且不止为我一人——《人道报》刚刚表现出的开放精神，这多亏了您。未来大概会比我在此所做的更能说明一切。”<sup>⑤</sup>几周之后，《人道报周日版》向此书致敬。共产党总书记罗贝尔·于（Robert Hue）也说为德里达的举动所感动。<sup>⑥</sup>

571

但德里达并非党派中人。代表着激进左派中十分不同趋势的《新政治，共产主义革命与批评》也很高兴找到了德里达这样一个有分量的新同盟，就在这革命思潮回归的时刻。前高师学生，《阅读〈资本论〉》的合著者皮埃尔·马舍雷对形势做出了最好的总结：

德里达让所有人吃惊，他反向而行，在1993年相对较晚的时候开始谈论马

① 载《新观察家》，1993年10月21日。

② 载《解放报》，1993年11月4日。

③ 载《世界报》，1993年12月3日。

④ 载《西南星期日报》，1993年11月7日。

⑤ 德里达致斯皮尔的信，1993年11月14日。

⑥ 同《人道报》的友好关系在下一个十年中一直保持。德里达将特别发表一篇优美的文章，题为《我的星期日的“人文”》，向报纸的新版表示祝福（载《人道报》，1999年3月4日。同这时的大多数文章或讲演一样，此文也收入《纸机器》）。

克思，谈论“这个马克思”，说着马克思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让马克思延迟讲话。这个时间差有其意义，甚至是必要的：恰恰在马克思藏身墓穴深处，死亡，被埋葬，被迫沉默，像条死狗一般被否定和消亡的时候。……还给他话语的时机似乎来了，如果说不是“这”话语，属于他本人，躲在他活生生的在场的同一性中的话语的话，至少是《马克思的幽灵》赋予他的“归来者”的幽灵般的话语。<sup>①</sup>

572 这本“小书”——德里达总是这么说，尽管它将近 300 页——却并不让所有自称站在马克思一边的人满意。辩论相当丰富，以至《再思考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主编斯普林科邀请十几名知识人作出回应，他们大多是用英语写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把这些回应和德里达的答复汇集在一起出版了《幽灵似的分野》。<sup>②</sup>只有德里达的文章将以法文出现，题为《马克思与儿子》：他以坚定但相当平静的口气与他的反对者们对话，而把最激烈的攻击留给了他的前学生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文章《彻头彻尾不可思议》。<sup>③</sup>

※ ※ ※

在《马克思的幽灵》出版前几个月，《世界的贫困》问世，这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主持的一部集体巨著，为他带来了新一轮的强烈的媒体曝光。两人几乎同时确认了强烈的左翼价值观，这使他们再次接近。无论德里达对萨特有怎样的批评，在他眼里“介入”仍然是个“全新美好的词汇”。如他值《现代》杂志 50 周年之际申明的，关键在于“通过改变其内容及策略而保留或激活这‘介入’的形式”<sup>④</sup>。

1991 年秋，在斯特拉斯堡这个欧洲文学的十字路口，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议会”的创意。1993 年 7 月，阿尔及利亚作家塔哈尔·贾乌特（Tahar Djaout）被暗杀之后，包括德里达和布尔迪厄在内的 60 多名作家呼吁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具体支持几乎遍及世界各地的受到迫害的作家和知识人。国际作家议会的奠基会议于 1993 年 11 月 4 至 8 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与一名城

---

① Pierre Macherey, “Le Marx intempestif de Derrida”, in *Derrida, la tradition de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135 - 136.

② *Ghostly Demarcations, 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res, Verso, 1999.

③ Jacques Derrida, *Marx & Sons*, *op. cit.*。文章写于 1998 年，英文版发表于第二年。

④ Jacques Derrida, “‘Il courait mort’: salut, salut”, in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200.



市官员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一同参与了筹备工作。嘉宾有苏珊·桑塔格、埃杜阿·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还有新近的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1月7日晚，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严密保护下“突然”到来，改变了事件的内容：这是从1989年2月发出对他的追杀令（fatwa）之后他第三次在法国公开露面。德里达和布尔迪厄同他一起参加了在Arte电视台直播的一场辩论，但主持人糟糕的表现让他们十分不快。不过他们仍然在好几年里陪伴着国际作家议会的历程，随后转而创办了一系列“城市一庇护所”。

573

也在1993年7月，德里达为《世界报》在莫里斯·奥朗德尔的倡议下刊登的《呼吁提高警惕》一文提供了支持。签名者们认为最近有太多的作家和知识人为与极右翼相关的出版物如《危期》（*Krisis*）撰文，造成人们对极右派的接受和视而不见。<sup>①</sup>这份呼吁书尤其导致了莫里斯·布朗肖与布鲁诺·鲁瓦和法塔·莫纳纳出版社的决裂，就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了与极右有关联的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的一部作品之后。<sup>②</sup>

阿尔及利亚人民被夹在伊斯兰拯救阵线（FIS）的暗杀行动和当局的残酷镇压之间，其悲惨状况令德里达深感触动。1994年初，他签署了《阿尔及利亚民间和平呼吁书》，并于1994年2月7日在索邦大学的大阶梯教室参加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知识人大型集会并发言。他一开始便回顾了自己“对阿尔及利亚的痛苦的爱”，“这虽不是一个公民的爱，即对国家—民族的爱国主义眷恋，但心灵、思想和政治立场仍然与之无法割舍”<sup>③</sup>。尽管局势如此艰难复杂，德里达却不愿放弃任何他惯常的要求。他逐条质询呼吁书的条款，为的是在阿尔及利亚背景下清晰地界定如“暴力”、“民间和平”和“民主”的恰当意义。他特别提醒道，如果说“选举肯定不是民主的全部的话，那么没有它，没有对选票的统计，便没有民主”<sup>④</sup>。

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在法国有着十分具体的后果。通常严守法规的德里达

574

① 这篇呼吁文章刊登于1993年7月13日的《世界报》，后经莫里斯·奥朗德尔评论并收入 *Race sans histoire*, Seuil, coll. “Points”, 2009, p. 244–248。

② 《文学半月刊》在1996年11月1—15日第703期刊登了莫里斯·布朗肖致布鲁诺·鲁瓦的一封信，此后论战变成了真正的“事件”。详情可参见 Christophe Bident, *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op. cit., p. 573。1995年7月，在鲁汶—拉-讷夫举行的“文学的激情”研讨会上，德里达在发言中全文引用了《我死亡的时刻》（*L’Instant de ma mort*）并加以评论。布朗肖为此在《驻留》（*Demeure*）出版时向他表示了热情的感谢：“我多么感谢您用无可比拟的评论拯救了我的新书，我已离开并谴责了其可恶的出版商，如您大概所知的。”（布朗肖致德里达的信，1998年1月15日。）

③ Jacques Derrida, “Parti pris pour l’Algérie”, ce texte est paru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n° 580, janvier-février 1995, avant d’être repris dans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222.

④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224–225.

站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萨米·纳伊尔 (Sami Nair) 一边, 勇敢呼吁对移民和国籍法, 以及最近有关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法规进行“公民抵制”。1995年3月25日, 在南特举行的一次签证权游行中, 他第一次以直接斗争的方式参与。“我在那儿, 被推上去——不是个桶, 是个高起的地方——就那样, 为了阿尔及利亚移民向人群喊话”<sup>①</sup>, 他后来这样讲述。这一天, 德里达直截了当地提醒大家, 法国在1993年向阿尔及利亚人颁发了29万张签证, 在1994年则减少了四分之三。他谴责“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关闭边界, 而他们生活在地狱中, 1994年在那里至少发生了3万起屠杀事件”。

世界上杀人越多, 法国就越是作为遥远而傲慢的观察者观看屠杀,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府。法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一形势难以令人接受, 因而禁止公布签发或拒绝签证的数字。它对自己的政策难道如此感到羞耻吗?<sup>②</sup>

常常就文字及其承载物进行思考的德里达让“无身份者”(sans-papiers) 这个用语在各个意义上回响, 这也是他在1990年代不断投身的斗争之一, 同时也让他与法国社会党渐行渐远, 他认为后者在此方面过于谨小慎微。<sup>③</sup> 有些人对他介入这类问题感到惊讶, 尽管他不像布尔迪厄那么振聋发聩。他回答说他在自己的写作和政治介入之间并不感到分裂, 其间“只有节奏、言论方式、背景的不同”<sup>④</sup>。在接受《媒体学刊》的长篇采访中, 他极具说服力地解释说权利和身份证件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如同居住, 如同名字, ‘在家里’设定了‘身份证件’。‘无身份证件者’就是法外人, 权利之非国民、非公民或外国公民, 他被拒绝了在纸上赋予的权利, 这权利表现为签证或居留卡, 戳记或钢印。”<sup>⑤</sup>

在他的哲学研究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连接日益频繁。好客性(l'hospitalité)是他1995—1997年研讨课的内容, 也成为不断出现的主题, 他的名字将与之越来越经常

---

① 2001年5月16日与埃蒂安纳·巴里巴尔和提耶里·布里奥的见面, 发表于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n° 9,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学生杂志, 2007年。

② 1995年3月25日在南特发表的讲话, IMEC 档案。

③ 《错失——从法律到正义(但无身份者缺少了什么?)》, 1996年12月21日在阿芒迪耶剧院的即兴发言, 收于 *Marx en jeu*, Descartes et Cie, 1997, p. 73-91。

德里达在晚年同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伯格的访谈中谈到弗朗索瓦·密特朗: “我见过他几次。他让我印象深刻。他对文学和哲学的观点有些短视, 但他是个文人。我很愿意赞赏他。”这将不妨碍德里达很长时间继续选举社会党, 有时还呼吁这么做, 例如在1995年的总统竞选当中。

④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386.

⑤ *Ibid.*, p. 265-266.

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好客性的原则集中体现了“最具体，最适合将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紧迫性”。德里达在一次讲演中申明了这一点，而讲演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方案：《所有国家的世界主义者，仍需努力！》。

好客性就是文化本身，而不是许多伦理中的一种。只要它触及德行（*éthos*），即居住地、家、熟悉的停留地，还有在那里存在的方式、与自我和他人相关联的方式，与他人就像与家人，或者就像与陌生人，那么，伦理便是好客性，伦理与好客性的经验在各个方面都是同广延的，无论怎样开启或限制它。<sup>①</sup>

与政治相邻的宗教是这段时期德里达关切的另一个领域。意大利出版人拉太扎（Laterza）有一个计划叫做“欧洲哲学年鉴”，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将欧洲的哲学家聚集起来。在筹备会议上，德里达提议以一个在他看来“最清晰也最晦涩的词——宗教”<sup>②</sup>开始。

1994年2月底，在卡普里岛的一间酒店，几个哲学家围坐在一起自由讨论。德里达身边有伽达默尔、瓦蒂莫、菲拉里斯……后者回忆道：“我们来时并未做什么准备，就好像小学生的学期旅行。除了德里达带着一个已经写满了字的本子。他是唯一完成了作业的人，这是他喜欢的说法。他的发言十分丰富，是我们交流的出发点。”<sup>③</sup>

576

文章标题《信仰与知识》（*Foi et savoir*）似乎中规中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副标题《单纯理性界线上“宗教”的两个来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religion” aux limites de la simple raison*）呼应着柏格森和康德，而且文章的密度惊人。同惯常那样，德里达从最具体的情境出发，强调了这次会面的西方性甚至欧洲性，尽管它有些过快地自称国际性。

我们代表着并说着四种不同的语言，但不妨明说，我们的共同“文化”明显是基督教的，或可算是犹太—基督教的。我们中间可惜没有一个穆斯林，至

① *Cosmopolites de tous les pays, encore un effort!*, Galilée, 1997, p. 42.

② Jacques Derrida, “Foi et savoir. Les deux sources de la ‘religion’ aux limites de la simple raison”, in *La Religion, Séminaire de Capri* (sous la direction de Gianni Vattimo et Jacques Derrida), Seuil, 1996. Repris dans Jacques Derrida, *Foi et savoir*, Seuil, coll. “Points”, 2001, p. 11.

③ 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的访谈。

少在这初步的讨论中，就在我们也许应该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伊斯兰教的时刻。也没有其他宗教的代表。没有一个女人！我们应该认识到：为这些沉默的证人说话而不为他们说话，占据着他们的位置，这会产生各种后果。<sup>①</sup>

在《信仰与知识》里，德里达第一次阐发了他晚期思想的关键概念之一——“自身免疫”（auto-immunité），“这奇特的生命体的功能，它以几乎是自杀的方式，竭力‘自己’摧毁其自身的保护，反抗其‘自有的’免疫性而自我免疫”<sup>②</sup>。他也质询原教旨主义与他所称的世界拉丁化（mondialatinisation）之间的冲突。这个组合词意指“如同上帝死亡经验的基督教和远程科技（télé-technoscientifique）资本主义的奇特结合”<sup>③</sup>。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组合词。



577 几个月之后，德里达在卡普里附近的那不勒斯完成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档案之殇》（*Mal d'archive*）。这是他应该于1994年6月5日在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由勒内·马若尔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组织的研讨会“记忆：档案问题”上的闭幕演讲。德里达在其中礼貌地批评了约塞夫·哈伊姆·耶鲁沙米（Yosef Hayim Yerushalmi）的新书《弗洛伊德的摩西：有尽的和无尽的犹太主义》。耶鲁沙米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对德里达至为重要，大概因为他像弗洛伊德一样与犹太教关系复杂。他将在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对话中再次谈到这一点：

这种对“犹太特性”（关于记忆、未来、精神分析的前瞻性，等等）的赞美在我看来不仅仅在内容上是值得商榷的。我也自问，耶鲁沙米的做法是否有这样的危险，可能导致神选的主题，或更确切地说“上帝的选民”这样重大（和难以诠释）的主题在政治上的实施，无论其意愿如何。<sup>④</sup>

研讨会期间耶鲁沙米在场，他本应参加德里达的讲演，但最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天他因恙没有离开旅馆房间。直到后来在纽约两人才试图对话。

1994这一年，各种计划压在德里达身上。他从伦敦回来后不久给菲拉里斯写道：

---

① *Foi et savoir, op. cit.*, p. 13.

② Jacques Derrida, *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 Galilée, 2004, p. 145.

③ *Foi et savoir, op. cit.*, p. 23.

④ Jacques Derrida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305.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焦头烂额 [特别是为了《友爱政治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这本我答应7月底完成的该死的书]。我不知道今年夏天我怎么能够做其他的，特别是关于宗教(的文章)!”<sup>①</sup>

这本“该死的书”——德里达将把它当成他希望完成的一本书的长篇序言——是“以《友爱政治学》为题的研讨课的第一堂”<sup>②</sup>的无限延伸。这个研讨课是在1988—1989年间进行的，就在德·曼事件之后及其后续中，尽管他从未直接提到此事。每堂课都以蒙田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开始：“啊，我的朋友，没有朋友。”在书里，每一章也重新以这句话为基础，以更好地引出他的诠释“或者让它转动起来，就像舞台装置围绕着自身转动”。从柏拉图到蒙田，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西塞罗到黑格尔，德里达把关于友谊的古典言论联系起来，使其言外之意得以显现。

578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里存在着一种哲学准则的霸权：它是怎样施加的？这力量从哪里来？它是怎样驱逐了女性或异性，女人之间或男女之间的友谊？为什么不能深刻地认识到友谊的女性或异性经验呢？在欲(*érôs*)与爱(*philia*)之间为什么有这样的异质性？<sup>③</sup>

关于友谊的传统论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归结到“家庭的，兄弟的，因而是男性中心的”政治格局，这正是德里达致力解构的：

为什么朋友如兄弟？让我们梦想这样一种友谊，超越这双重同属的密切性。超越亲属性，这最自然也正如最不自然的亲属性，当它从一开始就在姓上留下其签名，就像留在朋友和兄弟这一对概念的双重镜面之上。让我们问问自己这种“超越兄弟性原则”的政治会是怎样的。<sup>④</sup>

许多年过去，德里达一直保持着同乔治·康吉莱姆的联系。他从很久以前就退出了所有官方职位，有时自称是“退休的概念烹饪者”。德里达继续定期寄给他自己的作品，就像过去和今天他对友人所做的那样。1994年，康吉莱姆对他的忠诚表示感谢，但认为自己在他的路途上并不重要：“《友爱政治学》让我行动起来。因为这

① 德里达致菲拉里斯的信，1994年6月26日。

② *Politiques de l'amitié, Galilée, 1994, p. 11.*

③ *Ibid.*, p. 308 - 309.

④ *Ibid.*, p. 12.

是一部杰作。我想我能够评判您关于康德和尼采的见解。……我的惊讶在于发现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我赞赏您以简单的智慧使亚里士多德、蒙田和布朗肖并存。”<sup>①</sup>

※ ※ ※

579 1994年12月15日，卡特琳娜·玛拉布就她在德里达指导下完成的论文进行了答辩：《黑格尔的未来——时间性、可塑性、辩证法》。这是一部出色而大胆的论文，不惮就德里达对黑格尔的几点解读提出质疑。在答辩中，同惯常一样，德里达的发言持续了两个小时，非常出色，但其他的评委无法掩饰不快，有些似乎准备离开。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是玛拉布的朋友，她也在场。尽管希尔维亚一直是“实效的哲学”丛书的作者，但雅克和她在那段时期不再说话。“但答辩结束之后，”卡特琳娜·玛拉布回忆道，“他走近我们。他同希尔维亚说了几句话，问她丹尼尔怎么样，最后说：‘我每天为他祝福。’我们两人待在那里互相对视，目瞪口呆。”<sup>②</sup>

六个月前，希尔维亚同自1990年起共同生活的利奥奈尔·若斯潘结了婚。他十分喜爱丹尼尔，对之视如己出。德里达则没再见过孩子，除了完全偶然的一次。一天，在法国南部一个飞机场下飞机时，他认出了希尔维亚的妹妹索菲·阿加辛斯基及其丈夫让-马克·蒂博。雅克正准备同他们打招呼，这时一个男孩子跑来拥抱他们。毫无疑问，这只能是丹尼尔，他来姨妈家里度几天假：丹尼尔和雅克刚刚乘坐了同一架飞机而互不知情。德里达怅惘地转过身去。

580 岁月流逝，这段感情带给他越来越沉重的痛苦。他总是赞美秘密，却难以承担这个秘密。这也是他与萨拉·考夫曼关系冷淡的原因之一：她颇为饶舌，有时会在第三者面前提到雅克和希尔维亚过去的关系，并暗指丹尼尔。德里达对此无法忍受。大概他特别担心事情传到他在尼斯的家人耳中。他的另两个儿子知情很久，一直小心不对他说起。不过有一天，皮埃尔试图打破僵局：“我感到父亲应该对我和弟弟有负罪感，因此我提议与他单独见面。说了些别的事后，我对他说我知道丹尼尔的存在，对我他不必感到不安。他对我知道此事显得十分惊讶，但很快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对我说他不愿谈论此事。我只知道他不愿对丹尼尔作出任何举动，但如果孩子来找他的话，他会见的。他估计这不会发生：随着时间过去，他心目中的希尔维亚越来越负面，他怀疑她可能说他什么。……我明白没有必要再谈此事。父亲在许多

① 乔治·康吉莱姆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94年秋）。

② 同卡特琳娜·玛拉布的访谈。

事上十分开放和大胆，但他的性格里有些十分守旧的成分，让人无从置喙。所有与家庭有关的事尤其如此，狭义和广义的家庭都是如此。”<sup>①</sup>

※ ※ ※

有三起丧亡，其中两起是自尽，为这段时期刻下了痛苦的印记。

萨拉·考夫曼在1994年10月15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天是对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尼采的生日。几个月前，她发表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作品《奥德奈街，拉巴街》，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在占领下的童年，父亲的流放，她与母亲及救过她的女人的痛苦关系。尽管发表了许多重要的作品，萨拉·考夫曼的大学生涯却十分艰难，直到1991年她才被任命为索邦大学教师。

对德里达，和对许多人一样，萨拉一直是个叫人难以捉摸的朋友。从1983年就国际哲学学院有过活跃的信件往来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突然中断。随后是她没完没了的电话，雅克渐渐开始试着躲开，因为没有时间和耐心而把她推给玛格丽特和让-吕克。脆弱、孩子气、饱受折磨的萨拉·考夫曼容易把每件小事戏剧化。她对德里达的人和作品都极为热爱，并就他的作品写了一本优美的书。<sup>②</sup> 她对他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自主的要求。作为“实效的哲学”丛书四人组里唯一的女性，她感到没有得到其他三人足够的认可。

581

萨拉去世时德里达正在纽约，无法参加她的葬礼。在不久之后发表的致敬文章中，他并不试图掩饰他们关系的复杂性，回顾了“20多年温柔、紧张和暴风骤雨般的友谊，不可能的友谊”，并承认，直到最后他们“常常互相指责”。“不可能的，我们大概曾经对彼此就是这样的，萨拉和我。也许比对其他入、其他方式更加如此，用我无法叙述的各种方式。经过了这么多我们共同在场的场景，经过了这么多我们彼此引发的场景。”<sup>③</sup> 但他说这并不妨碍他对她如此深情，对她的作品如此敬佩，并请大家一读再读。

但这礼敬并不足以抹去某种不愉快：她最后的书，如此私密动情的《奥德奈街，拉巴街》寄给德里达后，他似乎没有作出回复。萨拉的伴侣亚历山大·克里特索斯难以接受德里达这篇萨拉身后所写的文章，觉得像是试图弥补什么。<sup>④</sup>

① 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② Sarah Kofman, *Lectures de Derrida*, Galilée, 1984.

③ Jacques Derrida, “Sarah Kofman”,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2003, p. 211.

④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阿德莱德·鲁索、弗朗索瓦斯·达斯图尔、克莱尔·南希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582 多年疾病缠身的吉尔·德勒兹于1995年11月4日自尽。从1950年代初他们在莫里斯·德·冈迪拉克家里结识后，德里达与他常常相遇，但总的来说对他了解很少。让-吕克·南希幻想让这两名一流的思想家对话，但从未能实现，其原因并非微不足道。德勒兹的悲剧性陨落加深了德里达很久以来的孤独感。他愈发觉得自己是幸存者，尤其是他每次都感到必须发言。他在《解放报》上发表的动人的致辞中写道：“每次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是不同寻常的，但是，从巴尔特到阿尔都塞，从福柯到德勒兹，它在同样的‘一代人’中间反复出现，就像一个系列——德勒兹也是探讨系列独特性的哲学家——对所有这些异常终结的奇特性能说些什么呢？”<sup>①</sup>

在《反俄狄浦斯》和关于尼采的瑟里斯研讨会时代，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关系并不简单，特别是德勒兹与福柯之间长期的友谊使事情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两位哲学家之间互相十分敬重，并存在着真正的哲学上的亲缘。德里达承认：

从一开始，他所有的书（但首先是《尼采》，《差异与重复》，《意的逻辑》）对我来说都不仅仅是对思想的强烈挑战，而且每次也是在“主题”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几乎完全相近亲和的经验，这是令人不安的，如此令人不安的经验，穿过我姑且称为写作、说话，也许是阅读的“姿态”、“策略”、“方式”上的太明显的距离。<sup>②</sup>

德勒兹在作品中很少提到德里达，但有时向他发出尊敬和默契的信号。特别是对德里达评论《安托南·阿尔托的素描与肖像》的文章《逼迫画布》更是如此。德勒兹告诉了他对这篇“精彩”文章的赞赏，说它抵达了“在阿尔托的作品中从未达到的境界”<sup>③</sup>。德里达在最后几年的研讨课中则数次回到德勒兹的作品——包括他与加塔里合著的《千高原》。就好像他们的对话只能在身后进行。

染病多年，年事已高的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于1995年12月25日逝世。他的陨落并不令人吃惊，但仍然深刻地触动了雅克·德里达。又一次，12月27日，在庞坛公墓，由他致词。

583 很久以来，这么久，我一直害怕要对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说永别。

① Jacques Derrida, “Gilles Deleuze”,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2003, p. 237.

② *Ibid.*, p. 236.

③ 吉尔·德勒兹致德里达的信，1987年2月3日。此信收入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328.



我知道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声音会颤抖，特别是当我大声地，在这里，面对他，在他身边，说出这道别的词，这个“致-上帝”的词<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我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个词，他教会了我用另外的方式思考和发出这个词。……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对谁说话？以谁的名义我们允许自己说话？常常，走向前来为了说话，为了当众说话的人，就这样中断了总是在内心深处同逝去的友人或大师的动情的低语、秘密或私下的交流；常常，这时在墓地公开说话的人，前来直接地、笔直地，向那个人说话，向人们说已经不在，已经不再活着，已经不在那里，将永远不会答复的那个人说话。<sup>②</sup>

这悲痛让德里达与保罗·利科接近起来，后者是第一个鼓励他阅读《整体与无限》的人。葬礼之后几天，利科告诉自己从前的弟子这次演讲多么令他感动：“请允许我前来与您分担我巨大的悲哀。您在列维纳斯面前，用他的名字埃玛纽埃尔，说出了应该说的话，我全部的思想都赞同的话。……但愿这位正义性的大师教给我们的正直能够继续使我们团结在一起。”<sup>③</sup>

一年之后，在索邦大学的黎世留阶梯教室，德里达以题为《迎接这个词》（“Le mot d'accueil”）的讲演开启了关于列维纳斯的研讨会。这是向始终伴随着他的这份思想致以有力而清醒的敬意，这思想在列维纳斯逝世后似乎对他更加重要。就好像德里达试图“超越列维纳斯”，在某种意义上接替他。无论他怀着怎样景仰的忠实和尊重，他都不愿让列维纳斯的去世剥夺了同其作品进行对话和讨论的权利。<sup>④</sup>

① 法文“永别”（adieu）一词可分解为“à”（致）和“Dieu”（上帝）两部分。——译注

② Jacques Derrida, *Adieu*, Galilée, 1997, p. 11-12.

③ 保罗·利科致德里达的信，1995年12月31日。利科将更加感动于1998年妻子西蒙娜去世后德里达写给他的信。

④ *Adieu*, *op. cit.*, p. 203.

## 第 30 章 德里达国际 (1996—1999)

584 在法国媒体上，德里达的身份渐渐改变，特别是他对政治的参与使他的形象更易于接近。1996年2月1日，《解放报》用双版面赞扬了他最近的著作：《抵制，绝境，宗教》（*Résistances, Apories, La religion*），还有他为塞尔日·马热尔（Serge Margel）的第一本书《手艺人上帝的坟墓》撰写的序《接近》。按语说：“精神分析、宗教、死亡的概念，没有什么逃得出德里达的思想，他会适时表现得如同造物主。”几个月后，在《世界报》上，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在一篇宏文中提到了《他者的单语主义》、《电视的回声书写》，还有研讨会论文集《文学的激情》的出版。他首先强调了其作品的规模，算出“34年出版了67本书，平均每年两本”。“在德里达的成果中有些奇迹般的东西：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时间似乎无法穷尽的慷慨。”德拉康帕涅对德里达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接受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喜爱，尽管在今天他和保罗·利科一道是法国思想在世界上最著名的代表。”他指出自己所认为的德里达作品的两个当前趋势：“自传的倾向，以及随着时光流逝日益明确的政治关怀”<sup>①</sup>。

585 “是的，我的书是政治的”<sup>②</sup>，德里达在一次同迪迪埃·埃里邦的访谈中承认。他在很长时间内迟疑于直接介入媒体，因为这个领地在他看来为那些现成思想的冠军们所侵占。“新哲学家”留下的伤痕仍然鲜活，正如他在晚期的一次采访中所解释的：

---

① 载《世界报》，1996年11月15日。

② 载《新观察家》，1996年2月21日。

如果想迅速变成媒体人物，就必须简单化，黑白分明，抛开遗产，不受概念的困扰。……问题的模糊性——因为这是我希望明了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年轻人常常为了好的、正当的理由而行动，特别是人权。这一代人总的来说常常为可尊敬的事业而斗争，但让人感到他们在利用而不是服务于这事业。<sup>①</sup>

尽管有些时候，他的立场同这些“新哲学家”并无根本不同，德里达还是很难接受把自己的名字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不过他在晚期承认，如果说“在知识界和媒体界之间的这种渗透性是充分法国化的现象”的话，发表言论对于公共空间和民主可以成为一件好事，只要不去“指手画脚”，不被“自我推销的渺小自恋，轻飘飘的煽动或出版界的庸俗胃口传染”<sup>②</sup>。

面对报刊，他的态度仍然带几分不信任，除了对少数几家视为“友人”的报纸。同《解放报》，特别是同罗贝尔·马焦利的关系变得十分友好。对《世界报》，德里达仍然持守势，部分是因为同罗日-波尔·德鲁瓦的复杂关系，部分是因为《书籍》副刊的主编若斯亚娜·萨维纽（Josyane Savigneau）同菲利普·索莱尔斯过从甚密。尽管他在高师的前学生多米尼克·东布勒的到来有助于缓和关系，他仍然抱着不信任态度。东布勒回忆道：“同布尔迪厄一样，德里达是个‘难对付的狗’。一开始，他玩着采访的游戏，乐于即兴讲话。但随后他又希望结果像一篇真正的文章，这对报刊来说很困难。他难以忍受字数的限制。最起码的删减在他看来就等于查禁。”<sup>③</sup>

586

德里达最终适应了拍照，后来承认说他拒绝被拍照的心态也掩饰了一种“矫情的卖弄”和同自己形象的一种“纠结的关系”<sup>④</sup>。今后对他来说，问题转移了。问题变成：是否要上电视？他从未得到《呼语》节目的邀请，但即使受邀也肯定会拒绝。1996年2月，在与巴黎八大的学生见面时，他说很欣赏帕特里克·莫迪阿诺（Patrick Modiano）在电视节目里做嘉宾时的态度：“他成功地让人在他找不到恰当的话时耐心等待。……这个人成功地改造了公众舞台，使之屈从于他的节奏。”<sup>⑤</sup>

两个月之后，劳尔·阿德勒（Laure Adler）在整整一期《午夜圈子》节目里对德

① “Si je peux faire plus qu'une phrase...”, entretien avec Jacques Derrida, *Les Inrockuptibles* n° 435, 31 mars 2004, p. 27-28.

② *Ibid.*, p. 27.

③ 同多米尼克·东布勒的访谈。杰弗雷·德·拉加斯纳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在《大学帝国——论布尔迪厄、知识分子和新闻业》（*L'Empire de l'Université. Sur Bourdieu,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journalisme*）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④ *Les Inrockuptibles* n° 435, 31 mars 2004, p. 28.

⑤ 《一位哲学家的肖像：雅克·德里达》，1996年2月26日在奥德翁剧院同巴黎八大学生见面的谈话记录，收入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1997, p. 27.

里达进行了访谈。除了同萨尔曼·拉什迪和皮埃尔·布尔迪厄一起在 Arte 电视台上那次短暂而糟糕的露面外，这是他从 1982 年 1 月 2 日布拉格归来后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电视上。德里达接受了阿德勒的邀请，因为他认识并欣赏她，还因为他能够在最质朴的背景下同她讨论这面对面的过程。弗朗索瓦丝·吉鲁 (Françoise Giroud) 在《新观察家》专栏中称赞了这次节目，同时对播出时间表示惋惜：

雅克·德里达出现在凌晨一点的节目，这是多么糟糕的安排！劳尔·阿德勒会同意我们这么说的。她的“午夜圈子”常常很有趣，但她的受众必然是有限的。而德里达来了……他从不露面，从不发言……在法国以外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就这样异乎寻常地同意出面，这是纯粹的奇迹。闻所未闻的自由表达，新鲜的思想，大胆踩出的新路……前所未有。太棒了。<sup>①</sup>

587 但还需要好几年才能再有这样的经历。在三年前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一系列访谈记录形成的书《电视的回声书写》里，德里达强调指出电视在结构上对作家和知识分子话语所施加的改变：

只要对我们说：“嗨！开始！”，竞赛便开始了。人们开始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讲话，不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几乎完全不再思考……同词语的关系，其抵达或抵达的方式都改变了，你们很清楚。……

每天上电视的知识人也许能更快地忘记这种虚假性的效果，而我，在这里，我深受其苦。我指的是过程、停滞、中止、暂停。当录制过程开始时，我便被抑制、瘫痪、中止，我“临场发挥”，不再思考，不再像别处那样说话。<sup>②</sup>

有趣的巧合：1996 年底，与《电视的回声书写》同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论电视》出版。社会学家在其中进行了与德里达相当接近的分析，但更加激进，更具战斗性。<sup>③</sup>

※ ※ ※

德里达一面对新的领域敞开，一面仍然保留着许多从前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

---

① 载《新观察家》，1996 年 4 月 23 日。

② Jacques Derrida et Bernard Stiegler, *Échographies—de la télévision*, op. cit., p. 81–82.

③ Pierre Bourdieu, *Sur la télévision*, Liber—Raisons d’agir, 1996.

在著名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第一次阿尔托素描作品大型展览《安托南·阿尔托。纸上作品》时，他欣然同意发表演讲。在1996年10月16日发表的讲话中，他想再次走近这位自称“阿尔托莫莫”（Artaud le Mómo）的人。但他也“对这一奇特事件进行了思考，即1996年在纽约大都市——及世界——最大的博物馆机构之一举办阿尔托作品展览这一事件”。不幸的是，博物馆负责人认为德里达选择的题目《阿尔托莫玛》（Artaud le Moma）<sup>①</sup>不够“像样或体面”。因此在宣布他的演讲时并未提到真正的标题：“雅克·德里达……将发表关于阿尔托素描的演讲。”<sup>②</sup>

就在这次演讲时，德里达认识了塞尔日·马娄塞纳（Serge Malausséna），他是阿尔托的侄子，也是其遗产继承人。1986年在迦里玛和施迈尔-莫塞尔（Schirmer-Mosel）出版的《素描与肖像》引发了一场严重诉讼，使两人多年对立。塞尔日·马娄塞纳也通过指定中止了迦里玛出版社《全集》第26卷的出版。他们的关系因此不仅仅是冲突而已。但这第一次同塞尔日·马娄塞纳的接触是友好的。德里达震惊地发现阿尔托与他的侄子之间外表惊人的相像，而且后者对其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热爱。马娄塞纳也很赞赏他的演讲。

他回忆道：“雅克·德里达在我看来是个充满魅力和出色的人，但我们的关系因为宝洛·泰弗南而恶化了。从这次在纽约见面起，特别是在巴黎一次长时间面谈时，我对他讲述了我的故事：宝洛·泰弗南是如何就在安托南·阿尔托逝世当天抢走了文件、手册和画作，搬空了他的屋子；她是如何在几年间把它们藏在这人或那人的家里，被问起时就说到某些神秘的收藏家……我的说明让德里达很尴尬：‘我从没在这个视角下看事情’，他对我说。但他总是强调对宝洛·泰弗南欠下的情。因为她死于1993年，他大概感到自己更需要对她保持忠诚。”<sup>③</sup>

他们第二次见面几个月之后，德里达给马娄塞纳写信说他希望在出版《阿尔托·莫玛》时复制一些阿尔托的画作，“大部分用小尺寸，彩色”<sup>④</sup>，继承人同意了。2002年看到样书时，马娄塞纳说吃惊地看到德里达在最终版本里加上的一个注释，其中对宝洛·泰弗南表达了强烈的敬意。马娄塞纳给他写信说，与流言相反，他从未反对过出版阿尔托的作品，但他想抗议的是印行未出版的手册的“错误的版本”，他说那些手册被宝洛·泰弗南“糟蹋”了。“将手稿把持半个世纪之久，这使其把持

① Moma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缩写，也暗指阿尔托作品《阿尔托莫莫》[Artaud le Mómo : mómo是阿尔托自创的词，指涉丰富，有小孩（môme）、疯子、钱、糖果、木乃伊化等义]。——译注

② Jacques Derrida, *Artaud le Moma*, Galilée, 2002, p. 11-12.

③ 同塞尔日·马娄塞纳的访谈。欲了解这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可参见 Florence de Mère-dieu, *L’Affaire Artaud. Journal ethnographique*, Fayard, 2009.

④ 德里达致塞尔日·马娄塞纳的信，1998年3月14日。

者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控制，对阿尔托从未托付给她的作品拥有绝对权力。”他说很高兴看到新一代研究者终于能够安宁地工作，“而不遭受阿尔托掠夺者的专制和压力”，并在信尾对德里达扮演的角色表示了更直接的质疑：“我突兀的坦率丝毫不能减低我对您的敬意。我只想说明您自诩为记忆的大牧师，却将一个终生如独裁者的人极端神圣化。”<sup>①</sup>

分歧深刻而无法解决，德里达只能采取行动。他对这条注释对安托南·阿尔托的侄子造成伤害感到遗憾，同意在校样上作出改动。

至于宝洛·泰弗南，我不能也不愿介入这样深入的辩论（这在一封信中将过于困难），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不可能否认她的工作对我的帮助，她对我解读阿尔托的帮助，她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我就阿尔托写些小文的（漫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关注的友谊。您很清楚。因此，每次在最后修订自己的文字时说出宝洛·泰弗南的名字，这是我认为应该遵循的尊重与忠诚的行动。我希望，尽管存在许多分歧，您能理解我为何作出这样的举动。<sup>②</sup>

德里达本人在《丧钟》时代同宝洛·泰弗南曾有过矛盾——还有热内对他讲的话——这本来应该让他不那么无条件地维护她。但同保罗·德·曼一样，宝洛·泰弗南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因而变得不可触犯。<sup>③</sup>

---

① 塞尔日·马娄塞纳致德里达的信，2002年2月8日。

② 德里达致塞尔日·马娄塞纳的信，2002年2月16日。

③ 在德里达生命的最后几周，当厚重的阿尔托作品集在“Quarto”丛书中出版时，阿尔托事件出现了新的反复。艾芙琳·格洛斯曼酝酿、介绍并注释了这部作品集。她在前些年同德里达十分接近，对他进行了好几次访谈，并主持了《欧洲》杂志关于他的专刊；他们甚至开始一起设想在“Quarto”丛书里出版有关他的一本书。但2004年9月14日，已经住院的德里达给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发了一封传真，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这封传真由他人打出来，上面有许多他手改的痕迹：“亲爱的莫里斯·纳多 / 当我将《阿尔托·莫玛》一书题献给宝洛·泰弗南时，这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个人的感谢。我是为了赞扬这位众所周知几乎一生研究、解读和编辑阿尔托作品的女士。迦里玛先生应当是了解此事的第一人。 / 然而，今天，在初次阅读之下我大为吃惊地发现‘Quarto’丛书的阿尔托作品集不遗余力地（可以举出上千个例子）抹去了宝洛·泰弗南的名字和工作，甚至她动人的肖像。我猜测这无法形容的恶行是阿尔托的侄子的强加的，他对宝洛·泰弗南的憎恨广为人知。 / 我确信我将不会是唯一的人，要求迦里玛先生做出解释，特别是对如此严重、骇人、悲伤的不公正行为进行补偿。”

艾芙琳·格洛斯曼因为自己的工作受到质疑而深受伤害，她用一篇采访做出了回应，糟糕的是，采访刊登于2004年10月16日的《文学半月刊》上，就在德里达逝世后几天。她在其中特别宣布：“我没有丝毫加入论战的意愿（特别是同雅克·德里达，我了解他对宝洛·泰弗南的友谊和忠诚），但我无法阻止自己在宝洛·泰弗南与阿尔托作品的关系中发现了太多的受难、牺牲与祭祀感。我并不否认激情和受难的必要性……但在我看来这丝毫不意味着读者应该守着这种对作品的直接表面的接受而对阿尔托五体投地地认同。”



对媒体十分警惕的雅克·德里达有时也会落入其他陷阱。美国著名爵士乐手奥奈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热爱哲学，很久以来就幻想着与解构之父见面。他在1997年6月底来到巴黎时，安排了一次见面，并由 *Les Inrockuptibles* 杂志进行了记录。谈话十分友好，奥奈特·科尔曼邀请德里达在几天之后自己在拉维莱特爵士节的演奏会上发表讲话。德里达为这个提议吸引和感动，立即表示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舞台产生了兴趣。虽然玛格丽特建议他谨慎，他还是没有预感到这环境同他所习惯的有多么不同。

7月1日晚，没有任何介绍，德里达突然出现在舞台上，面对黑压压的观众席，在爵士乐伴奏下开始朗读他刚刚写好的文字：

发生了什么？What's happening？What's going to happen, Ornette, now, right now？<sup>①</sup>

对我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同奥奈特·科尔曼在一起？With you？谁？真的需要即兴创作吗？需要很好地即兴创造。我知道奥奈特会叫我到身边来，今晚，当我们在上周整整一个下午会面时他这样对我说。这个机会让我害怕，我完全不知道将发生什么。很需要即兴创作，需要即兴创作，但要做得很好，这已经是一堂音乐课，your lesson，奥奈特，它扰乱了我们关于即兴创作的古老思想——我甚至相信你有时会认为这种即兴创作的古老而天真的想法是“种族主义的”。<sup>②</sup>

《世界报》记者被征服了：“哲学家的语调具有自然的音乐性，用词也是如此。萨克斯手加入了这话语。很美。”但德里达的文章同平时一样很长。起哄声很快响起。鼓噪的只是上千名观众中的几十个，但已足够打破和谐。喊叫声爆发了：“够了！”“闭嘴！”“下去！”有人发出嘘声，有人鼓掌。受辱的德里达不得不在读完文章之前离开舞台。希尔万·希克里耶（Sylvain Siclier）说：“他缺的是什么？是萨克斯手对哲学家的介绍，一句解释。……奥奈特·科尔曼的想法也许过于矫情，也许与音乐会的进程过于隔阂。”<sup>③</sup>

① 英文原文如此，意为：“在发生什么？什么将要发生，奥奈特，现在，此刻？/和你？/你的课”。

② Jacques Derrida “Joue-le prénom”, *Les Inrockuptibles* n° 115, 20 août 1997, p. 41. 这期杂志里还有奥奈特和德里达谈话的记录，以及提耶里·儒斯（Thierry Jousse）讲述拉维莱特事件的文章。

③ 希尔万·希克里耶的文章，载《世界报》，1997年7月3日。

十天之后，在瑟里斯-拉萨勒城堡，德里达重新找回了他完全熟悉的听众。就他的作品举办第三次研讨会的想法早在1993年就由艾迪特·埃尔贡和让·理夏杜提出。德里达很快被这个想法吸引，只是希望会议日程别像前两届那么紧张，那么“不人道”<sup>①</sup>。会议的主持工作再次交给了玛丽-路易丝·马莱，会议题目则既开放又玄妙地命名为《自传的动物》。

德里达的发言开始于1997年7月15日，他的生日，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大部分时间。“我逼着他们听了12个小时的讲演！”<sup>②</sup>他不无自豪地给友人卡特琳娜·玛拉布写道。但这次没有一个人抗议，正相反。由于他没有时间像他希望的那样讨论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与会者甚至提议他在会议的最后一晚就此主题作即兴发言。<sup>③</sup>

动物的问题对他一直是个“大问题，最具决定性的问题”。他从这个角度重读自己的作品，肯定地说已经“成千次涉及它，或直接或间接，通过阅读所有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家”<sup>④</sup>。但在瑟里斯的发言《故我所是的那个动物》里，他从一个十分具体的角度，从一次个人的经验开始：

我常常自问，我，为了看看我是谁——我是谁，就在那样的时刻，赤裸的我惊讶地发现，沉默中，在一个动物的注视之下，例如一只猫的眼睛，我很难，是的，很难克服我的困窘。

为什么会有这不安？

我很难抑制一种羞耻心的冲动。很难克制心中对不体面的反抗。对可能的失礼的反抗，当自己赤裸着，暴露着性器，一丝不挂面对一只猫，它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只是看着。这样一个赤裸的动物面对着另一个动物的失礼，不妨称为动物的失礼：独特的，无可比拟的体验，真正赤裸地出现，面对着动物坚持的目光，善意或无情的目光，惊奇或感激的目光。通灵者，幻想者，或超常清醒的盲者的目光。就好像那时我耻于在猫面前赤裸，但也耻于感到羞耻。……

我应该立即说明，我说的猫是一只真实的猫，真的，相信我，一只小猫。而非猫的形象。它悄然进入房间，并非为了寓示地球上所有的猫，穿越神话和宗教，文学和寓言的猫。<sup>⑤</sup>

① 德里达致埃尔贡的信，1993年5月9日。

② 德里达致卡特琳娜·玛拉布的信，1997年8月18日。

③ 同玛丽-路易丝·马莱的访谈。

④ Jacques Derrida, *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Galilée, 2006, p. 57.

⑤ *Ibid*, p. 18-20.



瑟里斯的十天研讨会对德里达而言从来就不仅仅是发言和随后的讨论。有些“更加感性、更加坚决、更加内心的东西，难以言说，难以思想”，存在于“那些密谈，在可称为往来路径之地，瑟里斯的侧道和反道，私下里的会面和交谈，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还有永远不会汇集或发表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得研讨会成为无可比拟的“思想的经验”<sup>①</sup>。

他又一次因这些丰富、安详和热情的日子感到十分幸福。他对会址的负责人重申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十天太奇妙了，真正“妙不可言”，再一次多亏了您。我不仅是以自己的名义这么说。这是所有人的感受，他们依依不舍，眼含泪水……对我来说是更个人的感受，您可以想象我将被赐予奇特的，那么美好又那么令人不安的运气——一种忧虑的羞怯感让我不能像应该的那样说出来，但我肯定您理解我……当然“回归”总是困难的。<sup>②</sup>

根据米歇尔·德基的说法，应该将德里达作品的演变大致视为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即“德里达国际”。“在他生命的最后15到20年，他周围有30多人致力于让解构照遍全球：教师、大学科系负责人、杂志与出版社主编、研讨会和致敬文章的组织者。他们的名字随着时间多少有些变化，但许多忠实者一直都在。只要看看各届瑟里斯研讨会名单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译者是最重要的接力者：德里达的作品由亲近他的人翻译，他们因为热爱其作品并得以同他对话而进行翻译。”<sup>③</sup>

594

从1960年代末起，美国当然成为主要的领地。在那里，他的在场始终最为强大；一大部分的世界性传播从那里完成。从1995年起，由于《马克思的幽灵》、《法的力量》和《档案之殇》三部作品迅速成为经典，他在美国激起了新的热情。尽管当人们说在他作品内部出现了政治转向或种族转向时，德里达表现出些许恼火，但不可否认，新的主题正在浮现：正义、见证、好客性、宽恕、伪誓……没有像在维特根斯坦或海德格尔那里的真正断裂，但很难不看到一系列的转变和滑动。德·曼事件大概促使他走出了自己的保留态度。

① Jacques Derrida, “Le modèle philosophique d’une ‘contre-institution’”, in *Un siècle de rencontres intellectuelles* ; Pontigny, Cerisy, *op. cit.*, p. 251.

② 德里达致埃尔贡的明信片，1997年8月1日。

③ 同德基的访谈。

我只是尝试着坚持继续一种思想，它很久以来一直沿着同样的绝路前行。伦理、权利或政治问题并非像从某个弯道贸然出现。而且思考它的方式并不总能令一种“道德”安心——也许因为这个问题对它要求太高。<sup>①</sup>

法兰西理论和解构的胜利有时也有弊端。德里达好像成了自己思想的牺牲品，有时也被指责过于保守和不够介入。阿维塔尔·若奈尔指出：“他是男性、白人、引诱者、哲学家：这些潜在的污点可以使他被归到传统权力一边。他变成了自己的归类，自己反对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斗争的牺牲品。”从这个角度看，他同几位激进女性的联盟成为一张珍贵的王牌。<sup>②</sup>

595 在纽约大学的最后几年里，若奈尔和德里达一起上研讨课。她先对这堂课进行介绍，回顾上一堂，并补充一些参照。雅克讲解之后，她再接过来提出一些问题，激发讨论。她讲道：“在别的任何地方，德里达都是他研讨课的唯一主人。但在纽约大学，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嘉宾，他也接受我的风格。情况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十分不同，在那里他重新讲述在高等研究学校的研讨课。在纽约，他的课则是新的内容，而且他的言论十分开放。有一年，他用了一个简单的词‘宽恕’（Forgiveness）作为题目；我不太喜欢，改成了‘暴力与宽恕’（Violence and Forgiveness）。当我们在研讨课开始前见面时，我对他解释说改了题目，说单纯的‘宽恕’这个词在英文中不能成立。他很不高兴：‘可是，阿维塔尔，您怎能不问我就做出决定呢？这不可能。’但开始上课时，他将情况调转，解释说‘暴力’一词不可或缺。他说是我，阿维塔尔，想要删掉这个词，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不思考暴力就不能思考宽恕。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味。我于是只能向听众解释为什么我想要删掉这个词。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向对方犯下了暴力行为，但这让我们能够前进并产生思想……最后几年，他感到我‘在他的左边’超过了他，这让他有些紧张。一天，他对我说我的激进对于解构变得很危险。他说在他那里，他总是冒着‘权衡过的’风险。我回答说这样的权衡是不可能的。但他有时会表现出真正恐慌的一面。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在行李中带我的书《毒品战争》[*Crack Wars*（法文是 *Addict*）] 过海关。他说他会被当作贩毒者被捕——而我的确出生在布拉格！——而且这类出版物会毁了他的美国生涯。他有时对我说：‘不管怎样他们会让我承担责任，

① Jacques Derrida,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306.

② 例如 Nancy J. Holland 主编的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Jacques Derrid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说这一切都来源于我！”<sup>①</sup>

※ ※ ※

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日益频繁，对他的翻译也越来越多。当法国报刊过于强调他在美国的影响力时，德里达并不掩饰他的恼火。正如他从克拉科夫给多米尼克·东布勒所写的：

我旅行很多，但我并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美国人”，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而且总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外省式的：“您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他在外国很有名”；另一层则是傲慢的：“您看，美国人就是对他感兴趣，不知道他们在他那里发现了什么”。而且两种潜台词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sup>②</sup>

1990年代，德里达在许多国家进行过讲演，他之前从未去过这些国家，有时是因为没有好的对话者，但更经常的是出于政治原因。

通常我只去“民主化”进程刚刚开始的国家。例如我直到1990年后才第一次去东欧国家（除了1973年去过布达佩斯——但匈牙利是个例外，还有1981年去过布拉格——但那次是秘密的，而且以被捕告终）。其他“年轻”民主国家的“第一次”：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南非。<sup>③</sup>

同样，他在1990年苏联解体时第一次去了莫斯科。1994年他又去了一次，还有圣彼得堡。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德里达其人及其作品激发了强烈的兴趣。他的译者娜塔莉亚·阿弗托诺莫娃（Natalia Avtonomova）讲述道：

在这里，德里达既“作为他本人”，也作为当代法国哲学——目前唯一在世——的代表而出现。这激起了巨大的兴趣。人们询问他是谁，在被赋予的种种形象之外：是颠覆了所有价值观还是建立了新价值观的人，是个流行明星还是严肃的研究者？记者们的异想天开——赞美的，咒骂的，但从不是无动于衷

597

①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东布勒的信，1997年12月10日。

③ 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1999, p. 233.

的——恰是他广受欢迎的另一面。因此，男士杂志 *Medved* 告诉读者他爱好什么样的领带或者饮食，而后苏联时代的文学领袖们则吹嘘自己同“大师”的密切关系。德里达响亮的名字回荡在学生们的歌里，所有人都把“解构”挂在嘴上。……

德里达在莫斯科的两次停留让莫斯科公众十分激动。想想吧，看看一位有血有肉的“经典大师”，而且不是随便哪一位：是维护马克思的经典大师，就在人们像对待一只受伤的狮子那样从四面八方对马克思踢上一脚的时候！<sup>①</sup>

通过动人的《侧道》一书，我们得以紧密跟随他在这段时期的几次旅行。书的完成多亏了雅克·德里达寄给卡特琳娜·玛拉布的长信。

1997年2月，他第一次抵达印度，进行了多场讲演和访谈；在加尔各答，“解构大师”为书展揭幕；在孟买和新德里，他受到凯旋般的欢迎。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德里达去了都柏林、巴尔的摩、维拉诺瓦、蒙特利尔、马德里、伊斯坦布尔、特里堡、图灵、比萨、伦敦、布莱顿、波尔图。别忘了他还如往年一样在尔湾和纽约逗留。1997年12月9到14日，他第一次前往波兰，在卡托维兹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并在克拉科夫和華沙发表了两次演讲。“我去了奥斯威辛，但不在这里说了”<sup>②</sup>，他写道。随后他几乎立刻去往雅典，在那里从12月18号待到21号。

1998年1月5日，他去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他已有十年没有回到以色列，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在特拉维夫进行过一次讲演和一场“相对平静”的辩论之后，598 他和西蒙·佩雷斯（Shimon Pérès）进行了一次长谈。第二天早晨，忠实于巴勒斯坦朋友的他出发去了拉马拉（Ramallah），并在比尔泽特（Birzeit）大学发表演讲。<sup>③</sup>这一年的其他时间也并不平静。特别在1998年夏，他在南非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讲演《宽恕：不可宽恕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吸引了大量听众。<sup>④</sup>他第一次会见了一直敬仰的政治人物曼德拉，并称深深为新南非的组成所吸引，认为它高度民主且极为现代。

※ ※ ※

友人萨法·法蒂（Safaa Fathy）在1998和1999年拍摄了一部以他为主题的电

---

① Natalia Avtonomova, “Paradoxes de la réception de Derrida en Russie”, in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400 - 401.

②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33.

③ *Ibid*, p. 259.

④ 这次讲演的文章——德里达这些年最常做的讲演之一，每次针对他所在的国家加以调整——收入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541 - 560. 关于同样的主题，参见“*Versöhnung, ubuntu, pardon: quel genre*”, in *Vérité, réconciliation, réparation*, Seuil, coll. “Le genre humain”, 2004, p. 111 - 159.

影，名为《别处的德里达》（*D'ailleurs Derrida*），将在 Arte 电视台播放，旅行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她拍下了他在法国和美国，还有西班牙南部的情景，在令人想起他童年的风景中。她也去了阿尔及利亚，但因为安全原因，德里达没能陪同拍摄小组同去。影片毫无说教，只将所有地点不加说明地叠加，伴随着阿拉伯—安达卢斯音乐。

德里达多少乐于参与人们提议的表演。他常常带着不自在的神情，有些做作。在与这部记录片同时完成的书《转动词汇。在一部电影边缘》中，他对自己变身“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拷问，尽管他只是扮演自己：

我从未如此妥协过。但也从未有过如此让我担忧，如此拙劣的妥协，痛苦地完全不懂得讨好，只是无法说“不”，无法穷尽我一直在培养的“不”的资源。

我从未如此被动，实际上我从未如此任人指挥。我怎能如此不慎地任由自己被震惊到这个地步？而从一开始，我就十分警惕，至少我相信如此，我提醒自己要十分警惕——小心这种不慎或意料之外的情形（摄影，即兴采访，即兴安排，摄像机，话筒，甚至公共空间，等等）。<sup>①</sup>

在随后的几年间，萨法·法蒂将继续在各种场合拍摄德里达，如演讲或当众发言，试图构建一份视听记忆档案，以补充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资料。这位女电影人无处不在，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哲学家，不惮惹恼许多他身边的人。就好像同影像的关系最终逆转，就好像德里达从对摄影的激烈拒绝转向了几乎不间断的影像记录；多样的踪迹大概也是一种抹去踪迹的形式。

※ ※ ※

同旅行和影像一样，出版物也不断增加。德里达最欣赏伽利略出版社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按照适合自己的节奏出书。有时是大部头，但通常是小书，收入一两篇讲演。他承担这种碎片的形式。很久以来他就确信无法再撰写“一部伟大的哲学机器”，而更愿意采纳一系列“短小的侧面的随笔写作”。面对传统的哲学概念，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本能感觉到危险的苍蝇”，他在一次同让-吕克·南希的辩论中这么说。“我总是条件反射似的要逃跑，似乎只要命名这些概念，只要一接触它们，我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et Safaa Fathy, *Tourner les mots. Au bord d'un film*, Galilée/Arte éditions, 2000, p. 73.

就会像个苍蝇一样脚爪被粘住：被俘获、瘫痪、成为人质，陷于一种计划。”<sup>①</sup>

德里达越来越像作家那样看待自己，他的思想越来越难以同他的叙述分开。如果说他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法国作者之一的話，他首先是一个语言天才，他承认对这种语言有着“焦虑、嫉妒和饱受折磨的爱”。他在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谈话中将自己的态度同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或德勒兹更加安详的态度相比，说感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经由与法语的近身肉搏，热烈而关键的肉搏”，“我敢于宣称在  
600 ‘法语’和我之间……还将有更多的爱。疯狂的爱，如果您愿意的话。嫉妒的爱，相互嫉妒的爱，如果这看起来不是太不合常理的话。”<sup>②</sup>

他对语言的爱和对写作的激情使他与埃莱娜·西克苏十分接近。1998年，他们合著了《面纱》：德里达的文章《蚕》在西克苏的《知识》开篇几页之后展开。这是她第一次在伽利略出版，后者将成为她主要的出版社。

同年，应米莱耶·卡勒-格鲁伯之邀，他在瑟里斯研讨会《埃莱娜·西克苏，作品的交汇》上发表了长篇开幕演讲，题目很美：《H. C. 为了生命，亦即……》。他在各个意义上，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发掘了这个题目，颂扬了两人在35年间彼此的友谊、仰慕和阅读。<sup>③</sup>

我不能做得更多，除了用虚线勾勒或预言我幻想给予您的无尽的讲演或无尽的心声。我希望能够为了这个机会，致埃莱娜，或者为了向埃莱娜致敬，发明一种新的体裁，给这体裁一个新的名字，超越所有的差异，或毋宁说游戏于所有的差异，在忏悔的吐露心声的低语和哲学或理论或批评或诗学话语的权威性之间的差异，诗艺（poïétique）是个献给瑟里斯的组词，游弋于心声、信任和讲演之间。<sup>④</sup>

埃莱娜·西克苏投桃报李，写了两本关于德里达的优美的书：2001年的《作为年轻犹太圣徒的雅克·德里达》和2006年的《坚持——致雅克·德里达》。<sup>⑤</sup> 在最后

---

① “Responsabilité du sens à venir”, débat entre Jacques Derrida et Jean-Luc Nancy, in *Sens en tous sens, autour des travaux de Jean-Luc Nancy*, Galilée, 2004.

② 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 op. cit., p. 30-31.

③ 在法语中，“心声”（confidence）、“信任”（confiance）和“讲演”（conférence）是三个形态与发音相近的词。——译注

④ Jacques Derrida, *H. C. pour la vie, c'est à dire...*, Galilée, 2002, p. 20.

⑤ 两本书都由伽利略出版。亦可参见 *L'Événement comme écriture, Cixous et Derrida se lisant*, Actes d'un colloque de 2005 dirigé par Marta Segarra, Éditions Campagne-Première, 2001.

的几年，他们多次对话并共同发言。“我们在各自生涯的开始相识。雅克有时想，如果我们两个都作为作家，或者都作为哲学家，是否还能够有同样的契合。他倾向于认为不能。我则确信相反。对我，无论怎样，他就是彻底的作家。”<sup>①</sup>

※ ※ ※

“太初有言”，德里达在同埃莱娜·西克苏最后的几次对话中承认。“既是命名又是词语。就好像在写作之前我什么都不想：我为法语如此丰富的、我尚未发现的源泉感到惊讶，我于是用它成就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计划好的，但早已因为词汇与句法的丰富而变为可能。”<sup>②</sup>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仰慕的弗朗西斯·蓬热一样，德里达也有“对《里特雷》的虔诚，这是一种世俗的和游戏的宗教”<sup>③</sup>。因为词源学游戏对他并不是对一种先在的真理的探寻；它首先是发明，并让“语言扩展”。

像“脚步/不”(pas)、“驻留/住所”(demeure)、“帷幕/面纱”(voile)这样的词，德里达能够使之成为整篇文章的出发点，以多种方式游戏其中，赞美其全部的源泉。

指引我的始终是不可翻译性：句子永远要借助于习语，而翻译只能令其丧失。然而，表面的悖论是，译者要比法国人更对我的文字感兴趣，他们试图在他们的语言中重新发明我刚刚描述的经验。<sup>④</sup>

德里达是如此热爱法语，他不断地想使之更加丰富。“他给予了我们新的、活跃的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激烈而富于诗性）”<sup>⑤</sup>，罗兰·巴尔特早在1972年就指出。德里达喜欢讲述这个故事：在延异(différance)一词收入小罗伯特词典后不久，阿维塔尔·若奈尔在雅克的母亲面前提起此事，把它当成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乔吉特·萨法尔带着不赞成的神气转向儿子问道：“可是杰基，你真的在差异(différence)这个词里用了‘a’？”

随着时间过去，他笔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让他母亲之外的许多人也惊讶不已。在一本小书《雅克·德里达的词汇》里，夏尔·拉蒙(Charles Ramond)统计

① 同埃莱娜·西克苏的访谈。

② “Du mot à la vie: un dialogue entre Jacques Derrida et Hélène Cixous”,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 430, avril 2004, p. 26.

③ Jacques Derrida, *Déplier Ponge*, entretien avec Gérard Faras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5, p. 15.

④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 430, avril 2004, p. 26 - 27.

⑤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n° 1429, 29 mars 1972.

并分析了几十个这样津津有味制造出来的新词和组合词。<sup>①</sup>有些转瞬即逝，有些则成为标志：无目的地（*adestination*）、原文字（*archi-écriture*）、到达（*arrivance*）、秘密目的地（*clandestination*）、目的流连（*destinerrance*）、剥夺占有（*exappropriation*）、萦绕学（*hantologie*）、传媒逻辑（*médiagogique*）、世界拉丁化（*mondialatinisation*）、余留（*restance*）、收缩结构（*stricture*）……

句法亦不例外。传统的哲学写作模式一再被超越。在这一方面，德里达的演变可与弗朗西斯·蓬热相比，后者从《采取事物的立场》的极端简洁与密集一直到《松林笔记》或《肥皂》的千变万化。这使得词语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在那里“文字总是跟随着声音。内在或外在地，它总是使自己或发现自己置身舞台”<sup>②</sup>。

阅读他晚期作品的时候，读者必须接受这一点，即任凭自己被一种特殊的呼吸所裹挟。德里达的句子更接近乔伊斯而不是普鲁斯特，它们似乎不确定地缠绕着自身，随后突然前行。<sup>③</sup>1996年的文本《驻留，雅典》（*Demeure, Athènes*）很能说明这一点。全书围绕着一句不厌其烦重复的句子展开：“我们对死亡负有责任（Nous nous devons à la mort）。”就好像德里达不断追随的就是它，而且只是它，一边佯作回顾让-弗朗索瓦·博诺姆（Jean-François Bonhomme）的一系列摄影作品。

不知从哪里浮现，那个句子不再属于我。而且它也从来不曾是我的，我还不感到要为它负责。它瞬间跌落在公共领地，穿越了我。它经过我，它说从我这里路过。我变成了它的人质，而不是它的主/客人，我应该为它提供好客性，是的，保证它的安全，我确实有责任保护它，保护它每个字的救赎，对各个字母相连接的免疫性负责。但同样的债务和同样的义务也教会我不夺走它，不夺走这完整的句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像对待有我签名的句子那样去掠夺它，而且它始终是无法获取的。<sup>④</sup>

603 读者首先感觉到一个仿佛无限延伸的长句。但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短句，间隔分

① Charles Ramond, *Le Vocabulaire de Jacques Derrida*, Ellipses, 2001. Jean-Pierre Moussaron 就德里达创造的新词写了一篇漂亮的文章“L'esprit de la lettre”, in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363-371.

②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 430, avril 2004, p. 22.

③ 我的分析在有些地方同下面两位作者可相印证：Cornelius Crowley, “Un rapport sur le mode du non-rapport: James et Derrida”, in *Derrida d'ici, Derrida de là, op. cit.*, p. 87-108, ainsi que celle de J. Hillis Miller, “The late Derrida”, in *For Derrida*,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Athènes*, photographies de Jean-François Bonhomme, Galilée, 2009, p. 14-15.



明，但又随着细微的重复和移动发展，一边不断返回同样的音节 (-sable/-table/-nable)，发出同样的词 (otage/hôte/hospitalité; garder/sauve/sauvegarder)，甚至显得凝滞不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地中海式的句子，伴随着隐秘的波涛，几乎难以觉察的浪潮的运动。通过一系列潜在的、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缓慢的改变，通过令人恼火或着迷的差异与重复的游戏，德里达渐渐将我们带上他沉思的路途。诗就在那里，十分接近，同哲学不可分割。

就好像一样东西，这对债务的认可，一样简单的失落在世间的东西，但已经到期，我应该不去拿取而将它保管好。把它库存，寄存——寄存于照相制版。这义务，这最初的负债，同这不恰当的宣言“我们对死亡负有责任” (nous nous devons à la mort) 里的这个动词有什么关系呢？同这句话表面上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不是“我们致死相互负有责任” (nous nous devons à mort)，不是“我们均应死亡” (nous nous devons la mort)，而是“我们对死亡负有责任” (nous nous devons à la mort)。

谁是死亡？[在哪里找它？在法语里有这样奇特的说法，找到死亡 (*trouver la mort*) ——便意味着死去。]<sup>①</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Athènes*, photographies de Jean-François Bonhomme, Galilée, 2009, p. 15.

# 第 31 章 对话的时代

## (2000—2002)

604 2000年1月，一部重要的新作由伽利略出版。《触感：让-吕克·南希》（*Le toucher, Jean-Luc Nancy*）首先像一件物品：同一切传统的哲学著作规范相去甚远，它共有350页，正方形开本，有大量版式变化；还附有一系列西蒙·昂塔伊（Simon Hantai）的绘画，名为“阅读的工作”。像通常对待一本深奥的书那样，米歇尔·德洛姆表现出爱书癖，为初版的129册附了一幅版画。

此书最早的简短得多的版本于1992年应佩吉·卡穆夫的提议在美国《段落》杂志的一期专刊里出版，但最终主要的部分于1998年9月到1999年9月写成。在大洋洲的旅行期间，德里达在墨尔本的一间旅馆房间里进行了最后润色。

这本书奇特的标题可能会推开许多潜在的读者，让他们觉得必须事先十分了解南希的作品。的确，德里达首先想要“勾勒出最初的运动”以向让-吕克·南希致敬，也向其作品所构成的“伟大事件”致敬。<sup>①</sup>但在南希之外，德里达在这里再次采取了他放弃许久的现象学方法，即围绕着“触感”这一始终困扰着他的线索和题目  
605 展开写作。因此实际上至少有两本书合二为一。也许还有更多，像德里达在插页中所承认的：

首先是异质的结构。执着于巴洛克或浪漫主义类别的人们自会判断（从不放弃任何东西的哲学+正统哲学史+系统的计划+类别目录——但也是虚构+幻想+叙述+传记+括号+题外话+心声+私人通信+计划+未遵守的承诺）。<sup>②</sup>

---

① Jacques Derrida, *Le toucher, Jean-Luc Nancy, op. cit.*, prière d'insérer de l'ouvrage.

② *Ibid.*

围绕着触觉的主题，德里达阐发了一系列相关的“切线”，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维纳斯，还有他从未提到过的作者如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拉韦松（Ravaisson）、让-路易·克里廷（Jean-Louis Chrétien）和其他几人，最后回到让-吕克·南希。德里达一直提醒读者，大部分哲学传统更强调视觉，不过他在此稍稍调整了自己的立场：

直觉，意味着目光；直觉主义，即认为目光和直接的视觉可直达真理的思想。……我在写作这本关于触觉的书和在重读所有这些文本的时候发现，从柏拉图以来存在着一种更加强有力的传统，使目光臣服于触觉，使直觉主义成为直接性、直接的接触、持续性、充实性和在场的经验，因为相对于视觉本身，触觉获得了更多在场的特权。当时我说的是一种触觉中心的直觉主义，这在我渺小的历程中构成了一个变化，因为对直觉主义的解构早从一开始就在进行，但它直接指向的更多是视觉而不是触觉。我于是最终以另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这一切。<sup>①</sup>

希利斯·米勒震惊于此书的独特性，认为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解释道：“通常，德里达等到友人故去才就他们写作。他们在他们逝后立刻或很快就开始书写。在几乎所有这些致敬的文字，特别是关于列维纳斯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种双重的运动：他指出他们的重要性，但同时将其置于或重新置于他们的位置。因而每一次，在结构上，都是由他来作出最后定论。而《触感》的情况完全特殊。德里达已经开始写作一篇长文，而这时让-吕克·南希在等待供移植的心脏，因此处于死亡的危险。但幸好南希幸存下来了，几乎可以说他复活了。德里达几年之后重拾他的文章，并给予其可观的规模。这是他发表的唯一这样的书，他讨论的作者还在世。南希因此得以就基督教的解构问题在《不要触摸我》（*Noli me tangere*）的一个注中作出了回复。甚至可以说是他作出了最后的定论。德里达指责他仍然过于基督教。南希反驳说德里达仍然过于拉比。”<sup>②</sup>

606

但让-吕克·南希深深震动于这样的礼敬，他衡量着此书的价值，从友谊的角度，也从其表现出的对他作品的极度关注。“如遭雷击……我从云端跌落，发现了这个标题，然后是这本书。我相信当时我对雅克说：我惊讶无语，这太多了。不错，关于友谊没有‘太多’，为此我深为感动。但在他的分析中有着如此强大的智识和质

<sup>①</sup> “La décision, la fiction, la présence”, *Revue ah !, Oui la philosophie*, É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2005, p. 173.

<sup>②</sup>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

607 询的力量，我对自己说：我不应该再提及触觉。因为必须认识到我从未如此将触觉作为主题论述过，或几乎没有过。雅克以惊人的方式阅读了大量文本，其中这一主题从侧面显现出来。他甚至捕捉到‘触觉’一词的形而上用法。他重拾自己已经或再次进行的大量阅读，将之汇集于这本属于他的关于触觉的书。另外，我清楚地感觉到他是怎样指出了我几乎落入的陷阱——如他所说的一种‘触觉中心主义’。如果说我避免了这个陷阱的话，那是因为我未曾将之作为主题论述，而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警觉。他在这本书里也给我上了一课。您应该知道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说，对自己/除了我（à part moi）<sup>①</sup>，让-吕克·南希是关于触觉的最伟大的哲学家。’雅克应该对这句有歧义的话暗自发笑：‘我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或者‘我对自己说，除了我——谁实际上是最伟大的’。最后，我还记住了这本书的结尾：‘没有拯救的救赎，即将来临的救赎。’‘救赎’，作为见面或告别时的呼语<sup>②</sup>，在这里成了一个概念：这令人赞叹，我常常想到它。”<sup>③</sup>

※ ※ ※

春天，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和雅克·德里达投入后来题为《明天会怎样……》的对话录。这个想法是在一次晚餐时由鲁迪奈斯库的伴侣、法亚尔出版社当时的副总编奥利维耶·贝图尔内（Olivier Bétourné）提出的。他惊讶于他们关于时事、伦理和政治的不间断的讨论，确信这样一部作品将极具兴味，并可助新的读者进入德里达的作品。

608 谈话记录于2000年5月20和23日之间，正值勒诺·加缪（Renaud Camus）事件高潮。<sup>④</sup>鲁迪奈斯库回忆道：“第二天晚上，克洛德·朗兹曼给我们打电话，他抛出一份强烈反对加缪的抗议书，要求德里达签名。他们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德里达对里面提到的“罪恶的”说法感到不安，但最终还是同意签名。当时的这场辩论

① “à part”可以有双重含义：“单独的，在心里”或“除了某人”；南希下面的话即针对此模糊性。——译注

② 法语“salut”一词是口语中见面或分手时打招呼的用语，也有基督教“救赎”之意。——译注

③ 同让-吕克·南希的访谈。

④ 勒诺·加缪2000年春在法亚尔出版了1984年的日记，题为《法国的运动》（*La Campagne de France*），其中特别有这样的段落：“参与法国文化电台《总揽》（Panorama）节目的犹太人还是有些过分：一方面，每次节目中他们大概占五分之四，或六分之四，或七分五之五的分量，这在一个国家几乎是官方的电台里明显超额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人种或宗教群体；另一方面，他们使得至少每周有一次节目有关犹太文化，犹太宗教，犹太作家，以色列国家及其政治，法国和世界、今天或历史上的犹太人生活。”这一段，还有其他一些时经删节或改造的段落，激起了相当大规模的论战，而出版界的影响力之争更使之升级。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和小些的层面上的雅克·德里达都曾是此事件中的重要角色，该事件在《明天会怎样……》中数次提到。

让我们的书增加了整整一章，题为《即将来临的反犹太主义》。”<sup>①</sup>

死刑是另一个纠缠着德里达的主题，他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并从1999年秋天开始作为他研讨课的主题。对大量相关哲学文本进行反复阅读之后，他的思考以惊讶开始：

为了简省地讨论，我要从很久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对我来说一直最具说明性、最令人惊愕、本身也最荒谬的事情说起：就我所知，从没有任何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在其系统的哲学言论中，从没有任何一种作为哲学的哲学，质疑过死刑的合法性。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卢梭到康德（后者大概是其中最严谨的），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而且有时不无遮掩和歉疚（卢梭），明确地采取了支持死刑的立场。<sup>②</sup>

2000年夏初，精神分析大会在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勒内·马若尔的倡议下，向德里达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对这些伦理—政治问题加以阐发。7月10日晚，在索邦大学大阶梯教室，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精神分析师，他提出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人是唯一享受以恶对恶的生物？德里达延伸了弗洛伊德关于死亡冲动的思考，称精神分析是“唯一这样的话语体系，还能够将心理残暴性归于其考察的范围之内”<sup>③</sup>。

在没有任何神学或其他借口的情况下，精神分析便会转向心理残暴大概最本来的特点。对于为了受苦而受苦，为了恶而作恶或任由作恶的问题，总之对于根本的恶或比根本的恶更糟的恶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再抛给宗教或形而上学，就没有任何学科准备对残暴这个命题感兴趣——除了被称为精神分析的东西。<sup>④</sup>

德里达认为，精神分析“尚未着手，因此远远未能成功地思考、进入和改变伦理、司法及政治公理”<sup>⑤</sup>。他想要赋予它新的角色，超越对个体痛苦的治疗，如果它希望还能在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世界里保持理论合理性的话。德里达确信：“将来的启蒙”应该考虑到无意识的逻辑。这尤其隐含了要回答一个在他眼中至关重要却

① 同鲁迪奈斯库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et Élisabeth 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op. cit., p. 235-236.

③ Jacques Derrida, *États d'âme 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2000, p. 12.

④ *Ibid.*, p. 13.

⑤ *Ibid.*, p. 21.

罕有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从不落脚于广阔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土壤？”<sup>①</sup>第二年的“9·11”事件将令这些质询更加迫切。



眼下，他关心的是一个更私人的问题。雅克从来不太喜欢过生日。2000年7月15日他70岁的生日更让他恼火。他十分消沉，而且一反常规，服用了大量镇静剂。<sup>②</sup>9月1日，他对马科斯·热奈夫吐露：“我比以往更被年龄和‘去老龄’的欲望所折磨。……您看，70岁，简直是地狱。”<sup>③</sup>但这并不妨碍他连续几小时在地中海游泳。

这个生日再次激起了雅克对自己档案的关注。其中一大部分已经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但他有时会惋惜没有在法国留下任何东西。当代出版资料馆(IMEC)是1988年在出版界的研究者和专业人员倡议下成立的收集资料的机构。在许多已收编的资料中(塞林纳、杜拉斯、巴尔特、福柯……)，有两位作者尤其令德里达感兴趣：阿尔都塞和热内。正如著名的热内专家、资料馆的负责人之一阿尔贝·迪奇(Albert Dichy)所讲：“1991年，阿尔都塞的友人们对《未来长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包括埃蒂安娜·巴里巴尔在内的好几个人认为不宜出版此书。德里达是少数认为此书应该出版的人之一。在这个敏感的行动中，他秘密地支持了我们。”<sup>④</sup>

1997年10月底，他们有好感的作家协会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第二天，资料馆长奥利维耶·科尔佩(Olivier Corpet)再次向德里达提出考虑合作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取出已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朗松图书馆的资料。但新的档案可以交给当代出版资料馆。许多与他工作相关的资料将对研究者大有裨益。在德里达看来，当代出版资料馆的优势还在于它的独立性：同瑟里斯一样，这也是他热爱的“反体制”机构之一。

1997年底，科尔佩和德里达在里斯-奥朗吉斯再次见面，开始具体考虑合作方式。几个月之后，科尔佩写信说他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会见档案的负责人。“见面的话许多事情都可以‘安排’，因为，您知道，当代出版资料馆时刻准备进行对话，因为我们急于建立信任和深入的合作关系。”<sup>⑤</sup>旅行在随后的春天成行，合作关系于1999年6月具体确定。

---

① Jacques Derrida, *États d'âme 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2000, p. 41 - 42.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和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访谈。

③ 德里达致马科斯·热奈夫的信，2000年9月1日。

④ 同阿尔贝·迪奇的访谈。

⑤ 奥利维耶·科尔佩致德里达的信，1998年3月20日。

德里达希望把与法国有关的通信原件——这些远远不是最多的——保存在当代出版资料馆，与美国和其他的国际交流相关信件原件则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同已经存放在那里的手稿和资料放在一起。双方预定交换复印件以便利研究者的工作。一切看来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2002年1月15日，科尔佩和德里达签署了个人档案存放合同。但将信件搬走的过程则很艰难。阿尔贝·迪奇回忆道：“他打开一份文件夹，取出一封信，对我讲几句当时的背景。他在很长时间里幻想着重读自己所有的信件；他意识到不会这么做了……当最早的信件装满了第一批纸箱后，他围着汽车转圈子。他抓住我的手臂：‘您知道，您带走的是我的生命……您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仍然忧虑地看着远去的车子。他显得垂垂老矣。70岁生日对他影响很大。”<sup>①</sup>

611

※ ※ ※

年龄渐长，死亡的念头越发缠绕着他。他似乎想要接近一些过去的对手。1999年10月，在纽约，他在共同的朋友季奥瓦纳·巴拉多利（Giovanna Barradori）那里又见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这次的不期而遇中，哈贝马斯带着“微笑的善意”向德里达提议进行交谈，后者立即接受：“是时候了，”他补充道，“别等到太晚了。”他们不久即在巴黎见面。在一次友好的午餐中，哈贝马斯竭力“以楷模般的公正态度抹去从前论战的痕迹”，这使德里达将一直对他感激不尽。<sup>②</sup>

两人12年来一直不和，因为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里有两章对德里达做出了“不公正和匆忙的”评论，后者在《记忆：致保罗·德·曼》和《有限公司》里作出了强烈回应。随后，虽然德里达和哈贝马斯保持沉默，但仍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这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它大概促人思考，……但也……损害了许多学生，他们被迫选择自己的‘阵营’，其学术生涯有时亦被迫中断”<sup>③</sup>。对德里达，与哈贝马斯的冲突并非没有后果：从1980年代中起，他无法进入最重要的德国出版社，他的作品在德语界的影响因此深受其害。

他们首先在政治领域相接近。即使在不和的年代，他们也曾签署过同样的请愿书和宣言。德里达在为自己从前对手的75岁生日所写的优美祝词中承认：“在许多场合，对哈贝马斯关于德国本身以及德国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论辩立场，我始终怀

612

① 同阿尔贝·迪奇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Unsere Redlichk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 18 juin 2004.

③ *Ibid.*

有同感和赞叹的钦佩。”<sup>①</sup>

从2000年起，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法兰克福就权利、伦理和政治的哲学问题举办了共同的研讨课。亚历山大·加尔西亚·迪特曼还记得这一“和解”在两位哲学家的弟子中间播下的混乱。“他们的接近让我恼火。在哲学上，他们互相没有什么话说。但在政治上，他们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也不应低估策略上的考虑。德里达在有些方面立场分明，但有时也是个灵活的谈判家。他可以根据情况表现得激进或妥协，勇敢或机巧。”<sup>②</sup>阿维塔尔·若奈尔也证实，这一阶段颇让他们的友人不安：“关于大人物及其弟子，以及在他们周围结合或分开的人，可以写出完整的故事。小群体们正在争斗不休，突然间他们的领袖提出暂停，就好像在某个黑手党组织里。”<sup>③</sup>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同哈贝马斯和解使德里达很快找回了他在德国丢失的地位。好几篇对他有利的文章出现在德国报刊上。许多翻译和再版的计划问世了。但其他因素也有助于打开局势。德里达的一位忠实友人维纳·哈马舍留美多年之后于1998年回到法兰克福执教，不久请他发表演讲《无条件的大学》。德里达借此机会又见到了伯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别和贝尔纳·斯蒂格勒混淆，他几年前曾在巴黎听过德里达的研讨课，现在一家大出版社苏尔坎普担任重要职务。阿多诺奖将很快标志着同德国的和解。



2000年12月3到5日，在约瑟夫·科昂（Joseph Cohen）和拉法尔·扎古里-奥利的倡议下，在巴黎社区中心举办了国际研讨会“犹太性：致雅克·德里达的问题”。哈贝马斯出席并发言，同时还有埃莱娜·西克苏、卡特琳娜·玛拉布、让-吕克·南希、吉尔·阿尼德加（Gil Anidjar）和吉亚尼·瓦蒂莫。

德里达对一切社群主义一直抱着含糊和多少有些距离的立场。但不管怎样，从1991年的《割礼忏悔录》和1996年的《他者的单语主义》开始，犹太性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前沿位置。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并未丧失任何复杂性，正如他在讲演一开始就承认的：

很久以来，从很早开始，面对这几天的题目，我颤抖过，我仍然在颤抖……这场表面上主要关于我的研讨会从未令我如此胆怯、忧虑、窘迫，甚至感到可能产生严重的误解，让人忘记这一点，即我感觉到了，而且将永远感觉

---

① Jacques Derrida, “Unsere Redlichkeit”, *Frankfurter Rundschau*, 18 juin 2004.

② 同迪特曼的访谈。

③ Avital Ronell, *American Philo*, *op. cit.*, p. 179 - 180.



到，我谈论这个话题时处在多么不恰当的位置，不恰当的，偏离的，与这些问题相类似的一切距离很远。……这样的问题的确应该对我提出，而且注定指向我，坐在教室后面的我吗？<sup>①</sup>

“如何回答？”他这样问自己，随后试着解释他一直以来的沉默或至少是保留的态度。“这是不断展开并概括了我所有生命转折的悖论，就好像我必须留住犹太教，才能留住我暂且命名为犹太性的东西”。德里达强调，他拒绝“宣扬一种社团的，甚至是民族的，或者特别是国家—民族的一致性”，并且拒绝“作为犹太人采取立场”<sup>②</sup>。

我实际上很难说出“我们”，但我有时会这么说。尽管就此有那许多折磨我的问题，例如以色列采取的灾难性的和自杀性的政策，还有某种犹太复国主义，尽管有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同我的“犹太性”相关的问题，但我将永远不否认这犹太性。在一些情形下我总是会说“我们犹太人”。这饱受折磨的“我们”处在我思想最焦虑的核心，我勉强带着微笑把拥有这思想的人称为“最后一个犹太人”。<sup>③</sup>

614

他在《割礼忏悔录》发表后不久接受伊丽莎白·韦伯的访谈中已经指出了他立场的复杂性：感到既“不够是犹太人”又“太是犹太人”，必须“试着去思想这无法控制的矛盾的逻辑”<sup>④</sup>。许多人相信他受到犹太法典的影响，甚至在他身上看出某种惊慌的犹太法典学者的影子，德里达则不断重申他的犹太文化是多么有限。

人们可以开玩笑地自问，一个人怎能受到他所不了解的东西的影响呢？我并不排斥它。比如我十分遗憾自己不了解犹太法典，但也许它了解我，它在我身上了解自己。一种无意识，不是吗？可以想象存在着许多矛盾的轨迹。很不幸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在阿尔及尔的童年过于殖民化，过于去根源化。在那里，也许部分是出于我的错误，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的犹太文化。<sup>⑤</sup>

① Jacques Derrida, “Abraham, l’autre”, in *Judéités. Questions pour Jacques Derrida*, Galilée, 2003, p. 16.

② *Ibid.*

③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entretien avec Jean Birnbaum, *op. cit.*, p. 40-41.

④ “Un témoignage donné”, in *Questions au judaïsme, entretiens avec Elisabeth Weber*, Desclée de Brouwer, 1996, p. 77.

⑤ *Points de suspension*, *op. cit.*, p. 85.

这一切使得德里达越来越认同于“marrane”的形象。这个轻蔑的词在西班牙语里是“猪”的同义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用来指代改教的犹太人及其后代。他们被迫弃绝自己的宗教，但仍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但由于是秘密，他们有时也会将之彻底忘却。德里达便有点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犹太性：“可以把我所说的一切解释成似乎属于犹太教的最好传统，但同时又好像一种绝对的背叛。我应该承认：这恰恰是我的感受。”<sup>①</sup>

615 2001年，德里达的旅行尤为频繁，这过度的动荡有时使他忧郁。4月，他从佛罗里达给卡特琳娜·玛拉布写信，第二天他要从那里出发去洛杉矶。他说不久在蒙彼利埃附近的卡斯特里城堡有一个研讨会，随后是北京、上海、香港、法兰克福，然后又是美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疑惑，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为什么做这一切？”有时，绝望从四面八方袭来，“如同毒堇一般”<sup>②</sup>在他身体里奔涌。但他仍然在整个夏天紧张工作，校订秋天将出版的三本书——《明天会怎样》、《无条件的大学》，还有巨著《纸机器》，同时准备阿多诺奖的获奖演说和9月份将在中国举行的讲演。

中国之旅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筹划，但政治风波使之搁浅。此后德里达有7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大部分从英文版翻译，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德里达希望在当地找到好的对话者，在更好的基础上重新推动事情的进展。出发之前，他的老朋友毕仰高给了他一些实际的建议，并向他保证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将愿意听他讨论死刑<sup>③</sup>。德里达本希望在其他城市也探讨这个问题，但为了避免与东道主产生公开的危机，他同意不作为他讲演的直接主题，但他仍会在可能的时候提到它。

616 他的第一次讲演在9月4日发表于北京大学，主题是《宽恕：不可宽恕的和无时效约束的》。接下来，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和香港的行程中又进行了两次讲演，好幾次研讨会和许多次访谈。德里达惊诧于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酒店的气派，以及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触目可及的大规模工地。旅行的条件极佳；他几乎像国家元首一样受到接待，每一步路都被拍照。大领主一般的主人们很快宣称“德里达的全部著作”都将翻译成中文。

不可预知的事突然发生，将一切倾覆。德里达感到“9·11”事件就像“对个人

---

① *Confessions et Circonfession*, table ronde avec Richard Kearney, in *Des confessions*, Stock, 2007, p. 83.

② 德里达致卡特琳娜·玛拉布的信，2001年4月14日。

③ 毕仰高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2001年夏）。

的打击”。在上海，他几乎整夜守在电视机前。

那是晚上，我正同朋友们在一间咖啡馆，老板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我赶快回到酒店，从最早的电视画面开始——是CNN的画面，我要说明——就很容易预测这将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成为……一起“重要事件”。……就我所能感知的，中国在最初的几天试图限制事件的影响，就好像这只是一起局部事件。<sup>①</sup>

第二天，德里达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中一开始就提到“我们所有人刚刚经历的十分严重的时刻”，“让我们昨夜无眠的悲剧”。“这一事件预兆着世界历史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还很难预计其后果。”<sup>②</sup>几天后他在香港发表的题为《世界化和死刑》的讲演被认为是他最近20年来最为出色和最为激情的演说，但他的心和思想都已经在纽约，他将于几天之后到达，那里他有那么多朋友。刚刚发生的震惊全球的灾难将成为他重要的思想源泉，并突然间赶走了他的忧郁。他从香港给卡特琳娜·玛拉布写道：

这次旅行将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我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拖着“痛”，它让我几乎总是难以活在我所在之地（对我来说这就是和我一起“旅行”）——特别是因为世贸大厦的倒塌，这个20年来以许多方式让我珍爱的地方，我曾希望带您前去，同您一起在第130层观看纽约最美的景色。<sup>③</sup> 617

去美国之前，他还得在法兰克福停留，接受9月22日的阿多诺奖，这大概是他获得过的最重要的奖励。该奖1977年由法兰克福市为纪念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家特奥多尔·阿多诺而设，每三年一次，表彰以法兰克福学派精神穿越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德里达之前有过哈贝马斯，但也有过皮埃尔·布列兹和让-吕克·戈达尔。

他用德语宣读了这篇出色的题为《围巾/完蛋》（“Fichus”）的讲演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他更多地向沃尔特·本雅明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提到后者命运中最悲剧的

① Jacques Derrida et Jürgen Habermas, *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 *op. cit.*, p. 164-165.

② Ning Zhang, “Jacques Derrida’s First Visit to China: A Summary of His Lectures and Seminars”,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décembre 2002, vol. 2, n° 1, p. 145.

③ 德里达致卡特琳娜·玛拉布的信，2001年9月17日。

时刻之一。

作为这谦卑简朴的谢词的题名，请允许我首先阅读沃尔特·本雅明的一句话，一天，夜里，他在梦呓，用法语。在一封1939年10月12日从被关押的涅夫勒写的信中，他用法语将这梦呓告知了葛雷特·阿多诺（Gretel Adorno）。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法国称为“自愿劳动营”。按照本雅明的话，这是个欢愉的梦，他在梦里用法语说：“需要把诗歌变成 fichu。”<sup>①</sup>

本雅明也是最关注翻译问题的作家之一，同他一样，德里达喜欢嬉戏于这个字的源泉，并以各种方式将之翻转。

618 我将不追踪“fichu”这个奇异的字的种种派生和用法。它在指名词或形容词时表示不同的意思。这个“fichu”，即本雅明句子中最表面的意思，指围巾，即女人匆忙中围在头上或脖子上的一块布。但作为形容词的“fichu”则指代恶：坏的，失败的，倒霉的。1970年9月的一天，看到死亡临近，我生病的父亲对我说：“我完了。”<sup>②</sup>

但德里达所有的心思都转向“9·11”，因此他对几周前精心准备的讲话进行了补充。特别是随着小布什（George W. Bush）试图进行政治报复，事态越发严重。

我对“9·11”事件受害者的绝对同情并不能阻止我这么说：在这场罪行中，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在政治上是无辜的。如果说我对所有无辜的牺牲者怀有无限同情的话，那是因为这同情并不限于“9·11”事件中在美国失去生命的人。这就是我对人们从昨天起根据白官的指令所称的“无限正义”（*infinite justice*, *grenzenlose Gerechtigkeit*）的理解：不为自己的错误和自己政策的失误辩解，哪怕是在为此付出超过所有可能范围的最可怕代价的时刻。<sup>③</sup>

雅克·德里达几乎立即离开赶往纽约。在这充满焦虑和恐惧的时候，曾经历飞机恐惧症的他没有一刻想到取消自己的约定。同许多其他友人一样，阿维塔尔·若

---

① Jacques Derrida, *Fichus*, Galilée, 2002, p. 10.

② *Ibid.*, p. 36.

③ *Ibid.*, p. 52.

奈尔对他的到来非常感动：“我认识的美国人对雅克怀着深深的感激。他立刻来看望我们，而大多数人都取消了预定的旅行。其他人感到害怕，这可以理解。人们害怕新的攻击，空气中弥漫着真正的毒性，让人很不舒服。但他来安慰我们，对我们讲话，为我们分析情况。他去了世贸大厦遗址。雅克对美国政治可以表现得十分严厉，但他对美国人民，特别是纽约人保持着忠诚。”<sup>①</sup>

9月26日到达纽约的德里达震惊于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爱国主义热潮。到处国旗飘扬，到处呈现着作为美国人的骄傲，有点像刚刚重新建国。预计在维拉诺瓦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于2001年9月27到29日举行，主题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割礼忏悔录》，但即便围绕着这个主题，对当前事件的指涉也无处不在。随后他去往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讲演，在那里他希望而且必须仔细斟酌每个词。

619

※ ※ ※

在纽约，在他们共同的朋友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家里，德里达高兴地再次见到了哈贝马斯。他们两人都感到身为欧洲人应该发言谨慎，哪怕是同美国的知识人，这使他们更加接近。

与《9·11的“概念”》（*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这本书的封面可能引起的联想不同，此书并不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构思的，甚至也不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全书由一个共同的友人吉奥瓦纳·博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编纂，她分别同两位哲学家进行了长篇访谈并加以介绍和分析。此书首先出版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标题为《恐怖时代的哲学》。在法国出版时德里达提议采用新的标题，想要“在引号的警示下，提请人们注意很难就仅以一个日期‘9·11’命名的‘东西’形成概念”<sup>②</sup>。

德里达到达三周后，2001年10月22日在纽约录制了对他的采访。在这样的时刻，不可能、而且几乎不允许“谈论任何事而不迎合形势，而不在根本上越来越盲目地援引这个日子”<sup>③</sup>。尽管事件带来可怕的压力，德里达仍然坚持一种微妙的立场，哪怕这样做会惹恼一些美国读者。放弃复杂性对他将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恶劣行径”<sup>④</sup>，就好像要求他屈服和被奴役。

人们可以做到无条件地谴责恐怖主义行动（无论其是否国家行为）而不拒 620

①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et Jürgen Habermas, *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 *op. cit.*, 封底。

③ *Ibid.*, p. 135.

④ Jacques Derrida,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op. cit.*, p. 30-31.

绝承认使之产生的环境，如果说不是使之合法化的环境的话。……

人们可以做到无条件地批评“9·11”的杀戮，就像我在这里所做的，而不拒绝考虑使之成为可能的真实的或假设的条件。在世界上，所有策划这场杀戮或企图为其辩护的人都认为这是对美国及其同盟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回应。<sup>①</sup>

然而，不掩藏矛盾与悖论的意愿丝毫不妨碍德里达采取鲜明的立场：

在这场匿名的暴行中，如果我必须在一个二元的框架中做出决定的话，我将选择立场。无论我对美国乃至欧洲的政策，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抱有怎样彻底的保留态度，无论如何，无论所有事实上的背叛，无论这些“联盟”国家建立的并直到某种程度支持的民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有怎样的过失，我仍将采取立场，站在这个阵营里，因为它在原则上，在法律上，以“政治”的名义，以民主、国际法、国际组织等等的名义，向未来完美的前景敞开。<sup>②</sup>

“9·11”事件使得好几年来缠绕着他的一个概念更显重要，即自身免疫的概念。1994年，在卡普里举行的宗教研讨会上，他第一次谈到这个概念：“自身免疫的过程，就是……生物体的奇特行为，即以几乎是自杀的方式，尽力‘自己’毁掉本来的功能，潜入并对抗自己‘本来的’免疫性。”<sup>③</sup> 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这种自身免疫的逻辑让步。即便是为了回应最坏的情况，民主也不能放弃其立身之本。

※ ※ ※

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的对话录《明天会怎样……》经过两位作者重要的修订之后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在法国出版。此书由法亚尔和伽利略共同出版，印数相当大，说明两家出版社期望值很高。但社长克洛德·迪朗（Claude Durand）仍然指责鲁迪奈斯库和德里达想要用这本书“使法亚尔不稳定”。18个月前加缪事件时巴黎出版界的论战远未结束，就连政治事件也不足以使之平息。<sup>④</sup>

报刊对此书表示热烈欢迎。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在《世界报》上赞扬此书是对德里达思想的“最好介绍”。菲利普·佩蒂（Philippe Petit）在《玛丽亚娜》上

① Jacques Derrida et Jürgen Habermas, *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 op. cit.*, p. 161.

② *Ibid.*, p. 169.

③ *Ibid.*, p. 45.

④ 同鲁迪奈斯库的访谈。

写道：“终于出现了，不那么深奥的德里达”；这位“自身即构成一个大陆，一份良心，一份记忆，一个新时代的改教者”的哲学家，这次同意“对最广大的人群敞开”。只有以弗朗索瓦·布斯奈尔（François Busnel）为代表的《观点》杂志认为这是一场“缺席的约会”：“这是两个老伙伴在火边的谈话，他们并不在乎读者的期待”。最好的评语大概来自雷吉斯·德布雷致德里达的一封信：“《明天会怎样……》使每个人可以评估自己的矛盾、倾向或反感。……随着这本对话录，许多人可以清醒地同您站在一起或离开您。”<sup>①</sup>

此书比德里达的其他作品销量都好——大开本大约1.8万册，它在法国并未获得本应有的“成功”。法亚尔出版社本来期望更高，但此书的推出因“9·11”事件和德里达长时间的不在场而推迟。直到11月份他才能同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一起在几个广播电视节目和几家书店的见面会上露面。但同德里达的其他著作一样，成功与否只能在国际层面上衡量：《明天会怎样……》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

※ ※ ※

这本书大量谈论政治问题，加上“9·11”事件的背景，使另一场论战被激活。一些人将德里达视为“坏犹太人”，因为他从与热内结交起就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他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许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变。他1988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讲演中就说过：他的态度“不仅仅源于正义感和对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人民的友谊。它也想表达对未来的希望和对某种以色列形象的尊重”<sup>②</sup>。

622

在给《浩劫》的作者，同时也是《现代》杂志主编克洛德·朗兹曼的一封长信中，德里达也许最好地表述了他对此问题的观点。2001年秋季号上的一篇罗贝尔·勒德克（Robert Redeker）的文章令他深受冲击；特别是作者在其中肯定地说，“9·11”事件以来，“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左派犹太恐惧症复活的现象。……人们不再抑制对以色列的仇恨，这使受害者——美国人——变成了罪人，同时也减轻了真正的罪犯（某些伊斯兰国家培养或支持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责任”<sup>③</sup>。

德里达写给朗兹曼的信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他1961年就《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① 雷吉斯·德布雷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2001年秋）。

② Jacques Derrida, “Interpretations at War”,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t. II,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Galilée, 2003, p. 250.

③ Robert Redeker, “De New York à Gaillac: trajet d'une épidémie logo-toxique”, *Les Temps modernes*, n° 615-616, sep-oct-nov 2001. 勒德克是哲学教授，他后来在2006年9月19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自由论坛，题为《面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恐吓，自由世界该怎么做？》。这篇文章为他带来了死亡的威胁，并将成为一场重要论战的核心。可参见：[http://fr.wikipedia.org/wiki/Robert\\_Redeker](http://fr.wikipedia.org/wiki/Robert_Redeker)。

人》写给皮埃尔·诺拉的信。德里达向朗兹曼重申对他的全部友谊。没有这友谊，他不会费心给他写信，因为他不会每次读到令他愤慨的东西时都提出抗议。但这篇文章因为其发表的刊物和其中的一些严厉指责而令他震惊。德里达尤其拒绝勒德克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在萨布拉（Sabra）和夏提拉（Chatila），是阿拉伯人在屠杀阿拉伯人”。他意欲避免这种混淆一切的说法，并借机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信念：

623

别以为我批判性的警惕是单方面的。它对于反犹太主义以及某种反以色列主义也同样强烈，对于某些中东国家，甚至巴勒斯坦当局……的某些政策也同样强烈，当然更不必说“恐怖主义”。但我相信我的责任是从“形势”本身出发表明态度：作为“法国公民”的我将公开对法国政治表示更大的批评性的关注，而不是对世界尽头的另一个国家。我这名“犹太人”，如果说对以色列的敌人的政策也抱有批评态度的话，那么我更坚持表达的是我在面对以色列政策时的忧虑，这种政策使得它理应代表的人们的救赎与形象处于危险当中。<sup>①</sup>

德里达继续说，按照许多言论，“只要对以色列政策……甚至对某种美国政策和某种以色列政策的某种联合表示最微小的保留，就应该感到有罪，或者被认为有罪”。

罪名至少有四：反以色列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犹太恐惧症（你知道，这是最近变得很时髦的概念，就此应该有很多话要说）——更不必说人称最主要的反美主义……

然而，不，不，不，不！四个不。这恰恰是我想对你说的，也是我给你写信的原因。为了告诉你我的忧虑，并作为朋友向你要求这不会成为《现代》杂志的“立场”或“战略”。……如果说存在着集权恐吓的做法的话，它就存在于对以色列和美国政策的一切批评性分析加以压制的企图中。……我希望能够进行这样的批评性分析，时而使之复杂化，时而加以调整，时而更加彻底，而不含犹太恐惧症，不含丝毫反美主义，而且，我应该补充，不含丝毫反犹太主义。

亲爱的克洛德，出于良心和友谊的义务，我都会给你写下这些，冒着我犯错的危险，哪怕我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但我确信你知道，我只是在提醒你，我并不是唯一，大概甚至在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当中也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sup>②</sup>

① 德里达致朗兹曼的信，2002年1月30日。

② 同上。



在德里达逝世一年后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阿兰·巴迪乌对德里达在政治领域里的行动路线做出了完美的总结。他解释说，德里达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哲学姿态，始终想要解开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立，“打散已归类的事件”：“在犹太/阿拉伯对立中，在巴勒斯坦冲突中，德里达采取了解构二元性的立场。”从根本的意义上，巴迪乌认为：624

德里达在其所有涉及的问题上都是我所称的勇敢的和平人士。他是勇敢的，因为永远要有巨大的勇气才能不进入已然形成的分裂当中。他是和平人士，因为总的来说，超越对立的探求便是和平之路。<sup>①</sup>

※ ※ ※

2001年秋，德里达在另一个领域被卷入政治。他在政治舞台上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艰难的立场，但他始终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小心地避开所有可能使之遭受危险的东西。对德里达，秘密是一个重要主题。他在其中看到的是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就像他在同菲拉里斯的访谈中解释过的。他甚至为这本始终没有法语版的书选择了这样的标题：《秘密的滋味》（*Il Gusto del Segreto*）。

我热爱秘密，这显然是因为没有归属感。比如，面对一种政治空间，一种不给秘密留下位置的政治空间，我会感到害怕或恐惧。对我，要求每个人将一切置于公共位置，没有内心世界，这马上就是民主向集权的演变。……如果不保留秘密的权利，就等于处在集权空间。<sup>②</sup>

2002年的总统竞选打乱了许多东西，并以他完全无法控制的方式混淆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确，利奥奈尔·若斯潘在1995年已经是左派候选人，德里达甚至是他的支持委员会成员。但那次的竞选运动很短暂，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还留在后台。1997年，若斯潘成为总理，这显然引人关注他的妻子。从2001年秋天起，德里达尤为痛苦地看到若斯潘的两部传记都暴露了他与希尔维亚及丹尼尔的事，而且报刊大量摘引：传记作者分别是塞尔日·拉费（Serge Raffy）和克洛德·阿斯克洛维奇（Claude Askolovitch）。625

德里达无法忍受自己的形象仿佛变成了庸俗摄影小说中的人物。在塞尔日·拉

① Alain Badiou, “Derrida, ou l’inscription de l’inexistant”, in *Derrida, la tradition de la philosophie*, Galilée, 2008, p. 179.

②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op. cit.

费的书里，他被表现成“1970年代以来法国大学的明星”，“雅克·拉康的大对头”：

那时的德里达结合了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和地中海人的形象，而且全身披挂着学位。他英俊而出色，但已婚。希尔维亚则经历着伟大的爱情故事，她知道她没有出路。她承担了一切。她是个自由现代的女子。她在1980年（原文如此）生下了儿子丹尼尔。就像在让-雅克·戈尔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n）的歌中，“她独自生养了孩子”。她再次承担了一切。爱情嘲笑日常规则。<sup>①</sup>

克洛德·阿斯克洛维奇的叙述也并不更克制些。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被描写成“一位获得教师资格的女子，其生活同文凭一样被塑造而成”，利奥奈尔·若斯潘则是“人猿泰山一般的人物，弥补了生活给这个女子带来的不应有的不公正”。作者提到了希尔维亚的年轻时代，那时“她围绕着菲利普·索莱尔斯创办和主持的《原样》杂志”：

她最终同雅克·德里达发展了一种私密关系。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左派的大人物。但大人物也有他们的道理。希尔维亚怀孕了。德里达不愿承担，他不愿意有一个秘密家庭，这是他的自由。她想要孩子，这是她的选择。拒绝这次怀孕将意味着放弃生命，封闭在只能依靠他人作决定的世界里。希尔维亚独自生下孩子。她现在成了单身母亲，小丹尼尔的妈妈，她开始独自抚养他。<sup>②</sup>

德里达在愤怒和苦涩中挣扎。他不理解为什么希尔维亚公开吐露他是丹尼尔的  
626 父亲。实际上她甚至不需要吐露，足够多的人知情，以至在若斯潘竞选总统的计划形成时，《费加罗报》完全没有询问希尔维亚就第一次提到此事。她未加否认，亦未予置评。不管怎样，对媒体一直抱不信任态度的德里达不愿承认总理夫人和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所承受的限制。

2002年，若斯潘参加总统竞选的宣言通过从住所发出的一份传真到达新闻社。《世界报》指出：“是丹尼尔，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的儿子——巴黎孔多塞高中高师预备班的学生——按下了传真机的按钮……就此向法新社和所有法国人宣告利奥奈尔·若斯潘的竞选资格。小事一桩，但含义丰富。若斯潘同雅克·希拉克相反，拥有一所住宅，一间厨房（里面放着3月7号的《巴黎竞赛画报》）和一个家庭。一

① Serge Raffy, *Jospin, secrets de famille*, Fayard, 2001, p. 307-308.

② Claude Askolovitch, *Lionel*, Grasset, 2001, p. 307.

个美好的、现代的、重组的家庭。”<sup>①</sup>

面对两名主要候选人展开的形象战，德里达只能无力而苦涩地旁观。从总统竞选正式开始，希尔维亚在媒体上就比1995年时活跃得多：3月20号在法国电视一台的采访，3月29号在《巴黎人》上的访谈，4月4号在《新观察家》，4月8号在《她》，4月11号在《盛宴》，4月18号在《巴黎竞赛画报》上的摄影报道。希尔维亚表现得明显比丈夫的传记作者更加审慎，从不提及德里达的名字。但德里达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时还是深感受伤：“1989年丹尼尔5岁，是利奥奈尔把他抚养大的……他对我这个他视为己出的小男孩是如此温柔慷慨，我为此无限感激——只要提及我就十分感动。”<sup>②</sup>“是利奥奈尔抚养了丹尼尔。他对他视如己出”<sup>③</sup>，这是一张占了两个版面的希尔维亚同儿子在一起的照片的说明文字。<sup>④</sup>

有些人忍不住冷笑，德里达的密友则看出他的痛苦。阿维塔尔·若奈尔回忆道：627  
“在很长时间里，雅克应该是不顾常理地告诉自己没人知情。这就像一种反向恐慌症：他如此希望保守秘密，以至于相信确实如此。因此当事件暴露在公共场合时感到震惊。2002年竞选期间，他感到因为同希尔维亚的恋情而受到了惩罚。这出戏对他尤为严重，因为他面对流言十分脆弱。他有时感到来自高层的迫害。”<sup>⑤</sup>

同1995年相反，德里达没有加入若斯潘的支持委员会。他对后者执政时所采取政策的好些方面感到失望，特别是关于无身份者。他本人倾向激进，认为社会党的行动过于胆怯。他震惊地看到“关于移民的‘帕斯卡-德布雷法’一部分至少在名义上得到了维持”<sup>⑥</sup>。德里达愿意承认，“无条件的好客性”“本身是无法践行的”：“如果想将之立即转变成一种政策，它就总会产生恶果。但在小心这些风险的同时，我们不能也不应放弃对无保留的好客性的参照。”<sup>⑦</sup>同样，德里达无法理解希尔维亚在12年间与他如此接近的思想立场产生了转变：在他看来，《性的政治》充满了生物学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痕迹。

① Ariane Chemin, “Comment M. Chirac et M. Jospin mènent leur bataille d’images. Le meeting du Premier ministre à Marseille sera ‘familial’”, *Le Monde*, 22 mars 2002.

② 载《新观察家》，2002年4月4日。

③ *Gala*, 11 avril 2002.

④ 2004年7月，刚满20岁的丹尼尔·阿加辛斯基通过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雅克肯定教过他。三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目前在图卢兹-勒-米拉耶（Toulouse-le-Mirail）大学撰写关于英雄形象建构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论文。

⑤ 同若奈尔的访谈。这些话也得到了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米什琳·莱维、皮埃尔·阿尔菲利和让·德里达的证实。

⑥ Jacques Derrida, “Non pas l’utopie, l’impossible”, entretien paru dans *Die Zeit* le 5 mars 1998 et repris dans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351.

⑦ *Papier Machine*, *op. cit.*, p. 361.

两人之间的冲突将公开化，并由于选举的戏剧性而激烈。2002年4月21号，第一轮选举之夜，“五雷轰顶”般的惊愕：卸任总统雅克·希拉克位列第一，随后是国民阵线候选人让-玛丽·勒庞。利奥奈尔·若斯潘当晚宣布退出政治生涯。5月5号，雅克·希拉克以82.21%的得票率当选连任。

628 几周之后，在《解放报》最后一版的报道中，德里达承认，他生平第一次没有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投票，“出于对所有候选人的坏情绪”<sup>①</sup>。第二天，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在将于数月后发表的日记中对此加以评论：

我在《解放报》上读到，雅克·德里达“出于对所有候选人的坏情绪”而没有在第一轮投票。情绪，还是而且总是它！它在这日记里不断出现。但我没想到它能在选举日成为决定因素。至少让我们希望哲学家在第二轮选举中，面对希拉克和勒庞时找回他的好情绪。<sup>②</sup>

随后她对前男友发起了更根本的责难，认为他的思想同她刚刚经历的现实脱节：

哲学也可以有坏情绪：例如德里达的概念“无条件的好客性”。这个概念不仅荒谬（这话总得说出来），而且具有挑衅性。如果说维护无身份者的事业似乎值得称道的话，它当然不能以无条件的好客性的名义来实现，因为没有什么比好客性更加具有条件性了。无条件性，总的来说，适合喜爱绝对和纯粹的美好灵魂的口味。它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因为它为了概念的纯粹性而牺牲了经验现实的智慧。但它放弃了对真正现实的思考。<sup>③</sup>

2003年1月，在《无赖》的一个长注里，德里达报复似地做出了回应：

无条件的好客性，我坚持这一点。因为好几个朋友告知我最近有本出版物讨论了这一主题（“类似《盛宴》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巴黎庸俗小报式的书”，其中一位补充说），其作者对我几年来在无条件的好客性这一称谓下所写作或教授的东西大加说教，却没有提出可查证的参照。对此显然毫无理解的作者甚至像从前在中学那样，给出一个很差的分数，并在我卷子的边上不容置疑地宣称：

---

① Luc Le Vaillant, “Jacques Derrida, Le bel et différent”, *Libération*, 22 mai 2002.

② Sylviane Agacinski, *Journal interrompu*, Seuil, 2002, p. 152.

③ *Ibid*, p. 153.

“荒谬”！那让我们看看吧……

关于无条件的好客性，我始终不变地坚称，作为不可能性，它同政治、司法、甚至伦理始终是异质的。但不可能并非空无。从定义上来说它甚至是真实发生的事。我想这让人难以想象，确实如此，但这正是占据思想的东西，如果有思想的话，并且从有思想开始。<sup>①</sup>

令人悲哀的是，这些话看来是雅克·德里达和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之间最后的文字交流。

※ ※ ※

2002年7月，围绕着德里达的第四次瑟里斯十天研讨会举行。这是艾迪特·埃尔贡在《自传的动物》出版后不久的1999年就向他提议举办的。德里达十分感动，他首先要求考虑一下。“您的建议（2002年举办‘德里达4’研讨会）让我浮想联翩。这有些疯狂，是吧……我不说‘不’，但还需考虑一下。”<sup>②</sup>8月，他决定接受诱惑：

经过思考，尽管有各种您能想象的内心真诚的反对（是否次数太多？我配得上吗，我的工作配得上另一场十天研讨会的荣誉吗？等等），我想我还是应该，正如我向您暗示的，接受这再次对我发出的如此慷慨的邀请。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因为这次会议关乎的是共同的工作而不是“庆祝”，因为过去的经验让人期待还会有十天以各种语言表达的友谊的节日，因为首先应当表现出配得上我们的主人和瑟里斯的传统……以谦虚为借口的退让或保留都不适宜。而且生命过于短暂，我们不再有权利向我们自己和我们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剥夺这次相见的机会。<sup>③</sup>

他向会场的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前两个是传统的：主题是《友爱政治学》——他认为这个题目既有政治性又很开放，并由玛丽-路易丝·马莱再次承担主持工作。第三项看起来有些荒唐：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出于迷信的嗜古，这十天如能再次将7月15号生日 630

① Jacques Derrida, *Voyous*, *op. cit.*, p. 204.

② 雅克·德里达致埃尔贡的信，1999年6月29日。

③ 雅克·德里达致埃尔贡的信，1999年8月24日。

包括在内的话，将既方便许多可能的参加者（尤其是来自国外的人），又能平息我的想象。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请只在日程安排没有丝毫不便时才考虑这一点。

我估量着这前所未有的特别馈赠，同时感到与之不能相配，瑟里斯的“生日”点缀并照亮了我生命里有些忧伤的这些年份，我从中汲取了强大的力量。<sup>①</sup>

这个愿望当然会得到满足。题目则改成《到来的民主》（“La démocratie à venir”），这在他眼里完全不是《将来的民主》（“démocratie future”）的同义词。对德里达，民主从不存在于当下，“但存在着不可能性，它便是其承诺”<sup>②</sup>。在规模堪比前几届瑟里斯研讨会的开幕演讲中，他阅读了几个月之后将以《无赖》为题在伽利略出版的文字。这对他是一种从特别的角度重读自己的方式，此时是从政治的角度，就像1997年他关于动物的主题所作的发言。一些时候以来德里达激进了许多。他延续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流氓国家（Rogue States）”<sup>③</sup>进行的“严厉控诉”，并不惮证实说：

最大最暴力的流氓国家，就是那些无视并继续侵犯国际法的国家，而它们却声称是国际法的冠军，并以其名义发言，以其名义对所谓的流氓国家挑起战争，而且每次都在其利益指使下。也就是美国。……

这些国家指控这个或那个流氓国家侵犯法律、不遵守法律、犯下了恶行或偏差，这些合众国宣称保障国际法并因为拥有武力而挑起战争、警察行动或维和行动，还有在这些行动中与之结盟的国家，它们，作为主权国，才是第一等的流氓国家。<sup>④</sup>

631 德里达认为还应该在更加根本的层面提高警惕性，因为“所有主权国家都或在或主要地处于滥用权力和侵犯国际法的状态，就如同流氓国家。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流氓国家。对国家权力的使用在这里从根源上就是过度和泛滥的”<sup>⑤</sup>。但这并不阻止他对民主抱有信心，这是“唯一的体制，唯一的宪法范式，在其中，在原

① 雅克·德里达致埃尔贡的信，1999年8月24日。

② Jacques Derrida et Jürgen Habermas, *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 op. cit., p. 177-178.

③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South End Press, 2000.

④ Jacques Derrida, *Voxyous*, op. cit., p. 138 et p. 145.

⑤ *Ibid*, p. 215.

则上，人们拥有或者取得了公开批评一切的权利，包括批评民主思想本身，其概念、历史及其名称”<sup>①</sup>。

※ ※ ※

2002 年秋时他在纽约，主要参加科比·迪克和艾米·齐尔林·考夫曼的第一部长片《德里达》的拍摄。拍摄工作从 1997 年开始延续了好几年。摄制方法比萨法·法蒂的《别处的德里达》要更加美国化和大众化。没有画外音和真正的采访，剪辑的线索是传记问题。摄像机跟随着德里达，在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中，从高等研究学校到纽约，经过加利福尼亚和南非，也作为个人，在家里，在厨房，甚至在理发店。他相当兴致勃勃地予以协助，虽然他曾长时间对影像和媒体抱有怀疑态度。音乐制作是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他曾在几年前的一部歌剧中采用德里达的一些文字。

为大银幕构思的《德里达》作为正式参选片在圣丹斯（Sundance）电影节上映，还有洛迦诺、威尼斯和墨尔本电影节，获得了这类影片罕见的上座率。广告词十分有效：“如果有一个人前来，不仅改变了你思考一切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你思考方式的一切，那会怎样？”第一次，至少在纽约，德里达在街上常常被人认出来。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Voyous*, *op. cit.*, p. 138 et p. 127.

# 第 32 章 向生向死

(2003—2004)

632 2003年2月12日，在《野兽与主权者》研讨课第二年的第六课堂上，德里达终于开始讨论他宣布了好几周的主题：在土葬和火化之间的选择。这个主题在关于死亡的哲学话语中很奇怪地少有提及。

土葬和火化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使遗体拥有存在、延续和占有领地的权利，后者则避开了遗体。……如果说死者消亡了的话，这消亡者的身体并不消失，他作为遗体并未像在火化中那样被销毁。这种未消亡留下了产生幻想的希望，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下葬之后，我并未消失，我还能附着于什么，我的幻想还能附着于我的尸身，附着于我消亡之后我尸身的未消亡。<sup>①</sup>

德里达随后对火化进行了长时间的分析，将之描述为“一种无可挽回的谋杀”，如果它是由死者身边的人决定的，而如果是死者要求的话，则是“无可挽回的自杀”。

633 当火化开始，在它阴森场景的现代性中，即在技术上从无失误，即刻有效，不可见且几乎不可闻，消亡者的尸体将在表面上消失，消失在其消亡之外。……死者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无迹可寻是因为无处不在，在世界之外又在世界各处和我们身上。死者纯粹的内在化，纯粹的理念化，其精神化，其绝对的理想化，在哀悼的生者那里的去物质化，生者只能任由死者占据，死者在世上不再有属于自己的任何地方，这是最大的忠诚，也是最高的背叛，用摆脱

---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2 (2002—2003), Galilée, 2010, p. 233.



来保存他者的最好方式。<sup>①</sup>

这些个人的思考并不妨碍德里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时下的政治问题。2003年1月，在反抗可能对伊拉克出兵的请愿书《别以我们的名义》上，他成了最早签名的人之一。就在这个背景下出版了前一年夏天在瑟里斯发表的长篇演讲《无赖》(Voyous)。

2月19日，在勒内·马若尔的倡议下，让·鲍德里亚和雅克·德里达以《为什么打仗》为题进行了一场辩论——它延续了1933年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之间著名的对话。五天前，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勒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呼吁伊拉克解除武装而不是进行武力干涉。德里达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发言，一开始就谦卑地承认：“面对如此艰巨可怕的问题，我发现，尽管有过许多其他公开讨论的经验，这却是我生平第一次就棘手的政治问题参加讨论。”他很高兴看到两天来全世界几百万人游行反对这场已宣布的战争，并祝贺“德法对美国的扩张表示反对”，尽管他感到自己“相对于萨达姆-侯赛因并不更支持希拉克”<sup>②</sup>。辩论彬彬有礼，气氛热烈。论战围绕着应该给予“9·11”事件怎样的重要性展开。鲍德里亚认为即将发生的武装干涉是其直接后果。德里达并未弱化此事件，但认为“伊拉克的后续有某种自主性”，而且小布什及其周边的人长期以来希望对伊拉克发起战争，这场战争无论怎样都会发生。后来的事证明他是正确的。

634

※ ※ ※

第二天，2月20日，德里达得知莫里斯·布朗肖逝世的消息，极其震惊。当他在24号参加这位既亲近又遥远的友人的火化仪式时，几天前在研讨课上讲到的关于火化的思考不会不浮现在他脑海。除了让-吕克·南希，主要是葡萄牙人：布朗肖的养女希达丽亚·菲尔南德(Cidalia Fernandez)的亲友，他们几乎不懂法文。在这间如意料中一般阴森的火化室里，德里达还是像布朗肖曾经希望的那样讲了话：

几天几夜以来，我徒然询问自己从哪里来的力量，此时此地，还能发出声音。我想要相信，我希望还能够想象我是从莫里斯·布朗肖本人那里接受的力量，否则我不会拥有的力量。……

莫里斯·布朗肖，我记忆如此遥远的时刻，在我整个成年时期，从我开始

① Jacques Derrida, *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2 (2002—2003), Galilée, 2010, p. 243.

② 我感谢勒内·马若尔给了我这场未发表的辩论的记录稿。

阅读他（50多年了），特别是从我遇见他开始，那是在1968年5月，他始终让我荣幸地拥有他的信任和友谊，我习惯于聆听他，聆听这个名字，不同于聆听一个人，一个第三者，人们引用并受到启发的无与伦比的作者：我以另外的方式聆听他，如同我仰慕的一个人的伟大名字，他在思想和存在中展露的力量，那隐退的力量，楷模式的谦逊，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谨言慎行。<sup>①</sup>

据阿维塔尔·若奈尔的说法，德里达将这一天视为疾病的象征性源头：“在内心深处，他感到一切都崩裂了。他的70岁，“9·11”事件及其后果，2002年竞选和布朗肖逝世时这场如此忧伤的葬礼，伴随着在虚无中讲话的感觉：所有这些各个不同的事件都使他虚弱，使久远的忧伤再次浮现。”<sup>②</sup>

635 几年前，布朗肖曾请他担任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友人逝后不久，就在他本人开始遭受一种奇怪的“腹中的绞痛”时，德里达去找了迦里玛，试图说服他在“七星”丛书出版布朗肖的作品。但安托万·迦里玛表现得并不热情：尽管布朗肖的名字能引发激情，但他的虚构作品销量始终很低。此外，德里达将没有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当希达丽亚·菲尔南德请他前来查看布朗肖留下的一个装满了纸张的箱子时，他已经做不到了。<sup>③</sup>

※ ※ ※

4月初，德里达飞赴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他身体不是很好。玛格丽特讲道：“他仍然抱怨腹痛，但体检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自己也很不舒服，但我什么都不想对他说，免得他徒然担心。”<sup>④</sup>

这个春天他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向希利斯·米勒致敬的研讨会，组织者是巴拉·科昂（Barbara Cohen）和他十分欣赏的年轻教授德莱根·库均兹克（Dragan Kujundzic）。德里达在2003年4月18日发表了向这位最亲密的美国朋友之一致敬的演讲，题目只是简单的《正义》。他还趁此机会同朗松图书馆专门收藏部的负责人杰基·都里（Jackie Dooley）再次讨论他的档案问题。德里达决定将最近作品的手稿托付给当代出版资料馆之后，情形变得有些复杂，但他确认美国和国际信件的原件都

① Jacques Derrida, “À Maurice Blanchot”,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p. 323. 2月26日，在他的研讨课上，德里达回顾道，“没有心情”真正谈论它，这场火葬，发生在“21世纪所能想象的最为陌生的熟悉情景下，在一间外省的火化室里”（*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2 (2002—2003), *op. cit.*, p. 250—251）。

②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③ 同埃里克·奥普诺的访谈。

④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会交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还有保存在资料馆的其他信件的复印件。杰基·都里想要弄清楚大学的权利和查询的方式, 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您不在了之后, *after your lifetime*, 会怎么样呢?” 她问他。佩吉·卡穆夫回忆, “*after your lifetime*” 这个说法令他震撼, 他在研讨班最后的几堂课上对此进行了长时间评论。<sup>①</sup>

在法国, 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她被诊断出肺炎, 但她仍然拒绝告知雅克。她曾得过肺结核, 情况因而令人担心, 皮埃尔和让请父亲缩短在加利福尼亚的行程, 尽快回来。他回到法国时, 玛格丽特已经好些了, 但仍然十分虚弱。雅克陪着她去看他们的胃肠科医生阿拉格 (Arago)。给玛格丽特做完检查后, 医生转向她的丈夫: “您呢? 好些了吗?” 他承认疼痛并未停止, 还是一样的绞痛。医生预约几天之后的 5 月 14 日在诊所做射线、扫描和超声波-内窥镜检查。

636

通常雅克会在接受检查后立刻给玛格丽特打电话让她放心。但这天他没打电话。她讲道: “我终于找到他之后, 我就感到他在试着对我隐瞒些什么……我一再坚持, 他终于说: ‘胰腺上有个肿瘤。’ 晚上, 他说出了“癌症”这两个字。房子好像倒塌在我身上。我不断地在两种感觉之间摇摆: 我因为问题出在胰腺而惊恐万分——这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同时我确信他不会死。他则很快认为自己被判死刑。”<sup>②</sup>

阿拉格医生为他在居里学院预约了专家。医生们准备立即开始化疗, 但德里达不同意。他希望推迟十几天住院, 为了不取消去以色列的旅行和另外两场预定已久的活动。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坚持遵守承诺。惊愕的医生们同意推迟治疗。

※ ※ ※

2003 年 5 月 22 日, 在埃莱娜·西克苏将档案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之际, 围绕着她举行的研讨会第一天, 德里达把自己的病情告知了近友。他常说自己依靠死亡前行, “就像人们说一辆车依靠汽油前行”, 但只能无奈地解释这一次是多么真实。他刚刚收到了化验报告的可怕结果, 但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无懈可击地发表了长篇演讲《源起、谱系、体裁与天才》。<sup>③</sup>

637

第二天, 他飞赴耶路撒冷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为了减少这次短暂旅行的劳累, 他请求到达和出发时安排一辆车在机场跑道上接他, 为他省去烦琐的以色列通关手续。5 月 25 日, 在德里达就保罗·策兰发表演讲之前——大概是他向伽达默尔致敬的

① 同佩吉·卡穆夫的访谈。

②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让·德里达和皮埃尔·阿尔菲利的访谈。

③ 由米莱耶·卡尔-格鲁伯主持的研讨会“埃莱娜·西克苏: 源起、谱系、体裁”于 2003 年 5 月 22 至 24 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行。德里达的论文《源起、谱系、体裁与天才》2003 年在伽利略出版。

《公羊》一文的修改版——多米尼克·德·维勒潘，还笼罩着几个月前在联合国发表的对出兵伊拉克的讲演的光环，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向德里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礼赞：

雅克·德里达，您为人类最有力和最简单的字重新赋予了强度。您站在新思想开路者的前列。……“解构”是一种在其对象考验下的小心审慎的思想方式。具有高度创造性和解放性的方式。拆解，永不摧毁，为了走得更远。<sup>①</sup>

部长还强调，德里达的“方法论”与大量涉足公共领域是相一致的：“反对前捷克斯洛伐克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或美国的监狱制度”。他回顾了反对不公正，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不倦的警惕性”。多米尼克·德·维勒潘总结道：“您跻身于热爱普世价值的光荣的知识人之列，在伏尔泰、贝尔纳诺斯（Bernanos）、左拉或萨特开启的道路上。”

回到法国后，德里达执意完成另一项承诺。5月27日晚，他同穆斯塔法·谢里夫（Mustapha Chérif）主持了在阿拉伯世界学院举行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向文明间对话的伟大人物致敬”的研讨会的闭幕式。大阶梯会场挤满了人；安德烈·米盖尔、安德烈·芒杜兹和让-皮埃尔·舍维纳芒在听众席上。到达时，德里达告诉谢里夫他将不参加别的讨论。但这一晚他坚持“作为阿尔及利亚人”讲话。比以往任何时候他都更加重视连接起他生命的所有脉络：“在我收到和传承的所有文化财富中，我的阿尔及利亚文化是给予我最有力支持的文化之一。”<sup>②</sup>

德里达在这次活动后随即开始治疗。他将停止写作几个星期。2003年5月31日，在《解放报》和好几家欧洲报纸上发表的向全欧洲发起的《为了共同的对外政策的辩护词》上，他附上了几句个人的话作为说明：

哈贝马斯和我坚持共同签署这篇同时也是呼吁书的分析文章。我们认为今天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亟须跨越过去使他们不一致的分歧，在这里聚拢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是哈贝马斯写的，这很容易看得出来。尽管我有此意愿，个人情况却使我不能撰写此文，因此我向哈贝马斯建议共同签署这份呼吁书，我在

① 多米尼克·德·维勒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讲演，2003年5月25日。

② Mustapha Chérif, *L'Islam et l'Occident. Rencontre avec Jacques Derrida*, Odile Jacob, 2006, p. 53 - 54.

主要内容上同意其前提与展望。<sup>①</sup>

从他在居里学院接受化疗的房间窗口，德里达可以看见于姆街和学校的入口，他在那里度过了那么多年。他顺从地忍受着沉重的治疗，并未完全放弃希望。人们不是对他讲过一个病人存活了17年吗？让-马克·埃克斯塔（Jean-Marc Extra）医生不是对他说最近在胰腺癌的治疗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吗？玛格丽特·德里达说，雅克下决心不消瘦，强迫自己吃饭，哪怕没有胃口：“他掉了些头发，但相当少。外表看他气色很好，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良好状态。我们都对病情缓解抱有希望。”

化疗的副作用主要在心理上显示出来。精力不济和严重的疲倦使他陷入新的抑郁状态，并远离他的计划和世界。“十几年来第一次，他不得不中断他的事情”，阿尔贝·迪奇讲道，“他始终有巨大的工作能力，但他被迫放弃一系列的文章、讲演和旅行，这使他难以忍受。”<sup>②</sup> 639

另一件让德里达恼火的事，是知识界表现出名人逝世前的怜悯，还有人突然对他提出请求，不然就“太晚了”。他甚至指责让-吕克·南希把他的病情传遍世界。后者回答说绝非如此，“但当然，有人来问我在别处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这并非偶然。你对我说过：‘这不是秘密，但愿一切保持低调’（大意如此），我一直遵循这个规则。尤其是我并未引发你得到的这些可恶的信息，而我对之同你一样反感”<sup>③</sup>。

在这痛苦的2003年夏天，德里达极少独自度过。玛格丽特不在的时候，友人们轮流守在他身边：星期一是埃莱娜·西克苏，星期二是玛丽-路易丝·马莱，星期四 是萨法·法蒂。德里达比以往更愿意打电话而不是写信。他并不对朋友们隐瞒他状况的严重性。希利斯·米勒讲述说：“我们常常交谈。他对我说他不能再写作，只是完成些简单的工作，比如批改卷子。”<sup>④</sup>

但德里达远未中断所有的工作。2003年7月5号，就在化疗当中，他给大卫·威尔斯（David Wills）写信，给了他关于《侧道》的英文翻译的一系列明确指示。他为自己的笔迹道歉，“它比以往更难辨认。这是化疗的副作用之一，手有些抖”<sup>⑤</sup>。就用这只将很快成为思考源泉的颤抖的手，他在7月10号写信给“坚决反对斗牛委员

① 雅克·德里达：《我为什么签署这份呼吁书》，《欧洲：为一种共同对外政策的辩护》，载《解放报》，2003年5月31日。同哈贝马斯一样，德里达将2003年2月15日发生的“大规模游行”——上百万公民游行反对战争——视为欧洲公共空间诞生的信号。

② 同阿尔贝·迪奇的访谈。

③ 让-吕克·南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2003年夏）。

④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

⑤ 德里达致大卫·威尔斯的信，2003年7月5日。

640 会”，同意成为这一行动的荣誉主席：保护动物的事业对他越来越重要。

整个夏天，就在一些人以为他已接近死亡时——他被迫取消了原定秋天去纽约的行程，还有一个研讨会——德里达继续同癌症的斗争。在第一轮化疗和一侧新的扫描后，医生对他说肿瘤缩小了。德里达仍然十分虚弱，但感觉好些。到夏末，他甚至考虑再次进行2003—2004年的研讨课，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出于对也身患癌症的伊丽莎白·韦伯的友谊，他并未放弃前往西海岸的桑塔·巴巴拉参加10月底的研讨会“不可调和的不同？——雅克·德里达与宗教问题”。伊丽莎白·韦伯回忆道：“2003年春夏期间，我们常常通电话讨论这次研讨会，也谈论我们两人都在接受的化疗。”<sup>①</sup>他选择的演讲题目好像呼应着这些谈话：《“一起”生活》(Living “together”)。

11月，德里达赴葡萄牙参加围绕他举行的三天的活动，活动由费尔南达·贝尔纳多(Fernanda Bernardo)组织，在古老的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举行。“所有的友人看到他到来时都感到某种释然”，迈克尔·利斯讲道，德里达叮嘱他别忘了接受荣誉博士时穿的长袍。“这十分庄重的仪式并不使他不快。他很高兴看到将近100岁的电影人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Manoel de Oliveira)为他主持典礼。”<sup>②</sup>德里达身穿漂亮的礼服，头戴尖顶礼帽，穿过老城区。但他对玛格丽特吐露：“我感觉要去参加自己的葬礼。”玛格丽特回答：“如果一个人参加自己的葬礼，那说明他还活着。”事实上，德里达表现得十分活跃。他发表了与平时同样长的讲演，并参加了这641三天预计举行的所有活动，特别是以“科英布拉：城市一庇护所”为主题的一天。“我们都以为他痊愈了”，迈克尔·利斯回忆。

回来不久，德里达收到了米莱耶·卡尔-格鲁伯的一封信，信中说她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他“精神健旺，神采奕奕，投入一切，总是将问题提出得更远”：“我们前来是为了在您身边，为了给您一些您不知疲倦地传递给我们的火焰，而您始终给予得最多，也最为慷慨。”<sup>③</sup>

这个冬天，医生们也为他参加的活动之多和他非同寻常的精力而惊讶不已。事实上，德里达只有在夜里才感到痛苦，但药物能够缓解一些；特别在公共场合和接待来访，或者酝酿新的计划时，他便活跃起来。佩吉·卡穆夫说：“这段时间雅克继续进行许多的工作和旅行。放弃他生活的这一部分就等于放弃生命。”<sup>④</sup>

① 同伊丽莎白·韦伯的访谈。

② 同迈克尔·利斯的访谈。

③ 米莱耶·卡尔-格鲁伯致雅克·德里达的信，2003年11月26日。

④ 同佩吉·卡穆夫的访谈。

※ ※ ※

如果说德里达像他常说的那样在“走向死亡”，他也在走向友谊，走向忠诚。1992年10月路易·马兰去世后，他曾写道：

对于亡友，人们为什么给予，又能给予什么？……

路易知道我对他的想法，他知道我的钦佩和感激，他有无数的信号知道这些，通过我们的姿态，我们的活动，还有我们各自相关的工作，以及未曾说出的一切，唉，这一切肯定一直在回荡和反响。但这钦佩之情，他知道的，我也许从未像今晚这样对他宣布过。我说这些并不只是，不只是，为了忏悔一个错误，一份遗憾，或一种难解的忧伤。这种情形从根本上相当普遍，我同不止一位友人，大概所有人称“最好的朋友”之间都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等到死亡？为什么人们要等到死亡，告诉我？<sup>①</sup>

这个问题，每一位亲爱的友人离世时德里达都向自己提出。从他的小弟弟诺尔贝去世开始，就是同样的震惊，“这不倦的讶异，面对我实在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事……在一位友人死后继续活着，或重新开始活着”<sup>②</sup>。芝加哥德保罗（DePaul）大学教授、他好几本著作的译者迈克尔·纳斯和帕斯卡-安娜·布劳特提议汇编并介绍德里达在友人过世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或讲演：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埃德蒙·雅贝斯、路易·马兰、萨拉·考夫曼、热拉尔·格拉奈尔，还有最近的莫里斯·布朗肖……德里达寄给纳斯和布劳特几篇他们不知道的致敬文章，同时强调这个计划是他们提出的。这些文章中许多在美国没有发表过，他很高兴看到它们发表。但在法国的发表让他有些担心。他怕有人会嘲笑他，仿佛他在用自己的悼词扮演博絮埃（Bossuet）或马尔罗的角色。他喜欢美国版的标题《哀悼之作》（*The Work of Mourning*），但“work”一词的模糊性——既是工作也是作品——在法语里找不到。《向生向死》这个标题正准备采纳时，它却出现在强尼·哈里代（Johnny Halliday）新唱片的封套上。<sup>③</sup> 作品最终命名为《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用以突出其中重要的一篇同名讲话。这是德里达在阿尔都塞去世时所写的：

642

① Jacques Derrida,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p. 146-147.

② Jacques Derrida in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29.

③ 同迈克尔·纳斯和帕斯卡-安娜·布劳特的访谈。

正在终结的，路易带走的，不仅是这样或那样东西，不仅是我们在某个时刻、在这里或那里分享过的东西，而是世界本身，某个世界的源头，大概是他的，但也是我生活过的世界，我们经历过的独一无二的，至少是无可替代的历史，它将对我们之中这人或那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义。……这个世界对我们就是世界本身，唯一的世界，它沦入深渊，任何回忆——哪怕我们保留着回忆，将保留着回忆——也无法挽回。<sup>①</sup>

643 这部忧伤而光明的巨著受到了报刊的好评。尽管过去有过分歧，贝尔纳-亨利·莱维还是在《解放报》上他主笔的专栏《本周纪事》中写道：

无法抵挡的同情心将我与旧日的《喜剧》大师拉近。……人们合上书，闭上眼睛，听到了他们。……整个时代的精神在此。一代人的哀悼，就像一部神性的喜剧，其中的人物汇聚一处，归于一种并非阴影、而是声音的状态，而德里达便是维吉尔（Virgile）。<sup>②</sup>

保罗·利科获知德里达的病情时悲痛落泪。两人之间的关系从列维纳斯逝后密切了许多。2002年12月，他们一起在拉丁美洲中心就“他者，如何谈论？”的主题进行了对话。这个问题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也是他们长期友情的中心。“我有才华，而德里达有天才”，利科有时对朋友这么说。在晚期的一封给自己从前的助手的信中，他承认对《活的隐喻》中提出的“不恰当的批评”“继续感到遗憾”，随后说：“您对这一批评进行了生动的引用，并出色地将其提高。”<sup>③</sup> 得知德里达情况的严重性后，利科在信中表示，德里达的思想和生命对他是多么珍贵：“对您作品的敬佩，还有，如果您许可的话，对您的友谊，我保持了太多的沉默，我一直相信这友谊在您那里会有回应。拥抱您。”<sup>④</sup>

2003年12月，以同样的慷慨，德里达为利科写下了最后的文章之一：

我甚至不必真诚地承认一种无能感，我相信我没有力量去触及保罗·利科的巨著，无论是以研究还是哲学讨论的形式。……再读我刚刚不假思索写下的文字（“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笑了。我在事后注意到，“困难”和“不可

---

① Jacques Derrida,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op. cit., p. 204.

② Bernard Henri-Lévy, “Journal de la semaine”, *Libération*, 20-21 décembre 2003.

③ 保罗·利科晚期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

④ 保罗·利科致德里达的信，2003年11月5日。



能”这两个字，在最近两年，是保罗·利科和我关于恶与宽恕的讨论的核心。<sup>①</sup>

德里达考问这“奇特的既非一致也非对立的沟通逻辑”，在那里他们两人的相遇 644  
“勾勒成形，同时互相躲避”。

我们曾经“肩并肩”，最近的一天他对我这么说，而又一次，我们试图一起思考，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在我们没能命名的不可逾越的深渊之下或穿越这深渊，我们仍然能够互相说话和倾听。

为了回顾这“不断增长的友情”，德里达回忆了他们之间的几个时刻。利科在他们很久前关于隐喻发生争论时曾写道：“此处的壮举，不是通过诞生之门，而是，如果我敢于这么说的话，通过死亡之门进入形而上学。”德里达在28年后回顾了在这个说法，并真诚地答复道：

尽管我怀疑对我关于隐喻的文章的评论是否真实，但这在今天已不再重要，我相信在这场辩论之外，利科的观点正确而深刻。关于我和我的哲学姿态的观点。我一直都，唉，通过“死亡之门”，眼睛盯着它，每时每刻，同时走向对生命、对生命欲望的证实和无往不胜的再证实。<sup>②</sup>

2004年初，德里达又开始遭受病痛折磨。米歇尔·利斯回忆：“由于口部化疗的毒副作用，他开始失去手指和脚趾的敏感度，必须长时间按摩。病痛使他无法写作新的文章。他仍然起得很早，但大半个下午都在休息。给他打来的电话很少。”<sup>③</sup>

但他远远没有停止所有的活动。他最关注的计划之一是著名的莱尔纳手册，玛丽-路易丝·马莱和吉奈特·米肖（Ginette Michaud）正在积极筹备关于他的一期专刊。他同她们讨论选择撰稿人，小心不遗忘任何人。他细心地选择资料和丰富的图片：有许多照片，也有卡米拉和瓦雷里奥·阿达米、西蒙·昂塔伊和热拉尔·提图斯-卡迈尔的素描和画作，还有音乐家米凯尔·列维纳斯（Michaël Levinas）的乐谱。 645

①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Donner, nommer, appeler”, in *Paul Ricoeur*,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19.

② Jacques Derrida, “La parole-Donner, nommer, appeler”, in *Paul Ricoeur*, Cahier de L’Herne, 2004, p. 24.

③ 同米歇尔·利斯的访谈。

德里达尤其要将 9 篇未发表过的法语文章整理在一起，成为书中之书。<sup>①</sup>

从年初起，阿维塔尔·若奈尔在里斯-奥朗吉斯住了六个月，以免玛格丽特去巴黎的精神分析诊所时留下雅克一个人。她和他商讨了为庆祝莱尔纳手册的出版而可能于 2004 年 10 月在纽约举行的研讨会。“气氛十分特别，有点吓人的沉重和庄严，因为我们两人都感到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美国。”但大部分时间里，阿维塔尔只是尽量让雅克分心，让他笑，她对此有特殊的天赋。“雅克喜欢叫我‘阿维’，听起来很像‘致命’。我们一起做一点瑜伽。他有时同意我给他按摩。但当我对他说起打坐时，他对我说他只知道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沉思。”<sup>②</sup>

※ ※ ※

如今他几乎不再能写东西，本已十分活跃的话语于是越发重要。加入《世界报》之前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对他进行过好几次访谈的让·勃恩鲍姆 (Jean Birnbaum) 向他建议，在犹太艺术历史博物馆围绕他最近的作品举行一次见面会，德里达忍不住同意了。但 2 月 12 日晚，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他感到如此疲倦，只能说明自己的病情。几周之后，在接受 *Les Inrockuptibles* 杂志的政治意味浓厚的采访中，他对自己的状况更少隐瞒：3 月 31 日，这本周刊用封面和 11 页的篇幅热情赞扬了“一位伟大的知识人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sup>③</sup>。几周之后，应《世界报》主编埃德维·普莱奈尔 (Edwy Plenel) 的要求，让·勃恩鲍姆来到里斯-奥朗吉斯进行了一次长篇访谈：它将罕见地占据两个版面。这件事很重要，德里达要求一些时间仔细阅读文稿。

他同《世界报》的关系一直充满暧昧，但他对其在编辑上完全独立的分支《外交世界》十分欣赏。2004 年 5 月 8 日，在这份月刊 50 周年之际，德里达应邀来到巴黎体育宫的舞台，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即（他）作为成人和公民的一生中最令人瞩目的新闻历险和雄心”致敬。他借此机会总结了自己从“9·11”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政治信念。

我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欧洲中心的哲学家。四十年来，人们更多地指责我是其反面。但是，虽说没有欧洲中心的幻觉和自负，没有丝毫欧洲民族主义，甚至对现在的或似乎正在形成的欧洲没有太多的信心，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为了欧洲这个名字在今天所代表的一切而斗争，当然是带着启蒙的回忆，但也带着

---

① Ginette Michaud 在她的书 *Veilleuses. Autour de trois images de Jacques Derrida* (Nota Bene, 2009) 中回顾了这部有丰富图片的书籍的筹备工作，并评论了一些照片。

② 同若奈尔的访谈。

③ Jacques Derrida, “Si je peux faire plus qu’une phrase...”, entretien avec Sylvain Bourmeau, Jean-Max Colard et Jade Lindgaard, *Les Inrockuptibles* n° 435, 31 mars 2004.

对过去的集权、种族屠杀和殖民主义罪行的有担当的负罪意识。因此我们应该斗争，为了欧洲在未来的世界上所保存的无可替代的一切，为了使她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和单一货币，不仅仅是一个新民族主义的聚合体，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武装力量，虽然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为她需要拥有军事强力，并能够制定对外政策，为经过改革的、总部设在欧洲的联合国提供支持，而且有能力实施其决议，不必听命于美国的技术—经济—军事力量的利益或单方机会主义。<sup>①</sup>

他为之辩护的欧洲应该让人在国际舞台上听到它超越一切路线的自由之声：

一个欧洲，在那里人们能够批评以色列政策，特别是沙龙（Sharon）和小布什的政策，而不会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或犹太恐惧症。

一个欧洲，在那里人们能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回自己权利、土地和国家的合法愿望，而并不就此赞同自杀式暗杀和反犹宣传，它常常——太经常地——在阿拉伯国家，使人重新相信那可怕的《锡安长老会纪要》。……

647

一个欧洲，在那里没有反美主义，没有反以色列主义，没有反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恐惧症，人们能够同那些常常比我们更警惕地批判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或统治力量的勇敢的人们联合起来，无论他们是美国人，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对于这样一个未来的欧洲，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怀着希望，这个欧洲将“播下一种新的另类全球化（altermondialiste）的政治”，这将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6月初，在斯特拉斯堡，在哲学家议会以他为主题的会议上，他重申了这一点。这座他来得最多，也最欢迎他的城市，向他致以庄严的敬意。2004年6月7日星期一，雅克·德里达在那里见到了福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de-Coulanges），高中二年级的教师，再次谈到三十年来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即哲学教育。第二天，以《论友谊》为题，他在克雷贝尔（Kléber）图书馆同伊莎贝拉·巴拉蒂纳-霍瓦尔德（Isabelle Baladine-Howald）对话，然后发表了他在法国最后的演讲：《论“好的君主”——迫切需要主权的欧洲》。作为坚定的教育家，他在星期三同前来发言的四名年轻博士生进行了对话。随后他又与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一同参加了一次气氛热烈的会议。语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似乎他们忘记了公众的存在。在德里达既悲情又安详的讲话中，死亡无处不在：

<sup>①</sup> 雅克·德里达，2004年5月8日在《外交世界》5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原文可见下列网页：<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2004/11/DERRIDA/11677>。视频见网页：[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ws9r\\_jacques-derrida\\_events](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ws9r_jacques-derrida_events)。

在我对死亡的预期中，在我同将要到来，而且我知道将彻底使我消亡湮灭的死亡的联系中，暗暗涌动着留下遗嘱的欲望，即渴望某些东西活下去，或留存，或传递——某种遗产，或某种我并不向往的东西，它不再回到我这里，但它也许将留下来……而这，这种感情缠绕着我，不仅为了人称作品或书籍的东西，还为了随便一个日常或平凡的手势，那将是这一切的见证，将在我不在的时候保留着对这一切的记忆。然而，我说过这不只是死亡，不只是死亡之不可能经验的一部分，也是我对死亡的预期的一部分。那么对我，它始终萦回不去，它关心的仍然不仅仅是公共领域及文字，也关乎私人事物……这种思想，我称为遗言性的，并试图将之与踪迹的结构建立联系——一切踪迹在本质上都是遗言性的，这种思想一直萦绕着我。尽管没有发生，没有接收到，但还是有一种遗嘱的欲望是死亡经验的一部分。<sup>①</sup>

2004年6月22日午夜过后，状态轻松愉快的德里达同雷吉斯·德布雷一起参加了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伯特主持的“文化与依赖性”系列的最后一次节目。在开场白中，德里达被称为“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同德布雷进行了一场高水平的对话，政治意味很浓。对话者的素质和主持人的美意使他放心地以清晰流畅的方式表达，不带丝毫造作：“我对媒体没有任何反感。我是无法与自己被媒体框出的形象妥协。”还有：“在政治上，同以往一样，我是个进行交易的人。”

尽管如此，德里达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彻底激进的立场。他维护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再次鼓吹一个去领土化的欧洲，站在另类全球化理念最前沿的欧洲。当专栏编辑伊丽莎白·莱维（Élisabeth Lévy）不无攻击性地询问“在《论文字学》和同性婚姻请愿书上签名的是否同一个德里达”时，他坦然解释说他举双手赞成诺埃尔·马麦尔（Noël Mamère）的倡议，但从根本上，他赞成“婚姻”一词在民法中消失，这个概念在他眼里属于宗教范畴。<sup>②</sup>

<sup>①</sup> “Dialogue entre Jacques Derrida,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et Jean-Luc Nancy”, *Rue Descartes* n° 52, *op. cit.*, p. 93。一本合著的小书 *Penser à Strasbourg* 由伽利略和斯特拉斯堡市在2004年6月共同出版。其中特别有一篇德里达的重要文章“Le lieu dit : Strasbourg”。

<sup>②</sup> 在同让·勃恩鲍姆的访谈中，德里达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我是立法者，我会直接建议在民法或世俗法中删去‘婚姻’这个词和概念。‘婚姻’，作为宗教的、神圣的、异性的价值观——伴随着繁殖、永恒忠诚等等的许愿，是世俗国家对基督教会的让步——特别在其一夫一妻制中，正如人们所知，它既非犹太的（欧洲人直到20世纪才将这一制度强加于犹太人，在几代人之前对马格里布的犹太人还不构成义务），也非穆斯林的。取消‘婚姻’这个词和概念，这个在世俗宪法中毫无位置的宗教的神圣的歧义和虚伪的观念，可以用一种契约式的‘民间联盟’取而代之，一种在没有性和数量限制的伴侣之间的普遍化的、改良的、细微的、灵活的和可调整的契约。……这是个乌托邦，但我要选定日期。”（Jacques Derrida,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op. cit.*, p. 45-46.）

尽管播出时间很晚，这期动人的节目将第一次对德里达作品的销量产生真正的影响。

7月6日，他前往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参加又一个荣誉博士典礼。这是自1992年剑桥大学之后在英国的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德里达这次旅行不是为了在一长串系列之上再加一项新的荣誉，而是为了让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的老友马里安·霍布森(Marian Hobson)高兴，也为了不让筹备许久的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失望。还为了见到忠实的友人，如佩吉·卡穆夫、尼古拉斯·若伊勒(Nicholas Royle)和杰夫·贝宁顿。但这天很热，德里达抱怨说刚刚过去的几周十分繁忙。亚历山大·加尔西亚·迪特曼讲道，“我先是发现他老了许多。但在研讨会和问答期间，他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他甚至显得很高兴。后来在晚餐时他感到疲倦，要求把他送到他喜爱的拉塞尔酒店。”<sup>①</sup>

他还是立刻动身前往阿维尼翁戏剧节。7月9日，在吉亚尼·瓦蒂莫和海因兹·维斯曼身边，他参加了题为《“古老的”欧洲和我们的欧洲》的辩论，阅读了一封题为《双重记忆》的短信作为引子。这三页纸上集中了许多他关注的主题：

古老的欧洲：

我从未用你来称呼你。我多年来说着一些人认为是对你的坏话。……今天，情况变了。我在你身上看到我所称的“古老新颖的欧洲”，这个说法受到一个古老的布拉格犹太教堂的启发，这座教堂叫做旧—新犹太教会堂(Staronova synagoga)，一个保留着它的回忆的欧洲，好的和坏的，光明的和阴暗的。……

我所希望的，是从你的两个回忆出发，特别是从我称为你的“黑夜的回忆”之后的良知和悔恨出发，你，我的新的“古老的欧洲”，你迈上了今天只有你才能够开辟的道路，夹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它甚至不遵守自己声称支持的国际法，原教旨主义神权政治，还有中国之间，后者早已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力量路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哪怕只就石油问题而言。<sup>②</sup>

几天之后，雅克和玛格丽特出发到大湖边的梅纳，瓦雷里奥·阿达米创办的素描学院。这是休憩的时候，在他一直热爱的地方，几位亲爱的友人身边；在那里他将庆祝自己的74岁生日。这也是相聚的日子，围绕着这个夏天由埃杜阿·格利桑选择的主题：“怎能不‘战栗’”。用比以往更加平易的语言，德里达将1942年冬轰炸阿

① 同迪特曼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Double mémoire”, in *Le Théâtre des idées, 50 penseurs pour comprendre le XXI<sup>e</sup> siècle*, Flammarion, 2008, p. 15-16.

尔及尔时童年战栗的回忆与现在手的“战栗”进行了对照，这“战栗”已有一段时间，让他无法写字甚至签名。由此出发，他对断裂、缺失、虚弱进行了思考：

651 不应假装知道什么是“战栗”，什么是真正的“战栗”，因为“战栗”将始终与知识无关。……“战栗”的思想是一种无一知的独特经验。……“战栗”的经验始终是一种绝对被动的经验，绝对地袒露，绝对地脆弱，面对无可挽回的过去也是面对无可预计的未来的被动。

“战栗”当然可以表示恐惧、焦虑，对死亡的担忧，想到将来的事情时预先的“战栗”。但它也可以是轻微的，掠过肌肤，宣示着快乐或享受。……人说水在沸腾前会“战栗”，那就是我们说的引诱。<sup>①</sup>

结论仿佛是向友人卡米拉和瓦雷里奥·阿达米的最后致敬：“艺术家是只有手在“战栗”时才成为艺术家的人，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在深处，将会来临什么，将来临的由他人规定。”<sup>②</sup>但德里达本人难道不是最终实现了尼采关于哲学—艺术家的梦吗？

※ ※ ※

雅克和玛格丽特从意大利回来不久，老友大卫·卡洛尔和苏珊娜·吉尔哈特来到里斯-奥朗吉斯共进晚餐。他们到达时，德里达还在书房，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学生论文打出详细的报告。尽管他在病中，在他最后的研讨课结束一年多后，学生的论文仍在源源不断寄到。卡洛尔讲道：“我不知道有另外任何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花时间和精力批改和评点学生的文章。他毫不犹豫做这件事——虽说他确实会发点牢骚——因为这是他的义务，是他职责的一部分。”<sup>③</sup>

652 在当晚的会面中，一个棘手的主题被有意避开：这就是德莱根·库均兹克事件，它严重地影响了德里达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关系。一切开始于2003年春，他最后一次去尔湾之后不久。早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采取了一项新的措施，正式禁止教师与学生之间，甚至在学校职员之间的任何亲密关系。德莱根·库均兹克指导毕业论文的一名女生同他建立了关系，随后控告他性骚扰。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因素支持展开司法程序，但大学还是决定中止

① Jacques Derrida, “Comment ne pas trembler”, *Annali*, 2006-II, Bruno Mondadori, p. 97-98.

② *Ibid.*, p. 97.

③ David Carroll, “Jacques Derrida ou le don d’écriture-quand quelque chose se passe”, *Rue Descartes* n° 48,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106.

同德莱根的聘任合同。希利斯·米勒讲道：“关于此事，我同雅克在电话里讨论过好几次，他非常关注。过去，从保罗·德·曼开始，许多教师与从前的学生结了婚而且婚姻幸福。这项规定在我们看来有些过分。德莱根也许对这个女子做出了不应有的许诺，但美国人过于倾向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德里达在这场事件中维护的不仅是他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朋友，还是一名遭到雇主侵犯的员工。”<sup>①</sup>

总之，2004年7月25日，德里达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校长拉尔夫·希思罗纳（Ralph J. Cicerone）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他的惊讶、忧虑和愤慨。

我将立刻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在原则上完全同意旨在阻止甚至打击美国定义为“性骚扰”的行为的一切规则。在原则上，这些法规在我看来是公正和有用的。但每个人都知道，在实践上，它们可能导致滥用的、反复的，甚至是堕落的和邪恶的工具化。

首先，从概率上看，我可以从众多我信任的同事（其中显然包括德莱根）对我说的话得出见证。很明显原告的指控是滥用的和居心不良的（我不想说是邪恶的）。既然对她没有过任何限制或暴力，对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的假设的“无辜”亦无损害（而且如此不可能！），她从哪里找到资源，她如何能够声称自己有权利启动这场如此严重的程序，而且针对一位可尊敬的且为所有人尊敬的教师采取如此沉重的司法—学术官僚行动？我还听说，在调查过程中，特别是在行政部门就有关法律的新规定知会我们的同事（事实上未曾知会）时，并非所有合法程序都得到了遵守。<sup>②</sup>

德里达强硬地提醒道，出于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信任的友谊”，他才将他所有的资料赠送给了图书馆特别收藏处。 653

我准备向您说的话，我以誓言向您保证，在我心中决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压力。但我出于义务对您说出关于此事的真相，即如果为了我刚刚对您陈述的所有理由，不中止或取消针对德莱根·库均兹克的可耻程序的话，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惩罚玷污了他和学校的荣誉的话，我将怀着忧伤不得不立即中止我同加州大学的所有关系。……

① 同希利斯·米勒的访谈。

② 德里达致拉尔夫·希思罗纳的信，2004年7月25日。全文可见：<http://jacques-derrida.org/Cicerone%20French.html>。

另一个后果：当然，由于我决不会收回我已经赠与的一切，我的档案将始终是加州大学和特别收藏处的财产。但很自然我帮助建构这些档案（一直在进行中而且年年增加）时的心情受到了严重影响。我并不否认我的承诺，但我将很遗憾做出了这些承诺并将最大限度减少其实施。

但德里达在尔湾的几位朋友和同事对他的立场感到很遗憾，认为他太快地对某些友人的压力让步。斯蒂芬·巴克尔叹道：“很可惜他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学校的规定很清楚，德莱根·库均兹克违反了规定。德里达用过分而且有些天真的方式写下了他的《我控诉》。无论怎样，正式程序已经启动，校长不再有选择；他不能更改已经采取的决定。”<sup>①</sup>

654 从4月起，德里达一直没有时间审读让·勃恩鲍姆的采访。埃德维·普莱奈尔突然坚持在夏末之前尽快刊登。德里达对这样的急切感到不快：他不信任《世界报》，感到它从未喜欢过他。经过勃恩鲍姆的坚持和玛格丽特的支持，雅克才同意再读此文。他们一起工作了好几次才确定了最终版本。勃恩鲍姆讲道：“他仔细重读了全文，包括我的提问。他想从谈论他的病情来开始，但坚持问题由我提出。文章中垂暮的感觉来自于他。他想要精心润色这篇遗嘱式的文字，不把‘最后的话’留给任何人。”<sup>②</sup>

德里达一反传统的智慧，用证实开始了访谈：

不，我从未“学会生活”。丝毫不曾。学会生活，这应该意味着学会死亡，接受它，意识到绝对的死亡性（没有拯救，没有复活，没有救赎——不为自我也不为他人）。从柏拉图起，这就是古老的哲学训诫：从事哲学，便是学会死亡。我相信这一真理，但不曾服从，越来越不能。我没有学会接受，死亡。我们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但我无法学会死亡的智慧，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生活

---

<sup>①</sup> 同斯蒂芬·巴克尔的访谈。雅克·德里达去世后不久，其家人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特别收藏部负责人的关系将恶化。杰基·都里不久即向玛格丽特询问什么时候重新寄来档案，就好像德里达写给校长的信从不存在。但这封信毫无秘密可言：它由佩吉·卡穆夫翻译成英文，在当事各方广为流传，后来又可在网上看到。玛格丽特因此重申了雅克关于档案的立场：已经捐赠的部分不可能收回，但不会再有新的捐赠。几个月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对德里达一家启动法律程序，造成了真正的打击：一天早晨，邮递员带给玛格丽特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法院的挂号信，要求支付50万美元的赔偿，因为没有收到“后续”的捐赠，即最近的手稿。很可能这是警告式的举动：校方担心玛格丽特、皮埃尔和让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将已捐赠的档案返回法国，而他们从未有过这个念头。2007年年初，这件在许多方面令人痛苦和耻辱的事让法国和美国报刊刊登了好几篇文章，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撤回了起诉，并同特别收藏处的新负责人达成了临时和解协议。德里达的档案目前分布在法国当代出版资料馆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但同最初设想的相反，两所机构之间没有进行复印件的互换。

<sup>②</sup> 同让·勃恩鲍姆的访谈。



的智慧。对此我从未学会或获得什么。而且，我们这么说吧，由于一些健康问题，愈益紧迫地，在我生命的每一刻，具体而不倦地，始终真实地缠绕着我的余存或缓期的问题，在今天染上了另外的色彩。我始终对这余存的主题感兴趣，其意义并非叠加于生活和死亡之上。它是原初的：生命就是余存。<sup>①</sup>

这篇长篇采访的全文将在雅克·德里达去世一年之后成为一本小书。《终于学会生活》(*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是一篇精彩清晰的文字，也许是对他作品的最好介绍。最后几句话感情充沛，任凭长期克制的情怀喷薄而出：

我从未像在幸福和享乐的时刻那样如此纠缠于死亡的必然性。享乐，悲伤于环伺的死亡，这对我是同样的事。当我回忆一生时，我倾向于认为我有过这样的运气，即热爱生命中哪怕是不幸的时刻，并为之祝福。几乎所有这样的时刻，除了一次以外。当我回忆起幸福的时刻，我当然也为之祝福，与此同时它们将我推向死亡的思考，面向死亡，因为它们已经过去，终结。……<sup>②</sup>

2004年8月14日晚，最后重读了一遍将在《世界报》上发表的采访之后，德里达乘飞机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围绕他作品举行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和巴西政府组织，一年多前已经定下来，主持人是他在高等研究学校的前学生之一、他在巴西的特别对话者伊万多·纳西曼托 (Evando Nascimento)。就在预计出发前一个月，德里达告知对方自己的担心：他感觉不是很好，不确定能够实践承诺。大家都让他放心，保证说如果他取消行程的话没有人会怪他。但最终他决定前往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和国家。当伊万多在机场接他时，德里达充满感情地对他说：“您知道，这仍然是我做过的最不可能的旅行。”纳西曼托承认，“他从科英布拉研讨会以来变了些，但看起来仍然健康。他平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虽然我好几次建议他回考帕卡巴纳酒店休息，他还是坚持参加这漫长的三天的所有会议。他用耳机聆听同声传译，并在辩论中发言。”<sup>③</sup>

研讨会在法国馆会议厅举行。听众来自巴西各地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可能让所有人进来。面对热情的听众，雅克·德里达2004年8月16日星期一

① Jacques Derrida,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entretien avec Jean Birnbaum, *op. cit.*, p. 26-27.

② *Ibid*, p. 55.

③ 同伊万多·纳西曼托的访谈。

在里约发表了开幕演讲，这是他最后一次研讨会的最后一次演讲：《宽恕，和解，真理：什么体裁？》他讲了整整三个小时，精彩纷呈。纳西曼托肯定地说，“对他而言，来到巴西是对生命的确认。不知道他生病的人意识不到，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虚弱的迹象。结束演讲时，他微笑着说：‘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不想让你们疲劳。’”

闭幕演讲由贝尔纳·斯蒂格勒发表。他专程赶来，主要是为了再见最后一面对他的生涯如此重要的人。他讲道：“到达大厅时，我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他老了，瘦了，表达起来似乎有困难。但从演讲开始他就变回了他自己。他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激进，这是最让我吃惊的事之一。”斯蒂格勒回忆起在法国大使公馆的一次午餐，德里达十分反对小布什，并为卡斯特罗辩护。斯蒂格勒接着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在我讲演结束时，我们进行了一场在我们一生中罕见的真正的讨论，是我论文答辩后的第一次。他强硬地争辩，毫不松懈，但也聆听我的辩解。对他来说也许只有在公众面前才有真正的讨论。”<sup>①</sup>

657 雅克每天给玛格丽特打两次电话。他说很高兴这次旅行，并感到有所改善。他的日程却同以往一样满满当当：他发表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接受了全球电视台和《圣保罗页报》的采访，甚至同意进行了一次签名活动。

从巴西回来后，人们给了他一份8月19日的《世界报》，上面刊登了他同勃恩鲍姆的长篇访谈，题为《我同自己作战》。他看起来既高兴又难过：“这是讣告”，他叹息道。照片尤其让他震动，其尺寸衬托出一种生硬感。他对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吐露：“知道我病了，这还不够，我说出来，这还不够，他们想在我脸上看出疾病的痕迹，想让读者看出来。”<sup>②</sup>

与此相反，莱尔纳手册关于他的专辑的出版让他感到由衷的喜悦。吉奈特·米肖回忆道：“同玛丽-路易丝·马莱一起，我们全力以赴准备这本大书。我们一定要让他看到。他翻阅时惊喜不已。他掂着这部628页的大开本书，像个孩子一样高兴。”<sup>③</sup>

但他的状况很快恶化。他吃饭越来越少，夜晚越来越痛苦。9月初的一个周末，玛格丽特不得不打电话紧急送他到居里医院。她讲道：“那个星期天，当救护车到达时，他回头看了看房子，好像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病情出现了转折’，医生第

---

① 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访谈。

② É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Derrida: l'exercice des médias lui a été profitable”, *L'Humanité dimanche*, 16 janvier 2005.

③ 同吉奈特·米肖的访谈。

二天对我说。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预感到他离终点这么近。”<sup>①</sup>

医务人员对来访表现得十分宽大，德里达接待了许多探视者。皮埃尔同他的伴侣让娜·巴里巴尔，让和妻子埃玛纽埃尔。让-吕克·南希、玛丽-路易丝·马莱、埃莱娜·西克苏和勒内·马若尔也频频前来探望。

10月初的几天，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里达的传言很盛。前一年他的名字就被提到过，但这次声响越来越大。好几家法国报纸已经开始为此准备长篇文章或专刊。与萨法·法蒂通过一次电话之后，玛格丽特对雅克说：“看来你要得诺贝尔奖了。”这时她看到他脸上有泪：“为什么？”她问他。“他们想给我诺贝尔奖，因为我要死了。”

10月6日，诺贝尔奖最终颁给了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剥夺了哲学从亨利·柏格森（1927）、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950）和让-保罗·萨特（1964）以来不再有过的神圣认可，也剥夺了德里达实现他最古老深刻的梦。

在法语史上留下踪迹，这是我感兴趣的事。我活在这激情中，如果不是为了法国的话，至少为了法语从许多个世纪以来融合的一切。假如我像爱我的生命那样爱这门语言，有时比某个出生于法国的人更甚的话，那是因为我爱它如同一个被接纳的异乡人，他使这门语言成为自己的财富，就像他唯一的可能性。<sup>②</sup>

止痛胶布此后无法再减轻他的痛苦，雅克只能接受吗啡治疗。需要的时候他能够通过一个泵使用吗啡，但他害怕用它。一天早晨，他担心地对玛格丽特说：“这是什么音乐？附近有一家夜总会吗？”她讲述道：“他以为听到了阿拉伯音乐。随后他开始抱怨闻到奇怪的厨房的味道。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三个黑衣人进入房间四处搜索。得用一点丁间醇醛才让他中止这些幻觉。”

德里达完全无法再进食。他患了肠梗阻，需要进行六个多小时的手术。雅克醒来后不久对前来探望他的让-吕克·南希称自己现在有一条和朋友一样长的伤疤，暗指后者的心脏移植。“他在开玩笑——他一直都喜欢笑——但他的疲倦和焦虑让他的

① 同玛格丽特·德里达的访谈。

② Jacques Derrida,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op. cit., p. 38-39.

口气不是那么愉快。”<sup>①</sup> 照医生的说法，手术很成功，治疗可以重新进行。但情形急转直下，当夜玛格丽特接到电话：“您的丈夫陷入昏迷。”等她赶到居里学院时已经太晚了。病房里所有的仪器都已拔下。雅克·德里达于2004年10月9日星期六溘然长逝，享年74岁。

※ ※ ※

在里斯-奥朗吉斯，玛格丽特在一个信封里发现了一封给她和孩子们的信，是德里达在住院前不久写的。他主要对葬礼做出了安排，希望有很少的人参加，尽可能低调。同犹太传统相反，他要求不要太快下葬，好有复活的机会。这是对让-吕克·南希的最后回顾。

10月12日，尽管没有发出任何通告，人群还是挤满了于姆街，堵塞了人行道。但只有家庭成员和十分亲密的友人目睹了将遗体从距高等师范学校几米之遥的居里学院搬离的过程。

像人们可以想象的，雅克·德里达更希望土葬而不是火化。在里斯-奥朗吉斯公墓，面对敞开的坟茔，气氛忧伤而茫然。一些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好几个人专程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但一切都显得太快。如德里达希望的，葬礼没有任何官方意味，杰克·朗虽然在场，却是以个人名义。皮埃尔私下里希望，丹尼尔就算不出现，也至少有一个信号。但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举动。

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几名犹太人，但雅克·埃里·德里达希望被葬在犹太人的方形墓区之外，好在那天到来时不跟玛格丽特分开。他的兄长勒内穿着犹太仪式用的披巾。没有人敢祈祷，因为雅克不希望。“于是，”勒内说，“我在心里默念犹太教祈祷文。”

肃穆的沉默笼罩着，但只有离墓地最近的人能听到皮埃尔阅读德里达准备的几句话。像34年前的父亲，他撰写了自己的墓志铭：

雅克不希望有仪式或祷告。他凭经验知道这对担当此任的朋友来说是怎样的折磨。他请我对你们前来表示感谢，为你们祝福，他请求你们不要悲伤，想一想你们让他有幸与你们分享的那许多美好时光。

对我微笑吧，他说，就像我会对你们微笑，直到最后。

---

<sup>①</sup> Jean-Luc Nancy, “Trois phrases de Jacques Derrida”, *Rue Descartes* n° 45,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69.

永远更爱生命，不断肯定生命的余存……

我爱你们，对你们微笑，无论我在何方。<sup>①</sup>

谁将继承，怎样继承？会有继承者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可以比任何时候都适于提出。它不断地占据着我。……

对于思想而言，余存的问题此后有着绝对难以预料的形式。在我的年纪，我准备好了面对最为矛盾的假设：请你们相信，我同时拥有这双重感觉，一方面，我可以微笑着不谦虚地说，人们还没有开始阅读我，如果说确实有许多很好的读者的话（这世界上也许有几十位这样的读者，他们同时也是作家—思想家、诗人），那么在根本上，这一切将来才有机会浮现；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我死后十几天或一个月之后，什么都不会再留下。除了合法保存在图书馆的东西。我向你们发誓，我真诚地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

——雅克·德里达：《终于学会生活》

---

<sup>①</sup> Jean-Luc Nancy, “Trois phrases de Jacques Derrida”, *Rue Descartes* n° 45,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op. cit.*, p. 6.

# 资料来源

## 德里达的档案

L'essentiel des considérables archives personnelles de Jacques Derrida se trouve rassemblé dans deux fonds, que j'ai minutieusement explorés :

### *Le fonds Derrida des « Special Collections » de l'université d'Irvine en Californie*

On y trouve notamment :

les travaux d'étudiant : lycée, hypokhâgne et khâgne, 1946—1952;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1952—1956 ;

les manuscrits des cours et séminaires, 1959—1995 ;

les manuscrits des ouvrages, articles et conférences, 1959—1995 ;

des carnets personnels ;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ffaire Paul de Man ;

des articles de presse, 1969—2002.

### *Le fonds Derrida de 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MEC) près de Caen, en France*

On y trouve notamment :

les manuscrits des cours et séminaires, 1995—2004 ;

les manuscrits des ouvrages, articles et conférences, 1995—2004 ;

l'ensemble des correspondances reçues, 1949—2004 ;  
de très nombreux livres, numéros de revues et articles de et sur Derrida ;  
des archives sonores et audiovisuelles.

Liste des principales correspondances reçues consultées à l'IMEC :

Robert Abirached, Suzanne Allen, Louis Althusser, Pierre Aubenque, Madeleine Aubier-Gabail, Michel Aucouturier, Étienne Balibar, Roland Barthes, Henry Bauchau, Jean Bellemin-Noël, Jean-Marie Benoist, Lucien Bianco, Maurice Blanchot, Lisa Block de Behar, Jean Bollack, Geneviève Bollème, Claude Bonnefoy, Yves Bonnefoy, Marie-Claire Boons, Pierre Bourdieu, Antoine Bourseiller, Mireille Calle-Gruber, Georges Canguilhem, John D. Caputo, Hélène Cixous, Éric Clémens, Catherine Clément, Olivier Corpet, Catherine David, Régis Debray, Michel Deguy, Jean Domercq, Didier Eribon, Jean-Pierre Faye, Maurizio Ferraris, Charles-Henri Flammarion, Élisabeth de Fontenay, Michel Foucault, Pierre Foucher, Maurice de Gandillac, Rodolphe Gasché, Jean Genet, Gérard Genette, Max Genève, Hans-Dieter Gondek, Jean-Joseph Goux, Gérard Granel, Hans Ulrich Gumbrecht, Karin Gundersen, Geoffrey Hartman, Édith Heurgon, Jean-Louis Houdebine, Jean Hyppolite, Edmond Jabès, Jos Joliet, Peggy Kamuf, Sarah Kofman, Julia Kristeva, Jack Lang,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Claude Lanzmann, Roger Laporte, Emmanuel Levinas, Micheline Levy, Jérôme Lindon, Michel Lisse, Robert Maggiori, René Major, Catherine Malabou, Serge Malausséna, Paul de Man, J. Hillis Miller, Michel Monory, Alan Montefiore, Jean-Luc Nancy, Pierre Nora, Jean-Claude Pariente, Bernard Pautrat, Jean Piel, Jean Ricardou, Paul Ricœur, Jean Ristat, Avital Ronell, Élisabeth Roudinesco, Michel Serres, Philippe Sollers, Bernard Stiegler, Paule Thévenin, Elisabeth Weber, Samuel Weber, David Wills, Heinz Wisman.

Des documents liés à Jacques Derrida sont également conservés à l'IMEC dans les fonds suivants : Louis Althusser, Roland Barthes, Centre culturel international de Cerisy-la-Sall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Michel Deguy, Jean Genet, Sarah Kofman, Emmanuel Levinas, Parlement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Revue *Critique*, Revue *Tel Quel*.

## 其他查阅过的资料

Archive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es, La Courneuve  
Archives du lycée Louis-le-Grand  
Archives de Gérard Granel  
Archives de Roger Laporte  
Bibliothèque de travail de Jacques Derrida, Ris-Orangis

Fonds Henry Bauchau, Louvain-la-Neuve  
Fonds Paul Ricœur, Paris

S'il conservait tous les courriers reçus, y compris les cartes postales et les plus petits billets, Jacques Derrida ne faisait que très rarement de doubles de ses propres lettres. D'importantes recherches ont donc été nécessaires pour retrouver et pouvoir consulter les plus importantes de ces correspondances, par exemple celles avec Louis Althusser, Gabriel Bounoure, Paul Ricœur, Maurice Blanchot, Paul de Man, Michel Foucault, Henry Bauchau, Sarah Kofman,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Jean-Luc Nancy, Roger Laporte, Emmanuel Levinas, Catherine Malabou, Avital Ronell, Philippe Sollers... Plus précieuses encore sont parfois les lettres envoyées par Jacques Derrida à quelques grands amis de jeunesse, pendant les années de formation, notamment à Michel Monory et Lucien Bianco.

## 访 谈

Liste des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

Robert Abirached, Fernand Acharrok, Camilla Adami, Valerio Adami, Pierre Alféri, François Angelier, Jean-Marie Apostolidès, Michel Aucouturier, Catherine Audard, Étienne Balibar, Denis Baril, Stephen Barker, Alan Bass, Philippe Beck, Jean Bellemin-Noël, Geoffrey Bennington, Lucien Bianco, Jean Birnbaum, Tom Bishop, Rudolf Boehm, Jean Bollack, Marie-Claire Boons, Anne-Pascale Brault,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Ellen Burt, Mireille Calle-Gruber, David Carroll, Hélène Cixous, Éric Clémens, Catherine Clément, Chantal Colliot, Olivier Corpet, Paul Cottin, Marc Crépon, Françoise Dastur, Albert Dauassin, Régis Debray, Michel Deguy, Denis Delbourg, Évelyne Derrida, Janine Derrida-Meskel, Jean Derrida, Marguerite Derrida, René Derrida, Dominique Dhombres,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Albert Dichy, Thomas Dutoit, Alexander Garcia Düttmann, Didier Eribon, Jean-Pierre Faye, Maurizio Ferraris, Jean-Jacques Forté, Pierre Foucher, Carlos Freire, Gérard Genette, Max Genève, Daniel Giovannangeli, Jean-Joseph Goux, Ortwin de Graef, Évelyne Grossman, Karin Gundersen, Werner Hamacher, Geoffrey Hartman, Robert Harvey, Éric Hoppenot, Jean-Louis Houdebine, Denis Kambouchner, Peggy Kamuf, Julia Kristeva, Jack Lang, Hadrien Laroche, Dominique Lecourt, Bernard-Henry Lévy, Micheline Lévy, Michel Lisse, Robert Maggiori, René Major, Catherine Malabou, Serge Malausséna, Marie-Louise Mallet, Martine Meskel, Pierrot Meskel, Ginette Michaud, J. Hillis Miller, Michel Monory, Alan Montefiore, Jean-Paul Morel, Njoh Mouellé, Michael Naas, Claire Nancy, Jean-Luc Nancy, Evando Nascimento, Monique Nemer, Maurice Olender, Jean-Claude Pariente, Bernard Pautrat, Alain Pons, Richard Rand, Jean Ristat, Élisabeth Roudinesco, Adelaïde Russo, Philippe Sollers, Bernard Stiegler, Bernard Tschumi, Andrzej Warminski, Elisabeth Weber, Samuel Weber, David Wills, Heinz Wismann.



雅克·德里达主要的法文著作和文章<sup>①</sup>

**1962**

Edmund Husserl,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tra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 Jacques Derrida, PUF.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Minuit.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Seuil.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UF.

**1972**

*La dissémination*, Seuil.

*Marges – de la philosophie*, Minuit.

*Positions*, Minuit.

**1973**

« L'Archéologie du frivole » (introduction à *l'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de Condillac*), Galilée.

**1974**

*Glas*, Galilée.

---

<sup>1</sup> Les textes et ouvrages utilisés pour écrire cette biographie ont été cités dans les notes. On trouvera des bibliographies complètes des entretiens et articles de Derrida, ainsi que des ouvrages le concernant, dans *Derrida*, Cahier de L'Herne, publié en 2004, ainsi que dans le livre *Jacques Derrida* de Geoffrey Bennington réédité en 2008 au Seuil.

1975

« Économimesis », in *Mimesis des articulations*, Aubier-Flammarion.

1976

« Fors », préface à *Le Verbier de l'Homme aux loups* de Nicolas Abraham et Maria Torok, Aubier-Flammarion.

1978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Flammarion.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Flammarion.

« Scribble », préface à *l'Essai sur les hiéroglyphes* de Warburton, Aubier-Flammarion.

1980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Flammarion.

1982

*L'oreille de l'autre*, textes et débats, éd. C. Lévesque et C. McDonald, Montréal.

1983

*D'un ton apocalyptique adopté naguère en philosophie*, Galilée.

1984

*Otobiographies. L'enseignement de Nietzsche et la politique du nom propre*, Galilée.

1985

« Lecture » de *Droit de regards* de Marie-Françoise Plissart, Minuit.

« Préjugés : devant la loi », in *La faculté de juger*, Minuit.

1986

« Forcener le subjectile » in *Dessins et Portraits d'Antonin Artaud*, Gallimard.

*Parages*, Galilée.

*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 Galilée.

1987

*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Galilée.

*Feu la cendre*, Des Femmes.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Galilée.

*Ulysse gramophone. Deux mots pour Joyce*, Galilée.

**1988**

*Mémoires – pour Paul de Man*, Galilée.

**1990**

*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Galilée.

*Mémoires d'aveugle. L'autoportrait et autres ruines*, Louvre,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PUF.

**1991**

*L'autre cap*, Galilée.

*Circonfession*, in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Jacques Derrida*, Seuil.

*Donner le temps. 1. La fausse monnaie*, Galilée.

**1992**

*Points de suspension*, Galilée.

**1993**

*Khôra*, Galilée.

*Passions*, Galilée.

*Sauf le nom*, Galilée.

*Spectres de Marx*, Galilée.

**1994**

*Force de loi. Le fondement mystique de l'autorité*, Galilée.

*Politiques de l'amitié*, Galilée.

**1995**

« Avances », préface au *Tombeau du dieu artisan* de Serge Margel, Minuit.

*Mal d'archive*, Galilée.

*Moscou aller-retour*, Éditions de l'Aube.

**1996**

*Apories*, Galilée.

« Foi et savoir », in Gianni Vattimo et Jacques Derrida, *La religion*, Seuil.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Galilée.

*Résistances – 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Échographies – de la télévision*, entretiens filmés avec Bernard Stiegler, Galilée.

**1997**

*Adieu – à Emmanuel Levinas*, Galilée.

*Cosmopolites de tous les pays, encore un effort!*, Galilée.

*Le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du point de vue cosmopolitique*, Verdier.

*De l'hospitalité*, avec Anne Dufourmantelle, Calmann-Lévy.

**1998**

*Demeure – Maurice Blanchot*, Galilée.

*Voiles*, avec Hélène Cixous, Galilée.

**1999**

*Donner la mort*, Galilée.

*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 Éditions de l'Aube/France-Culture.

*La contre-allée. 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Louis Vuitton.

**2000**

*États d'âme 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Foi et savoir*, Seuil.

*Le toucher*, Jean-Luc Nancy, Galilée.

*Tourner les mots. Au bord d'un film*, avec Safaa Fathy, Galilée/Arte éditions.

**2001**

« Une certaine possibilité impossible », in *Dire l'événement, est-ce possible?*, séminaire de Montréal, L'Harmattan.

« De la couleur à la lettre », in *Atlan grand format*, Gallimard.

« La forme et la façon », préface à *Racisme et antisémitisme* d'Alain David, Ellipses.

*Papier Machine*, Galilée.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Galilée.

« La veilleuse », préface à *James Joyce ou l'Écriture matricide* de Jacques Trilling, Circé.

*La connaissance des textes. Lecture d'un manuscrit illisible*, avec Simon Hantaï et Jean-Luc Nancy, Galilée.

*De quoi demain...*, dialogue, avec Élisabeth Roudinesco, Fayard/Galilée.

« Tête-à-tête », in *Camilla Adami*, Edizioni Gabriele Mazzotta.

**2002**

*Artaud le Moma*, Galilée.

*Fichus*, Galilée.

*H. C. pour la vie, c'est à dire*, Galilée.

*Marx & Sons*, PUF/Galilée.

*Au-delà des apparences*, entretien avec Antoine Spire, Le Bord de l'eau.

**2003**

*Béliers. Le dialogue ininterrompu : entre deux infinis, le poème*, Galilée.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 Galilée.  
*Genèses, généalogies, genres et le génie*, Galilée.  
*Voyous*, Galilée.

**2004**

*Le « concept » du 11 septembre*, avec Jürgen Habermas, Galilée.  
 « Le lieu-dit : Strasbourg », in *Penser à Strasbourg*, Galilée.  
*Prégnances. Lavis de Colette Deblé. Peintures, L'Atelier des brisants*.

**2005**

*Apprendre à vivre enfin*, avec Jean Birnbaum, Galilée.  
*Déplier Ponge. Entretien avec Gérard Faras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6**

*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Galilée.  
 « Le sacrifice », postface à *L'Éternel Éphémère* de Daniel Mesguich, Verdier.  
 « En composant “Circonfession” », in *Des Confessions, Jacques Derrida et saint Augustin*, Stock.

**2008**

*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1, Galilée.

**2009**

*Demeure, Athènes*, avec des photographies de Jean-François Bonhomme, Galilée.

**2010**

*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2, Galilée.

雅克·德里达著作（包括访谈录和讲演录）  
 中文译本（不包括台湾译本）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文学行动. 赵兴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论文字学.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2004.
- 马克思的幽灵们. 何一,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008.
- 声音与现象. 杜小真,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9, 2010.
- 多义的记忆. 蒋梓骅,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书写与差异. 张宁,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
- 明天会怎样: 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 苏旭,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
-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 杜小真, 张宁,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论瓦尔特·本雅明. 郭军,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多重立场. 余碧平,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4.
- 德法之争: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 孙善春, 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 恐怖时代的哲学: 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 王志宏,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方向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解构与思想的未来. 夏可君, 等, 编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 宗教. 杜小真,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6.
- 论好客. 贾江鸿,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 朱刚,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于奇智,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9.
-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 胡继华,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无赖. 汪堂家, 李之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致 谢

我对玛格丽特·德里达的感谢无以言表；没有她的信任，这部作品是不可想象的。她允许我完全自由地参阅所有的档案，并耐心而准确地对我的无数问题做出了答复。我也感谢玛格丽特和雅克·德里达的儿子皮埃尔和让，以及勒内和艾芙琳·德里达，雅尼娜和皮埃勒·麦斯凯尔，玛尔蒂娜·麦斯凯尔和米什琳·莱维。

德里达的一大部分档案收藏在当代出版资料馆（IMEC）。在那里工作令人十分愉快。我对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特别是馆长 Olivier Corpet，副馆长 Nathalie Léger，文学档案负责人 Albert Dichy，以及德里达档案及信件的负责人 José Ruiz-Funes 和 Mélina Reynaud。他们热忱的帮助与工作能力对我极为珍贵。我也要向 Claire Paulhan 致谢，她为我提出了许多成果丰硕的建议。

雅克·德里达的另一部分公开档案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特别收藏处”。我要对 Jackie Dooley, Steve McLeod 及其团队的高效工作表示感谢。在此我也特别感谢 Patricia de Man, Jacqueline Laporte, Dominne 和 Hélène Millieux, Christophe Bident, Éric Hoppenot, Michael Levinas, Avital Ronell, Ginette Michaud, Michel Monory, Jean-Luc Nancy 和 Jean Philippe, 还有 Marianne Cayatte (路易大帝高中档案馆), André Vivet (勒芒孟德斯鸠高中校友会), Françoise Fournié (热拉尔·格拉奈尔档案馆), Myriam Watthee-Delmotte (亨利·博肖档案馆), Catherine Goldenstein (巴黎保罗·利科档案馆), Bruno Roy (罗日·拉波尔特档案馆), Claire Nancy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档案馆), 以及所有帮助我找到罕见的信件或资料的人士。

我也衷心感谢所有对我提出建议、意见和鼓励的人士，感谢 Valérie Lévy-Soussan 日常的聆听、建议与支持，还有 Marie-Françoise Plissart, Sandrine Willems, Marc

Avelot, Jan Baetens, Jean-Christophe Cambier, Luc Delliges, Archibald 和 Vladimir Peeters, Hadrien 和 Gabriel Pelissier。我也要向 Sophie Dufour 表示感谢，她怀着细心与热情誊写了许多条引文。最后还要特别感谢 Christian Rullier；他知道为什么。

我对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人文科学处负责人 Sophie Berlin 怀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没有她，我不会投身于这一工作，也不会有力量完成它。



# 人名索引

(所列页码即本书边码)

- Abirached, Robert, 罗贝尔·阿比拉舍德, 55, 83, 103, 168, 540
- Aboulker, José, 约瑟·阿布克, 32
- Abraham, Nicolas, 尼古拉·阿伯拉罕, 135, 351 - 354, 449, 534
- Acharrok, Fernand, 菲尔南·阿沙洛克, 21, 30, 36, 37, 52, 67, 69
- Adami, Camilla, Mme Valerio, 卡米拉·阿达米, 瓦雷里奥·阿达米夫人, 328, 329, 330, 357, 358, 365, 529, 645, 651, 684n
- Adami, Valerio, 瓦雷里奥·阿达米, 327 - 330, 357, 365, 395, 529, 645, 650, 651
- Adler, Laure, 劳尔·阿德勒, 586
- Adorno, Gretel, 葛雷特·阿多诺, 617
- Adorno, 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特奥多尔·阿多诺, 465, 617
- Agacinski, Daniel (1984), 丹尼尔·阿加辛斯基, 439, 579, 580, 625, 626, 659
- Agacinski, Sophie, 索菲·阿加辛斯基, 305, 579
- Agacinski, Sylviane, 希尔维亚·阿加辛斯基, 304 - 306, 308, 333, 336, 342, 358, 359, 363, 365, 367, 379, 393, 395, 438 - 440, 446, 516, 579, 624 - 629
- Alain-Fournier, Henri-Alban Fournier, dit, 阿兰-傅尼埃, 50
- Alain, Émile-Auguste Chartier, dit, 阿兰, 52
- Alféri, Pierre Derrida, dit Pierre, 皮埃尔·阿尔菲利, 498, 500, 也见 Derrida, Pierre
- Alleg, Henri, 亨利·阿莱格, 123, 149
- Allen, Allen Stewart Königsberg, dit Woody, 伍迪·艾伦, 531, 564
- Allende, Salvador Allende Gossens, dit Salvador, 萨尔瓦多·阿连德, 469
- Alluni, Charles, 夏尔·阿吕尼, 550

- Alquié, Ferdinand, 费尔迪南·阿勒吉耶, 86, 98
- Althusser, Hélène Rytman, Mme Louis, 埃莱娜·丽特曼·阿尔都塞, 路易·阿尔都塞夫人, 395 - 397, 399
-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 12, 14, 86, 92, 95, 96, 102 - 104, 107, 115 - 117, 130, 133, 134, 136, 138, 153, 154, 182 - 194, 200, 216, 222, 226, 245, 247, 251, 263 - 265, 281, 285, 289, 291, 292, 324, 336, 337, 343, 345, 349, 395 - 400, 406, 448 - 450, 508, 509, 534, 566, 582, 609, 610, 642
- Amade, Louis, 路易·阿玛德, 202
- Amrouche, Jean, 让·安鲁士, 43
- Anidjar, Gil, 吉尔·阿尼德加, 613
- Antonioni, Michelangelo, 米歇朗吉罗·安托尼奥尼, 544
- Apostolidès, Jean-Marie, 让-玛丽·阿波斯托利代斯, 480, 481
- Arago, (Dr), 阿拉格(医生), 636
- Aragon, Louis, 路易·阿拉贡, 177, 230, 249, 285, 292, 294, 295
- Arcady, Alexandre, 亚历山大·阿卡迪, 532
-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304, 305, 465
- Ariès, Philippe, 菲利普·阿利耶斯, 551
- Aristote, 亚里士多德, 9, 146, 231, 458, 577, 578, 605
- Aron, Jean-Paul, 让-保罗·阿隆, 135
- Aron, Raymond Claude Ferdinand Aron, dit Raymond, 雷蒙·阿隆, 80, 95, 430
- Artaud, Antoine Marie Joseph Artaud, dit Antonin, 安托南·阿尔托, 42, 43, 161, 166, 170, 181, 197, 198, 217, 252, 264, 281, 288, 294, 301, 325, 462, 582, 587 - 590
- Askolovitch, Claude, 克洛德·阿斯克洛维奇, 625
- Assaad, Fauzia, 弗茨亚·阿萨德, 303
- Aubenque, Pierre, 皮埃尔·奥邦克, 231, 232, 265, 274, 391, 392
- Aubier-Gabail, Madeleine, 玛德莱娜·奥比耶-加巴耶, 374
- Aubral, François, 弗朗索瓦·奥布拉尔, 370
- Aucouturier, famille, 欧库图里耶, 家庭, 101, 108, 120, 121, 143, 180
- Aucouturier, Gustave, 古斯塔夫·欧库图里耶(雅克·德里达的岳父), 87, 101, 108, 120, 180, 415
- Aucouturier, Marguerite, 玛格丽特·欧库图里耶, 见 Derrida, Mme Jacques

- Aucouturier, Michel, 米歇尔·欧库图里耶(雅克·德里达的内弟), 70, 74, 87, 100, 101, 108, 124, 130, 180
- Aucouturier, Mme Gustave, 古斯塔夫·欧库图里耶夫人(雅克·德里达的岳母), 101, 108, 120, 180, 415
- Audard, Catherine, 卡特琳娜·欧达尔, 410, 415
- Audin, Maurice, 莫里斯·奥丹, 123, 149
- Austen, Jane, 简·奥斯汀, 69
- Austin, John Langshaw, 约翰·朗肖·奥斯丁, 282, 404, 528
- Avtonomova, Natalia, 娜塔莉亚·阿弗托诺莫娃, 596
- Axelos, Kostas, 克斯塔斯·阿克塞洛斯, 100, 240
- Ayer, Alfred Jules, 阿尔弗雷德·于勒·埃尔, 237
- Bach, 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266
- Bachelard, Gaston, 加斯东·巴什拉, 62, 170
- Bachelard, Suzanne, 苏珊娜·巴什拉, 146
- Bachmann, Ingeborg, 瑛格褒·巴赫曼, 305
- Badiou, Alain, 阿兰·巴迪乌, 216, 222, 255, 503, 505, 507, 623, 624
- Bakhtine, Mikhaïl, 米哈伊尔·巴赫金, 221
- Baladine-Howald, Isabelle, 伊莎贝拉·巴拉蒂纳-霍瓦尔德, 647
- Balibar, Étienne, 埃蒂安纳·巴里巴尔, 13, 183, 185, 189, 191, 192, 255, 396, 398-400, 421, 449, 450, 452, 610
- Balibar, Jeanne, 热娜·巴里巴尔, 657
- Balzac, Honoré d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42
- Barbie, Klaus, 克劳斯·巴比, 466
- Baring, Edward, 爱德华·巴林, 151
- Barker, Stephen, 斯蒂芬·巴克尔, 557, 653
- Barret, Philippe, 菲利普·巴莱, 423
-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尔特, 85, 168, 178, 203, 206, 209, 216, 221, 227, 250, 257, 292, 293, 294, 296, 370, 388, 441, 494, 545, 582, 601, 609, 642
- Bass, Alan, 阿兰·巴斯, 283, 284, 382, 386, 387, 512, 517, 524, 688n
- Bataille, Georges, 乔治·巴塔耶, 49, 167, 168, 217, 281, 288, 294, 300, 301
- Bauchau, Henry, 亨利·博肖, 204, 205, 233, 234, 248, 257, 287, 360
- Bauchau, Laure, Mme Henry, 劳尔·博肖, 亨利·博肖的夫人, 233, 257

- Baudelaire, Charles, 夏尔·波德莱尔, 50, 252
- Baudrillard, Jean, 让·鲍德里亚, 355, 452, 633
- Beaufret, Jean, 让·波弗莱, 52, 96, 182, 230, 240, 241, 255, 263, 471
- Beauvoir, Simone-Lucie-Ernestine-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 dite 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瓦, 277, 430, 440
- Bécaud, François Gilbert Léopold Silly, dit Gilbert, 吉尔贝·贝科, 202
- Beck, Philippe, 菲利普·贝克, 472, 505, 507
- Bellemin-Noël, Jean, 让·贝勒曼-诺埃尔, 54, 56-59, 65, 74, 178, 218, 540
- Benesti, 贝奈斯蒂(雅克·德里达的表兄弟), 264
- Benjamin, Walter, 沃尔特·本雅明, 10, 328, 329, 374, 473, 617
- Bennington, Geoffrey, 杰弗雷·贝宁顿, 15, 20, 359, 475, 476, 494, 495, 539, 540, 542, 550, 649
- Benoist, Alain de Benoist de Gentissard, dit Alain de, 阿兰·德·伯努瓦, 573
- Benoist, Jean-Marie, 让-玛丽·伯努瓦, 237, 323
- Bérard, Mme, 贝拉尔夫夫人, 65, 73
- Bergman, Ernst Ingmar, 恩斯特·英格曼·伯格曼, 440
- Bergson, Henri, 亨利·柏格森, 44, 80, 146, 185, 545, 576, 658
- Bernady, Claude, 克洛德·贝纳迪, 43
- Bernanos, Louis Émile Clément Georges Bernanos, dit Georges, 乔治·贝尔纳诺斯, 637
- Bernardo, Fernanda, 费尔南达·贝尔纳多, 640
- Bernstein, Richard, 理查德·伯恩斯坦, 619
- Bertin, Roland, 罗兰·贝尔丹, 326
- Bertrand, Louis Jacques Napoléon Bertrand, dit Aloysius, 阿洛伊修斯·贝特朗, 71, 163
- Bessières, Lucien, 吕西安·贝希尔, 47
- Bétourné, Olivier, 奥利维耶·贝图尔内, 607
- Bhabha, Homi, 霍米·巴巴, 556
- Bianco, Lucien, 吕西安·比昂科(中文名毕仰高), 14, 84, 85, 89-91, 93, 94, 99, 103, 106, 111-113, 123, 124, 126-130, 281, 431, 432, 615
- Bianco, Sylvie, 希尔维·比昂科, 129
- Birault, Henri, 亨利·毕罗, 98

- Birnbaum, Jean, 让·勃恩鲍姆, 645, 648, 654, 657
- Bishop, Tom, 汤姆·比绍普, 560, 561
- Blanchot, Maurice, 莫里斯·布朗肖, 10, 12, 14, 42, 49, 170, 173, 177, 195 - 198, 203, 240, 241, 246, 255, 262, 275, 276, 278, 294, 319, 347, 349, 361, 368, 394, 452, 453, 460, 468, 471, 481, 536, 544, 573, 578, 634, 635, 642, 696n, 697n, 704n, 709n
- Blin, Roger, 罗日·布兰, 198
- Bloch, Ernst, 恩斯特·布洛克, 135
- Bloom, Harold, 哈洛德·布鲁姆, 367, 526
- Blum, Léon, 雷翁·布罗姆, 80
- Boehm, Rudolf, 鲁道夫·伯赫姆, 91, 92
- Boileau, Nicolas, 尼古拉·布瓦洛, 292
- Bollack, Jean, 让·博拉克, 300, 344, 453, 454
- Bollème, Geneviève, 热娜维耶尔·波莱姆, 94, 206
- Bonaparte, Marie, 玛丽·波拿巴, 335
- Bonhomme,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博诺姆, 602
- Bonnefoy, Claude, 克洛德·博纳弗瓦, 76, 77
- Bonnefoy, René, 勒内·博纳弗瓦, 76, 77
- Bonnefoy, Yves, 伊夫·博纳弗瓦, 545, 546
- Boons, Marie-Claire, 玛丽-克莱尔·布斯, 204, 516, 533
- Borne, Étienne, 埃蒂安纳·博尔纳, 52, 53, 59, 61, 62, 72, 73, 75
- Borradori, Giovanna, 吉奥瓦纳·博拉多利, 611, 619
- Bossuet, Jacques-Bénigne, 雅克-贝尼涅·博絮埃, 642
- Bouhired, Djamilia, 贾米拉·布赫德, 108
- Boulez, Pierre, 皮埃尔·布列兹, 198, 277, 532, 617
- Bounoure, Bric, 布里耶克·布努尔, 191, 258
- Bounoure, Gabriel, 加布里埃尔·布努尔, 14, 171 - 173, 179, 191, 192, 195, 202, 214, 215, 217, 220, 242, 257, 258, 360, 405
- Bouquet, Carole, 卡洛尔·布凯, 327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尔迪厄, 13, 54, 84, 90, 113, 115, 122, 182, 324, 380, 448, 473 - 477, 478, 501, 545, 546, 572 - 574, 585 - 587
- Bourget, Paul, 保罗·布尔热, 41

- Bourseiller, Antoine, 安托纳·布尔塞耶, 326, 327
- Bousquet, Jean, 让·布斯凯, 274, 285, 300, 396, 397, 406
- Bouveresse, Jacques, 雅克·布弗雷斯, 191, 501-503, 546
- Boyer, Philippe, 菲利普·布瓦耶, 388
- Brague, Rémi, 雷米·布拉格, 263
- Brault, Anne-Pascale, 帕斯卡-安娜·布劳特, 562, 642
- Braun, Lucien, 吕西安·布劳恩, 271, 309
- Brecht, Bertolt, 贝尔托·布莱希特, 347
- Bréhier, Émile, 埃米尔·布列赫, 69
- Brejnev, Léonid Ilitch,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378
- Breton, André, 安德烈·布勒东, 60, 135, 449
- Brunet, Roland, 罗兰·布吕内, 342, 376, 380
- Brunold, M., 布鲁诺德, 138
- Brunschwig, Jacques, 雅克·布隆斯维格, 400, 401, 501
- Buci-Glucksmann, Christine, 克里斯蒂娜·布希-格鲁克斯曼, 245, 269
- Buren, Daniel, 丹尼尔·布兰, 462
- Burger, Rodolphe, 鲁道夫·布尔日, 500, 532
- Burt, Ellen, 艾伦·伯特, 558
- Bush, George Walker, 乔治·布什(小布什), 618, 634, 646, 656
- Busnel, François, 弗朗索瓦·布斯奈尔, 621
- Butler, Judith, 朱迪斯·巴特勒, 556
- Butor, Michel, 米歇尔·布托尔, 462
- Cadiot, Olivier, 奥利维耶·卡迪奥, 500
- Calle-Gruber, Mireille, 米莱耶·加尔-格鲁伯, 470, 600, 641
- Camus, Albert, 阿尔贝·加缪, 23, 37, 42, 43, 46, 79, 83, 99, 101, 149-151, 170, 561
- Camus, Renaud, 勒诺·加缪, 607, 621
- Canguilhem, Georges, 乔治·康吉莱姆, 146, 163, 164, 182, 185, 192, 194, 223, 236, 251, 265, 578
- Caputo, John D., 约翰·卡普托, 562
- Carrive, Elie, 埃里·卡里夫, 74, 87
- Carroll, David, 大卫·卡洛尔, 210, 228, 486, 524, 557, 558, 651

- Casanova, Antoine, 安托纳·卡萨诺瓦, 267, 287, 288, 291
- Casarès, María Victoria Casares Pérez, dite Maria, 玛丽娅·卡萨莱斯, 326
- Castellin, Philippe, 菲利普·卡斯特兰, 255, 263
- Castex, Pierre-Yves, 皮埃尔-伊夫·卡斯特克斯, 74, 75
- Castro, 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dit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656
- Celan-Lestrangle, Gisèle, 吉赛勒·策兰-莱斯特朗日, 305, 381
- Celan, Paul Pessach Antsche, dit Paul, 保罗·策兰, 239, 240, 266, 272, 305, 368, 381, 453, 454, 471, 507, 544, 637
- Céline, Louis Ferdinand Auguste Destouches, 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 466, 609
- Cerdan, Marcel, 马塞尔·塞当, 52
- Challe, Maurice, 莫里斯·夏勒, 128, 147
- Chaput, Thierry, 提耶里·沙比, 462
- Char, René Émile Char, dit René, 勒内·夏尔, 232, 240
- Charlot, Edmond, 埃德蒙·夏洛, 43
- Charnet, Yves, 伊夫·沙尔奈, 544
- Chase, Cynthia, 辛西亚·彻斯, 556
- Châtel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沙特莱, 203, 226, 251, 376, 377, 422, 423, 427, 462
- Chemetov, Paul, 保罗·舍莫托夫, 463
- Chérif, Mustapha, 穆斯塔法·谢里夫, 637, 638
- Chevalier, Maurice, 莫里斯·舍瓦利耶, 24
- Chevènement, Jean-Pierre, 让-皮埃尔·舍维纳芒, 422, 423, 428, 637, 638
- Cheysson, Claude, 克洛德·谢松, 415
- Chirac, Jacques, 雅克·希拉克, 626 - 628, 633
- Chomsky, Noam, 诺姆·乔姆斯基, 630
- Choski, Jean, 让·绍斯基, 44, 45
- Chrétien, Jean-Louis, 让-路易·克里廷, 605
- Cicéron, 西塞罗, 578
- Cicerone, Ralph J., 拉尔夫·希思罗纳, 652, 653
- Cimino, Michael, 迈克尔·希米诺, 532
- Cioran, Emil, 埃米尔·萧沉, 172
- Cixous, Hélène Berger, dite Hélène, 埃莱娜·西克苏, 12, 32, 35, 103, 178, 179, 250, 251, 314, 336, 437, 460, 516, 531, 540, 541, 600, 601, 613, 636, 639, 657

- Claudé, Paul, 保罗·克洛代尔, 50, 146, 169
- Clavel, Maurice, 莫里斯·克拉韦尔, 370
- Clemenceau, Georges, 乔治-克莱蒙梭, 22
- Clémens, Éric, 埃里克·克莱芒, 289-291, 522, 523
- Clément, Catherine Backès-Clément, 卡特琳娜·克莱芒, 245, 260, 269, 292, 295, 314, 315, 336, 355, 379, 380, 415, 529
- Clinton,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dit Bill, 比尔·克林顿, 564
- Cohen, Barbara, 巴巴拉·科昂, 635
- Cohen, Jean-Louis, 让-路易·科昂, 464
- Cohen, Joseph, 约瑟夫·科昂, 613
- Coleman, Ornette, 奥奈特·科尔曼, 590, 591
- Comte, 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 dit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374
- Condillac, Étienne Bonnot de, 艾提安纳·博诺·德·孔狄亚克, 273, 307, 318, 319
- Coogan, John Leslie Coogan, dit Jackie, 杰基·库根, 23
- Corbin, Henry, 亨利·科尔班, 47, 72, 203
- Corneille, Pierre, 皮埃尔·高乃依, 169
- Cornell, Drucilla, 德鲁西拉·康奈尔, 556
- Corpet, Olivier, 奥利维耶·科尔佩, 610
- Cottin, Paul, 保罗·科廷, 141
- Coty, René, 勒内·科蒂, 127
- Courtine,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库尔提那, 263
- Couve de Murville, Maurice,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248, 249
- Crébillon fils, Claude-Prosper Jolyot de Crébillon, dit, 小克雷彼翁, 388
- Crémieux, Adolphe, 阿道夫·克雷米厄, 22, 28, 29, 35, 128
- Cullenberg, Stephen, 斯蒂芬·卡伦伯格, 566
- Culler, Jonathan, 乔纳森·卡勒, 442, 489
- Cuss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居塞, 350, 554, 564
- Czarnecki, Jan, 扬·扎奈基, 47, 48
- Damisch, Hubert, 于贝尔·达米什, 292
- Darwin, Charles, 查理·达尔文, 490
- Dastur, Françoise, 弗朗索瓦兹·达斯图尔, 147, 162, 165, 494, 544, 545, 569



- Daumezon, Georges, 乔治·都莫宗, 87
- Daussin, Albert, 阿尔贝·多辛, 140
- David, Catherine, 卡特琳娜·大卫, 19, 430, 454
- David, M.-V., 大卫, 200
- Davidson, Arnold, 阿诺德·大卫逊, 562
- Davis, Angela, 安吉拉·达维斯, 277
-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35, 41, 126-128, 130, 138, 147, 148, 150, 246, 249, 261, 262
- de Graef, Ortwin, 奥特温·德·格拉夫, 478, 479
- de Man, Paul, 保罗·德·曼, 10, 12, 14, 227, 228, 235, 237, 284, 324, 337-339, 348, 349, 350, 351, 363, 366, 383, 402, 404-406, 424, 425, 440, 441, 442, 446, 447, 455, 465, 478-488, 489, 490, 506, 530, 534, 545, 552, 563, 577, 589, 594, 611, 642, 652, 676n
- de Man, Henri, 亨利·德·曼, 478, 481, 482
- Debord, Guy, 居·德波, 473
- Debray, Régis, 雷吉斯·德布雷, 183, 185, 191, 396, 398, 399, 415, 416, 621, 648
- Debré, Jean-Louis, 让-路易·德布雷, 627
- Deguy, Michel, 米歇尔·德基, 54, 56, 74, 168, 174, 178, 184, 200, 203, 216, 220, 232, 240, 254, 308, 446, 447, 450, 487, 511, 534, 593
- Delacampagne,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 313, 323, 347, 584, 621
- Delbourg, Denis, 德尼·代尔布尔, 415, 416
- Delcourt, Xavier, 格扎维埃·德尔古, 370
- Deleuze, Gilles, 吉尔·德勒兹, 95, 100, 226, 255, 257, 273, 300, 301, 302, 305, 319, 322, 352, 370, 371, 372, 376, 490, 531, 581, 582, 599, 642
- Delon, Alain Fabien Maurice Marcel Delon, dit Alain, 阿兰·德龙, 553
- Delorme, Michel, 米歇尔·德洛姆, 307, 320, 331, 346, 394, 395, 451, 452, 604
- Delouvrier, Paul, 保罗·德鲁夫里耶, 128
- Deluy, Henri, 亨利·德吕, 269
- Demornez, Jacqueline, 雅克琳娜·德莫内, 309
- Denys l' Aréopagite, dit aussi Pseudo-Denys, 法官狄奥尼西, 也称“伪狄奥尼西”, 461
- Derrida, Abraham, 阿伯拉罕·德里达(雅克·德里达的祖父), 23
- Derrida, Daniel, 丹尼尔·德里达, 见 Agacinski, Daniel

- Derrida, Emmanuelle, Mme Jean, 埃玛纽埃尔·德里达, 让·德里达夫人(雅克·德里达的儿媳), 657
- Derrida, Georgette Sultana Esther Safar, Mme Aimé, 乔吉特·苏塔娜·埃斯泰·萨法尔, 埃梅·德里达夫人(1901—1991), (雅克·德里达之母), 23, 24, 27, 28, 31, 33, 38, 41, 45, 50, 51, 78, 107, 120, 122, 155, 156, 157, 180, 248, 274, 283, 347, 387, 439, 496, 497, 525, 535, 536, 601
- Derrida, Haïm Aaron Prosper Charles Derrida, dit Aimé, 阿伊姆·阿隆·普罗斯佩·查理, 称埃梅·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父, 1896—1970), 19, 23, 28, 38, 39, 41, 50, 51, 54, 60, 91, 107, 118, 120, 155, 156, 157, 176, 180, 248, 273, 359, 361, 398, 403, 522, 523, 528, 535, 561, 618
- Derrida, Janine Meskel, 雅尼娜·麦斯凯尔, 闺姓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妹), 14, 21, 24, 28, 40, 109, 155, 156, 281, 427, 439, 536
- Derrida, Jean Louis Emmanuel, dit Jean (1967), 让·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子), 25, 222, 229, 233, 248, 252, 274, 281, 282, 283, 308, 330, 336, 357, 358, 402, 406, 415, 417, 439, 511, 514, 520, 524, 580, 636, 654, 657, 659
- Derrida, Josette, 罗塞特·德里达(雅克·德里达的表妹), 110
- Derrida, Marguerite Aucouturier, Mme Jacques, 玛格丽特·欧库图里耶, 雅克·德里达夫人, 14, 37, 70, 87, 100, 101, 106 - 108, 109, 110 - 112, 118 - 122, 123, 124, 125, 129, 130, 134, 136, 137, 139 - 141, 143, 145, 152, 153, 155, 177, 180, 198, 200, 205, 207, 212, 214, 222, 233, 248, 249, 251, 256, 274, 281 - 283, 288, 308, 328, 330, 352, 354, 357, 358, 359, 383, 384, 399, 400, 402, 411, 412, 414, 415, 417, 420, 421, 431, 432, 438, 439, 516 - 523, 525, 530, 535 - 537, 569, 581, 590, 635, 636, 638 - 640, 645, 650, 651, 653, 654, 656 - 659, 686n
- Derrida, Norbert, 诺尔贝·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弟), 28, 70, 361, 427, 641
- Derrida, Paul Moïse, 保罗·莫伊斯·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兄), 23, 361
- Derrida, Pierre, 皮埃尔·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子), 25, 170, 179, 200, 207, 212, 213, 214, 222, 229, 233, 248, 252, 255, 258, 272, 274, 281, 282, 283, 308, 330, 336, 357, 358, 383, 384, 387, 388, 406, 415, 424, 425, 439, 449, 498, 499, 500, 511, 520, 524, 532, 580, 636, 654, 657, 659, 660, 也见 Alféri, Pierre

- Derrida, René Abraham, 勒内·阿伯拉罕·德里达(雅克·德里达之兄), 14, 19, 20,  
21, 23, 25, 30, 37, 38, 44, 56, 109, 110, 156, 157, 439, 536, 659
- des Forêts, Louis-René, 路易-勒内·德佛莱, 198
- Desanti, Jean-Toussaint, 让-图桑·德桑蒂, 135, 376, 391, 392
-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68, 96, 98, 102, 109, 143, 166, 167, 209, 225,  
229, 297, 298, 299, 300, 412, 645
- Descombes, Vincent, 樊尚·德孔布, 245, 301
- Dhombres, Dominique, 多米尼克·东布勒, 263, 395, 585, 596
- Dhombres, Jean, 让·东布勒, 501
- Diagne, Souleymane Bachir, 苏勒马纳·巴希尔·迪亚涅, 345, 346
- Diatkine, René, 勒内·迪亚特金, 187, 352, 396, 399
- Dib, Mohammed, 默罕默德·迪布, 43
- Dichy, Albert, 阿尔贝·迪奇, 277, 609, 610, 611, 639
- Dick, Kirby, 科比·迪克, 10, 631
- Diderot, Denis, 德尼·狄德罗, 74, 551
- Dinner, Margaret, 玛格丽特·迪纳, 110, 112, 119
- Djaout, Tahar, 塔哈尔·贾乌特, 572
- Domerc, Jean, 让·多麦克, 46, 50, 54, 65
- Donato, Eugenio, 欧金尼奥·多纳托, 209, 383
- Dooley, Jackie, 雅基·都里, 635, 653
- Dosse, François, 弗朗索瓦·多斯, 203
- Doubrovsky, Serge, 塞尔日·杜布洛斯基, 354
- Doumergue, Gaston, 加斯东·杜美格, 21
- Dreyfu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22
- Droit, Roger-Pol, 罗日·波尔·德鲁瓦, 470, 540, 585
- Drumont, Édouard, 埃德华·德吕蒙, 22
- Dufourmantelle, Anne, 安娜·迪弗尔芒泰勒, 555
- Dumas, Alexandre, 大仲马, 42
- Dumas, Roland, 罗兰·杜马, 415
- Dupin, Jacques, 雅克·迪班, 327
- Durand, Claude, 克洛德·迪朗, 621

- Duras, Marguerite Germaine Marie Donnadiou, dite Marguerite, 玛格丽特·杜拉斯, 278, 425, 609
- Durkheim, Émile, 埃米尔·涂尔干, 80
- Dutoit, Thomas, 托马斯·迪托瓦, 559, 560
- Dutourd, Jean, 让·迪图尔, 398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约翰·彼特·爱克尔曼, 382
- Édimbourg, Philip Mountbatten, duc d', 爱丁堡公爵, 548
- Ehrmann, Jacques, 雅克·艾尔曼, 368
-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633
-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12
- Eisenman, Peter, 皮特·艾森曼, 463, 464
- Eribon, Didier, 迪迪埃·埃里邦, 467, 474, 540, 546, 569, 585
- Erskine-Hill, Howard, 霍华德·埃斯金-希尔, 547
- Escher, Maurits Cornelis, 莫利茨·克尔奈里·埃舍, 315
- Establet, Roger, 罗日·埃斯塔布莱, 189
- Étiemble, René Etiemble, dit, 安田朴, 565
- Étienne, Pierre, 皮埃尔·埃蒂安娜, 395, 397
- Ewald, François, 弗朗索瓦·埃瓦尔德, 246, 541
- Extra, Jean-Marc, 让-马克·埃克斯塔, 638
- Ey, Henri, 亨利·埃, 184
- Fabius, Laurent, 洛朗·法比尤斯, 428, 443
- Farias, Victor, 维克托·法里亚斯, 466 - 471, 475
- Fathy, Safaa, 萨法·法蒂, 598, 599, 631, 639, 658
- Faulkner, William, 威廉姆·福克纳, 130
- Faure, Edgar, 埃德加·富尔, 249, 250
- Faye, Jean-Pierre, 让-皮埃尔·费伊, 203, 243, 244, 267 - 269, 279, 295, 422, 423, 427, 428, 432, 433, 443, 444, 466
- Fédier, François, 弗朗索瓦·菲迪埃, 232, 240, 241
- Felman, Shoshana, 苏珊娜·费尔曼, 556
- Ferenczi, Sándor, 桑道尔·费勒齐, 352, 537
- Fernandez, Cidalia, 希达丽亚·菲尔南德, 634, 635
- Fernandez, Dominique, 多米尼克·菲尔南德, 54, 56

- Ferraris, Maurizio, 莫里兹奥·菲拉里斯, 11, 247, 314, 498, 520, 527, 529, 566, 575, 577, 624
- Ferry, Luc, 吕克·费里, 393, 447, 448, 489
- 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 181, 187, 189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戈特列布·费希特, 465
- Fieschi, Pascal, 帕斯卡·费希, 133, 141
- Finas, Lucette, 吕塞特·菲纳, 251, 254, 308, 312, 313, 317, 337, 358
- Fitzgerald, Scott,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 283
- Flacelière, Robert, 罗贝尔·弗拉瑟利埃, 183, 184, 262, 263, 274
- Flammarion, Charles-Henri, 夏尔-亨利·弗拉马里翁, 451
- Flammarion, Henri, 亨利·弗拉马里翁, 346, 374
- Flaubert, Gustave, 古斯塔夫·福楼拜, 94
- Fleurian, Dominique de, 多米尼克·德·弗勒里昂, 320
- Fliess, Wilhelm, 威廉·弗利斯, 64
- Fontenay, Elisabeth de, 伊丽莎白·德·丰特奈, 178, 223, 332, 342, 376, 387, 487, 488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12, 14, 86, 87, 92, 95, 164 - 169, 177, 192, 198, 202 - 204, 216, 218, 226, 229, 230, 255, 257, 277, 289, 296 - 299, 301, 302, 312, 319, 331, 370, 377, 389, 420, 430, 443, 448, 473, 544 - 546, 582, 599, 609, 642
- Foucher, Pierre, 皮埃尔·富歇, 58, 71, 72, 77, 78, 275, 533, 540
- Fouchet, Max-Pol, 马克斯-波尔·弗舍, 43
- Fouque, Antoinette, 安托瓦奈特·富克, 263
- France, François-Anatole Thibault, dit Anatole, 阿纳托尔·法朗士, 272
- Franck, Didier, 迪迪埃·弗朗克, 494, 498
- Francois jacob, 275
- Frank, Manfred, 曼弗莱德·弗兰克, 490
- Frege, 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戈特洛布·弗雷戈, 115
- Freire, Carlos, 卡洛斯·弗莱尔, 542
-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0, 57, 62, 64, 95, 183, 184, 205, 206, 210, 215, 217, 227, 231, 244, 259, 282, 283, 297, 301, 318, 335, 336, 350, 351, 352, 354 - 356, 365, 385, 386, 388, 426, 430, 448, 449, 537, 544, 577,

608, 609, 633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568, 570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菲雷, 447

Gabin, Jean-Alexis Moncorgé, dit Jean, 让·迦本, 553

Gadamer, Hans-Georg,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91, 265, 382, 403, 470 - 472, 575, 637

Galilée, Galileo Galilei dit, 伽利略, 227

Gallieni, Joseph, 约瑟夫·加利埃尼, 22

Gallimard, Antoine, 安托纳·迦里玛, 590, 635

Gandillac, Maurice Patronnier de,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 86, 90, 92, 98 - 100, 102, 117, 131, 135 - 138, 143, 144, 188, 189, 192, 208, 219, 220, 235, 246, 257, 265, 301, 391, 581

Garcia Düttmann, Alexander, 亚历山大·加西亚·迪特曼, 487, 490, 508, 517, 521, 534, 562, 612, 649

Gasché, Rodolphe, 鲁道夫·加什, 265, 383, 393, 431, 555

Gassendi, Pierre Gassend, dit, 皮埃尔·迦桑狄, 143

Gassman, Vittorio, 维托里奥·加斯曼, 238

Gauchet, Marcel, 马塞尔·戈谢, 389, 447

Geahchan, Dominique, 多米尼克·热尚, 355

Gearhart, Suzanne, 苏珊娜·吉尔哈特, 558, 651

Gehry, Frank, 弗兰克·盖瑞, 464

Gendreau-Massaloux, Michèle, 米歇尔·让德洛-玛萨鲁, 549

Genet, Jean, 让·热内, 12, 198, 199, 222, 246, 277, 278, 292, 293, 295, 318 - 320, 322 - 326, 357, 419, 430, 589, 609, 622

Genette, Gérard, 热拉尔·热奈特, 84, 133, 134, 138, 139, 141 - 143, 168, 177, 178, 221, 235, 251, 254, 271, 272, 335, 432

Genette, Raymonde Debray, Mme Gérard, 莱蒙德·德布雷, 热拉尔·热奈特夫人, 133, 134, 139, 141

Genève, Max, 马科斯·热奈夫, 388, 515, 609

Gere, Richard, 理查德·基尔, 625

Gide, André, 安德烈·纪德, 30, 41, 43, 61, 565

Giesbert, Franz-Olivier, 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伯特, 262, 574, 648

- Giovannangeli, Daniel, 丹尼尔·乔瓦南杰里, 372
- Girard, René, 勒内·吉拉尔, 209
- Giraud, Henri, 亨利·吉罗, 35
- Giroud, Lea France Gourdj, dite Françoise, 弗朗索瓦丝·吉鲁, 586
-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340, 344, 402, 430
- Glissant, Édouard, 埃杜阿·格利桑, 572, 650
- Glucksmann, André,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370, 371, 378
- Godard, Jean-Luc, 让-吕克·戈达尔, 532, 617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382
- Gogol, Nicolas Vassiliévitch,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180
- Goldmann, Jean-Jacques, 让-雅克·戈尔德曼, 625
- Goldmann, Lucien, 吕西安·戈尔德曼, 100, 131, 135, 209, 211, 221
- Goldschmidt, Georges-Arthur, 乔治-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467
- Gordimer, Nadine, 内丁·戈迪默, 460
- Gorki, Alekseï Maksimovitch Pechkov, dit Maxime, 马克西姆·高尔基, 130
- Gorz, André, 安德烈·戈兹, 452
- Gouhier, Henri, 亨利·古耶, 67, 86, 219, 220, 256
- Goux, Jean-Joseph, 让-约瑟夫·古, 259, 260, 286, 289, 292, 332, 554
- Granel, Gérard, 热拉尔·格拉奈尔, 58, 97, 168, 215, 216, 229, 230, 232, 271, 275, 276, 278, 301, 458, 515, 566, 568, 642, 677n
- Green, André, 安德烈·格林, 205
- Green, Julien, 朱利安·格林, 61
- Grenier, Jean, 让·格勒尼埃, 256
- Grisoni, Dominique, 多米尼克·格里索尼, 377, 378
- Gros, François, 弗朗索瓦·格罗, 501
- Grossman, Evelyne, 艾芙琳·格洛斯曼, 491, 589, 590
- Guattari, Félix, 菲利克斯·加塔里, 94, 300, 301, 322, 352, 582
- Guégan, Gérard, 热拉尔·盖冈, 570
- Guichard, Olivier, 奥利维耶·吉沙尔, 274
- Guitton, Jean, 让·吉顿, 256
- Gumbrecht, Hans Ulrich, 汉斯·乌里奇·冈布莱希特, 562
- Guyotat, Pierre, 皮埃尔·吉约塔, 277, 278

-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12, 489, 490, 611 - 613, 617, 619, 638
- Haby, René, 勒内·阿比, 340, 341, 342, 371, 376, 377, 380, 422
- Hadid, Zaha, 扎哈·哈西德, 464
- Hajek, Jiri, 基瑞·哈杰克, 410
- Halliday, Jean-Philippe Smet, dit Johnny, 强尼·哈里代, 642
- Hallier, Jean-Edern, 让-埃德恩·阿利耶, 177
- Hamacher, Werner, 维纳·哈马舍, 265, 393, 612
- Hantaï, Simon, 西蒙·昂塔伊, 604, 645
- Hartmann, Geoffrey, 杰弗雷·哈特曼, 324, 425, 482
- Harvey, Robert, 罗伯特·哈威, 536
- Hassner, Pierre, 皮埃尔·阿斯奈, 86
- Havel, Vaclav, 瓦克拉·哈维尔, 410
- Haverkamp, Anselm, 安瑟姆·哈弗坎普, 561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0, 49, 56, 95, 141, 146, 154, 170, 175, 176, 181, 187, 189, 190, 217, 220, 221, 234, 242, 254, 264, 271, 300, 319, 322 - 324, 338, 349, 350, 402, 448, 555, 578, 579, 608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9, 10, 12, 47, 49, 52, 53, 72, 91, 97, 100, 146, 147, 154, 173, 175, 182, 189, 190, 195, 201, 202, 218, 226, 227, 230 - 232, 240, 254, 263, 267, 268, 271, 272, 279, 300, 304, 305, 309, 310, 338, 349, 350, 364, 393, 407, 408, 410, 447, 448, 450, 458, 465 - 473, 475 - 478, 482, 483, 489, 504, 505, 506, 526, 544, 551, 592, 594, 605
- Hejdanek, Ladislav, 拉迪斯拉夫·海达奈克, 412, 421
-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恩斯特·海明威, 544
- Henric, Jacques, 雅克·亨利克, 245, 249
- Hergé, Georges Prosper Remi, dit, 埃尔热, 481
- Hersch, Jeanne, 热娜·赫什, 236
- Herve, Jane, 简·艾尔弗, 388
- Hésiode, 赫西俄德, 135
- Heurgon, Anne Heurgon-Desjardins, ou Anne, 安娜·埃尔贡, 100
- Heurgon, Édith, 艾迪特·埃尔贡, 392, 591, 593, 629
- Heurgon, Jacques, 雅克·埃尔贡, 41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67
- Hlavaty, Jirina, 基里娜·赫拉瓦蒂, 412, 414
- Hobson, Marian, 马里安·霍布森, 649
- Hoffmann, Ernst Theodor Wilhelm, 恩斯特·霍夫曼, 347
- Hölderli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382, 405, 507
- Houdebine, Jean-Louis, 让-路易·乌德比纳, 269, 279 - 281, 285 - 287, 566
- Hue, Robert, 罗贝尔·于, 571
-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50, 544, 561
- Hus Jan, 扬-胡斯, 410
- Husa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 410, 417, 419
- Husserl, Edmund, 埃德蒙·胡塞尔, 48, 49, 53, 56, 88, 90 - 92, 96, 97, 106, 111, 115, 116, 131, 132, 147, 152, 153, 154, 161, 162, 164, 165, 168, 170, 173, 176, 177, 178, 182, 185, 190, 208, 216, 217, 218, 221, 223, 229, 231, 234, 271, 310, 331, 338, 349, 350, 352, 389, 410, 430, 448, 450, 474, 494, 541, 605, 645
- Hyppolite, Jean, 让·伊波利特, 92, 95, 102, 116, 117, 132, 134, 135, 137, 138, 142, 144, 152, 164, 182, 185, 188, 189, 206, 208, 209, 211, 220, 223, 234, 235, 256, 265, 273
- Ibn Massara, 易本·马萨拉, 203
- Ibsen, Henrik Johan,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 440
- Irigaray, Luce, 露丝·伊利格瑞, 312, 332, 336, 393
- Iser, Wolfgang, 沃尔夫冈·伊瑟, 557
- Jabès, Arlette, Mme Edmond, 阿尔莱特·雅贝斯, 埃德蒙·雅贝斯夫人, 171, 172, 239
- Jabès, Edmond, 埃德蒙·雅贝斯, 170, 171, 176, 203, 217, 239, 314, 430, 642
- Jackson, George, 乔治·杰克逊, 277, 278
- Jackson, John E., 约翰·杰克逊, 309
- Jacob, Max, 马科斯·雅各布, 172
- Jagger, Michael Philip Jagger, dit Mick, 米克·贾格, 552
- Jakobson, Roman Ossipovitch, 罗曼·雅各布森, 227
- Jambet,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让贝, 466, 467, 470
-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斯, 544, 602

- Jamet, Dominique Benjamin, dit Dominique, 多米尼克·雅麦, 397
- Janicaud, Dominique, 多米尼克·亚尼克, 47
- Jankélévitch, Vladimir, 弗拉迪米尔·扬科勒维奇, 60, 86, 376
- Jannoud, Claude, 克洛德·亚努, 323, 540
- Jaruzelski, Wojciech, 沃杰希克·雅鲁泽斯基, 411
- Jaurès, Jean, 让·饶勒斯, 80
- Jeanson, Francis, 弗朗西斯·让松, 83
- Jelinek, Elfriede,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658
- Johnson, Barbara, 芭芭拉·约翰逊, 393, 481
- Johnson, Philip, 菲利普·约翰逊, 464
- Joliet, Jos, 若斯·若利耶, 346, 347, 365, 398, 524
- Joly, Guy, 居伊·若利, 396, 397
- Joly, Henri, 亨利·若利, 391
- Jospin, Lionel, 利奥奈尔·若斯潘, 439, 501, 579, 624 - 627
- Jouhaud, Edmond, 埃德蒙·儒奥, 147
- Jouve, Pierre Jean, 皮埃尔·让·儒弗, 172
- Joyce, James, 詹姆斯·乔伊斯, 111, 162, 177 - 179, 250, 328, 386, 437, 453
- Jung, Karl Gustav,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269, 448
- Juquin, Pierre, 皮埃尔·于甘, 84
- Kafka, Franz, 弗朗兹·卡夫卡, 272, 382, 417, 426, 529
- Kambouchner, Denis, 德尼·康布施奈, 344, 513
- Kamuf, Peggy, 佩吉·卡穆夫, 112, 483, 487, 508, 521, 524, 536, 558, 559, 566, 604, 635, 641, 649, 653
- Kant,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康德, 10, 44, 96, 102, 141, 146, 225, 264, 315, 334, 430, 465, 473, 474, 543, 555, 576, 578, 605, 608, 628
- Kastner, Rudolf, 鲁道夫·卡斯特纳, 239
- Kessel, Joseph, 约瑟夫·凯塞尔, 43
- Khatibi, Abdelkébir, 阿布代尔科比尔·卡蒂比, 399
- Khrouchtchev, Nikita Sergueïevitch,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12
- Kierkegaard, Søren, 索伦·克尔凯郭尔, 48, 53, 69, 367, 544
- King,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253
- King, Rodney Glen, 罗德尼·金, 544

- Klein, Mélanie, 梅拉妮·克莱因, 205, 352
- Kleist,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382
- Klossowski, Pierre,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198
- Kobayashi, Yasuo, 小林康夫, 394
- Kofman, Sarah, 萨拉·考夫曼, 14, 273, 303, 312, 317, 331 - 333, 342, 347, 357, 364, 365, 374, 375, 385, 393, 429, 446, 451, 452, 457, 506, 563, 579 - 581, 642
- Kohout, Pavel, 帕维尔·科胡特, 410
- Kojève, Aleksandr Vladimirovitch Kojevnikov, dit Alexandre, 亚历山大·科耶夫, 95, 254
- Koolhaas, Rem, 雷姆·库哈斯, 464
- Kosofsky Sedgwick, Eve,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556
- Krieger, Murray, 穆雷·克里格尔, 455, 456, 557, 558
- Kristeva, Julia,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221, 222, 227, 244, 248, 249, 260, 263, 269, 281, 286, 288, 289, 355, 504
- Kujundzic, Dragan, 德莱根·库均兹克, 635, 651 - 653
- Kyritsos, Alexandre, 亚历山大·克里特索斯, 581
- Labica, Georges, 乔治·拉比卡, 402
- Lacan, Jacques-Marie Émile Lacan, dit Jacques, 雅克·拉康, 12, 183, 184, 185, 191, 193, 203 - 205, 209 - 213, 250, 259, 262, 263, 280, 281, 286, 283, 300, 307, 311, 334 - 336, 344, 349, 352 - 355, 386, 388, 389, 430, 448, 449, 491, 503, 504, 543, 625
- Lacoste, Robert, 罗贝尔·拉科斯特, 113
-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14, 271 - 273, 299, 300, 304, 307, 310, 311, 331 - 335, 344, 347, 355, 365, 371, 374, 375, 385, 392, 393, 395, 398, 399, 407, 439, 451, 452, 457, 458, 468, 470 - 473, 503, 505 - 507, 531, 563, 572, 647
- Lacroix, Jean, 让·拉克鲁瓦, 192, 226
- Lafayette, Marie-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拉法耶特侯爵, 254
- Lamont, Michèle, 米歇尔·拉蒙, 349, 563
- Lamy, 拉米, 74
- Lang, Jack, 杰克·朗, 403, 422, 424, 427, 428, 549, 659

- Lanson, Gustave, 古斯塔夫·朗松, 47
- Lanzmann, Claude, 克洛德·朗兹曼, 544, 607, 622, 623
- Laporte, Jacqueline, Mme Roger, 雅克琳娜·拉波尔特, 罗日·拉波尔特夫人, 241
- Laporte, Roger, 罗日·拉波尔特, 14, 203, 204, 240, 241, 274, 292, 307, 314, 317, 318, 319, 359
- Laroche, Hadrien, 阿德里安·拉罗什, 278
- Laruelle, François, 弗朗索瓦·拉鲁埃尔, 314
- Las Vergnas, Raymond, 雷蒙·拉斯韦尼亚, 250, 254
- Lascault, Gilbert, 吉尔贝·拉斯科, 391
- Laurent, Jacques Laurent-Cély, dit Jacques, 雅克·洛朗, 77
- Lautréamont, Isidore Ducasse, dit le comte de, 洛特雷阿蒙, 207, 283
- Laval, Pierre, 皮埃尔·拉瓦尔, 76
- Lazarus, Jacques, 雅克·拉扎鲁, 176
- Le Dantec, Jean-Pierre, 让-皮埃尔·勒当代克, 464
- Le Doeuff, Michèle, 米歇尔·勒多夫, 342
- Le Pen, Jean-Marie, 让-玛丽·勒庞, 123, 627, 628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 81, 84
- Le Senne, René, 勒内·勒塞纳, 47
- Lebel, Jean-Jacques, 让-雅克·勒贝尔, 263
- Leclair, Serge, 塞尔日·勒克莱尔, 251, 449
- Leclerc, Annie, 安妮·勒克莱尔, 544
- Lecourt, Dominique, 多米尼克·勒古, 193, 262, 396, 398-401, 423, 427
- Lefèvre, M., 勒费弗里先生, 30, 41
-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95, 96, 170, 284
- Leiris, Michel, 米歇尔·莱里斯, 198, 430
- Lénine, Vladimir Ilitch Oulianov, dit, 列宁, 94, 193, 279, 280, 286
- Leone, Sergio, 塞尔吉奥·莱奥内, 532
- Leroi-Gourhan, André, 安德烈·勒鲁瓦-古尔让, 145, 200
- Lévesque, Claude, 克洛德·列维斯克, 383
- Lévi-Strauss, Claude,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2, 184, 193, 206, 211, 224, 225, 227, 275, 430, 491, 545, 599
- Levinas,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 12, 14, 169, 173-177, 195, 202, 203,

- 217, 218, 219, 222, 224, 229, 235, 240, 241, 315, 316, 319, 384, 391, 392, 430, 448, 468, 498, 582, 583, 605, 606, 642
- Levinas, Michaël, 米凯尔·列维纳斯, 645
- Lévy, Bernard Lévy, dit Bernard-Henri, 贝尔纳-亨利·莱维, 263, 264, 265, 370, 371, 373, 375, 377-379, 430, 569, 643
- Lévy, Élisabeth, 伊丽莎白·莱维, 648
- Lévy, Micheline (cousine de Jacques Derrida), 米什琳·莱维(雅克·德里达的表妹), 21, 25, 40, 87, 105, 110, 140, 535
- Lewinsky, Monica Samille, 莫尼卡·莱温斯基, 564
- Libeskind, Daniel, 丹尼尔·李伯斯金, 464
- Lillyman, William, 威廉姆·利利曼, 456
- Lindon, Jérôme, 热罗姆·兰东, 206, 277
- Linhart, Robert, 罗贝尔·林哈特, 193, 247
- Lisse, Michel, 米歇尔·利斯, 515, 640, 641, 644
- Liszt, Franz, 弗朗兹·李斯特, 266
- Litré, Émile, 埃米尔·里特雷, 201, 202, 601
- Lodge, David, 大卫·洛奇, 547
- Liotard,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271, 272, 302, 307, 377, 393, 417, 429, 444, 448, 452, 462, 463, 490, 544, 557, 642
- Mabin, Yves, 伊夫·马班, 563
- Macciocchi, Maria-Antonietta, 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 281, 285, 288, 295
- Macherey, Pierre, 皮埃尔·马舍雷, 183, 189, 192, 255, 571
- Macksey, Richard, 里查德·马克塞, 209, 252
- Maggiore, Robert, 罗贝尔·马焦利, 467, 469, 470, 570, 585
- Magnus, Bernd, 伯恩德·玛格努斯, 566
- Maine de Biran, Marie François Pierre Gontier de Biran, dit Pierre, 皮埃尔·曼恩·德·比朗, 605
- Major, Chantal, Mme René, 尚塔尔·马若尔, 勒内·马若尔夫人, 357, 522, 523
- Major, René, 勒内·马若尔, 354, 355, 257, 286, 439, 444, 449, 503, 505, 514, 522, 523, 550, 577, 608, 633, 657
- Malabou, Catherine, 卡特琳娜·玛拉布, 459, 501, 502, 551, 566, 579, 592, 597, 613, 615, 616, 617

- Malausséna, Serge, 塞尔日·马娄塞纳, 587 - 589, 590
- Malebranche, Nicolas,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67, 68
- Mallarmé, Stéphane, 斯特芬·马拉美, 170, 207, 252, 257, 258, 261, 267, 294, 321
- Mallet, Marie-Louise, 玛丽-路易丝·马莱, 342, 429, 487, 550, 592, 629, 639, 644, 657
- Malraux, André, 安德烈·马尔罗, 51, 154, 170, 642
- Mamère, Noël, 诺埃尔·马麦尔, 648
- Mandela, Nelson, 纳尔逊·曼德拉, 12, 158, 262, 460, 461, 598
- Mandouze, André, 安德烈·芒杜兹, 49, 637
- Mao-Tsé-Toung, 毛泽东, 193, 263, 269, 271, 285, 286, 289, 294, 370
- Marcel, Gabriel,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52, 100
- Marcello-Fabri, Marcel Louis Faivre, dit, 马赛罗-法布里, 157
- Marcus, Ruth Barcan, 露丝·马库斯, 404, 443, 547
- Margel, Serge, 塞尔日·马热尔, 584
- Marin, Louis, 路易·马兰, 393, 498, 641, 642
- Marion, Jean-Luc, 让-吕克·马里翁, 263, 461, 494
- Marion, Sylvie, 希尔维·马里翁, 417
- Martin, Bernd, 伯恩德·马丁, 467
- Martin, Jacques, 雅克·马丁, 182
- Martineau,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马尔蒂诺, 263, 408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83, 90, 135, 150, 175, 180, 183, 185, 187 - 189, 190 - 192, 211, 227, 230, 259, 266, 275, 276, 278, 286, 291, 295, 301, 332, 341, 343, 349, 372, 373, 388, 396, 402, 426, 447, 450, 462, 466, 485, 565 - 571, 572, 594, 597, 624
- Massignon, Louis, 路易·马西尼翁, 203
- Masson, André, 安德烈·马松, 292
- Massu, Jacques, 雅克·马絮, 113, 125, 126
- Mathieu, Paul, 保罗·马修, 47
- Maulnier, Thierry, 提耶尔·莫尼埃, 69
- Mauriac, 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77
- Mauriès, Patrick, 帕特里克·莫利耶斯, 527
- Mauroy, Pierre, 皮埃尔·莫鲁瓦, 403

- McCartney, James Paul McCartney, dit Paul, 保罗·麦卡特尼, 413  
 McDonald, Christie V., 克里斯蒂·麦克唐纳, 383  
 McDougall, Joyce, 乔伊斯·麦克杜加尔, 352  
 McMullen, Ken, 坎·麦克马伦, 425, 532  
 Mehlman, Jeffrey, 杰弗雷·迈尔曼, 481, 483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511, 544  
 Mendès France, Pierre, 皮埃尔·蒙戴斯·弗朗斯, 95, 98, 127  
 Merleau-Ponty, Maurice, 莫里斯·梅洛-庞蒂, 50, 60, 83, 88, 90, 91, 147, 162, 165, 545, 605  
 Mermoz, Jean, 让-麦墨兹, 22  
 Mersenne, Marin, 马兰·梅森, 143  
 Mesguich, Daniel, 丹尼尔·迈斯基什, 462, 531  
 Meskel, Jaquie, 雅基·麦斯凯尔(皮埃罗·麦斯凯尔的兄弟), 156  
 Meskel, Janine, 见 Derrida, Janine Meskel, Marc, 马克·麦斯凯尔(雅克·德里达的外甥), 155, 427  
 Meskel, Martine, 玛蒂娜·麦斯凯尔(雅克·德里达的外甥女), 155, 281-283, 342, 427, 512  
 Meskel, Michel, 米歇尔·麦斯凯尔(雅克·德里达的外甥), 155  
 Meskel, Pierrot, 皮埃罗·麦斯凯尔(雅克·德里达的妹夫), 155-157, 427  
 Metzger, Hans-Joachim, 汉斯·乔辛·麦茨格, 387  
 Meysenbug, Malwida von, 玛尔维达·冯·梅森葆, 306  
 Michaud, Ginette, 吉奈特·米肖, 644, 657  
 Michaux, Henri, 亨利·米修, 172  
 Michelet, Jules, 于勒·米什莱, 22, 465  
 Miller, Henry, 亨利·米勒, 130  
 Miller, Jacques-Alain, 雅克-阿兰·米勒, 184, 193, 222, 255, 263  
 Miller, Jay Hillis, 希利斯·米勒, 210, 252, 283, 284, 337, 404, 455, 456, 520, 526, 530, 558, 566, 605, 635, 639, 652  
 Milner, Jean-Claude, 让-克洛德·米尔纳, 193  
 Miquel, André, 安德烈·米盖尔, 546, 637  
 Mitchell, Thomas, 托马斯·米切尔, 562  
 Mitterr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密特朗, 95, 340, 402, 403, 415, 422, 427, 574

- Modiano, Patrick, 帕特里克·莫迪阿诺, 586
- Mollet, Guy, 居·摩勒, 113, 117
- Mondoloni, Jacques, 雅克·蒙多罗尼, 379
- Monory, Michel, 米歇尔·莫诺里, 14, 58-61, 63-66, 68-71, 77, 78, 88, 92, 93, 101, 103, 104, 107, 111, 113, 114, 115, 117, 118, 120-122, 131, 137, 145, 163, 196, 218, 405, 497, 499, 531
-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米歇尔·蒙田, 577, 578
- Montefiore, Alan, 阿兰·蒙特菲奥, 266, 410
-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德斯鸠, 183
- Morin, Edgar Nahoum, dit Edgar, 埃德加·莫兰, 275
- Morrisson, Toni, 托尼·莫里森, 572
- Mosconi, Jean, 让·莫斯科尼, 191
- Mouellé, Njoh, 乔·穆埃雷, 141
- Mounier,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穆尼埃, 52
- Muñoz, Osvaldo, 奥斯瓦尔多·穆诺兹, 510
- Naas, Michael, 迈克尔·纳斯, 562, 642
- Nabert, Jean, 让·纳贝尔, 47
- Nadeau, Maurice, 莫里斯·纳多, 590
- Nair, Sami, 萨米·纳伊尔, 574
- Nakano, Mikitaka, 干高中野, 296
- Nancy, Claire, 克莱尔·南希, 511, 513
- Nancy, Jean-Luc, 让-吕克·南希, 12, 14, 93, 158, 162, 224, 270-273, 299, 300, 304, 306, 307, 311, 331-334, 344, 355, 361, 365, 371, 375, 377, 378, 385, 386, 392, 393, 394, 395, 407, 439, 451, 452, 457, 468, 473, 506-508, 513, 514, 529, 531, 534, 562, 563, 572, 581, 599, 604-607, 613, 634, 639, 647, 657-659
- Nascimento, Evando, 伊万多·纳西曼托, 655, 656
- Nasser, Gamal Abdel, 加马尔·阿卜代尔·纳塞尔, 112
-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9, 10, 41-42, 56, 167, 175, 193, 195, 201, 226, 227, 252, 254, 264, 272, 273, 285, 301-303, 306, 345, 346, 349, 350, 383, 393, 430, 440, 448, 450, 465, 526, 557, 561, 578, 580, 582, 651
- Nijhoff, M., 尼霍夫, 173



- Nin, Anaïs, 阿纳伊斯·宁, 197
- Nora, Pierre, 皮埃尔·诺拉, 54, 74, 148, 150, 151, 152, 389, 446, 447, 622
- Ockham, Guillaume d', 吉约姆·多克阿姆, 498
- Ogier, Pascale, 帕斯卡·欧吉尔, 425, 426, 427, 532
- Olender, Maurice, 莫里斯·奥兰德尔, 516, 573, 683n
- Oliveira, Manoel de, 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 640
- Ollier, Claude, 克洛德·奥利耶, 203, 292, 314
- Ott, Hugo, 雨果·奥特, 467, 471
- Overney, Pierre, 皮埃尔·奥维内, 289, 295, 289, 296
- Ovide, 奥维德, 544
- Pachet, Pierre, 皮埃尔·帕舍, 323
- Pankejeff, Sergueï, 塞尔格伊·潘克杰夫, 352
- Paoletti, Catherine, 卡特琳娜·帕奥莱蒂, 550
- Papon, Maurice, 莫里斯·巴蓬, 155
- Parain, Brice, 布里斯·帕兰, 236
- Pariante, Jean-Claude, 让-克洛德·帕里安特, 46, 47, 49, 50, 53, 54, 59, 60, 218, 257
- Pascal, Blaise, 布莱斯·帕斯卡尔, 143
- Pasqua, Charles, 夏尔·帕斯卡, 37, 627
- Passeron, Jean-Claude, 让-克洛德·帕斯隆, 84, 251
- Pasternak, Boris Leonidovitch, 鲍里斯·雷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30, 180
- Patočka, Jan, 扬·帕托卡, 410, 412, 544
- Pautrat, Bernard, 贝尔纳·波特拉, 193, 194, 250, 251, 255, 285, 289, 296, 297, 301, 307, 333, 342, 345, 406, 407, 542
- Péguy, Charles, 查理·佩吉, 80
- Penel, Alain, 阿兰·佩纳尔, 226
- Perdriel, Claude, 克洛德·佩尔德里耶, 415
- Pérès, Shimon, 西蒙·佩雷斯, 597
- Pétain, Philippe, 菲利普·贝当, 28, 29
- Petit, Philippe, 菲利普·佩蒂, 621
- Peyrefitte, Alain, 阿兰·佩莱菲特, 398
- Peyrouton, Bernard Marcel, 贝尔纳·马塞尔·佩鲁顿, 29

- Pflimlin, Pierre, 皮埃尔·弗林姆兰, 125, 126
- Piaget, Jean, 让·皮亚杰, 135, 136
- Picard, Raymond, 雷蒙·皮卡尔, 203
- Piel, Jean, 让·皮埃勒, 168, 169, 174, 200, 206, 208, 209, 212, 216, 230, 312, 331, 371, 372, 375
- Pivot, Bernard, 贝尔纳·皮沃, 369, 513
- Platon, 柏拉图, 47, 59, 69, 212, 242, 243, 248, 252, 257, 264, 282, 292, 293, 327, 364, 386, 458, 463, 500, 555, 578, 605, 608, 654
- Plenel, Hervé Edwy Plenel, dit Edwy, 埃德维·普莱奈尔, 645, 654
- Pleynet, Marcelin, 马塞兰·普利耐, 203, 207, 285, 286, 288, 289, 294
- Plissart, Marie-Françoise, 玛丽-弗朗索瓦丝·普里萨, 15, 437, 462
- Plotin, 普罗提诺, 500
-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 252, 335, 419, 529
- Poirier, 普瓦里耶, 146
- Poirot-Delpech, Bertrand, 贝特朗·普瓦罗-戴尔佩奇, 375
- Poitou, Georges, 乔治·普瓦图, 406
- Polin, Raymond, 莱蒙·波林, 146
- Pompidou, Georges, 乔治·蓬皮杜, 248, 261, 274, 285, 340
- Ponge, Francis, 弗朗西斯·蓬热, 49, 69, 198, 346, 349, 392, 601, 602
- Pons, Alain, 阿兰·蓬斯, 86, 89, 401
- Pons, Roger, 罗日·蓬斯, 67, 74, 75
- Poulet, Georges, 乔治·普莱, 209, 210, 252, 482
- Poulet, Robert, 罗贝尔·普莱, 482
- Prévost, Claude, 克洛德·普雷沃, 267, 268
- Prigent, Jean, 让·普里让, 106
- Prigogine, Ilya, 伊利亚·普利高津, 427
-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24, 62, 293, 510, 516, 544, 602
- Pudlak, Jan, 扬·普德拉克, 415
- Puisais, Harris, 哈里斯·皮塞, 416
- Queneau, Raymond, 莱蒙·格诺, 130
- Quine, Willard, 威拉德·奎因, 547
- Rabant, Claude, 克洛德·拉邦, 192

- Raffy, Serge, 塞尔日·拉费, 625
- Ragon, Marc, 马克·拉贡, 540
- Ramond, Charles, 夏尔·拉蒙, 601
- Rancière, Jacques, 雅克·朗西埃, 183, 189, 192
- Rand, Richard, 理查德·兰德, 348, 479, 480
- Ravaisson, Jean Gaspard Félix Ravaisson-Mollien, dit Félix, 菲利克斯·拉韦松, 605
- Ravel, Maurice, 莫里斯·拉威尔, 62
-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460, 521
- Redeker, Robert, 罗贝尔·勒德克, 622
- Régnauld, François, 弗朗索瓦·雷尼奥, 193
- Rembrandt,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dit, 伦勃朗, 318
- Renaut, Alain, 阿兰·勒诺, 263, 393, 447, 448, 489
- Revel, Jacques, 雅克·雷韦尔, 431
- Reverdy, Pierre, 皮埃尔·勒维蒂, 172
- Rey, Jean-Michel, 让-米歇尔·雷伊, 312, 317
- Ricardou, Jean, 让·理夏杜, 203, 392, 591
- Richard, Jean-Pierre, 让-皮埃尔·理夏尔, 251, 261
- Richmond, Sarah, 萨拉·里奇蒙, 548
- Ricoeur, Paul, 保罗·利科, 14, 88, 146, 147, 153, 162, 164, 173, 188, 189, 193, 219, 220, 263, 270, 271, 282, 376, 389, 390, 391, 392, 400 - 402, 583, 584, 643, 644, 681n, 690n
- Risset, Jacqueline, 雅克琳娜·里塞, 244, 289
- Ristat, Jean, 让·里斯塔, 147, 292 - 295, 317, 321, 326, 332, 357, 446, 682n
- Rivière, Jacques, 雅克·利维尔, 42
- Robbe-Grillet, Alain, 阿兰·罗伯-格里耶, 85
- Robert, Paul, 保罗·罗伯特, 601
- Robin, Léon, 雷翁·罗班, 242
- Roblès, Emmanuel, 埃玛纽埃尔·罗布莱斯, 43
- Roche, Denis, 德尼·罗什, 494, 539
- Roche, Maurice, 莫里斯·罗什, 462
- Rodwin, 罗德温, 110, 119
- Rolland, Romain, 罗曼·罗兰, 80

- Romains, Louis Henri Jean Farigoule, dit Jules, 于勒·罗曼, 80
- Ronat, Mitsou, 米佐·罗纳, 269
- Ronell, Avital, 阿维塔尔·若奈尔, 381 - 384, 406, 415, 429, 486, 493, 517, 522, 534, 537, 545, 555, 561, 594, 595, 596, 601, 612, 618, 627, 634, 645
- Ronse, Henri, 亨利·荣斯, 230
- Rorty, Richard, 理查德·罗蒂, 562
- Rosat, Jean-Jacques, 让-雅克·罗萨, 342, 501
- Rosolato, Guy, 居·罗索拉多, 210
- Rostand, Jean, 让·罗斯当, 275
- Rottenberg, Pierre, 皮埃尔·罗滕博格, 244
- Roubaud, Jacques, 雅克·鲁伯, 462
- Roudinesco, Élisabeth, 伊丽莎白·鲁迪奈斯库, 33, 183, 184, 209, 212, 245, 269, 279, 355, 439, 448, 449, 469, 513, 523, 577, 599, 607, 620, 621, 657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0, 21, 41, 42, 193, 207, 225, 228, 230, 237, 243, 256, 338, 448, 608
- Roussel, Raymond, 雷蒙·鲁塞尔, 544
- Rousset, Jean, 让·鲁塞, 169, 170, 217
- Roy, Bruno, 布鲁诺·鲁瓦, 319, 320, 573
- Roy, Jules, 于勒·鲁瓦, 43
- Royle, Nicholas, 尼古拉斯·若伊勒, 649
- Rushdie, Ahmed Salman, 阿赫迈德·萨尔曼·拉什迪, 572, 586
-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dit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658
- Sachs, Maurice, 莫里斯·萨克斯, 61
- Saddam Hussein, Saddam Hussein Abd al-Majid al-Tikriti, dit, 萨达姆·侯赛因, 633
- Sade,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comte de Sade, dit le Marquis de, 萨德, 207
- Safar, Fortunée Temime, Mme Moïse (1880—1961), 福图内·塔米姆, 莫伊斯·萨法尔夫人(雅克·德里达的外祖母), 23, 27, 78
- Safar, Georges, 乔治·萨法尔(雅克·德里达的舅舅), 109
- Safar, Georgette Sultana Esther, 见 Derrida, Mme Aimé
- Safar, Moïse, 莫伊斯·萨法尔(1870—1943)(雅克·德里达的外祖父), 23, 27
- Sagawa, Issei, 佐川一政, 509
- Saint Augustin, 圣·奥古斯丁, 21, 23, 496, 619

- Saint Paul, 圣保罗, 528
-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安托纳·德·圣埃克絮佩里, 41
- Sakamoto, Rynichi, 坂本龙一, 631
- Salan, Raoul, 拉乌尔·萨朗, 125 - 127, 147
- Sallenave, Danièle, 达妮埃勒·萨勒纳夫, 332
- Sallis, John, 约翰·萨利斯, 562
- Salmon,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萨尔蒙, 572
- Sarraute, Claude, 克洛德·萨洛特, 509
- Sarrazin, Pierre, 皮埃尔·萨拉赞, 77, 78
-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10, 44, 45, 48 - 50, 52, 60, 69, 72, 76, 80, 83, 84, 88, 90, 91, 95, 98, 147, 150, 154, 162, 198, 254, 277, 289, 322, 326, 388, 572, 637, 658
- Saunier-Seité, Alice, 阿丽斯·索尼埃-赛依特, 401, 422
- Saussure, Ferdinand de,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201, 224, 227, 280, 349
- Savary, Alain, 阿兰·萨瓦里, 403
- Savigneau, Josyane, 若斯亚娜·萨维纽, 585
- Savin, Maurice, 莫里斯·萨文, 61, 62, 66, 72
- Scarpetta, Guy, 居·斯卡尔佩塔, 279, 566
- Schehadé, Georges, 乔治·舍阿德, 172
- Schérer, M., 谢赫, 75
- Schiller,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58
- Schlegel,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 325
- Schmitt, Karl, 卡尔·施密特, 578
- Schopenhauer, Arthur, 亚瑟·叔本华, 56
- Schwartz, Laurent, 洛朗·施瓦茨, 123
- Schwartzberg, Roger-Gérard, 罗日-热拉尔·施瓦兹堡, 428
- Searle, John Rogers, 约翰·塞尔, 12, 282, 299, 404, 429, 491, 494, 552
- Sebbar, Leila, 莱伊拉·塞巴尔, 200
- Sénèque, 塞内克, 551
- Serres, Michel, 米歇尔·塞尔, 54, 74, 86 - 88, 182, 255, 377
- Servan-Schreiber, Jean-Jacques, 让-雅克·塞尔万-施勒贝, 85
-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462, 531, 567

- Shapiro, Meyer, 梅耶·夏皮罗, 364
- Sharon, Ariel Scheinermann, dit Ariel, 阿利埃勒·沙龙, 646
- Shelley, Percy Bysshe, 珀西·比希·雪莱, 368
- Shmueli, Ilana, 伊拉娜·施姆利, 305
- Siclier, Sylvain, 希尔万·希克里耶, 591
- Socrate, 苏格拉底, 212, 243, 364, 386, 548
- Soljenitsyne, Alexandre Issaïevitch,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369
- Sollers, Philippe Joyaux, dit Philippe, 菲利普·索莱尔斯, 14, 177, 178, 180, 181, 196 - 198, 204, 207, 208, 216, 217, 221, 222, 227, 243 - 245, 247, 249, 253, 259, 260, 263, 266, 267, 269, 278 - 281, 285 - 289, 292 - 295, 313, 314, 325, 331, 370, 379, 405, 419, 420, 531, 566, 585, 625
- Sontag, Susan, 苏珊·桑塔格, 460, 572
- Souriau, Étienne, 埃提安纳·苏里奥, 134, 185
- Soustelle, Jacques, 雅克·苏斯戴尔, 98, 99, 113
- Spaak, Paul-Henri, 保罗-亨利·斯帕克, 482
- Spinoza, Baruch, 巴鲁赫·斯宾诺莎, 225
- Spire, Arnaud, 阿尔诺·斯皮尔, 571
- Spivak, Gayatri,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284, 350, 442, 478, 534, 555, 572
- Sprinker, Michael, 迈克尔·斯普林科, 133, 187, 189, 191, 291, 450, 566, 571
- Staline, Joseph Vissarionovitch Djougachvili, dit, 斯大林, 84, 291, 292, 565
- Stendhal, Henri Beyle, dit, 司汤达, 42
- Stephens, Mitchell, 米切尔·斯蒂芬斯, 552, 553
- Sterne, Laurence, 劳伦斯·斯特恩, 69
- Sternhell, Zeev, 兹夫·斯特海尔, 482
- Stiegler, Bernard, 贝尔纳·斯蒂格勒, 14, 458, 459, 512, 533, 534, 566, 586, 612, 656
- Stiegler, Bernd, 伯恩德·斯蒂格勒, 612
- Stora, Benjamin, 本雅明·斯托拉, 35
- Strindberg, Johan August,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440
- Supervielle, Jules, 于勒·苏佩维埃尔, 170, 172
- Szondi, Leopold, 雷奥坡德·斯丛狄, 239
- Szondi, Peter, 彼得·斯丛狄, 237, 239, 266, 381, 453, 454

- Taminiaux, Jacques, 雅克·塔米尼奥, 223, 224, 310
- Taousson, Jean, 让·塔乌松, 30, 36, 69
- Taubes, Jacob, 雅各布·托布斯, 382
- Temime, Fortunée, 福图内·泰米姆, 见 Safar, Mme Moïse
- Temime, Guy, 吉·泰米姆(雅克·德里达的表兄), 34
- Thatcher, Margaret Hilda Roberts, Mme Denis,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547
- Thévenin, Paule, 宝洛·泰弗南, 197-199, 249, 288, 289, 292, 307, 325, 326, 357, 415, 419, 462, 532, 588-590
- Thévenin, Yves, 伊夫·泰弗南, 198, 288
- Thibau, Jacques, 雅克·蒂博, 415
- Thibault, Jean-Marc, 让-马克·蒂博, 305, 579
- Thom, René, 勒内·托姆, 427, 547
- Thomas d' Aquin, 托马斯·阿奎那, 230
- Thomas, Henri, 亨利·托马斯, 405, 488
- Thomas, Louis-Vincent, 路易-文森·托马, 551
- Tillion, Germaine, 热尔曼那·蒂里庸, 150
- Tim, Louis Mitelberg, dit, 提姆, 313
- Titus-Carmel, Gérard, 热拉尔·提图斯-卡迈尔, 368, 425, 645
- Tocqueville, Alexis-Henri-Charles Clérel, vicomte de Tocqueville, dit Alexis de, 阿莱克西·德·托克维尔, 465
- Todorov, Tzvetan, 茨维坦·托多罗夫, 250, 384, 447
- Tolstoï, Lev Nikolaïevitch Tolstoï, dit Léon, 雷翁·托尔斯泰, 180
- Török, Maria Torok, ou, 玛丽亚·托洛克, 135, 351-353, 449, 534
- Tournier, Michel, 米歇尔·图尼埃, 100
- Tran-Duc-Thao, 陈德滔, 90, 162
- Tschumi, Bernard, 贝尔纳·楚米, 463
- Tubeuf, André, 安德烈·杜伯夫, 56
- Valéry, Paul, 保罗·瓦雷里, 42, 284, 541, 545
- Vallat, Xavier, 扎维耶·瓦拉, 29
- Van Breda, Herman, 赫尔曼·冯·布莱达, 90
- Van Gogh, Vincent, 文森特·凡·高, 364
- Vattimo, Gianni, 吉亚尼·瓦蒂莫, 541, 575, 613, 649

- Vercors, Jean Bruller, dit, 维尔高, 43
- Vergès, Jacques, 雅克·维尔热斯, 108
- Vernant, Jean-Pierre, 让-皮埃尔·韦尔南, 135, 209, 235, 411
- Verne, Jules, 儒勒·凡尔纳, 292
- Versini, Laurent, 洛朗·维斯尼, 101, 102, 108
- Veyne, Paul, 保罗·维纳, 84
- Vidal-Naquet, Pierre, 皮埃尔·维达-拿凯, 123, 400
- Villemain, Abel-François, 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勒曼, 202
- Villepin, Dominique Marie François René Galouzeau de Villepin, dit Dominique de, 多米尼克·德·维勒潘, 633, 637
- Virgile, 维吉尔, 643
- Virilio, Paul, 保罗·维里利奥, 452
-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it, 伏尔泰, 637
- Vuarnet, Jean-Noël, 让-诺埃尔·维阿尔奈, 306, 317
- Vuillemin, Jules, 于勒·维耶曼, 546
- Wagner, 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465
- Wahl, François, 弗朗索瓦·华尔, 221, 222, 335, 375
- Wahl, Jean, 让·华尔, 69, 100, 146, 165, 174, 236
- Waldheim, Kurt, 库特·瓦尔德海姆, 480, 486
- Warburton, William, 威廉姆·沃伯顿, 351
- Warminski, Andrzej, 安德泽·沃曼斯基, 556, 558
- Weber, Elisabeth, 伊丽莎白·韦伯, 493, 494, 614, 640
- Weber, Samuel, 萨缪尔·韦伯, 228, 237, 238, 266, 337, 456, 478, 507, 512, 523
- Weil, Simone, 西蒙娜·薇依, 59
- Weil, E., 魏伊, 176
- Weill, Nicolas, 尼古拉·维耶, 570
- Wiener, Jon, 若·维纳, 485, 486
- Wigley, Mark, 马克·威格利, 464
- Wills, David, 大卫·威尔斯, 639
- Winnicott, Donald, 唐纳德·韦尼科特, 352
- Wismann, Heinz, 海因兹·维斯曼, 300, 303, 305, 306, 344, 649
- Wittgenstein, Ludwig,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 204, 502, 594



Yacine, Kateb, 卡代布·亚辛那, 43, 460

Yerushalmi, Yosef Hayim, 约塞夫·哈伊姆·耶鲁沙米, 577

Zagury-Orly, Raphael, 拉法尔·扎古里-奥利, 613

Zeller, André, 安德烈·载勒, 147

Ziering Kofman, Amy, 艾米·齐尔林·考夫曼, 10, 631

Zola, Émile, 埃米尔·左拉, 42, 637

# 译后记：阅读德里达

2014年将是雅克·德里达（1930—2004）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详尽的《德里达传》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此刻中文版即将问世，这在我们擅长纪念的传统中也许恰逢其时。而对于一位终生被死亡的思想缠绕，其全部工作又深深植根于语言经验的思想家来说，一部由他人写成的传记，又被翻译成另一种“绝对他者”的语言，在他死亡十年之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一名以晦涩著称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厚重传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关于悼亡，关于记忆，关于续存，关于生命在文字中的呈现与不可现，关于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德里达已在他的80多部著作，散播于世界各地的无数讲演、研讨会、访谈及对话中一再述说。那么，短暂而又漫长的他已不在的十年之后，在他锐利的双眼、耀眼的白发，他的笔迹与声音遗留的痕迹——他无所不在的“幽灵”仍然萦绕着我们静默的哀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打开这本传记，阅读他的生活、生平、生命，仿佛去掀开已盖上的灵柩，窥探他已安息的身体与灵魂？我们为什么想要回到他的文字，聆听他的声音，当他已逝去十年？当他已不在，不再像生前孜孜不倦所做的那样，作出应答，回复我们的探询、我们的疑问和困惑时，我们为何阅读他？

德里达于2001年在中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他的作品至今已多有译介，他的名字亦早已为人所知。而除了他的“大名”之外，也许他的文字罕有得到真正的阅读，特别是，很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沉入他迷宫般的文字之网，遑论在注定佶屈聱牙的译文中。因此，借着这本传记，我们试图回答一个艰难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德里达？或者，阅读德里达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作为译者，我本无资格亦无能力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评述——这也绝不是一种

可以概括的思想。在此希冀与读者分享的只是从对他的阅读、倾听、翻译与转换的历险中拾取的些许心得，关乎的或许是面对这个世界和自身时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读方式，亦即生存方式。

## 重读与重写

德里达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浓缩于这一表述。他穿越哲学与文学的巨大文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朗肖、阿尔托、蓬热、热内——以令人惊叹的耐心与细心追踪其文字的编织、连缀、断裂与涂抹的痕迹，于无人辨识之处让力量与意义在文本中显现。而所谓“解构”，这个遭遇了太多滥用与误解的概念，在他那里却是最严密最关切，丝丝缕缕贴近原文的叩询，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经典文本因而被注入新的活的气息，与他的文字应和交缠，敷衍生成汪洋恣肆、溢出所有边界的书写。二元的对立，形而上学的等级，逻各斯的逻辑，结构与体系的完整均衡，一一从最细微的裂纹与皱褶处遭到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是破坏，不是虚无，而是独一无二的阅读经验，每一次都是重读，每一次也都是新的；这新的当中却有着反复抹去与重现的层积。阅读因此是多重的和多义的。书写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阅读都是重读，所有的书写也都是重写。其中层层累积着记忆与忘却，时间与空间，隔离与悬置，死亡与生命的经验。他的文字的艰险与晦涩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不是让人放心舒适的平铺直叙，而是在边缘，在巅峰，在出人意料处的峰回路转；不是一气呵成的贯通通畅，而是摸索，推敲，字斟句酌的掂量；不是故弄玄虚的语言奇技，而是书写过程本身不断的反躬自问，不断的自我修改和自我抹去，是思想蜿蜒的险峻路径。在德里达那里，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存在不会没有其反面，其另一面或另外许多面，不会不立刻带来对它的怀疑和质询，或者补充和置换。他的文本因而意义纷呈，句法繁复，有许多的“也许”、“大概”、“可能”，许多的条件式和虚拟式，许多的插入语，使意思分散、搁置、延迟，再重新上路，但也许改变了去向。这是思想的要求。要求复杂性，要求一再的质疑，一再审慎的诘问，拒绝简单化和两分法，也要求读者巨大的耐心与勇气，因为这样的文字可能将我们裹挟甚至淹没，我们从前所有的确定与安宁也许就此动摇。借用电影《别处的德里达》的广告词，他前来改变的并不是我们思考一切的方式，而是我们思考方式的一切。

## 介入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德里达 1980 年代以后的“政治转向”，因为他看起来更加关

注时事，思考的主题也远远不止于狭义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法律、美学、精神分析……而且，他也曾直接积极参与变革，如维护并呼吁增加高中的哲学课时，参与创建极具革新精神的文森纳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前身），创办国际哲学院，等等。但他对现实始终保持冷静的批评的警醒态度，远离匆忙的阵营选择，坚持从理论的高度与角度，用严密的分析捕捉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无论是面对战后巴黎知识界对苏联的顶礼膜拜还是“六八风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无论是冷战结束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逆向反思（《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对“9·11”事件的深入思索（《“9·11”的“概念”》），以及对死刑问题的探究，对伊拉克战争的谴责，对曼德拉的赞赏，等等。在此过程中，他阐发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概念：宽恕、好客、赠与、自我免疫，进而用概念的严谨与抽象将具体事件提升到哲学思索的层面。在此意义上，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萨特一代知识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介入传统，虽然他从未自诩为精神导师，从未认同萨特意义上的介入写作。

但从根本上，德里达的写作始终是政治的，因为始终是哲学的和诗的：关系，链接，立场，视角；也因为始终是“述行的”，即让事件降临于语言，让书写成为切入世界的行动。这种种政治性的烙印在他的晚年只不过更加凸显。而他所着力的却仍然是超越的思想，或曰思想的“绝境”，即思想尽头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如“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好客性，“绝对的”宽恕，“未来的”民主。这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性”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也唯有在思想的烛照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向未来敞开。

##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构成了德里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机。这一点是我们面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时常常容易忽略的。实际上，从殖民到独立（1830—1962），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与法国上百年难解的纠葛，对20世纪法国知识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生经验与之密切相关者，如加缪、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德里达、利奥塔、西克苏，而其中一些之所以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一代大师，与此经历不无关系。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2岁时因犹太身份被逐出学校，19岁第一次抵达巴黎，不久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困扰与撕裂。与加缪相似，对出生地难以割舍的眷恋和对去殖民化现实的清醒认知使德里达陷入痛苦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超验的经验，一块象征与隐喻之地，一个无解的悖论。阿尔及利亚就是疑难和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归属感的故国，熟悉的陌生地，绝对的他乡，但也提供了一个域外的视角，一段必要的批评的距离。德里达如同加缪笔下

的“异乡人/局外人”，从一个“外面的世界”渡过地中海来到“世界的中心”巴黎，实际上用“外界”消解了“中心”，带着距离和间隔打开了另外的视野，打开了边缘与边界，打开了对他者的审视，对同一性的质疑。他一生不见容于法国大学，游走于体制、大陆、体系、概念的边缘，也许根源即在于此。在德里达的思考中，阿尔及利亚也是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义词：无论民族、语言，还是信仰、历史。德里达以《他者的单语主义》解读阿尔及利亚，并在不同的语境中将之与解构的概念相联系：如果说解构的一个定义是“多于一种语言”的话，阿尔及利亚就是解构。

### 语言的经验与汉语的重生

德里达把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最终转化为语言的经验 and 自传——自我书写——的经验（《他者的单语主义》和《割礼忏悔录》），那是因为在移植于异地的法语中出生成长，视之为唯一的语言，却不属于他；法语是他者的语言，如母语一般的外语，是他挚爱的唯一书写源泉，而他必须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习语。在此经验中有些什么降临于文字：他所有关于他者、延异、<sup>8</sup>痕迹、涂抹、替补的思考原来永远已经（*toujours déjà*）镌刻于他的书写。

说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汉语；不能不说到作为在汉语语境中成长的读者读到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概念时那种奇异的似曾相识之感，似乎它与汉字有着某种隐秘的微妙的契合。从仓颉造字到甲骨遗迹，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再到文人的书画传统，汉字的奇异传承在印证了天地人之间的俯仰感应，也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德里达关于“元文字”的思考。也许重要的不是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的区别，西文与中文的比较，而是书写的经验如何构成人类业已湮灭又留存至今的文明的记忆，如何曾经是，并且终将是生命符码恒久的余存。还有，书写，作为实践、姿态、印记、刻画，也作为思想、记忆、时间的凝结，以及身体与精神的舞蹈，如何在我们“此在”的世界中开启了广阔丰盈、敏感深邃的“另一个”空间。借此，古老而常新、又饱受摧残的汉语也许会迎来某种运气（*chance*）或馈赠（*don*）。也许在对别语言、文化、思想的慷慨敞开与接纳中，在他者的映照中，以及对自身书写传统的反躬自省与孜孜求索中，汉语才有可能获得重生（*re-naissance*），那必定也是一种共生（*co-naissance*）。列维纳斯说，“语言的本质是好客与友爱”：用德里达的话便是，语言是唯一的不可能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赠与的可能性。汉语亦然。

我们永远无法以一些文字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以页码和年代串联起一个貌似井然有序的人生经验。而本书作者努力做到了一个传记作家的本分，即怀着忠实和虔敬，谨慎与节制，从千头万绪中捕捉梳理，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无数访谈提炼出活

的细节与事实，描述了一个孤独、脆弱而又强韧的人的故事，也刻画了一个一去不返的光辉时代，一个天才辈出的知识人群体，值得我们回顾咀嚼。

翻译是艰险的赌注，如同将译者许多年来穿越不同语言与边界的行走进行转换和结晶的过程，更何况浓缩在书里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跨界的历险。斯人已逝，世界亦随之终结；不单是逝者的世界，也是所有人的世界（德里达悼念亡友的文集题为：《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余下的我们都是踽踽独行、向死而生的幸存者。

中译本结稿之时，初夏的北京正笼罩在一片末世的阴霾之中；而追根溯源，西文的“末世”（源自希腊语 apocalypsis）也意味着“启示”。于幽暗中看到光，于哀悼中肯定生命，于终结处迎接未来。就像德里达（的幽灵）在给自己撰写的悼词中继续对我们说：“对我微笑吧，就像我会对你们微笑，直到最后。永远热爱生命，不断证实生命的续存……我爱你们，对你们微笑，无论我在何处。”这便是他的遗赠：微笑，生命，爱。

※ ※ ※

最后对中译本作一点补充说明。书中有为数不少的德里达原著的摘引：理想的做法是核对相应的中文版并注明出处，以方便读者参考。但由于时间匆促，工作量巨大，所有的引文均为译者直接从原文译出，未参照中文译本。译者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意，但想必与德里达著作已有的中文版翻译有相当出入，不当与不便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在此谨向原书作者伯努瓦·皮特斯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不仅拨冗与译者见面，而且多次邮件往来，对翻译中的问题作出解释与澄清。他还应译者之邀专门撰写了中文版序，回顾了德里达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中国读者对德里达的接受作出了殷切的展望。

还应该感谢的是因此书结缘的夏可君先生：他熟读德里达，在贯通中西的道路上令人仰止。他对此书的出版十分热情，并花大量时间通读译稿，提出了许多珍贵的建议。

我也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刘汀编辑一年多来的理解、支持与合作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国教师 Jean-Rémy Bure 和 Yoan Gandin：他们不仅是同事，也是相谈甚欢的朋友，对本书的翻译工作亦颇有助益。

魏柯玲

2013年5月，北京

Derrida

By Benoit Peeters

Copyright © Flammarion, 2010

Cover Copyright: Jacques Derrida, 1991 © Horst Tappe /Fondation Horst Tappe / Roger-Violet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3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